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

1851年8月—1853年2月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编译
列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邓仁娥
装帧设计:尹凤阁 王师颀
版式设计:程凤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十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2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ISBN 7-01-001984-3

I. 马…
II. 中…
III. 马恩著作-全集
IV. A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576 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MAKESI ENGESI QUANJI

第十一卷

马克思 恩格斯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编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年6月第2版 199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33.5 插页 11
字数:840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7-01-001984-3/A·204 定价 63.00元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
局编译的。

凡 例

1. 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2. 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3. 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的,引文中加圈点。处,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着重号的地方。

4. 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 未说明是编者加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 《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前 言

本卷收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1 年 8 月至 1853 年 3 月所写的政治论著、时事评论、声明和文件。

这一时期,1848—1849 年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已经平息,反动势力在整个欧洲巩固了自己的统治。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发动了政变,结束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了专制体制。它是欧洲除了沙皇制度以外的又一个反动势力堡垒,成了国际冲突和军事冒险的策源地。在 1849 年春夏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失败后的头几个月,还存在着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前景,而在波拿巴政变之后,反革命势力的地位暂时得到了巩固。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首要的任务是认真分析形势,从理论上继续总结革命的经验,找出革命失败的原因,并为制定工人运动在反动时期的战略和策略,为未来的革命斗争作准备。

本卷的首篇著作《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一组通讯。在此以前,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已经及时地评论了 1848 年德国革命中发生的事件,还写过有关的专著《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他对这次革命作了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述,分析了革命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并得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上的重要结论。

恩格斯指出，不能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恶意的煽动，“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革命爆发和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见本卷第5—6页）。他还发挥了马克思关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思想，指出：不同阶级的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的阶级对抗必然尖锐化，他们会分成不同的营垒，“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见本卷第37页）。

恩格斯用丰富的材料说明了各个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自由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掌握了政权，但它害怕人民，为革命运动的规模所吓倒，最终背叛了革命，与封建容克反动势力结成了联盟。小资产阶级由于其不坚定性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怯懦，不敢依靠人民，不敢依靠武装群众的支持，并且迷信议会制的权力。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最彻底的真正的战斗力量，“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见本卷第103页）。但德国的工人阶级人数还很少，还没有很好组织起来，不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恩格斯在文章中强调革命政党和革命者要有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的精神。他说：“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

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见本卷第 80 页)

恩格斯从革命的经验中概括了为取得武装起义胜利而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并为自己的武装起义的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指出,“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并具体地说明了革命政党在举行武装起义时必须遵循的一些规则,指出:“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见本卷第 99 页)

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可以说是《1848 年至 1850 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续篇。它虽是为评述法国阶级斗争的新发展,即 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而写的,但正如恩格斯 1885 年为这篇著作所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所说,在这里马克思用法国这段阶级斗争历史成功地检验了他首先发现的历史运动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详细地考察了法国二月革命以来的几个阶段的政治斗争的情况,陈述了波拿巴怎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他复辟帝制的计划。马克思指出,波拿巴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是法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二月革命后执政

的法国资产阶级在第二共和国时期奉行一系列反革命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它不断向二月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反攻的必然结果，是它的反革命本性的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18世纪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而19世纪中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见本卷第156页）

马克思阐述了资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总是短暂的，很快就达到了自己的顶点，而无产阶级革命肩负着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这一世界历史任务，它是彻底的，要“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揭露和纠正自己的错误，直至到达自己的宏伟目标。

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态度。他以法国的历史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以及各种不同形式，指出，一切资产阶级革命都没有动摇在君主专制时期就已经形成的军事官僚机器，而是把现存的国家机器看作是主要的战利品。“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见本卷第227页）无产阶级革命则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国家机器。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旧的军事官僚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

马克思阐明了农民与工人阶级结成革命联盟的必然性。他详细叙述了法国农民对波拿巴政变的态度。农民支持波拿巴是由于他们政治上落后和闭塞，脱离城市的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而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把农民仅仅当作征收苛捐杂税的对象，这使他们对革命失去了信任，转而支持波拿巴。此外，农民作为眷恋小块土地的私有者总是把拿破仑王朝的代表当作自己传统的保护者。波拿巴正

是利用了农民作为私有者的保守性。同时马克思也说明了法国农民具有革命的倾向。他在分析了法国小块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现状后写道,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小块土地所有者,拿破仑以法律形式保证农民能够自由地利用得到的土地并满足了他们的私有欲,可是,原是保证农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资产阶级制度下已经变成了农民贫困和破产的根源。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见本卷第232页)同时,马克思指出,由于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见本卷第235页)

恩格斯写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在内容上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相通的。恩格斯在这篇文章中简要而通俗地解释了波拿巴政变成功的原因。他还分析了政变后的形势,认为波拿巴政权只能暂时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但“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见本卷第264页)。他预言,第二帝国的寿命未必会比第一帝国的寿命长。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下一次革命高潮来到之前,革命者应当作长期的、耐心的、踏实的准备工作,可是流亡在伦敦和美国的一些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派代表人物却在搞冒险主义、唯意志论和把革命当儿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败坏革命者的声誉和危害革命事业的言行不能不表示义愤。收入本卷的《1851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流亡中

的大人物》和《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等著作都揭露和抨击了这些庸俗民主派代表人物,并维护了工人运动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纯洁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恩·德朗克的协助下撰写的抨击性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哥·金克尔、阿·卢格、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等人的劣迹和丑行,让人们了解这伙人的空虚庸俗的精神世界,平庸狭隘的哲学和政治观点,政治上的反复无常和好走极端。他们斥责这伙人喜好空谈,唱革命高调,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他们严正指出:这伙人“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谋叛的把戏”,“给了各邦政府以其所希望的借口,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运动”(见本卷第 386 页)。

1851 年 5 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些领导成员相继在德国被捕。普鲁士当局为了打击德国的革命工人运动,策划了一起反共产主义的审判案。为了营救被捕者,揭露德国反动当局对被捕者的陷害和对他们的身心的折磨,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了大量工作,撰写了许多有关这个案件的文章、声明和文件。马克思写的小册子《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是这方面的最重要文献。它充分地揭露了普鲁士当局在这个案件中采取的种种卑劣的手段,说明了资产阶级司法的倾向性和阶级性,资产阶级的“司法公正”的虚伪性。马克思指出:“陪审团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见本卷第 545 页)马克思反驳了强加给共产党人的所谓“密谋叛国”的莫须有的罪名。他郑重声明,共产主义者同盟不是阴谋家的团体,而是一个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目的的秘密团体。他公开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宗派主义分子和冒险主义分子划清了界限,指出他们的言行只能损害工人阶级的运动,并为

警察当局所利用。

科隆案件结束之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在1852年11月停止了在英国的活动,并宣布同盟在欧洲大陆上继续存在已不适宜。这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一个组织已不复存在。

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文章在本卷占很大的篇幅。文章主要是评述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生活。

在《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选举中的舞弊》、《选举的结果》等文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英国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制度的反人民的本质,说明英国传统的两党制不过是由托利党这一土地所有者利益的代表和辉格党这一资产阶级的贵族代表的轮流执政。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英国选举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质,它剥夺了大多数人的选举权。他还描述了选举中的贿赂行为。

马克思在一些文章中分析了英国工人维护自己经济利益的较为重大的事实,他特别关心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他热情支持宪章派,高度评价作为宪章派纲领的中心点的普选权。在《宪章派》一文中,马克思探讨了在英国工人阶级通过和平的议会的方式取得政权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英国不存在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并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可以通过普选权取得重要的政治权力,并说:“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等于政治权力”(见本卷第424页)。在马克思的指导和组织下写成的《评有关政变的著作》的第四篇文章,对普选权作了补充性的解释:普选权一旦争得,也“只是朝着革命方向迈进的决定性的第一步,是人民组织自己的队伍所必需的一块地盘,是迄今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战争可能最终借以公正地打到底的公开战场,一言以蔽之,是人民解放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见本卷第747页)。

在《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大不列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说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他说：“现代工商业经历着5—7年的周期性的循环，在此循环中，有规律地相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贸易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见本卷第447页）

在《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了不列颠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特征，叙述了萨瑟兰家族如何残酷地剥夺农民并把他们从世代居住的土地赶出去。他写道：“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么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共的土地，通过骗人和杀人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权利根据。”（见本卷第614页）。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了这篇通讯中有关萨瑟兰家族发家的历史材料。

马克思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通讯中对大陆上发生的事件也及时地作出反应。马克思对1853年2月在意大利爆发的反对奥地利统治的米兰起义深表关切。在《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拿破仑的遗嘱》和《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和流亡者》中，他对这次起义作了评述。他高度赞扬米兰起义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同时忠告意大利革命者不要采取冒险主义的行动，不要搞“即兴的革命”，指出“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

召已经不够了”(见本卷第 641、642 页)。

本卷附录中收入了约·格·埃卡留斯、厄·琼斯、阿·克路斯、查·德纳、约·魏德迈、威·皮佩尔、卡·施奈德第二的文章,它们都是作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和参与下写成的。从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如何吸引他们的朋友参加各种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揭露科隆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紧张活动。

本卷收入的文献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版相应时期有关卷次收入的文献增加 21 篇,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3 篇:《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针对科隆案件结束发表的声明》;附录 18 篇:《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合作 它的现状和它应当是什么样的》、《三比一。或工人阶级的力量》、《科苏特是什么人》、《针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关于在科隆被关押的共产党人的境况》、《普鲁士的司法》、《德国的运动及其“尖顶”》、《普鲁士的司法和〈普鲁士报〉》、《即将来临的危机及其原因》、《关于 1852 年的英国议会选举》、《评有关政变的著作》、《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延期审判的短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辩护词》、《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秘密协会和共产党人案件》。《暴风雨的第一声响雷》。原收入第 1 版的《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经考证不是马克思写的,是查·德纳的手笔,现收入附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著作都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和 1984 年第 1 部分第 12 卷翻译或重新作了校订。

目 录

前言	1—9
弗·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3—112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5
[二 普鲁士邦]	14
[三 德国其他各邦]	24
[四 奥地利]	29
[五 维也纳起义]	36
[六 柏林起义]	40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45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50
[九 泛斯拉夫主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 秦因的战争]	55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60
[十一 维也纳起义]	64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70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78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83
[十五 普鲁士的胜利]	88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93

[十七 起义]	97
[十八 小生意人]	102
[十九 起义的终结]	107
卡·马克思 * 1851 年夏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 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	113—121
卡·马克思 声明	122—125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127—240
一	131
二	142
三	155
四	171
五	183
六	202
七	222
弗·恩格斯 英国	241—255
[I]	241
[II]	25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 的信	256—258
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 的真正原因	259—271
[一]	259
[二]	264
[三]	269
卡·马克思 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	272—273
卡·马克思 * 致《科隆日报》编辑部的声明	274—27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中的大人物	277—407
一	279
二	303
三	311
四	316
五	319
六	336
七 古斯塔夫和斋戒移民区	344
八	346
九	350
十	359
十一	366
十二	377
十三	385
十四	402
十五	406
卡·马克思 克拉普卡将军	408—410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 《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	411—414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415—421
卡·马克思 宪章派	422—431
卡·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	432—438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	439—445
卡·马克思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 商业危机	446—453
卡·马克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	454—459

卡·马克思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	460—464
卡·马克思	*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	465—470
卡·马克思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471—545
一	前言	475
二	狄茨档案	481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485
四	原本记录	501
五	《红色问答书》的附函	529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532
七	判决	540
弗·恩格斯	*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科隆 共产党人案件审理期间寄给辩护人的文件的 目录	546—5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科隆案件	548—549
卡·马克思	科隆案件	550—551
卡·马克思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	552—553
卡·马克思	* 针对科隆案件结束发表的声明	554—55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最近的科隆 案件的最后声明	559—562
弗·恩格斯	最近的科隆案件	563—570
卡·马克思	* 关于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无产 阶级代表及其家属的呼吁书	571—572
卡·马克思	议会。——11 月 26 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	573—580
卡·马克思	答科苏特的“秘书”	581—582

卡·马克思 内阁的失败	583—588
卡·马克思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 及其他	589—595
卡·马克思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俄 死人事件	596—606
卡·马克思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	607—615
卡·马克思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	616—624
卡·马克思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 ——政局	625—633
卡·马克思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634—639
卡·马克思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起 义。——不列颠的政策。——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	640—650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 ——饿死人	651—657
卡·马克思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 ——科布顿先生	658—666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政府 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泰晤士报》 和流亡者	667—674

附 录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	677—684
厄内斯特·琼斯 合作 它的现状和它应当是什 样的	685—694
厄内斯特·琼斯 三比一。 或工人阶级的力量	695—699
厄内斯特·琼斯 科苏特是什么人	700—707
厄内斯特·琼斯 * 针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	708—710
阿道夫·克路斯 * 关于在科隆被关押的共产 党的境况	711—714
查理·德纳 普鲁士的司法	715—717
约瑟夫·魏德迈 德国的运动及其“尖顶”	718—721
约瑟夫·魏德迈 * 普鲁士的司法和《普鲁士报》	722—724
厄内斯特·琼斯 即将来临的危机及其原因	725—727
约瑟夫·魏德迈 * 关于 1852 年的英国议 会选举	728—730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 * 评有关政变的著作	731—764
查理·德纳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	765—768
约瑟夫·魏德迈 * 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延期 审判的短评	769—770
威廉·皮佩尔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771—777
卡尔·施奈德第二 * 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的 辩护词	778—788
威廉·皮佩尔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789—792

约瑟夫·魏德迈 秘密协会和共产党人案件	793—796
厄内斯特·琼斯 暴风雨的第一声响雷	797—803
注释	807—877
人名索引	878—969
文献索引	970—1028
报刊索引	1029—1047

插 图

弗·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译本 1930 年 上海版和 1939 年延安解放社版(作为“马恩丛书”第 8 种) 的封面和译文	6—7
载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的《纽约每日论坛报》 原版的一部分	88—89
卡·马克思的《声明》的手稿	123
卡·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旧译《拿破仑第 三政变记》)一书中译本 1930 年上海版和 1940 年延安解放 社版(作为“马恩丛书”第 11 种)的封面和译文	128—129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革命。不定期 刊物》第 1 期的扉页	129
弗·恩格斯的《英国》的手稿第 1 页	243
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 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267
《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手稿的一页	358—359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巴塞尔 第 1 版的扉页	473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 年	

波士顿版的扉页	533
载有卡·马克思的《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一文的 《人民报》原版的一部分	608—609

卡 · 马 克 思
和
弗 · 恩 格 斯

1851 年 8 月—1853 年 3 月

弗·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¹

弗·恩格斯写于 1851 年 8 月
17 日—1852 年 9 月 23 日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和 28 日，
11 月 6、7、12 和 28 日，1852 年
2 月 27 日，3 月 5、15、18 和 19
日，4 月 9、17 和 24 日，7 月 27
日，8 月 19 日，9 月 18 日，10 月
2 和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一 革命前夕的德国]

欧洲大陆上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已经闭幕了。1848年大风暴以前的“过去的当权者”，又成为“现在的当权者”了，而那些多少受人欢迎的短期掌权者，如临时执政者、三头执政、独裁者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民政委员、军事委员、地方长官、法官、将军、军官、士兵等等，都被抛到异国，“赶到海外”，赶到英国或美国去了。他们在那里组织起新的“有名无实的”政府、欧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民委员会，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布它们的成立，那些文告的庄严堂皇，并不亚于真正当权者的文告。

很难想象出还有什么失败比大陆的革命党派（更确切些说是各革命党派）在全战线各个据点所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为了争取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英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8年^①，而法国中间阶级不是经过了40年^②空前的斗争吗？中间阶级不正是在复辟了的君主制以为自己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巩固的时刻才最接近自己的胜利的吗？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

① 指1640—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② 指1789—1830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编者注

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锁打碎。所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那么我们除了从头干起之外再无别的办法。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次大约很短暂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个别人活动的结果，而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此外，研究和揭示革命动荡及其被镇压下去的原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具有极重要的意义。所有这些琐碎的个人争论和互相责备，所有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说把革命之舟驶向暗礁以致使它触礁沉没的是马拉斯特，或者是赖德律-洛兰，或者是路易·勃朗，或者是临时政府的其他成员，或者是他们全体，——这一切对于从远处来观察这种运动、因而不了解事件的详情细节的美国人或英国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

会相信,多半都是庸才、既不能为大善也不能作大恶的11个人^①能在3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3600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3600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11个人同样缺乏。问题正在于这3600万在一定程度上还在昏暗中摸索的人怎么突然应当自己决定走什么道路,而后来他们又怎么迷了路而让他们从前的领袖暂时回到了领导地位。

因此,如果我们要向《论坛报》的读者说明1848年德国革命必然发生以及它必然在1849年和1850年暂时遭到镇压的原因,那么我们就无须叙述德国发生这些事件的全部历史。将来的事变和后代的评论会判定,在这一大堆杂乱的、看来是偶然的、互不连贯而又矛盾的事实中,哪一部分将构成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解决这一任务的时候尚未到来。我们现在只限于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论述,如果我们能根据确凿的事实找出合理的原因来说明那个运动的主要事件和根本性的转折,使我们能够认清下一次、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出现的爆发将指示给德国人民的方向,那么我们就满足了。

那么,首先,革命爆发时德国处于怎样一种状况呢?

在德国,作为一切政治组织的基础的人民中的各个阶级构成比任何别的国家都更为复杂。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而富裕的中间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沦为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形式,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留着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封建领主甚至还保留着对租佃者的审判权。他们虽然被剥夺了政治上的特权——对各邦君主的控制权,

^① 即1848年2月24日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的成员。——编者注

但他们几乎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对他们领地上的农民的那种中世纪的统治权以及不纳税的权利。封建制度在有些地区比在另一些地区更为盛行，除了莱茵河左岸，它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完全被消灭。²这种封建贵族当时人数很多，一部分也很富裕，被公认为国内的第一“等级”。他们充任政府的高级官吏，军队里的军官也差不多全是他们。

当时德国的资产阶级远没有英国或法国的资产阶级那样富裕和集中。德国的旧式工业因蒸汽的采用和英国工业优势的迅速扩张而被摧毁了。在拿破仑的大陆体系³之下开始出现的、在国内其他地方所建立的现代化的工业，既不足以补偿旧式工业的损失，也不能保证工业有足够强大的影响，以迫使那些对于非贵族的财富和势力的任何一点增强都心怀忌妒的各邦政府考虑现代工业的要求。法国在50年的革命和战争中成功地经营了自己的丝纺织业，而德国在这个时期却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旧式的麻纺织业。此外，德国的工业区少而分散；它们在内地，主要是利用外国的——荷兰或比利时的——港口进行进出口贸易，所以它们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大商港很少有或毫无共同的利益；而最重要的是，它们不能建立像巴黎和里昂、伦敦和曼彻斯特那样巨大的工商业中心。造成德国工业的这种落后状态的原因很多，但是只要举出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的地理位置不利，距离已经成为世界贸易要道的大西洋太远；从16世纪到现在，德国不断卷入战争，而这些战争又都是在它的国土上进行的。英国资产者自1688年即已享有政治统治权，法国资产者自1789年也已夺到了这种统治权，但德国的中间阶级由于人数少，尤其是由于非常不集中，没有能够获得这种权力。可是，自从1815年以来，德国中间阶级的财富不断增加，而且随着财富的增加，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不断增长。各邦政府虽不愿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考虑一下它的直接

的物质利益。我们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各小邦宪法中给予中间阶级的每一点政治势力，在 1815—1830 年和 1832—1840 年这两个政治反动时期虽然都又被剥夺了，但中间阶级却得到了更实际的利益作为补偿。中间阶级每次政治上的失败，都带来贸易立法方面的胜利。当然，1818 年普鲁士的保护关税条例以及**关税同盟**⁴的建立，对于德国商人和工业家来说，要比在某一小公国的议会中拥有对嘲弄他们的表决权的大臣们表示不信任的那种不大可靠的权利重要得多。这样，随着财富的增多和贸易的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利益的发展受到本国政治制度的约束，国家被 36 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在交通方面蒸汽的普遍采用，国内贸易中日益加剧的竞争，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它们全都转到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了，德国中间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普鲁士的**资产阶级**领导德国中间阶级运动的时候开始的。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1840—1847 年的这个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运动。

国民的大部分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和工人，以及农村中的农民。

在德国，由于大资本家和大工业家作为一个阶级尚不发达，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人数非常之多。在较大的城市中，它几乎占居民的大多数；在较小的城市中，由于没有更富裕的竞争对手同它争夺势力，它完全居于支配地位。这个阶级在所有现代国家和现代革命中，

都居于极重要的地位，而在德国则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国各次斗争中，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地位是介于较大的资本家（商人和工业家）即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或产业工人阶级之间，这种地位就决定了它的特性。它力图爬上资产阶级的地位，但命运中的一点点不顺利就把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抛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在君主制的和封建的国家里，这个阶级的生存要仰赖于宫廷和贵族的惠顾，失去这些主顾，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就会破产。在较小的城市里，驻军、地方政府、法院以及它们的属员，通常便是这个阶级繁荣的基础，没有这些，小店主、裁缝、鞋匠、木匠等就无法生存。因此，这个阶级永远摇摆在两者之间：既希望跻身于较富有的阶级的行列，又惧怕堕入无产者甚至乞丐的境地；既希望参加一份对公共事务的领导以增进自己的利益，又唯恐不合时宜的对抗行为会触怒政府，——他们的生存是操在政府手里的，因为政府有权力使他们失掉最好的主顾；他们拥有的财产很少，而财产的稳固程度是与财产的数额成正比的，因此，这一阶级的观点是极端动摇的。它在强有力的封建或专制君主政府面前卑躬屈膝，百依百顺，但当中间阶级得势的时候，它就转到自由主义方面来；一旦中间阶级获得了统治权，它就陷入强烈的民主主义狂热，但当低于它的那个阶级——无产阶级企图展开独立的运动时，它马上就变得意气消沉，忧虑重重。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在德国，这个阶级如何在种种不同的状态中变来变去。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的演变，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中间阶级的生存条件的发展同时进行的。在中间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

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变得刻不容缓而再也不可能推迟;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可能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19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就终于会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现在,在德国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大不列颠的工业巨头是最好的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方法,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细木工,后者的生活和工作方法,与500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伴随着差不多同样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在革命刚爆发时,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人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公会,那是毫不奇怪的。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往便利,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智力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明确得多,而且更加符合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中间阶级的积极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那么工人阶级的积极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我们在下面很快就有机会来考察这一运动所经过的各个阶段。

最后,还有一个广大的小农业主阶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加上附属于它的农业工人,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这个阶级本身又分为

不同的部分。第一是富裕的农民，在德国叫作**大农和中农**，这些人都拥有面积不等的大片农田，都雇用若干个农业工人。对这个处于不纳捐税的大封建地主与小农和农业工人之间的阶级来说，最自然的政治方针当然就是同城市中反封建的中间阶级结成联盟。第二是小自由农，他们在莱茵地区占据优势，因为这里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国大革命的有力打击之下垮台了。在其他省份的某些地区也有这种独立的小自由农存在，在这些地方，他们赎买了从前加在他们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可是这个阶级只是名义上的自由的所有者阶级，他们的财产大都在极苛刻的条件之下抵押出去，以致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并不是农民，而是放债的高利贷者。第三是封建佃农，他们不容易被赶出所租的土地，但他们必须永远向地主交租，或永远为地主服一定的劳役。最后是农业工人，在许多大农场中，他们的状况和英国的这个阶级的状况完全一样，他们由生到死都处在贫穷饥饿之中，做他们雇主的奴隶。农村居民中后面这三个阶级——小自由农、封建佃农和农业工人，在革命以前是从来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但这次革命显然已经为他们开辟了一个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新天地。革命对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有利，因此可以预料，一旦运动全面展开，他们就会一个跟着一个参加进来。但同时，农村居民由于分散于广大地区，由于难以达到大多数的意见一致，所以他们永远不能胜利地从事独立的运动，这一点也同样是十分明显而为各个现代国家的历史所证实了的。他们需要更集中、更开化、更活跃的城市居民的富有首创精神的推动。

上面对在最近的运动爆发时构成德国民族的各个最重要的阶级的概述，已经足以说明这次运动中普遍存在的不一致、不协调和明显的矛盾等情况的一大部分。当如此各不相同、如此互相矛盾而又如此奇异地互相交织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的时候，当各地区各省的这些

互相冲突的利益以各种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当德国没有伦敦或巴黎那样一个大的中心的时候(这种城市的各项权威性的决定,可以避免每一个地区每一次都要用斗争来重新解决同一的争论),除了斗争被分解成许多不相联系的格斗,因而耗费大量的鲜血、精力和资本而仍然得不到任何有决定意义的结果而外,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呢?

德国在政治上分解成 36 个大大小小的公国,也同样要用组成这个国家而在每个地方又各有特点的各种成分的混乱与复杂来解释。没有共同的利益,也就不会有统一的目的,更谈不上统一的行动。不错,德意志联邦⁵曾宣称是永远不可分割的,但联邦和它的代表机关联邦议会⁶,却从来没有代表过德国的统一。德国中央集权所达到的最高点,是关税同盟的成立。北海一带的各邦也曾经因此不得不组成它们自己的关税联盟⁷,而奥地利则仍然关起门来实行它自己单独的禁止性关税。这样,德国可以满意了,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实际目的现在仅仅分成 3 个独立的势力,而不是 36 个。当然,1814 年建立起来的俄国沙皇的无上权威,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变动。

根据我们的前提得出这些初步结论之后,在下一篇里我们就要谈到德国人民的上述各个阶级怎样一个跟着一个卷入运动,以及这个运动在 1848 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所具有的性质。

1851 年 9 月于伦敦

[二 普 鲁 士 邦]

德国中间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1840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⁸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滕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中间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律师、职业的反党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Volksmänner),在做了20年喧嚷然而总

是毫无成效的反对派之后，被 1848 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中间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 年的事件⁹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 1830 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¹⁰。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中间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中间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

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准确的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遍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的最严重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普鲁士

前国王^①——1815年神圣同盟¹¹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②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中间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屏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才，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¹²（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¹³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己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中间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很会打算盘，而封建主义自唐·吉河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 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中间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中间阶级取

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 15 个月之后就被查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 1842 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1820 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¹⁴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 1823 年成立的。王国 8 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8 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 8 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¹⁵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

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1813年和1815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¹⁶(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1846年秋天的事,次

年2月国王就把所有8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¹⁷。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1820年法令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中间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中间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

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1840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1843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¹⁸，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宗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1847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

工商业中间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低声地说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時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1851年9月于伦敦

[三 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 1840 年至 1848 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 1830 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⁶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⁸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种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 1830 年和 1831 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谄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中间阶级，1840 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¹⁹并

因他们单独召开会议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²⁰的立宪派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⁵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中间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兄跑。商人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

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²¹和自由公理会²²。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一派的或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²³,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²⁴被拿破仑

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达，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想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商人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²⁵。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 1847 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中间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中间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生意人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

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字。有哪个国家的中间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年9月于伦敦

[四 奥 地 利]

我们现在应该来看看奥地利，这个国家在 1848 年 3 月以前不为外国人所了解，差不多就像最近一次同英国作战以前的中国^①一样。

当然，我们这里只能研究德意志的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或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不属于本题范围；至于 1848 年后他们对德意志的奥地利人的命运的影响，我们将在以后来谈。

梅特涅公爵的政府所遵循的两个方针是：第一，使奥地利统治下的各民族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受到所有其他处于同样境地的民族的牵制；第二，这向来是一切专制君主制的基本原则，即依靠封建地主和做证券生意的大资本家这两个阶级，同时使这两个阶级的权势和力量互相平衡，以便政府保留完全的行动自由。以各种封建收益作为全部收入的土地贵族，不能不支持政府，因为政府是他们对付被压迫的农奴阶级（他们靠掠夺这些农奴为生）的唯一靠山。而每当他们之中较不富裕的一部分起来反对政府的时候，例如 1846 年加利西亚的情形，梅特涅立刻就纵使这些农奴去反抗他们，因为这些农奴总是力图抓住机会狠狠地报复他们的直接压迫者²⁶。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大资本家由于大量投资于公债，也受到梅特涅政府的束缚。奥地利在 1815 年恢复了它的全部实力，1820 年后又在意大利恢复和维持了专

① 即鸦片战争(1839—1842 年)以前的中国。——编者注

制君主制,1810年的破产²⁷又免除了它的一部分债务,所以,在媾和之后,它很快就在欧洲各大金融市场重新建立了信用;而信用越是增长,它也就越是加紧利用这种信用。于是,欧洲的一切金融巨头都把他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投于奥地利的公债。他们全都需要维持奥地利的信用,而要维持奥地利的国家信用又总是需要新的借款,于是他们便不得时常提供新的资本,以维持他们过去已经投资的债券的信用。1815年以后的长期和平,以及表面上看来奥地利这样一个千年王国不可能倾覆的假象,使梅特涅政府的信用惊人地增长,甚至使它可以不依赖维也纳的银行家和证券交易人了;因为只要梅特涅还能够在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得到足够的资金,他当然就心满意足地看着奥地利的资本家们被踩在他的脚下,而且,他们在其他方面也仰承他的鼻息。银行家、证券交易人、政府的承包商虽然总是设法从专制君主制那里获得大宗利润,但这是以政府对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具有几乎是无限的支配权作为交换条件的,因此,不能期待这一部分人会对政府持任何反对态度。这样,梅特涅便有把握获得帝国中最有力量和最有权势的两个阶级的支持,此外他还拥有军队和官僚机构,它们被组织得最适合于为专制制度服务,奥地利的文武官员自成一个门第;他们的父辈是为奥皇效劳的,他们的子孙也将如此。他们不属于在双头鹰^①的羽翼下联合起来的许多民族中的任何一族;他们经常从帝国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波兰到意大利,从德意志地区到特兰西瓦尼亚。他们对匈牙利人、波兰人、德意志人、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对一切没有打上“皇家和王室”等等标记而具有某一民族特性的人同样予以轻视;他们没有民族性,或者更确切些

① 神圣罗马帝国国徽。——编者注

说,正是他们构成了真正的奥地利民族。很明显,这样一个文武官员的特殊等级,在一个有才智有能力的统治者手里会是怎样一种驯顺而有力的工具。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梅特涅采取十足的旧式政治家的态度,不大重视他们的支持。他对待他们只有一个政策:通过赋税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地进行榨取,同时使他们保持平静。工商业中间阶级在奥地利发展很慢。多瑙河流域的贸易相对来说无足轻重;奥地利仅有的里雅斯特一个港埠,而这个港埠的贸易也十分有限。至于工业家,他们则受益于广泛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这一制度在大多数场合下甚至无异于完全排除了外国的竞争;但向他们提供这种优惠,主要是为了增加他们纳税的能力;不过,由于国内对工业的限制,由于行会和其他封建公会(在不妨碍政府实现它的目的和意图的情况下,它们是受到周密的保护的)的特权,这种优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抵销了。小手工业者被封闭在这些中世纪行会的狭窄框框内,这种行会使各个行业彼此不断地为争夺特权而斗争,同时它们使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几乎没有任何可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而使这些强制性的联合体的成员具有一种世袭的稳定性。最后,农民和工人只是被当作征税的对象;他们所得到的唯一的关心,就是要尽可能使他们保持他们当时和以前他们父辈所赖以生存的生活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切旧的、既存的、世袭的权力,都像国家的权力一样受到保护;地主对小佃农的权力,厂主对工厂工人的权力,手工业师傅对帮工和学徒的权力,父亲对儿子的权力,到处都受到政府的极力维护,凡有不服从者,都像触犯法律一样,要受到奥地利司法的万能工具——笞杖的惩罚。

最后,为了把所有这些创造人为的安定的努力结成一个包罗万

象的体系,被允许给予人民的精神食粮都要经过最审慎的选择,而且极其吝啬。教育到处都掌握在天主教教士手里,而教士的首脑们像大封建地主一样,是迫切需要保存现有制度的。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种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除了匈牙利,根本没有报刊,而匈牙利的报纸在帝国一切其他地方都是违禁品。至于一般的著述,100年以来它的发行范围不但毫未扩大,自约瑟夫二世死后反倒缩减了。在奥地利各邦与文明国家接壤的地方,除了关税官员的警戒线,还有书报检查官的警戒线;外国的任何书籍或报纸不经过两次三番的详细审查,查明它们丝毫没有沾染时代的恶毒精神,他们决不让它们进入奥地利。

在1815年后的将近30年中,这种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奥地利几乎完全不为欧洲所了解,而欧洲也同样不为奥地利所了解。居民中各阶级和全体居民的社会状况,似乎都没有丝毫变化。不管阶级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怨仇(这种怨仇正是梅特涅统治的一个主要条件,他甚至有意加深这种怨仇,让上层阶级充当政府进行一切横征暴敛的工具,从而把憎恶引向它们),不管人民对国家下级官吏有怎样的憎恨,但整个说来,他们对于中央政府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不满情绪。皇帝受到崇拜,而事实似乎也证实了老弗兰茨一世的话,——他曾经怀疑这种制度能否持久,但他接着就安慰自己说:“在我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它总还是会维持下去的。”

但是有一种徐缓的、表面上看不见的运动在进行着,它使梅特涅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财富和势力都增加了。工业中机器和蒸汽的采用,在奥地利,也像在所有别的地方一样,使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旧有关系和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它把农奴变成了

自由民，把小农变成了工业工人；它摧毁了旧有的封建手工业行会，消灭了许多这种行会的生存手段。新的工商业居民与旧的封建制度到处发生冲突。因营业关系日益频繁地去国外旅行的中间阶级，把关于帝国关税壁垒以外的各文明国家的某些神话般的知识介绍给国内；最后，铁路的建设加速了国内工业和智力的发展。此外，在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中，也存在一个危险的部分，这就是匈牙利的封建宪法、议会辩论以及反政府的大批破落贵族对政府和它的同盟者豪绅显贵们进行的斗争。匈牙利的议会所在地普雷斯堡在维也纳的大门口。这一切因素都促使城市中间阶级产生一种情绪——这不是真正反政府的情绪，因为当时反政府还不可能，而是一种不满情绪，产生实行改革、主要是行政上的改革、而不是立宪性质的改革的普遍要求。也如在普鲁士一样，在这里一部分官僚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了。在这个世袭的官吏阶层中间，约瑟夫二世的传统还没有被遗忘；政府中受过较多教育的官员本身有时也幻想各种可能的改革，他们宁愿要这位皇帝的进步和开明的专制，而不愿要梅特涅的“严父般的”专制。一部分较穷的贵族也支持中间阶级，至于居民中一向有充分理由对上层阶级（如果不是对政府）不满的下层阶级，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是不会不赞助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的。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即 1843 年或 1844 年，在德国创立了一个适应这种变革的特殊的著作部门。少数奥地利的作家、小说家、文艺批评家、蹩脚诗人（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但都天生具有犹太人所特有的那种勤奋）在莱比锡以及奥地利以外的其他德国城市站住了脚，在梅特涅的势力所不及的这些地方出版了一些论述奥地利事务的书籍和小册子。他们和他们的出版商的这桩生意“十分兴隆”。全德国都急于想了解这个欧洲的中国的政治的秘密；奥地利人本身通过波

希米亚边境上进行的大批的走私而获得了这些出版物，他们的好奇心更加强烈。当然，这些出版物中所泄露的秘密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它们的善意的作者所设计的改革计划非常天真，可以说在政治上十分纯朴。人们认为宪法和新闻出版自由对奥地利来说是难以得到的东西。实行行政改革，扩大省议会权限，允许外国书报入境，稍稍放松书报检查制度，——这些善良的奥地利人的忠君守法的谦恭的要求，不过如此而已。

无论如何，要阻止奥地利与德国其他部分以及经过德国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越来越不可能了，这种情况大大促进了反政府的舆论的形成，并且至少使奥地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获得一些政治知识。于是在 1847 年底，当时盛行于全德国的政治的和政治宗教的鼓动也波及到奥地利，虽然在程度上较弱。这种鼓动在奥地利进行得较为沉寂，但它仍然找到了足以供它施加影响的革命因素。这些因素是：被地主或政府的横征暴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农奴或封建佃农，在警察的棍棒下被迫在厂主随意规定的任何条件下做工的工厂工人，被行会条例剥夺了在自己的行业取得独立地位的任何机会的手工业帮工，在经营中处处被种种荒谬条例捆住手脚的商人，不断与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特权的手工业行会发生冲突、或不断与贪婪而多事的官吏发生冲突的厂主，与无知而专横的教士或愚蠢而跋扈的上司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的教师、学者和受过较高教育的官员。总之，没有一个阶级感到满意，因为政府有时不得不作的一些小小让步，并不是由它自己出资（国库是负担不了的），而是靠上层贵族和教士出资进行的。至于大银行家和国家证券持有人，那么意大利最近的事变、匈牙利议会中日益加强的反对派、以及波及整个帝国的异常的不满情绪和要求改革的呼声，自然丝毫也不会加强他们对奥地利帝国

的巩固与支付能力的信心。

这样,奥地利也在缓慢地但确实地走向伟大的变革,而这时法国忽然爆发了事变,它使逼近的暴风雨立刻倾降下来,驳倒了老弗兰茨关于大厦在他和梅特涅在世的时候还是会维持下去的断语。

1851年9月于伦敦

[五 维也纳起义]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被赶出巴黎,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紧接着,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民摧毁了梅特涅公爵的政权,迫使他可耻地逃亡国外。3月18日,柏林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经过18小时顽强的战斗之后,满意地看到国王^①向他们求饶乞降。同时,在德国各小邦的首府也都爆发了猛烈程度不同但全都得到同样的成果的骚动。如果说德国人民没有完成他们的第一次革命,那么他们至少是真正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我们不能在这里考察这许多次起义的细节;我们只想阐明这些起义的性质以及居民中各个阶级对起义所采取的立场。

维也纳的革命可以说几乎是全体居民一致完成的。资产阶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除外)、小生意人阶级、全体工人,一致立即起来反对大家所憎恶的政府,这个政府如此普遍地被人憎恨,以致从前支持它的极少数贵族和金融巨头在它刚刚遭到攻击时也都隐藏起来了。梅特涅已使中间阶级在政治上无知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从巴黎传来的关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和恐怖的统治的消息,以及关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即将展开斗争的消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不是完全不了解这些消息的意义,就是以为那是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梅特涅恶意捏造的,为的是恐吓他们,让他们再去服从他。而且,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工人作为一个阶级而行动或者为自己本身的特殊的阶级利益而斗争。他们根据过去的经验,不能设想刚刚如此衷心地联合起来推翻大家一致憎恨的政府的各阶级之间可能产生任何分歧。他们看到工人在所有各点上——在宪法、陪审审判、新闻出版自由等问题上——都与他们一致。于是,他们至少在1848年3月,全身心地投入了运动,而另一方面,运动从最初起就使他们(至少在理论上)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

但是,不同阶级的这种联合,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向来是一切革命的必要条件,却不能持久,——一切革命的命运都是如此。在战胜共同的敌人之后,战胜者之间就要分成不同的营垒,彼此兵戎相见。正是旧的复杂的社会机体中阶级对抗的这种迅速而剧烈的发展,使革命成为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正是新的党派的这种不断的迅速成长,一个接替一个掌握政权,使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5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100年还走不完的途程。

维也纳革命使中间阶级成为理论上的统治阶级;这就是说,从政府那里争取到的让步一旦付诸实行,并且能够坚持一个时期的话,就一定会保证中间阶级的统治。可是,事实上这一阶级的统治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不错,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建立使资产阶级和小生意人掌握了武器,资产阶级获得了力量和权势;不错,由于成立了“安全委员会”这种由资产阶级占支配地位的、对谁都不负责的革命政府,资产阶级取得了最高的权力。但同时一部分工人也武装起来了,每当发生战斗时,他们和大学生²⁸总是承担起战斗的全部重任;约4000名装备优良、训练远比国民自卫军要好的大学生,形成了革命武装的核心和真正力量,他们决不愿意只是充当安全委员会手里的一个工具。他

们虽然承认安全委员会，甚至是它的最热烈的拥护者，可是他们成立了一种独立的而且颇不安分的团体，在“大礼堂”召开他们自己的会议，保持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中间立场，以不断的鼓动阻止事物回复到旧日的平常状态，而且经常把自己的决议强加于安全委员会。另一方面，工人差不多完全失业了，国家不得不花钱雇用他们到公共工程中去做工，而用于这方面的款项当然必须取自纳税人的腰包或维也纳市的金库。这一切自然使维也纳的生意人很不愉快。该市的工业企业本来是为这个大国中的富豪和贵族的消费服务的，由于发生革命，由于贵族和宫廷的逃亡，这些企业自然完全停业了；商业陷于停顿，工人和大学生不断进行的鼓动和骚动，当然不是如当时人们常说的“恢复信任”的办法。这样，中间阶级与不安分的大学生和工人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某种冷淡关系，而这种冷淡关系之所以在一个长时期中并没有转变为公开的敌对关系，那是由于内阁、尤其是宫廷急欲恢复旧秩序，因而不断证明比较革命的党派的疑虑和不安分的活动是有道理的，并且甚至当着中间阶级的面，不断地使旧日的梅特涅专制借尸还魂。由于政府企图限制或完全取消某些刚刚争得的新的自由，于是5月15日和5月26日先后两次发生了维也纳各阶级的起义。在这两次起义中，国民自卫军或武装的中间阶级、大学生、工人之间的联盟又暂时得到巩固。

至于居民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和金融巨头们已经销声匿迹，农民则到处忙于铲除封建制度的残余。由于意大利的战争²⁹，也由于宫廷忙于维也纳和匈牙利问题，农民得到了充分的行动自由，在奥地利，他们在解放事业中取得的成就，比在德国任何其他地方都大。在这之后不久，奥地利议会只好确认农民已经实际实行了的种种措施，不管施瓦尔岑堡公爵的政府还能够恢复别的什么东西，它却永远不能恢

复对农民的封建奴役了。如果说奥地利目前又比较平静了,甚至强有力了,这主要是因为人民的大多数即农民真正从革命中得到了利益,还因为不管业已重建的政府侵犯了别的什么东西,农民所争得的这些实际的物质利益却没有受到侵犯。

1851年10月于伦敦

[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中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¹⁷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中间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中间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5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要求改组政府。而

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的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普选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

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3月18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中间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2500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3月18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同于小生意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而这却是任何以小生意人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1848年和1849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中间阶级立即转

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3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中间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年10月于伦敦

[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月13日和柏林3月18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中间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上任就了职，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或者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

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 1848 年三月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¹⁹。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⁶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⁵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

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无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

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那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中间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

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①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部分，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³⁰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年9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年1月于伦敦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7章。——编者注

[八 波兰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

从以上几篇的叙述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除非 1848 年三月革命后紧接着再来一次新的革命,否则德国就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到这次事变以前的状态。但我们现在试图略加阐述的历史问题,性质非常复杂,因此,如果不考虑到可以称之为德国革命的国际关系的种种情况,便不能够充分了解后来的一些事件。而这些国际关系也像德国内部情形一样复杂。

大家都知道,在过去 1 000 年中,整个德国东半部,直到易北河、萨勒河和波希米亚林山,已经从斯拉夫族的入侵者手里夺回来了。这些地区的大部分都已日耳曼化,以至斯拉夫族的民族性和语言几百年以前已经完全消失;如果我们把少数完全孤立的残余(总共不到 10 万人,包括波美拉尼亚的卡舒布人、卢萨蒂亚的文德人或索布人)除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德意志人了。但在所有同旧波兰接壤的地带和捷克语国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情形就不同了。在这些地方,两个民族在每个区域都混居杂处,城市一般地说在不同程度上属于德意志人,而农村中则是斯拉夫人占优势,不过在农村中斯拉夫人也因德意志人势力的不断增强而逐渐被瓦解和排挤。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坚决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封

建贵族在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所进行的征服，武装骑士团在普鲁士和利沃尼亚一带所建立的封建殖民地，只是为德国工商业中间阶级所实行的一个规模更大和更有效得多的日耳曼化计划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德国，正如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从15世纪起，中间阶级的社会和政治作用增长起来了。斯拉夫人，尤其是西方的斯拉夫人（波兰人和捷克人），主要是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从来不怎么重视工商业。结果，随着这些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兴起，一切工业品的生产便落在德意志人移民的手里，这些商品与农产品的交换完全被犹太人所垄断，而这些犹太人，如果说他们属于什么民族的话，那么在那些国家里，他们当然与其说属于斯拉夫人，不如说属于德意志人。整个东欧的情形都是如此，虽然程度略轻。在彼得堡、佩斯、雅西，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直到今天，手工业者、小商人、小厂主都还是德意志人，而放债人、酒店老板和小贩（在这些人口稀少的国家，这种人是非常重要的）则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的母语是一种讹误百出的德语。在边境各斯拉夫人地区，德意志人的重要性随着城市和工商业的发达而增加，而当实际情况是几乎一切精神文化都必须从德国输入时，他们的重要性就更加增大了。继德意志商人和手工业者之后，德意志牧师、教员和学者也到斯拉夫人的土地上安家立业。最后，侵略军的铁蹄或审慎周密的外交手段，不仅跟随在由于社会发展而发生的缓慢的但是肯定无疑的非民族化过程的后面，而且常常走在它的前面。因此，自从第一次瓜分波兰³¹以后，由于把官地卖给或赐给德意志殖民者，由于奖励德意志资本家在这些混居地区建立工业企业等等以及经常对该地波兰居民采取极端横暴的手段，西普鲁士和波森的大部分就日耳曼化了。

因此，近70年来，德意志民族和波兰民族间的分界线完全改变

了。1848年的革命，立即唤醒一切被压迫民族起来要求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所以很自然，波兰人也立即要求恢复他们在1772年以前旧波兰共和国的疆界以内的国家。的确，就在当时，这个疆界作为德意志民族与波兰民族的分界线也已经过时了，而此后随着日耳曼化的进展，它更是一年比一年过时了；但是当时德意志人既然曾经那样热情地宣布他们赞助波兰复国，那么，要求他们放弃他们所掠得的一部分领土作为体现他们同情心的第一个证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但另一方面，应不应该把主要是德意志人居住的大块大块的土地和完全属于德意志人的大城市，让给一个从来没有证明自己能够摆脱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状态的民族呢？这个问题十分复杂。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同俄国开战。那时，革命化了的各民族间的划界问题就会成为次要的问题，而主要的问题就将是确立一个对付共同敌人的安全的疆界。波兰人如果在东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他们在西方的要求便会比较温和而合理；总而言之，对他们来说，里加和米塔瓦也会同但泽和埃尔宾一样重要。因此，德国的先进政党认为，要支持大陆上的运动，就必须对俄国开战，而且它深信，即使是部分地恢复波兰的民族独立，也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战争，所以它支持波兰人。而当权的自由派中间阶级党却很清楚地预见到，反对俄国的民族战争将使它自身崩溃，因为这种战争一定会使更活跃、更积极的人掌握政权；因此，它装出一副热心于德意志民族的扩张的样子，宣布普属波兰，即波兰革命鼓动的中心，是未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热情高涨的最初几天向波兰人许下的诺言，被可耻地背弃了。经政府批准而组成的波兰军队，被普鲁士的炮兵击溃和屠杀；到1848年4月，即柏林革命后6个星期，波兰的运动就被镇压下去了，而且波兰人和德意志人之间旧有的民

族敌视就复活了。为俄国专制君主^①立下这场巨大的和无法估量的功劳的是自由派商人阁员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应当附带说明，这次对波兰的战役，是改组和鼓舞普鲁士军队的第一步，正是这支军队后来推翻了自由派政党，摧毁了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辛辛苦苦造成的运动。“恶有恶报”，——这就是从赖德律-洛兰到尚加尔涅、从康普豪森到海瑙所有这些 1848 年和 1849 年的暴发户的共同的命运。

民族问题在波希米亚引起了另一场斗争。在这个居住着 200 万德意志人和 300 万捷克语斯拉夫人的地区，有不少伟大的历史事迹几乎都与捷克人先前的霸权相联系。但自从 15 世纪的胡斯战争³²以后，斯拉夫族的这一支脉的势力就被摧毁了。捷克语地区分裂了：一部分形成了波希米亚王国，另一部分形成了摩拉维亚公国，第三部分——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喀尔巴阡山地则归入匈牙利。从那时起，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就已失掉一切民族意识和民族生命力的痕迹，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着他们的语言。波希米亚被德意志人的地区三面包围。德意志人在波希米亚境内作出了很大的成绩，甚至在首都布拉格，这两个民族也完全势均力敌；而资本、商业、工业和精神文化则普遍掌握在德意志人手里。捷克民族的头号卫士帕拉茨基教授，他本人就是一个发了狂的博学的德意志人，直到今天他还不能正确地、不带外国腔调地讲捷克语。但是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垂死的捷克民族——最近 400 年历史上的一切事实都证明它是垂死的——于 1848 年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恢复它从前的生命力，而这次努力的失败，撇开一切革命方面的考虑不谈，足以证明波希米亚此后只能作为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德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即使它的一部分居民在几百年之内继续说非德国的语言。

1852年2月于伦敦

[九 泛斯拉夫主义。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战争]

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斯拉夫族的另一个离散的成员,它受匈牙利人的影响,就像波希米亚人受德意志人的影响一样),是欧洲大陆上所谓“泛斯拉夫主义”的发源地。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都没有强大到自身足以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它们各自的民族性都已逐渐被种种历史原因的作用所破坏,这些原因必然使它们为更强大的种族所并吞,它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和其他斯拉夫民族联合起来而恢复一定的独立性。波兰人有 2 200 万,俄罗斯人有 4 500 万,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有 800 万,为什么不把所有这 8 000 万斯拉夫人组成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把侵入神圣的斯拉夫族领土的土耳其人、匈牙利人、尤其是那可恨而又不可缺少的 *Niemetz* 即德意志人驱逐出去或消灭掉呢?于是,就从几个斯拉夫族的历史科学的爱好者的书斋里发起了一个荒唐的、反历史的运动,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文明的西方屈服于野蛮的东方,城市屈服于乡村,商业、工业和文化屈服于斯拉夫农奴的原始农业。但在这种荒唐的理论之后,还站着俄罗斯帝国这一可怕的事实;这个帝国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出它想把整个欧洲变成斯拉夫族、尤其是这个族的唯一强有力的部分即俄罗斯人的领土的野心;这个帝国虽有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首都,但只要被每个俄国农民

看作是他们的宗教和国家的真正京都的“沙皇之城”(君士坦丁堡,俄文为沙皇格勒,即沙皇城)还没有成为俄国皇帝^①的真正的府邸,这个帝国就还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过去150年以来,这个帝国在它所进行的每次战争中不仅从未失掉领土,而且总是获得领土。在中欧,人所共知,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式的泛斯拉夫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发明最适合于它的目的。因此波希米亚和克罗地亚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有的是自觉地、有的是不自觉地、为俄国的直接利益服务;他们为了民族性的幻影而出卖了革命事业,而这个民族的命运至多也不过同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民族的命运一样。然而必须对波兰人加以赞扬: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陷入这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圈套;至于少数贵族变成了狂热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知道,他们在俄国统治下所受的损失,要比他们在自己的农奴起义时所受的损失轻微一些。

后来波希米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布拉格召开了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³³,筹备成立一个斯拉夫人大同盟。即使没有奥地利军队的干涉,这个大会也会遭到惨败。几种斯拉夫语言各不相同,就像英语、德语和瑞典语各不相同一样;因此在会议开始以后,那些发言人都无法讲一种大家都能听懂的共同斯拉夫语言。曾经试用法语,但大多数人也不懂,于是,这些可怜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他们的唯一的共同感情就是对德意志人的共同仇恨——最后不得不用与会人都懂得的唯一语言,即可恨的德语来表达意见!但正在这个时候,在布拉格也召开了另外一个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参加这个大会的是加利西亚人的轻骑兵、克罗地亚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掷弹兵、波希米亚人的炮兵

① 亚历山大一世。——编者注

和重骑兵,而这个真正的武装的斯拉夫人代表大会在文迪施格雷茨的指挥之下,不到 24 小时就把假想的斯拉夫人霸权的这些奠基者们驱逐出城,并把他们赶得东逃西散了。

奥地利制宪议会中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达尔马提亚的代表和一部分波兰的代表(贵族),在这个议会中对德意志代表发动了有计划的斗争。德意志人和一部分波兰人(破产的贵族)在这个议会中是革命进步势力的主要支持者。对他们采取反对态度的大多数斯拉夫族代表,并不满足于这样明确表露自己整个运动的反动倾向,他们竟下贱地同驱散他们的布拉格会议的奥地利政府暗中勾结。他们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也得到了报答。斯拉夫代表在 1848 年十月起义(归根到底正是这次起义使他们在制宪议会中获得了多数)时支持政府,而在这之后,现在这个几乎是清一色的斯拉夫人的议会,也像布拉格代表大会一样被奥地利军队驱散了,这些泛斯拉夫主义者还被警告说,他们如果再有所动作,就将被关进监狱。他们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结果:斯拉夫人的民族性现在到处都被奥地利的中央集权所摧毁,而这是他们的幻想和愚蠢所应得的。

如果匈牙利和德国的边境问题还有任何疑问,那也一定会引起另一场争端。但是,幸亏没有任何口实,而且两个民族的利益密切相连,他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奥地利政府和泛斯拉夫主义狂热。相互的善意谅解一刻也没有发生破绽。但是意大利的革命至少使德国的一部分陷入了自相残杀战争,而在这里必须指出一个事实,证明梅特涅的统治多么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意识的发展,1848 年的头 6 个月曾经在维也纳参加街垒战斗的人又满腔热情地参加了与意大利爱国者作战的军队。不过,这种可悲的思想混乱并没有继续多久。

最后,还曾经因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而发生了与丹麦的

战争。这两个地方在民族、语言和感情方面无疑都是德意志的，而从军事、海运和商业方面说，也是德国所需要的。这两地的居民在过去3年中曾经顽强地反对丹麦人的入侵。此外，根据条约，正义在他们方面。三月革命使他们与丹麦人发生公开冲突，德国援助了他们。可是，虽然在波兰、在意大利、在波希米亚，以及后来在匈牙利，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但在这个唯一得人心的、唯一至少具有部分革命性的战争中，却采取了一系列毫无意义的前进和后撤行动，甚至屈从外国的外交干涉，在进行了许多次英勇的战斗之后，导致了十分悲惨的结局。德国各邦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抓住一切机会出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革命军队，故意让丹麦人在这支军队被分散或分开的时候把它消灭，由德意志志愿兵组成的部队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虽然德国的名字遭到普遍的憎恨，而德国各立宪派和自由派的政府却扬扬得意。它们把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运动镇压下去了。它们到处重新挑起旧日的民族仇恨，这种仇恨直到今天还使德意志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彼此间不能有任何谅解和共同行动。它们使人民习惯于内战和军队镇压的场面。普鲁士军队在波兰，奥地利军队在布拉格都恢复了自信。当满怀着过分的爱国激情（即海涅所谓的“die patriotische Überkraft”）^①的、热心革命但目光短浅的青年被引导到石勒苏益格和伦巴第去在敌人的霰弹下送死的时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正规军这些真正的作战工具，却得到机会以战胜外国人来重新赢得人心。但是我们要再说一遍：这些被自由派加强起来当作反对较先进的党派的作战工具的军队，刚刚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它们的自信和纪律，便翻脸反对自由派，而把政权交还给了旧制度的代表人物。

① 海涅《夜巡逻来到巴黎》。——编者注

当拉德茨基在阿迪杰河彼岸他的军营中接到维也纳的“责任大臣们”的第一批命令时，他大喊道：“这些大臣是些什么人？他们并不是奥地利政府！奥地利现在只存在于我的军营中；我和我的军队就是奥地利；等将来我们把意大利人打败，我们就要为皇帝夺回帝国！”老拉德茨基是对的。但维也纳的没有头脑的“责任”大臣们却没有注意他。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 巴黎起义。法兰克福议会]

早在1848年4月初,在整个欧洲大陆革命的洪流已经被那些从最初的胜利中获得利益的社会阶级同战败者立即缔结的联盟挡住了。在法国,小生意人阶级和共和派资产阶级,同保皇派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在德国和意大利,胜利的资产阶级急忙乞求封建贵族、政府官僚和军队帮助他们对付人民群众和小生意人。联合起来的保守的和反革命的党派,很快又获得了优势。在英国,发动得不适时和准备得不充分的人民示威(4月10日),使从事运动的党派遭到了彻底的决定性的失败³⁴。在法国,两次类似的运动(4月16日³⁵和5月15日³⁶)也同样被击败了。在意大利,炮弹国王在5月15日一举恢复了政权。³⁷在德国,各个新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它们的制宪议会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如果说在维也纳,多事的5月15日使人民获得了胜利,那么这毕竟只是一个次要的事变,可以认为这是人民的能量的最后一次胜利的闪耀。在匈牙利,运动看来是转入了完全合法的平静的轨道,至于波兰的运动,我们在前面一篇中已经提到,它刚刚萌芽就被普鲁士的刺刀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确定事态的最后结局,各革命党派在各国失去的每一寸土地,只是使它们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投入决定性的战斗。

决定性的战斗已经临近了。它只能在法国爆发;因为当英国没有参加革命战斗而德国仍然四分五裂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家的独立、文

明和中央集权,是唯一能够推动周围各国发生强烈震动的国家。所以,当1848年6月23日巴黎的流血斗争³⁸开始的时候,当接二连三的电报和信件使欧洲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次斗争是在工人群众为一方和得到军队援助的巴黎居民的其他一切阶级为另一方之间进行的这样一事实的时候,当战斗以现代内战史上空前未有的激烈程度打了好几天,但双方都没有得到明显的胜利的时候,这时候,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这是一次伟大的决战,如果起义胜利,整个欧洲大陆就会掀起新的革命浪潮,如果起义失败,反革命统治就会至少暂时恢复。

巴黎的无产者被击败,被屠戮,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恢复元气。在整个欧洲,新旧保守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立即肆无忌惮地抬起头来,这说明他们对这次事变的重要性了解得十分清楚。他们到处压制报刊,限制集会结社权,利用外地任何一个小城镇发生的任何细小事件来解除人民的武装,宣布戒严,并且用卡芬雅克传授给他们的新的策略和手段训练军队。此外,二月革命以后,大城市里的人民起义是不可战胜的这种说法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幻想;军队的荣誉恢复了;以前经常在重大的巷战中失败的队伍,现在重新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也能胜任这样的斗争了。

在巴黎工人的这次失败之后,德国的旧封建官僚党便开始采取积极的步骤并制定明确的计划,甚至抛弃他们暂时的同盟者中间阶级,使德国恢复到三月事变以前的状态。军队又成为这个国家中的决定力量,而军队已不属于中间阶级而属于它自己了。甚至在普鲁士,那里一部分下级军官在1848年以前十分倾向于立宪制度,革命在军队中引起的混乱又使这些理智的年轻人像从前一样忠于职守了,只要普通士兵对于长官们稍微随便一点,长官就会立刻感到纪律和绝

对服从的必要。被击败的贵族和官僚们现在开始看到自己的出路。空前团结的军队由于在镇压小规模起义和对外战争中取得胜利而扬扬得意，羡慕法国士兵刚刚获得的大胜利，——只要使这个军队不断和人民发生小冲突，一旦决定性的时刻到来，它就能够在强有力的一击粉碎革命党人，并把中间阶级议员们的傲慢不逊一扫而光，而进行这样一次决定性的打击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

关于德国各党派夏季里所从事的那些有时令人感到新奇而多半令人感到厌烦的议会辩论和地方性斗争，我们就不谈了。只需要说明一点：中间阶级利益的维护者虽然在议会里取得多次胜利，但没有一次得到过任何实际效果，他们普遍感到，他们介于两个极端党派之间的地位一天天变得更不稳固了；因此，他们不得不今天力求同反动派结盟，明天又向比较民主的党派讨好。这种不断的摇摆使舆论界对他们嗤之以鼻，而按照事态发展的趋向来看，他们受人轻蔑，暂时主要是有利于官僚和封建主们。

到了秋初，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已极其尖锐而紧张，使决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民主派革命群众同军队之间在这场战争中的最初战斗发生在法兰克福³⁹。虽然这次战斗并不十分重要，但是军队却是第一次在这里取得对起义的显著优势，而这产生了很大的精神上的效果。普鲁士根据十分明显的理由允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所建立的虚有其名的政府同丹麦签订停战协定³⁰，这个协定不但把石勒苏益格的德意志人交给丹麦人去横加报复，而且也完全否认了在丹麦战争中公认的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原则。法兰克福议会以两三票的多数否决了这个停战协定。在这次表决之后发生了虚假的内阁危机。而3天以后议会重新审查了自己的决议，实际上取消了这个决议而承认了停战协定，这种可耻的行为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筑起了街垒，但法兰克

福调来了足够的军队,经过6小时的战斗,起义便被镇压下去了。这次事件在德国其他地方(巴登、科隆)引起的类似的但声势不大的运动,也同样被镇压下去了。

这次前哨战给反革命党派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好处:完全由人民选举出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唯一政府——法兰克福帝国政府,也像国民议会一样,在人民心目中破产了。这个政府和这个议会都不得不用军队的刺刀来反对人民意志的表现。它们已名誉扫地,虽然它们以前多少还能得到一点尊敬,但这次的忘本行为和这种依赖反人民的各邦政府及其军队的做法,却使帝国的摄政,使他的大臣们和议员们此后都变成了毫无意义的摆设。我们不久就会看到,最先是奥地利,接着是普鲁士,后来是各小邦,都怎样轻蔑地对待这群无能梦想家所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项要求、每一次委派。

现在我们应该来谈谈法国六月战斗³⁸在德国所引起的强有力的反响,来谈谈对德国有决定意义的——就像巴黎无产阶级的斗争对法国那样——事变。我们是指1848年10月维也纳的起义⁴⁰和随之而来的对维也纳的攻击。但这次斗争的意义十分重大,说明对这次事件的进程发生比较直接影响的种种情况需要占《论坛报》很大篇幅,因此我们不得不专门写一篇通讯来加以阐述。

1852年2月于伦敦

[十一 维也纳起义]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个有决定意义的事变,即 1848 年 10 月的维也纳起义,它是巴黎六月起义在德国的革命的对应物^①,它使优势一下子转到了反革命党派方面。

我们已经看到,3 月 13 日革命胜利以后维也纳各阶级的状况如何。我们也已经看到,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运动如何同非德意志的奥地利各省的事变交错在一起并受到后者的阻碍。所以,我们现在只要简短地叙述一下引起德意志的奥地利的这次最后的最勇猛的起义的原因就可以了。

上层贵族和做证券交易的资产阶级是梅特涅政府的主要的非官方的支柱,他们在三月事变后仍然能够保持对政府的决定性影响。这是因为他们不仅利用了宫廷、军队和官僚,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利用了中间阶级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无政府状态”的恐怖。他们很快就大胆地放出了一些试探气球,这就是:新闻出版法⁴¹、不伦不类的

^① 1852 年 3 月 1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原文“which formed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arty in Germany, 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可能是印刷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9 年莫斯科英文版第 11 卷第 54 页上将这句话改为“which formed the revolutionary counter part in Germany to the Parisian insurrection of June……”。——编者注

贵族宪法和以旧日的“等级”区分为基础的选举法⁴²。由怯懦无能的半自由派官僚组成的所谓宪制内阁，5月14日竟敢直接攻击群众的革命组织，解散了国民自卫军代表和大学生军团²⁸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这个团体是专门为了监督政府并且在必要时动员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反对它而组织的）。但这种行动激起了5月15日的起义，因此政府被迫承认了上述委员会，取消了宪法和选举法，并且授权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来制定新的根本法。这一切都由第二天的圣谕确认了。但是在内阁中拥有代表的反动党派，不久就促使自己的“自由派”同僚向人民的胜利成果发动新的进攻。大学生军团是从事运动的党派的堡垒，是经常的鼓动的中心，正因为如此，它就为较温和的维也纳市民所厌恶。5月26日，内阁下令把它解散了。如果只是由一部分国民自卫军来执行这个命令，这次打击也许能够成功，但是政府连国民自卫军也不相信，它调动了军队，于是国民自卫军立即倒戈，和大学生军团联合起来，从而破坏了内阁的计划。

但是与此同时，皇帝^①和他的宫廷却于5月16日离开维也纳，逃到因斯布鲁克去了。在这里，他们被狂热的蒂罗尔人所包围，这些人由于看到撒丁—伦巴第的军队有入侵自己国家的危险，他们对皇室的忠心重新激荡起来；他们可以依靠驻在附近的拉德茨基的军队的支持，因斯布鲁克就在该军的大炮的射程之内。在这里，反动党派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可以摆脱任何监督和注视，毫无危险地集结自己已被击溃的力量，修补自己的阴谋之网，再次撒向全国。和拉德茨基、耶拉契奇、文迪施格雷茨以及各省行政官僚中可信赖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恢复了，开始同斯拉夫族领袖们策划阴谋；这样一来，由反革命

① 斐迪南一世。——编者注

的宫廷奸党所掌握的一股真正的势力便形成了，而维也纳的无能的大臣们却只能在与革命群众不断的冲突中，在关于即将成立的制宪议会的辩论中败坏自己短暂而低微的声誉。因此，对首都的革命运动暂时听之任之的政策，在法国那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会使从事运动的党派变得无比强大，而在奥地利这样一个五光十色的政治结合体里则是重新组织反动力量的最可靠的方法之一。

维也纳的中间阶级以为，宫廷党在连续遭到三次失败之后，而且面临着由普选产生的制宪议会，已经不再是一个可怕对手了，于是就越来越陷入厌倦和冷漠，老是呼吁遵守秩序和保持镇静；这个阶级在猛烈的动荡和由此产生的工商业混乱之后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情绪。奥地利首都的工业，几乎只是生产奢侈品，而对奢侈品的需求，自从革命爆发和宫廷逃亡以后，当然是大大缩小了。要求恢复正常的政府组织和宫廷还都（这二者都被指望会带来商业的重新繁荣），现在已成为中间阶级的普遍呼声。7月间制宪议会的召开被当作革命时代的终结而受到热烈的欢迎。宫廷还都也受到同样的欢迎⁴³；而宫廷在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获胜和多布尔霍夫反动内阁上台之后，感到自己已经足以抵挡住人民的浪潮，同时它认为也需要回到维也纳以完成它同在议会中占多数的斯拉夫议员策划的阴谋。当制宪议会讨论把农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并且免除他们为贵族进行强迫劳动的法律的时候，宫廷耍了一个巧妙的手腕。8月19日，皇帝被安排去检阅国民自卫军，皇室、廷臣和将军们竞相恭维这些武装的市民，这些市民看到自己被公开承认为国家的一支重要力量而扬扬得意。紧接着发布了一道由内阁中唯一有声望的大臣施瓦策先生签署的命令，取消国家一向发给失业工人的补助金。诡计成功了。工人阶级举行了示威；中间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宣称拥护他们的大臣的命令；他们向

“无政府主义者”进攻，他们像猛虎一样扑向手无寸铁、毫未抵抗的工人，他们在8月23日那天屠杀了许多工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实力就这样被摧毁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维也纳也演成了流血的搏斗，反革命的宫廷奸党则看到，它可以进行致命打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匈牙利的事态很快就给反革命的宫廷奸党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宣布他们行动中所要遵循的原则。10月5日官方的《维也纳日报》发表一道皇帝敕令（敕令没有一个匈牙利责任大臣副署），宣布解散匈牙利议会并且任命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做该国的军政首脑；耶拉契奇是南方斯拉夫反动派的领袖，他实际上与匈牙利合法政权处于交战状态。同时，维也纳的部队奉令出动，加入支持耶拉契奇政权的军队。可是，这么一来马脚就过于明显地露出来了；每一个维也纳人都觉得，向匈牙利开战，就等于向立宪制度的原则开战。这个原则在这个敕令中已经遭到蹂躏，因为皇帝企图不经责任大臣的副署就使自己的命令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人民、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的国民自卫军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阻止部队出发。一些掷弹兵转到人民方面来；人民的武装力量和部队发生了短时间的冲突；陆军大臣拉图尔被人民杀死，到晚间人民取得了胜利。在施图尔韦森堡被佩尔采尔击败的耶拉契奇总督，这时逃到了维也纳附近的德意志的奥地利领土上。本应开去援助他的维也纳卫戍部队，现在也对他采取显然敌对和戒备的态度；皇帝和宫廷再次逃亡，逃到了半斯拉夫人的领土奥尔米茨。

宫廷在奥尔米茨的处境和它从前在因斯布鲁克时的处境完全不同了。它现在已经能够直接进攻革命了。它被成群流入奥尔米茨的制宪议会的斯拉夫族议员，以及帝国各个部分的斯拉夫族狂热分子

所包围。在他们看来,这次战役应当是斯拉夫人复兴的战争,是歼灭侵入他们认为是斯拉夫人领土的两个入侵者——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的战争,布拉格的征服者,现在集结在维也纳四周的军队的司令官文迪施格雷茨,一下子变成了斯拉夫民族的英雄。他的军队迅速地从各方面集中。一团一团的军队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施蒂里亚、上奥地利和意大利开往维也纳,与耶拉契奇的部队和原来的首都卫戍部队会合。这样,到10月底就集结了6万多人,他们立刻从四面八方把帝国的首都包围起来,到10月30日,他们已经推进到可以大胆进行决定性攻击的地位了。

这时,笼罩着维也纳的是惊慌失措和束手无策,中间阶级刚刚获得胜利,就又对“无政府主义的”工人阶级抱定从前那种不信任的态度。工人们也还清楚地记得6个星期以前武装的生意人对待他们的态度,记得整个中间阶级的摇摆不定的政策,因此不愿意指望他们去保卫维也纳城,而要求自己取得武器,成立自己的军事组织。热望与君主专制作斗争的大学生军团,完全不能了解两个阶级彼此隔膜的真正原因,或者说完全不能了解当前局势的需要。公众思想混乱,各领导机构也是一片混乱。议会中剩下的人,即德意志族议员和几个给自己在奥尔米茨的朋友作侦探的斯拉夫族议员(几个革命的波兰议员除外)没完没了地开会。但是他们并不采取坚决的行动,却把全部时间消耗在能不能不越出宪法惯例的范围抵抗帝国军队这种无聊的辩论上。差不多全部由维也纳各民众团体的代表组成的安全委员会虽然决心抵抗,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多数是市民和小生意人,这些人永远不允许它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路线。大学生军团的委员会显然通过了一些英勇的决议,但它根本不能掌握领导权。不受信任、没有武装、也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刚刚解脱旧制度的精神枷锁,刚

刚觉醒,但并不是认识到,而只是本能地感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应当采取的政治行动路线。他们只能在喧嚷的示威中表现自己;不能指望他们去克服当时的种种困难。但是只要能得到武器,他们是准备战斗到底的,在德国革命时期他们一向都是这样。

这就是维也纳当时的情形。在城外,是经过整编的奥地利军队,由于拉德茨基在意大利的胜利而士气大振,其人数共有六七万,武装和组织都很良好,尽管指挥不力,但至少总还有指挥官。在城内,人心惶惶,阶级矛盾重重,一片混乱;国民自卫军有一部分决定根本不打,一部分犹豫不决,只有一小部分准备行动;无产阶级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没有领袖,没有受过任何政治教育,他们容易惊慌失措,或者几乎是无缘无故地怒不可遏,盲目听信一切流言蜚语;他们决心战斗,但是至少开始是没有武装,而当最后被带去打仗的时候,也是武装不全,组织很差;议会束手无策,在火差不多已经烧着它头上的屋顶的时候,它还在讨论一些琐碎的理论问题;领导委员会⁴⁴既无魄力,又无能力。一切情形都和3月和5月的那些日子不同了,那时反革命营垒中充满混乱,唯一有组织的力量是革命所创造的力量。这样一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几乎是不问可知的;如果还有什么疑问,那么10月30、31日和11月1日的事变也已经作出解答了。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二 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定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

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8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人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而出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

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延迟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耶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40万维也纳人把要开去征服1200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

特举行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中间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

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也纳人民在3月13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⁴⁵。而当1848年10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⁴⁶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煊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

勇的抵抗相交换。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的是维也纳人。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¹⁹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媚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的越少,说的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

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⁴⁷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⁴⁸。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珂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认为他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

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三 普鲁士制宪议会。国民议会]

维也纳于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宪议会的解散说明这一事变怎样立刻助长了全德国反革命党派的气焰和势力。

1848年夏季普鲁士的事变很快就传开了。制宪议会，或者更确切些说，“为了与国王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以及它的由中间阶级利益的代表构成的多数，由于害怕居民中较积极的分子而同宫廷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它早已威信扫地。他们承认了，或者无宁说，恢复了令人憎恨的各种封建特权，因而出卖了农民的自由和利益。他们既没有能够起草宪法，也没有能够对总的立法作任何改进。他们差不多只是忙于弄清一些理论上的细微差别、纯粹的形式问题和制宪的仪式问题。事实上，这个议会与其说是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任何一点利益的机关，不如说是一个供议员们学习议会礼仪的学校。另外，议会中没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多数，而且这个多数差不多总是由动摇的“中间派”来决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摇摆，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内阁，后来又推翻了奥尔斯瓦尔德和汉泽曼的内阁。但当自由派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坐失时机的时候，宫廷却把它在贵族、最落后的农村居民以及在军队和官僚中的各种力量重新组织起来。在汉泽曼倒台以后，建立了一个由官僚和军官、由一切顽固的反动派组成的内阁，而这个内阁装出一副样子，好像它准备考虑议会的要求。议会采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这一变通原则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对

这个内阁鼓掌称赞；这样，它当然就看不到这个内阁几乎公开地在收集和组织的反革命势力的事实。最后，维也纳的陷落发出了信号；国王把大臣们都撤了职，用现任的内阁首相曼托伊费尔先生为首的“实干家”代替了他们。于是梦中的议会才突然惊醒，意识到大难临头。它通过了一个不信任内阁案，但是对此的回答是立刻来了一道命令，责令议会从柏林，从这个在发生冲突时议会可以指望得到群众支持的地方，迁到勃兰登堡——一个完全处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镇，但议会宣称，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会期，也不能把它迁移或解散。这时候，弗兰格尔将军统率约4万大军进入柏林^①。市政当局和国民自卫军军官会议决定不予抵抗。于是，制宪议会和它的后盾——自由派资产阶级听任联合起来的反动党派占据了一切重要阵地，并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几乎所有的防御手段，在这以后，就开始演出了一场“消极合法抵抗”的大喜剧，他们想把这种抵抗变成对汉普敦和美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最初行动⁴⁹的光荣模仿。柏林宣布了戒严，但仍然平静无事；国民自卫军被政府解散，它规规矩矩地缴了械。在两个星期中，议会被军队从一个开会地点赶到另一个地点，到处都被驱散，而议员们却要求市民保持镇静。最后政府宣布议会已被解散时，议会才通过一项决议，宣布征税是非法的，随后议员们奔走全国，组织抗税⁵⁰。但他们发现，他们选择这种手段是个大错误，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几个星期之后，政府对反对派采取了严厉手段，于是所有的人都不愿再拒绝纳税以取悦于一个甚至连自卫的勇气都没有的已经死去的议会了。

在1848年11月初进行武装抵抗是否已经太迟，或者一部分军

① 实际只有13 000名士兵。——编者注

队如果遇到严重反抗是否会转到议会方面来,从而使事态的结局有利于议会,——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永远需要勇敢地面对敌人,而进攻者总是处于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战争中一样,在决定性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历史上没有一次胜利的革命不证明这个原理的正确。1848年11月,普鲁士革命的决定性关头来到了,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议会,不但没有勇敢地面对敌人,反而节节后退;进攻就更谈不上了,因为它连自卫都宁肯放弃。在弗兰格尔率领4万人叩打柏林大门的决定性关头,完全出乎他和他的军官们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满街垒的街道和变成枪眼的窗口,而是敞开的城门,街道上唯一的障碍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们欣赏着自己同他开的这次玩笑——他们把自己手脚全都捆绑起来而听任那些惊异不止的士兵的处置。不错,议会和人民如果进行抵抗,也许会被击败;柏林也许会遭到炮击,也许会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党的最后胜利,但这并不能作为他们立刻缴械乞降的理由。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无疑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采取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

在革命中,占据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

普鲁士国王解散制宪议会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宪法，这个宪法是以该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所拟定的草案作为基础的；不过，它在某些条款中扩大了国王的权限，而在另外一些条款中使议会的权力大成问题。根据这个宪法建立了两个议院，这两个议院应该在短期内开会，以便批准和修订宪法。

几乎用不着再问：当普鲁士的立宪派进行“合法而又和平的”斗争的时候，德国国民议会究竟在什么地方。像通常在法兰克福所见的情形一样，它忙于通过一些很温和的决议，谴责普鲁士政府的行动，而称赞“全体人民消极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壮观”。中央政府派专员到柏林去调解内阁和议会间的纠纷，但他们遭到了他们的前任在奥尔米茨所遭受的同样命运——被客气地送出来了。国民议会的左派即所谓激进派，也派遣了他们的专员，这些专员确信柏林议会完全无用并承认自己也同样无用之后，便回到法兰克福去报告事情的经过，并证实柏林居民的令人称道的和平行为。不仅如此，当中央政府的一个专员巴塞尔曼先生报告说，因为近来常看见各种各样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头徘徊，而在一切无政府主义运动发生之前总是有这类人物（后来这种人物就被称为“巴塞尔曼式的人物”）出现，所以普鲁士内阁最近所采取的严厉手段并非毫无理由的时候，这些可敬的左派议员和革命利益的坚决捍卫者便真的站起来赌咒发誓，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两个月当中，已经明显地证明了法兰克福议会的完全无能。这再清楚不过地证明这个机构完全不能胜任它的职务，证明它甚至连自己的职务究竟是什么也毫不理解。革命的命运在维也纳和柏林都已被决定了，而在这两个首都解决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时都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存在似的。仅仅这个事实就足以证明，这个机构不过是个由一群轻信笨伯组

成的辩论俱乐部。他们让各邦政府把自己当作议会傀儡，登场演戏，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生意人开心，因为政府认为暂时有必要转移一下这一部分人的视线。这种作法需要保持多久，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这个议会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个人都丝毫没有感觉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么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兰克福俱乐部的旧日的成员们也还原封未动地保留着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感觉器官。

1852年3月于伦敦

[十四 秩序的恢复。议会和议院]

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利用 1849 年的最初几个月来扩大上年 10 月和 11 月的战果。自从维也纳被占领以后，奥地利的议会就在摩拉维亚的一个叫作克雷姆西尔的小镇上继续其有名无实的存在。斯拉夫族议员和选派他们的人曾经充当奥地利政府用来摆脱虚脱状态的主要工具，在这里，他们因为自己背叛欧洲革命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政府一经恢复了力量，便用极端轻蔑的态度来对待议会和构成它的多数的斯拉夫族议员；当帝国军队的最初的胜利已经预示匈牙利战争将很快结束的时候，议会便在 3 月 4 日被解散了，议员们也被武力驱散了。这时斯拉夫人才终于看到他们受了愚弄，于是他们大声疾呼：我们要到法兰克福去继续我们在这里不能进行的反对派活动！但这时已经太迟了，而他们除了安分守己或者参加无能的法兰克福议会以外再无别的选择，单是这个事实也足以表明他们已完全无可奈何了。

德国的斯拉夫人恢复独立的民族生存的尝试，现在而且多半是永远地就这样完结了。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被消灭，因此它们在近 1 000 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就像过去威尔士人在英国，巴斯克人在西班牙，下布列塔尼人在法国一样，也像今天西属或法属克里奥尔人在最近被英裔美国人占领的北美洲那些地方一样。这些垂死的民

族，如波希米亚人、卡林西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800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1000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向他们表明，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如果说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的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人所占据，那么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民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德意志人进行并吞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保持独立民族生存、团结统一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波希米亚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病弱者称心而倒退1000年呢？这些人在他们居住的所有地方到处都是和德意志人混居杂处并且为后者所包围，他们几乎从很久以来为了满足文明的需要除了德语以外就再没有别的语言，而且他们甚至缺乏民族生存的首要条件——众多的人口和整片的领土。因此，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拥护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任何地方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

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碎的纷争——这完全是因为他们过分无知，但永远不应忘记：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么德国的职责就是很明显的，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旺代⁵¹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

至于皇帝^①在解散议会的同时所颁布的宪法，没有必要再谈它，因为它从未生效，现在则已完全废除了。从1849年3月4日起，在奥地利已经完全恢复了专制制度。

在普鲁士，各议院曾在2月开会，审查和批准国王所颁布的新宪章。它们开了差不多6个星期的会，它们对政府的态度十分谦卑恭顺，但它们当时还没有充分的决心完全遵照国王和他的大臣们的愿望办事。因此，时机一到它们就被解散了。

于是，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暂时摆脱了议会监督的束缚。两邦政府现在已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自己手里，并且能够在一切需要的场合使用这种权力。奥地利利用它对付匈牙利和意大利，普鲁士用它对付德意志。因为普鲁士也准备进行一次战役来恢复各小邦的“秩序”。

现在，在德国的两个巨大的运动中心维也纳和柏林，反革命占了上风，只是在各小邦里斗争尚未见分晓，虽然在那里力量的对比也日渐不利于革命方面。我们已经说过，这些小邦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¹⁹里找到了共同中心。虽然这个所谓的国民议会的反动性质早已十分

①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编者注

明显,连法兰克福的人民也都武装起来反对它,但是它的产生却多少带一点革命性。1月间它曾经采取过一反常态的革命立场;它的权限从未确定,但它却终于能够作出了一项决议——虽然各大邦从未承认这个决议,说它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在君主立宪派看到正在恢复元气的专制派已经夺取了它的阵地的時候,差不多全德国的保皇派自由资产阶级自然都把他们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这个议会的多数派身上,而小商人的代表,民主派的核心,在日渐困难的境遇中团结在这个议会的少数派周围,这个少数派的确是民主派在议会中最后的密集的方阵。另一方面,各大邦的政府,尤其是普鲁士的内阁,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不正常的民选机关和德国已经复辟的君主制度是不能相容的,而它们所以没有要求立刻把它解散,那只是因为时机未到,也因为普鲁士还希望先利用它去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

同时,这个可怜的议会本身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狼狈,在维也纳和柏林,它派去的代表和专员都遭到极端的轻蔑;它的一个议员^①在维也纳被当作一个普通造反者处以死刑,虽然他具有议员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它的法令到处都没有人理睬。如果说各大邦还曾经提到这些法令,那只是在抗议书中提到,这些抗议书否认议会有权通过它们的政府必须执行的法律和决定。代表这个议会的中央行政权,几乎和全德各邦的内阁都发生了外交争辩,而且不管议会和中央政府如何努力,它们都没有能够使奥地利和普鲁士说明它们的意图、计划和要求究竟是什么。最后,议会终于开始清楚地看到,至少是看到了这样一点:它已失去了一切权力,它本身也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掌握

^① 罗·勃鲁姆。——编者注

中；如果它真打算给德国制定全联邦宪法，它就必须立刻认真地开始做这件事情。许多动摇的议员也都清楚地看到，他们被各邦政府大大地愚弄了。但他们既然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现在他们又能做什么呢？唯一能挽救他们的办法是迅速而坚决地投入人民的营垒，但就是采取这个步骤，成功的希望也是很渺茫的。其次，这是一伙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目光短浅、自以为是的人，当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和外交照会的没完没了的嘈杂声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他们却在不断重复的誓言中寻求慰藉和支持，说什么他们是国家最优秀、最伟大、最英明的人物，只有他们能够拯救德国。一年的议会生活已使他们变成了道地的白痴，难道在这伙可怜虫中间能找到可以作出迅速明确的决定的人吗？至于行动坚决果断的人，那就更不用说了！

奥地利政府终于丢掉了假面具。在3月4日颁布的宪法中，它宣称奥地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君主国，财政、关税制度和军事编制完全统一；这样便抹去了德意志省份和非德意志省份之间的一切界线和差别。它这样宣布，是与法兰克福议会已经通过的决议和已经通过的草拟中的联邦宪法的条文相抵触的。这是奥地利对议会的挑战，而可怜的议会除了应战而外，再没有别的选择。它虚张声势地应战一番，但奥地利很明白它自己的力量，也很了解议会一文不值，所以根本不予理睬。而这个自以为是宝贝的代议机关，为了报复奥地利对它的这种侮辱，竟想不出任何更好的办法，而只好自缚手足，跪倒在普鲁士政府面前。说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它向之屈膝跪拜的，正是它曾经斥之为违背宪法和敌视民意并坚持要撤换而没有撤换掉的那些大臣，这种可耻的行径和后来发生的悲喜剧事件的详情，将是我们下一篇的课题。

Christian street, they were fined if not more severely punished. It was under such foul oppression, however, that the fortunes of his house took their rise and began to flourish. At the entrance of this street is still the bureau, the council-room of their imperial line, where they receive tributes from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of the world. A poor devil of a Christian clerk sits there alone on Saturdays, to deal out small sums to travellers and others on letters of credit, &c.

Jews settled in Frankfurt under some imperfect, dearly-paid protection of the German Emperors as early as the twelfth century. In 1279 their wretched habitations were set fire to by religious fanatics, called Flagellants. In 1462 they built in the present *Juden-gasse*, or New-Egypt, as it is sometimes named. Fire came upon them yet again in 1711. I roughly translate a brief account of the last conflagration, as illustrative of the spirit of that time: "Meanwhile, all the houses were burned up stock and branch, and indeed in such way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so many houses, say, not so much as a stick of wood of an arm's length remained, which is surely marvellous. It was remarkable, also, that when one side of the street was burned down, the wind turned about as though it had finished there the business on which it was sent, and would now carry it on further; so that by this the other and greater part of the street was seized on by the fire and laid in ashes. The fire broke out almost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in the house of the Rabbi Naphthali, their most famous Doctor. It is related to a certain truth that when their Rabbi, who was besides a good Cabalist, was minded to touch his scholar the Cabala, and had kindled for experiment a great heap of wood in his house, he became confused in his incantation, and in place of conjuring the water-spirit to extinguish the fire kindled by him, called up the fire-spirit. Wherefore it was altogether in vain to try to save the smallest Jewish building. This is also to be considered in this conflagration, that of the many Christian houses near by, not a single one was consumed." Seeing on one side this account, writte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and the persecutions and oppressions under which the Jews existed until the close of the last century; and seeing on the other side the friendly forms on which Jews and Catholics and Protestants now live and work together here, one would say the world had made progress. Now, however, is to be made. Some additional measure of justice was dealt out to the Jews in the Revolution of 1848; but they are not yet admitted to a full political equality with the Christian citizens of Frankfurt. Just at this time the question of revis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ity is much discussed, and some propose, as one of the alterations, the admission of Jews to the Senate. With the present reactionary spirit of the German powers, it would seem, however, a dangerous time to al-

tiguing. Local events of the day, or some general item of foreign news, are the favorite topics of a low-toned conversation, freely punctuated with long whiffs of tobacco-smoke from the mouths of the interlocutors. As for helping out their rhetoric by any gesticulation or rising from their seats to command more attention, such French vivacity is never indulged in. The services of one hand are engaged to hold the pipe, while the other attends to the glass, and the rest of the body, once seated, never leaves its moorings till bedtime. These gentlemen must have had periods in their lives of greater mental activity than they indicate at these meetings, which are very possibly, to their habit, only an anodyne taken after the agitation of the day's business, as a preparation to full repose. They answer a questioning stranger intelligently and politely. May they sleep well; with quiet consciences and good digestions. They retire mostly before 10½ o'clock. The Frankforters generally are early to bed. Think of my coming home from Don Pasquale at the theater last night, at a little after 9 o'clock!

C. R. S.

GERMANY.

XV.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We now come to the last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the conflict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with the Governments of the different States, especially of Prussia; the insurrection of Southern and Western Germany, and its final overthrow by Prussia.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Frankfurt National Assembly at work. We have seen it kicked at by Austria, insulted by Prussia, disobeyed by the lesser States, duped by its own impotent Central "Government," which again was the slave of all and every prince in the country. But at last things began to look threatening for this weak, vacillating, insipid legislative body. It was forced to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ublime idea of German Unity was threatened in its realization,"—which meant neither more nor less than that the Frankfurt Assembly, and all it had done and was about to do, were very likely to end in smoke. Thus it set to work in good earnest in order to bring forth as soon as possible its grand production,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There was, however, one difficulty. What Executive Government was there to be? An Executive Council? No;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y thought in their wisdom, making Germany a Republic. A "President"? That would come to the same. Thus they must revive the old imperial dignity. But—as of course a prince was to be Emperor—who should it be? Certainly none of the *Dürrenbergs graffien*, from Reuss-Schleitz-Greiz-Lobenstein-Ebersdorf up to Bavaria; neither Austria nor Prussia would bare horns that.

a disorder which penetrates its unfortunate victims with the solemn conviction that the whole world its history and future, are governed and determined by a majority of votes in that particular representative body which has the honor to count them among its members, and that all and everything, going on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ir house—were revolutions, railway-constructing, colonizing a whole new continent, California gold discoveries, Central American canals, Russian armies, or whatever else may have some little claim to influence upon the destinies of mankind—is nothing compared to the incommensurable events hanging upon the important question, whatever it may be just at that moment occupying the attention of their honorable House. Thus it was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the Assembly, by effectually dragging a few of their acrotes into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first became bound to support it although in every essential point it flatly contradicted their own proclaimed principles; and at last, when this mongrel work was abandoned and bequeathed to them by its misadventurous, sceptical inheritances, and held out for this monarchic Constitution ever in opposition to everybody who then proclaimed their own republican principles.

Bu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in this the contradiction was merely apparent. The indeterminate self-contradictory, incoherent character of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was the very image of the incoherence, conflict, conflicting political ideas of these democratic gentlemen. And if their own sayings and writings—as far as they could write—were not sufficient proof of this, their actions would furnish such proof; for among sensible people it is a matter of course to judge of a man not by his professions but by his actions; not by what he pretends to be, but by what he does and what he really is; and the deeds of these heroes of German Democracy speak loud enough for themselves as we shall learn by and by. However, the Imperial Constitution with all its appendages and paraphernalia was definitively passed, and on the 30th of March the King of Prussia was, by 296 votes against 248 who abstained and some 200 who were absent, elected Emperor of Germany, *vis-à-vis* Austria. The historical irony was complete the Imperial farce executed in the streets of a townish Berlin, three days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March 18, 1848, by Frederick William IV. while in a state which elsewhere would come under the name Liquor Law—this disgusting farce, just one year afterward, had been sanctioned by the pretended Representative Assembly of all Germany! That, then, was the result of the German Revolution!

KARL MARX.

London, July 9, 1852.

载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论文的
《纽约每日论坛报》原版的一部分

那样做。只有奥地利或普鲁士才有这样的资格。但是怎样二者择一呢？毫无疑问，如果环境更好的话，如果不是奥地利政府斩断戈尔迪之结因而使议会解脱了麻烦的话，这个崇高的议会可能直到今天还在开会，还在讨论这个重要的左右为难的问题而得不出结论。

奥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驯服，而重新以一个强大的欧洲大国出现在欧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会把德国其他部分拉入它的势力范围之内，而不需要借助于法兰克福议会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获得的威信。奥地利自从扔掉那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德皇皇冠之后，它已经更加强盛得多了，行动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个皇冠妨碍了它实行独立的政策，而并没有在德国国内国外给它增加丝毫力量。如果奥地利不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阵地，那么它在德国也会土崩瓦解、一败涂地，它永远也别想拿回它在全盛时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奥地利立刻宣称它根本反对复活皇权，而明确地要求恢复德意志联邦议会——即被 1815 年的各个条约提到和承认的唯一的德国中央政府。它在 1849 年 3 月 4 日颁布的宪法，则明确宣布奥地利是个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权的和独立的君主国，它甚至与法兰克福议会所要改组的那个德国也毫不相干。

这种公开宣战使得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实在没有别的选择，只得把奥地利屏除于德国之外，而把德国的其余部分建成一个东罗马帝国⁴⁷式的国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当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鲁士国王陛下的身上。应该提到，这是 6—8 年前德国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义空论家们所提倡的那种旧的计划的更新，这些人把这种有失体面的状况视为天赐的良机，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可以把自己旧日的奇怪念头重新提出来，作为拯救祖国的最后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间,他们结束了关于帝国宪法以及权利宣言和帝国选举法的讨论,同时不得不在许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让步——时而向议会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确切些说向反动派让步,时而又向较进步的派别让步。事实上,很明显,原来属于右派和右翼中间派(保守派和反动派)的议会领导权,现在逐步地(虽然是徐缓地)转到议会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来。议会已把奥地利排除于德国之外,但奥地利代表仍被邀请参加会议和进行表决,这些代表的暧昧立场,也促使议会中的均势遭到破坏;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间派和左派就常常由于奥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于多数地位,虽然有的时候保守的奥地利代表好像开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时又追随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边。他们使议会这样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让它为人所轻视,但这是完全用不着的,因为人民群众早已认识到法兰克福所做的一切纯粹是空洞无益的事情。不难想象,在当时这种左右摇摆的情形下拟定的宪法,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了。

议会中的左派(他们自信是革命德国的精英和骄傲),完全陶醉于依靠受奥地利专制制度唆使并为它效劳的一些奥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确切些说是恶意)而取得的微小的胜利。每当一种稍稍接近于他们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确的原则的主张以一种用顺势疗法冲淡了的形式获得法兰克福议会的某种批准时,这些民主派就宣称他们已经挽救了国家和人民。这些可怜的蠢人,在他们的整个说来是十分黯淡的一生中,绝少遇到胜利一类的事情,以致他们真正相信,以两三票的多数通过的他们的毫无价值的修正案,会改变欧洲的面貌。他们从开始立法生涯时起,就比议会中任何其他派别更深地感染了议会迷这种不治之症,这种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满怀一种庄严的信念:整个世界,它的历史和它的未来,都要由有幸以他们为议员的这个代议机

关的多数票来支配和决定；他们议院四壁以外发生的所有一切——战争、革命、建筑铁道、所有新大陆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中美洲运河、俄罗斯的军队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响人类命运的事情——同取决于目前正受到他们的可敬的议院的关注的重要问题的解决的那些无可比拟的事件比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于是，议会中的民主派由于他们成功地往“帝国宪法”里偷偷塞进了自己的一些灵丹妙药，便认为自己首先有义务对它加以支持，虽然这部宪法的每一重要条款都和他们自己所常常宣扬的原则正相矛盾。最后，当这部不伦不类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们抛弃并遗赠给民主派的时候，后者就接受了这份遗产，并且坚持这部**君主制**的宪法，甚至反对任何**当时**主张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义**原则的人。

但是应该承认，这里的矛盾不过是表面的。帝国宪法的不明确、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质，恰好反映了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不成熟、混乱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说他们自己所说的话和所写的文章——就他们所能够写出的而言——还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那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充分的证据。因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而德国民主派的这些英雄们的行动，完全足以说明他们自己，这我们以后就会看到。不管怎样，帝国宪法及其一切附属物和装饰品的确被通过了，3月28日，普鲁士国王在248票弃权和大约29位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以290票当选为**除奥地利之外的德国皇帝**。这真是历史的一个绝大的讽刺：在1848年3月18日的革命后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惊愕的柏林的街道上演出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剧⁵³，当时的情形如果是在别处，他也许会被认为触犯了缅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后，这个令人厌恶

的滑稽剧却被一个虚构的全德代表会议所批准。德国革命的结果就是这样！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六 国民议会和各邦政府]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¹⁹把普鲁士国王选为德国(奥地利除外)皇帝以后,便派遣一个代表团到柏林去授予他皇冠,然后就宣告休会。4月3日弗里德里希-威廉接见了代表们。他告诉他们说,虽然他接受人民代表投票所赋予他的凌驾于德国其他各邦君主之上的权利,但他在还没有确信其余各邦君主承认他的最高统治权和承认赋予他这些权利的帝国宪法以前,不能接受皇冠。他接着说,考虑这个宪法是否可以予以批准,这是德国各邦政府的事。最后他说,做皇帝也好,不做皇帝也好,他时刻都准备着以武力打击内部或外来的敌人。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以使国民议会十分吃惊的方式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法兰克福的那些自作聪明的人经过一番深刻的外交研究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说,作这种答复就等于拒绝皇冠。于是他们(在4月12日)作出一项决议:帝国宪法是国家的法律,必须遵守。但是,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他们就选举了一个三十人委员会,要它就如何才能实施这部宪法提出建议。

这项决议就是法兰克福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现在已爆发的冲突的信号。

中间阶级,尤其是小生意人阶级,立即宣布拥护新的法兰克福宪法。他们不能再等待“终结革命”的时刻了。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由于武力的干涉,革命当时已经终结。上述各阶级本想选择一个较和平的

方式来实现这个行动,但他们没有得到机会。事已如此,他们只能好自为之,——这就是他们立即作出的并坚决执行的决定。在事情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各小邦,中间阶级早已重新陷入那种最合他们心意的、表面上轰轰烈烈但由于没有实力而毫无成效的议会鼓动。这样一来,德国的每一个邦,单独看来,好像都获得了据说能使它们今后走上和平立宪发展道路的新的最终形式。只留下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关于德意志联邦⁵的新的政治组织的问题。人们认为这个唯一的、看来还包含着危险的问题必须立刻加以解决。因此中间阶级就对法兰克福议会¹⁹施加压力,以便敦促它尽快制定宪法;因此上层和下层资产阶级都决心接受并支持这部不管是什么样的宪法,以便立即造成一个稳定的局面。总之,要求制定帝国宪法的鼓动一开始就是出于一种反动的情感,并且是在那些早已厌倦革命的阶级中产生的。

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未来的德国宪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在1848年春天和夏天的最初几个月就已被表决通过了;当时,人民运动还处于高潮。那时通过的决议虽然在当时来说是十分反动的,但在经历了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暴虐行为之后,现在看起来它们却是十足自由主义的,甚至民主主义的了。进行比较的标准变了。法兰克福议会如果不愿在道义上自杀,就不能勾销已经通过的这些条款,而根据在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的刀剑的威逼下制定的那些宪法的模样去仿造一部帝国宪法。此外,我们已经说过,议会中多数派的地位已经掉换,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势力不断增大。因此,帝国宪法的特色是:它不仅在表面上完全出自民意,同时,虽然充满了矛盾,却仍然是全德国最富于自由主义精神的宪法。它的最大缺点在于它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条款没有实力作为后盾。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派即小生意人阶级群众抱住帝国宪

法不放,那是很自然的。这一阶级在提出自己的要求方面,向来比自由派的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更先进;它曾经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常常以武力对抗相要挟,经常慷慨地宣称,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但是有许多事实证明,一到危急关头它就不见了,而在遭到彻底失败的第二天,它却觉得再舒服不过了,这时虽然一切都已失掉,但它至少可以自慰的是:它知道,无论如何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当大银行家、大工厂主和大商人对法兰克福宪法的拥护比较慎重,只是简单地对它表示赞成的时候,紧挨在他们下面的阶级——我们的勇敢的民主派小商人,却堂而皇之地出来亮相,像往常一样地宣称,他们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让帝国宪法完蛋。

得到这两派——拥护君主立宪的资产者和多少带有民主主义倾向的小商人——支持的、要求立即实施帝国宪法的运动进展很快,它在几个邦的议会中得到了最强有力的表现。普鲁士、汉诺威、萨克森、巴登和符滕堡的议院都宣称赞成这部宪法。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了。

可是,各邦政府迅速行动起来了。普鲁士的两院被解散了,这是违宪的,因为应由它们审查和批准普鲁士宪法;政府故意在柏林激起了骚动;过了一天,即4月28日,普鲁士内阁发布了一个通告,声称帝国宪法是一个极端无政府主义的和革命的文件,德国各邦政府必须予以审订并使之纯正。普鲁士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法兰克福的那些聪明人常常夸耀而从未真正实现过的自主的制宪权。于是召集了一个各邦君主的会议⁵⁴,即死灰复燃的旧联邦议会,来讨论已被宣布为法律的宪法。同时,普鲁士把军队集中于离法兰克福只有3天路程的克罗伊茨纳赫,并且号召各小邦效法它的榜样,只要各小邦的议院支持法兰克福议会,就立即予以解散。汉诺威和萨克森马上照

着这个榜样做了。

显然,斗争的结局要靠武力来决定,这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各邦政府的敌对态度和人民中的骚动,一天比一天更加明显。具有民主情绪的市民到处力图影响军队,并且在德国南部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处举行群众大会,会上通过决议准备在必要时以武力支持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科隆为此召开了一个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⁵⁵在普法尔茨、在贝格区、在富尔达、在纽伦堡、在奥登林山,农民成群地举行集会,情绪十分激昂。这时,法国的制宪议会已被解散了,各地都在激烈的骚动中准备新的选举;而在德国的东部边境,匈牙利人通过连续不断的光辉的胜利在不到一个月的期间把奥地利的侵略浪潮从蒂萨河压回到莱塔河,每天都有攻下维也纳的可能。总之,人民的想象力到处都达到了最高点,而各邦政府的挑衅政策也一天天更加露骨,暴力冲突是必不可免了,只有怯懦的低能儿才会相信斗争可以和平解决。但这种怯懦的低能儿在法兰克福议会里却大有人在。

1852年7月于伦敦

[十七 起 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¹⁹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这个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8月15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

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 $\frac{3}{4}$ 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种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全国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滕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

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莱奥波德。——编者注

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地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①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

^① 丹东 1792 年 9 月 2 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们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而后者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⁵⁶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

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于伦敦

[十八 小生意人]

在我们的前一篇中，我们指出了德国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的斗争终于达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在5月初德国很大一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公开的起义：首先在德累斯顿，接着在巴伐利亚的普法尔茨，在莱茵普鲁士的部分地区，最后在巴登。

在这一切场合，起义者**真正的战斗**的主力，首先拿起武器与军队作战的主力，是由**城市工人阶级**组成的。一部分穷苦的农村居民，即雇农和小农，一般在冲突真正爆发后参加了工人的队伍。资本家阶级以下的一切阶级中的大多数青年至少曾一度参加了起义军的队伍，但这一群颇为混杂的青年人，一到事态的严重时刻，便很快减少了。尤其是喜欢自称为“知识界的代表”的大学生，如果不是由于获得军官头衔而被留住，他们便首先抛弃自己的旗帜，可是，他们担任军官根本就不够格。

工人阶级参加了这次起义，正像它也会参加其他起义一样，——只要这种起义能清除它在取得政治统治和实行社会革命道路上的某些障碍，或者至少可以迫使那些势力较大而勇气较小的社会阶级采取一种比它们以前所采取的更坚决更革命的方针。工人阶级拿起武器时已清楚地认识到，从事件的直接目的来说，这次起义并不是它自己的斗争；但它仍然执行了对它来说是唯一正确的策略：不让任何以它为垫脚石的阶级（像资产阶级在1848年所干的那样）巩固其阶级

统治。除非这一阶级至少给工人阶级提供一个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的自由场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使事态发展成为危机，这种危机不是使整个民族坚决果断地走上革命道路，就是使革命前的状况尽量恢复，从而使新的革命不可避免。在这两种场合下，工人阶级都代表整个民族的真正的和被正确理解的利益，因为它尽量加速革命的进程，而这个革命对于文明欧洲的任何一个旧社会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没有这个革命，文明欧洲的任何旧社会都休想较安稳较正常地继续发展自己的力量。

至于参加这次起义的农村居民，他们大半是这样投入革命派的怀抱的：部分地是由于捐税过重，部分地是由于压在他们身上的封建义务过重。他们本身没有任何主动性，总是尾随在参加起义的其他阶级的后面，在工人与小生意人阶级之间摇摆。他们站在哪一边几乎总是由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农业工人通常是支持城市工人的；小农则倾向于和小商人携手。

我们已经几次提到过这个小生意人阶级的重大作用和影响，可以认为这个阶级是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在这一次，没有一个德国大城市是运动的中心，所以通常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生意人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而且我们已经知道，这次维护帝国宪法和德国议会权利的斗争，正是同这个阶级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在一切起义地区^①所组织的临时政府中占大多数的都是这一部分人的代表，因此，他们能走多远，这完全可以作为衡量德国小资产阶级有多大能耐的尺度。我们将要看到，它除了使托付给它的运动遭到失败而外，什么能耐也没有。

① 即萨克森、巴登和普法尔茨等地。——编者注

小资产阶级擅长于吹牛，在行动上却十分无能，而且不敢作任何冒险。这个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的小本经营，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因此它的政治活动也自然具有同样的特点。所以小资产阶级是用漂亮的言词和吹嘘它要完成什么功绩来鼓动起义的；一当完全违背它的愿望而爆发了起义，它就迫不及待地攫取权力；但它使用这种权力只是为了毁灭起义的成果。每当一个地方的武装冲突使事态发展到了危急关头，小商人就十分害怕他们所面临的危险局势，害怕人民真正接受了他们号召武装起来的高调，害怕已经落到他们手里的政权，尤其是害怕他们被迫采取的政策会给他们自己、给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的财产带来的后果。人们不是希望他们真的像他们常说的那样，为了起义的事业，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财产”吗？他们在起义时不是被迫担任官方职务，因而在失败时就有失去自己的资本的风险吗？而在起义胜利时，他们不是深信自己会立即被赶下台，并且眼看着他们的全部政策被作为他们的战斗部队主力的胜利的无产阶级根本改变吗？这样，小资产阶级就被种种互相对立的危险团团包围，它除了让一切都听天由命之外，再也不知道如何使用它的权力；因此，它当然也就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取得胜利的小小的机会，而把起义完全断送了。小资产阶级的策略，或者更确切些说，小资产阶级的毫无策略，到处都是一样，所以 1849 年 5 月德国各个地方的起义，也都是由一个模子铸出来的。

在德累斯顿，巷战继续了 4 天之久。德累斯顿的小商人、“市自卫军”，不仅没有参加斗争，反而在许多场合支持军队镇压起义者的行动。起义者又几乎全是周围工业区的工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干的、头脑冷静的指挥者——俄国的流亡者米哈伊尔·巴枯宁，后来他被俘了，现在被囚禁在匈牙利的蒙卡奇监牢里。人数众多的普鲁士军队

的干涉，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了。

在莱茵普鲁士，实际的战斗规模不大。所有的大城市都是被许多炮台所控制的堡垒，起义者只能进行一些小的战斗。一旦调集了足够数量的部队，武装反抗就终止了。

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则相反，起义者占领了一个富饶的省份和一个整个的邦。金钱、武器、兵士、军需品这里应有尽有。正规军的士兵们本身就参加了起义队伍；在巴登他们甚至是起义的先锋。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作了自我牺牲，为组织德国南部的运动赢得了时间。一省范围内的地方起义，还从来没有得到过这样有利的条件。巴黎也有爆发革命的可能；匈牙利人已兵临维也纳城下；在德国中部各邦，不仅人民，连军队也都坚决赞助起义，一等有适当机会就公开加入起义。可是运动既然被小资产阶级所控制，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遭到毁灭。小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尤其是以布伦坦诺先生为首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统治者，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篡夺“合法的”君主即大公的地位和特权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坐在大臣的坐椅里深感内疚。能够希望这些懦夫有什么作为呢？他们不仅对起义放任自流，使之分散因而毫无结果，并且还竭力磨去运动的锋芒，阉割和摧毁运动。由于一批深谋远虑的政客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英雄们的热诚支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这些英雄们当真相信，他们让布伦坦诺之流的少数狡猾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时候，是在“拯救祖国”。

至于军事方面，从没有见到过比原正规军尉官巴登总指挥济格尔指挥的军事行动更草率、更蠢笨了。一切都杂乱无章，一切有利时机都放过了，一切宝贵的时刻都浪费在考虑一些庞大而不能实现的计划上，到最后，当能干的波兰人梅洛斯拉夫斯基担任指挥的时候，军队已经是组织涣散、迭遭败北、士气沮丧、给养恶劣，却面对着4倍

于己的敌人，所以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瓦格霍伊瑟尔进行战斗，这一仗虽未打胜但打得很英勇，接着实行了机智巧妙的退却，在拉施塔特城下进行了最后一次绝望的战斗便辞职了。像在任何起义战争中一样，部队是由老练的士兵和新召入伍的士兵混合组成的，所以在这支部队中虽然有许多英雄事迹，但同时也有许多次士兵所不应有的、常常是不可理解的惊慌失措。但是，尽管有这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这支军队至少有一点是可以对自己表示满意的，这就是：人们承认4倍的优势兵力还不足以把它击溃，10万正规军在对付2万起义者的战役中，在军事上对后者如此高度重视，就好像要同拿破仑的老近卫军作战一般。

起义在5月爆发；1849年7月中它完全被镇压下去。第一次德国革命就此完结了。

[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生意人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 800—900 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 150 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 100 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

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5月中或5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的话算数,他们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①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

^①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 年 5 月 18 日—1849 年 5 月 30 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

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滕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滕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符滕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滕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1849年6月18日封闭了议会

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滕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这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年6月30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6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滕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查符滕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10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1820—1848年

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中间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 1848 年 3 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 1849 年 5 月和 6 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 年 5 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各小邦 $\frac{2}{3}$ 的军队，普鲁士 $\frac{1}{3}$ 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生意人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⁵⁷

1852年9月2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

*1851年夏在伦敦的德国
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情况概述⁵⁸

你大概在各种德文报纸上读到了半政府的《石印通讯》的一篇文章⁵⁹，在这篇文章里，伦敦的官方德国流亡者向公众宣布他们兄弟般的团结，宣布他们已组成一个完整的组织。所有渴望达成协议的民主派分成三个集团：卢格集团、金克尔集团和难以描述的维利希集团。在所有这三者之间，还有一些加盟的神仙：小文学家，如梅因、孚赫、奥本海姆等，前柏林协商派⁶⁰，最后还有陶森瑙和一些奥地利人。

我们应当从欧洲民主派中央⁶¹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阿·卢格谈起。阿·卢格并不是戴着桂冠来到伦敦的。大家只知道，他在紧急关头^①从柏林溜走，后来向布伦坦诺谋求驻巴黎公使的职位也没有成功；在整个革命时期，每当出现什么幻想的时候，他总是用坚定不移的态度支持这种幻想，甚至有一次心血来潮，发现“按照德

① 指1848年11月12日柏林戒严。——编者注

绍的形式”能轻而易举地解决当代的冲突。他正是这样称呼那个小小的模范国家的保皇立宪的民主形式的。但他执意要在伦敦成为一个大人物。像往常一样，他事先采取办法同德国的一家民主派的地方报纸建立联系，以便能够肆无忌惮地向德国公众表明他是一个重要人物。这一次好运气落到了《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现在卢格可以开始他的下一步行动了。因为他讲法语结结巴巴，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作为德国最重要人物自荐于外国人，但是马志尼立刻完全准确地看出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可以毫无顾忌地委托此人以德国人的名义在他的宣言上签名。于是，阿·卢格便成了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正如赖德律-洛兰有一次所说，成了马志尼的人。阿·卢格感到这已经超越了自己的理想。然而，现在问题在于，也要在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的面前显出有实力的样子，并证明他除了不佳的名声还将有更多的东西投到天平上去。因此，阿·卢格决定完成三项壮举。他同豪格、隆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德国中央委员会⁶²。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冠以谦逊的名称：《宇宙》，最后还向德国人民发行了1 000万法郎的公债，作为报答，他保证德国人民取得自由。1 000万没有到手，就是《宇宙》也完蛋了，中央委员会分裂成它最初的几个组成部分。《宇宙》只出了3期。卢格的经典风格把凡俗的读者们都吓跑了。但总是做了一些事，阿·卢格得以在纸上表达自己对于女王邀请冯·拉多维茨先生，而不邀请他到温莎城堡所感到的惊讶，另外他自己编造了一些德国来信，信中把他“作为临时政府”向他致敬，并以自己的轻信的朋友们的名义，对他回国以后“国家事务”将不允许他保持各种亲密的私人关系事先表示遗憾。

由卢格、隆格、豪格、司徒卢威和金克尔等先生们签名的关于号

召认购1 000万公债的呼吁书^①刚刚发表,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正在传递着为司徒卢威赴美捐款的名单,而另一方面,《科隆日报》登载了约翰娜·金克尔太太的声明,说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宣言上签名,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中央委员会。

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先生在三月革命前后的全部政治智慧,不过是鼓吹“憎恨君主”而已。然而在伦敦,他为了得到现款,竟然给卡尔·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文报纸^②撰稿,甚至还得受公爵先生至高无上的亲手检查。这件事报告了马志尼,当司徒卢威先生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炫耀在欧洲通告上的时候,马志尼却加以禁止。司徒卢威愤然而去,他怀着对中央委员会的极度愤恨搭船到了纽约,要把自己的固定观念,把自己不可缺少的《德国旁观者》移植到那里去。

至于说到金克尔,正如阿·卢格和《纽约快邮报》喋喋不休地所说的那样,他的确没有在那个呼吁书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呼吁书的;草稿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亲自把许多份寄往德国,而他退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因为选出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卢格在作此声明时尖锐地攻击了他称之为民主派贝克拉特的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为她效劳的是《科隆日报》这种被唾弃的报纸。

因此,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卢格也已经明白,这个三位一体不但不能创造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但是,不倦的卢格还不愿认输。对这位大人物来

① 指德国事务委员会1851年3月发表的《告德国人书!》,见本卷第367—368页。——编者注

② 《德意志—伦敦报》。——编者注

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一般地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像个忙于深奥的政治计谋的人,首先是能为他装腔作势地高谈阔论,东奔西跑,进行谈判,散布自鸣得意的澜言和撰写新闻简讯提供些材料。他真走运,菲克勒尔刚刚到了伦敦。此人和其他两个南德人戈克和济格尔对金克尔先生的妄自尊大感到厌恶;济格尔决不愿意受维利希的指挥,戈克也决不会接受维利希改善世界的计划。而且这三个人对于德国哲学史知道得太少了,以致把卢格当成了大思想家;他们太天真了,以致受了他伪装纯朴的欺骗;他们太老实了,以致把这批所谓的流亡者的全部活动都当成真的。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①在给《纽约快邮报》的信中所说,他们决定同其余的集团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就是这位通讯员却又抱怨说,实现这个虔诚而良好的事业的希望很小;金克尔继续在搞阴谋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②、他的传记作者^③和几个普鲁士尉官^④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暗地里活动,秘密地逐渐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钱弄到手,然后作为强大的金克尔派突然公开出现;这样做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卢格不得不在同一号报纸上对“绝对的受难者”作了些旁敲侧击。就在《纽约快邮报》把这种澜言传到伦敦来的当天,举行了敌对集团的第一次正式的团结友爱日^⑤。但这还没有完!阿·卢格通过《纽约快邮报》在美国征求倒霉的欧洲公债的认购者。

曾在《科隆日报》上表示不同意这件令人可笑的事情的金克尔,

① 戈克。——编者注

② 卡·叔尔茨。——编者注

③ 阿·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④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古·阿·秦霍夫。——编者注

现在却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独自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还说,应该把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不用说,他就是这样的人。

他要求先付3 000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阿·卢格,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司库,在他那里可以得到已经准备好的债券;因此,对于势必丧失300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债券总比去买还不存在的要合算。而《快邮报》编辑部相当直率地声称,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最后,当卢格在《快邮报》上搬出他那每星期一次的谰言,在这里装模作样地把自己打扮成未来的人物,并庆贺自己占有了所有与这个第五个轮子相称的要职的时候,金克尔却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州报》上写道:

“你们看,在大西洋彼岸正在进行正式战争,而在此岸却在交换着犹太之吻。”

如果您问我,像阿·卢格这样一个实际上从来毫不中用,理论上早就完蛋,只以经典的混乱文体而出众的人,他怎么还能起某种作用,那么我首先指出,他的作用只是在报纸上撒谎,他靠他所特有的顽强的勤奋和用各种最卑贱的手段竭力传播这些谎言,竭力使他自己和别人都能相信这些谎言。至于他在这里的所谓流亡者中的地位,那么这正好同他相称,虽然他只是一条把整个民主派的所有矛盾、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汇合起来的阴沟。作为流亡者所固有的通病——思想模糊和糊涂的典型代表,作为他们的孔夫子^①,他理所当然地保住

^① “孔夫子”(Konfuzius)和“糊涂虫”(Konfusion)在德语中发音相似。——编者注

了自己的地位。

您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金克尔随着他认定的民众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某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在为短命的《宇宙》写的一篇文章里，他特别赞赏水晶宫⁶⁴里展出的一面大镜子。由此您可以看到这么一个人：镜子是他的生命的要素。他首先实质上是个演员。他主要扮演德国革命的受难者，在伦敦这里获得了给予其余的战斗牺牲者的那种尊敬。但是，他一面让唯美主义的自由资产阶级公开酬谢并款待他，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渴望达成协议的流亡者的极端派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认为，这样做既能保证自己享受资产阶级的现在，又能保证自己享有对革命的未来的权利。他在这里的生活同他过去在波恩时的状况比起来，可算是豪华了，但同时他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过的生活像一个穷人的代表所应该过的生活一样。总之，他遵照必要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也对无产阶级表示应有的尊敬。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性的人，他不可能不多少表现出暴发户的粗暴和狂妄，这使得流亡者中某些装腔作势的庸人离开了他。据说，他现在打算周游英国，以便在各个城市向德国商人发表演说，接受别人的敬意以及把通常只适于南方气候的双季收获的特权移植到北方的英国。金克尔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个有雄心的人，那他就错了。他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而且命运除了把这个通常是善良的善于辞令的人引向他的愿望的目的，并把他安置到重要的地位上去，再也不能跟他开更恶劣的玩笑。即使是这样，他也会遭到无法挽救的彻底惨败的下场。

最后，关于维利希，我只把他的熟人的看法告诉您。他们全都认为他是个目光短浅的空想家。他们对他的天才表示异议，可是正因为

如此，他们宣布他是有性格的人。他满意自己的这种地位，并且以他那超出人们预料的普鲁士人的狡猾利用这个地位。现在您会了解到未来的大人物们。

官方流亡者的总数，除了极少数例外情况，是由零构成的，其中每一个零都认为，如果它同别的零凑成一打的话，它就成为一。由此他们经常企图搞联合，这类企图总是由于这些渺小的大人物之间无谓的争吵、倾轧、卑鄙行为和竞争而失败，但是还是不停地这样搞下去。他们一方面在北美报纸上相互辱骂，一方面又认为必须面对着德国结成一条战线，并认为他们聚集成一大堆散播流言蜚语的乌合之众，就必然会使人感到他们是一种势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组织。他们经常要自己相信，为了使公众敬仰，他们总是还缺少点什么；因此他们有组织地招募每一个新来者。他们为了把弗莱里格拉特从马克思那里拉到自己一边所做的努力既是死乞白赖的，当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们现在用沉默来惩罚他。为了使加入他们的正义者同盟，金克尔试用过一切手段，而阿·卢格甚至用书面形式向他呼吁。⁶⁵现在，他当然也和威·沃尔弗和其他与这种勾当保持距离的流亡者一样，不属于“这一类流亡者”。多一个人多好！如果这些革命的嘉布遣会⁶⁶修士，这些革命的行乞的修士可以献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么为了多一个人，特别是多一个像弗莱里格拉特这样有声望的人，他们会献出一个王国。流亡者的这个总数是由追逐职位者和沽名钓誉者凑成的。这些先生们认为，革命即将来临，而他们当然要作好准备。于是，帝国议会的成员们便在瑞士成立了类似的同盟，同盟中未来的职位已经根据等级按次序分配好了。不过，在谁应该当第17号或者第18号代表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激烈斗争。

您对这些先生们把半政府的《石印通讯》变成自己的通报感到奇

怪。如果我对您说，他们这些拙劣作家中有一个人^①定期为《新普鲁士报》胡乱写一通，另一个人^②在俄国的《纪事晨报》做助手工作等等，那么您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不过，这绝不是背着官方流亡者干的。不仅如此，他们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以宣读《石印通讯》的文章开始的。他们大约有50人，而且在第二次会议上这个数字就减少了一半以上。不和的种子已经在这些渴望达成协议的人们中间大批破土出芽，不过，正如其中有一人秘密地表示的那样，这些人仅仅是些“流亡者上层”。普通的工人流亡者群众一个也看不到。

如果说亲如兄弟的流亡者在某一点上是一致的话，那么这一点就是他们对马克思全都怀有疯狂的仇恨。他们准备去做任何蠢事，去干任何卑鄙勾当，去搞任何阴谋，以便发泄自己对这个眼中钉的愤恨的感情。这些先生们甚至低三下四地同古比茨的《伴侣》的前撰稿人贝塔、即贝特齐希建立联系，让这位大作家和爱国者以马克思是普鲁士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夫为理由在快活的酒馆老板路易·德鲁克尔的刊物^③上怀疑马克思是奸细。冯·威斯特华伦先生同马克思只打过一次交道，这就是，他通过没收贝克尔的印刷所并把在科隆的海·贝克尔投入监狱的办法，破坏了贝克尔开始出版的、第一分册已经问世的《马克思文集》的出版，并且阻挠出版已在印刷中的杂志。由于萨克森政府公布了共产主义文告^④，对马克思的仇恨就更强烈了，因为他被认为是这份文告的作者。不过，马克思已经多年完全埋头于

① 尤·孚赫。——编者注

② 洛·布赫尔。——编者注

③ 在伦敦出版的德文周报《您好！》。——编者注

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编者注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他正如弗莱里格拉特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一样,既没有愿望也没有时间来回答这些亲如兄弟的流亡者谰言。可是,越是不理睬他们,这些未来的哈巴狗就越是狂吠不已。过早去世的古斯塔夫·尤利乌斯,这个有充分的批判能力和学术上有造诣的人,现在也被流亡者宣布为他们的拥护者;他们的无聊而荒唐的勾当使他十分厌烦,所以他在去世前几个星期给一家北德意志的报纸寄去一篇详尽地描述流亡者的文章,但是,这家报纸拒不接受。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8月
15日—25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1956年
《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第9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声 明⁶⁷

奥格斯堡《总汇报》发表一篇精心炮制的“科隆 9 月 26 日”通讯，荒唐地把我同倍克男爵夫人以及科隆的逮捕⁶⁸扯在一起，竟说什么我曾经把政治机密透露给倍克男爵夫人，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为政府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见过两次面⁶⁹，两次见面都有见证人。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谈到了向我约稿的事，而我不得不加以拒绝，因为这是以我同德国报纸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错误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直到我听说这位男爵夫人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⁷⁰。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人来往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我没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隆通讯员或者在伦敦的那些把流亡变成一种营生或职务的德国“大”人物当作自己的朋友一样。我从来就认为，德国报纸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谬而且拙劣的谣言是不值一驳的，它们不是从伦敦直接制造出来的，就是从伦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之所以破例，只是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隆通讯员

13

25, Davenport, Ila, Iowa
4 October 1892

U. S. - Affiliated Revision 2. U. S. Z.
Deren Reduktion Sie A. A. Z. - in der Brief Correspondenz
aus demselben Zusammenhang gegen die öffentliche Meinung
der von Ihnen vertretenen Sache aufgeführt & gedruckt
in dem Ihre nicht neuen Werke sind
beigefügt

Dr. Karl Marx
Münchener Privat-Druckerei
Bismarckstr. 27
München
Preussische

für die Veröffentlichung des Allg. Allg.
Zitierung d. d. von der ~~Veröffentlichung~~ in
Lernin v. Beck in der oben genannten
in einem abgedruckten Zitatung. Ich
nehme an dass Lernin v. Beck geistig
nicht anerkannt haben die geistigen in dem
die andere Seite der Angelegenheit
wissen

Angenehm

Ich habe die Lernin v. Beck mit
Ihre Meinung - ganz im Gegensatz von
Ihren. Sie sind nicht zu befehlen

卡·马克思的《声明》的手稿

企图把所谓我向倍克男爵夫人泄密当作在科隆、德累斯顿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

卡尔·马克思

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10月
4日

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
报》第242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⁷¹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51 年
12 月中—1852 年 3 月 25 日

载于 1852 年 5 月《革命。不定
期刊物》第 1 期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60 年德文版第 8 卷翻译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erausgegeben von

J. Weydemeyer.

Erstes Heft

Der 18te Brumaire des Louis Napoleon

von

Karl Marx.

New-York.

Expedition: Deutsche Vereins-Buchhandlung von Schmidt und Schmidt,
William-Street Nr. 191.

1852.

最先刊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
《革命。不定期刊物》第1期的扉页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⁷²。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⁷³，侄子代替伯父。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①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伟大的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卑劣的笑剧出现。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伦敦的特别警察⁷⁴和一打债台高筑的军官代替小个军士及其一桌元帅！白痴的雾月十八日代替天才的雾月十八日！在使雾月十八日事变得以再版的种种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第一次是法国站在破产的边缘，这一次是波拿巴自己站在债务监狱的边缘；当初是大国联盟站在边境，这一次是卢格和达拉什联盟在英国，金克尔和布伦坦诺联盟在美国；当初是爬过一座圣伯纳德山⁷⁵，这一次是派一个中队宪兵越过汝拉山脉⁷⁶；当初是不止获得一个马伦戈，这一次是应当得到圣安德烈大十字勋章⁷⁷和丧失柏林《国民报》的尊敬。”——编者注

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的一幕。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罗⁷⁸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拙劣地时而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传统。就像一个刚学会一种新语言的人总是要把它翻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新语言翻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们中间的显著差别。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仑，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前几个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国内部创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经营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国内的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则到处根据需要清除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给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创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土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凯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库辛们、鲁瓦耶-科拉尔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作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统帅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领是肥头肥脑的路易十八。资产阶级社会完全埋头于财富的创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记了古罗马的幽灵曾经守护过它的摇篮。但是，不管资产阶级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诞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需要自我牺牲、恐怖、内战和民族间战斗的。在罗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传统中，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理想和艺术形式，找到了他们为了不让自己看见自己的斗争的资产阶级狭隘内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自我欺骗。例如，在100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⁷⁹。

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

在1848—1851年间，只有旧革命的幽灵在游荡，从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装的戴黄手套的共和党人马拉斯特起，直到用拿破仑的死人铁面型把自己的鄙陋可厌的面貌掩盖起来的冒险家^①止。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亡的时代；而为了不致对倒退产生错觉，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为古董的旧的日期、旧的纪年、旧的名称、旧的敕令以及好像早

① 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已腐朽的旧宪兵复活起来。一个民族的感觉,就好像贝德勒姆^①那里的一个癫狂的英国人的感觉一样,这个英国人设想自己生活在古代法老的时代,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劳役,因为他要在地下监狱般的埃塞俄比亚矿场挖掘金矿,借着系在自己头上的一盏暗淡油灯的灯光,在一些手持长鞭的奴隶监工的监督下劳动;矿洞口站着一群乱哄哄的野蛮兵士,他们既不了解劳役囚人,相互之间也不了解,因为大家讲着不同的语言。疯癫的英国人叹道:“我这个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被迫忍受这一切,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还债。”——法兰西民族叹道。这个英国人在头脑清醒的时候总不能撇开找金子这种固定观念。法国人在从事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⁸⁰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险,他们曾经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锅⁸¹,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回答。他们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老拿破仑的漫画,他们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19世纪中叶所应当出现的老拿破仑。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隐瞒自己的内容。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②,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内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袭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

① 伦敦的疯人院。——编者注

②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

则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纪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一个狡猾的赌徒的骗术所葬送，结果，被消灭的不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个世纪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结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内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统治。1851年12月的轻率行为报复了1848年2月的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去得快。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间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间，法国社会总算获得了教训和经验，而且是以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获得的。这些教训和经验在正常的即所谓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如果这次革命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的话。看起来仿佛社会现在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创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创造唯一能使现代革命成为真正的革命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彩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学会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动的不彻底性、弱点和拙劣；它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前面挺立起来；它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

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⁸²

但是，每个平庸的观察家，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闻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⁸³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在锡利亚⁸⁴信徒脑子里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的那个日子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象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绩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结成团伙，来驳倒关于他们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见，他们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预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们的有名无实的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员已由他们毫不挑剔地在暗中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贴现。12 月 2 日对他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让呼喊者的大喊大叫来压抑自己内心的惊愕，这一次他们也许已经了解到：鹅的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利诺⁸⁵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

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⁸⁶、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⁸⁷、非洲的英雄⁸⁸、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见了，而这个人连他的敌人也不认为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了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遗嘱，并以人民自

己的名义宣布：“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⁸⁹

像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受了偷袭，那是不够的。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一个有 3 600 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偷袭而毫无抵抗地做了俘虏。

现在我们来把法国革命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到 1851 年 12 月所经过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期**，或**制宪国民议会时期**（从 1848 年 5 月 4 日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立宪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议会时期**（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到 1851 年 12 月 2 日）。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到 5 月 4 日，即从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议会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促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试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分子——**王朝反对派**⁹⁰、**共和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小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派**工人，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情况只能是这样。二月事变原先的目标是选举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统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

候，成立共和国似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记，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表露出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內容，这个内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教育水平上用现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经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的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满意足了。正因为如此，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势力同墨守成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国民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民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事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³⁶，就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国民中起反动作用的思潮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五月十五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

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空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以六月起义³⁸作了回答，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上最大的一次事变。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³¹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资产阶级共和国胜利以后，起义者被屠杀的有3 000多人，未经审判就被放逐的有15 000人。无产阶级从这次失败后，就退到革命舞台的后台去了。每当运动好像又进入高潮时，无产阶级就企图再向前推进，可是劲头越来越弱，成效也越来越小。每当无产阶级上面的某个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时，无产阶级就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受到的全部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力量分摊到全部社会的整个表面，也越来越弱了。无产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的领袖，相继被捕判罪，代替他们挂帅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放，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与无产阶级为敌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无产阶级至

少是带着进行过世界历史性的伟大斗争的光荣而失败的；不仅法国，并且整个欧洲都被六月的地震所惊动，而各个上层阶级后来的失败所付的代价却如此便宜，以致得胜的党派只有公然无耻地加以夸张，才可以把这些失败说成是事变。同时，失败的政党离开无产阶级政党越远，这些失败就越是可耻。

六月起义者的失败，固然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奠基和建立准备和扫清了基地，但同时它也表明，欧洲的问题并不是争论“共和国还是君主国”的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揭示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是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它表明，在那些阶级构成发达、具有现代生产条件、具有那种通过百年来的工作而使一切传统观念都融化于其中的精神意识的旧文明国家里，**共和国一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变革形式**，而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的保守形式，例如，像北美合众国那样；在那里，虽然已有阶级存在，但它们还没有固定下来，它们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更新自己的组成部分，并且彼此互换着自己的组成部分；在那里，现代的生产资料不仅不和经常的人口过剩现象同时发生，反而弥补了头脑和人手方面的相对缺乏；最后，在那里，应该占有新世界的物质生产的那种狂热而有活力的运动，没有给予人们时间或机会来结束旧的幽灵世界。

在六月的日子里，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⁹²**”这句话激励反革命十字军征讨。从这时起，许多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过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守住革命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

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集团范围缩小时，每当比较狭小的利益压倒比较广大的利益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资产阶级财政改革的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的要求，都同时被当作“侵害社会的行为”加以惩罚，被当作“社会主义”加以指责。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司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们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财产、家庭和秩序。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站在自己阳台上的资产者即秩序的狂信者开枪射击，亵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最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败类组成为**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就以“**社会教主**”的资格进入了土伊勒里宫^①。

^① 巴黎的一座皇宫。——编者注

二

现在让我们再接着谈下去。

六月事变以后的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和瓦解的历史，这个派别是以三色旗的共和党人、纯粹的共和党人、政治的共和党人、形式的共和党人等等称呼闻名的。

这个派别在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度下是官方的共和主义反对派，因而是当时政界中一个公认的构成部分。议院中有它的代表，在报界它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它在巴黎的机关报《国民报》，和《辩论日报》一样，算是受人尊敬的。它的性质和它在立宪君主制度下的这个地位也是相称的。它并不是一个因有某些重大的共同利益而紧密团结、因有特殊生产条件而独树一帜的资产阶级集团。它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资产者、作家、律师、军官和官吏组成的一个派系，这个派系之所以有影响，是由于全国对路易-菲力浦个人的反感，由于对旧的共和国的怀念，由于一群幻想家的共和主义信仰，而主要是由于法国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对于维也纳条约⁹³和对于同英国联盟的憎恶，这个派别是始终予以鼓励的。在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下，《国民报》的很大一部分拥护者都是因为它鼓吹这种隐蔽的帝制思想而获得的，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在共和国时期，这种帝制思想就能以路易·波拿巴为代表，作为一个置人于死地的竞争者来同《国民报》本身对立。《国民报》也和其余一切资产阶级反对派一

样，曾经对金融贵族作过斗争。反对预算案的论争在当时的法国是同反对金融贵族的斗争完全相吻合的，这个论争既然保证有可能博得非常便宜的声望，并吸取非常丰富的材料来写清教徒式的社论，因而不能不大受利用的。工业资产阶级感激《国民报》，是因为它奴颜婢膝地拥护法国的保护关税制度，而它维护这个制度又多半是出于民族的动机，而不是出于国民经济学的动机。整个资产阶级感激它，则是因为它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国民报》派是**纯粹的共和派**，就是说，它要求把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由君主国改为共和国，首先是要求保证自己能在这个统治中占优势。对于这一变革的条件，它的认识极其模糊。但有一点它看得十分清楚，而且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期的改革运动的宴会上，这一点已很明显地表露出来了，这就是它在民主派小资产者中间，特别是在革命无产阶级中间是不受欢迎的。这些纯粹的共和党人，真是名副其实的纯粹的共和党人，本来已经准备好在开始时满足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摄政⁹⁴，恰好这时爆发了二月革命，因而他们那些最有名的代表人物都在临时政府里获得了位置。他们当然是一开始就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并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临时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马上被排挤出国民议会开幕后成立的执行委员会⁹⁵；《国民报》派利用六月起义的爆发解散了执行委员会，从而清除了它的最切近的对手，即小资产阶级的或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赖德律-洛兰等人）。卡芬雅克，这个指挥了六月战斗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将军，获得了一种独裁的权力，代替了执行委员会。《国民报》的前任总编辑马拉斯特，成了制宪国民议会的常任议长；政府各部部长以及其他一切重要职位，都由纯粹的共和党人占据了。

这样，实际情况超过了早就自命为七月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资

产阶级共和派的理想。但是,这个派别取得统治权并不像它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是通过资产阶级举行反对国王的自由主义叛乱,而是由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举行了被霰弹镇压下去的起义。资产阶级共和派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怀里,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

资产阶级共和派独占的统治,只是从1848年6月24日起存在到12月10日止。这种统治的结果就是**拟定共和主义宪法和宣布巴黎戒严**。

新的**宪法**实质上不过是1830年宪章⁹⁶的共和主义化的版本。七月王朝的过高的选举资格限制,甚至把资产阶级的一大部分人也排挤在政治统治之外,这是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存在不相容的。二月革命立刻取消了这种选举资格限制而宣布了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资产阶级共和派不能把这一事件一笔勾销。他们只得补充了一个限制条款,规定选民必须是在选区居住6个月的。旧有的行政、市政、司法和军队等等组织,仍然原封不动;宪法上作了变更,而这种变更只涉及目录而没有涉及内容,只涉及名称而没有涉及事物。

1848年各种自由的必然总汇,人身、新闻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和宗教等自由,都穿上宪法制服而成为不可侵犯的了。这些自由中的每一种都被宣布为法国公民的**绝对权利**,然而总是加上一个附带条件,说明它只有在不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或“**法律**”限制时才是无限制的,而这些法律正是要使各种个人自由彼此之间以及同公共安全协调起来。例如:“公民有权成立团体,有权和平地、非武装地集会,有权进行请愿并且通过报刊或用其他任何方法发表意见。对于这些权利的享受,除受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限制

外,不受其他限制。”(法国宪法第2章第8条)“教育是自由的。教育的自由应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在国家的最高监督下享用之。”(同上,第9条)“每一公民的住所是不可侵犯的,除非按照法定手续办事。”(第1章第3条)如此等等。所以,宪法经常提到未来的**构成法**;这些构成法应当详细地解释这些附带条件并且调整这些无限制的自由权利的享用,使它们既不致互相抵触,也不致同公共安全相抵触。后来,这种构成法由秩序之友制定出来,所有这些自由都加以调整,结果,资产阶级可以不受其他阶级的同等权利的任何妨碍而享受这些自由。至于资产阶级完全禁止“他人”享受这些自由,或是允许“他人”在某些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警察的陷阱)下享受这些自由,那么这都是仅仅为了保证“公共安全”,也就是为了保证资产阶级的安全,宪法就是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两方面都有充分权利援引宪法:一方面是废除了所有这些自由的秩序之友,另一方面是要求恢复所有这些自由的民主党人。宪法的每一条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中**废除自由**。所以,当自由这个名字还备受尊重,而只是对它的真正实现设下了——当然是根据合法的理由——种种障碍时,不管这种自由在日常的现实中的存在怎样被彻底消灭,它在宪法上的存在仍然是完整无损、不可侵犯的。

然而,用这么巧妙的方法弄成不可侵犯的这个宪法,如同阿基里斯一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只是这个弱点不是在脚踵上,而是在头脑上,或者不如说,是在两个头脑(在这里宪法便消失了)上:一个是**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总统**。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问题,是要建立资产阶级

共和派的可靠地位。按照宪法第 45—70 条规定，国民议会可以用合乎宪法的办法排除总统，而总统要排除国民议会却只能用违背宪法的办法，即只有取消宪法本身。可见，这里宪法本身是在号召以暴力来消灭自己。宪法不仅像 1830 年的宪章那样尊崇分权制，而且把这种分权制扩大到矛盾重重的地步。基佐曾经把立法权和行政权在议会内的争吵称为**宪法的权力的赌博**，在 1848 年的宪法中，这种赌博一直是孤注一掷的。一方面是由普选产生并享有连选连任权的 750 名人民代表构成一个不受监督、不可解散、不可分割的国民议会，它拥有无限的立法权力，最终决定宣战、媾和及商约等问题，独揽大赦权，因自己不间断地召集会议而经常站在政治舞台最前面。另一方面是具有王权的一切特性的总统，他有权不经国民议会而任免自己的内阁阁员，他掌握行政权的一切手段，他可以分封一切官职，从而在法国操纵着至少有 150 万人的命运，因为有这么多的人在物质生活上依靠于 50 万各级官吏和各级军官。他统率一切武装力量。他享有赦免个别罪犯、解散国民自卫军以及——经国务会议同意——罢免由公民自己选出的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镇委员会的特权。同外国缔结条约时，它具有倡议和领导的作用。国民议会永远留在舞台上，是公众日常批评的对象，而总统却在极乐世界⁹⁷过着隐居的生活，不过他眼前和心里老是有宪法第 45 条在提醒他：“兄弟，要准备牺牲！⁹⁸”你的权力在你当选的第四年，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要完结了！那时你的荣华就要完蛋了，这出戏是不会再演的，如果你负有债务，你就及时用宪法规定给你的 60 万法郎的薪俸一律偿清，不然你就不免要在美丽的 5 月的第二个星期一进入克利希！^①这

① 1826—1827 年巴黎的债务监狱。——编者注

样，宪法就把实际权力授给了总统，而力求为国民议会保证精神上的权力。可是，不用说，法律条文不可能创造精神上的权力，宪法就在在这方面也是自己否定自己，因为它规定总统由所有的法国人直接投票选举。全法国的选票是分散在 750 个国民议会议员之间，可是在这里选票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每一单个人民代表不过是某个政党、某个城市、某个桥头堡的代表，甚至只是表示必须选出一个人来凑足 750 个人民代表，人们并不去特别注意事情本身和被选举者本人，可是总统是由全国人民所选出，选举总统是行使主权的人民每四年运用一次的王牌。民选的国民议会和国民只有形而上学的联系，而民选的总统却和国民发生个人联系。国民议会的确通过它的各个代表反映着国民精神的多种多样的方面，而总统却是国民精神的化身。和国民议会不同，总统是一种神权的体现者，他是人民恩赐的统治者。

海洋女神西蒂斯曾经预言阿基里斯要在盛年夭折。像阿基里斯一样有个致命弱点的宪法，也像阿基里斯一样预感到它命该早死。根本用不着西蒂斯离开海洋向制宪的纯粹的共和派泄露这个秘密，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傲慢自负以及他们自己的不孚众望，也就与日俱增。他们力图用立宪的狡猾手腕，用宪法第 111 条来躲过厄运，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修改宪法的提案都必须经过每次相距一个月的三次讨论，至少必须由 $\frac{3}{4}$ 的票数通过，而且参加表决的至少必须有 500 个国民议会议员。可是这只是为了在他们将来成为议会少数派时（他们现在已经预感到这一点）保持自己势力的一种无力的尝试，这种势力现在当他们还在议会中占多数并且握有一切政府权力手段时，就已经一天天地从他们的软弱的手中滑出

去了。

最后，在一个特别滑稽的条文中，宪法把自己托付给“全体法国人民和每一个法国人的警惕性和爱国心”，而在前面的另一条文中，它已经把有“警惕性”和“爱国心”的法国人托付给它专门发明出来的最高法院（“haute cour”）所实行的温柔的刑事监护了。

1848年的宪法就是这样。它在1851年12月2日不是被人头撞倒，而只是由于触摸一顶帽子而倾倒，诚然，这顶帽子是三角拿破仑帽。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国民议会内忙于构思、讨论和表决这个宪法时，卡芬雅克却在国民议会外把巴黎控制在戒严状态中。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如果说后来宪法被刺刀葬送了，那么不要忘记，在它还在母胎中时，刺刀，而且是对准人民的刺刀就保护过它，而且它是在刺刀帮助下出世的。“正直的共和派”的祖先们曾经拿着他们的象征即三色旗走遍了全欧洲。正直的共和派自己也作出了一项发明，这项发明自己给自己开拓了通向整个大陆的道路，但是它又怀着永不熄灭的爱回到法国，直到它终于在法国的半数的省里取得公民权为止。这项发明就是戒严。这是一项卓越的发明，每当法国革命进程处于危机关头，它就要被周期地加以运用。但是，既然兵营和露营是这样周期地重重压在法国社会头上，以便压制这个社会的意识并制服这个社会；既然马刀和毛瑟枪周期地受命进行审判和管理，进行监护和检查，执行警察和更夫职务；既然胡子和军服周期地被宣布为社会的最高智慧和指导者，那么兵营和露营、马刀和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又怎么能不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说：最好是宣布自己的制度是最高等的制度，并使资产阶级社会根本不必关心自治问题，从而一劳永逸地拯救社会！兵营和露营、马刀和

毛瑟枪、胡子和军服必然要产生这种想法,尤其是因为它们在这种场合下可以希望自己所建树的更高的功劳得到更多的现金报酬,而当它们按某一派资产阶级的命令实行周期戒严和暂时拯救社会的时候,它们除了几个人的死伤和资产者的一些假笑之外,是很少获得实际利益的。为什么军方不可以终于搞出一次对它自己有利益有好处的戒严,同时把资产者的交易所也围攻一下呢?而且还不应忘记(我们顺便提一提),贝尔纳上校,即在卡芬雅克时期未经审判就把15 000名起义者放逐的那位军事委员会主席,现在又是巴黎各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了。

如果说正直的、纯粹的共和派宣布巴黎戒严,从而创设了后来1851年12月2日的近卫军⁹⁹所赖以成长的苗床,那么同时属于他们的还有另一种功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他们还点燃民族情感,而现在,当他们掌握了全国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却向国外列强跪拜,不去解放意大利,反而让奥地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再一次来奴役意大利¹⁰⁰。路易·波拿巴在1848年12月10日当选为总统,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独裁和制宪议会。

宪法第44条说:“曾经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不能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不只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不只当过英国特别警察⁷⁴,而且是一个已经归化了的瑞士人¹⁰¹。

关于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我在另一个地方已经详细谈过^①,这里就不再谈了。这里只须指出,12月10日的选举是曾经不得不支

① 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篇(1848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编者注

付了二月革命的费用**的农民反对国内其他各个阶级的表现，是农村反对城市的表现**。这次选举得到军队方面的巨大同情，因为军队从《国民报》派的共和党人那里既没有取得荣誉，也没有领到附加军饷；这次选举还受到大资产阶级方面的巨大同情，大资产阶级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恢复君主制度的一个跳板；选举也受到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巨大同情，他们欢迎波拿巴是把他作为对卡芬雅克的一种惩罚。下边我还要更详细地谈谈农民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以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可是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是保皇派，其中一部分，即大土地所有者，曾经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正统派；另一部分，即金融贵族和大工业家，曾经在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是奥尔良派。军队、大学、教会、律师界、学院和报界的显要人物，都分属于上述两派，虽然所占比例各不相同。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作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作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六月起义³⁸已经把他们联合成“秩序党”，现在首先应该把还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席位的一帮资产阶级共和派排斥出去。这些纯粹的共和派曾经极其残暴地滥用武力对付人民，而现在，当需要捍卫他们自己的共和主义和自己的立法权以对抗行政权和保皇党人时，他们却极其怯懦地、畏缩地、沮丧地、软弱无力地放弃了斗争。我用不着在这里叙述他们解体的可耻历史。他们不是灭亡了，而是无形消失了。他们已经最终演完了自己的角色。在往后的时期中，不论在议会内或议会外，他

们都仅仅表现为对过去的回忆，只要涉及到共和国的名称，只要革命冲突有下降到最低水平的危险，这些回忆便又复活起来。顺便指出，把自己的名称交给这个派别的《国民报》，在后来一个时期就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去了。^①

在结束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应该回顾一下两种力量，这两种力量从1848年12月20日起到制宪议会结束时止是并居在一起的，而在1851年12月2日那天，其中的一种力量消灭了另一种力量。我们所指的一方是路易·波拿巴，另一方是联合的保皇党，即秩序党，大资产阶级的党。波拿巴就任总统后立即组织了以奥迪隆·巴罗为首（请注意，是以议会资产阶级的最自由主义的一派的老领袖为首）的秩序党内阁。巴罗先生终于获得了1830年以来他朝思暮想的内阁职位，并且是内阁总理的职位。然而这个位置并不是像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所幻想的那样以议会反对派的最先进领袖的身份得到的，而是以他的一切死敌即耶稣会和正统派的同盟者的身份得到的，而且他的任务是把议会送进坟墓。他终于把新娘迎来举行婚礼，然而只是在新娘失身以后才迎来的。波拿巴本人好像是完全退隐了，代他行动的是秩序党。

在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就决定派出远征军去罗马，并且商定要瞞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之后还有如下一段话：“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创立或奠定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1845年5月4日—6月24日，在二月事变中联合起来的所有阶级和附属阶级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反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败涂地；1848年6月25日—1848年12月10日，资产阶级共和派当政，制定宪法，巴黎戒严，卡芬雅克专政；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底，波拿巴和秩序党反对共和派制宪议会，共和派制宪议会失败，资产阶级共和派覆灭。”——编者注

着国民议会来安排这件事，而经费却要假造口实向国民议会索取。这样，内阁就开始以欺骗国民议会和暗中勾结外国专制势力的办法来对付革命的罗马共和国了。波拿巴也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手段准备了反对保皇党立法议会及其立宪共和国的十二月二日政变。不要忘记，在1848年12月20日组成波拿巴内阁的那个政党，又是1851年12月2日的立法国民议会中的多数。

8月间制宪议会曾经决定，在制定并公布一套补充宪法的构成法以前，它不解散。1849年1月6日，秩序党通过议员拉托建议议会不要去搞什么构成法，最好是通过一项关于**解散自己**的决议。这时，不仅是以奥迪隆·巴罗先生为首的内阁，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全体保皇党议员，都以命令口吻对国民议会说：为了恢复信用，为了巩固秩序，为了终止不确定的暂时状态而建立完全确定的状态，必须解散国民议会；议会妨碍新政府进行有效的工作，它只是由于执迷不悟才企图延长自己的生命；它已经使全国感到厌恶了。波拿巴把这一切攻击立法权的说法都记在心里，背得烂熟，并在1851年12月2日向议会保皇派证明，他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得了一些东西。他把他们自己的口号拿来反对他们。

巴罗内阁和秩序党往前更进了一步。他们在全法国掀起了**向国民议会请愿的运动**，客客气气地请求国民议会隐退。这样，他们就把无组织的人民群众引入反对国民议会、反对依照宪法组织起来的民意表现的斗争。他们教会波拿巴从诉诸议会转而诉诸人民。1849年1月29日那天，制宪议会终于不得不解决关于自行解散的问题了。这一天，军队占据了国民议会举行会议的场所；总揽国民自卫军和正规军指挥大权的秩序党将军尚加尔涅，就像是处于临战状态那样在巴黎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而联合起来的保皇党人威胁制宪议会说，

如果它不表示顺从,就将使用暴力。国民议会果然表示愿意顺从,但商定再苟延一个短短的时期。1月29日不就是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吗?不过这次是由保皇党人协同波拿巴反对共和派国民议会罢了。保皇党老爷们没有看到或是不愿意看到,波拿巴利用1849年1月29日事变,为的是让一部分军队在土伊勒里宫前受他检阅;他贪婪地抓住这个公然诉诸武力来反对议会权力的初次尝试,为的是提醒大家想起卡利古拉¹⁰²。他们当然只看见了他们的尚加尔涅。

特别推动秩序党使用暴力去缩短制宪议会生命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些补充宪法的构成法——教育法、宗教法等等。联合的保皇党人认为极其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制定这些法律,而不是让那些疑虑重重的共和党人去制定。可是,在这些构成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共和国总统的责任的法律。1851年立法议会正从事于制定这个法律,波拿巴就以12月2日的打击防止了这一打击。联合的保皇党人在1851年冬季议会战役时期,是多么希望有一个现成的总统责任法,并且是由疑虑重重的、敌对的共和派议会制成的总统责任法啊!

在制宪议会于1849年1月29日自己毁坏了自己的最后的武器以后,巴罗内阁和秩序之友便将它置于死地。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贬低它,强迫这个软弱无力的和对自己绝望的议会通过一些使它失去最后一点社会尊敬的法律。波拿巴沉溺于自己的固定的拿破仑观念^①,竟肆无忌惮地公开利用对议会势力的这种贬低。例如,当国民议会1849年5月8日因乌迪诺将军占领奇维塔韦基亚而通过谴责内阁议案,并命令罗马远征军回到它所谓的目标时,当天晚上波拿巴就在《通报》上发表了致乌迪诺的一封信,祝贺这位将军建树了英雄

① 暗指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写的《拿破仑观念》一书。——编者注

的功绩，并且和那些卖弄笔墨的议员相反，假装成宽大为怀的军队的庇护者。保皇党人对此加以讥笑。他们认为他不过是个笨蛋。最后，当制宪议会议长马拉斯特偶尔怀疑到国民议会的安全，根据宪法责令一个上校率领所部开来保护国民议会时，那个上校却以军纪为借口拒绝调动，并建议马拉斯特去跟尚加尔涅交涉，但尚加尔涅也拒绝了马拉斯特的要求，并且刻毒地说，他不喜欢能思想的刺刀。1851年11月，联合的保皇党人在准备同波拿巴开始作决定性的斗争时，曾经企图在他们的声名狼藉的议会总务官法案¹⁰³中规定国民议会议长能直接调动军队的原则。他们的一位将军勒夫洛签署了这个法案。但是，尚加尔涅白白地投票赞成这一法案，梯也尔也白白地赞扬了已故制宪议会的有远见的智慧。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像尚加尔涅回答马拉斯特一样回答了他，而且博得了山岳党的鼓掌！

当秩序党还只是内阁而不是国民议会的时候，它就这样玷污了议会制度。而当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把议会制度逐出法国的时候，它就叫喊起来了！

我们祝议会制度一路平安！

三

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①。

在第一次法国革命中,立宪派统治以后是吉伦特派的统治;吉伦特派统治以后是雅各宾派的统治。这些党派中的每一个党派,都是以更先进的党派为依靠。每当某一个党派把革命推进得很远,以致它既不能跟上,更不能领导的时候,这个党派就要被站在它后面的更勇敢的同盟者推开并且送上断头台。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

1848年革命的情形却相反。当时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属物。后者背叛了它,并使它在4月16日、5月15日和6月的日子里遭受了失败。民主派又全靠资产阶级共和派双肩的支持。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立法国民议会于1849年5月28日开会,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这一时期是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849年5月28日—1849年6月13日,民主派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或民主主义政党的失败;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资产阶级,即联合的奥尔良派和正统派或秩序党的议会专政,这个专政是在废除普选权之后实行的;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和波拿巴的斗争,推翻资产者的统治,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覆灭。”——编者注

资产阶级共和派刚刚感到自己站稳脚跟，就把这个麻烦的伙伴抛弃，自己又去依靠秩序党双肩的支持。但秩序党耸了耸肩膀，抛开资产阶级共和派，自己赶忙站到武装力量的双肩上去；它还一直以为它是坐在武装力量的肩膀上，却忽然有一天发现肩膀已经变成了刺刀。每个党派都向后踢那挤着它向前的党派，并向前伏在挤着它后退的党派身上。无怪乎它们在这种可笑的姿势中失去平衡，并且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鬼脸，奇怪地跳几下，就倒下去了。革命就这样沿着下降的路线行进。二月革命的最后街垒还没有拆除，第一个革命政权还没有建立，革命就已经这样开起倒车来了。

我们所谈的这个时期，各种尖锐的矛盾极其错综复杂：立宪派公然图谋反对宪法，革命派公开承认自己拥护立宪；国民议会想左右一切，却总是按议会方式进行活动；山岳党以忍耐为天职，并以预言未来的胜利来补偿现在的失败；保皇派扮演着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的角色，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在国外支持他们所依附的互相敌对的王朝，而在法国内部却支持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行政权把自己的软弱当作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招来的轻蔑看作自己的威信；共和国不过是两个王朝——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卑鄙方面在帝国的招牌下的结合；联盟的首要条件是分离；斗争的首要准则是不分胜负；放肆的无谓的煽动，是为了安宁；最隆重地宣扬安宁，是为了革命；有热情而无真理；有真理而无热情；有英雄而无功绩；有历史而无事变；发展的唯一动力仿佛是日历，它由于同一的紧张和松弛状态的不断反复而使人倦怠；对立形势周期地达到高度尖锐化，好像只是为了钝化和缓和，但始终不能得到解决；一方面是装腔作势的努力和害怕世界灭亡的市侩恐怖心理，另一方面却是救世主们玩弄极其卑微的倾轧手段和演出宫廷闹剧，他们这种无忧无虑的做法使人想起的不是末日

的审判，而是弗伦特运动¹⁰⁴时期的情景；法国的全部官方天才，由于一个人的狡猾的愚钝而破灭；国民的共同意志每次经过普选权来表现时，都试图在群众利益的顽固的敌人身上得到适当的表现，一直到最后它在一个海盗的固执的意志上得到了表现。如果历史上曾经有一页是被涂抹得一片灰暗的话，那就正是这一页。人物和事变仿佛是些颠倒的施莱米尔——没有肉体的影子。革命自己麻痹自己的体现者，而把热情的强力完全赋予自己的敌人。如果说，反革命派不停地召唤来的“赤色幽灵”¹⁰⁵终于出现，那么它出现时就不是戴着无政府主义的弗利基亚帽¹⁰⁶，而是穿着秩序的制服、红色的军裤。

我们已经看到，波拿巴在1848年12月20日他自己的升天节这一天所组成的内阁，是秩序党的内阁，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联合内阁。这个或多或少用强力缩短了共和派制宪议会寿命的巴罗—法卢内阁，直到制宪议会死后还在执掌政权。联合保皇党人的将军尚加尔涅继续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最后，普选保证秩序党在国民议会中取得极大多数的席位。在国民议会中，路易-菲力浦的众议院议员和贵族院议员，已同一群神圣的正统主义者汇合起来了，对于这些正统主义者说来，国民的大量的选票变成了政治舞台的入场券。波拿巴派的议员人数太少，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议会党。他们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可怜的附属物。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而且这个党在精神上是靠着把它的统治炫示为民意表现的普选、靠着反革命势力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同时获得的胜利而加强起来的。

从来还没有一个党派拥有这样强有力的手段和在这样良好的征兆下开始斗争。

罹难的纯粹的共和派在立法国民议会中只剩下一个以非洲的将

军卡芬雅克、拉莫里西埃和贝多为首的、大约 50 人组成的集团。大的反对党是山岳党⁷³——这是社会民主派给自己取的议会名称。在国民议会 750 个席位中，它占有 200 多个，所以它至少是和秩序党三个派别中任何一个派别同等强大。它和整个保皇派联盟相比之下所占的相对少数地位，好像是由于特殊情况而趋于平衡了。不仅各省的选举表明山岳党在农村居民中获得很多拥护者，而且差不多全体巴黎议员都是属于山岳党的；军队以选出三个下级军官来表明它的民主主义信念，而山岳党的首领赖德律-洛兰与秩序党的一切代表不同，是由于五个省的选票集中到他身上而升为议会贵族。这样，在 1849 年 5 月 28 日，山岳党在保皇党内部以及在整个秩序党和波拿巴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看来有获胜的一切条件。可是，两星期以后，它竟失掉了一切，包括声誉在内。

在我们继续叙述议会的历史以前，为了避免在估计我们所考察的这个时代的总的性质时通常易犯的错误，需要作几点说明。在民主派看来，无论在制宪国民议会时期或在立法国民议会时期，问题都不过是在于共和党和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他们把运动本身概括为一个词儿：“反动”——黑夜，这时所有的猫都是灰的，而他们也可以滔滔不绝地倾泻出他们的更夫的老生常谈。当然，初看起来，秩序党好像是各种保皇派集团的结合体，这些集团不仅互相倾轧，以便把自己的王位追求者捧上王位，把对方的王位追求者排挤掉，而且它们一致对“共和国”表示仇恨，一致对“共和国”进行斗争。和这些保皇派的阴谋家相反，山岳党好像是“共和国”的代表。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反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山岳党”同样毫不停息地忙于抵抗这种攻击，以

此来保护“永恒的人权”，就像近 150 年以来每个所谓的人民党派所多多少少做过的那样。可是，只要更仔细地分析一下情况和各个党派，这种遮蔽着阶级斗争和这个时期特有面貌的假象就消失了。

我们已经说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是秩序党中的两个大集团。什么东西使这两个集团依附于它们的王位追求者并使它们互相分离呢？难道只是百合花^①和三色旗，波旁王室和奥尔良王室，各种色彩的保皇主义？难道真是它们的保皇主义信仰？在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连同它的僧侣和仆从；在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即资本和它的随从者——律师、教授和健谈家。正统王朝不过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七月王朝则不过是资产阶级暴发户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的物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占有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如果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这两个集团中每一个集团，都硬要自己和别人相信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它们对两个不同王朝的忠诚，那么后来的事实所证明的却刚刚相反，正是它们利

① 波旁王朝的徽号。——编者注

益的对立才使得这两个王朝不能结合为一。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词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么这只是表明,资产阶级分裂成的两大集团(地产和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我们谈论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是因为大地产虽然还摆着封建主义的资格,抱着高贵门第的高傲态度,但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下已经完全资产阶级化了。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曾长期认为,他们是热中于王权、教会和旧日英国制度的美好之处,直到危急的关头才被迫承认,他们仅仅是热中于地租。

联合的保皇党人在报刊上,在埃姆斯¹⁰⁷,在克莱尔蒙特¹⁰⁸,在议会之外,总是互相倾轧。在幕后,他们又穿起他们旧时的奥尔良派的和正统派的制服,进行他们的旧时的比武。但是在公开的舞台上,在大型政治历史剧演出时,在扮演一个议会大党的角色时,他们对自己的可敬的王朝只是敬而远之,无止境地推迟君主制的复辟。他们在从事自己的真正事业时是以秩序党的姿态出现,即凭着社会的资格,而不是凭着政治的资格;是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秩序的代表者,而不是作为出游公主的护卫骑士;是作为和其他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作为和共和党人相对立的保皇党人。作为秩序党,他们也比先前任何时候,比复辟时期或七月王朝时期,享有更加无限和更加稳固地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

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如果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以秩序党身份痛骂共和制，并不掩盖他们对共和制的憎恶，那么这就不仅是由于保皇主义的回忆了。本能告诉他们，共和制虽然完成了他们的政治统治，同时却破坏着这一统治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现在必须面对各个被奴役的阶级并且直接和它们斗争，没有人调解，没有王冠作掩护，也不能用相互之间以及和王权之间的次要斗争来转移全国的视线了。由于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他们才不得不在他们阶级统治的完备的条件面前退缩下来，力图返回到那些不大完备、不大发达、因而危险也较少的阶级统治的形式上去。相反地，每当联合的保皇党人和敌视他们的王位追求者即波拿巴发生冲突时，每当他们担心行政权危害他们的议会的万能权力时，每当他们因此必须亮出自己统治的政治资格时，他们就不是以保皇党人的身份出面，而是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出面，从奥尔良派的梯也尔起直到正统派的贝里耶止都是如此：前者曾向国民议会担保说，关于共和国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最少分歧；后者缠着三色绶带，以护民官的姿态，在1851年12月2日代表共和国向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前面的人民群众发表演说。的确，有一阵讥笑的回声响应着他：亨利五世！亨利五世！

与联合的资产阶级相对抗的，是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联合，即所谓社会民主派。1848年六月事变³⁸以后，小资产者发觉自己受到了亏待，它的物质利益受到威胁，而那些应当保证它有可能捍卫这种利益的民主保障，也受到了反革命的危害。因此，它就和工人接近起来。另一方面，它在议会中的代表，即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时期被排挤到后台去的山岳党，在制宪议会存在的后半期中，因为同波拿巴及保皇派阁员们进行了斗争，又重新获得了已失去的声望。山岳党和社会主义的领袖们结成了同盟。1849年2月举行了和解宴会，制定了共同

纲领,设立了共同的选举委员会,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无产阶级的社会要求已被磨掉革命的锋芒,从而发生了民主主义的转折,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则丢掉了纯政治的形式而显露出社会主义的锋芒。这样就产生了**社会民主派**。由这种联合产生出来的新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除了几个工人阶级出身的配角和几个社会主义的宗派分子,还是和旧山岳党所包含的成员一样,不过是人数多点罢了。但是,逐渐地它就随着它所代表的那个阶级一同变化了。社会民主派的特殊性质表现在,它要求把民主共和制度作为手段并不是为了消灭两极——资本和雇佣劳动,而是为了缓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抗并使之变得协调起来。无论它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然而也不应该狭隘地认为,似乎小资产阶级原则上只是力求实现其自私的阶级利益。相反,它相信,保证它自身获得解放的那些特殊条件,同时也就是唯一能使现代社会得到挽救并使阶级斗争消除的一般条件。同样,也不应该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代表**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山岳党为了共和国和所谓的人权不断同秩序党作斗争时,共和国或人权并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正

像一支将被缴械的军队进行反抗和投入战斗并不只是为了保留自己的武器一样。

国民议会刚一开幕，秩序党就向山岳党挑战。资产阶级这时已感到必须制服民主派小资产者，正如他们在一年以前感到必须整垮革命无产阶级一样。不过这次敌方的情况已是另一个样子了。无产阶级党的力量是在街上，小资产者的力量却在国民议会中。因此必须趁时间和形势还没有把这种力量巩固起来的时候，就把它从国民议会引诱到街上，使它自己摧毁它在议会中的力量。山岳党便纵马飞奔到陷阱中去了。

把山岳党引入陷阱的诱饵是法军炮轰罗马。这次炮轰违反了宪法第 V 条，因为该条禁止法兰西共和国使用自己的兵力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此外，宪法第 54 条还禁止行政权不经国民议会同意宣布战争，而制宪议会在 5 月 8 日的决议中曾指责远征罗马的举动。赖德律-洛兰以此为根据在 1849 年 6 月 11 日对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提出弹劾案。赖德律-洛兰被梯也尔的刻毒的讥刺激怒，威胁说将用一切手段，甚至将使用武力来保卫宪法。山岳党全体一致起立，重申这个使用武力的号召。6 月 12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弹劾案，于是山岳党就退出了议会。六月十三日事变¹⁰⁹大家都知道：一部分山岳党人发表宣言，宣布波拿巴和他的部长们“不受宪法保护”；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徒手举行示威游行，遇到尚加尔涅的军队就逃散了，如此等等。一部分山岳党人逃到国外，另一部分被交付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余下的山岳党人按照议会规则¹¹⁰受到国民议会议长的琐碎的监管。巴黎重又宣布戒严，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民主派部分被解散了。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在巴黎的力量就这样被消灭了。

里昂——在那里六月十三日事变成了工人流血起义的信

号¹¹¹——也和邻近的5个省同时宣布了戒严。戒严状态一直继续到现在。

山岳党大多数背弃了自己的先锋队，拒绝在它的宣言上签名。报刊也临阵脱逃了，只有两家报纸^①敢于登载这个宣言。小资产者背叛了自己的代表，国民自卫军没有露面，即使在某处露了面，也只是阻挠构筑街垒。代表们欺骗了小资产者，军队中的所谓同盟者根本没有露过面。最后，民主派不但没有从无产阶级中去汲取力量，反而把自己的懦弱传染给无产阶级，并且正如民主党人一切伟大行动中常有的情形那样，领袖们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人民”背叛了他们，人民为了安慰自己，可以责备他们的领袖欺骗了他们。

很少看到什么事情比山岳党当前的进军喧嚷得更厉害；很少看到谈论什么事情像现在吹嘘民主派必然胜利这样自信、这样迫不及待。显然，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¹¹²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城墙面前时，他们就力图重复这个奇迹。如果山岳党真想在议会中获得胜利，它就不应该号召使用武力。如果它在议会中号召使用武力，它就不应该在街头上采取议会式的行动。如果它认真考虑过和平示威，那么它没有预先看到示威将受到武力的干涉，就很愚蠢了。如果它想过实际的战斗，那么放下战斗所必需的武器，就是件怪事了。可是问题在于，小资产者和他们的民主派代表人物提出革命威胁，不过是企图吓唬一下敌人罢了。当他们错误地走入死胡同时，当他们丢尽了面子，以致不得不把他们的威胁付诸实行时，他们就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尽力避免采取可能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急于寻找失败的口实。一旦必须实地战斗时，宣战的震耳

① 《改革报》和《和平民主日报》。——编者注

欲聳的前奏曲就变成怯懦的唠叨；演员不再认真表演了，戏也就停止了，像吹胀了的气球一样，针一刺就破了。

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夸大自己的力量，也没有一个党派像民主党这样轻率地错误估计局势。当一部分军队投票赞成山岳党的时候，山岳党就认为，军队会举行起义来拥护它。而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根据这样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在军队看来只有一个意思，即革命家站在罗马士兵方面反对法国士兵。另一方面，人们对1848年的六月事变还记忆犹新，以致无产阶级对国民自卫军深恶痛绝，秘密团体的领袖们对民主派的领袖们表示很不信任。要消除这些矛盾，必须有受到威胁的重大的共同利益出现。宪法某一抽象条文遭破坏，并不能激起这种利益。如民主党人自己所说，难道宪法不是已经被人破坏了许多次吗？难道最大众化的报纸不是已经责骂宪法是反革命的拙劣作品吗？但是，民主党人代表小资产阶级，即体现两个阶级的利益互相削弱的那个**过渡阶级**，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是站在阶级对抗之上。民主党人认为，和他们对立的是一个特权阶级，但他们和全国所有其他阶层一起构成了**人民**。他们所维护的是**人民的权利**；他们所关心的是**人民的利益**。因此，他们没有必要在临近斗争时考察各个不同阶级的利益和状况。他们不必过分仔细地估量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只要发出一个信号，**人民**就会用它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冲向压迫者。可是，如果事实表明民主党人的利益并不使人关心，他们的力量是软弱无力的，那么这就应该归罪于危险的诡辩家，他们把**统一的人民**分成了各个敌对的阵营，或者是由于军队太野蛮，太没有理智，不能把民主党人的纯正目的当作自己的至宝，再不然就是由于执行中的某种细节使全局都遭失败，最后，或者是由于某种意外的偶然事件，事情没有成功。不管怎样，民主党人逃出最可耻的失败时总是洁白无瑕

的，正像他们进入这种失败时是纯洁无辜的一样；他们摆脱失败时信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以为他们一定会胜利，以为不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党应该放弃旧的观点，相反地，是形势应该来适应他们的旧观点。

因此，不应当以为人数大大削减、备受挫折并被新的议会规则所侮辱的山岳党是太不幸运了。虽然六月十三日事变排挤了它的领袖，但是这一天又给第二流的能者腾出了位置，这个新地位使得他们得意忘形。虽然他们在议会中软弱无力的情况已经无可怀疑，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有权把他们的行动局限于道义上的愤怒和虚张声势的言论了。虽然秩序党把他们这些最后正式代表革命的人物看作无政府状态一切可怕现象的体现者，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已经能够表现得更平庸、更温和了。关于6月13日的失败，他们意味深长地安慰自己说，只要谁敢动一动普选权，只要敢动一下，我们就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走着瞧吧！

至于那些逃到国外的山岳党人，那么这里只须指出：赖德律-洛兰在不到两星期的时间内就把他所领导的强大的党无可挽回地断送了，在这以后，他竟觉得自己负有使命组织一个有名无实的法国政府；他这个远离行动舞台的人物，似乎将随着革命水平的下降，随着官方法国的官方大人物变得愈益矮小而愈益高大起来；在1852年，他能以共和派竞选人的资格出面；他不断向瓦拉几亚人和其他民族发出通告，威胁说要以他自己和他的同盟者的壮举来对付大陆上的专制暴君。蒲鲁东曾向这班老爷们说过：“你们就是会吹牛皮！”这样说难道没有一点道理吗？

6月13日¹⁰⁹，秩序党不仅击溃了山岳党的势力，同时还执行了**宪法应服从国民议会多数的决议的原则**。它对共和国的理解是：在共和国里，资产阶级通过议会形式实现统治，它不像在君主国里那样既

要受行政权的否决权的限制，又要受行政权解散议会的权力的限制。根据梯也尔所下的定义，议会制共和国就是这样。可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在6月13日保证自己在议会大厦内取得了无限的权力，那么它把议会中最孚众望的议员排除出去，岂不是严重地削弱了议会对付行政权和人民的力量，因而使议会本身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吗？它既然毫不客气地把许多议员交付法庭审判，也就是废弃了它本身的议会不可侵犯性。它迫使山岳党议员遵守的那个屈辱性的规则，大大提高了共和国总统的地位，因而也就大大贬低了每一个人民代表。它指责为保护立宪制宪法而举行的起义是图谋颠覆社会的无政府行动，也就是自己剥夺了自己在遭受行政权违反宪法的侵犯时诉诸起义的机会。历史真能捉弄人！1851年12月2日，秩序党痛哭流涕、但徒劳无益地向人民推荐了一位抵御波拿巴而保护宪法的将军乌迪诺，这位将军曾按照波拿巴的命令炮轰了罗马，因而成为6月13日护宪骚动的直接原因。6月13日的另一个英雄维埃伊拉，曾经率领一帮属于金融贵族的国民自卫军在民主派报社内胡作非为，因而受到来自国民议会讲坛的称赞；这个维埃伊拉竟参与了波拿巴的阴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国民议会在生死关头失掉了国民自卫军方面的任何援助。

6月13日的事变还有另一种意思。山岳党曾力求把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所以，山岳党的失败也就是波拿巴的直接胜利，也就是波拿巴个人对他那些民主派敌人的胜利。秩序党赢得了这个胜利，而波拿巴只要把这次胜利写在自己的帐簿上就行了。他这样做了。6月14日，巴黎各处墙壁上张贴了一个布告，据布告所说，总统好像并没有参与这一切，好像他也并不愿意，只是为事变所迫才离开他的僧院式的隐居生活，他以被人误会的善人口吻抱怨敌人对他的诽谤，他仿佛

把他个人和秩序的事业等同起来，实际上却是把秩序的事业和他个人等同起来。此外，虽然国民议会后来批准了对罗马的征讨，但这次征讨是由波拿巴发起的。波拿巴恢复了最高祭司撒母耳在梵蒂冈的权力以后，便可以指望以大卫王的姿态进入土伊勒里宫了¹¹³。他已把僧侣拉到自己方面来了。

我们已经说过，6月13日的骚动只不过是一次和平的街头游行。所以，对付这次游行，是谈不上什么军事勋业的。然而，在这个很少有英雄人物和事变的时期，秩序党却把这个不流血的战斗变成了第二个奥斯特利茨¹¹⁴。讲坛和报纸都称赞军队，说它是秩序用来对抗那些反映无政府状态的软弱无力的人民群众的一种力量，而尚加尔涅则被称颂为“社会中坚”——这个骗局，最后连他自己也信以为真了。这时，那些仿佛怀有二心的军队，都被悄悄地调出了巴黎；那些在选举中表露出浓厚的民主倾向的团队，都从法国调往阿尔及尔去了；士兵中不安分的分子，都被送入了惩罚队；最后，报刊渐渐和兵营完全隔绝，而兵营渐渐和市民社会完全隔绝了。

在这里我们已经谈到了法国国民自卫军历史上的决定性的转折点。1830年，国民自卫军决定了复辟的垮台。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如果国民自卫军站在军队一边，每次暴动都要遭到失败。当国民自卫军在1848年的二月事变中对镇压起义采取消极的态度，而对路易-菲力浦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时，路易-菲力浦就认为自己一定要完蛋，而事情果然也就是这样。于是就确立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没有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胜利，而军队如果反对国民自卫军便不能获胜。这是军队对市民万能的一种迷信。在1848年六月事变中，当全部国民自卫军协同正规军镇压了起义的时候，这种迷信更加牢固了。从波拿巴就任总统时起，由于违反宪法地把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和正规军第一

师的指挥权统一在尚加尔涅一人身上，国民自卫军的地位才稍稍降低了一些。

国民自卫军的指挥权在这里好像成了最高军事统帅的一种属性，同样，国民自卫军本身也好像只是正规军的附属物。最后，在6月13日国民自卫军已经被粉碎，这不仅是由于从这一天起它在法国全国各地都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被解散，直到它只剩了一些碎屑为止。6月13日的示威游行首先是国民自卫军中民主派的示威游行。固然，他们用来和军队对抗的，不是自己的武器，而只是自己的军装；可是，护身符就在于这个军装。军队知道，这种军装不过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料。魔法消失了。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1849年6月13日，资产阶级在军队的帮助下驱散了小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1851年12月2日，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也已经不存在了，当波拿巴后来签署解散国民自卫军的法令时，他只是确认了既成的事实。资产阶级就这样自己毁坏了自己对抗军队的最后一个武器，但是自从小资产阶级已不像一个忠顺的臣仆支持它而像一个反叛者反对它的时候，它就已经应该毁坏这个武器了。一般说来，资产阶级一当自己成为专制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用来对付专制制度的一切防御手段尽行毁坏。

这时候，秩序党却在庆祝政权重新回到它手里（1848年它失掉了这个政权，好像只是为了1849年它摆脱一切羁绊的时候重新把它收回来），它对共和国和宪法横加侮辱，咒骂未来、现在和过去的一切革命，甚至连它自己的领袖所完成的革命都包括在内，最后还颁布了箝制报刊言论、消灭结社自由和把戒严状态规定为正常制度的法律。接着，国民议会从8月中旬到10月中旬停止了开会，任命了休会期

间的常任委员会。在休会期间，正统派在埃姆斯进行阴谋活动，奥尔良派在克莱尔蒙特进行阴谋活动，波拿巴借皇帝式的巡游来进行阴谋活动，而各省议会则在为修改宪法召开的会议上施展阴谋，这是国民议会定期休会时期照例发生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只有在它们具有事变的性质时，我才较为详细地予以论述。不过这里还应该指出，国民议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退出舞台，只留下路易·波拿巴这一个——虽然是一个可怜的——人物在众目共睹之下占据共和国首脑的地位，国民议会的这种举动是失策的，而这时秩序党却分解为各个保皇派构成部分，发泄其彼此敌对的复辟欲望，使公众为之哗然。每当这种休会期间议会的喧闹声趋于沉寂而议会的身体消融到国民里去的时候，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个共和国为要显出自己的真面目来，只缺少一件东西——使议会的休会继续不断，并把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这句格言代以毫不含糊的“步兵，骑兵，炮兵！”

四

1849年10月中，国民议会复会。11月1日，波拿巴送给议会一个咨文^①，说巴罗—法卢内阁已经免职，新内阁已经组成，这使议会大为震惊。就是驱逐一个仆人也不会像波拿巴驱逐自己的内阁阁员那样蛮横无礼。预定要向国民议会踢去的一脚，先踢到巴罗和他的同僚身上了。

我们已经说过，巴罗内阁是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的。这是秩序党的内阁。波拿巴需要这个内阁，是为了要解散共和派制宪议会，实现对罗马的征讨，并摧毁民主派的力量。那时他好像躲到这个内阁背后，把政府权力让给了秩序党，戴上了路易-菲力浦时期报刊的责任发行人戴的谦虚的性格面具，即代理人戴的面具。现在他把面具丢掉了，因为这个面具已不是一块使他能够隐藏自己的面容的薄纱，而是已变成一个妨碍他显示出自己的本来面目的铁制面具了。他任命巴罗内阁，是要借秩序党的名义驱散共和派的国民议会；他解散这个内阁，是要宣布他自己的名字和这个秩序党的国民议会无关。

要解散巴罗内阁是不乏正当借口的。巴罗内阁在对待共和国总统这个和国民议会并存的权力时，甚至连必须遵守的礼节都忽视了。

^① 1849年11月1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05号。——编者注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波拿巴发表了致埃德加·奈的信，其中好像是指责教皇^①的自由主义行动¹¹⁵，正像他曾同制宪议会相对抗，发表了称赞乌迪诺进攻罗马共和国的信一样。当国民议会表决远征罗马的拨款时，维克多·雨果从所谓的自由主义出发提起了这封信的问题。秩序党在表示轻蔑和怀疑的叫声下，根本埋葬了认为波拿巴的狂妄举动可能有什么政治意义的念头。内阁阁员没有一个人出来替波拿巴应战。又一次，巴罗以他特有的空洞的热情，在讲坛上愤愤不平地讲到据他说是在总统亲信人物中进行的“可憎的阴谋”。最后，内阁从国民议会中为奥尔良公爵夫人争得了寡妇抚恤金，却坚决拒绝向国民议会提出增加总统薪俸的议案。在波拿巴身上，王位追求者和破产冒险家的身分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因此，认定他自己负有恢复帝国的使命这一伟大思想总是由认定法国人民负有替他偿清债务的使命的另一伟大思想所补充。

巴罗—法卢内阁是波拿巴所成立的第一个同时又是最后一个议会制内阁。所以，这个内阁的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随着这个内阁的解散，秩序党就不可挽回地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掌握行政权。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它那些最广大的生活表现起，直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止，从它的最一般的生存形式起，直到个人的私生活止；在这里，这个寄生机体由于非常的中央集权而无处不在，无所不知，并且极其敏捷、极其灵活，同时现实的社会机体却又是极无自动性、极其软弱、极不固定；在这样一个国

^① 庇护九世。——编者注

家里,十分明显,国民议会如果不同时简化国家管理,不尽可能缩减官吏大军,最后,如果不让市民社会和舆论界创立本身的、不依靠政府权力的机关,那么它一旦失掉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了。但是,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恰恰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国家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残和麻痹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如果不能把它们根本割掉的话。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

新内阁叫作奥普尔内阁。这并不是说奥普尔将军得到了内阁总理的职位。自从巴罗免职时起,波拿巴甚至废除了这个职位,因为事实上这个职位使共和国总统成为在法律上微不足道的立宪君主,这个立宪君主没有王位和王冠,没有权杖和宝剑,没有不被追究责任的特权,没有世袭的最高国家权位,而最坏的是没有皇室费。奥普尔内阁里只有一个人拥有议员头衔,这就是高利贷者富尔德,他是金融贵族中恶名昭彰的一个。财政部长的位置就落到他手上。只要看看巴黎交易所的行市表,就可以看出,从1849年11月1日起,法国的证券是随着波拿巴的股票的涨跌而涨跌的。这样波拿巴在交易所中找到了同盟者,同时又以任命卡尔利埃为巴黎警察局长而把警察抓到自己手里。

可是,内阁更迭的后果,只有在事变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才能显露

出来。波拿巴暂时只向前进了一步，好像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自己被抛到后面去了。他送了一份粗鲁的咨文以后，接着就极为卑屈地表示听命于国民议会。每当内阁阁员们敢于小心翼翼地试图把他们个人的奇奇怪怪的想法制定成法案的时候，他们好像只是迫于本身地位违心地执行他们事先已确信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滑稽的委托。每当波拿巴在内阁阁员们背后泄露出他的意图并玩弄他的“拿破仑观念”的时候，他的内阁阁员就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表示不同意他的主张。看来他说出篡夺权位的欲望，只是为了使他的敌人们的幸灾乐祸的笑声不致沉寂下去。他扮演了一个不被赏识而被全世界当作傻瓜的天才角色。他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期这样遭到一切阶级的极度的轻蔑。资产阶级从来还没有这样绝对地统治过，从来还没有这样高傲地炫耀过自己的统治的象征物。

我的任务不是在这里叙述资产阶级立法活动的历史。它的立法活动在这个时期只限于制定两个法律：一个是恢复葡萄酒税的法律¹¹⁶，另一个是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¹¹⁷。当法国人难以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①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旧时的心境。有人感到奇怪，为什么奥尔良派，自由派资产者，这些伏尔泰主义¹¹⁸和折衷派哲学的老信徒们，竟把指导法国人的精神的工作，委托给他们的世仇耶稣会去担任。可是，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在王位追求者这个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是他们双方都懂得，他们的共同统治要求把两个时期的压迫手段结合起来，七月王朝时期的奴役手段必须用复辟时期的

① 《新约全书·启示录》第22章。——编者注

奴役手段来补充和加强。

农民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他们一方面比任何时候都苦于粮价低落，另一方面又苦于赋税和抵押债务日益加重，于是他们在各省开始骚动起来。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迫害教师，使他们服从于僧侣，迫害镇长，使他们服从于县官，最后是施行控制一切人的侦探制度，在巴黎和各大城市，反动派本身具有自己时代的特征，挑衅行为多于压制。在乡村，反动派卑鄙龌龊，琐碎小气，可恶可厌，一句话，就是宪兵。显然，受过牧师制度祝福的宪兵制度三年来对愚昧的群众的腐蚀该是多么深。

虽然秩序党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热情奔放，大发议论反对少数派，但是它的言词始终是单音节的，正如基督徒“是，就说是，不，就不说”^①一样！不论是讲坛上或报刊上的言论，都很单调，和预先知道答案的谜语一样平淡无味。不管是谈请愿权还是葡萄酒税，不管是谈新闻出版自由还是贸易自由，不管是谈俱乐部还是市政机构，也不管是谈保障人身自由还是决定国家预算，发出的口号总是一样，题目总是一个，判词总是早已准备妥帖而且总是一成不变地说：“社会主义！”甚至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也被宣布为社会主义。在已有运河的地方建筑铁路也是社会主义，用木棍抵御刀剑的袭击也是社会主义。

这并不只是一句空话、一种时髦或一种党派斗争手腕。资产阶级正确地了解到，它为反对封建制度而锻造出来的各种武器都倒过来朝向它自己了，它所创造的一切教育手段都转过来反对它自己的文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编者注

明了，它创造的所有的神都离弃了它。它了解到，一切所谓的市民自由和进步机关，都侵犯它的**阶级统治**，并且既威胁它的社会基础，又威胁它的政治上层，因此这些东西就成了“**社会主义的**”了。在这种威胁和这种侵犯中，它正确地看出了社会主义的秘密，所以它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和趋势的评价，就比所谓的社会主义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更正确些。而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因此也就不能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对它一味表示反对——不管它是在为人类的痛苦感伤地哭泣，不管它是在宣扬基督的千年王国和博爱，也不管它是在用人道主义态度漫谈精神、教育和自由，或是在空泛地臆造一切阶级的协调和幸福的制度。资产阶级只是没有了解到一点：如果推论下去，那么它自己的**议会制度**，它的整个**政治统治**，现在也应该被普遍指责为**社会主义的东西**了。当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没有充分组织起来，还没有获得自己的纯粹的政治表现时，其他各个阶级的对抗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而在出现这一对抗的地方，它也不能实现那种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①。既然资产阶级认为任何一种社会生活表现都危害“安宁”，那么它又怎能希望在社会上层保持**不安宁的制度**，即保持自己那个——照它的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生存在斗争中并且靠斗争生存的**议会制度**呢？靠辩论生存的议会制度怎能禁止辩论呢？既然这里每种利益、每种社会措施都被变成一般的思想，并被当作一种思想来讨论，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能把某种利益、某种措施当作一种高出思维的东西而强使人们把它当

①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样写的：“它也不能实现那种立刻危及财产、宗教、家庭和秩序，使一切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转化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危险转变。”——编者注

作信条来接受呢？发言人在讲坛上的斗争，引起了报界低级作家的斗争；议会中的辩论俱乐部必然要由沙龙和酒馆中的辩论俱乐部来补充；议员们经常诉诸民意，就使民意有理由在请愿书中表示自己的真正的意见。既然议会制度将一切事情交给大多数决定，那么议会以外的大多数又怎能不想作决定呢？既然你们站在国家的顶峰上拉提琴，那么站在下面的人跟着跳舞不正是意料之中的事吗？

总之，既然资产阶级把它从前当作“自由主义”颂扬的东西指责为“社会主义”，那么它就是承认它本身的利益要求它逃避自身统治的危险；要恢复国内的安宁，首先必须使它的资产阶级议会安静下来，要完整地保持它的社会权力，就应该摧毁它的政治权力；只有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注定同其他阶级一样毫无价值，个别资产者才能继续剥削其他阶级，安逸地享受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要挽救它的钱包，必须把它头上的王冠摘下，而把保护它的剑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地悬在它自己的头上。

在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方面，国民议会表现得非常无能。例如1850年冬季开始的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1851年12月2日还没有结果。只要国民议会不从事压迫，不进行反动活动，它就患了不可救药的不孕之症。

当波拿巴的内阁一部分人倡议制定符合秩序党精神的法律，一部分人还在夸大这些法律在实施和运用中的残酷性的时候，波拿巴本人却企图以一些幼稚荒唐的提案来博得声望，强调自己对于国民议会的敌意，并暗示有某种神秘的藏宝处，只是由于环境的阻碍暂时还不能把所藏的财宝奉献给法国人民。例如，给下级军官每天增加四个苏的津贴的提案，以及为工人创设信誉贷款银行的提案。金钱的馈赠和金钱的借贷，这就是他希望用以诱惑群众的远景。馈赠和贷款，

这就是显贵的和卑贱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财政学。波拿巴所善于运用的妙诀只此而已。从来还没有一个王位追求者像他这样庸俗地利用群众的庸俗习气来进行投机勾当。

国民议会眼看着波拿巴这样明明白白地企图靠损害它来博取声望，眼看着这个被债主催逼而又毫无值得珍惜的声誉的冒险家越来越可能干出某种极冒险的勾当，曾不止一次地表示狂怒。秩序党和总统之间的分歧已经带有危险性质，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又迫使总统怀着忏悔的心情重新投入秩序党的怀抱。我们指的是**1850年3月10日的补选**。这次选举是为了填补六月十三日事变后被监禁或驱逐出国的议员所空下来的席位。巴黎只选了社会民主派的候选人^①，并且绝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参加过1848年六月起义的德弗洛特。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巴黎小资产阶级，就这样报复了1849年6月13日的失败。看来，小资产阶级在危急关头离开战场，只是为了要在顺利的情况下以更大的战斗力量和更勇敢的战斗口号重新进入战场。看来有一种情况更加重了这次选举胜利的危险性。军队在巴黎投票选举了六月起义的一个参加者来对抗波拿巴的内阁阁员拉伊特，而在各省，军队中大部分人投了山岳党人的票，山岳党人在这些地方虽然不像在巴黎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也比对手占了优势。

波拿巴突然看到自己又面对着革命了。和1849年1月29日及1849年6月13日一样，1850年3月10日他又躲到秩序党背后去了。他屈服了，他怯懦地请罪，表示决心遵照议会多数的意旨来组织任何一个内阁，他甚至恳求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首领们，梯也尔们、贝里耶们、布罗伊们和摩莱们，一句话，就是恳求所谓的卫戍官们¹¹⁹

① 拉·伊·卡诺、保·德弗洛特和弗·维达尔。——编者注

亲自掌握政权。秩序党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它不但没有大胆地抓住这个送到手上的政权，甚至也没有强迫波拿巴恢复他在11月1日所解散的内阁；它满足于用自己的宽恕羞辱波拿巴，并使巴罗什先生加入奥普尔内阁。这个巴罗什作为公诉人曾经在布尔日最高法院上疯狂地攻击过五月十五日事件³⁶中的革命者和六月十三日事件中的民主派，两次都指控他们危害国民议会。以后波拿巴的任何一个内阁阁员，都没有再敢像巴罗什那样蔑视国民议会，而在1851年12月2日以后，我们发现，他又得到了参议院副议长这个官高禄厚的职位。他把痰吐在革命者的菜汤中，为的是让波拿巴能够把它喝掉。

社会民主派这方面似乎只是在寻找借口，以便再度使自己的胜利成为问题并削弱这一胜利的意义。巴黎新选出的议员之一维达尔，同时在斯特拉斯堡也当选了。他被说服放弃巴黎的选举而接受了斯特拉斯堡的选举。这样，民主派就没有把自己在投票站的胜利变成最终的胜利，从而激起秩序党立刻在议会中对这个胜利提出异议，它没有迫使对手在人民热情高昂和军队情绪良好的时机出来斗争，反而在3月和4月间用新的竞选把巴黎弄得疲惫不堪，使人民的激昂的感情在这一新的临时竞选把戏中消耗掉，使革命的精神满足于宪制的成就，把革命精力浪费于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让资产阶级集合起来并作好准备，最后，以4月补选的感伤主义的注释（欧仁·苏当选）减弱了3月选举的意义。一句话，社会民主派让3月10日受了4月愚人节的愚弄。

议会中的多数派了解自己对手的弱点。因为波拿巴让多数派领导和负责攻击，多数派的17个卫戍官制定了新选举法，法案的报告人是要求这种荣誉的福适先生。5月8日，福适提出了这个法案，其

内容是要废除普选权,并规定选举人必须在他们所在的选区内居住3年,最后,工人在选区的居住年限应由他们的雇主来作证。

民主派在宪制选举斗争时期曾满怀革命的激情,当现在应该拿起武器来证明自己的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的时候,他们却以宪制精神鼓吹秩序,宣扬庄严的宁静(*calme majestueux*)和合法行为,也就是盲目地服从自封为法律的反革命势力的意志。在辩论的时候,山岳党力图羞辱秩序党,以一个遵守法制的正直庸人的冷漠态度来对抗它的革命热情,严厉责备它的革命行为,从而把它置于死地。甚至新当选的议员们也极力想以自己的谨慎而有礼的举动来向大家证明:责骂他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把他们的当选解释成革命的胜利,是一种怎样的误解。5月31日,新选举法¹²⁰通过了。山岳党把抗议书塞进总统的衣袋里就心满意足了。继选举法之后又通过了一个彻底消灭革命报刊的新的新闻出版法¹²¹。革命报刊遭到这种厄运是应该的。在这场大洪水以后,革命的最前哨就只剩下《国民报》和《新闻报》这两个资产阶级的报纸了。

我们已经看到,民主派的领袖们在3月和4月间曾竭力把巴黎人民拖入虚构的斗争,而他们在5月8日以后又竭力阻止巴黎人民进行实际的斗争。此外,我们还不应当忘记,1850年是少有的工商业繁荣的年头,所以当时巴黎的无产阶级有充分就业的机会。可是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根本剥夺了无产阶级参政的权利,甚至断绝了他们接近战场的机会。这个法律使工人回复到他们在二月革命以前所处的贱民地位。面对着这样的事变,他们却让民主派来驾驭自己,为了一时的安逸而忘记了自己阶级的革命利益,他们放弃了作为致胜力量的光荣,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并且表明,1848年6月的失败使他们长期丧失了战斗能力,最近的历史进程又要撇开他们而向

前发展。至于在6月13日曾大嚷大叫“只要敢动一动普选权,那就对他不客气!”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现在他们却自慰说:反革命给他们的打击根本不是打击,而5月31日的法律也根本不是法律。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每个法国人都将一手拿着选票,一手拿着利剑来到投票站。他们用这样的预言来安慰自己。最后,军队为了1850年3月和4月的选举而受到上级的处罚,正如他们曾经为了1849年5月29日的选举而受到处罚一样。可是这次军队坚决地对自己说:“第三次我们再不会上革命的当了!”

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¹²⁰,是资产阶级的政变。资产阶级过去所有各次对革命的胜利,都只具有临时的性质。只要现届国民议会一退出舞台,这些胜利就成为问题了。这些胜利是取决于新的普选中的偶然情况的,而自从1848年以来,选举的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实际统治越强大,它对人民群众的精神统治就越软弱。普选权在3月10日直接表明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资产阶级就以取消普选权进行了报复。所以,5月31日的法律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然表现。另一方面,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当选至少要有200万票才算有效。如果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人获得这个最低限度的票数,国民议会就有权从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来当总统。当制宪议会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选民册中共有1 000万选民。所以,按照这个法律,只要取得占选民总数 $\frac{1}{5}$ 的票数,总统当选就算有效了。5月31日的法律至少从选民册中勾销了300万个选民,这样就把选民人数减低到700万人,但是当选总统需要获得200万选票的法定最低限额却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来,法定的最低限额就从总选票的 $\frac{1}{5}$ 几乎提高到 $\frac{1}{3}$ 。换句话说,这个法律用尽一切办法把总统选举

从人民手里暗转到国民议会手里。总之，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

五

革命危机刚一过去，普选权刚一废止，国民议会和波拿巴之间的斗争就重新爆发了。

宪法规定发给波拿巴的薪俸是每年 60 万法郎。他就职后不到半年功夫，就把这个数额增加了一倍，因为奥迪隆·巴罗硬要制宪议会每年发给 60 万法郎的津贴作为所谓交际费。在 6 月 13 日以后，波拿巴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要求，可是巴罗这次并没有听从。现在，在 5 月 31 日以后，波拿巴立即利用这个有利的时机，通过他的内阁阁员们向国民议会要求每年发给 300 万法郎的皇室费。长期的流浪生活使这个冒险家长出非常发达的触角，他能探知可能向资产者勒索金钱的时机，他采取了十足的敲诈手段。国民议会在他的协助和同意下污辱了人民的主权。他威胁说，如果国民议会不松开钱袋，不以每年 300 万法郎来买他的沉默，他就要向人民法庭告发国民议会的犯罪行为。国民议会剥夺了 300 万法国人的选举权，他要求把每一个不流通的法国人换成一个流通的法郎，正好是 300 万法郎。他是由 600 万人选出来的，他要求赔偿他在事后被剥夺掉的票数。国民议会的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要求。波拿巴派的报纸进行威胁。国民议会能够在它根本彻底和国民群众决裂的时候又同共和国总统决裂吗？国民议会虽然否决了每年的皇室费，但同意一次增

发 216 万法郎。国民议会既已答应给钱，同时又以自己的烦恼表明自己这样做是出于不得已，因而就暴露了双倍的软弱。波拿巴为什么需要这笔款子，我们往后就可以看到。在废除普选权后，接踵而至的是令人气恼的尾声，在这尾声当中波拿巴对于篡权的议会的态度已经从 3 月和 4 月危机时期的恭顺平和变成了挑战式的骄横，而国民议会在这个尾声后却休会三个月，从 8 月 11 日到 11 月 11 日。它在休会期间留下了一个由 28 人组成的常任委员会，代行它的职能。这其中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但是有几个温和的共和派。1849 年的常任委员会完全是由秩序党和波拿巴分子组成的。但是，那时是秩序党以革命的经常反对者自命，现在则是议会制共和国以总统的经常反对者自命了。5 月 31 日的法律通过后，秩序党要对付的只是这个敌手了。

1850 年 11 月国民议会复会的时候，过去国民议会和总统之间的一些小小的冲突看来势必要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大规模的无情战斗，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

同 1849 年间一样，这一年议会休会期间，秩序党又分解成了各个派别，每一派别都忙于自己的复辟阴谋，这种阴谋因路易-菲力浦之死而更加活跃起来。正统派的国王亨利五世，甚至任命了一个组织完备的内阁驻在巴黎，其中有几个常任委员会委员参加。因此，波拿巴也有理由巡游法国各省，并按照他所幸临的每个城市的情绪，或者隐晦地或者公开地吐露自己的复辟计划，为自己张罗选票。波拿巴的这次巡游，自然被大型的官方报纸——《通报》和小型的波拿巴私人通报捧作胜利的游行，在这次巡游期间，到处都有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随驾陪行。这个团体在 1849 年就成立了。它名义上是个慈善会，实际上是由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一些秘密宗派，每一个宗派都

由波拿巴的走狗们领导，总领导人是一个波拿巴派的将军^①。在这个团体里，除了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除了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就是一些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私娼狗腿、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拣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化子，一句话，就是被法国人称作浪荡游民的那个完全不固定的不得不只身四处漂泊的人群。波拿巴把这些跟他同类的分子组成十二月十日会即“慈善会”的核心，因为这个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和波拿巴一样感到自己需要靠国内的劳动群众来周济。波拿巴是流氓无产阶级的首领，他只有在这些流氓无产者身上才能重新找到他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大量反映，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作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②。他这个老奸巨猾的痞子，把各国人民的历史生活和他们所演出的大型政治历史剧，都看作最鄙俗的喜剧，看作专以华丽的服装、辞藻和姿势掩盖最鄙陋的污秽行为的化装舞会。例如，在进攻斯特拉斯堡时，一只受过训练的瑞士兀鹰就扮演了拿破仑之鹰的角色。当他在布洛涅登陆时，他给几个伦敦仆役穿上了法国军装，于是他们就俨然成了军队¹²³。在他的十二月十日会中，他搜罗了10 000个游手好闲分子，要他们扮演人民，正像尼克·波顿扮演狮

① 让·皮·皮阿。——编者注

②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是：“这就是真实的波拿巴，不加掩饰的波拿巴，他后来除了革命者之外，还把他的一部分昔日的共谋者送到卡宴¹²²，从而以万能的方式还清了欠他们的债，这充分地显示出波拿巴的本色。”——编者注

子^①一样。当资产阶级毫不违反法国演剧格式的迂腐规则,十分严肃地表演最纯粹的喜剧时,当它一半被骗一半信服自己的大型政治历史剧的庄严时,一个把喜剧仅仅看作喜剧的冒险家当然是要获得胜利的。只有当他战胜了盛装的敌人,并且认真演起自己的皇帝角色,戴上拿破仑的面具装作真正的拿破仑以后,他才会成为他自己的世界观的牺牲品,成为一个不再把世界历史看作喜剧而是把自己的喜剧看作世界历史的认真的丑角。十二月十日会是波拿巴特有的一种党派战斗力量;它对于波拿巴的意义,正如国家工场¹²⁴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别动队对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意义一样。在他巡游期间,十二月十日会的会员们成群地聚集在沿途各火车站,装作迎驾的群众,并表示人民的热情,高叫“皇帝万岁!”,侮辱和殴打共和党人,——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在警察保护下干出来的。在他返回巴黎的途中,这些人就充当了前卫,防止或驱散敌对性的示威游行。十二月十日会属于他,它是他创造出来的,是完全出自他自己的主意。在其他方面,他据为己有的东西,都是由于形势关系落到他手中的;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形势替他做好或者是他模仿别人的行为罢了。他公开地对资产者大打其关于秩序、宗教、家庭、财产的官腔,暗地里却依靠着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一流人的秘密团体,依靠着无秩序、卖淫和偷窃的团体,这是波拿巴的本色,而十二月十日会的历史便是他本人的历史。有一次破例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几个秩序党议员挨了十二月十日会会员的木棍。更有甚者,指派给国民议会负责它的保卫事宜的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口供向常任委员会报告,说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决定暗杀尚加尔涅将军和国民议会议长杜班,

①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2场。——编者注

并且已经指定了凶手。可以想象，杜班先生该是多么惊恐。看来，议会对十二月十日会的调查，即对波拿巴秘密内幕的揭发，是不可避免的了。可是，在国民议会即将开会的时候，波拿巴却早有戒备地解散了自己的这个团体，不过这种解散当然只是在纸面上，因为1851年底，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一个详尽的报告书中还白费气力地劝他把十二月十日会真正解散。

当波拿巴还未能把国家军队变成十二月十日会时，十二月十日会仍然是他的私人军队。波拿巴在国民议会休会不久就在这方面作了初次的尝试，而且用的是他刚刚从国民议会手中索取来的钱。他是一个宿命论者，相信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是人们特别是军人们所抵抗不住的。而首先被他列入这种力量的就是雪茄烟和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所以他一开始就在爱丽舍宫的大厅里用雪茄烟、香槟酒、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了军官和军士。10月3日他在圣莫阅兵时，又对军队采用了这种办法；10月10日他在萨托里阅兵时，又更大规模地重复了这种办法。伯父回忆亚历山大的远征亚洲，侄子就回忆巴克科斯在同一地方的征伐。不错，亚历山大是半神，而巴克科斯却是神，并且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庇护神。

10月3日检阅后，常任委员会曾把陆军部长奥普尔召来质问，后者保证这类违反纪律的事情不再发生。大家知道，波拿巴怎样在10月10日履行了奥普尔的诺言。这两次阅兵都是由巴黎军队总司令尚加尔涅担任指挥的。这个尚加尔涅既是常任委员会的委员，又是国民自卫军的司令官；既是1月29日和6月13日的“救星”，又是“社会中坚”；既是秩序党的总统候选人，又是两个王朝的意中的蒙克；他以前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陆军部长的部属，一向公开嘲笑共和国宪法，以模棱两可的高傲的庇护态度追逐着波拿巴。现在他却热烈

地拥护军纪,反对陆军部长;拥护宪法,反对波拿巴了。当10月10日有一部分骑兵高呼“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时,尚加尔涅竟作了安排,至少使他的朋友诺马耶率领去受检阅的步兵严守沉默。在波拿巴的怂恿下,陆军部长为了惩罚诺马耶将军,以任命他为第十四和第十五师团的司令官为借口,解除了他在巴黎的职位。诺马耶拒绝调换职务,因而被迫辞职。尚加尔涅于11月2日发布命令,禁止军队在持军械的情况下呼喊任何政治口号和进行任何示威。爱丽舍宫方面的报纸¹²⁵攻击尚加尔涅;秩序党的报纸攻击波拿巴;常任委员会接连不断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一再提议宣布祖国处于危急状态;军队好像已分裂为两个敌对的阵营,有两个敌对的总参谋部,一个在波拿巴的官邸爱丽舍宫,另一个在尚加尔涅的官邸土伊勒里宫。看来只需国民议会召开会议来发出战斗的信号了。法国公众对波拿巴和尚加尔涅之间这次纠纷的评判,和一位英国记者的评论相同,这位记者写道:

“法国的政治女仆们正在用旧扫帚扫除革命的灼热熔岩,而她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又互相争吵得不可开交。”

这时,波拿巴急忙免除了陆军部长奥普尔的职务,随即把他派到阿尔及尔去,任命施拉姆将军继任陆军部长。11月12日波拿巴向国民议会送去了一篇美国式的冗长咨文^①,其中充满了琐事,渗透着秩序的臭味,渴望调和,表示服从宪法,谈论到所有一切,只是没有谈到当前的紧急问题。他好像是顺便指出,根据宪法的明确规定,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总统。这篇咨文是以下面一段极其庄严的词句结尾的:

① 1850年11月13日巴黎《总汇通报》第317号。——编者注

“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我只受誓言约束，我将谨守这个誓言给我划定的狭隘界限…… 至于我个人，我是人民选出的，我的权力完全是人民赋予的，我将永远服从人民的合法表示的意志。如果你们在本届会期中决定要修正宪法，那就由制宪议会来调整行政权的地位。否则人民将于1852年庄严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可是不论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们总应该取得一种共识，永远不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命运由热情、意外事故或暴力来主宰…… 我首先注意的问题不是弄清楚谁将在1852年治理法国，而是要运用我所能支配的时间使这个过渡时期不发生风波和乱子。我对诸位是开诚布公的。望你们以信任来回答我的诚意，以襄助来回答我的善念，其余的一切上帝会来照顾。”

资产阶级的有礼貌的、伪善而温和的、庸俗慈善的腔调，在十二月十日会的专权者兼圣莫和萨托里的野餐英雄的口中，暴露了它那最深长的含义。

关于这种内心剖白是否值得信任的问题，秩序党的卫戍官们总是心中有数。誓言他们早已听厌了，他们自己的人中间就有许多政治上发伪誓的老手和巧匠；不过关于军队的那一段话，他们倒没有听漏。他们愤懑地发觉：这个咨文非常烦琐地列举了最近颁布的各种法律，但是故意不提最重要的法律——选举法；不仅如此，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这个咨文把1852年的总统选举委诸人民。选举法是拴在秩序党脚上的铅球，妨碍他们行动，当然更妨碍他们冲击！此外，波拿巴以正式解散十二月十日会和免除奥普尔的陆军部长职务的手法，亲手把替罪的羔羊献到祖国的祭坛上。他把预期发生的尖锐冲突缓和了下来。最后，秩序党自己也胆怯地竭力回避、缓和并抹杀和行政权发生的决定性的冲突。由于害怕失去在和革命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一切，它让敌手攫取了它所获得的果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秩序党从2月起就开始对革命这样叫喊；现在波拿巴在他的咨文中又对秩序党这样叫喊。“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

波拿巴采取了图谋篡夺权位的行为，但是当秩序党因为这种行为而吵吵嚷嚷并且神经过敏地加以解释的时候，它就造成了“不安宁”。只要没有人谈到萨托里的腊肠，这腊肠是根本不会说话的。“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波拿巴要求让他安安静静地干他的事情，而议会党却由于双重的恐惧而动弹不得：一怕重新引起革命的不安宁状态，二怕自己在本阶级即资产阶级眼中成为造成不安宁的人。既然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所以秩序党也就不敢用“战争”来回答波拿巴咨文中的“和平”了。公众本来以为在国民议会开会时准有好戏看，结果是大失所望。反对派议员要求常任委员会交出它关于十月事件的记录，但这个要求被多数否决了。人们根本规避一切可能激动人心的辩论。国民议会在1850年11月和12月的工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直到12月底，才开始在议会的个别特权问题上爆发一场游击战。自从资产阶级以废止普选权暂时避开了阶级斗争的时候起，运动就沦为两个权力之间为特权问题发生的小小的口角。

有一位人民代表，名叫莫甘，因负债被法庭判罪。司法部长鲁埃在回答法院院长的询问时宣称，应当径直下令把负债者拘捕起来。于是莫甘就被投入债务监狱。国民议会知道这种谋害行为时，大为愤懑。它不仅决定立即释放被捕者，而且当晚^①就通过自己的法警强制地把他从克利希监狱放出来了。可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信仰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并且暗中打算将来在必要时能够把讨厌的山岳党人安置到收容所去，国民议会又宣布说：在事先取得它的同意时，拘捕负债的人民代表是容许的。国民议会忘记宣布总统也可以因负债被捕入

^① 1850年12月28日晚。——编者注

狱。国民议会把自己议员的不可侵犯权的最后一点影子都消灭无余了。

上面已经讲过，警官伊雍根据一个名叫阿莱的人的供词，告发了十二月十日会的一个支部阴谋暗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计划。因此，议会总务官在第一次会议上^①就提议设立一种特殊的议会警察，由国民议会本身的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完全不受警察局长管辖。内务部长巴罗什提出了抗议，说这是一种侵害他的职权的行为。结果双方达成了可怜的妥协，规定议会警官应由议会预算中的经费维持并由议会总务官任免，但是事先必须取得内务部长的同意。这时，政府已对阿莱提起诉讼，政府方面很容易就把阿莱的供词宣布为凭空捏造，并通过公诉人的嘴把杜班、尚加尔涅、伊雍和整个国民议会嘲笑了一顿。然后，12月29日，巴罗什部长又写信给杜班，要求把伊雍免职。国民议会委员会决定伊雍留任原职，可是国民议会由于自己在莫甘案件中采取了强制性的行动而忐忑不安，它习惯于在每次给行政权打击后受到它两次回击，因此没有批准这个决定。国民议会为酬答伊雍的忠诚尽职而免了伊雍的职，因而丧失了自己所享有的一种议会特权，但这种特权对它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所要对付的那个人，不是一个夜间决定白天要干什么的人，而是一个白天作决定夜间就采取行动的人。

我们已经看到，国民议会在11月和12月间，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现在我们却看到，它不得不为了最微不足道的理由投入战斗。在处理莫甘案件时，它原则上已经允许逮捕负债的人民代表，不过有个条件，即这个原则只能运

^① 1850年12月29日举行的会议。——编者注

用于可恶的人民代表身上，它为了这种可耻的特权和司法部长^①发生了争执。国民议会没有利用关于有人准备谋杀杜班和尚加尔涅两人的消息要求追查十二月十日会的活动，并在法国和欧洲面前彻底揭穿波拿巴作为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首领的真面目，它竟把冲突归结为在警官应由谁任免的问题上跟内务部长的争吵。这样，我们就看到，秩序党在这个时期内始终都因自己的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不得不把自己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谓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因为它如果要争斗，就会对国民发出一种进军令，而发动国民正是它最害怕的事情。因此，在这种场合，它总是否决山岳党的提案而转入日常议程。当秩序党已经放弃了大规模的斗争之后，行政权就静待时机，以便有可能当斗争只具有可以说是议会性的局部的利害关系时，借一些无关紧要的理由重新开始这种斗争。那时秩序党将发泄出满腔的愤怒，那时它将拉开后台的幕布，揭开总统的面具，宣布共和国处境危急，然而那时它的热情令人感到荒唐，斗争的理由是一种虚伪的口实或根本不值得斗争的东西。议会的风暴原来不过是一杯水的风暴，斗争不过是阴谋，冲突不过是吵架。各革命阶级都幸灾乐祸地观望着国民议会受屈辱，因为它们对国民议会的议会特权热心的程度，和国民议会对社会自由热心的程度一样；同时，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却不了解，为什么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居然把时间浪费在这样琐碎的纠纷上，为什么它竟这样无聊地跟总统进行竞争，从而危害安宁。

① 欧·鲁埃。——编者注

当大家都在等候作战的时候进行媾和，而当大家都以为和约已经缔结的时候却又开始进攻，这种战略把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弄迷糊了。

12月20日，帕斯卡尔·杜普拉就发行金条彩票一事向内务部长提出质问。这彩票是“来自爱丽舍园的女儿”。波拿巴和他的亲信把它献给人世；而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则把它置于自己的正式保护之下，虽然法国的法律除了以救济为目的的彩票外是禁止发行任何其他彩票的。彩票发行了700万张，每张一法郎，而所得纯利据说是用来遣送巴黎的游民到加利福尼亚去。一方面是为了用黄金梦来排除巴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梦想，用可望中头彩的诱人幻景来驱除作为教义的劳动权。自然，巴黎的工人们没有认出加利福尼亚的耀眼的金条就是从他们口袋里骗去的无光彩的法郎。无论如何，这种彩票不过是一种骗局而已。妄想不离开巴黎就能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的游民，正是波拿巴本人和他的负债累累的亲信。国民议会同意给他的300万法郎已经用光，无论如何总得重新填满空虚的钱库。波拿巴为建立所谓的工人村曾向全国募集捐款，并且他自己在认捐名册上第一个认捐了一大笔款子，但他只是徒劳了一番。冷酷的资产者抱着不信任的态度等待他付出认捐的款子；而这笔款子自然是没有付出，于是利用社会主义空中楼阁进行的投机把戏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金条的成效较大。波拿巴和他的同谋者并不满足于把700万法郎中扣除应兑现的金条以后的一部分纯收益装进自己的腰包，他们还制造了假彩票，同一个号码的彩票发出了10张、15张以至20张，——这真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金融手段啊！这里，国民议会所碰到的不是名义上的共和国总统，而是有血有肉的波拿巴。这里，国民议会可以在他犯罪——不是违反宪法，而是违反刑法典——的现场把他当场捉住。如果说国民议会以转入日常议程回答了杜普拉的质问，那么，它

这样做不只是因为日拉丹要国民议会宣布自己“满意”的提案提醒了秩序党人想起他们自己的一贯的贪污行为。资产者，尤其是高升为政治家的资产者，总是用理论上的浮夸来弥补自己实践上的卑下。资产者身为政治家时，也和同他相对立的国家权力一样，就俨然成为至高无上之物，因而对他作斗争时，也只能采取高尚的庄严的方式。

波拿巴是一个浪荡人，是一个骄横的流氓无产者，他比无耻的资产者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现在，在国民议会亲手帮助他顺利地走过了军人宴会、阅兵、十二月十日会以及违反刑法典等几处很容易滑倒的地点以后，他看到，他可以由伪装的防御转为进攻的时刻已经到了。司法部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财政部长^①所遭到的那些小小的失败，即国民议会借以表示愤懑的失败，很少使波拿巴感到不安。他不仅阻止了部长们辞职，从而阻止了承认行政权服从议会。他现在已经能完成他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就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军权和议会分立，把尚加尔涅免职。

爱丽舍宫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个5月间似乎是向第一师团颁发的紧急命令^②（因而是出自尚加尔涅的命令），劝告军官们遇有叛乱时不要宽容自己队伍中的叛徒，要立刻将他们枪毙，并且不要按国民议会的要求派遣军队。1851年1月3日，内阁因这一紧急命令受到了质问。为了调查这一事件，内阁起初要求的限期是3个月，继则一个星期，最后仅仅是24小时，国民议会要求立即予以解释。尚加尔涅站起来声明说：这个紧急命令从未下过。他并且补充说，他随时都准

① 欧·鲁埃、让·保·亚·施拉姆、罗·约·德福塞和阿·富尔德。——编者注

② 1851年1月2日巴黎《祖国报》。——编者注

备执行国民议会的要求；遇有冲突发生时，国民议会可以信赖他。国民议会以狂热的鼓掌欢迎他的声明，并对他投了信任票。国民议会既委身于一个将军的私人保护之下，也就是放弃了权力，宣告自己的软弱和军队的万能；但是这位将军弄错了，因为他居然想把波拿巴只是封给他的权力交付给国民议会去反对同一个波拿巴，并且盼望从这个议会，从他的需要保护的被托管者那里获得保护。可是尚加尔涅相信资产阶级从1849年1月29日起赋予他的那种神秘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和其他两个国家权力相鼎立的第三个权力。他所遭遇到的命运，也和当代其他的英雄，更正确些说，和当代的圣者们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这些人物的伟大只在于他们的党派故意替他们宣扬，而到局势要求他们创造奇迹时，他们就显得平庸无奇了。一般说来，不信神是这些假英雄和真圣者的死敌。因此他们对那些冷酷无情的讽刺者和讥笑者表示高尚的道义的不满。

当晚^①，内阁阁员们被召请到爱丽舍宫，波拿巴坚持要撤换尚加尔涅，五个阁员^②拒绝署名。《通报》宣布内阁危机，而秩序党的报纸则以组织由尚加尔涅指挥的议会军相威胁。根据宪法，秩序党是有权这样做的。它只要任命尚加尔涅为国民议会议长，并调来任何数量的军队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就够了。由于尚加尔涅实际上还统率着军队和巴黎国民自卫军，并且正等待和军队一起被调用，所以秩序党是可以更加放心地这样做的。波拿巴派的报纸甚至还不肯否认国民议会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提出这种法律上的问题在当前局势下是不会

① 1851年1月3日晚。——编者注

② 比·茹·巴罗什、罗·约·德福塞、让·厄·杜·拉伊特、玛·路·皮·费·帕略和欧·鲁埃。——编者注

有什么成效的。军队将听从国民议会调遣，这是可能的，要知道，波拿巴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才在巴黎找到两位将军（巴拉盖·狄利埃和圣让·丹热利）愿意在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上签名。但是秩序党本身是否能在自己的队伍中和议会里找到通过这种决定所必需的票数，就很成问题了，要知道，过了一个星期就有 286 个议员脱离了秩序党，而且山岳党甚至在 1851 年 12 月，在最后的决定性的时刻还否决了这样的提议。不过，卫戍官们这时也许还能发动他们党内的群众去建立丰功伟绩，即藏身于枪林之后，并利用投到它阵营中的军队的帮助。可是，卫戍官先生们并没有这样做，1 月 6 日晚上他们到爱丽舍宫去，希望用政治手段和论据规劝波拿巴放弃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决定。劝谁就是承认谁是主事人。波拿巴由于卫戍官们的这种做法而增加了勇气，1 月 12 日他任命了新内阁，旧内阁的首领富尔德和巴罗什两人继续留任。圣让·丹热利当了陆军部长。《通报》刊载了把尚加尔涅撤职的命令，他的职权划分给指挥第一师团的巴拉盖·狄利埃和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佩罗了。社会中坚退职了，这虽然并没有使一块瓦片从屋顶上掉下来，但是使交易所的行情上涨了。

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议会制内阁已经不存在了。秩序党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的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它现在只好求助于一些无力的原则，这些原则就连它自己也经常看作只是责成第三者遵守而使自己能更加从容行动的一般规则。我们所研究的时期，即秩序党和行政权斗争的时期的前一部分，就以尚加尔涅被撤职和军权落入波拿巴

之手而结束。现在，两个权力之间的战争已经正式宣布并且已在公开进行，不过是在秩序党既失去武器又失去士兵以后罢了。国民议会已经没有内阁，没有军队，没有人民，没有社会舆论，从5月31日通过选举法起就不再是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者了，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一切，逐渐变成了一个旧法国高等法院¹²⁶，它让政府去行动，自己则满足于在事后发出唠叨的抗议。

秩序党以狂怒迎接了新的内阁。贝多将军提醒大家记住常任委员会在议会休会期间的温和态度，记住它由于过分慎重而拒绝把自己的议事记录公布出来。这时内务部长^①自己也坚持公布这些记录，因为这些记录现在当然就像不新鲜的水一样已经走味，它暴露不出任何新的事实，对于厌倦的公众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了。根据雷缪扎的建议，国民议会退回到自己的各委员会，任命了一个“非常措施委员会”。巴黎不越出自己平常生活的常轨一步，尤其是因为这时贸易繁荣，工厂开工，粮价低廉，食品丰富，储蓄银行每天都收到新存款。议会所喧嚷的“非常措施”，不过是在1月18日通过了对内阁的不信任案罢了，而关于尚加尔涅将军连提都没有提到。秩序党不得不这样来提出自己的不信任案，是为了保证自己取得共和党人的票数，因为在内阁的一切措施中共和党人只赞成尚加尔涅被撤职一项，而秩序党实际上也不能非难其余的措施，因为这些措施是它自己迫使内阁采取的。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以415票对286票通过，就是说，只是由于极端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同纯粹共和党人和山岳党人的联合才得以通过。这就证明，秩序党不只失去了内阁，不只失去了军队，而且在

① 比·茹·巴罗什。——编者注

自己和波拿巴的冲突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由于狂热地倾向妥协，由于害怕斗争，由于软弱，由于顾及亲属而眷恋国家薪俸，由于指望获得阁员的空缺（如奥迪隆·巴罗），由于那种经常使平庸的资产者为某种个人动机而牺牲本阶级的总的利益的庸俗的利己主义，一部分议员已经从秩序党阵营中开了小差。波拿巴派的议员们从最初起就只是在对革命进行斗争时才依附于秩序党。天主教党的首领蒙塔朗贝尔在那时已经把他个人的势力投到波拿巴方面，因为他已不相信议会党的生命力了。最后，这个党的首领们，奥尔良派的梯也尔和正统派的贝里耶，不得不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派，不得不承认说，虽然他们的心是保皇派，而头却是共和派，议会制共和国是整个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唯一可能的形式。一句话，他们不得不在资产阶级眼前把他们在议会背后继续努力从事的复辟计谋咒骂为危险而愚蠢的阴谋。

1月18日的不信任案是对内阁阁员的打击，而不是对总统的打击。可是撤换尚加尔涅的并不是内阁，而是总统。秩序党不应当向波拿巴本人问罪吗？不应当以他的复辟欲望作为罪名吗？可是，这种复辟欲望只不过是补充了秩序党自己的复辟欲望罢了。不应当以他在阅兵和十二月十日会中的阴谋活动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早已把这些问题埋葬在一堆日常议程下面了。不应当以他撤换了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英雄，即撤换了1850年5月曾威胁遇有叛乱发生时就四处放火烧光巴黎的那个人作为罪名吗？可是，秩序党的山岳党同盟者和卡芬雅克甚至根本不让它以正式表示同情来把倒台的社会中坚扶起来。秩序党自己不能否认总统拥有由宪法赋予他的撤换将军的权力。秩序党之所以气愤，只是因为总统把自己由宪法赋予的权力当作反对议会的手段。可是，秩序党自己岂不是也不断地（特别是在

废除普选权时)把它的议会特权当作违反宪法的手段吗?因此,秩序党只好严格地在议会范围以内活动。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失去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这样,秩序党只是让总统得到一次机会在国民面前重新凌辱国民议会罢了。1月20日,《通报》报道说,内阁全体辞职已被批准,波拿巴把已经没有一个议会党占据多数(这点已由1月18日的投票,即山岳党和保皇党联合产生的果实所证明),而新的多数又尚待形成作为借口,任命了一个所谓的过渡内阁,其中没有一个人是议会议员,全都是些毫不知名的和微不足道的人物,这是个纯粹由一些听差和司书组成的内阁。秩序党现在可以把自己的精力花费在跟这些傀儡打交道上面了;而行政权则不再认为自己在国民议会中需要有什么认真的发言人了。波拿巴的内阁阁员越是成为单纯的哑配角,波拿巴就越是明显地把全部行政权集中在他一人身上,越容易利用行政权来达到个人目的。

为了报复,秩序党和山岳党联合在一起否决了给予总统180万法郎补助金的提案,这个提案是由十二月十日会的首领命令他的听差阁员们提出来的。这一次,问题是由不过102票的多数票决定的,由此可见,秩序党从1月18日以来又丧失了27票;它的解体又进了一步。同时,为了使人不致对它和山岳党联合的用意发生丝毫怀疑,它甚至对189名山岳党人所署名提出的关于大赦政治犯的议案不屑一顾。只要那个叫作瓦伊斯的内务部长出来声明说,安宁只是表面的

安宁,有人在加紧进行秘密鼓动,到处都有人组织秘密团体,民主报纸又准备重新出版,从各省传来不利的消息,日内瓦的流亡者正在主持一个通过里昂遍及法国南部全境的阴谋活动,法国处于工商业危机的前夜,鲁贝市的厂主们缩短了工作时间,贝勒岛¹²⁷的囚犯已经骚动起来——只要瓦伊斯这么一个人唤来赤色幽灵,秩序党不经讨论就立刻否决一个将使国民议会获得极大的声望并迫使波拿巴重新投入它的怀抱的提案。秩序党本来不应当被行政权所描绘的新骚动的远景吓住,而应当让阶级斗争有些活动余地,以便把行政权控制在从属于自己的地位。可是,秩序党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担负这种玩火的任务。

可是,所谓的过渡内阁却一直勉强维持到4月中旬。波拿巴不断地以组织新内阁的把戏来搅扰和愚弄国民议会,他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有拉马丁和比约参加的共和党内阁,时而表示要组织一个不免要有奥迪隆·巴罗(凡是需要有个易于愚弄的蠢才时总是少不了他)参加的议会制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瓦蒂梅尼尔和贝努瓦·达济参加的正统派内阁,时而又表示要组织一个有马尔维尔参加的奥尔良派内阁。波拿巴用这种方法使秩序党各派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并以共和党内阁的出现以及因此必然会使普选权恢复的远景来恫吓整个秩序党,同时他又竭力让资产阶级相信,他组织议会制内阁的真诚努力由于保皇派集团的不调和态度而受挫。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越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越响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越是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商业萧条日益加重,失业者显著增多,巴黎至少有10 000工人没有饭吃,在鲁昂、米卢斯、里昂、鲁贝、图尔宽、

圣艾蒂安、埃尔伯夫等地,无数的工厂停了工。在这种情况下,波拿巴就敢于在4月11日恢复了1月18日的内阁,除了鲁埃、富尔德、巴罗什及其他先生们而外,还添进了莱昂·福适先生,这个福适先生曾因散发伪造的电讯而被制宪议会在最后几天一致(除五个内阁阁员外)投了不信任票。这样,国民议会在1月18日取得了对内阁的胜利,它和波拿巴斗了三个月,只不过是為了在4月11日让富尔德和巴罗什能够把清教徒福适当作第三者接受到自己的内阁同盟中去而已。

1849年11月,波拿巴满足于非议会制内阁,1851年1月他满足于超议会制内阁,而到4月11日,他已经觉得有充分的力量来组织一个反议会制内阁了,这一内阁把两个议会——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即共和派议会和保皇派议会所表示的不信任协调地结合在自己身上。内阁的这种演变,是议会可以用来测定其体温下降的温度计。这种体温到4月底已经降得非常之低,甚至佩尔西尼能够在私人谈话中建议尚加尔涅投到总统方面去。他向尚加尔涅保证:波拿巴认为国民议会的势力已经彻底消灭,并且已经拟定了预备在政变后发表的宣言,这个政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又延迟下来。尚加尔涅把这个讣告通知了秩序党的首领们。但是谁会相信臭虫咬人能致人于死命呢?议会虽然已经虚弱无力,完全瓦解,奄奄一息,但是它毕竟还不能使自己把和十二月十日会的小丑一般的头子的决斗看作一种不同于和臭虫的决斗。然而波拿巴像阿革西拉乌斯回答国王亚奇斯那样回答了秩序党:“你把我看作蚂蚁,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¹²⁸

六

秩序党在徒劳地力图保持军权和夺回已经丧失的对于行政权的最高领导权时，不得不去跟山岳党和纯粹共和党人进行联合，这就确凿地证明，秩序党已经失去了独立的**议会多数**。仅仅是日历的力量、钟表的时针，在5月28日发出了秩序党彻底瓦解的信号。5月28日是国民议会生命的最后一个年头的开始。国民议会现在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原封不动地保存宪法呢，还是把它加以修改。但是，修改宪法就不只意味着是资产阶级统治还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统治，是民主主义还是无产阶级无政府状态，是议会制共和国还是波拿巴，而且意味着是奥尔良王朝还是波旁王朝！这样，在议会内部就出现了厄里斯的金苹果，秩序党内利益彼此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将围绕着它展开公开的斗争。秩序党是各种不同社会成分的结合体。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

波拿巴派关心修改宪法的原因很简单。他们首先想废除禁止再度选举波拿巴的第45条和延长他的权力期限。共和派的立场也很简单。他们无条件地反对任何修改，认为修改宪法是反对共和国的周密的阴谋。因为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拥有 $\frac{1}{4}$ 以上的票数，而依照宪法又必须要有 $\frac{3}{4}$ 的票数赞成才能合法地决定修改宪法和召集修改宪法

的专门会议，所以他们只要计算一下自己的票数，就可以相信自己必获胜利了。他们当时确实是相信自己一定要胜利的。

和这些明显的立场相反，秩序党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中。如果它拒绝修改宪法，它就会使现状受到威胁，因为这样就会使波拿巴只有使用暴力一个出路，并且会使法国在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这个决定时刻听任革命的无政府状态摆布，那时，总统是失去了权力的总统，议会是早已没有权力的议会，人民则是企图重新争得权力的人民。如果它投票支持按照宪法修改宪法，那么它知道它的表决是枉然的，它的表决一定会被共和派按照宪法进行的否决所推翻。如果它违背宪法而宣布说只要有简单多数通过就够了，那么它就只有在在自己完全服从行政权的条件下才能希望制服革命；这样它就把宪法、宪法的修改和它本身一并交给波拿巴掌握了。为延长总统权力而作局部的修改，将为帝制派篡夺权力开辟道路。为缩短共和国寿命而作全面的修改，又必然会引起各个王朝的要求之间的冲突，因为波旁王朝复辟的条件和奥尔良王朝复辟的条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议会制共和国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他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作为保皇派，他们又重新陷入他们旧有的对抗状态，卷入地产和金钱争夺霸权的斗争，而这种对抗状态的最高表现，这种对抗状态的化身，就是他们各自的国王，他们各自的王朝。正因为如此，秩序党总是反对召回波旁王族。

奥尔良派的人民代表克雷通，在1849年、1850年和1851年曾

定期地建议废除放逐王族的法令。议会同样定期地表演保皇派集会顽强地阻挡其被逐国王返国的场面。理查三世在杀死亨利六世以前曾对他说,他太好了,这个尘世容纳不了他,他的位置在天上^①。保皇派认为法国太坏了,不能再有自己的国王。形势迫使他们成为共和派并屡次批准人民作出的把他们的国王逐出法国的决定。

修改宪法(而这个问题由形势所迫又非讨论不可)不仅会使共和国成为问题,而且会使资产阶级两派的共同统治成为问题;不仅会使君主国有恢复的可能,而且会复活曾在君主国中轮流占有特权地位的那些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复活资产阶级两派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秩序党的外交家们希望以两个王朝的结合,即以各个保皇派和它们的王室的所谓融合来中止这一斗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真正融合便是议会制共和国,在这一共和国中,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双方的色彩都脱落了,各类的资产者都消融为一般的资产者,消融为资产者这个类属了。现在奥尔良派应当变成正统派,正统派应当变成奥尔良派。体现着他们的互相对抗的君主国,应当成为他们彼此统一的化身;他们互相排斥的派别利益的表现,应当成为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利益的表现;君主国应当完成只有废除两个君主国,只有共和国才能完成和已经完成的任务。这就是秩序党的术士们绞尽脑汁制造出来的哲人之石。仿佛正统派的君主国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工业资产者的君主国,或是资产者王权可能在什么时候变成世袭土地贵族所拥有的王权。仿佛地产和工业能够在一顶王冠下面称兄道弟,可是王冠只能落到一个人头上——不是落到哥哥头上,就是落到弟弟头上。仿佛在地产还没有决心自动变成工业财产以前,工业可以完全和地产和

^①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1幕第2场。——编者注

解。如果亨利五世明天逝世，巴黎伯爵仍然不会成为正统派的国王，除非他不再作奥尔良派的国王。但是，从事融合的哲人随着宪法修改问题被提到首位而自我膨胀起来，把《国民议会报》变成自己的正式的机关日报，并且现在（1852年2月）又在努力活动——这些哲人认为一切困难都是由于两个王朝的对抗和竞争。想使奥尔良王室和亨利五世和解的企图，从路易-菲力浦逝世时就已经开始，但这种企图也像只是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在幕间小节目中，在后台进行的一切王朝阴谋一样，与其说是郑重的事情，不如说是对旧日迷信的卖弄风情，这种企图现在已经变成大型政治历史剧，秩序党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把它当作票友戏，而是把它搬上公开的舞台。信使不断从巴黎奔到威尼斯^①，再从威尼斯奔到克莱尔蒙特，又从克莱尔蒙特奔到巴黎。尚博尔伯爵发表了一个宣言，他在这个宣言中“靠他全家族的支持”，宣布“国民的”、而不是他自己的复辟。奥尔良派的萨尔万迪跪倒在亨利五世脚下，正统派的首领贝里耶、贝努瓦·达济和圣普里跑到克莱尔蒙特去劝说奥尔良王室，但是徒劳无功。融合派在太晚的时候才觉察到，资产阶级两派的利益既然集中地表现为家族利益即两个王室的利益，那么它们的利益就会互相排斥，而不会互相通融。假定亨利五世承认巴黎伯爵是他的继承人（这是融合派在最好的场合所能指望的唯一成就），那么奥尔良王室除了因亨利五世没有后嗣本来就一定能够获得的东西外，并不会得到别的权利，可是它会因此丧失它从七月革命获得的一切权利。奥尔良王室将放弃自己旧日的要求，放弃它在差不多100年的斗争中从波旁王室长系手里夺得的一切权利，它将要为了宗族的特权而放弃自己的历史特权，即现代君主国的特

^① 19世纪50年代为尚博尔伯爵的驻地。——编者注

权。所以，融合无非就是奥尔良王室自愿退让，向正统派让权，忏悔地从新教国教后退到天主教国教。这种后退甚至不可能把奥尔良王室送上它所失去的王位，而只能把它送上它诞生时所占据的王位的台阶。旧日的奥尔良派阁员基佐、杜沙特尔等人，也赶快跑到克莱尔蒙特那里去为融合游说，实际上他们只是表现了七月革命后的沮丧，表现了对资产者王权和资产者所拥有的王权的失望，表现了对正统派的迷信，把它作为防止无政府状态的最后的护符。他们自命为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之间的调停者，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奥尔良派的变节分子，而茹安维尔亲王就是把他们当作这种人来看待的。然而，奥尔良派富有生命力的、好战的那部分人，如梯也尔、巴兹等，却因此更容易使路易-菲力浦家族确信，既然君主制的任何直接的复辟都要以两个王朝的融合为前提，而任何这样的融合又都要以奥尔良王室引退为前提，那么，暂且承认共和国，等到事变允许把总统的安乐椅变成王位时再说，这样做是和他们先辈的传统完全相适合的。起初有传言说茹安维尔要当共和国总统的候选人，公众的好奇心被激发起来了，过了几个月，到9月间，在宪法修改案已被否决以后，这个候选人就被公开宣布了。

这样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之间搞保皇主义融合的企图，不仅遭到了失败，而且还破坏了他们在议会中的融合，破坏了把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和国形式，把秩序党又分解成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但是，克莱尔蒙特和威尼斯之间越是疏远，它们之间的关系越是近于决裂，有利于茹安维尔的煽动越是加紧，波拿巴的内阁阁员福适和正统派之间的谈判，也就越是热烈，越是认真了。

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原来的构成部分。这两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先前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

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了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正统派在梦中回味土伊勒里宫和马松阁之间的争吵、维莱尔和波林尼雅克之间的争吵¹²⁹。奥尔良派重温基佐、摩莱、布罗伊、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之间比武的黄金时代。

秩序党中有一部分人赞成修改宪法,可是对于修改的范围,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在这一部分人中,有贝里耶和法卢为一方所领导和拉罗什雅克兰为另一方所领导的正统派,有摩莱、布罗伊、蒙塔朗贝尔和奥迪隆·巴罗领导的那些在斗争中疲倦了的奥尔良派;这一部分人和波拿巴派的议员一致提出了如下一个含义广泛而不明确的建议:

“下面署名的议员建议把宪法加以修改,目的在于把完全实现国民主权的可能性还给国民。”

同时,这些议员通过自己的报告人托克维尔一致声称:国民议会无权建议**废除共和国**,这个权利只能属于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议会。此外,他们声称,宪法只能在“合法的”基础上,就是说,只有在按照宪法规定的 $\frac{3}{4}$ 的多数票赞成修改时才能修改。经过六天的激烈讨论之后,7月19日,宪法修改案果然被否决了。赞成修改的有446票,反对修改的有278票。极端的奥尔良派梯也尔、尚加尔涅等人在表决时和共和派及山岳党采取了一致行动。

这样,议会的多数表示反对宪法,而宪法本身却表示拥护议会的少数,认为议会少数的决议具有约束力。可是,秩序党在1850年5月31日和1849年6月13日岂不都曾经把议会多数置于宪法之上吗?

它以前的全部政策岂不都是以宪法条文服从议会多数决议为基础的吗？它不是曾经让民主派以迷信旧约的态度去对待法律的字眼，并因为这种迷信而处罚了民主派吗？可是目前，修改宪法无非就是要延长总统掌权的期限，而延长宪法的寿命无非就是要罢免波拿巴。议会表示拥护波拿巴，但是宪法表示反对议会。所以，当波拿巴撕毁宪法时，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而当他解散议会时，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

议会宣布宪法，同时也就是宣布议会本身的统治处在“多数之外”；议会以自己的决议废除了宪法，延长了总统掌权的期限，同时也就是宣布说，当它本身还继续存在时，宪法既不能死亡，总统的权力也不能生存。它未来的掘墓人已经站在门前了。当议会正忙于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时，波拿巴撤销了表现得不坚决的巴拉盖·狄利埃将军第一师指挥官的职务，任命马尼昂将军继任该职，这位将军是里昂的胜利者¹¹¹，十二月事变的英雄，波拿巴的爪牙之一，早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就由于布洛涅征讨事件多多少少地替波拿巴出了丑。

秩序党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表明，它既不能统治，又不能服从；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既不能容忍共和国，又不能推翻共和国；既不能维护宪法，又不能废除宪法；既不能和总统合作，又不能和总统决裂。它究竟是期待谁来解决一切矛盾呢？期待日历，期待事变的进程。它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事变。这样，它就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交给一种力量支配，它在反对人民的斗争中已经向这种力量让出了一个又一个属性，直至它自己在这种力量面前变得毫无权力为止。为了使行政权的首脑能够更顺利地定出对付它的战斗计划，加强自己的进攻手段，选择自己的工具和巩固自己的阵地，秩序党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决定退出舞台，使议会从8月10日到11月4日休会三个月。

不仅议会党分裂为原来的两大集团,不仅其中的每一个集团又各自再行分裂,而且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资产阶级的演说家和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一句话,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资产阶级自己,代表者和被代表者,都互相疏远了,都不再互相了解了。

外省的正统派,由于眼界狭小和过分热情,责备他们的议会领袖贝里耶和法卢投奔波拿巴阵营和背叛了亨利五世。他们的百合花^①的头脑只相信造孽行为,不相信外交手腕。

商业资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家之间的分裂,更加危险,更具有决定的意义。正统派责备自己的政治家背弃了原则,而商业资产阶级却正好相反,责备自己的政治家忠实于已经变得无用的原则。

前面我已经指出,自从富尔德加入内阁以来,那一部分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握有绝大部分权力的商业资产阶级,即**金融贵族**,已经变成波拿巴派了。富尔德不仅在交易所中维护波拿巴的利益,而且也在波拿巴面前维护交易所的利益。关于金融贵族的态度,他们的欧洲机关刊物即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中的一段话作了最贴切的说明。这个杂志在1851年2月1日那一期上发表了如下的巴黎通讯:

“现在我们从各方面都得到证实,法国要求的首先是安宁,总统在他致立法议会的咨文中声明了这一点;国民讲台上也有人响应了这一点;报纸上再三重复说到这一点;教堂的教坛上也宣扬这一点;国家证券对于最小的破坏安宁的事件的敏感以及它们在行政权每次胜利时的稳定,也证明这一点。”

《经济学家》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那一期上以自己的名义宣称:

① 波旁王朝的徽号。——编者注

“在欧洲所有的证券交易所中，总统现在已被公认为秩序的卫士。”

可见金融贵族指责秩序党对行政权进行的议会斗争是破坏秩序，而把总统每次对它那些所谓的代表们的胜利当作秩序的胜利来欢呼。这里所说的金融贵族，应当了解为不只是那些大国债经纪人和大国家证券投机者，这些人的利益当然是和国家政权的利益相吻合的。全部现代金融业，全部银行业，都是和社会信用极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银行的部分营业资本必然要投入容易兑现的国家证券以收取利息。银行存款，即交给银行并由银行在商人和工业家之间分配的资本，有一部分是从国家债权人的红利中得来的。既然在一切时代国家政权的稳定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这种金融市场的牧师们来说是摩西和先知，那么现在，当任何大洪水都有把旧的国家连同旧的国债一并从地面上冲掉的危险时，又怎能不是这样呢？

狂热地渴望秩序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因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行政权发生争吵而感到烦恼。梯也尔、昂格勒斯、圣贝夫等人在1月18日因尚加尔涅免职事件投票以后，也受到他们的选民们（而且正是工业区的选民）的公开谴责，特别是他们跟山岳党成立联盟的行为被指斥为背叛秩序。如果说，像我们所已经看到的，秩序党和总统的斗争不过是些言过其实的嘲弄和琐屑无聊的攻讦，不配受到好的待遇，那么，另一方面，对这部分要求自己的代表们顺从地把军权从自己的议会手中奉送给冒险的王位追求者去掌握的资产阶级，就连那些曾为他们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攻讦手段也不值得采取了。这部分资产阶级表明，为了保持他们的公共利益、他们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的政治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是有碍于他们私人的事情的，因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痛苦和烦恼。

当波拿巴巡游各地时，外省城市的资产阶级显贵、市政官员、商业法庭的法官等等，到处都几乎毫无例外地以极卑屈的态度迎接他，甚至当他在第戎公开地攻击国民议会，特别是攻击秩序党的时候，也是这样欢迎他。

当商业情况良好的时候（1851年初还是这样），商业资产阶级狂暴地反对任何议会斗争，生怕这种斗争会使商业吃亏。当商业情况不好的时候（从1851年2月底起已成为经常现象了），商业资产阶级就抱怨议会斗争是商业停滞的原因，并要求为了活跃商业停止这种斗争。关于修改宪法的讨论恰好发生在这种不好的时期。因为当时涉及到现存国家制度的生死存亡问题，所以资产阶级就更有理由要求它的代表们终止这种痛苦的过渡状态，同时又保持现状。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它所理解的终止过渡状态，正是延长过渡状态，将应当作出决断的时刻拖延到遥远的将来。保持现状只能有两种方法：一是延长波拿巴掌权的期限，一是让波拿巴按照宪法辞职，选出卡芬雅克来。一部分资产阶级倾向于后一种解决方法，可是他们除了叫他们的代表保持沉默，不去触动这个迫切的问题以外，提不出更好的建议。他们以为，如果他们的代表不出来讲话，波拿巴就不会行动了。他们希望有一个为了不让人看见而把头藏起来的鸵鸟议会。另一部分资产阶级希望让已经坐在总统位子上的波拿巴留任总统，一切照旧不变。他们感到愤慨的，是他们的议会不愿意公开违背宪法和率直地放弃权力。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从8月25日起召开的各省委员会（资产阶级的地方代议机关），几乎一致表示赞成修改宪法，即反对议会，拥护波拿巴。

资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著作界代表和自己的报纸所表现的愤怒，

比它跟议会代表们的破裂更为明显。只要资产阶级的新闻记者抨击一下波拿巴篡夺权力的欲望，只要报刊企图保护一下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不受行政权侵害，资产者陪审团就判处数额异常巨大的罚款和不光彩的监禁，这种情况不仅使法国，而且使整个欧洲都感到惊愕。

前面我已经指出，议会内的秩序党由于叫嚣要安静而自己也得安静下来，它在反对其他社会阶级的斗争中亲手取消了自己的制度即议会制度的一切条件，从而宣布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同资产阶级的安全和生存是不相容的，相反，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却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从而促使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讲话和写文章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纸，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它能够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它毫不含糊地声明说，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

这个议会外的资产阶级，对于为它本阶级的统治而进行的单纯的议会斗争和文字斗争，就曾表示激愤，并且出卖了这一斗争的领袖人物；但是现在它却敢于在事后责备无产阶级没有为它进行流血斗争，进行殊死的斗争！这个资产阶级时刻都为最狭小最卑鄙的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全阶级的利益即政治利益，并且要求自己的代表人物也作同样的牺牲；但现在它却哀叫无产阶级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它的理想的政治利益。它装得像个好心肠的人，被社会主义者引入歧途的无产阶级不了解它，并且在紧要关头抛弃了它。它的这种哀叫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中得到了普遍的赞赏。自然，这里我不是指德国那些小政客和浅学之辈。我指的是例如《经济学家》那个杂志。

这个杂志在1851年11月29日，即政变前四天还宣布波拿巴是“秩序的卫士”，而梯也尔和贝里耶是“无政府主义者”，在1851年12月27日，在波拿巴驯服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它又大叫大喊，说什么“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愚蠢、无知和卑鄙的一群不是别人，正是资产阶级本身。

的确，法国在1851年是遭受了一次小小的商业危机。2月底，出口比1850年减少了；3月，商业衰落，工厂关闭；4月，各工业省的情况好像和二月事变后一样令人失望；5月，情况还没有好转；6月28日法兰西银行的结算还是以存款数量猛增和贴现数量锐减表明了生产的停滞；直到10月中旬，情况才逐渐好转。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的国家形式的不稳定，由于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⁸³的可怕远景。我并不否认所有这些情况都对巴黎和各省的某些工业部门的衰落有影响。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政治局势的影响只是局部的，而且是很微小的。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来霹雳的时候，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虽然法国的资产者所具有的“才能、知识、洞察力和智力源泉”越不出他们自己的鼻尖，但是他们在伦敦工业博览会¹³⁰整个会期内总能用鼻子触到自己的商业情况不利的原因吧。当法国工厂关闭的时候，英国爆发了商业破产。法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是工业恐慌，而英国在4月和5月达到顶点的则是商业恐慌。无论是在法国或英国，毛纺织业和丝纺织业的情况都很不妙。虽然英国的棉纺织工厂还在继续生产，但是它们所获得的利润已不像1849年和1850年那样大了。不同点只在于法国发生的是

工业危机，而英国发生的则是商业危机；法国是工厂关闭，而英国则是生产扩大，不过是在不如前几年那样顺利的条件下扩大的；在法国，受打击最重的是出口，在英国是进口。其共同原因（当然不应在法国政治地平线的范围内去寻找）是显而易见的。1849年和1850年是物质大繁荣和过度生产的两个年头，这种过度生产本身直到1851年才显露出来。这年年初，过度生产因工业博览会即将举行而特别加重了。除此以外，还有下面一些特殊情况：起初是1850年和1851年的棉花歉收，然后是人们确信棉花的收成会比预期的好，棉价起初是上涨，后来突然跌落，——一句话，就是棉价涨跌不定。生丝产量至少在法国是低于中等产量。最后是毛纺织业自1848年以来飞速发展，使得羊毛的生产跟不上去，而原毛的价格上涨与毛纺织品的价格相比非常不相称。这样，我们就在上述三个世界性工业部门所需的原料方面找到引起商业停滞的三重原因。除了这些特殊情况以外，1851年的表面上的危机，无非是在过度生产与过度投机还未用尽所有力量疯狂地跑过工业循环的最后阶段并重新回到自己的出发点——即回到**普遍的商业危机**去以前，在工业循环中经常与它们相伴而生的一种停顿。在商业史上的这种间隙时期中，英国发生了商业的破产，而法国却是工业本身陷于停顿，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业已经经受不住英国人的竞争而被排挤出所有的市场，另一方面是由于法国工业是奢侈品工业，每当出现商业的停滞，它都首当其冲。这样一来，法国除了普遍危机之外，还经受本国的商业危机，不过，这种商业危机为世界市场一般情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程度，比它受法国地方影响决定和制约的程度要大得多。这里不妨把英国资产者的推断拿来和法国资产者的偏见对比一下。利物浦的一家大商行在1851年度的商业报告中写道：

“很少有哪一年像刚刚过去的这一年这样辜负年初对它所寄托的希望了。这一年不但没有大家一致预期的大繁荣，反而成了最近 25 年来最令人沮丧的年头。这自然只是对商业阶级，而不是对工业阶级而言。可是，在这年年初，无疑是有可靠的根据来预期相反的情形：产品贮藏很少，资本充足，食品价格低廉，秋季丰收在望；在大陆有稳固的和平，在本国又没有任何政治上或财政上的困难，的确，看来商业是完全可以展翅高飞的…… 这一不幸的结果究竟应归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应归罪于进出口贸易额过分庞大。如果我们的商人自己不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较狭小的范围内，那么，除了三年一度的恐慌以外，什么东西也不会使我们保持均衡。”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法国资产者在这种商业恐慌中的情形：他们的生意经的病态头脑每天都被这样一些东西所折磨、搅扰和麻痹，这就是关于政变和恢复普选权的种种谣传、议会和行政权的斗争、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的攻讦、法国南部共产主义的密谋活动、涅夫勒省和谢尔省臆想的农民起义、各个总统候选人的自吹自擂、报纸上各种大肆宣扬的口号、共和派要以武力保卫宪法和普选权的威胁、流亡国外的英雄们预告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将是世界末日的文告，——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者在融合、修改、延期、宪法、密谋、联合、亡命、篡权和革命等难以形容的喧嚣的混乱中气急败坏地向自己的议会制共和国喊道：“没有终结的恐怖，还不如有的恐怖的终结！”

波拿巴懂得这种喊声。由于债权人急躁难耐的情绪日益增长，他的理解力更加敏锐了，这些债权人发觉，太阳每一落山，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天即 1852 年 5 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就愈益接近，这是天上星辰的运动在反对他们的地上的票据。债权人变成了真正的占星家了。国民议会使波拿巴丧失了靠宪法来延长其掌权期限的希望，茹安维尔亲王的候选人资格已不允许他再犹豫动摇了。

如果说有过什么事变在它尚未到来之前老早就把自己的影子先

投射过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波拿巴的政变了。波拿巴早在1849年1月29日,即在他当选刚过一个月的时候,就已向尚加尔涅提出了这种建议。关于政变的政策,他自己的内阁总理奥迪隆·巴罗在1849年夏天委婉地谈到过,而梯也尔则在1850年冬天公开地揭露过。1851年5月,佩尔西尼曾经再度企图取得尚加尔涅对于政变的赞助,而《国民议会通报》公布了这些谈判。每逢议会发生风波时,波拿巴派的报纸就以政变相威胁;危机越是接近,它们的声调就越放肆。在波拿巴每夜和打扮成绅士淑女的骗子举行的狂宴上,一到午夜,当豪饮使他们畅谈起来并激起他们的幻想时,政变总是指定在第二天早晨举行。剑拔出来,酒杯相碰,议员被抛出窗外,皇袍加在波拿巴身上,而一到早晨,幽灵便又消失,吃惊的巴黎从直率的修女和不慎重的武士们的口里才知道它又度过了一次危险。在9月和10月两个月间,关于政变的谣传一刻也没有停息过。影子像彩色的银版像片一样已蒙上了各种色彩。只要翻一翻9月和10月的欧洲报纸,就可以找到这类情况的报道:“巴黎到处流传着政变的谣言。听说首都今天夜间就要被军队占领,而明天早晨就会有解散国民议会、宣布塞纳省戒严、恢复普选权并诉诸人民的法令出现。听说波拿巴正在寻找阁员来执行这些非法的法令。”提供这些消息的报道总是以不祥的“延期”一语结束。政变始终是波拿巴的固定观念。他是抱着这个观念重回法国的。他为这个观念所控制,以致经常流露于言谈之间。他十分软弱,因此又经常放弃这个观念。对巴黎人来说,这个政变的影子像幽灵一样习以为常,以致最后当这个政变有肉有血地出现时,巴黎人还不愿意相信它。可见,政变之所以成功,根本不是由于十二月十日会的头子严守秘密和国民议会方面受到没有预料到的袭击。不管波拿巴怎样泄露秘密,不管国民议会怎样事先完全知悉内情,这个政变都是会

成功的，因为这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且不可避免的结果。

10月10日，波拿巴向内阁阁员们宣布他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6日内阁阁员辞职；10月26日巴黎知道了托里尼内阁组成的消息。同时，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由莫帕代替，而第一师师长马尼昂把最可靠的团队调到了首都。11月4日国民议会宣布复会。国民议会除了把它已学过的课程按简单扼要的提纲复习一遍并表明它只是在死后才被埋葬之外，是别无他事可做了。

国民议会在和行政权斗争时所失掉的第一个阵地就是内阁。国民议会不得不以完全承认纯系摆样子的托里尼内阁而庄严地承认这个损失。当日罗先生以新内阁名义向常任委员会作自我介绍时，常任委员会报之以嘲笑。这么一个软弱的内阁竟敢来执行像恢复普选权这样强硬的措施！可是，全部问题正是在于什么事情也不通过议会，一切事情都违背议会。

国民议会在它复会的当天就接到了波拿巴的咨文，在咨文中他要求恢复普选权和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当天他的阁员们就提出了这种内容的法令。国民议会立即否决了阁员们的紧急提案，而在11月13日以355票对348票否决了这个法律本身。这样，议会就再度撕毁了自己的委任状，又一次证实它已从自由选出的人民代议机关变成了一个阶级的篡权议会，再度承认它自己割断了联结议会头部和国民身躯的肌肉。

如果说行政权建议恢复普选权是表示从诉诸国民议会转向诉诸人民，那么立法权通过它的议会总务官法案则是表示从诉诸人民转向诉诸军队了。国民议会是想通过这个法案来确立自己直接调动军队的权利，确立自己创建议会军的权利。国民议会就这样一方面指定军队来充当自己和人民之间、自己和波拿巴之间的仲裁者，承认军队

是国家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它也不得不肯定,它自己早已放弃统率这种力量的要求了。它不是立刻调动军队,而是把自己调动军队的权利当成讨论的题目,这就暴露了它对于自己的力量的怀疑。它否决了议会总务官法案,于是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这个法案因为只得到 108 票的少数而失败了。山岳党决定了它的命运。当时山岳党所处的地位就像布利丹的驴子¹³¹一样,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不是要在两袋干草之间决定哪一边诱惑力更大,而是要在两顿棒打之间决定哪一边打得更痛。一边怕尚加尔涅,另一边怕波拿巴。老实说,这种处境决不是英雄好汉的处境。

11 月 18 日,有人对秩序党提出的市镇选举法提出了一个修正案,规定市镇选举人在选区内居住的期限不是三年,而是一年。这个修正案被仅仅一票的多数否决了,但是立刻就发现这一票是废票。秩序党由于分裂成各个敌对的派别,早就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的议会多数。这时它表明,议会内根本没有什么多数可言了。国民议会丧失了通过决定的能力。已经没有什么聚合力能够把它的原子般的构成部分再结合在一起,它已经断了气,它已经死了。

最后,在大难临头的前几天,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又一次庄严地证实自己已与议会内的资产阶级决裂。梯也尔这个议会英雄特别严重地患了议会迷这个不治之症,他在议会死后还协同国务会议想出了一个新的议会阴谋——制定责任法,把总统牢牢地约束在宪法范围之内。波拿巴在 9 月 15 日巴黎的新的集市大厅举行奠基典礼时,简直像马赞尼洛那样把那些女商贩和卖鱼女人迷惑了一番(不错,一个卖鱼女人的实际力量等于 17 个卫戍官);在议会总务官法案提出之后,他曾使他在爱丽舍宫设宴招待的那些尉官们喜出望外,同样,到了 11 月 25 日,他又把聚会在马戏场想从他手中领取伦敦工业

博览会奖章的工业资产阶级吸引过来了。现在我把《辩论日报》上他的演说中最典型的一段话引录如下：

“这样出乎意料的成绩使我有权再说一遍，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有可能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和改组自己的机构，而不是一再容忍蛊惑者和君主主义幻想的骚扰，那么法兰西共和国该是多么伟大啊。（圆形剧场里到处响起雷鸣般的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君主主义的幻想妨碍任何进步和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没有进步，只有斗争。我们看到，从前热烈拥护国王的权威和特权的人，现在成为国民公会的党徒，只求削弱从普选权中产生的权威。（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们看到，从前吃革命的苦头最多和最怨恨革命的人，现在却煽动新的革命，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要束缚国民的意志……我保证你们将来能得到安宁等等，等等。（“好！好！”暴风雨般的叫好声。）”

工业资产阶级就这样卑屈地鼓掌欢迎了12月2日的政变，欢迎了议会的灭亡，欢迎了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毁灭和波拿巴的独裁。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¹³²报答了11月25日轰隆的鼓掌声，而鼓掌鼓得最起劲的萨兰德鲁兹先生的房子挨的炮弹也最多。

克伦威尔在解散长期国会¹³³时独自一人进入会场，从口袋里拿出表来，为的是不让国会比他所指定的期限多存在一分钟，接着就以愉快的幽默的嘲笑把每一个国会议员赶出会场。拿破仑虽然比他的榜样矮小，但他毕竟在雾月18日跑到立法机关去向它宣读了（虽然是以颤抖的声调）死刑判决书。第二个波拿巴所拥有的行政权无论和克伦威尔或拿破仑所拥有的比起来都完全不同，他不是在世界史册中，而是在十二月十日会的史册中，在刑事法庭的史册中为自己寻找榜样。他从法兰西银行窃取了2500万法郎，用100万法郎收买了马尼昂将军，用15法郎加烧酒收买一个个士兵，他像贼一样夜间偷偷地去跟自己的同谋者相会，命令他们闯入最危险的议会首领们的住宅，把卡芬雅克、拉莫里西埃、勒夫洛、尚加尔涅、沙尔腊斯、梯也

尔、巴兹等人从床上绑架走，用军队占领巴黎各重要据点和议会大厦，第二天一早就在各处墙上张贴广告般的告示，宣告国民议会和国务会议已被解散，普选权已经恢复，塞纳省处于戒严状态。稍后，他就在《通报》上登出了一个伪造的文件，说什么在他周围已聚集了许多议会权威人士，他们已组成一个咨政会。

议会里剩下的人，主要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合在第十区市政厅内开会，反复高呼“共和国万岁！”，决定罢免波拿巴，毫无成效地向站在市政厅门前张望的人群呼吁，直到最后被非洲猎兵押送到多尔塞兵营，然后又装进囚车转送进马扎斯、阿姆和万塞讷等地的监狱。秩序党、立法议会和二月革命的结局就是如此。在抓紧作结论之前，我们且把它们的历史作个简括的概述。

I. 第一个时期，从 1848 年 2 月 24 日起到 5 月 4 日止。二月时期。序幕。普遍友爱的骗局。

II. 第二个时期，共和国成立和制宪国民议会时期。

(1) 从 1848 年 5 月 4 日起到 6 月 25 日止。一切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无产阶级在六月事变中遭受失败。

(2) 从 1848 年 6 月 25 日起到 12 月 10 日止。纯粹的资产阶级共和派专政。起草宪法。宣布巴黎戒严。资产阶级专政因 12 月 10 日波拿巴当选为总统而废除。

(3) 从 1848 年 12 月 20 日起到 1849 年 5 月 28 日止。制宪议会¹对波拿巴以及和波拿巴联合起来的秩序党进行斗争。制宪议会灭亡。共和派资产阶级遭受失败。

III. 第三个时期，立宪共和国和立法国民议会时期。

(1) 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起到 1849 年 6 月 13 日止。小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遭受失败。

(2)从1849年6月13日起到1850年5月31日止。秩序党实行议会专政。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而完成自己的统治,但失去议会制内阁。

(3)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2月2日止。议会资产阶级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a)从1850年5月31日起到1851年1月12日止。议会失去军队总指挥权。

(b)从1851年1月12日起到4月11日止。议会重新支配行政权的企图遭到失败。秩序党失去独立的议会多数。秩序党同共和派和山岳党联合。

(c)从1851年4月11日起到10月9日止。企图修改宪法,融合和延长任期。秩序党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资产阶级议会和资产阶级报刊同资产阶级群众最后决裂。

(d)从1851年10月9日起到12月2日止。议会和行政权公开决裂。议会正在死亡和崩溃,被自己的阶级、军队以及其余各阶级所抛弃。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的统治覆灭。波拿巴获得胜利。对帝制复辟的拙劣可笑的模仿。

七

社会共和国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个词句、作为一个预言出现的。1848年六月事变时,它被扼杀在巴黎无产阶级的血泊中,但是它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戏剧的下几幕中。民主共和国登上了舞台。它在1849年6月13日和它那些四散奔逃的小资产者一同消失了,但是它在逃走时却随身散发了大吹大擂的广告。议会制共和国同资产阶级一起占据了全部舞台,在它的整个生存空间为所欲为,但是1851年十二月二日事件在联合的保皇党人的“共和国万岁!”的惊慌叫喊声中把它埋葬了。①

法国资产阶级反对劳动无产阶级的统治,它把政权送给了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为首的流氓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使得法国一想到红色无政府状态的可怕前景就心惊肉跳,12月4日,当那些为烧酒所鼓舞的秩序军队根据波拿巴的命令对蒙马特尔林荫道上和意大利林荫道上的凭窗眺望的显贵资产者射击的时候,波拿巴就把这一可怕前景贴现给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曾把马刀奉为神,马刀统治了它。资产阶级消灭了革命的报刊,它自己的报刊也被消灭了。它把人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社会共和国和民主共和国失败了,而议会制共和国、保皇派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已经覆灭,同样,纯粹的共和国、资产者共和派的共和国也已经覆灭。”——编者注

民的集会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它自己的沙龙也遭到了警察的监视。它解散了民主派的国民自卫军，它自己的国民自卫军也被解散了。它实行了戒严，戒严也实行到了它头上。它用军事委员会代替了陪审团，它自己的陪审团也被军事委员会代替。它把国民教育置于教士的支配之下，教士也把它置于自己的教育之下了。它不经审判就流放囚犯，它自己也未经审判就被流放了。它以国家权力镇压社会的任何运动，它自己的社会的任何运动也遭到了国家权力的镇压。它因偏爱自己的钱袋而反对自己的政治家和著作家，它的政治家和著作家也被排除了，但是它的钱袋也在它的口被封死和笔被折断后被抢劫了。资产阶级曾不倦地像圣徒阿尔塞尼乌斯对基督徒那样向革命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波拿巴也向资产阶级叫喊道：“Fuge, tace, quiesce! ——快跑，住嘴，安静！”

法国资产阶级早已把拿破仑的“50年后欧洲是共和制的欧洲还是哥萨克式的欧洲”^①这个二难推理给解决了。它以“哥萨克式的共和国”解决了这个二难推理。无需瑟西的魔法就把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杰作变成一个畸形怪物了。这个共和国除了外表的体面之外，什么也没有丧失。今天的法国在议会制共和国中就具有了现成的形态。只要刺刀一戳，水泡就破了，怪物就出现在眼前。^②

① 拉斯卡斯《圣赫勒拿岛回忆录》。——编者注

②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话后面是这样写的：“二月革命的最近的目标是推翻奥尔良王朝和在奥尔良王朝时期当政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到1851年12月2日才达到这个目标。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大量财产，即它的影响的物质基础，被没收了。二月革命后人们所期待的，在12月以后出现了，自1830年以来那些大喊大叫弄得法国精疲力竭的人遭到监禁、流亡、撤职、放逐、缴械、嘲笑。然而在路易-菲力浦时期执政

为什么巴黎无产阶级在12月2日后没有举行起义呢？

当时资产阶级的倾覆还只见之于法令，而法令还没有被执行。无产阶级的任何重大起义都会立刻使资产阶级重新活跃起来，使它和军队协调起来，这样将为工人造成第二个六月失败。

12月4日，资产者和小店主唆使无产阶级起来战斗。当天晚上，

的，只是商业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它的其他派别形成一个王朝反对派和一个共和主义反对派，或者完全站在所谓合法国土之外。只有议会制共和国把商业资产阶级的所有派别吸收到它的国家范围里。另外，在路易-菲力浦时期，商业资产阶级排斥了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只有议会制共和国使他们彼此处于平等地位，让七月王朝和正统王朝联姻并把财产统治的两个时期合而为一。在路易-菲力浦时期，资产阶级的享有特权的部分将其统治隐匿于王冠之下；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资产阶级统治在联合了它的所有的构成部分并把它的帝国扩展为它的阶级的帝国之后，赤裸裸地露出头角。因此，革命本身首先必须创造一种形式，使资产阶级统治在这种形式下可以得到最广泛、最普遍、最彻底的表现，因而也可以被推翻，再也不能站立起来。

直到这时才执行了2月宣布的对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即法国资产阶级中最有生命力的派别的判决。它的议会、律师协会、商业法庭、地方代议机关、公证处、大学、讲坛和法庭、报刊和书籍、行政收入和法院诉讼费、军饷和国家租金，它的精神和肉体被击溃了。布朗基把解散资产阶级自卫军作为向革命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曾经在2月阻挡过革命前进的资产阶级自卫军12月从舞台上消失了，万神殿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的教堂。曾经把资产阶级制度的18世纪的发起人神圣化的魔法也同资产阶级制度的最后形式一起破灭了。当基佐得知十二月二日政变成功时，他宣告：*C'est le triomphe complet et définitif du Socialisme!*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也就是说：这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而完全的灭亡。

为什么无产阶级没有拯救资产阶级呢？这个问题变成另一个问题。”——编者注

国民自卫军的几个联队答应拿着武器穿着军装到战场上来。因为资产者和小店主已经得知波拿巴在12月2日的一项命令中废除了秘密投票,命令他们在正式登记名册上把“赞成”或“反对”写在他们的名字后边。12月4日的抵抗吓坏了波拿巴。夜间他就下令在巴黎各个街口张贴了广告,宣布恢复秘密投票。资产者和小店主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次日早晨留在家里的正是小店主和资产者。

12月1日深夜,波拿巴以突然的袭击使巴黎的无产阶级失掉了它的领袖,失掉了街垒战的指挥者。这支没有指挥官的军队,由于对1848年六月事变、1849年六月事变和1850年五月事变记忆犹新,不愿意在山岳党的旗帜下作战,于是就听凭自己的先锋队即秘密团体去挽救巴黎的起义的荣誉,这种荣誉已被资产阶级如此恭顺地交给兵痞们去蹂躏,以致波拿巴后来能够用一个刻薄的理由解除了国民自卫军的武装:他担心无政府主义者滥用它的武器来反对它自己!

“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基佐曾这样评论12月2日的政变。但是,如果说议会制共和国的倾覆包含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萌芽,那么它的直接的具体结果就是**波拿巴对议会的胜利,行政权对立法权的胜利,无言语的力量对言语的力量的胜利。**^①在议会中,国民将自己的普遍意志提升为法律,即将统治阶级的法律提升为国民的普遍意志。在行政权面前,国民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意志,而服从于他人意志的指挥,服从于权威。和立法权相反,行政权所表现的是国民的他治而不是国民的自治。这样,法国逃脱一个阶级的专

^① 在1852年版中这句话后面还有这样一句话:“这样,旧国家的一种权力首先只是从它自身的局限中解放了出来,变成了无限制的绝对的权力。”——编者注

制,好像只是为了服从于一个人的专制,并且是服从于一个没有权威的人的权威。斗争的结局,好像是一切阶级都同样软弱无力地和同样沉默地跪倒在枪托之前了。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使行政权臻于完备,使行政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之孤立,使之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行政权。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①

这个行政权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50万人的官吏大军和50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互相对抗的中世纪的无限权力的五颜六色的样本转化为确切规定的国家权力的方案,国家权力的工作像工厂一样有分工,又有集中。第一次法国革命所抱的目的是破坏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市的和各省的特殊权力以造成全国的公民的统一,它必须把专制君主制已经开始的事情——中央集权加以发展,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属性和走卒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1幕第5场。——编者注

朝并没有增添什么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这种分工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分工愈益造成新的利益集团,即造成用于国家管理的新材料,而愈益扩大起来。每一种共同的利益,都立即脱离社会而作为一种最高的普遍的利益来与社会相对立,都不再是社会成员的自主行动而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起,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止。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但是在专制君主时代,在第一次革命时期,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官僚不过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进行准备的手段。在复辟时期,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官僚虽力求达到个人专制,但它终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的东西。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种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凌辱了。①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一段是这样写的：“只是在第二个波拿巴统治时期,国家才似乎成了完全独立于社会并对它进行奴役的东西。行政权具有明显的独立性,这时它的首脑不再需要天赋,它的军队不再需要声誉,

虽然如此，国家权力并不是悬在空中的。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

正如波旁王朝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王朝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被农民选中的不是服从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而是驱散了资产阶级议会的那个波拿巴。城市在三年中成功地曲解了12月10日选举的意义和辜负了农民对恢复帝国的希望。1848年12月10日的选举只是在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中才得以实现。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

它的官僚不再需要道义上的权威，便可以合法存在。和市民社会比起来，国家机器已经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它现在竟能以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一个从外国来的、被喝醉了的兵痞拥为领袖的冒险家做首脑，而这些兵痞是他用烧酒和腊肠收买过来的，并且他还要不断地用腊肠来讨好他们。由此便产生了怯懦的绝望和难以表述的屈辱情感，这个情感压住法国的胸膛，不让它自由呼吸。法国觉得自己似乎是被侮辱了。如果说拿破仑还勉强能够给法国留下争取自由的口实，那么第二个波拿巴再也不可能给法国留下受奴役的口实。”——编者注

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人来冒充这个人，只是因为他——根据拿破仑法典规定：“不许寻究父方”——取名为拿破仑。经过20年的流浪生活和许多荒唐冒险行径之后，预言终于实现了，这个人成了法国人的皇帝。侄子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

但是，也许有人会反驳我说：在半个法国不是发生过农民起义吗？军队不是围攻过农民吗？农民不是大批被捕，大批被流放吗¹³⁴？

从路易十四时起，在法国农民还没有“因为蛊惑者的阴谋”而遭到过这样的迫害。

但是，要很好地了解我的意思。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

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力求摆脱其社会生存条件即小块土地的农民，而是想巩固这种条件的农民；不是力求联合城市并以自己的力量去推翻旧制度的农村居民，而相反，是愚蠢地拘守这个旧制度，期待帝国的幽灵来拯救自己和自己的小块土地并赐给自己以特权地位的农村居民。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不是农民的现代的塞文¹³⁵，而是农民的现代的旺代。⁵¹

议会制共和国的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这一过程是在教师和教士的不断斗争的形式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压倒了教师。农民第一次力图对政府的行动采取独立的态度；这表现在镇长和县官之间的不断冲突上。资产阶级撤换了镇长。最后，法国各地农民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曾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产物，即军队。资产阶级用宣布戒严和死刑惩罚了他们。这个资产阶级现在却公然叫喊什么群众是可鄙的群氓，十分愚蠢，说这些群众把它出卖给波拿巴了。它自己曾以暴力加强了农民阶级对帝制的信赖，它曾把这种农民宗教产生的条件保留下来。当群众墨守成规的时候，资产阶级害怕群众的愚昧，而在群众刚有点革命性的时候，它又害怕起群众的觉悟了。

在政变以后发生的各次起义中，一部分法国农民拿起武器抗议他们自己在1848年12月10日的投票表决。1848年以来的教训，使他们学聪明了。但是他们已经投身于历史的地狱，历史迫使他们履行诺言，而大多数农民当时还抱有成见，以致恰恰是在最红的省份

中农村居民公开投波拿巴的票。按照他们的意见，国民议会妨碍了波拿巴的活动。波拿巴只是现在才打破了城市加之于乡村意志的桎梏。有些地方，农民甚至荒唐地幻想在拿破仑身旁建立一个国民公会。

第一次革命把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后，拿破仑巩固和调整了某些条件，保证农民能够自由无阻地利用他们刚得到的法国土地并满足其强烈的私有欲。可是法国农民现在没落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土地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产生了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19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而在这个世纪的过程中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而这个法律正是第二个波拿巴必须维护的“拿破仑观念”中的第一个观念。如果他和农民一样，还有一个错觉，以为农民破产的原因不应在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中去探求，而应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以外，在一些次要情况的影响中去探求，那么，他的实验一碰上生产关系，就会像肥皂泡一样地破灭。

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其他社会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土地的小块化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①农民阶级是对刚被推翻的土地贵族的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几句话：“对农民阶级实行优待本身有利于新的资产阶级制度。这个新造就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制度向城市以外的地区的全面伸延，是资产阶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编者注

普遍抗议。^①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桩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19世纪的过程中，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债务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国债的年债息。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1600万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居住在洞穴中，大部分的洞穴只有一个洞口，有的有两个小洞口，最好的也只有三个洞口。而窗户之于住房，正如五官之于脑袋一样。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拿破仑法典现在至多也不过是一个执行法庭判决、查封财产和强制拍卖的法典。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400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游民、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500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农村，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

^① 在1852年版中这之后还有如下一句话：“如果说它首先受到优待。那么它还首先为封建领主的复辟提供了进攻点。”——编者注

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秩序。这种“物质秩序”也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口号。

小块土地除了肩负资本加于它的抵押债务外，还肩负着赋税的重担。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一句话，它是行政权整个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一回事。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各种关系和个人的划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各个部分发生划一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全面介入。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体面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①。拿破仑借助于他用刺刀开辟的新市场，借助于对大陆的掠夺，连本带利一并偿还了强制性赋税。这种赋税曾是刺激农民发展产业的手段，而现在赋税却使这些产业失去最后的资源，失去抵御贫穷化的最后的可能性。大批衣着华贵和脑满肠肥的官僚，是最符合第二个波拿巴心意的一种“拿破仑观念”。既然波拿巴不得不创造一个和社

^①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段话：“在拿破仑时期，这一大批政府人员不仅仅直接提供生产成果，因为他们在公共工程等等的形式下采用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新形成的农民阶级做出了资产阶级在私人产业的道路上还不可能做出的事情。国家赋税是维持城市和农村之间交换的必要的强制手段，否则，小块土地所有者就会像在挪威和瑞士的一部分地区那样由于农民的自给自足而破坏同城市的联系。”——编者注

会各真实阶级并列的人为等级,而对这个等级说来,保存他的制度又如同饭碗问题一样地迫切,那么,事情又怎能不是这样呢?正因为如此,他的最初的财政措施之一就是要把官吏薪俸提高到原来的水平,并添设了领干薪的新官职。

另一个“拿破仑观念”是作为政府工具的教士的统治。可是,如果说刚刚出现的小块土地由于它和社会相协调,由于它依赖自然力并且对从上面保护它的权威采取顺从态度,因而自然是相信宗教的,那么,债台高筑、同社会和权威反目并且被迫超出自己的有限范围的小块土地自然要变成反宗教的了。苍天是刚才获得的一小块土地的相当不错的附加物,何况它还创造着天气;可是一到有人硬要把苍天当作小块土地的代替品的时候,它就成为一种嘲弄了。那时,教士就成为地上警察的涂了圣油的警犬——这也是一种“拿破仑观念”^①。对罗马的征讨下一次将在法国内部进行,不过它的意义和蒙塔朗贝尔先生所想的¹³⁶刚刚相反罢了。

最后,“拿破仑观念”登峰造极的一点,就是军队占压倒的优势。军队是小农的光荣,军队把小农造就成为英雄,他们保护新得的财产免受外敌侵犯,颂扬他们刚获得的民族性,掠夺世界并使之革命化。军服是他们的大礼服,战争是他们的诗篇,在想象中扩大和完整起来的小块土地是他们的祖国,而爱国主义是财产观念的理想形态。可是,现在法国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所要对付的敌人,已不是哥萨克,而是法警和税吏了。小块土地已不是躺在所谓的祖国中,而是存

①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和拿破仑时期不同,在第二个波拿巴时期地上警察的使命不是监视城市里的农民体制的敌人,而是监视农村里的波拿巴的敌人。”——编者注

放在抵押账簿中了。军队本身已不再是农民青年的精华，而是农民流氓无产阶级的败类了。军队大部分都是招募来的新兵，都是些替手，正如第二个波拿巴本人只是一个招募来的人物，只是拿破仑的替手一样。现在军队是在执行宪兵职务围捕农民时树立英雄业绩的；所以，如果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在其制度内在矛盾驱使下到法国境外去用兵，那么军队在干了几桩强盗勾当后就不是获得光荣，而是遭到痛打了。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切“拿破仑观念”都是不发达的、青春年少的小块土地所抱的观念；对于已经衰老的小块土地说来，这些观念是荒谬的，它们只是它临死挣扎时的幻觉，只是变成了空话的词句，只是变成了幽灵的魂魄。但是，为了使法国国民大众解脱传统的束缚，为了使国家权力和社会之间的对立以纯粹的形态表现出来，一出模仿帝国的滑稽剧是必要的。随着小块土地所有制日益加剧的解体，建立在它上面的国家建筑物将倒塌下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只能在和封建制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军事官僚政府机器的废墟上建立起来^①。

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¹³⁷，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

① 在1852年版中没有最后这两句话，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打碎国家机器丝毫不会危及中央集权制。官僚政治不过是中央集权制还受其对立物即封建制度累赘时的低级和粗糙形态。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编者注

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法律。①

显然,资产阶级现在除了投票选举波拿巴之外,是再没有别的出路了。②当清教徒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¹³⁸上诉说教皇生活淫乱并悲叹必须改革风气时,红衣主教皮埃尔·大利向他们大声喝道:“现在只有魔鬼还能拯救天主教会,而你们却要求天使!”法国资产阶级在政变后也同样高声嚷道:现在只有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还能拯救资产阶级社会!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波拿巴作为一种已经成为独立力量的行政权,自命为负有保障“资产阶级秩序”的使命。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秩序的力量是中间阶级。所以他就自命为中间阶级的代表人物,并颁布了相应的法令。可是,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人物,只是因为他摧毁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摧毁这个中间阶级的政治力量。所以他又自命为中间阶级的政治力

① 在1852年版中这段话是这样写的:“12月20日和21日大选的谜,要从法国农民的状况中找到解答。这次大选把第二个波拿巴推上西奈山,并不是为了让他去接受法律,而是为了让他去颁布和执行法律。的确,法国民族在那些灾难的日子里犯了反对民主主义的滔天大罪。民主主义跪倒在地,每天祷告:神圣的普选权,求您帮帮我们!普选权的信奉者自然不愿意放弃一种神奇的力量,因为它可以使他们成就大业,可以把第二个波拿巴变成拿破仑,把扫罗变成保罗,把西门变成彼得。国民精神通过选票箱对他们说话,就像先知以西结对枯干的骸骨说话:‘Haec dicit dominus deus ossibus suis: Ecce, ego intromittam in vos Spiritum et vivetis.’‘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编者注

② 在1852年版中这后面还有如下一句话:“专制或者无政府主义,它自然投票赞成专制。”——编者注

量和著作力量的敌人。可是，既然他保护中间阶级的物质力量，那么也就不免要使这个阶级的政治力量重新出现。因此必须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但是，原因和结果总不免有某些混淆，因为原因和结果在相互作用中不断丧失自己独特的标志。于是就有抹掉界限的新法令出现。同时波拿巴认为自己和资产阶级不同，他自命为农民和一般人民的代表，想使人民中的下层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内得到幸福。于是就有一些预先抄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¹³⁹的治国良策的新法令出现。但是波拿巴首先觉得自己是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代表。他本人、他的亲信、他的政府和他的军队都属于这个阶级，而这个阶级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能生活得舒服，是从国库中抽取加利福尼亚的彩票。于是他就以颁布法令、撤开法令和违反法令来证实他真不愧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

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盲目摸索前进，时而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拉拢另一个阶级，时而侮辱这个阶级，时而又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他这个政府在实际行动上表现的犹豫，和他从伯父那里盲目抄袭来的政府法令的独断果敢的风格形成一种十分可笑的对照。

工业和商业，即中间阶级的事业，应该在强有力的政府治理下像温室中的花卉一样繁荣。于是就让出了无数的铁路承租权。但是波拿巴派的流氓无产阶级是要发财致富的。于是就有事先知悉秘密的人在交易所进行承租权上的投机。但是建筑铁路的资本又没有。于是就强令银行以铁路股票作抵押来发放贷款。但是银行同时应该由波拿巴本人来经营，因此就应该优待银行。于是银行就免除了公布每

周结算的义务，它和政府订立了只对它有利的契约。人民应该有工作。于是就举办公共工程。但是公共工程增加人民的税金。因此必须对食利者下手，把利息由五厘改为四厘半，以此来减低税额。但是必须再给中间等级一些甜头；因此零买酒喝的大众的葡萄酒税增加了一倍，而大批买酒喝的中间等级的酒税却减低了一半。现有的工人团体被解散了，但是许诺将来会出现团体的奇迹。必须帮助农民。于是抵押银行就加重农民债务并加速财产集中。但是必须利用这些银行来从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中榨取金钱。可是没有一个资本家同意这个在法令中没有规定的条件，结果抵押银行也就始终只是一纸法令，如此等等。

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但是，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一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正如吉兹公爵在弗伦特运动时期由于曾把自己的一切财产变成他的党徒欠他的债务而被称为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一样，波拿巴也想做法国最该受感激的人，把法国所有的财产和所有的劳动都变成欠他个人的债务。他想窃取整个法国，以便将它再赠给法国，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以便能够用法国的钱再来购买法国，因为他作为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就不得不收买应归他所有的东西。于是所有一切国家设施，即参议院、国务会议、立法机关、荣誉军团勋章、士兵奖章、洗衣房、公共工程、铁路、没有士兵的国民自卫军司令部以及被没收的奥尔良王室财产，都成了购买对象。军队和政府机器中的每一个位置，都成了购买手段。然而在这种先把法国攫取过来，然后再把它交给法国自己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东西还是在买卖过程中流到十二月十日会的头目和会员的腰包里去的利息。莫尔尼先生的情妇L. 伯爵夫人，对没收奥尔良王室财产一事曾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①（“这是鹰的最初的飞翔”），这句俏皮话，对于这只毋宁说是乌鸦的鹰的每一次飞翔都可以适用。一个意大利的加尔都西会修士曾对一个夸耀地计算自己还可以受用多年的财产的守财奴说过：“Tu fai conto sopra i beni, bisogna prima far il conto sopra gli anni”。^②波拿巴和他的信徒每天都对自己说这句话。为了不致算错年月，他们按分钟来计算。钻进宫廷，钻进内阁，钻进行政机关和军队的上层去的是一群连其中最好的一个也来历不明的流氓，是一群吵吵嚷嚷的、声名狼藉的、贪婪的浪荡者。他们穿着华丽的衣服，装出俨如苏路克的高官显宦那样可笑的庄严的样子。如果人们注意到，韦隆-克勒维尔^③是十二月十日会的道德说教者，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是它的思想家，那么人们对这个会的上层人物就能有个清楚的概念了。基佐主持内阁的时候，曾在一家地方小报上利用这个格朗尼埃作为攻击王朝反对派的工具，并且通常都给他如下的好评：“C'est le roi des drôles”，“这是丑角之王”。如果把路易·波拿巴的朝廷和亲属拿来跟摄政时期¹⁴⁰或路易十五统治时期相提并论，那是不公正的。因为“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④⑤}。

① vol 有“飞翔”和“盗窃”两个意思。

② “你总是计算你的财产，但你最好是先计算一下你的年岁”。

③ 巴尔扎克在其长篇小说《贝姨》中，把克勒维尔描绘为最淫乱的巴黎庸人，这个克勒维尔是以《立宪主义者报》报社主人韦隆博士为模特描摹出来的。

④ 德·日拉丹夫人的话¹⁴¹。

⑤ 在1852年版中本段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卡托为了在极乐世界同英雄相会，宁愿一死！可怜的卡托！”——编者注

波拿巴既被他的处境的自相矛盾的要求所折磨，并且像个魔术师不得不以日新月异的意外花样吸引观众把他看作拿破仑的替身，换句话说，就是不得不每天举行小型的政变，于是他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侵犯一切在 1848 年革命中看来是不可侵犯的东西，使一些人对革命表示冷淡而使另一些人奋起进行革命，以奠定秩序为名而造成真正的无政府状态，同时又使整个国家机器失去圣光，亵犯它，使它成为可厌而又可笑的东西。他模仿特里尔的圣衣¹⁴²礼拜仪式在巴黎布置拿破仑皇袍的礼拜仪式。但是，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¹⁴³顶上倒塌下来。

弗·恩格斯

英 国¹⁴⁴

[I]

英国辉格党¹⁴⁵人的运气大为不佳。帕麦斯顿刚刚因为“没有使英国在欧洲大陆上得到一个同盟者，甚至没有一个朋友”而被撤职¹⁴⁶，关于撤职一事的最初的轰动刚刚平息，整个报界就又掀起了战争叫嚣，并趁机公布了一大堆有关陆军和海军部门管理不善的事例，而这些事例足以毁掉不止一个部。

从1846年以来，各式各样的军事家就把全国的注意力引向一旦同法国发生战争英国被入侵的可能性这个问题上，但是在当时这种战争的危险性是微乎其微的，这些首先发出警报的人的那种唐·吉珂德式的姿态只能令人发笑。特别是黑德将军，他从那时起经常呼吁国家要加强国防，因而落了个不太令人羡慕的名声。当然，在这里也不应当忘记，老威灵顿曾同样认为现有的岸防工事是非常不够的。

不过路易-拿破仑的政变突然使这些争论具有了全新的意义。约翰牛立即感到，法国的军事独裁，对拿破仑第一执政时期的拙劣的模

仿，很可能使法国卷入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对滑铁卢的失败采取报复行动是完全可能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的英雄功绩并不十分辉煌。在开普地区卡弗尔人接连不断地获得胜利，甚至英军在奴隶海岸登陆，尽管使用了欧洲的战术和火炮，也被赤膊上阵的黑人击退，遭到惨痛的失败。¹⁴⁷假如英国军队同在阿尔及利亚受过锻炼的可怕得多的“非洲人”⁸⁸发生冲突，那么他们会有什么下场呢？像路易·波拿巴这样的胆大妄为的冒险家，谁敢担保他不会在一天早晨不通过枯燥的宣战手续，就率领 10—12 艘满载军队的蒸汽舰在许多艘战列舰的护送下出现在英国海岸并向伦敦进军呢？

情况确实很严重。政府立刻下令在南部和东南部沿海的各大港口的入口处构筑新的炮台。但是公众对这件事情也是认真的，并且采取了一种可能会使政府感到极不愉快的方式。人们首先调查了现有力量的情况，结果发现，在这个时候，即使根本不防守爱尔兰，那么能够用来保卫大不列颠的最多不过 25 000 名兵士和 36 门马拉的火炮；至于海军，目前各港口没有一艘大型舰船是准备好启碇去阻击登陆的。人们发现，英国兵的装备使他们的机动性受到极大的限制，而且根本不实用，这点在卡弗尔战争中已经得到证明；同时还发现，他们的武器根本不能和欧洲其他军队的武器相比，任何一个英国兵的枪都简直无法同普鲁士的针发枪或法国射手和猎兵的步枪相比。在海军军需部里曾经发现营私舞弊和玩忽职守的现象非常严重，而所有这一切又被那些发出警报的人和怀有野心的人夸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

这件事似乎将首先触犯英国贵族、食利者和资产者，因为法国人的入侵和可能的占领将使他们首先遭殃。然而不要忘记，英国独立的发展，这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充分发展了的对立通过斗争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likely a manuscript page. The text is dense and appears to be a list or a series of numbered entries, possibly related to a collection or a study. The handwriting is cursive and somewhat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the ink and the angle of the page. The page is numbered 1 at the bottom.

得到缓慢而彻底的解决,这对于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即使英国这种独特的按部就班的发展有时也会成为大陆上暂时获得胜利的革命者的暂时障碍(如 1848 年和更早从 1793 年起),然而从根本上来说,它所具有的革命内容却远远超过大陆上所有这些短暂的斗争所具有的革命内容的总和。当对欧洲的侵占使得法国大革命遭到失败的时候,英国通过蒸汽机变革了社会,夺得了世界市场,一步步地把所有那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阶级从政权中排挤出去,从而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大决战打下基础。拿破仑未能将 15 万人的军队从布洛涅调到福克斯通并在共和国军老兵的援助下占领英国,这对欧洲的整体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复辟时期,当时大陆无条件地交给了贝朗瑞恰如其分地描绘的那些正统主义的米尔米东人¹⁴⁸,而在英国,通过已经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坎宁内阁,老牌反动派托利党¹⁴⁹走向第一次大分裂,开始对英国宪法的逐渐破坏,这种破坏活动从坎宁开始,后来又由皮尔继续,至今仍未终止,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必将导致腐朽建筑物的轰然倒塌。这种对旧的英国制度的破坏和这种破坏所赖以发生的由大工业引起的英国社会的不断变革,在不声不响地继续进行着,而不管当时在大陆上得胜的是革命还是反革命;这种变革虽然缓慢,但却可靠,并且从来没有后退过一步。1848 年 4 月 10 日宪章派的失败³⁴完全是外国政治影响的一次失败,是对外国政治影响的坚决的抵制。推动英国发展的强大力量,不是大陆上的政治动荡,而是普遍的商业危机,是威胁着每个人生存的直接的物质打击。而现在,当无可怀疑的迹象表明,工业资产阶级从政权中最后地排除所有传统阶级,从而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之间进行决战的日子已经迫近的时候,如果这个发展受到阻碍,英国哪怕暂时被 12 月 2 日的掠夺成性的御用军所征

服,那就会给欧洲的整个运动带来最悲惨的后果。只有在英国,工业才达到了囊括整个民族利益和各阶级全部生活条件的规模。工业一方面是工业资产阶级,另一方面是工业无产阶级,而民族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都日益集结在这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的周围。所以,在英国只存在着工业资本家还是工业工人占统治地位的问题,而且正是在英国,存在着能够使现代形式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的土壤,在这种土壤上工业无产阶级一方面具有夺取政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具有使它能够进行全面的革命和彻底地消灭阶级对立的物质手段,即生产力。显然,整个欧洲的无产阶级政党所最关切的问题就是,英国的这种将导致两个工业阶级的对立走向极端尖锐化和导致被压迫阶级最终战胜统治阶级的发展方向,不要因遭受到外国的征服而改变;这种发展的势头不要受到削弱;决战的时刻不要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但是入侵的可能性如何呢?

首先,大不列颠这个国家不包括爱尔兰有 2 200 万居民,包括爱尔兰则有 2 900 万居民,这样的国家不是通过突然的袭击所能占领的。那些发出警报的人举出迦太基¹⁵⁰为例,说迦太基的舰队和陆军都分散在最远的领地,而迦太基的两次失败都是罗马人突然袭击的结果。但是,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完全改变这一点姑且不谈,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在非洲登陆,只是因为在这以前迦太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精锐部队已被消灭,迦太基的舰队已被赶出了地中海,这种突然袭击决不是突然袭击,而是一次非常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正是这次军事行动,十分自然地结束了一场延续很久而在很长时期中终究是罗马占优势的战争。而第三次布匿战争未必能算作战争,这不过是一次强者以十倍优势的力量对弱者的征服,这同拿破仑并吞威尼斯共和国¹⁵¹的情形差不多。但是,现在法国已不是 1797 年的

法国，而英国也不同于当年衰败的威尼斯。

拿破仑曾经认为占领英国至少需要 15 万人。当时英国虽然相对来说有很多可用的士兵，但是人口和工业资源却很少。当前，不管英国人暂时拥有的力量怎样薄弱，然而要想占领英国，至少还需要同样多的人。只要看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任何一支在英国登陆的入侵军队至少需要推进到蒂斯河、泰恩河或者甚至推进到特威德河；它如果停留在比较近的地区，那么各工业区的全部资源仍然是在防御者的手里，而它为了对付防御者不断增加的力量，就不得不去占领从军事观点来看好处很小并且使它的力量过于分散的那些阵地。在上面提到的几条河以南的地区，即英格兰本身，共有 1 600 万居民。为了保证交通线，为了围攻和占领岸防工事以及镇压必然发生的民族起义，必须分兵把守，这样能够在苏格兰边界机动作战的兵力就非常少了。因此，只有不到 15 万人的军队，要想占领英格兰，镇压其境内的起义并应付从苏格兰和爱尔兰方面发动的正规战争，即使指挥十分得当，也是不可设想的。

假定能够用征召新兵和巧妙集中的办法把 15 万人集结在法国北部沿海的某一个地点，这至少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英国一方面抽调塔霍舰队¹⁵²和附近其他停泊场的蒸汽舰，另一方面动员那些停泊在各港口的已拆除武器装备的舰船，就能够在海峡集中相当可观的一批海军兵力；再过一个月，全部蒸汽舰和一部分帆力舰将从大西洋各停泊场以及从马耳他岛和直布罗陀开来。因此，登陆部队必须一次登陆完毕，至少也要分几大批登陆，因为登陆部队同法国的联系迟早要被切断。每次至少需要渡过 5 万人，这样，全军三次就可以渡完。同时，运送军队只能有限地使用军舰，或者根本不能使用军舰，因为军舰必须对付英国舰队的攻击。法国不可能在

6个星期内在本国的海峡港口内集中足以运送5万人及其所必需的火炮和弹药的运输工具,即使对中立船只封港,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征讨每推迟一天,都会给英国带来新的优势,因为英国唯一需要的就是集中舰队和训练新兵的时间。

但是,如果说由于考虑到英国的舰队,不能把15万人的登陆部队分成3批以上登陆,那么任何一个像样的军事家考虑到英国的陆军,都不敢一次率领不足5万人的军队在英国登陆。我们已经看到,在对入侵有利的情况下,英国人仍然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准备;如果认为英国人在这段时间内不会组织起一支在敌人援军赶到以前就能毫不费力地把这支5万人的前卫部队赶到海里去的陆军,那就对英国人太不了解了。必须考虑到,军队只能在瑟堡和布洛涅之间上船,而登陆只能在怀特岛和多佛尔之间进行,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沿海地区之内进行,而这一地区的任何一个地方距离伦敦都不会超过4整天的行程。必须考虑到,上船和登陆取决于风向和潮水;英国舰队将在海峡进行抵抗;因此第一批登陆和第二批登陆之间大约要相隔8天至10天的时间,无论如何不能少于4天,因为大批军队要靠帆力舰来运送,而且这些军队必须在瑟堡和布洛涅之间的整个沿海地区集中;“布洛涅兵营”¹⁵³也不是立即就能建立起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除非一次至少能够运送七八万人,否则是不敢贸然行动的,为此,首先需要弄到运输工具,而这又需要时间。但是征讨每延迟一个星期都会使英国的防御手段比敌人的运输工具和海战手段增长得更快,这就使侵犯者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事情很快就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除非他们一次就把15万人运送过去,否则他们就不敢贸然采取任何行动,并且这15万人即使过去了,也会遇到强烈的抵抗,如果不续派10万人左右的预备队,最后也必遭歼

灭。

总而言之,突然袭击是不能占领英国的。假如整个大陆为了占领英国而联合起来,那么仅仅是制造和获得运输工具就需要一年的时间。而英国却不需要这样长的时间,就可以完成本国沿海地区的防御工事;可以集中起一支海军,其力量将超过大陆各国的所有联合的舰队,从而使这种联合成为不可能;同时,还可以组织起一支陆军,使得任何敌人都不可能在英国土地上停留下来。

正是现在,英国人的民族感比 1815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强烈,而入侵的严重危险更会使这种民族感获得一个全新的高涨。况且,大不列颠的居民并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是毫无军事素质的;当然大城市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大陆上的这些阶级比较起来是很不善于使用火器的,因此也不太适于进行内战。但是总的来说,英国居民还是很有尚武精神的,在他们当中有非常适合于当兵的人。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么多的猎人和偷猎者,即准轻步兵和猎兵;有四五万名机械师和机械工人,他们的素质优于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精选出来的同样数量的人,更适于在军械所工作,在炮兵部队和工兵部队服役。直到靠近苏格兰边界的这个地区地形几乎完全不适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这一地带沟壑纵横,非常适合进行小规模战争。如果说游击战迄今只是在人口比较稀少的地区里取得成功,那么正是英国在受严重袭击的情况下将会证明,在人口非常稠密的地区,例如在几乎到处是迷宫般房舍群的兰开夏郡和西约克郡,游击战能够获得更大的效果。

至于说为了掠夺富有的港口城市和破坏仓库等而进行的突然袭击,显然,目前英国完全有可能遭到这样的袭击。关于防御工事甚至不值得一提。只要斯皮特黑德海峡没有舰船,就能平安进抵南安普敦

港湾的入口处，派遣足够数量的军队登陆，在南安普敦任意征收税捐。看来，伍利奇目前有可能被占领和破坏，但需要使用较大的力量。保卫利物浦的只是一个可怜的炮队，拥有 18 门铁制的没有瞄准装置的海军炮，炮队的勤务由 8 个或 10 个炮手和半个连的步兵担负。但是，除布赖顿以外，英国所有重要的沿海城市都位于海湾的深处或者高居于河流之上，而且都有浅滩和暗礁作为天然的工事，而这些浅滩和暗礁只有当地的领港员才熟悉。谁要是企图在没有领港员引导的情况下通过这些狭窄的、通常只有涨潮时大船才能通过的水道，那么他就会有搁浅的危险，而不会有通过的希望；这样的征讨一旦遇到某种抵抗和一些事先预料不到的微小的阻碍，就会遭到像 1848 年丹麦进攻埃肯弗德¹⁵⁴时的悲惨结局。相反，一两万人乘蒸汽舰在某一个乡村地区突然登陆和对一些地方小城市进行短时间的然而肯定不会有积极成果的掠夺性的征讨，当然是很容易实现的，现在也是绝对无法阻止的。

但是只要塔霍舰队、北美分舰队以及一部分在巴西和非洲之间追捕贩运奴隶的船只的蒸汽舰奉命返回英国，同时使停泊在各军港的、已拆除了武器装备的舰船进入战斗准备，那么所有这些忧虑就会自行消失了。这样就足以防止突然袭击，推迟任何一次重大的入侵行动，从而使英国有时间采取进一步的必要措施。

但是，警报会产生一些良好的后果，使英国放弃那种可笑的政策：在地中海保持 800 门舰炮，在大西洋保持 1 000 门，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各保持 300 门，而在国内却没有一艘军舰保卫沿海地带；当国内极需军队的时候却同黑人和卡弗尔人进行无休止的、不光彩的战争。军队的笨拙、沉重和各方面都很陈旧的武器装备，陆军和海军部门的极端严重的玩忽职守和疲塌作风，在这些部门中普遍存

在的任人唯亲、贪污受贿和营私舞弊，都将得到不同程度的克服。最后，工业资产阶级将摆脱对和平代表大会与和平协会¹⁵⁵的迷恋，这种迷恋使工业资产阶级遭到了许多应得的嘲笑，使它的政治进步以及英国的整个发展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如果战争终于爆发的话，那么，由于众所周知的空前盛行的世界历史的嘲弄，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科布顿和布莱特两位先生必将以和平协会会员和不久将来的大臣的双重身分发动一次很可能以整个大陆为对象的激烈的战争。

1852年1月23日于曼彻斯特

[II]

议会下星期二，2月3日开会。关于议会首先要辩论的三个主要问题，我们已经简要地说过了其中的两个¹⁵⁶：帕麦斯顿的撤职问题和对法战争的防御手段问题。剩下的第三个问题对英国的发展极其重要，这就是**选举改革**问题。

一开始就会由罗素提出的新改革法案，将使我们有机会来详细地探讨英国选举改革的普遍意义。现在，当关于这个法案还只是听到一些流言和对流言的解释的时候，只需要指出，在这整个问题上，首要的一点就是，那些反动的或顽固的阶级，即土地贵族、食利者、证券投机商、殖民地的土地占有者、船主和一部分商人和银行家将在多大的程度上保持他们的权力，他们要把多少权力让给站在所有进步阶级和革命阶级前列的工业资产阶级。关于无产阶级在这里

暂时还谈不到。

在这类问题上消息灵通的工业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机关报《每日新闻》，报道了关于辉格党内阁的新改革法案的一些消息^①。根据这个报道，预定的改革触及到现行的英国选举制度的三个方面。

迄今为止，每一个议员必须证明至少拥有 300 英镑地产才具备进入议会的资格。但是这个在很多情况下令人难堪的条件差不多总是通过假买地产和假造契约的办法被回避过去了。它对工业资产阶级说来早已失效了，现在应该完全取消。取消这个条件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宪章¹⁵⁷的“六条”中的一条。官方怎样来承认这六条（整个这六条都带有完全资产阶级的性质，在美国都已实现）中的一条，人们拭目以待。

迄今为止，选举权是这样规定的：按照英国的旧习惯，一部分议员由郡选派，另一部分议员则由城市选派。想在郡里选举的人，必须拥有每年获得两英镑收入的完全自主的地产，或者租赁每年获得 50 英镑收入的地产。可是在城市里却不同，凡是租赁房屋交付 10 英镑和按照这个数目的比例缴纳济贫捐的人，都有选民资格。因此，在选派议员的那些城市里，大批的小商人和手工业师傅，也就是整个小资产阶级都享有选举权，而在郡的选举中，绝大部分的选民则是贵族的 tenants-at-will，也就是每年都可能被解除租契从而完全依附于自己的东家的佃户。去年洛克·金先生建议，把在城市里实行的 10 英镑租金这一标准也推广到郡里，这个建议在人数很少的议院里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成，而反对的只是大臣们。据说，罗素现在建议把郡的标准降到 10 英镑，而城市降到 5 英镑。这一措施将会产生非常重大

^① 见 1851 年 12 月和 1852 年 1 月的《每日新闻》。——编者注

的影响。那时在城市里,无产阶级中收入较多的那一部分人将会立即获得选举权,这样一来,在一些大城市宪章派的代表很可能当选,而在中小城市里工业资产阶级的选票和议席将会大大增加。在那里,没有选派自己代表参加议会的地方小城市的所有中小资产者都会立即获得选举权;他们通常会构成绝大多数,对现在在郡里占统治地位的几个大贵族家族来说,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又相对独立,因此他们能够制止这些贵族至今在选举中所采用的恐怖手段。此外,这些地方小城市的小资产者现在就已经越来越处于工业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因此,他们将会把很大一部分郡交给工业资产阶级。

迄今为止,各个选区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相差非常悬殊;代表名额同居民和选民的数目极不相称。在这个地方,100或200名选民推选多少代表,而在另一个地方,6 000—11 000名选民也推选那么多代表。特别是在城市中这种差别更加悬殊;而选民不多的小城市恰恰就是这个或那个大土地占有者进行最丑恶的收买贿赂(例如圣奥尔本斯)或者是实行绝对选举独裁的地点。根据《每日新闻》的报道,有8个最小的城镇选区要被剥夺推选代表的权利,而其余的选举议员的小城市,将会同另外一些相邻的至今只在郡里有代表的地方小城市联合起来,这样一来,选民数目就会大大增加。这是模仿苏格兰早在同英格兰联合¹⁵⁸(1707年)时起就开始实行的城市组合制度。无论这种措施多么不彻底,工业资产阶级也会指望通过它来加强它的政治势力,其证明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很久以来就认为选区的平等化同议会改革的所有其他问题比较起来具有特殊的意义。此外,根据报道,伦敦和兰开夏郡这两个工业资产阶级的主要中心将在议会中获得更多的代表名额。

如果罗素真的打算提出这样的法案¹⁵⁹,那么根据以往的经验来

看,这件事对这位小个子来说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显然,他对皮尔的桂冠羡慕不已,他也要表现一次“勇敢”。诚然这种勇敢将伴随着英国辉格党人的胆怯怕事、谨小慎微和顾虑重重,并且在英国舆论的目前情况下,除了罗素本人和他的同僚——辉格党人,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勇敢。但是在犹豫、动摇、考虑之后,在这位小个子勋爵自从上次会议结束以来一直小心进行试探而屡遭失败以后,人们能够期望于他的肯定将是比上述建议更少的东西,除非他在星期二之前又有了新的考虑。

无须明确地说明,工业资产阶级所要求的要多得多。它要求 household-suffrage,即凡是占用一幢房子或其一部分并为此而交纳市政税的户主都应有的选举权;它要求秘密投票和完全重新划分选区,以保证同样数目的选民和同样数目的财产有同样的代表名额。它将顽强地、长期地和内阁为此而讨价还价,从内阁方面得到每一个可能得到的让步之后,才会出售对内阁的支持。我们的英国工业家们都是些精明的商人,他们无疑要按可能达到的最高价格出售自己的一票。

但是,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出,甚至内阁提出的上述最低限度的选举改革,除了加强工业资产阶级的权力而外,不会得到其他的结果。现在,工业资产阶级已经在实际上统治着英国,并且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步骤使它的最高统治权在政治上也得到承认,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利益和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独立斗争只有在后者的政治统治权确立之后才能开始,但是无论如何它也会从这次选举改革中得到一些利益。但是这个利益到底会有多大,完全取决于选举改革的辩论和最后确定是在商业危机爆发之前还是在商业危机中进行;因为无产阶级暂时只有在伟大的决定时刻才能积极地走上前台,正如古代悲剧

中的天命一样。

1852年1月30日于曼彻斯特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1月
22—30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1927年
《马克思主义年鉴》第4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¹⁶⁰

阁下！

大陆上最后残留的一些独立报刊也都被查封了，因此揭露在欧洲的这个地区所发生的一切违法和迫害行为，就成为英国报刊的光荣的义务了。所以请允许我通过贵报向公众报告一件事实，这件事表明，普鲁士的法官和路易-拿破仑的政治奴仆简直一模一样。

您知道，假如在恰当的时机搞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那将是一种多么宝贵的**统治方法**。普鲁士政府在去年年初很需要搞这样一个阴谋，好让议会变得比较驯服一些。因此，逮捕了許多人，在全德国动用了警察。但是结果，一无所获，最后只是把少数几个人关进了科隆监狱，借口说他们是一个遍及各地的革命组织的领袖。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有：同新闻界有联系的两位先生贝克尔博士和毕尔格尔斯博士；从事医务工作的丹尼尔斯博士、雅科比博士和克莱因博士，其中两个人光荣地履行了济贫院医生的艰苦职责；此外还有一个大化学企业的领导人、因自己在化学方面的科学成就而驰名全国的奥托先生。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有罪，所以，人们每天都以为他们会得到释放。但是，就在他们被拘禁的期间，颁布了一个“纪律法”¹⁶¹，这个法律使政府有权通过非常简便的手续解除任何一个它

不称心的司法官员的职务。这个法律的实施直接影响到迄今为止已经拖延很久而迟迟未决的、对上面提到的那几位先生的诉讼。他们不仅被关进单人牢房，被禁止彼此之间以及同朋友之间的任何来往，即使是书信来往，不得读书和写作（在普鲁士，这对尚未判决的最恶劣的重罪犯也是允许的），而且诉讼程序也完全改变了。审议委员会（您知道，在我们科隆是根据拿破仑法典进行审判的）立即同意确认他们的犯罪构成，案件提交检察院，检察院是由法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其职能相当于英国的大陪审团¹⁶²。我请您特别注意检察院所作的史无前例的决定。在这个决定里有下列一段令人吃惊的话，现在把这段话逐字逐句地翻译如下：

“鉴于没有提出可靠的证据，因而也未能确定犯罪构成，没有理由坚持起诉（您当然会以为，由此得出的必然结论应该是下令释放被拘禁者了吧？完全不是！），现将全部记录和文件发还预审法官重新进行调查。”

这就是说，经过 10 个月的拘禁，警察当局花了很大力气，王国检察官也费尽心机，却没有能够造成一点点犯罪构成，全部程序要从头再来一遍，也许是为了再经过一年的调查，将案件第三次交还给预审法官！

这样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是事出有因的：政府现在正在准备成立一个由最忠顺的分子组成的最高法庭。政府在陪审团面前必然会遭到失败，所以它必须拖延这个案件的最后审理，直到能够把它移交给新的法庭，而这个新的法庭当然会对国王百依百顺，而使被告毫无保障。

如果普鲁士政府仿照路易·波拿巴先生的办法，立即由国王下令对犯人进行判决，那岂不是光明磊落得多吗？

阁下,我永远是您的最顺从的仆人。

一个普鲁士人^①

1852年1月29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于1852年1月
28—29日

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通信集》1913年斯图加
特版第1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这个署名是马克思写的,信的正文则是恩格斯写的。——编者注

弗·恩格斯

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 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¹⁶³

[一]

自去年12月2日以来,大走红运的、肆无忌惮的赌徒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吸引了外国政治、至少是大陆政治所有可能的全部兴趣。“他在打什么主意?他准备打仗吗?和谁打?他打算入侵英国吗?”每当人们在谈论大陆局势时都必然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是的,的确发生了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个意外地登上伟大共和国的行政权首脑宝座的名气不大的冒险家,一夜之间就占领了首都各个重要据点,像清除垃圾似的清除了议会,两天之内就镇压了首都的起义,两个星期之内就平息了外省的骚乱,经过一次虚假选举迫使全体人民接受他的统治,并立即制定了一部使他能够独揽国家大权的宪法。自从没落的罗马帝国的近卫军团把帝国拿到市场上拍卖给出价最高者的那个时候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民族蒙受过这样的耻辱。所以,英国的中间阶级报刊,从《泰晤士报》到《每周快讯》,从12月那些日子以来就没有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来表露它

们对这个军事独裁者、毁灭本国自由的叛徒、摧残新闻出版事业的刽子手等等的义愤。

然而,在给路易-拿破仑以罪有应得的最大的鄙视的同时,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机关报^①不应该加入这个骂街式的合唱队,这个合唱队中的证券投机商、棉纺大王和土地贵族等各自的报纸,在进行不堪入耳的谩骂方面互不相让,力图超过对方。而对这些绅士们不妨提醒一下事情的真实情况。他们是有充分理由叫嚷的,因为路易-拿破仑从别人那里抢去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从工人阶级那里,而是从在英国由上述报刊代表其利益的阶级那里抢去的。这并不是说,路易-拿破仑甘心于不掠夺工人阶级,不从工人阶级那里抢去他所想要的一切,事实是,去年12月的时候,法国工人阶级身上已经没有什么可抢的了,因为1848年6月的大失败之后,在中间阶级议会统治的三年半期间,凡是值得抢去的东西,都已经被抢走了。的确,在12月2日前夕,他们手里还留下什么可抢的东西呢?选举权吗?1850年的五月选举法¹²⁰已经剥夺了他们的这项权利。集会权吗?这项权利很久之前就已经被社会上的“可靠的”和“善良的”阶级所垄断了。新闻出版自由吗?真正的无产阶级报刊已经被淹没在伟大的六月战斗的起义者的血泊之中,此后这种报刊的影子虽然还残存过一个时期,但是在国民议会后来的每一次会议都加以修改和完善的禁口律¹⁶⁴的压迫下,它早已消失了。他们的武器吗?已经利用一切借口把所有的工人从国民自卫军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武器只掌握在社会上的比较富裕的阶级手里。

这样,到不久前的政变时,工人阶级在政治权利方面可失去的东

^① 指《寄语人民》。——编者注

西已经极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了。而另一方面,中间阶级和资本家阶级这时却拥有全部政治权力。报刊、集会权、携带武器权、选举权、议会都属于它们。正统派¹³和奥尔良派、土地占有者和国家证券持有人,经过30年的斗争之后,终于在共和政体中找到了中立的场地。对这个阶级来说,在几小时之内就被抢走所有这一切,而且立即在政治上被贬低得一文不值,就像这个阶级自己过去贬低工人那样,这的确是很痛苦的。这就是英国“有声望的”报刊所以对路易-拿破仑的违法的卑鄙行为勃然大怒的原因。当来自行政机关或是来自议会的这些卑鄙行为是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时候,那很自然是完全正当的;可是,一当同样的政策扩展到“上等人”头上,扩展到“民族的英才”的头上的时候,那就大不相同了,每一个自由的爱好者便应当大嚷大叫地出来维护“原则”了。

总之,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中间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路易-拿破仑是了解这一点的,因为在12月4日的战斗中,他曾经向军队下令主要向“衣着阔绰的先生们”开枪。这场出色的巷战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对关闭的窗户和没有武器的资产者放几排枪,就完全足以把巴黎中间阶级的任何反抗行动镇压下去。

另一方面,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权利,但是这件事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没有利害关系的。首先,它必将失去1852年5月的一次大好机会:那时,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将同时任满,那时,它从1848年6月以来第一次可以指望得到一个有利的斗争场所。其次,既然它力图获得政治统治权,它就不能允许用暴力改变政权,——除非它以最高仲裁人的身分在互相斗争的双方之间进行调停,并且把它的意志作为国家的法律迫使双方接受。

因此,工人阶级不可能放过这种场合,除非它向两种互相敌对的力量表明,在战场上还有第三种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暂时被排除出官方的和议会的竞争舞台,但它仍然时刻准备着,一旦舞台转到它的活动范围内——转到街头,它就会立即出场。可是,不要忘记,即使在这种场合,无产阶级党仍然会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假如无产阶级党起来反对篡位者,那它实质上岂不是在支持那个已经表明是它的死敌的议会的复辟及其专政?而假如无产阶级党立即宣布主张成立革命政府,那岂不会吓坏中间阶级,促使它同路易-拿破仑和军队结成同盟(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外省已经发生)吗?此外,还应当记得,革命工人阶级当中的基本力量和精华,有的已经在六月起义中被残杀,有的则在六月事件之后在数不清的种种借口下被流放或者被关进监狱。最后,还存在工商业非常繁荣这个事实,它本身就足以向拿破仑保证,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会保持中立。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

现在,在英国人们都说,法国人想必是一群老太婆,否则他们不会忍受这样的待遇。我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目前应该得到这样漂亮的绰号。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法国人在他们的见解和行为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文明的民族都更容易受胜利的影响。一当这个国家中的事变进程发生了某种转折,他们就会毫不抗拒地遵循着这个转折方向走下去,一直走到极端。1848年的六月失败使法国并且通过法国使整个大陆发生了这样一个反革命的转折。现在建立起来的拿破仑帝国不过是近3年来反革命势力的一连串胜利的顶峰。可以预料,一旦法国站到斜坡上,它就会往下滚,一直滚到坡底为止。它离坡底究竟还有多远,这还很难说;但是,它正在

非常迅速地接近坡底，这是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的。而假如法国过去的历史不被法国人民未来的行动所推翻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有把握地预料，越向下滚，后果就越会令人感到意外和吃惊。在我们的时代，事件以惊人的速度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生，从前一个民族需要整整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事情，现在只要几年就能轻易地完成。旧帝国维持了14年；而以最拙劣的形式恢复起来的这个艺术品，如果它能够维持14个月，那就算是帝国之鹰的大幸了。以后会怎样呢？

〔二〕

乍看起来,好像现在路易-拿破仑是作为一个绝对的主宰统治着法国,好像除了他本人的力量之外,唯一的力量就是那些宫廷阴谋家的力量,他们把他团团包围起来,并且为了独占这位法国独裁者的宠爱和垄断对他的影响而互相倾轧。但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路易-拿破仑成功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事实上在法国的军事专制现在实行的戒严状态这一外衣之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仍然同过去一样激烈地继续进行着。这场最近4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它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自由农,资本家和工人。

法国各个阶级的情况是:二月革命永远地推翻了大银行家和证券投机商的政权;在他们垮台之后,城市居民中其余的每个阶级都

有过一个出头的时期。首先是第一次革命骚动时期的工人，其次是赖德律-洛兰时期的共和派小店主，再其次是卡芬雅克时期的共和派资产阶级，最后是前国民议会时期的联合的保皇派中间阶级。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能够牢固地掌握住它一度得到的政权。而后来正统保皇派或土地贵族同奥尔良保皇派或金融贵族之间不断发生分裂，政权看来又要不可避免地使他们手中滑落，而再一次转到工人阶级手中，当时，本来是可以指望工人阶级会好好地利用政权的。但是在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强大的阶级，说它强大并非因为它的成员拥有大量的个人财产，而是因为它的人数众多以及它本身的需求。这个阶级就是负债累累的小自由农，它至少占法国全国人口的 $\frac{3}{5}$ 。像所有农村居民一样，这个阶级行动缓慢，而且反应迟钝；它抱住自己的旧传统不放，不相信一切来自城市的党派的使徒所宣传的深奥道理；它记得皇帝^①在位时自己是幸福的，没有负债而且生活还比较富裕，因此它就利用普选权把行政权交给了皇帝的侄子^②。社会民主党的积极鼓动，更重要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措施在他们当中引起的失望情绪，促使这个农民阶级的一部分人转到红党的队伍中来了。但是，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仍然坚持自己的传统，他们断言，如果说路易-拿破仑还没有表明他就是人们所期待的那个救世主，那是由于国民议会的罪过，是由于它捆住了他的手脚。路易-拿破仑本人就是一个窃踞高位的衣冠楚楚的扒手，其周围又有一群大扒手，他除了得到大部分农民的支持之外还得到一部分最堕落最腐化的城市居民的拥护。他把这支力量组成了一个领取津贴的组织名字叫“十二月

① 拿破仑第一。——编者注

② 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十日会”。于是他依靠农民来进行选举，依靠一批暴民来举行招摇过市的示威游行，依靠随时准备推翻由议会清谈家组成的政府的军队，同时装出一副工人阶级意志的表达者的姿态，——这样，他就能够安详地等待时机，趁中间阶级议会内讧的机会行动起来，对那些经过4年的流血斗争之后全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自己的巩固统治权的阶级实行比较绝对的统治。他在去年12月2日就是这样干的。

所以，路易-拿破仑的统治并没有结束阶级之间的战争。它只是暂时中止了时时标志着这个或那个阶级夺取或保住政权的企图的流血冲突。这些阶级当中没有一个阶级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次可望取得胜利的新的战斗。阶级之间存在着分裂这件事本身，暂时帮助了拿破仑实现他的计划。他推翻了中间阶级议会，摧毁了中间阶级的政权；无产者难道不应该为此而高兴吗？当然，不应当希望无产者为曾经是他们的死敌的国民议会而战！但是，路易-拿破仑的篡位行为同时也威胁着各个阶级的共同战场和工人阶级的最后一个有利的阵地——共和国；而一当工人起来保卫共和国的时候，中间阶级就为了打败工人阶级这个社会公敌而同刚刚把他们赶走的人联合起来。在巴黎和在外省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因此军队也就轻而易举地战胜了相互斗争和相互敌对的阶级；在这个胜利之后，忠于帝国的千百万农民出来参加投票，依靠官方的弄虚作假，建立了作为几乎完全一致的法国的代表的路易-拿破仑的统治^①。

但是，即使是在目前，阶级斗争和阶级利益仍然是路易-拿破仑的每一个重要措施的背景，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中就可以看到。

^① 指1851年12月20—21日的“全民投票”。——编者注

Vol. II.] Saturday, March 27, 1852. [No. 48.

NOTES

TO

THE PEOPLE.

BY

ERNEST JONES,

OF THE MIDDLE TEMPLE, BARRISTER AT LAW,

Author of the Wood Spirit, Lord Lindsay, My Life, History of the Working Classes, Confessions of a King, Recollections of a Student, The New World, Bologna Church, Palace of Florence, Canterbury versus Rome. &c., &c.

PRICE TWOPENCE.

CONTENTS:

The People's Anthem	==	==	833	Labour's Grievances	==	==	842
Current Notes	==	==	833	THE CHARTER MOVEMENT	==	==	844
Women's Wrongs	==	==	839	Continental Notes	==	==	848

London:

J. PAVEY, 47, HOLYWELL STREET.

1852.

Green & Co., Printers, 32, Castle Street, Malvern.

Read in this Number "Continental Notes."

Read in this Number "Current Notes, No. 1."

Read in this Number "Charlist Reports, 1."

载有弗·恩格斯的《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一文的《寄语人民》杂志的扉页

〔三〕

我们再说一遍：路易-拿破仑所以能取得政权，是因为最近4年来法国社会各个阶级之间进行的公开的战争，使这些阶级精疲力竭，削弱了每个阶级的战斗力；其次是因为在上述这种情况下，这些阶级之间的斗争，至少暂时只能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即通过竞争、工会组织以及其他各种和平斗争的手段进行，——在英国，100多年来阶级之间的对抗一直就是通过这些手段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的公开对抗，这种对抗不会有任何结果，由于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究竟要到什么时候，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都能重新积蓄起足够的力量和具有充分的自信，公开要求自己取得对法国的专政呢？这当然谁也无法断定。但是由于现今事变的迅速发展，这两个阶级当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很可能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这样，阶级反对阶级的斗争在街头重新爆发的时间，就可能比根据双方相对的或绝对的力量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因为，如果法国的革命党即工人阶级党一定要等待1848年2月时的力量对比重新出现，那么它势必要在十来年中俯首听命，安分守己，——当然它不会这样做。同时，像路易-拿破仑政府这样的政府，正如我们

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必然使自己和法国陷入最终必须用巨大的革命爆发来加以解决的困难。我们不谈战争的可能性或者是其他可能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想谈谈一个事件，这个事件之必将到来，就像明天早晨太阳必将升起一样。这就是商业和工业的普遍震动。1846年和1847年工商业的不景气和农业的歉收引起了1848年的革命。十之八九，1853年全世界的工商业将遭到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深刻的破坏，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长久地处于混乱状态。有谁将能够预料路易-拿破仑的航船十分牢固，足以抵挡得住必将爆发的风暴呢？

但我们还是看看这只低能的鹰^①在他胜利之夜所处的状况吧。支持他的是军队、僧侣和农民。反对他的意图的是中间阶级（包括大土地所有者）和社会主义者或革命的工人。一旦他成为政府的首脑，他不仅必须保持住那些帮他上台的集团，而且必须尽可能多地把那些过去一直反对他的人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或者至少让这些人安于新的秩序。至于军队、僧侣、政府官吏以及长期追随他的那帮想升官发财的阴谋家，所需要的只是直接贿赂、现金以及公开抢劫公共财产。我们已经看到路易-拿破仑如何敏捷地支付现金，或是把他的朋友们安插到最能使他们暴富起来的肥缺上。就拿莫尔尼来说吧：他在上任的时候还是个满身债务的穷光蛋，而过了4个星期之后他卸任时，不仅还清了债，而且还有了一笔就是在贝尔格莱夫广场一带¹⁶⁵也要算是可观的、足够坐享清福的财富！但是对待农民，对待大土地所有者，对待国家证券持有人、对待银行家、工业家、船主、商人、小店主，以及对待当代最严重的问题——工人问题，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

^① 指路易-拿破仑。——编者注

事了。虽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钳制言论的措施,但是这些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的对立依然如故,——尽管宣扬这个不愉快的事实的报刊、议会和会议讲坛都已经不存在;因此,政府要做任何有利于一个阶级的事,都必然触犯另一个阶级的利益。路易-拿破仑想要做任何事,他必然到处都遇到“谁来出钱?”这个问题。由于这个问题而被推翻的政府比由于其他一切问题(如民军问题、改革问题等等)而被推翻的政府的总数还要多。尽管路易-拿破仑已让他的前任路易-菲力浦支付了这笔款项的很大一部分¹⁶⁶,但是剩下要支付的还有很多。

下面我们考察法国社会各个不同阶级的状况,弄清楚现政府有多少办法改进这种状况。同时,我们还要考察这个政府为此目的做了什么,以及将来大概还会做些什么,因此我们将收集一些材料,以便对目前正在尽力玷污拿破仑的名声的人的现状和命运作出正确的结论。

弗·恩格斯写于 1852 年 1 月
底—4 月初之间

载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3 月 27
日和 4 月 10 日《寄语人民》第
43、48 和 5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¹⁶⁷

2月底于利物浦

最近的一班美国轮船带来不久前在纽约新出版的德文报纸《革命》的各期，其中一期刊载了弗莱里格拉特抨击金克尔，或者更正确些说，抨击金克尔在美国推销的德国公债的一首诗^①。这首诗不仅是对个人的辛辣讽刺，而且其中也表现了派别之间的斗争。因此我们认为，这首诗对于评价流亡者中的分裂和派别是非常有意义的，值得在下面介绍给贵报的读者。许多读者将会感到吃惊，正是极端革命派最粗暴、最坚决地拒绝金克尔现在所热衷的那些措施，正是这一派对近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件表现出滑稽可笑的无动于衷。大概这一派的想法同基佐一样。大家知道，据说他在12月2日之后马上就说：“政变，这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而彻底的胜利！”这样人们自然就会明白，为什么当民主阵营到处都在痛哭和悲叹时，这一派却装出束手无策的样子在暗中窃笑。

此外，这首诗尽管有不少地方性的（伦敦的和纽约的）隐喻，但还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致约瑟夫·魏德迈》。——编者注

是通俗易懂的。需要说明的大概只有一点：金克尔最初在北部各州扮演废奴派，但后来（根据最新消息）在南部各州拒绝同奴隶制的反对者建立任何联系，这个金克尔又在底特律和其他地方为推销他的公债举行了黑人集会。

如果弗莱里格拉特能执行在这第一封信中提到的计划，如果他后来给《革命》编辑（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约瑟夫·魏德迈曾是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归天的《新德意志报》的出版人之一）的信同样能使祖国普遍感到兴趣的话，我将在方便的时候，在贵报的允许下，继续把这些信完整地或摘要地介绍给贵报。这确实是一种独特的场面：一个被迫远离祖国的德国诗人想把祖国不断变化着的景象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句这面镜子中，以便让（不是让祖国或为他提供栖身之地的国家，不）大洋彼岸的新德国，让从哈得孙河口到遥远的密执安州木头屋的男女同胞们领略一番。他不仅会驳斥和谴责，而且不乏愉快的赞许，根据我从他的诗作和传闻中了解到的情况，我认为诗人的本质可以保证他这样做。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2 月

21 日—24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3 月 7 日《知识界

晨报》第 10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 致《科隆日报》
编辑部的声明¹⁶⁸

《科隆日报》第 51 号发表的一篇“巴黎 2 月 25 日”通讯就所谓德法密谋¹⁶⁹写了下面一段话：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有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①

这种关于我不仅有“同伙”而且还有一个“代理人”的说的欺骗性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阿·迈尔是卡·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尉官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曾在他们领导的流亡者委员会¹⁷⁰中当会计。关于这个同我毫不相干的人离开伦敦一事，我只是从我的一个日内瓦的朋友的来信中才得知的。他告诉我，有一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散布关于我的最卑鄙的谣言。最后我从法国报纸上了解到这个阿·

① 见 1852 年 2 月 28 日《科隆日报》第 51 号。——编者注

迈尔原是一位“政治人物”。^①

卡尔·马克思

1852年3月3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3月3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2年3月6日《科隆日报》第57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见1851年2月7日恩·德朗克致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中的大人物¹⁷¹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2年5月6日—6月28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文库》1930年版第5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歌颂吧，永垂不朽的灵魂，为有罪的人的赎罪”^①——通过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生于约 40 年前。他的生活在《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这本由阿道夫·施特罗特曼编写(1850 年汉堡霍夫曼—康培出版公司版, 8 开本)的自传中已有描述。

哥特弗里德是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¹⁷²的英雄, 这个时期给德国带来了无限的爱国主义的苦闷和泪如泉涌的悲伤。哥特弗里德就是以平庸的感情丰富的济格瓦特的姿态初露头角的。

在读者的面前, 他的世俗生活像日记一样支离破碎, 而且这些情况的揭露又采取了毫无顾忌的轻率态度,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使徒施特罗特曼,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位使徒的“七拼八凑的叙述”。

波恩。1834 年 2 月—9 月。

“年轻的哥特弗里德和他的朋友保尔·采勒一同研读福音神学, 他以勤勉和虔诚博得了他的著名教师(扎克、尼茨施和布莱克)的尊重。”(第 5 页)

^① 弗·哥·克洛普施托克《救世主》第 1 卷。——编者注

看来他一开始便“显然是沉溺于深思”(第4页),他“悲伤而忧郁”(第5页),活像一个未来的大人物。“哥特弗里德的褐色的、忧郁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几个“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哥特弗里德立刻感觉到,这些大学生“力图用外表的华丽来掩饰内心的空虚”(第6页)。他感到义愤是因为他“拥护黑格尔和马尔海内克”,这些大学生说马尔海内克是“蠢才”。后来,当这位候补神学家为了继续求学而到柏林去,并且要亲自求教于马尔海内克的时候,他在日记中针对马尔海内克抄下了下列的文学名言(第61页):

“一个人只顾玄想,
就像个牲口,在荒野地上
被一个恶灵牵着,来回盲目游荡,
不知外围有美丽青葱的牧场。”^①

哥特弗里德在这里忘记了靡菲斯特斐勒司用来取笑渴求知识的学生的一句名言:

“你尽管蔑视理性,蔑视科学!”^①

整个这场对大学生进行道德说教的戏只是一个序幕,是为了给世界未来的解放者一个机会来作如下的表白(第6页)。

哥特弗里德说:

“假如没有战争,这一代决不会灭亡……只有强有力的手段才能使我们这衰败的时代重新振兴!”

而他的朋友回答道:

^① 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书斋》。——编者注

“一场新的大洪水来临时，你是修正版的挪亚。”

浅蓝色的外套帮助哥特弗里德飞黄腾达，他竟可以宣布自己是“一场新的大洪水中的挪亚”。他的朋友对这一点提出了下列的评语，这个评语本可以作为传记的题词：

“我的父亲和我时常暗笑你偏爱模糊的概念！”

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所有这一切表白^①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不断重复出现，那就是金克尔早在胎儿时期就已经是一个大人物了。一切平凡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最平凡的事情，都成了意义深远的事件，每个候补神学家都有趣地经历过的那些小小的痛苦和欢乐，在德国任何神学院学生宿舍和任何集会中屡见不鲜的同市民环境的冲突，在这里都成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严重事件，而浸沉在人间苦痛之中的哥特弗里德总是要趁这些机会表演一场喜剧。

“朋友保尔”的家要搬回符滕堡去。哥特弗里德便把这件事按下述方式搬上了舞台。

哥特弗里德爱保尔的妹妹，并且趁此机会声明他“已经爱过两次”。但是这次的爱情不是寻常的爱情，而是“对上帝的热烈而真诚的崇敬”（第13页）。哥特弗里德和朋友保尔一起登上了龙岩，并在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背景的衬托下迸发出下面的颂歌：

“别了，友谊，我将认救世主为兄弟！别了，爱情，信仰将是我的未婚妻！别了，姐妹的忠贞，我要进入成千成万正直的人的教区！去吧，我的年轻的心，学会单独和你的上帝在一起，和他战斗，直到你制服他，直到他赋予你一个新的名

①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部《一个美丽的灵魂的表白》。——编者注

字,赋予你圣以色列这个除了得到它的人谁也不知道的名字!你好,壮丽的初升的太阳,我的觉醒的灵魂的影象!”(第17页)

这样,和朋友的离别成了哥特弗里德如痴如醉地为自己的灵魂大唱赞歌的良机。但这还不够,朋友也应该和上一首赞歌。在这个热烈地倾吐胸怀的时刻,哥特弗里德讲话时“声音高昂,容光焕发”,他“忘记他的朋友在场”,“他的眼光闪烁着喜悦”,“他的呼声充满了激情”,如此等等(第17页)。一句话,简直就是旧约全书中先知以利亚的出现。

“保尔以忠实的眼光带着忧郁的微笑看着他,并说道:‘在你的胸中跳动着一颗比我更强壮的心,你,当然,将胜过我,但请允许我在远处仍然做你的朋友。’哥特弗里德高兴地握住他伸出的手,恢复了昔日的盟约。”(第18页)

在高山上的改变形象这一场戏里,哥特弗里德达到了他所想达到的目的。朋友保尔不久前还嘲笑“哥特弗里德偏爱模糊的概念”,现在却对“圣以色列”这个名字佩服得五体投地,承认哥特弗里德的高超和未来的伟大。哥特弗里德欣喜若狂,随即友好宽厚地恢复了昔日的盟约。

布景换了。金克尔的母亲,上卡塞尔的牧师金克尔的妻子的生日。利用这个家庭的节庆来宣告,“这位可敬的妇人像救世主的母亲一样,也叫马利亚”(第20页)。毫无疑问,这就是预示着哥特弗里德也要做救世主和人类的救星。这么一来,在传记的头20页内,通过一些不值一提的事件,神学系的大学生便先后被描绘成挪亚、圣以色列、以利亚以至基督了。

实际上什么经历也没有的哥特弗里德，在生活的过程中自然要不断地挖掘他的内心的感受。他作为传教士的儿子和未来的神学家所特有的虔诚主义，是同他的天生的精神上的软弱和矫揉造作地故作忙碌的行为完全相适应的。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严格的虔诚主义者，哥特弗里德也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种虔诚的赎罪观同普通大学生的“快乐的社交生活享受”发生了冲突，而从他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使命来看，这种冲突在他身上便成了宗教和诗意的斗争；上卡塞尔牧师的儿子和别的大学生一起喝啤酒用的酒杯也变成了浮士德的两个灵魂¹⁷³在其中搏斗的极不幸的圣餐杯。从对虔诚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马利亚”如何反对“哥特弗里德向往剧院的罪恶心意”（第28页），这种被认为也是未来诗人的征兆的意味深长的两面性，实际上只是表明哥特弗里德对矫揉造作的作风的偏爱而已。后来他的姐姐约翰娜被说成是一个虔诚的悍妇，说有一次她在教堂打了一个5岁的女孩一记耳光，因为那个女孩不专心。我们在书末发现，正是这位约翰娜姐姐最激烈地反对哥特弗里德同莫克尔女士^①的婚事，否则宣扬这一页家庭丑史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哥特弗里德在塞尔沙伊德作了“一次关于枯萎中的麦种的精彩讲道”，这也被当作一个事件。

采勒一家和“心爱的爱利莎”终于起程了。我们看到，哥特弗里德“热烈地握着姑娘的手”并低声话别说：“爱利莎，再见了！别的话我不必多说。”在这一段有趣的情节以后，接着便是第一声济格瓦特式的

① 即约·金克尔。——编者注

叹息：

“毁灭了！”“默默无言！”“柔肠寸断！”“灼热的额头！”“深沉的叹息！”“剧痛浸透了他的脑髓”等等。（第 37 页）

这样，这一整场表演以利亚的戏，就成了他演给“朋友保尔”和自己看的一场纯粹的喜剧。保尔也重新出场，向独自坐在那里叹息的济格瓦特低声耳语：“这一吻给我的哥特弗里德。”（第 38 页）

哥特弗里德又高兴起来了。

“只有当我有了体面和不无名望的时候，我才再和我亲爱的人相见，我的这个计划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第 38 页）^①

就是在为爱情而苦闷的时候，他也没有停止思考未来的名望和向人炫耀预支的桂冠。哥特弗里德运用这一插曲，是为了以言过其实的夸张手法把他的恋爱故事记载在纸上，以便在世界上不致失掉他那些存在于日记本上的感情。不过，这场戏的效果还没有达到。忠实的保尔不得不请这位征服世界的大师注意这样一点：如果爱利莎停止了前进，而他继续不断地发展，那时，爱利莎也许就不再能使他满意了。

“哥特弗里德说：呵，不会的！这朵天上的花刚刚张开它最初的花瓣便散发出如此浓郁的芳香。当……男性力量的炎夏的日光打开它内心的萼片时，又将会怎样呵！”（第 40 页）

保尔不得不对这种不正派的比喻作出回答，说理性的论据对诗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①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0年汉堡版第1卷第35页。——编者注

“哥特弗里德微笑着回答道：‘您的全部智慧就像我们的可爱的疯狂一样，毕竟不能使您摆脱生活中的波折。’”(第40页)

对着自己微笑的纳尔齐苏斯，一幅多么动人的画面！笨拙的候补神学家突然装扮成可爱的狂人，保尔变成了对这位大人物表示钦佩的瓦格纳，而这位大人物“微笑着”，“他甚至温柔而友爱地微笑着”。戏剧效果达到了。

哥特弗里德终于离开了波恩。在波恩，他在学识上达到了高峰，他对此作了如下的总结：

“可惜，我同黑格尔派离得越来越远了；成为一个理性主义者，这是我最大的愿望，但是我同时又是超自然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而必要时甚至还是一个虔诚主义者。”(第45页)

这幅自画像是任何东西都不必再增添了。

柏林。 1834年10月—1835年8月。

哥特弗里德脱离了贫乏的家庭生活和大学生活，来到了柏林。但是我们看不到这个大城市(至少和波恩比较而言)的状况对他发生任何影响，也看不到他参加当时的学术运动的任何迹象。哥特弗里德的日记中记载的，只是他同新的冒险伙伴，巴门的胡果·杜恩韦克共同感受的内心活动，以及可怜的神学家的一些小小的痛苦，金钱上的窘困，破旧的燕尾服，评论员的职位等等。他的生活和都市的社会生活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施勒辛的家庭的圈子里打转。在这个家庭里，杜恩韦克不知不觉被看成是沃尔弗拉姆大师，而哥特弗里德则被看成是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大师(第67页)。爱利莎的形象在他的

心中渐渐缩小；哥特弗里德又开始迷恋玛丽·施勒辛小姐了；他不幸还得悉爱利莎同他人订婚的消息，最后他概述了他在柏林“模糊地思念那个本来应该完全属于他的女人”时的心情和想法。

但是，没有达到不可缺少的戏剧效果，决不能离开柏林。

“在他离开柏林之前，老（导演）魏斯又一次把他带进剧院。这位亲切的老人指着陈列德国剧作家的半身像的大厅里的几个空着的壁龛，意味深长地说道：

‘还有空着的位置！’

这时，一种奇异的感觉控制了这个人。”^①

这个位置是为普拉滕的弟子哥特弗里德预备的，他会非常认真地接受一个老滑稽演员所给予的“未来的不朽人物”这种至高无上的享受，这个位置的确还空着。

波恩。 1835 年秋—1837 年秋。

“他经常动摇于艺术、生活和科学之间，这三方面他都研究，但是没有固定的意向，他希望在他决定不下从事哪种事业的情况下，在每一方面都尽可能多地学习一些，得到一些，甚至创造一些。”（第 89 页）

哥特弗里德意识到自己是个犹豫不决的学识肤浅的人，于是他回到波恩。感觉到自己的学识肤浅自然并不妨碍他去考取学位并担任波恩大学的编外讲师。

“无论是沙米索，或是克纳普都不愿在他们出版的袖珍本^②上发表他投去的诗篇，这件事使他很伤心。”（第 99 页）

①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0 年汉堡版第 1 卷第 81 页。——编者注

② 指文学杂志《德国缪斯年鉴》和《基督徒的娱乐》。——编者注

这就是这位大人物想在社会舞台上显露头角的初次尝试，而他在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直是靠吹嘘他的未来的作为来度日的。从这时起他便最终成为大学生文学小组中颇成问题的地方大人物，直到他在巴登被子弹擦伤而一举成为德国小市民的英雄为止。

“相反，在金克尔的胸中逐渐产生出对牢固和忠实的爱情的憧憬，这种憧憬是任何工作都无法排除的。”（第103页）

这种憧憬的第一个牺牲品，是一个叫敏娜的姑娘^①。哥特弗里德和敏娜玩起游戏来，为了玩花样，有时他竟扮作慈悲的马哈德伐，要这位姑娘把他当作神来崇拜，而他则在反复考虑姑娘的健康状况。

“如果金克尔能够对她的状况不在乎的话，他是会爱她的；不过他的爱情只能加速这朵凋谢中的玫瑰的死亡。敏娜是第一个能够理解他的姑娘；不过她会成为第二个希姑葩，她为他生下的不会是孩子而是火炬，双亲的火焰会通过孩子烧毁自己的房屋，就像柏里亚的特洛伊城被烧毁一样。但是他不能离开她，他为她柔肠寸断，他的痛苦不是由于爱情，而是由于同情。”^②

这位非凡的英雄（他的爱情，如丘必特的目光那样，能致人于死命），其实不过是个庸俗的、经常为自己打算的花花公子，他是在选择未婚妻时才第一次想把自己扮成一个多情郎。此外，他关于病情及其对可能出世的孩子产生的后果的那些令人作呕的考虑，变成了一种卑鄙的打算，因为他为了寻求内心的自我满足而保持着这种关系，直到这种关系使他有去演一出新的情节剧的时候，才割断它。

① 敏·特罗莱。——编者注

②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0年汉堡版第1卷第106、113页。——编者注

哥特弗里德到他的一个刚死了儿子^①的舅父^②家去。在可怕的半夜里,就在灵旁,他和他的表妹爱利莎第二小姐表演了一场富于贝利尼歌剧风味的戏:“在遗骸旁”和她订了婚约,第二天早晨便顺利地
被舅父接纳为未来的女婿。

“他也时常想到敏娜,想到他必将重新见到她的时刻,那时她已永远地失去了他;但是他并不害怕这个时刻,因为她不能向一颗已经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任何要求。”(第 117 页)

订立新的婚约的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把同敏娜的关系导致使“义务和热情”相互对立的戏剧性的冲突。这个冲突本身是通过极端庸俗的卑鄙行为造成的;这个老实人竟然觉得敏娜无权对他那“已经交给了别人”的心提出合法要求。这种怯懦的自我欺骗甚至还是靠事后颠倒“把心交给别人”的日期来掩饰过去的,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使这个有德行的男子汉感到丝毫困窘。

于是哥特弗里德出于耐人寻味的必要性,伤害了一颗“可怜的伟大的心”。

“停了一会哥特弗里德继续说:‘同时我感到应当请求您的宽恕,亲爱的敏娜,也许我在您面前是有罪的,敏娜,昨天我那样亲切地伸给您的这只手,再也没有自由了,我已经订婚了!’”(第 123 页)

不过这位擅长表演情节剧的候补神学家当然避免告诉她订婚是在他“那样亲切地”向她伸出手之后过了几小时发生的。

“天啊! 敏娜,您能原谅我吗?”(同上)

① 古·黑尔明豪斯。——编者注

② 黑尔明豪斯。——编者注

“我是个男子汉，应该忠于自己的义务，我不应该爱您！但是我并没有欺骗您。”（第124页）

在事后安排了这个道义上的义务之后，就该去做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了，即卓有成效地颠倒整个关系：仿佛不是敏娜宽恕他，而是这个道德高尚的牧师宽恕被欺辱的敏娜。为了这个目的捏造了敏娜可能“会从远处怀恨他”的情节，由于这个假想，最后又添上一段道德说教：

“‘我愿意原谅您，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可以事先就相信我会宽恕您。祝您幸福！我的义务在召唤我，我不得不离开您。’于是他缓步走出了凉亭……从这一刻起哥特弗里德便感到自己是不幸的。”（第124页）

这位演员和臆想的情人变成了伪善的牧师，假惺惺地说一声祝福便脱了身。济格瓦特通过臆造的恋爱纠纷，顺利地达到了能够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不幸的人的目的。

真相终于大白，原来这一切虚构的恋爱波折，只是哥特弗里德自己同自己的风流韵事。整个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幻想成为未来的不朽人物的牧师演出了旧约全书中的故事和流动图书馆中的施皮斯、克劳伦和克拉默笔下那样的现代幻想，并且陶醉于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浪漫的主人公。

“他在翻书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诺瓦利斯一年前就时常鼓舞他去从事诗的创作。当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他就同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名叫‘条顿’的小组，小组成员给自己规定的目的是相互启发对德国历史和文学的理解，他当时用的笔名就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现在他才明白了这个名字的意义。他感到自己就是瓦尔特堡脚下的可爱的小城里的那个亨利希，对‘蓝色花朵’的憧憬不可抗拒地攫住了他。但是，不管他怎样质问他的心，敏娜和他的未婚妻都决不是那童话中的闪闪发光的花朵。他陷入了幻想，如饥如渴地继续读下去，光怪陆离的世界包围着他，最后，他哭倒在沙发上，

憧憬着‘蓝色花朵’。”①

在这里，哥特弗里德泄露了他用来掩饰自己的全部浪漫的谎言；化装成陌生人这种狂欢节规矩，就是他的真正的“内在本质”。他从前把自己称为“斯特拉斯堡的哥特弗里德”，现在又装扮成“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而他寻找的并不是“蓝色花朵”，而是一个会把他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女人。最后，他终于在一个为了他和他自己的利益和他共同演出了一出梦寐以求的喜剧的女人身上，找到了这种“蓝色花朵”，虽然这花朵已经有点枯萎了。

这一套伪造的浪漫故事，这种对古老传说和冒险故事的改写和可笑的仿制（哥特弗里德自己的天资不足，这是他对别人的模仿），所有这些感情上的幻觉，即同玛丽、敏娜、爱利莎第一和爱利莎第二的毫无内容的冲突，竟使他以为他已经达到了歌德生活经历的高度。歌德在狂热地恋爱之后，突然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写他的《哀歌》，同样，哥特弗里德在陶醉于臆想的恋爱之后，认为现在也有权作罗马之行。歌德已预感到哥特弗里德：

“连鲸鱼身上也有虱子，
我怎能摆脱它的骚扰？”②

意大利。 1837年10月—1838年3月。

哥特弗里德在日记中连篇累牍地描绘了从波恩到科布伦茨的旅程，这是罗马之行的开始。

①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0年汉堡版第1卷第126—127页。——编者注

② 歌德《温和的讽刺诗》。——编者注

新的时期开始时,和前一时期结束时完全一样,还是把别人的经历全套用到自己身上。哥特弗里德在轮船上想起了“霍夫曼的出色的文笔”,这位作家“使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在刚刚经历了极大的痛苦之后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作品”。为了证实这种“出色的文笔”的真实性,哥特弗里德在经历了因敏娜而引起的“极大的痛苦”之后,便一心“想着那早已计划完成的悲剧”。(第140页)

在金克尔从科布伦茨到罗马的旅途中,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他的未婚妻的亲切的来信(他经常收到,通常是立刻回信)驱散了阴郁的思想。”(第144页)

“对美丽的爱利莎,黑·的爱情,在年轻人的憧憬的胸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第146页)

在罗马发生了如下的事件:

“抵达罗马以后,金克尔在那里看到了未婚妻的来信,这使他更加爱她,而敏娜的形象便越来越退居次要地位,他的心告诉他,爱利莎能够使他幸福,他非常兴奋地沉溺于这种感觉……只是现在他才学会了爱。”(第151页)

于是,他从前只是“由于同情”才爱恋的敏娜又重新出现在他的感情的舞台布景上。至于同爱利莎的关系,他幻想爱利莎能使他幸福,而不是他给她幸福。而在幻想“蓝色花朵”时,他的确早就预言过,无论是爱利莎或是敏娜,都不可能成为这个引起他强烈诗兴的童话中的花朵。但是他胸中重新激荡起对这两个姑娘的感情,是为了编排新的冲突:

“在意大利,金克尔的诗意显然是打瞌睡了。”(第151页)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有找到体裁。”(第 152 页)

后来我们知道，他在意大利逗留了 6 个月之后，带着精心包装的“体裁”回到了德国。因为歌德在罗马写了他的《哀歌》，所以哥特弗里德也写了哀歌《罗马的觉醒》。(第 153 页)

在金克尔的寓所，女佣交给他一封他的未婚妻的来信。他高兴地拆开了信，然而

“大叫一声，倒在床上”。“爱利莎告诉他，有一个 D. 医生，是个很有钱的人，开了一个很大的诊所，甚至还有……一匹乘马(1)，这个人已向她求婚。因为他，金克尔，穷神学家，还要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弄到一个可靠的地位，所以她请求他解除把他俩联结在一起的纽带。”

《恨世和懊悔》的完整的再现。

哥特弗里德“毁灭了”，“呆若木鸡”，“无泪的眼睛”，“复仇的心”，“匕首”，“情敌的胸膛”，“对手心脏的血”，“冰冷的表情”，“痛苦得发狂”，如此等等。(第 156 和 157 页)

在“穷神学家的这些痛苦和欢乐”中，不幸的候补神学家主要是被一种想法折磨着：爱利莎为了“靠不住的世俗财富”而“鄙视”他(第 157 页)。哥特弗里德在沉湎于舞台艺术规定的上述感情之后，终于找到了下面的崇高的慰藉：

“她配不上你，你有天才的双翼，它们将使你高高地飞越在这些阴郁的痛苦之上！有朝一日你的荣誉遍布全球，那个虚伪的女人将受到内心的惩罚！谁知道，也许过几年她的孩子会来请求我帮助，我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件事。”(第 157 页)

在他当然地预先高度享受了“遍布全球的未来的荣誉”以后，便露出了卑鄙的伪君子的嘴脸。他估计，也许将来爱利莎的陷入贫困的孩子会向伟大的诗人请求施舍，而“他并不想过早地回避这件事”。为什么？因为爱利莎“宁要乘马”而不要哥特弗里德经常幻想的“未来的荣誉”，因为她为了“世俗财富”而屏弃了他希望在其中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那出滑稽的喜剧。老黑格尔早就正确地指出，高贵的意识总是转变成卑贱意识。^①

波恩。 1838年夏—1843年夏

（阴谋与爱情）

哥特弗里德在意大利可笑地模仿了歌德之后，回国时决定表演席勒的《阴谋与爱情》。

虽然哥特弗里德的心灵因人间痛苦而受到折磨，他的身体却“比任何时候都好”（第167页）。他打算“通过著作使自己在文学界成名”（第169页），不过，后来当“著作”并没有能使他在文学界成名的时候，这并没有妨碍他不靠著作而给自己争得更廉价的名望。

哥特弗里德在追求“女人”时总是怀有的“模糊的憧憬”表现为非常轻易地许诺订婚和结婚。订婚是强者和“未来的”高超的智者力图实际上征服和束缚住所爱的人的古典方式。当他一发现那使他得以扮演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的蓝色花朵的时候，诗人那种温柔的、模糊的感伤便凝结成候补神学家的非常明朗的梦幻：用“义务”的纽带带来补充那精神上的亲和力。这种一见面便不加选择地追求同所有

^① 见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章《精神》。——编者注

的雏菊和睡莲订婚的庸俗行为，使哥特弗里德为了证明他的“巨大的诗人的痛苦”而不停地倾吐衷肠时所装出的那副矫揉造作的姿态变得更加令人作呕。

因此，从意大利回来以后，哥特弗里德当然又应该“订婚”了。他所憧憬的对象这一次是他的姐姐即那位约翰娜夫人直接给他指定的，她的虔诚主义狂热早已被哥特弗里德用感叹词在日记里永久保存下来。

“伯格霍尔德恰巧在这几天宣布他同金克尔小姐订婚，而这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干预弟弟的婚事的约翰娜，由于种种原因和家庭方面的考虑（这些最好不谈），希望哥特弗里德以对换的方式同她的未婚夫的妹妹索菲娅·伯格霍尔德小姐结婚。”（第172页）“金克尔（这是不言而喻的）必然应该感到被一位温顺的姑娘吸引……那是个可爱的纯洁的姑娘”（第173页）。“金克尔极其柔情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向她求爱，只要（这是不言而喻的）他获得一个可靠的地位并且能够以教授或者一所安静的教士住宅的拥有者的身分把他的未婚妻娶回家（这是不言而喻的），幸福的双亲就会高高兴兴地立刻把她许配给他”。

热情奔放的候补神学家在每次艳遇中表现出来的对结婚的向往，这一次以下面的优美诗句洋溢在纸面上：

“我什么也不需要，
只要这只白白的手。”

其余的一切，眼睛、嘴唇、鬓发，他都认为是“无所谓的东西”。

“这一切他都不需要，
只要那只白白的小手！”（第174页）

遵照“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干预的姐姐约翰娜”的命令，并且由于经常使他心痒的对一只“手”的爱慕，他同索菲娅·伯格霍尔德小姐结下了私情，他把这种私情同时称作“深刻的、牢固的和平静的”爱

情(第175页)，“在这新的爱情中宗教的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第176页)

就是说，在哥特弗里德的恋爱故事中宗教的因素经常同小说和戏剧的因素互相交替。当哥特弗里德没有能够通过喜剧的效果达到新的济格瓦特境界的时候，他便求助于宗教的感情，以便赋予平庸的故事以高尚的意义。济格瓦特变成了虔诚的荣克-施梯林¹⁷⁴，上帝赋予了后者非凡的力量，三个妻子都死在他的男性的怀抱中，而他还能再把新的情人“娶回家”。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这个多事的生活经历中的极不幸的灾难，施梯林同那个和马蒂厄离了婚的女人约翰娜·莫克尔相识一事。哥特弗里德在她身上找到了女性的金克尔，他的浪漫的第二个我，只是更坚强，更聪明，更清醒，并由于年龄大而已经摆脱了初期的幻想。

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共同之点是两人都未被世界承认。她为人乖戾，相貌平庸；她的第一次婚姻是“不幸的”。她有音乐才能，但是还不足以用她的作品或演奏技巧引起轰动。在柏林，她曾经企图模仿蓓蒂娜的过了时的稚气，但是完全失败了。她的经验使她的性格变得愤世嫉俗。她和金克尔一样喜爱装腔作势，无限夸张地赋予自己生活中的平凡事件以“崇高的”性质，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爱情的“需要”（施特罗特曼语）比起用诗歌大谈爱情来说的确更加急切了。在这个方面，金克尔身上女性的东西，在她那里成了男性的东西。因此，这样的女人自然很高兴同金克尔表演一出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的喜剧，来达到一种互相满足的解决，就是说，把济格瓦特认作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并让他把她当作“蓝色花朵”。

金克尔刚刚通过姐姐的帮助顺利地进行了第三次或者已是第四

次的订婚,现在立刻又被莫克尔引入了爱情的迷宫。

哥特弗里德置身在“社团的浪潮”(第190页)里,置身在德国大学小城里一个不大的教授小组,或者叫作“名士小组”里,这些小组只有在基督教德意志的候补神学家的生活中才能一举成名。莫克尔唱着歌,并得到喝采。用餐的时候哥特弗里德被安置在她的座位旁边,于是便演出了下面这场戏。

“哥特弗里德说:‘当您在大家的啧啧称赞下张开天才的双翼在快乐的世界飞翔的时候,您大概感到心旷神怡吧。’莫克尔激动地回答道:‘那是您的感觉。我听说您有非常好的诗才;也许您也会受到极口赞扬……那时我将问您,您幸福吗,如果您不……’‘如果我不?’——哥特弗里德在她停顿下来的时候问她。”(第188页)

向笨拙的多情的候补神学家撒下了诱饵。

在这以后,莫克尔告诉他说,不久前她

“听了她关于基督徒思乡的传道,她想,这个漂亮的青年不得不完全弃绝尘世,他甚至激起她胸中对纯朴孩童梦想的微弱的憧憬,从前,那已经消失的信仰之声曾唤起她这种梦想。”(第189页)

哥特弗里德被这一段恭维话弄得“神魂颠倒”(第189页)了。他异常高兴地“发现莫克尔是不幸的”(同上)。而他立刻决定,[……]①“以自己关于耶稣基督拯救世界的热烈的信念”,“也能重新赢得……这个痛苦的人的心灵”(同上)。因为莫克尔是天主教徒,所以关系是在“为全能的上帝效劳”就必须赢得人的心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建立起来的,这是一出莫克尔也参加演出的喜剧。

① 本页和下页删节处的文字在原稿中已被划去,无法辨认。——编者注

“在1840年间金克尔也被任命为科隆基督教教区的牧师助手，他每星期日早晨到那里去讲道。”(第193页)

传记作者的这个说明提醒我们谈一谈金克尔的神学家的立场。“在1840年间”，批判已经最无情地分析了基督教的内容，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科学的[……]同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在这个时期，金克尔当了传教士。但是他既没有正统派的毅力，又缺乏客观地理解神学的能力，他像克鲁马赫尔一样，是以多愁善感的空谈方式接受基督教的，他把基督描绘成“朋友和老师”，企图抛弃基督教形式上的“丑陋的东西”，并且用空洞的套话来偷换它的内容。用形式偷换内容、用空话偷换思想这套手法在德国造就了整整一批牧师空谈家，他们自然是要把民主当作自己最后的避难所。讲神学有时总还需要有一些哪怕是表面的学问，讲民主则相反，空洞的套话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在这里，毫无内容的响亮的说教、空谈完全代替了思想和对情况的见解。金克尔研究神学不过是从基督教教义中摘录一些感伤的东西，采取克劳伦的方式加以阐述，在他的演说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这种胡说八道的说教，这种说教有时也被叫作“散文诗”，而且他可笑地企图以此来证明他有“诗人的使命”。不过，他创作诗的目的不是要种植真正的月桂树，而是要栽培红酸浆果来装饰他那平凡的道路。他想用方便的形式而不想在内容上解决冲突，这种性格上的软弱也在他的大学讲师的位置上表现出来。他“模仿大学生的”举止，来回避同职业上的旧的学究气作斗争，于是，讲师变成了大学生，而大学生则上升为编外讲师。这一派里出现了整整一代的施特罗特曼们、叔尔茨们以及同他们类似的人物，这些人归根到底只能在民主的招牌下说他们的套话，研究他们的学问，完成他们的无足轻重的“崇高使命”。

新的恋爱关系现在发展为关于小公鸡、小母鸡和小鸡蛋¹⁷⁵的故事。

1840年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一方面，黑格尔哲学批判地运用于神学和政治使科学革命化；另一方面，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登位开始了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资产阶级的立宪要求表面上还是十分激进的。那时模糊的“政治诗歌”逐渐消失，而新出现了日报这样一种革命力量。

哥特弗里德这时候做了些什么呢？莫克尔同他一起创办了《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第209页）和小金虫协会。这个刊物唯一的

“宗旨就是约一些密友每周举行一次愉快的和享乐的晚会，使参加者能够把自己的作品供爱好艺术的善意的听众评断”。（第209—210页）

小金虫协会的真正意图是要解开蓝色花朵之谜。集会是在莫克尔家中举行的，其目的是在从事美文学的平庸的大学生圈子里把莫克尔捧为“女王”（第210页），把金克尔捧为“大臣”（第255页）。这两个未被承认的美丽的灵魂可以在小金虫协会里自得其乐，以补偿“无情的人世给予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第296页）。他们可以在他们所扮演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蓝色花朵的角色中相互承认，而扮演他人成了自己的第二天性的哥特弗里德应该感到幸福了，因为他终于创立了真正的“业余剧团”（第254页）。这一出滑稽剧本身同时成了实际发展的序幕：

“这些晚会也给了他到莫克尔双亲家中去拜访莫克尔的机会。”（第212页）

再补充一点，小金虫协会是对格丁根的林苑协会¹⁷⁶的模仿，不同的只是，后者标志着德国文学中的一个发展时期，而小金虫协会只

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地方性的可笑仿制品。作为辩护士的传记作者自己承认，塞巴斯蒂安·隆加德、莱奥·哈瑟、卡·阿·施伦巴赫等等这些“快活的小金虫”(第 254 页)都是些死板、平庸、懒惰和无足轻重的大学生。(第 211 和 298 页)

哥特弗里德自然立刻就把他的未婚妻同莫克尔“在心里作了比较”(第 221 页),不过“关于结婚和婚姻生活的问题,暂时还没有时间来作无谓的思考(其实,他是惯于这样做的)”(第 219 页)。总之,他就像布利丹的驴子¹³¹一样,在两堆干草之间犹豫不决。但是饱经世故和比较讲求实际的莫克尔却“清楚地看出了这种看不见的联系”(第 225 页);她决定促成这个“机缘或天赐良缘”。(第 299 页)

“有一天,哥特弗里德在通常因为学术教学工作而不能去看莫克尔的时候到她那里去。他轻轻地走到她的房门前,听到了哀怨的歌声。他注意地听着:

‘你走过来了,我的双颊
泛起绯红……
多少难言的痛苦,
唉,你却不知!’

长长的、悲哀的音调结束了她的歌声,并慢慢地消失在空气中。”(第 230 和 231 页)

哥特弗里德自以为未被察觉就返回来,回到家中觉得这一情节非常有意思,便写起绝望的十四行诗,把莫克尔比作罗累莱(第 233 页)。为了躲避罗累莱和保持对索菲娅·伯格霍尔德小姐的忠实,他打算在维斯巴登找一个教师的席位,但是被回绝了。除了上述偶然事件,还有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机遇。不仅“太阳转过了室女座”(第 236 页),而且哥特弗里德同莫克尔乘着小船在莱茵河里荡漾,一艘从旁驶过的轮船掀翻了小船,哥特弗里德抱着莫克尔游到了岸边。

“当他紧抱着被救者游近岸边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只有这个女人才能给他幸福。”(第 238 页)

这一次哥特弗里德终于不是想象地，而是实在地经历了小说《亲合力》中的一幕。这一下问题解决了。他同索菲娅·伯格霍尔德分手了。

爱情之后便是阴谋。牧师恩格斯代表教务评议会告诉哥特弗里德，说他是新教牧师，同离了婚的女人，况且还是个天主教徒结婚不合体统。哥特弗里德引用了永恒的人权，慷慨激昂地提出了以下几点：

1. “他同那位女士在希尔金普兴饭店里喝咖啡，这件事并没有什么罪过。”(第 249 页)

2. “事情还没有决定，因为他到现在为止既没有公开声明，他打算同这位女士结婚，也没有说没有这个打算。”(第 251 页)

3. “至于信仰问题，那么还不知道将来会怎样。”(第 250 页)

“现在请您到我家里喝一杯咖啡。”(第 251 页)

哥特弗里德说完了这句话，便同无法拒绝邀请的恩格斯牧师一起离开了舞台。哥特弗里德善于这样威严而温和地解决同现存关系发生的冲突。

小金虫协会必然对哥特弗里德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引用下面这一段话来加以说明：

“1841 年 6 月 29 日，这一天隆重地庆祝小金虫协会成立一周年。”(第 253 页)“关于谁应当受奖的问题，得出了一致的决定。哥特弗里德谦恭地跪在女王的面前，女王把当然的桂冠戴在他的灼热的头上，这时夕阳的炽热的光辉照耀

在诗人的容光焕发的脸上。”(第 285 页)

在“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隆重地接受了想象的诗人荣誉之后,蓝色花朵也赶忙表示了自己的感情和愿望。在这个晚上,莫克尔演唱了由她自己配曲的小金虫协会会歌,歌词的结尾概述了协会的全部意图: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

小金虫,飞吧!

谁老了谁就找不到老婆,

因此,不要过多地倾听和考虑!

小金虫,飞吧!”^①

天真的传记作者说,“这里所包含的求婚的意思,完全是无意的”(第 255 页)。哥特弗里德懂得这个意图,“但是并不想过早地放弃”两年之内继续在小金虫协会里接受人们加给他的桂冠和作为眷恋的对象向他暗送的秋波。1843 年 5 月 22 日,他和莫克尔结婚了,在这以前,莫克尔尽管不信教,却根据下面这个荒谬的借口信起新教来了:“新教与其说是以确定的信条为基础,不如说是以伦理概念为基础。”(第 315 页)

“我们从历史中学到:

蓝色花朵决不可相信!”

哥特弗里德是在使她从不信教转向新教的借口下同她结合的。现在莫克尔要读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因而又变得不信教了,

^① 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1850 年汉堡版第 1 卷第 257 页。——编者注

“他惴惴不安地随她沿着怀疑之路走向否定的深渊。他同她一起艰难地通过现代哲学的迷宫。”(第 308 页)

他走向否定并不是由于在当时已经对群众发生了影响的哲学的发展,而是由于一时的情绪。

从他的日记里可以知道,他究竟从这个哲学迷宫里得到了什么:

“我倒愿意看一看,这个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巨大的浪潮会不会把我推向泛神论!!”(第 308 页)

好像这个浪潮不是恰巧超出泛神论的范围,好像费尔巴哈就是德国哲学的最新成就!

日记里接着说道:“我的生活的基石并不是历史的认识,而是牢固的体系,神学的核心不是教会史,而是教义。”(同上)

好像德国哲学不是恰巧把牢固的体系溶化在历史的认识里,不是恰巧把教义的核心溶化在教会史中! 这些自白十分明显地刻画出这位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对这位民主主义者说来,运动本身又只是达到某些不容辩驳的永恒真理即腐朽的静止点的一种手段。

根据哥特弗里德这本有关他的整个发展状况的辩护性的流水账,读者可以自己判断这位装腔作势、多愁善感的神学家身上究竟有什么革命因素。

二

金克尔的生活的第一幕就这样结束了，在二月革命发生以前，他生活中没有什么值得提及的事情。科塔的出版社在不付稿酬的条件下出版了他的诗集；但是大部分诗集都堆积在仓库里，直到前面提到的作者在巴登那次受轻伤为止，这个事件给了他以诗人的声望，并为他的作品开辟了市场。

但是，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实传记作者没有提到。金克尔自己承认，他最大的愿望是至死要当上一个剧院的老经理^①，他的理想人物是一个叫艾森胡特的巡回演出的丑角演员。这个人带着他的戏班子沿莱茵河来回流浪，最后发了疯。

哥特弗里德除了在波恩发表具有说教口才的讲演，有时也在科隆进行一些神学和美学方面的富于艺术性的表演。当二月革命爆发时，他用以下的预言结束了这些表演：

“从巴黎传来的战斗的雷声对德国和整个欧洲大陆来说也标志着一个美好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暴风雨之后，接着便吹起令人舒畅的自由的和风；从此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幸福的时代——君主立宪的时代。”

^① 见 1851 年 3 月 3 日格·维尔特致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立宪君主政体把金克尔提升为副教授^①，以答谢他的这番恭维。但是，这个承认并不能使未来的大人物感到满意。看来，君主立宪政体决不急急于让“他的荣誉遍布全球”。此外，新的政治诗^②给弗莱里格拉特带来的桂冠使这位加了冕的小金虫诗人坐立不安。于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便来了一个向左转，起先成为民主立宪派，然后又成为民主共和派（循规蹈矩的和温和的）。他很想当议员，但是5月的选举^③既没有把他送到柏林也没有把他送到法兰克福。然而他不顾这些最初的失败，继续争取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说，他花了不少力气。起先他很明智沉着，只在狭小的本地区活动。他创办了《波恩日报》，一种以最乏力的民主主义空谈和愚昧能够拯救祖国的幼稚看法著称的地方小报。他把小金虫协会提高到民主派大学生俱乐部的水平，从这个俱乐部里不久便出现了一群这样的学生，他们向波恩地区的所有村落传播老师的荣誉，并把金克尔教授先生硬塞给每一个集会。他自己在娱乐场同食品杂货店老板大谈其政治，同正直的手工业师傅友好地握手，甚至在金德尼希和塞尔沙伊德的农民中宣扬他热爱自由的情怀。但是他特别同情可敬的手工业师傅阶层。他同他们一起，为手工业的衰落，为自由竞争的惨重后果，为现代的资本和机器的统治而痛哭流涕。他同他们一起制定了恢复行会制度和消灭非法独立经营¹⁷⁷的计划，为了完成他所想的这一切，他在《手工业，救

① 1846年2月6日金克尔被任命为波恩大学艺术史和文化史副教授。——编者注

② 斐·弗莱里格拉特《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1849年科隆版第1册。——编者注

③ 1848年5月举行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选举和普鲁士制宪议会选举。——编者注

救自己吧!》这本小册子中阐述了他在娱乐场同小业主们谈话的结果。

为了使人一眼看清金克尔先生的位置究竟应该在哪里,他的著作具有怎样的法兰克福般的全民意义,他把这本著作献给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国民经济委员会的 30 位委员”。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对手工业者阶层的“美”的探讨,使他立刻得出结论:“手工业者阶层目前完全分裂了。”(第 5 页)分裂就在于:有一些手工业者“光顾食品杂货店老板和官吏的娱乐场”(多么大的成就!),而其他的人则没有去;其次,有一些手工业者受到了教育,而另一些没有受到。虽然有这种分裂,但作者仍然看到了可喜的征象:在可爱的祖国,各地都成立了手工业者协会和举行了手工业者会议,并且到处都在进行改善手工业者阶层的状况的宣传(请回忆一下 1848 年的温克尔布莱希哀歌¹⁷⁸)。为了也对这个有益的运动贡献一点好主意,他陈述了他的拯救纲领。

首先,作者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通过限制来消除自由竞争的弊病,而又不根本取消自由竞争。在这个问题上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立法应当防止不具备必需的本领和熟练技能的青年成为师傅。”(第 20 页)

“每一个师傅只能有一个学徒。”(第 29 页)

“教授手艺也必须经过考试。”(第 30 页)

“考试时考生的师傅必须在场。”(第 31 页)

“为了保证必要的熟练程度,我们要求立法规定,今后凡不满 25 岁的人都不得成为师傅。”(第 42 页)

“为了考察本领,我们要求今后每一个新的师傅都要经过考试,而且是当众考试。”(第 43 页)“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考试要完全免费。”(第 44 页)“所有居住在农村里的同行师傅也要经过”(第 55 页)这种考试。

朋友哥特弗里德自己干着挨户兜售政治的勾当，却希望把“流动的或挨户兜售”其他普通商品的生意人当作不正当的生意人加以取缔。（第 60 页）

“手工业品的生产者想把自己的财产从营业中抽出，而且要对自己有利，让自己的债权人受到欺骗。就像一切含糊的东西用外国名字来表示一样，这种行为也用了一个外国名字来表示，这就叫破产。因此，他很快地把自己的成品抛向邻近地区，并立刻把它们卖给出价最高的人。”（第 64 页）这种甩卖行为“原来只是我们的可爱的邻居——商业阶层倾入手工业者园地的污秽”，这种行为必须加以取缔（朋友哥特弗里德，如果抓住祸根并立即取缔破产本身，不是更干脆得多吗？）。

“赶年集当然是另一回事。”（第 65 页）“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当让各个地方决定，是否在为集市问题召开的全体公民讨论会上由多数（！）来决定保存还是取缔固定集市。”（第 68 页）

哥特弗里德后来转到手工业和机器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的“有争议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下面的原则：

“让每一个出售成品的人只经销他能亲手制造出来的商品。”（第 80 页）“因为机器和手工业分离，所以二者都走向衰落，并脱离了正道。”（第 84 页）

他想通过手工业者（如一个城市的装订工人）联合起来和共同购置机器的办法把手工业和机器结合起来。

“因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只是为了完成订货而利用机器，他们的生产费用就能够少于拥有工厂的商人。”（第 85 页）“资本可以用联合来摧毁”（第 84 页）（而联合可以用资本来摧毁）。

后来，他又把自己关于波恩的联合起来的经考试合格的装订工人“购置画线机、切边机和切纸板机”（第 85 页）的想法概括为“机器所”：

“各地都必须通过有关行业的师傅的联合,设立同小商人的工厂相仿的企业,这些企业只为当地的师傅制造订货,不接受其他雇主的任何订货。”(第 86 页)这种机器所的特点是:“商业性的经营”只是“在开始时才需要”(同上)。哥特弗里德“高兴地”叫道:“同这种想法一样新颖的任何想法,在实现之前,都需要非常平静和实际地加以考虑,直至考虑到最微小的细节。”他号召“每一种手工业都要为自己作出这样的考虑。”(第 87、88 页)

接着,便是驳斥利用囚犯劳动的国家竞争,对罪犯流放地(《建设一个人道的西伯利亚》第 102 页)的回忆,最后是攻击军事部门中的“所谓手工业者连队和手工业委员会”。不言而喻,手工业者阶层所担负的军事重担应当减轻,为此,国家必须按照高于它自己的生产成本的价格向手工业师傅订购器材^①。

“这样,竞争问题就解决了。”(第 109 页)

哥特弗里德然后谈到了第二个基本论点,这就是国家应当给手工业者阶层以物质援助。哥特弗里德完全是从官吏的观点来看待国家,他认为,最容易帮助手工业者的显然是靠庞大国库的预支款建立手工业局、贷款协会等等。至于国库应当从哪里得到这笔资金,这里当然没有加以研究,因为这是问题的“不美的”方面^①。

最后,我们的神学家当然要重新扮演道德说教者,要向手工业者阶层作关于道德的报告,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自己。起初是“抱怨长期借款和扣款”(第 136 页),并且要求手工业者凭良心回答这样的问题:“我的朋友,你是否坚持你所做的每一种活都收取同样的和不变的报酬?”(第 132 页)借此机会,他特别警告手工业者不要向“有钱

^① 哥·金克尔《手工业,救救自己吧!》1848年波恩版第89—108、110、130页。——编者注

的英国人”要过高的价钱。歌特弗里德苦苦想出了答案：“每年的结算是一切祸害的根源。”(第 139 页)然后是关于手工业者的妻子爱打扮和手工业者本人嗜酒的耶利米哀歌(第 140 页及以下各页)。

手工业者阶层能够用来改善本身状况的手段是：“行会、保健基金会、手工业者仲裁法庭”(第 146 页),最后是工人教育协会(第 153 页)。这种教育协会的最新成就是：

“歌唱和朗诵的结合终于架起了一座通往戏剧表演和手工业者剧场的桥梁,必须把这种剧场始终看作这些美学追求的最终目的。只有当劳动阶级重新学会登台表演的时候,对他们的艺术教育才告完成。”(第 174、175 页)

这样一来,哥特弗里德便顺利地把手工业者变成了喜剧演员,从而自己也得到了好处。

但是这种讨好波恩手工业师傅的行会要求的把戏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朋友哥特弗里德由于庄严许诺提出恢复行会的议案,因而被选为代表波恩出席钦定的第二议院的议员。“从这一瞬间起哥特弗里德感到自己”幸福了。

他立刻动身前往柏林,由于他认为政府打算把第二议院建立成经过核准的立法者师傅的永久“行会”,他准备永久居住在那里,并决定叫妻子和孩子随后也到他那里去。但是第二议院被解散了,哥特弗里德在享受了为时不久的当议员的乐趣之后,伤心失望地回到了莫克尔的身边。

此后不久,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之间爆发了冲突,接着德国南部和莱茵河畔也掀起了运动^①。祖国在召唤,哥特弗里德响应了召唤。

^① 见本卷第 97—101 页。——编者注

在锡格堡有后备军的军械库，而且锡格堡仅次于波恩，是哥特弗里德最经常播种自由的地方。因此，他同他的朋友前尉官安内克联合起来号召他所有的追随者向锡格堡进军。集合地点在浮桥。本来应当来100多人，但是等了很久以后，哥特弗里德数了一下他的好汉们，刚够30人，而且其中（可以说这是小金虫协会的洗不尽的耻辱）总共只有3个大学生^①！虽然如此，哥特弗里德仍然同他的一伙人勇敢地过了莱茵河，直扑锡格堡。夜漆黑，下着雨。突然勇士们的背后传来了马蹄声。他们躲在路旁，枪骑兵的巡逻队从他们身旁飞驰而过。有几个卑鄙的坏蛋泄露了秘密，当局已经得到情报，无法进军了，于是只好退回。这一夜哥特弗里德所感到的刺心的痛苦，只有他以前当克纳普和沙米索全都拒绝把他的初期诗作收进他们的《缪斯年鉴》时所感受的痛苦可以相比拟。

这一切事情发生以后，他已经不能再留在波恩了。可是，难道普法尔茨不是为他进行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场地吗？他动身前往凯撒斯劳滕，因为他必须有一项职务，所以他便在军事局里得到一个拿干薪的闲差（据说是管理海军事务）。他照例是在当地的农民中兜售自由和人民福利来赚取面包，听说，在某些反动地区他的生意并不受人欢迎。虽然有这些小小的不幸，人们仍然可以看到，金克尔肩负行囊精神饱满地在大路上走着，从那时起，所有的报纸都按行囊这一不变的特征来描写他。

但是，普法尔茨的运动很快就结束了，金克尔重新出现在卡尔斯鲁厄，不过肩上背的已不是行囊而是火枪，从此火枪又成了他的不变的特征。据说，这枝火枪非常美，枪托和枪柄是用桃花心木做的。无

① 路·迈尔、卡·叔尔茨和爱·温克尔曼。——编者注

论如何，这是一枝很美的、富于艺术性的火枪。美中不足的是，朋友哥特弗里德既不会装弹，不会瞄准，不会射击，也不懂步法。因此，有一个朋友问他：他为什么要去战斗，哥特弗里德回答道：唉，波恩我是不能回去了，可是我必须活下去！

于是，哥特弗里德加入了战斗者的行列，加入了侠义的维利希的部队。哥特弗里德的许多战友竭力要我们相信，从这时起，他已经同这支队伍共命运了，他很谦虚，像个普通的志愿兵，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或是在困难的时候，他都和蔼可亲，不过多半是坐在收容掉队者的马车上。在拉施塔特¹⁷⁹，这位真理和正义的真正见证人不得不经受了后来使他在全德国人民的赞叹声中成为纯洁无瑕的受难者的考验。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形到现在还没有确实查明，可以相信的只是，志愿部队在散兵战中迷了路，这时从侧翼向他们射来了几枪，一颗流弹轻轻地擦过了我们的哥特弗里德的头，他大叫一声“我被打死了！”便倒在地上。虽然他并没有被打死，但是已不能同其余的人一起撤退了；他被送到一个农民的家里，在那里他向纯朴的黑林山人请求道：“救救我吧，我就是金克尔！”最后，在这里他被普鲁士人发现，于是便当了巴比伦之囚。

三

从被俘的时候起便开始了金克尔生活中的新时期,这个时期同时也开辟了德国小市民发展史上的新时代。小金虫协会一听到金克尔被俘,便立刻写信给所有的德国报纸,说伟大的诗人金克尔面临着被战地法庭判处枪决的危险,德国人民,尤其是有教养者,而特别是太太小姐们,应当竭尽全力来拯救被俘的诗人的生命。据证实,他自己这时写了一首诗,诗中把自己同“他的朋友和老师基督”相比,他还谈到他自己,他说: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从这时起七弦琴成了他的标志。于是,德国突然知道了金克尔是一个诗人,一个伟大的诗人。从这一瞬间起,大批德国小市民和唯美主义的庸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也都参与演出了我们的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主演的关于蓝色花朵的喜剧。

这时普鲁士人已经把他交付军事法庭,这使他有机会在经过了长时期的间歇以后第一次重新向他的听众发表令人感动得流泪的演说,就像他在科隆当牧师助手时成功地做过的一样(根据莫克尔的见证),而且科隆也注定了不久就要重新欣赏他在这一专业方面的辉煌成就。他在军事法庭上发表了辩护词¹⁸⁰,由于他的一位朋友的不慎,这一辩护词后来不幸被柏林《晚邮报》传到了广大公众的耳朵里。在这个辩护词中金克尔“抗议”

“把我的行为同革命不幸最后沾上了的污垢和淤泥(我知道这一点)相提并论”。

金克尔发表了这一高度革命的辩护词之后,被判处 20 年的要塞监禁;不过后来又恩准改为普通监禁。他被转解到了瑙加德,据说他在那里曾经被迫纺羊毛,因此,他的标志先是行囊,后是火枪,再后是七弦琴,而从现在起则变成了纺车。以后我们将看到,他怎样带着钱袋这一标志远渡重洋。

与此同时,在德国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众所周知的天生有美丽的灵魂的德国小市民,由于 1849 年的沉重打击而对他们的最甜蜜的幻想完全失望了。任何一个希望都没有实现,在青年们的沸腾的胸膛里甚至开始对祖国的命运感到绝望。所有的人都灰心丧气,到处都在渴求民主主义的基督,真实的或想象的殉难者,因为他会像羔羊一样温顺地以自己的受难承担起小市民世界的罪过,他的痛苦会以急性的方式体现出一切庸人的怯懦而慢性的苦闷。

以莫克尔为首的小金虫协会准备来满足这一共同感到的需要。的确,除了被俘的坐在纺车旁的西番莲金克尔,除了这个泪水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泉源,这个传道者、美学教授、议员、政治兜售商、火枪手、新出现的诗人和剧院老经理的结合体,还有谁更适于表演这出伟大的蒙难喜剧呢?金克尔是时代的人物,而他也正是作为时代人物立刻被德国庸人接受的。所有的报纸上满篇都是被俘诗人的逸事、特写、诗篇、回忆。他在狱中的苦难被无限地夸大,描绘得像神话一样;报纸每月要报道一次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在所有的市民俱乐部里和茶会上,人们都带着沉痛的心情想起他。有教养的阶层中的少女因他的诗篇而感伤叹息,体会过眷恋之苦的老处女在祖国各个城市里为他的男性力量的逐渐丧失而痛哭。而参加运动的所有其他普通

牺牲者——被枪杀者、阵亡者、被俘者，在这个唯一的牺牲羔羊面前，在这个征服了男女庸人的心的大丈夫面前都销声匿迹了，人们仅仅为他而泪如雨下，自然也只有他一个人能给这些泪水以报答。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的济格瓦特时期¹⁷²，丝毫不比上一世纪的文学中的济格瓦特时期逊色；而济格瓦特—金克尔从来也没有感到还有什么比扮演这个角色更好了。在这个角色中，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是由于他所没有做的事情，他之所以伟大并不是由于坚强和反抗，而是由于软弱和恭顺，在这一角色中他的唯一任务是有礼貌、有感情地忍耐。饱经世故的莫克尔善于从公众的这种软心肠中攫取实利，立刻展开了最积极的经营活动。她着手重新出版哥特弗里德的一切已经发表过和没有发表过的突然身价百倍、风行一时的作品，并且在公众中替这些作品吹嘘。她趁机呈献出她自己从昆虫世界里得来的生活经验，例如《萤火虫的历史》。为了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钱，她通过小金虫施特罗特曼把哥特弗里德日记中的隐私公之于众。她组织了各种捐款，并善于以无可置疑的经营者的机灵和极大的坚忍精神，把有教养的人们的软心肠变成硬塔勒^①。同时她还感到满意的是，她

“每天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到德国最伟大的人物集聚在自己的周围，例如阿道夫·施塔尔”。

这种济格瓦特狂在科隆陪审法庭开庭时达到了顶点。哥特弗里德于1850年春天在法庭上作了访问演出。这里举行了关于袭击锡格堡一案的审判，金克尔被押解到了科隆。由于在这篇概述中哥特弗里

① 德国旧银币。——编者注

德的日记占了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位目击者的日记片断也是完全恰当的。

“金克尔的妻子在监狱中探望了他。她隔着铁栏用诗句向他问候,而他,我想是以六步韵诗作了回答。然后两人相对而跪,站在那里的狱吏,一个老军曹,弄不清在他面前的是两个疯子还是喜剧演员。后来检察长问他,他们说了些什么,狱吏回答说,虽然他们讲的是德语,但是他连一个词也听不懂。据传金克尔夫人对此回答说,根本就不应当任命一个在文学和艺术方面毫无教养的人充当狱吏。”

在陪审员面前,金克尔完全扮演成催人泪下的角色,《少年维特之烦恼》时代中济格瓦特时期的文学家。

“‘法官先生,陪审员先生——我的孩子们的报春花色的眼睛——莱茵河的碧绿的水——同无产阶级握手并不有失尊严——囚犯的苍白的嘴唇——温和的故乡空气’——①以及其他胡话,这一整篇著名的辩护词就是如此,公众们、陪审员们、检察官们、甚至宪兵们听了这篇辩护词都流出了悲伤的眼泪,于是法庭在一片哭泣和呜咽声中一致通过宣判无罪。金克尔当然是一个可爱的好人,而另外,他还是宗教、政治和文学的回忆的令人厌恶的混合体。”

这实在让人受不了。

所幸的是,这个痛苦的时期很快就因金克尔被解救出施潘道监狱这件富于浪漫色彩的事情而告终。在这个解救事件中重演了狮心理查和布朗德尔的故事¹⁸¹,不过在这里,坐在监狱里的是布朗德尔,而狮心则在外面演奏手摇风琴,而且布朗德尔不过是一个平庸的街头艺人,而狮心实质上是像兔子一样的胆小鬼,狮心就是小金虫协会里的大学生叔尔茨,一个志大才疏的耍弄阴谋的小人物,不过他还

① 哥·金克尔《1850年5月2日在科隆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编者注

完全能够弄清“德国的拉马丁”。把金克尔救出后不久，大学生叔尔茨便在巴黎发表声明说，他清楚，受他利用的金克尔当然不是世界的灯塔，正是他叔尔茨，而不是别人，肩负着担任未来的德意志共和国总统的使命。这个小人物，一个曾被哥特弗里德的忧郁而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过的“穿棕色燕尾服和浅蓝色外套的”大学生，是靠牺牲一个可怜的狱卒^①而救出了金克尔。这个狱卒现在正因此而坐牢，不过他怀着一种崇高的感情：他是为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自由而牺牲的受难者！

① 布鲁纳。——编者注

四

在伦敦我们又看到了金克尔，这一次，他靠着坐牢的光荣和德国小市民阶层的泪水而成了德国头号大人物。朋友哥特弗里德意识到自己的崇高的使命，很善于利用当前的一切有利的时机。富于浪漫色彩的解救事件在国内给了金克尔狂热以新的推动，这种推动被非常巧妙地引上正常的轨道，取得了物质成果。同时，这个世界城市给这个载誉而来的人开辟了重新博得荣誉的新的广阔场所。他很清楚：他一定会成为当代的名流。为此，他暂时放弃了一切政治活动，首先呆在家中把胡子重新留起来，没有胡子便不成其为先知了。然后，他访问了狄更斯、英国自由派报纸、伦敦西蒂区的德国商人，主要访问了该地的美学界的犹太人。他是所有人的理想人物。在一些人眼中是诗人，在一些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爱国者，在一些人眼中是美学教授，在一些人眼中是基督，在一些人眼中是威严的受难者奥德赛，但是在所有的人的眼中，他都是温柔的、灵巧的、好心的和仁慈的哥特弗里德。他一直到狄更斯在《家常话》里颂扬他^①和《新闻画报》上刊登了他的像片时才安静下来。他使少数旅居伦敦在异乡也感受到金克尔的烦恼的德国人活动起来，是为了要造成一种是他们邀请他去作关于现代剧的讲演的假象，并且把讲演会的门票整叠整叠地分发

^① 查·狄更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一生的三个画面》。——编者注

到德国商人的家里去。他不耻于四处奔走,刊登夸大其词的广告,进行诈骗,到处纠缠,对这些公众卑躬屈节。可是,大功到底告成了。哥特弗里德心满意足地陶醉于自己的荣耀,在水晶宫⁶⁴的大镜子里欣赏自己的映像,可以说,他感到非常舒畅。

他的讲演得到了承认(见《宇宙》)。

《宇宙》。《金克尔的讲演》182

“有一次在看到德布勒的朦胧影像时,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能否用‘语言’创作出这样乱七八糟的作品,能否把朦胧影像讲清楚?批判者一开口就不得不承认,在这种情况下,批判的自主性就像颤动的弦上发出的一个逐渐停息的音符的逐渐消失的声音那样,在激情的共鸣的通了电流的神经里颤动,这当然是很不愉快的事。不过,我宁愿放弃对科学的无感觉作枯燥无味的、学究式的分析,而不愿放弃德国流亡者的迷人的缪斯在我的感觉的思想游戏中产生的共鸣。金克尔绘画的这种基本色调,他的和音的这种共鸣范围,就是那种响亮的、创造性的、建设性的、逐渐形成的‘字眼’——‘现代思想’。人类对这一思想的‘判断’从混乱的虚伪传统中引伸出了真理,并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公共财产置于天生聪明的、有逻辑性的少数人的保护之下,这少数人使真理脱离了有信仰的无知而走向无信仰的有知。无信仰的有知的责任,就是使由虔诚的错觉而产生的神秘主义世俗化,铲除愚昧的习惯的专制主义,利用怀疑这个不停工作的哲学断头台来砍掉权威们的头,并且通过革命使人民走出神权政治的迷雾,迈向花朵盛开的民主主义(废话)的原野。顽强地、坚韧不拔地研究人类的编年史,并说明人类本身,这是一切变革参加者的伟大的任务,而这一点是被驱逐的反叛诗人非常清楚的,他在前3个星期的每星期一晚上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讲述现代戏剧史时,讲述了自己的‘破坏性的观点’。

一个工人”

仅仅从“共鸣范围”、“逐渐消失的声音”、“和音”和“通了电流的神经”这几个用语来判断,大家都认为,这个工人就是金克尔的非常亲近的亲人。

然而，就是这个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来的自我享乐的时期也不会永久地维持下去。对现存世界秩序的末日审判，民主主义的末日审判，光荣的 1852 年 5 月一天天临近了。为了整装待发地迎接这个伟大的日子，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必须重新披上政治的狮子皮，必须同“流亡者”取得联系。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伦敦的“流亡者”，这是由法兰克福议会、柏林国民议会和下院的前议员，巴登战役¹⁸³的头头们，演出帝国宪法¹⁸⁴喜剧的泰斗们，没有读者的作家，民主派俱乐部里和代表大会上的空谈家，第十二流的报刊作家等等人物组成的混合物。

1848 年的德国的大人物们已经站在可耻的结局的边缘，而“暴君”的胜利却挽救了他们，把他们抛到了国外，使他们变成了受难者和圣徒。反革命拯救了他们。大陆上的政治发展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引到了伦敦，于是伦敦便成了他们的欧洲中心。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这些世界的解放者必须干出点什么事情，发动点什么事情，好使公众日复一日地重新想起他们的存在。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防止产生这种印象，似乎世界历史不靠这些强者的帮助也能前进。这堆人类渣滓越是由于自身的无能和受现存条件所限不能完成任何实际工作，他们就越是需要积极地从事毫无益处的表面活动，这种活动的参加者总是非常夸张地宣扬想象的活动、想象的政党、想象的战斗和想象的利益。这些人越是没有能力真正唤起新的革命，他们就越是不得不只在想象中实现这个未来的可能性，老早就分好位置，并且预先尝了尝当权的滋味。这种装腔作势的活动的表现方式是大人物的互助保险会和未来政府职位的互助保障会。

五

建立这种“组织”的初次尝试早在1850年春天就作过了。那时伦敦各处都散发了用夸张的笔调写成的《致德国民主派的通告信草案。草稿》和《致领袖们的附函》。在通告信和附函中号召建立民主的统一教会。最近目标是：建立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¹⁸⁵来统一管理流亡者的事务，在伦敦建立印刷所，团结一切派别反对共同的敌人等等。这样一来，流亡者将会重新成为国内运动的领导中心，流亡者的组织将会为广泛的民主派组织奠定基础。卓越人物中的穷困者将会作为中央局的委员从德国人民所付的税款中取得报酬。由于“德国流亡者在国外不仅没有一个出色的英雄，而且更糟糕的是缺乏共有的财产基金”，实行这种课税就尤其显得恰当。同时也不隐讳，现有的匈牙利、波兰和法国的委员会是这个“组织”的榜样，而且整个文件中透露出对这些卓越的同盟者的优越地位的羡慕。

这个通告信是鲁道夫·施拉姆和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两位先生合写的。在他们的背后还隐藏着那时住在奥斯坦德以通讯委员身分出现的光辉形象阿尔诺德·卢格先生。

鲁道夫·施拉姆先生是个喜欢争吵的、夸夸其谈的、极其糊涂的傀儡，他把《拉摩的侄子》中的一段话：“我宁愿做个厚颜无耻的空谈家，而不愿做默默无闻的人”当作生活中的座右铭。康普豪森先生在

他的权力鼎盛时期是很乐意授予这个年轻气盛的克雷费尔德人以重要职位的,如果这样提升一个普通的见习法官并不有失体面的话。由于官僚制度的礼仪,施拉姆先生只有操民主派的生涯这一条路可走。在这个舞台上,他一度真的当了柏林民主派俱乐部的主席,后来在几个左翼议员的帮助下当选为代表施特里高出席柏林国民议会的议员。在这里平时非常爱讲话的施拉姆却表现得非常沉默,但是又连续不断地发牢骚。在制宪议会解散以后,这个民主派名流写了一本关于君主立宪的小册子^①,但是仍然没有重新当选。后来,在布伦坦诺政府时期,他在巴登呆了一段时间,并且在那里,在“坚决前进俱乐部”¹⁸⁶里认识了司徒卢威。来到伦敦以后,他宣布打算脱离一切政治活动,因此,立刻发出了上述的通告信。实际上官运不佳的施拉姆先生由于家庭的关系¹⁸⁷而设想自己是流亡者中的激进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并且真的相当成功地为激进派资产者画了一副漫画。

古斯塔夫·司徒卢威也是流亡者中比较重要的人物。他的山羊皮般的脸,他的狡猾而有点愚蠢的凸出的眼睛,他的微微发光的秃头,他的斯拉夫-卡尔梅克人的特征,乍一看像个不平常的人,而他的沙哑的喉音、充满感情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和妄自尊大的模样更加深了这种印象。可是,应该如实指出,由于目前对每个人来说要出风头都是越来越困难了,我们的古斯塔夫至少想用下面的行为来表明他不同于自己的同胞:时而充当预言家,时而充当大骗子手,时而充当修脚师,把最离奇古怪的琐碎事变成自己的主要职业,并宣传各式各

① 鲁·施拉姆《民主派在钦定第二议院采取的立场》1849年柏林版。——编者注

样的荒唐无稽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俄国出生，却突然热中于德国的自由事业，这是他在派驻联邦议会⁶的俄国使团中担任了一个编制外的职务并写了一本维护联邦议会的小册子^①之后的事情。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头盖骨是人类标准的头盖骨，所以他开始沉醉于骨相学，并且从此只信任那些头盖骨预先经他摸过和检验过的人。此外，他停止了肉食，开始宣传只进素食的福音。他也是气候的预言者，吸烟的热烈反对者，并积极地为德国天主教²¹的道德原则及水疗法作宣传。由于他对一切实证知识深恶痛绝，他当然热中于自由大学，在这些大学里应当取消四个系的课程¹⁸⁸，教授骨相学、面相术、手相术和关亡术。他非常顽强地想成为伟大的作家，这也完全符合他的特点，其原因恰恰是他的写作风格完全不同于一切可以称为风格的东西。

早在40年代初，古斯塔夫便创办了《德国旁观者》，这是他在曼海姆出版的一张小报，他握有这张小报的经营权，而这张小报就像一个固定观念一样，和他形影不离。此外，他在那时就已经发现，被他奉为新旧约的两本书，即罗泰克的《世界史》和罗泰克同韦尔克尔合著的《国家学词典》，已不再“符合时代的精神”，需要出版新的民主主义版本。古斯塔夫立即着手这一加工工作，预先以《国家学原理》为名出版了一个节录本；这个工作成了“1848年以来最刻不容缓的事情，因为已故的罗泰克没有经历过近年来的事情”。

与此同时，相继爆发了三次巴登的“人民起义”¹⁸³，古斯塔夫本人把这三次起义当作整个现代世界运动的中心点向我们作了历史的

① 即古·司徒卢威《关于根据德意志联邦法依法解决德意志各邦之间争执的第一个尝试》1830年不来梅版。——编者注

描述^①。在黑克尔起义之后，他立刻流亡异乡，正当他在巴塞尔张罗恢复他的《德国旁观者》的时候，他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德国旁观者》的曼海姆出版者^②另外找了编辑，继续出版当地的《德国旁观者》。真假《德国旁观者》之间斗争得非常激烈，甚至弄得两家报纸都垮了台。但是，古斯塔夫却草拟了一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法。按照该宪法，德国分成24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都有一名总统和两个议院。宪法上还附有精确地划分了领土的详细地图^③。1848年9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在这次起义里我们的古斯塔夫一身兼扮了凯撒和苏格拉底这两个角色。他利用了他能够重新来到德国土地上向黑林山农民详细说明吸烟有害的这段时间。在勒拉赫他出版了一张标题为《政府报。德意志自由国家。自由、幸福、教育》的通报。这张报纸登载了下列指令：

“第一条，取消根据上述情况对瑞士进口货征收的10%的附加税。第二条，责成关税主管人克里斯蒂安·弥勒执行本决定。”^④

他的忠实的阿马利亚分担了他的全部苦难，后来还用浪漫主义的笔调对此作了描绘^⑤。此外，她参加了被俘宪兵的宣誓典礼，给每

① 古·司徒卢威《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年伯尔尼版。——编者注

② 亨·霍夫。——编者注

③ 古·司徒卢威《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1848年比尔斯菲尔登版。——编者注

④ 1848年9月22日《共和国政府报。德意志共和国！繁荣昌盛，人人自由！》第1号第4版。——编者注

⑤ 阿·司徒卢威《巴登争取自由斗争回忆录》1850年汉堡版。——编者注

一个宣誓效忠于德意志自由国家的人带上红袖章，然后拥抱。可惜，古斯塔夫和阿马利亚被俘了，并且被囚于牢狱，在狱中，古斯塔夫并没有泄气，他立即开始继续按共和主义的精神改写罗泰克的《世界史》，直到第三次起义终于恢复了的自由时为止。那时，古斯塔夫成了真正的临时政府的委员，从那时起在他的诸多固定观念中又多了一个固定观念：对临时政府的狂热。他一担任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便立刻把委托他管的部门的事务弄得一团糟，并且推荐“叛徒”迈尔霍弗为陆军部长（见戈克《回顾……》1850年巴黎版）。后来他争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且获得6万弗洛林的支配权，但没有成功。布伦坦诺先生不久又解除了我们的古斯塔夫的行政重担，于是古斯塔夫便在“坚决前进俱乐部”¹⁸⁶里担任了反对派的领袖。他特别热中于指挥反动派反对布伦坦诺实行那些他本人曾经支持过的措施。虽然这个俱乐部被解散了，古斯塔夫也不得不流亡到普法尔茨，但是祸中有福，不可缺少的《德国旁观者》又在哈尔特山麓的诺伊施塔特出版了唯一的一号，这补偿了古斯塔夫所遭受的许多不应遭受的痛苦。另外还可以自慰的是，他在上巴登一个偏僻的小地方的补选中被选为巴登制宪议会的议员，这样他便可以以官方人士的身分回到巴登。在这个议会中古斯塔夫可以出风头的只有三个在弗赖堡提出的提案：（1）6月28日提议：宣布一切想同敌人举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2）6月30日提议：任命一个司徒卢威在其中有席位和选举权的新的临时政府；（3）后面这个提案被否决后，在同一天提议：由于拉施塔特战役的失利，继续反抗已成为无益的事，应当拯救上巴登的居民免遭战争的惊扰，为此必须发给每个公务员和士兵10天的薪饷，而制宪议会的议员则发给10天的津贴和旅费，然后吹着军号，打着战鼓开往瑞士。在这个提案也被否决以后，古斯塔夫立刻私自来到瑞士，然而却被詹

姆斯·法济的棍棒从那里赶到了伦敦，在这里他宣布了新的发现，即**人类六个祸害**。这六个祸害是：君主、贵族、教士、官僚、常备军、钱袋和臭虫。古斯塔夫的另一发现是：钱袋是路易-菲利浦的发明，从这个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是以什么样的精神来改写已故的罗泰克的著作的。古斯塔夫现在开始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宣讲这六个祸害，为此而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因而也就以感激的心情接受公爵阁下的检查了。这就是古斯塔夫对待第一个祸害——君主的态度。至于他对第二个祸害——贵族的态度的，我们的这位讲道义信宗教的共和党人在给自己定制的名片上自称为“司徒卢威男爵”。如果说他没有能够同样友好地对待其他几个祸害，那么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后来，古斯塔夫利用在伦敦的闲暇编制共和国历书，在历书中不是把圣徒的名字，而是只把志同道合者的名字，特别是经常把“古斯塔夫”和“阿马利亚”这两个名字摆在醒目的地位，月份所用的名称是按法兰西共和国历书¹⁸⁹仿制的德文名称，并且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对大家都有用的老一套的东西。另外，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和“坚决前进俱乐部”以及成立临时政府等可爱的固定观念又重新出现了。在所有这些方面他都得到了施拉姆的赞同，因此便产生了通告信。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伟大的**阿尔诺德·卢格**，由于他那副始终在期待着取得文官职位的警官形象而在一切流亡者中显得超群出众。决不能说，这位绅士由于特别顺眼的外表而给人以良好的印象。巴黎的熟人通常把他的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的脸型叫作貂脸。阿尔诺德·卢格，吕根岛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因参加蛊惑者¹⁹⁰的阴谋而在普鲁士的监牢里当了7年的受难者，一当他知道，只要浏览一下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就不用学习其他一切科学时，他便狂热地投

入了黑格尔哲学的怀抱。此外，他遵守着一种原则（这个原则他曾在一部短篇小说中阐述过，并极力想在他的朋友中间推行，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不幸的海尔维格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原则就是，在婚姻中也要获利。因此，还在青年时代他便通过婚姻给自己奠定了“物质基础”¹⁹¹。

他靠他的黑格尔词句和物质基础当上了德国哲学的看门人，这一身分使他有责任在《哈雷年鉴》和《德国年鉴》上通报初露头角的名人，并且称颂他们；他趁这个机会在著作方面十分巧妙地利用了他们。可惜，不久哲学上的无政府时期便来到了，在这个时期，已不再有公认的科学之王，施特劳斯、布·鲍威尔、费尔巴哈彼此相斗，各式各样的彼此格格不入的人物开始把简单明了的经典学说弄得糊里糊涂。这时我们的卢格茫然若失，不知所从；他那些本来就是毫无联系的黑格尔范畴，现在更是乱成一团了，于是他突然强烈向往一种强大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再也不必那样认真进行思考和写作了。

在《哈雷年鉴》上，卢格扮演了已故的出版者尼古拉在过去的《柏林月刊》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尼古拉一样，卢格也把出版别人的著作并从中攫取物质利益和可以表露自己智慧的文字材料看作自己的主要贡献。所不同的是，我们的卢格比他的楷模更明白，这种改写他的撰稿人的文章的行为，这种一直达到产生出必然的最终结果的文字消化过程，具有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卢格并不是德国启蒙运动的看门人，而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尼古拉，而且他能够把他的天生的平庸的天资隐藏在思辨的措词的浓密的荆棘之后。和尼古拉一样，他也勇敢地反对浪漫主义，正好是因为黑格尔在《美学》中用批判的方式，而海涅在《浪漫主义学派》中用文学的方式早已把它革除。但是，和黑格尔不同，他和尼古拉一致认为，作为反浪漫主义者，他以为自己有权把

凡夫俗子,首先把他本人这样的庸人推崇为最完美的典范。为了这个目的,也为了在他自己的小圈子内战胜对手,卢格也作起诗来,并且把这些任何一个荷兰人所不及的枯燥无味的诗当作挑战书,傲慢地向浪漫主义者的脸上扔去。

不过,我们的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实际上也不是非常满意黑格尔哲学的。虽然他也能清楚地看出矛盾,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解决矛盾,而且对辩证法抱有非常明显的反感。因此,在他的教条主义的头脑里那些最大的矛盾都能和平共处,而他的本来就极端笨拙的思维能力在这个混乱的社会里比在任何地方都自在。有时,他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按自己的方式同时消化两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并把它们融合成一篇新的著作,但是并没有发觉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完全相反。他经常陷入矛盾,但是他能解救自己的办法是:在理论家面前,他把自己的有缺欠的思维说成是合乎实际的,而在实践家面前则相反,把自己的实践方面的无能和有始无终说成是理论上的最高成就,并且最终地宣布,正是这种对无法解决的矛盾的束手无策,正是这种对一切时髦词句的内容不加批判的胡乱信任才能算是“信念”。

在进一步考察我们的萨克森的莫里茨^①(卢格喜欢在朋友圈子里这样称呼自己)后来的命运之前,我们先谈一下他早在办《年鉴》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宣言狂。一当有人想出一个新的观点,而卢格看出了这个观点有一些前途的时候,他便发出宣言。因为从来没有人责备他应当对某一原始思想负责,所以这样的宣言总是便于他用多少有些夸张的方式把某种他认为是新的东西据为己有,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尝试组织拥护他的政党、派别、“群

^① 罗·爱·普鲁茨的悲剧《萨克森的莫里茨》中的主人公。——编者注

体”，他在其中可以执行警官的职责。我们以后还会看到，卢格把这种制作宣言、公告和布告的工作做得简直完善得令人难以置信。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勤奋，阿尔诺德的这种勤奋是无与伦比的。因为他不爱多作研究，或者，如他所说的，“从一个图书馆抄到另一个图书馆”，所以他宁愿“从新鲜的生活汲取”^①，即每天晚上将白天听到、读到和偶然了解到的一切想法、“奇闻”、新思想和其他消息严肃认真地记载下来。然后看需要再把这一切材料用之于他每天都像是对待他的其他肉体需要那样认真地加以对待的作业。因此，他的崇拜者常说，他的笔停不下来。在他每天的写作成果里谈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他给一切论题都加上了适用于一切东西的奇妙的风格调料，就像英国人喜欢在三文鱼、禽肉、煎肉排及其他一切食物里都加上他们的“索耶的调味品”或沃里克郡的调味品一样。而这种每天的风格上的腹泻卢格偏要称之为“优美动人的形式”，并且以此作为自命为“艺术家”的充分理由。

虽然卢格很满意他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的地位，但内心深处仍然非常苦恼。他一本厚书也还没有写成，因此每天都在妒忌布鲁诺·鲍威尔这个幸运儿，后者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出版了18本大部头的著作。为了消除这种不平衡现象，卢格把同一篇文章用三个不同的标题登载在同一本书里，然后把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开本出版。这样一来，便出现了阿尔诺德·卢格的全集，到现在为止，作者每天早晨都要在自己的书房里逐卷重新清点这些精装的书本，然后心满意足地连连说道：“布鲁诺·鲍威尔连信念都没有！”

① 阿·卢格《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1846年莱比锡版下册第10页。——编者注

虽然阿尔诺德从来不懂黑格尔哲学,然而他本身倒是黑格尔范畴之一的体现者。他千真万确地就是“诚实的意识”的化身,当他在他丝毫不理解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高兴地发现,诚实的意识“自身总是感到快乐”的时候,他更加确信这一点了。这种诚实的意识把庸人的一切卑鄙奸诈的怪癖和诡计都掩藏在令人厌恶的正直后面。它可以允许自己做出各种卑鄙的事情,因为它知道,它出于诚实才干卑鄙的事情。愚蠢本身变成了优点,因为愚蠢是信念坚定的确实证据。它的每一个隐秘思想都靠内心是坦诚的这一信念来支撑,诚实的意识越是想进行某种欺骗,干下流的勾当,它就越能够表现得纯朴和可信。小市民的一切卑劣行径在诚实意图的光环下变成诸多的美德,丑恶的利己主义打扮成好像肯自我牺牲的形象时显得纯洁而又清白,怯懦被描绘成最大的勇敢,卑鄙变成了高尚,而粗鲁放纵的举止被美化成正直和性格开朗的表现。一条把哲学中,民主中,总之,空话中的一切矛盾奇妙地混合在一起的阴沟,另外,一个人一身集中了一切道德缺陷、一切卑鄙下贱的品质,既狡猾又愚蠢、既贪婪又迟钝、既奴性十足又傲慢不逊、既虚伪又朴实得像一个被解放的农奴,像一个村夫,是庸人和空想家,无神论者和空话的信仰者,绝对的不学无术者和绝对的哲学家,这就是我们的阿尔诺德·卢格,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这样预言过了。

《德国年鉴》被封后,卢格便带着家眷乘一辆特制的乡间马车搬到巴黎去了。他的不幸的命运使他在那里结识了海涅,而后者却坚持认为他是“把黑格尔著作译成波美拉尼亚文”的人。海涅问他,普鲁茨是不是他的笔名,对此卢格诚恳地表示了异议。但是海涅总是无法改变我们的阿尔诺德就是普鲁茨的诗的作者这个观念。同时海涅很快就发觉,卢格虽然没有天才,可是很成功地装成一个有性格的人,因

此,我们的朋友阿尔诺德使诗人产生了写他的《阿塔·特洛尔》的想法。虽然阿·卢格没有写出伟大的作品来给他的旅居巴黎树立纪念碑,但是海涅为他完成了这一工作,这还是应该归功于他的。为了表示感谢,诗人献给了他一首著名的墓志铭:

“阿塔·特洛尔,一只有倾向的熊,
正派,虔诚,作为丈夫,他肉欲旺盛;
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诱,
成为出身林莽的长裤汉;
舞跳得虽然十分拙劣,
但毛茸茸的胸膛里却充满信念;
有时,他也散发着恶臭,
虽无才能,却有性格!”^①

在巴黎,我们的阿尔诺德和共产主义者有了来往,并开始在《德法年鉴》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而这些文章的内容和他在前言中的主张^②是完全对立的。奥格斯堡的《总汇报》使他注意到这个不幸,不过他以哲学的容忍承受了这个不幸。

为了弥补不善于社交这个天生的缺陷,我们的卢格学会了随意重述几个他称之为奇闻的趣事。长年利用这些奇闻的习惯,竟使得一切事件、情况和关系对他来说都逐渐地变成了愉快的或不愉快的、好的或坏的、重要的或不重要的、有趣的或枯燥无味的奇闻。巴黎的熙熙攘攘、无数的新印象、社会主义、政治、皇宫¹⁹²、便宜的牡蛎,这一切竟把这个可怜虫征服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在他的头脑里堆起了

① 亨·海涅的讽刺诗《阿塔·特洛尔》。——编者注

② 见阿·卢格《〈德法年鉴〉计划》。——编者注

一堆永远存在的和难以消除的奇闻，而巴黎则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奇闻库。同时，在他自己身上，也出现了一件奇闻：要用锯末来替无产者做衣裳；而他平常对工业上的奇闻就颇有癖好，但总是无法为实现这些奇闻找到股东。

当法国把政治上有名气的德国人驱逐出境¹⁹³的时候，卢格向杜沙特尔大臣介绍自己是**严肃的学者**，因而摆脱了这种命运。他在这里所说的必定是保尔·德·科克的《拜月者》中的“学者”^①，这位学者称自己为学者有一个独特的理由：他会把软木塞弹到空中去。

此后不久，阿尔诺德就到瑞士去了，他在那里遇见了前荷兰下级军官、科隆地方作家和普鲁士小税吏卡·海因岑。两人不久便结成了莫逆之交。海因岑向卢格学哲学，卢格则向海因岑学政治^②。从这时起，卢格感到有必要只在德国运动中的那些生手面前以地道的哲学家的姿态出现。可是命运使他的处境每况愈下，最后只有一些光明之友¹⁹⁴派的教士（杜朗）、德国天主教神父（隆格）和芬妮·莱瓦尔德才认为他是哲学家¹⁹⁵。与此同时，德国哲学中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发展。施蒂纳的《唯一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③等等这一些全新的入侵者，使奇闻在卢格的头脑中达到难以承受的地步。必须下决心采取某种重大的步骤了。于是，卢格在人道主义的庇护¹⁹⁶下得救了，德国的一切糊涂虫，从罗伊希林到赫尔德，都是用这种词句来掩盖他们的狼狽相的。这种词句似乎尤其合乎时宜，因为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

① 指小说《拜月者》中的索西萨尔。——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共产主义的》，见《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第358页。——编者注

③ 洛·冯·施泰因《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莱比锡版。——编者注

了人”¹⁹⁷，阿尔诺德就拼命抓住了它，甚至到现在还不肯放弃。但是，阿尔诺德在瑞士还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发现，即“我通过在公众面前的再次出现表现自己是个有性格的人”^①。从这时起，阿尔诺德有了一块新的用武之地。他把厚颜无耻的纠缠和插手提高为原则。卢格必须参与一切，到处出面干涉。一只母鸡要生个蛋，如果不由卢格对这一“事件的合理性加以审查”^②，那也不行。无论如何都必须同随便哪一家地方小报保持联系，因为在报纸上可以再次出现。给报纸写的任何一篇文章他都得冠上自己的名字并在里面尽可能地谈他自己，否则他就不写。这个再次出现的原则必须运用在每一篇文章上，每篇文章都先是以书信的形式在欧洲的和（从海因岑迁居纽约时起）美洲的报纸上发表，然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表，最后再一次在全集里发表。

我们的卢格有了这些本钱以后，可以回到莱比锡去叫那里的人们明确地承认他是个有性格的人了。可是，这里也不尽是玫瑰花。他的老朋友、出版家维干德很成功地代替他充当了尼古拉的角色，因为连一个空职位也没有，卢格陷入了对一切奇闻的空幻性的忧郁的沉思。突然，德国革命爆发了。

在这次革命中我们的阿尔诺德出乎意料地得救了。强大的运动终于爆发了，在这个运动中，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顺顺当地随着大流走，因此，卢格立刻奔赴柏林，企图在那里混水摸鱼。因为那里刚刚爆发革命，所以他认为打出改革的旗号是最合时宜的。他用这个名字

① 阿·卢格《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1846年莱比锡版第2卷第129页。——编者注

② 阿·卢格《德国激进改良派的选举宣言》，见1848年4月16日《改革报》第16号第123—125页。——编者注

创办了一张小报。革命前出版的巴黎的《改革报》是法国的一张最平庸、最无知和最枯燥的报纸。柏林的《改革报》证明，它还可以超过它的巴黎的榜样；甚至在“智慧的首都”也可以毫无愧色地把这样难以想象的报纸献给德国公众。

鉴于有人担保说，卢格的不善辞令恰恰最可靠地保障了隐藏在这种不善辞令后面的深刻内容，阿尔诺德遂被选为布雷斯劳出席法兰克福议会的代表。在那里，他立刻找到机会以民主派左翼编辑的身分带着荒谬的宣言^①出现。此外，他只是靠热中于搞欧洲各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来表现自己，他热心地支持关于普鲁士融合于德意志的普遍愿望。后来，回到柏林以后，他却要求德意志融合于普鲁士，法兰克福则融合于柏林，而最后，当他想起来要当萨克森的贵族的时候，他又要求德意志和普鲁士都融合于德累斯顿。

他的议会活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桂冠，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帮人对他的迟钝无能表示失望。同时，他的《改革报》也每况愈下，他认为，只有自己坐镇柏林才能扭转不利局面。于是他退出了议会¹⁹⁸。作为诚实的意识，他自然为自己的退出找到了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借口，并且还建议整个左翼同他一起退出。这当然没有成功。于是卢格就一个人回到了柏林。在柏林，他发现最好按照“德绍的形式”（他这样称呼小的典型的民主立宪国家）解决现代的冲突。后来，在维也纳被围的时候，他又草拟了一个宣言，号召弗兰格尔将军起来解放维也纳，反对文迪施格雷茨。他以签了字的宣言已经排印好了为借口，使这个独特的文件获得了民主主义者代表会议¹⁹⁹的批准。最后，当柏林也

^① 阿·卢格《法兰克福制宪国民议会激进民主派的论证性宣言》，见1848年6月7日《改革报》第66号第543—544页。——编者注

处于戒严状态²⁰⁰以后,卢格先生就到曼托伊费尔那里去,向他提出了一些关于《改革报》的建议,可是这些建议都遭到了拒绝。曼托伊费尔对他表示,他就希望看到像《改革报》这样的反对派报纸,《新普鲁士报》要危险得多等等,天真的卢格连忙得意洋洋地把这句话传播到德国各地^①。同时,阿尔诺德醉心于消极抵抗^②,并且自己身体力行,他把报纸、编辑们^③及其他一切都弃之不顾,急忙溜之大吉。显然,积极逃跑是消极抵抗的最彻底的形式。反革命爆发了,在反革命面前,卢格就一口气从柏林逃到了伦敦。

在德累斯顿五月起义²⁰¹期间,阿尔诺德同他的朋友奥托·维干德和市议会一起在莱比锡领导运动。他和这些同事一起发表了告德累斯顿人的强有力的宣言,要他们勇敢地战斗,说在莱比锡有卢格、维干德和本市的父老们坐镇守卫,只要自己不抛弃自己,上帝就不会抛弃他。但是这个宣言刚一发表,我们的勇敢的阿尔诺德便急忙动身到卡尔斯鲁厄去了。

在卡尔斯鲁厄他也感到不安全,虽然巴登人还驻扎在内卡河畔,而敌对行动还远远没有开始。他请求布伦坦诺派他到巴黎去做公使。布伦坦诺跟他开了一个玩笑,让他做了12小时的公使,而在第二天早晨,正好在卢格准备起程的时候又从他那里骗回了委任状。但是卢格还是同真正委任的布伦坦诺政府代表许茨和布林德一起到巴黎去了,他的举动非常奇特,甚至连他自己过去的编辑奥本海姆也认为必

① 指阿·卢格《在德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人民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国家》1849年莱比锡第2版。——编者注

② 关于消极抵抗的策略,见本卷第78—82页。——编者注

③ 亨·伯·奥本海姆、爱·梅因和爱·维斯。——编者注

须在官方的报纸《卡尔斯鲁厄日报》上宣布，卢格先生完全不是以官方身分到巴黎去的，而完全是“擅自行动”。有一次，许茨和布林德带着他去见赖德律-洛兰，卢格突然打断了外交上的谈话，开始当着法国人的面痛骂德国人，弄得他的同伴手足无措，窘迫不堪地退了出来。6月13日^①来到了，这一天大大地震动了我们的阿尔诺德，他连任何理由都没有提出就匆匆逃跑了，并且一直到踏上了伦敦这块自由的不列颠土地时才又镇静下来。后来，在提到这次逃跑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狄摩西尼。

在伦敦，卢格先是企图让人宣布自己是巴登临时政府的公使。后来他又企图向英国新闻界炫耀自己是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和作家，可是到处碰壁，人家说，英国人过于唯物，无法理解德国的哲学。此外，当人们问起他的作品时，卢格只好以叹息来回答，与此同时布鲁诺·鲍威尔的形象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因为，就拿他的全集来说，也不过是一些重印过许多次的小册子！甚至连小册子也不是，而只是一些印成小册子的报刊文章，实际上连报刊文章也不是，而只是杂乱无章的读书摘抄而已！在这方面必须重新做点什么，于是卢格给《先驱》写了两篇文章^②，在文章里他以描写德国民主派为借口宣布，“人道主义”在德国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它的代表人物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阿尔诺德·卢格，即(1)《当代的宗教》、(2)《民主和社会主义》、(3)《哲学和革命》这几本著作的作者。这三本到现在还无法在任何一个书店里找到的划时代的作品自然只是卢格的还没有

① 见本卷第163页。——编者注

② 即《德国民主党。一、党的创建和成员》和《德国民主党。二、革命与各党派和全国的状况》。——编者注

印出新标题的某些旧文章而已。与此同时，阿尔诺德又开始了他每天的作业，把《晨报》转载自《科隆日报》的一些文章重新译成德文，这对他本身颇有教益，对德国公众也有用处，只是使布吕格曼先生大吃一惊。他一无所成地回到了奥斯坦德，在那里他有了足够的闲暇去为准备充当德国流亡者中的孔夫子^①。

正如古斯塔夫提倡素食，哥特弗里德提倡感情一样，阿尔诺德提倡德国小资产阶级庸人的理性，或者说得确切些，无理性。他像阿尔诺德·温克尔里德一样，没有开辟自由的道路，他自身就是“自由”的阴沟^②。在德国革命中，卢格竖在那里就像路角上的一块写着“这里准许小便”的招牌。

但是，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通告信和附函上来吧。它没有得到响应，成立民主的统一教会的初步尝试也毫无结果。后来，施拉姆和古斯塔夫声明说，毛病只是出在卢格既不会讲法语，也不会写德语。但是，大人物们立刻又重新行动起来了。

他们个个力量无穷，
详细情节，请听下一首歌曲。^③

-
- ① “孔夫子”(Konfuzius)和“糊涂虫”(Konfusion)在德语中发音相似。——编者注
- ② “自由的道路”(Gasse der Freiheit)和“自由的阴沟”(Gosse der Freiheit)在德语中发音相似。——编者注
- ③ 见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编者注

六

罗多芒特-海因岑和古斯塔夫同时从瑞士来到了伦敦。几年来一直威胁要在德国铲除“暴君”并以此为生的卡尔·海因岑，在二月革命爆发后竟然有了前所未闻的勇气，到舒斯特岛上重新视察德国土地，以后又转往瑞士。在那里，在安全的日内瓦，他又开始轰击“暴君和压迫者”，并利用机会宣布：“科苏特是个伟人，但是科苏特忘掉了雷酸银。”^①由于厌恶流血，海因岑成了革命的炼金术士。他幻想一种爆炸物，能在一眨眼之间彻底消灭整个欧洲反动势力，而使用这种爆炸物的人连手指也不会烧伤。他特别厌恶“在弹雨中散步”，讨厌普通的作战方法，因为信念是不能防弹的。在布伦坦诺先生执政时期，他甚至冒险作了去卡尔斯鲁厄的革命旅行。由于在那里他没有得到预期的对他的伟大功绩的奖励，他最初决定去主编“叛徒”布伦坦诺的通报^②。但是，当普鲁士人逼近的时候，他声明，他海因岑“不想为了叛徒布伦坦诺”而让人“杀死”，并借口组织精锐部队（在这个部队里政治信念和军事组织将相互补充，换句话说，军事上的怯懦将被认作政治上的勇敢），不断地追求这种“模范的”志愿部队，步步退却一直到重新退回熟悉的瑞士土地为止。索菲娅从梅梅尔到萨克森的旅

① 卡·海因岑《谋杀》。——编者注

② 《卡尔斯鲁厄日报》。——编者注

行^①看来比罗多芒特的革命旅行更富于血腥味。到瑞士后,他声明,德国已经再没有人了,真正的雷酸银还没有发现,战争还不是靠革命信念来进行,而是用普通的方法,用火药和铅弹来进行的,现在他将开始使瑞士革命化,因为他对德国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②。在纯朴的被隔离的瑞士,由于当地讲的是一种奇怪的混合语言,罗多芒特倒可以被认为是德国作家,甚至是危险的人物了。他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遭到了驱逐,并由瑞士联邦出资将他送到了伦敦。罗多芒特-海因岑没有直接参加欧洲的革命,但是毫无疑问,他曾经为革命多方奔忙过。当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他为了赶快去帮助祖国,在纽约募集了“革命经费”^③,并且一直到达了瑞士边境。当三月同盟革命²⁰²遭到失败时,他靠瑞士联邦委员会的资助从瑞士迁移到了海峡的彼岸。他很满意,既能向革命征款作进攻之用,又能向反革命征款作退却之用。

在意大利的骑士叙事诗中常常出现威武魁伟的巨人;他们的武器是粗大的木棍,但是在格斗的时候,尽管他们野蛮地乱打,大声地吼叫,但总是打不着敌人,而只能打着周围的树木。海因岑先生就是政治著作界的这样的阿里欧斯托的巨人。他生就一副粗壮结实的体格,他把这一点看作他成为大人物的素质。这副笨重的肉体控制着他的全部写作活动,这种活动完全是肉体活动。他的敌人总是很矮小,是连他的足踝也够不到的侏儒,他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看到他们。然

-
- ① 约·提·海尔梅斯《索菲亚从梅梅尔到萨克森旅行记》1770—1773年莱比锡版第1—6卷。——编者注
- ② 见卡·海因岑《回顾巴登—普法尔茨革命》。——编者注
- ③ 见卡·海因岑《向我的同胞呼吁》。——编者注

而,当需要肉体活动的时候,“身强力壮的男儿”却逃脱到著作中或法庭上。比如说,他刚一安全地踏上英国的土地,便写了一篇关于道义的勇敢的文章^①。又比如说,在纽约这位巨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常挨一个叫李希特尔先生的人的毒打,直到原先只处以少许罚金的治安法官,后来终于认识到这种行动的后果,判决侏儒李希特尔交付200美元赔偿金^②。对这个一切都健全的巨大肉体的自然补充是健全理性^③,海因岑先生自认为最富有健全理性。按照这个健全理性的要求,海因岑这个天生的天才什么也不学习,在文学和科学方面一无所知,他把健全理性也叫作“特有的洞察力”,并根据健全理性向科苏特担保,他“已经深入到思想的极限”。由于健全理性,他学习只是靠道听途说或是靠看报纸,因此他总是落后于时代,总是穿着几年前就已经被著作界抛弃了的服装,而新的现代服装他还怎么也穿不惯,把它们说成是不道德的和无用的东西。但是,他对已经掌握了的东西却坚信不移,而且这对他来说变成了一种自然产生的、不言而喻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应当领会它,只有心怀恶意的、愚蠢的或是喜欢诡辩的人才不想理解它。如此结实的肉体 and 健全理性当然也应当具有坚定的端正的信念,甚至应当使对信念的狂热达到极限。在这方面海因岑做得比谁都不逊色。一有机会他就吹嘘他的信念,拿信念和每个论据相对抗,而对一切不理解他或是他所不理解的人,他一律斥之为没有信念的人,由于存心不良和心怀恶意而否认明明白白的东西的人。

① 卡·海因岑《革命的教训》。——编者注

② 1852年3月18日阿·克路斯致马克思的信和1852年4月4日阿·克路斯致威·沃尔弗的信。——编者注

③ 见卡·海因岑《[声明]》。——编者注

他呼唤他的缪斯——愤慨——来反对阿里曼的这些可鄙的信徒；他咒骂，他叫喊，他自吹自擂，他进行道德说教，他吐沫飞溅地作着悲喜剧般的告戒。他表明，谩骂式的文学如果被一个既不如白尔尼那样机智又缺乏白尔尼那样的文学修养的人拿来运用，会弄成什么样子。他的风格也和他的缪斯一样。永远是袋子里的木棍^①，但是，这里是一根极普通的木棍，就连它的结节也不奇特，而且也没有刺。只有当他遇到某种科学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一下子愣住。他的情况就像比林格斯盖特²⁰³的女鱼贩子一样，奥康奈尔同女鱼贩子发生过争吵，奥康奈尔骂了一大串话来回敬她：“你自己才是这样，你还要更坏，你这个等腰三角形，你这个平行六面体！”，骂得她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关于海因岑先生过去的经历，应该指出，他在荷兰殖民地虽不曾晋升为将军，但是晋升到了下级军官。由于受此冷落，后来他总是说荷兰人是没有信念的民族。以后，我们又在科隆看到他做了小税吏，他用这个身分写了一个喜剧^②，在这个喜剧中他的健全理性竟枉费心机地想嘲弄黑格尔的哲学。他在《科隆日报》下端的地方琐闻栏内感到非常自在，在那里他装腔作势地议论科隆的狂欢节协会（科隆的所有大人物都是从这个机构里产生出来的）里发生的口角。他本人的不幸，以及他的父亲林务官海因岑同上司发生冲突时所遭遇的不幸，就像健全理性在各种微不足道的私人冲突中的情况一样，都被他上升为世界级事件。他在《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中描述了这些不幸，

① 格林兄弟《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奈贝尔博士，或博学和生平》1841年科隆版。——编者注

这本书比费奈迭的书^①还要糟糕得多，书中除小官吏对上司的抱怨外，毫无其他内容。这本书把他牵进了一个违反出版法的案件。虽然他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判6个月的监禁，可是他竟感到有杀头的危险，因此逃到布鲁塞尔去了。他从那里要求普鲁士政府不仅保障他的人身自由和通行安全，而且为他完全废除法国的诉讼程序²⁰⁴，并把他作为普通罪犯交付陪审法庭^②；普鲁士政府对他发布了逮捕令；他以《逮捕令》一文对普鲁士政府作了答复；在这篇文章里，他鼓吹精神反抗和立宪君主制，而把革命者说成是没有道德的和狡猾的人。他从布鲁塞尔来到了瑞士。在那里，如上所述，他会见了朋友阿尔诺德，并且除了他的哲学以外，还向他学会了非常有用的充实自己的方法。正如阿尔诺德在论战中力图把对手的观点据为己有一样，海因岑也学着在咒骂中掌握他所反对的新思想。他刚一成为无神论者，便怀着真正的改宗者的热忱，立刻向可怜的福伦老头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因为后者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在晚年无缘无故地也成为无神论者。他现在直接接触到的瑞士联邦共和国使他的健全理性发展到这种地步，以致他现在就想在德国也实行这样的联邦共和制^③。但是健全理性也使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革命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于是，海因岑成了革命家。他开始兜售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瑞士乡下佬的最粗鲁的语调鼓吹立刻投入“战斗”和杀死给世界带来一切不幸的君主们。他打算在德国成立一些委员会来募集资金出版这些宣传

① 雅·费奈迭《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逮捕令》.1. 我的保证》，见《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第1—7页。——编者注

③ 卡·海因岑《克拉科夫。一个德国人献给瑞士人的话。III 瑞士》，见《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第398—412页。——编者注

品并加以广泛散发,接着便不客气地进行大规模的乞讨活动,在这一活动中,属于他那一派的人先是被利用,然后是挨一顿臭骂。这方面的情况伊茨施太因老头可以作详细的说明。这些小册子使海因岑在德国流动酒贩中博得了很大的荣誉,这些酒贩到处都把他吹嘘成勇敢的“斗士”^①。

他从瑞士转到了美国;在这里他虽然靠了瑞士乡下佬的风格而被认为是个真正的德国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便断送了纽约的《快邮报》。

二月革命后,他回到了欧洲,给《曼海姆晚报》写了几篇关于伟人海因岑到来的报道^②,出版了一本攻击拉马丁的小册子^③,来报复拉马丁和整个政府无视他的旅美德国人代表的委任状而对他置之不理的行为。他不想回普鲁士,因为,虽然发生了三月革命和宣布了大赦,他认为他在那里仍然有杀头的危险。人民应当召唤他。因为事情并非如此,所以他打算让人在遥远的汉堡选他为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他的理由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好演说家,所以他就会用更大的嗓门去表决。但是他落选了。

巴登起义结束后,他来到了伦敦,他对年轻人大为恼火,因为这个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大人物都由于这些青年人而被忘却,也被这些年轻人自己所忘却。他永远只是昨天的人或明天的人,却从来不是今

① 卡·海因岑《对德国自由派的一个警告。5. 要求》,见《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第235页。——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的4月12日莱茵[通讯]和《我的声明》,见1848年4月15日和4月17日《曼海姆晚报》第105、107号。——编者注

③ 卡·海因岑《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1848年]莱茵费尔登版。——编者注

天的人,特别不是重大事变那一天的人^①,因为真正的雷酸银还没有发现,必须寻找同反动派斗争的新工具。因此,他要求牺牲 200 万人^②,以便他能够作为独裁者踏过深及踝骨的别人流的鲜血。实际上这只是为了引起轰动。反动派曾出钱把他送到伦敦,现在他们应当用放逐出英国的办法再把他免费送到纽约。可是,他失策了,只是惹得法国激进派报纸把他叫作蠢货,说他要求牺牲 200 万人,只是因为他从来不拿自身去冒险。但是为了让这件事圆满成功,他在前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上发表了他的杀气腾腾的、充满了血腥味的文章,这当然是现钱交易。

古斯塔夫和海因岑老早就互相敬仰的。海因岑把古斯塔夫说成智者,而古斯塔夫则把海因岑说成斗士。海因岑几乎等不到欧洲革命结束,就来结束“民主派德国流亡者当中的致命的纠纷”,并重新开始他的三月革命前的工作。他“提出了德国革命党的纲领,作为草案和建议以供讨论”^③。这个纲领引人注意的是:它发明了一个特殊的部,“负责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任何部门的公共的运动场、格斗场(没有弹雨)和公园”;其次是它命令“取消男子的特权,尤其是在婚姻上(特别是也在战争中的突击策略方面。参见克劳塞维茨)的特权”。其实,这个纲领不过是海因岑给古斯塔夫的一纸外交照会,其他人都没有把它当回事。这个纲领非但没有加强团结,反而引起了这两只阉鸡

① 卡·海因岑《革命的教训》,见 1849 年 11 月 16 日《德意志—伦敦报》第 242 号。——编者注

② 卡·海因岑《革命的教训》,见 1849 年 11 月 9 日《德意志—伦敦报》第 241 号。——编者注

③ 卡·海因岑《德国革命党的纲领。作为草案和建议以供讨论。1850 年 2 月……于伦敦》。——编者注

之间的关系立即破裂。海因岑要求为“革命的过渡时期”任命一个唯一的独裁者，这个独裁者一定要是普鲁士人^①，同时为了避免误会，他补充道：“士兵不能当独裁者”^②。而古斯塔夫则相反，要求三巨头独裁，其中除了他，至少还应当有两个巴登人。此外，古斯塔夫认为他已经发现，海因岑在急忙公布的纲领里窃取了他的某种“观点”。这样，这第二次团结的尝试就破产了，而根本不被世人理解的海因岑，又回去过他的隐居生活，一直到他发现英国的土地无法立足而在1850年秋天到纽约去为止。

① 卡·海因岑《革命的教训》，见1849年11月9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1号。——编者注

② 同上，见1849年11月1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2号。——编者注

七

古斯塔夫和斋戒移民区

不知疲倦的古斯塔夫在他再一次试图和弗里德里希·博布钦、哈贝克、奥斯瓦尔德、罗森布卢姆、科恩海姆、格龙尼希以及其他“杰出的”人物共同成立**流亡者中央委员会**而遭到失败以后，就到约克郡去了。他相信这里会有一座繁茂的仙境花园，而满园争艳的不是阿耳契娜花园里的邪恶，而是美德。原来，一个很幽默的英国老头讨厌我们的古斯塔夫的理论，抓住了古斯塔夫的话柄，在约克郡辟给他几摩尔根沼泽地，附上一个明确的条件，即要他在那里建立“斋戒移民区”，在这个移民区里严禁吃肉、吸烟和喝酒，只允许素食，每个移民每天做晨祷时必须读一章司徒卢威的《国家法》^①。此外，移民区还必须自力更生。古斯塔夫带了他的阿马利亚、黄口小儿士瓦本人施瑞费尔和其他几个战友顺从地出发了，并且建立了“斋戒移民区”。关于这个移民区能说的只是：在那里，不是一片“幸福”气象，而到处是“教化”和烦恼与消瘦的充分“自由”。在某个早晨，我们的古斯塔夫发现了一个大阴谋。他的随从们不具备像他那样的反当的体质，他们厌恶素食，因而决定背着他宰掉唯一的一头老奶牛，而这头奶牛的奶却是

^① 古·司徒卢威《国家学原理》。——编者注

“斋戒移民区”的主要收入来源。古斯塔夫对于如此恶意地对待一个同类的行为惊骇异常，痛哭流涕，他愤怒地宣布，移民区解散，他决定去当一个湿的贵格会²⁰⁵会士，除非他这次能够在伦敦恢复《德国旁观者》或者建立一个“临时政府”。

八

决不适于奥斯坦德的隐居生活并向往着“再次出现”于公众面前的阿尔诺德，听到了古斯塔夫的不幸的消息。他立刻决定赶回英国，踏着古斯塔夫的肩爬上欧洲民主派五巨头之一的地位。事情是这样：当时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和达拉什成立了欧洲中央委员会⁶¹，它的灵魂是马志尼。卢格嗅到了这里还有一个空位。马志尼可以把由他自己发现的将军恩斯特·豪格聘为他的《流亡者》的德国撰稿人，但是，从面子来考虑，他也不可能让这个毫无名声的人充当他的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的卢格知道，古斯塔夫还在瑞士就同马志尼有联系。他自己虽然也认识赖德律-洛兰，但是可惜后者不认识自己。于是，阿尔诺德在布赖顿住了下来，开始吹捧和讨好纯朴的古斯塔夫，答应和他一起在伦敦创办《德国旁观者》，甚至由他出钱来共同编辑罗泰克-韦尔克尔合著的《国家学词典》的民主主义版本。同时，他把我们的古斯塔夫作为大人物和撰稿人介绍给一家德国地方报纸，他按照自己的原则总是把这类报纸放在手边（这一次这种命运落到了光明之友派教士杜朗的《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身上）。彼此互赖互助。古斯塔夫把阿尔诺德介绍给马志尼。因为阿尔诺德讲的是别人完全不懂的法语，所以没有人能妨碍他以德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姿态，尤其是以德国“思想家”的姿态自荐于马志尼。这个精明的意大利狂热者第一眼就看出了阿尔诺德是他所需要的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

人，他可以在自己的反教皇的训谕上以德国人的名义签名。于是，阿尔诺德·卢格便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当一个阿尔萨斯人问赖德律，他怎么会产生同这种“蠢货”联合的念头，赖德律生硬地回答道：他是马志尼的人。当有人问马志尼，为什么他要和赖德律^①这个毫无思想的人联合的时候，老滑头回答道：正是因此我才选中他。马志尼本人有充分理由摆脱开有思想的人。而阿尔诺德·卢格却感到他的理想被超过了，一时间甚至把布鲁诺·鲍威尔也忘记了。

当他必须签署马志尼的第一个宣言的时候，他忧郁地想起了他在哈雷反对莱奥教授和在瑞士反对福伦老头的时刻，前一次他还是三位一体的信徒，而后一次则是人道主义的无神论者了。而这一次却要同马志尼一起反对君主，保卫上帝。这时，我们的阿尔诺德的哲学良心已经由于他同称他为哲学家的杜朗及其他教士的交往而大大地堕落了。我们的阿尔诺德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已无法摆脱对整个宗教的某种偏爱，此外，他的“诚实的意识”又在对他悄悄地说：签名吧，阿尔诺德！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²⁰⁶。决不能白白地充当有名无实的欧洲临时政府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想想吧，阿尔诺德！每两星期签署一次宣言，而且还是作为“德国议会议员”置身于欧洲最伟大的人物的圈子里！于是阿尔诺德汗流浹背地签了名。他喃喃自语道：真是不寻常的奇闻！万事开头难。他在头天晚上在笔记本上记下了上面这句话。然而，对阿尔诺德的考验还没有完结。欧洲中央委员会向欧洲、法国人、意大利人、水上波兰人²⁰⁷、瓦拉几亚人发表了一系列的宣言以后，现在轮到德国了，因为这时正好爆发了布龙采尔大战²⁰⁸。

① 从上下文来看，这里可能说的是卢格。——编者注

马志尼在草稿中攻击了德国人缺乏世界主义精神，尤其是攻击他们对待意大利的腊肠商、流浪乐师、糖果点心商、玩土拨鼠者和捕鼠器贩卖商采取傲慢态度。阿尔诺德虽对此感到震惊，却什么都承认下来。还不仅如此。他声明，同意将蒂罗尔意大利语区和伊斯特里亚半岛割让给马志尼。但是这还不够。不仅应当忠告德意志民族，而且还应当对它的软弱的一面施加影响。阿尔诺德这次受命发表意见，因为他代表德意志部分。这时他的感受就像应考者约布斯一样。他沉思地搔着后脑勺，经过长久的考虑后，吞吞吐吐地说：“从塔西佗时代起，德意志的吟唱诗人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冬天里在所有的山上生起篝火，以便烤脚。”马志尼微笑地说：吟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和所有的山上的篝火！这对德意志的自由并无帮助！于是，吟唱诗人、低沉的声音、山上的篝火和德意志的自由都被当作给德意志民族的甜点而收入了宣言。²⁰⁹阿尔诺德·卢格自己也很奇怪，居然通过了考试，并且第一次懂得，管理世界并不需要有多少智慧。从此，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鄙视还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写出18部巨著的布鲁诺·鲍威尔了。

当阿尔诺德作为欧洲中央委员会的随从同上帝一起签署支持马志尼反对君主的好战宣言的时候，和平运动在科布顿的领导下不但席卷了英国，甚至越过了北海，蔓延到大陆，这才使骗子手美国佬伊莱休·伯里特和科布顿、尧普、日拉丹以及印第安人卡-吉-加-吉-瓦-瓦-贝-塔得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和平代表大会²¹⁰。我们的阿尔诺德浑身痒痒，也想趁这个机会实现他的“再次出现”^①，并以自己

① 见阿·卢格《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1846年莱比锡版下册第129页。——编者注

的名义发表宣言。因此，他自命为这个法兰克福会议的通讯委员，并且向那里寄去了一篇极其混乱的和平宣言^①，这篇宣言是他用他的思辨的波美拉尼亚文根据科布顿的演说改写成的。许多德国人向阿尔诺德指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好战立场同他的和平宣言的贵格会精神之间有矛盾。他通常反驳说：“这里的确存在着矛盾。这就是辩证法。我在年轻时研究过黑格尔。”而他的“诚实的意识”^②则这样安慰他：马志尼不懂德文，因此很容易蒙骗他。

刚刚在赫尔登岸的哈罗·哈林的庇护也预示了阿尔诺德同马志尼的关系有巩固的希望。哈罗·哈林以一个新的、非常出色的人物登上了舞台。

① 指阿·卢格《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主席。1850年8月15日于布赖顿》。——编者注

②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6章《精神》。——编者注

九

1849—1852年的民主派流亡者的伟大戏剧的序幕，还在18年前就已经揭开了，这个序幕就是1830—1831年流亡的蛊惑者。虽然这样长的时间已经足以把这首批流亡者中的很大一部分从舞台上清除出去，然而还是有几个可尊敬的残余人物存留下来了。他们对世事及其结果泰然处之，他们继续操着鼓动家的行业，拟定包罗万象的计划，成立临时政府和向四面八方散发宣言。显然，这些经验丰富的骗子在办事本领方面比新的一代不知要高明多少倍。18年来玩弄阴谋、勾结、诡计、宣言、欺骗和突出个人的实践经验所获得的这套办事本领，使马志尼先生依靠三个在这类事情上不太在行的傀儡^①的支持，有勇气和信心宣布自己就是欧洲民主派的中央委员会。

谁也没有像我们的朋友哈罗·哈林那样，由于时势而处于成为典型流亡者鼓动家这样有利的地位。而他确实成了我们的一切流亡中的大人物——所有的阿尔诺德们、古斯塔夫们和哥特弗里德们多少是有意识地 and 多少是成功地加以模仿的榜样；他们也许能达到（如果不发生任何对此不利的情况）他的水平，但是要高他一筹是困难的。

^① 指阿·达拉什、赖德律-罗兰和阿·卢格。——编者注

哈罗像凯撒一样自己描写了自己的功勋(1852年于伦敦^①)。他生于“基姆布里半岛”,^②属于有先见之明的北弗里斯人种,这个人种通过克莱门特博士证明了,世界上一切伟大民族都起源于它^③。“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力求“用行动来证明他对各族人民的事业的热情”^④,因而于1821年前往希腊²¹¹。显然,朋友哈罗很早就预感到自己负有前往一切发生了任何骚乱的地方的使命。后来,他

“由于奇妙的命运而来到了专制制度的发源地,直接靠近了沙皇。而在波兰的时候,仔细观察了立宪君主制的伪善的性质”^⑤。

因此,还在波兰²¹²时哈罗就已经为自由而战了。但是,“华沙落后欧洲历史上出现的危机使他陷入了深思”,而这次深思却使他产生了关于“民族民主”的思想,他立刻把这一思想“发表在1832年3月斯特拉斯堡出版的《各族人民》这本著作^⑥里”。关于这一著作必须指出,人们差点在汉巴赫大典²¹³上引用它。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他的“共和主义的诗篇:《血滴》、《扫罗王的历史,或君主政体》、《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统一》,并主编在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杂志《德意志》。所有这些著作,甚至他的一切未来的著作,突然幸运地于1831年11月4日遭到了联邦议会的禁止。这正是勇敢的战士所缺少的,现在他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同时得到了受难者的圣职。于是,他可以高呼: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② 日德兰半岛的古称。——编者注

③ 克·荣·克莱门特《石勒苏益格公国南朱特族和朱特语同德语和弗里西亚语的实际关系。对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残稿第六册所作的历史的、民族学的阐述》1849年汉堡版。——编者注

“我的著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在人民的心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应。它们大部分是免费奉送的。其中有几部的收入甚至不能抵销出版费用。”^①

但是新的荣誉等待着他。还在1831年11月，韦尔克尔先生徒劳地企图通过一封长信使他“转向立宪主义的垂直的地平线”^①。以后，在1832年1月，普鲁士在国外的著名的代理人马尔滕先生到他那里去，建议他为普鲁士服务。这样两次推崇居然都是来自敌人方面！这就足够了。马尔滕的建议使他

“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想法：复活斯堪的纳维亚民族这个观念，来对抗这种王朝的背叛行为”，并且“从这时起看来是已被遗忘了数百年的‘斯堪的纳维亚’这个词至少已经复活了”。^①

这样，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北弗里斯人本来不清楚自己是德国人还是丹麦人，现在至少得到了一个幻想的国籍，而由此所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却是：汉巴赫人不想同他打交道了。

通过这些事件，哈罗成了一个飞黄腾达的人。争取希腊和波兰自由的老战士，“民族民主”的发明者，重新发现了“‘斯堪的纳维亚’这个词”的人，由于联邦议会的禁令而得到公认的诗人，思想家和新闻工作者，受难者和立宪主义者、专制政体拥护者和共和主义者竞相争夺的、连敌人也尊敬的大人物，此外还是一个头脑空虚和糊涂得足以相信自己伟大的大人物，——他还有什么不幸运的事情呢？但是，随着荣誉的增高，哈罗作为一个严格的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提高了。还应当写一部巨著，以引人入胜的和通俗的形式、用艺术的笔调来综合论述关于自由的伟大学说、民族民主的思想，以及在他心目中正在觉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醒的青年欧洲的一切高尚的争取自由的努力。这样的著作只有头等的诗人和思想家才写得出来，而只有哈罗能够成为这样的人。于是便出现了“戏剧集《人民》”的头三部，“而总共有12部，其中有一部是用丹麦文写的”，作者为这一著作贡献出自己生命中的整整10年。可惜，这12部书中有11部“至今还只是手稿”^①。

然而，同缪斯的甜蜜的交往维持得并不很久。

“1832—1833年冬天，一场运动在德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在悲剧性的法兰克福骚动²¹⁴中遭到了失败。当时我受委托在4月6日深夜占领凯尔要塞(?)，人员和武器都已经准备好了。”^①

可惜，这件事毫无结果，哈罗也不得到法国内地去，在那里他写成了他的《一个人的话》。已经装备好向萨瓦进军的波兰人召唤他从那里到瑞士去。在瑞士，他成了“他们的司令部的同盟者”^①，还写了两部戏剧集《人民》，并且在日内瓦认识了马志尼。然后，这个由波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的冒险家组成的硫磺帮²¹⁵在高贵的拉莫里诺的率领下，向萨瓦进行了有名的侵袭²¹⁶。在这次进军中，我们的哈罗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和自己的能量”^①。但是，因为其他自由战士都像哈罗一样感到了“自己的生命的价值”，而对于自己的“能量”也并未抱任何幻想，所以结果很糟，这一伙人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逃回瑞士。

为了使这群流亡的骑士充分认识到他们对暴君来说是可怕的，仅仅这一次进军是不够的。当七月革命的影响还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以个别起义的形式显示出来的时候，当还有人拥护我们的流亡英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雄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只是行动起来的群众中的一分子,虽然是多多少少享有特权的领导分子,但终归还是一分子。随着这些起义的力量的逐渐消失,随着大批“儒夫”、“三心二意的人”、“无坚定信仰的人”日益嫌弃暴动的把戏,随着我们的骑士越来越感到自己孤单,他们的妄自尊大也就滋长起来。既然整个欧洲都变得怯懦、愚蠢和自私自利,那么那些忠于事业的人必须更加尊重自己。这些人像教士那样胸中燃起仇视暴君的神圣火焰,并为更坚强的一代保存美德和热爱自由的伟大时代的传统!如果连他们也背叛了事业,那么暴君就要永远得救了。于是,完全像1848年的民主派一样,他们从每一次的失败中都汲取了新的必胜的信心,并且日益变成生活来源可疑的游侠唐·吉珂德。站在这样的地位上,他们就可以从事他们的最伟大的壮举,即成立“青年欧洲²¹⁷”了,由马志尼审定的这个组织的团结友爱宣言,于1834年4月15日在伯尔尼签署。哈罗参加了这个组织,他参加时的身分是

“中央委员会的发起人,‘青年德意志’²¹⁸和‘青年意大利’²¹⁹的非嫡系成员,同时又是斯堪的纳维亚分会的代表”,他“直到今天还代表”这一分会。^①

团结友爱宣言签署的日子,对于我们的哈罗来说,成了伟大纪元:往前和往后都从这一天算起,就像迄今为止的基督降生日一样。这个日子标志着他生活中的顶点。他是有名无实的欧洲独裁者中的一个,虽然他并没有名闻世界,但总还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在他背后,除了他的许多尚未出版的著作、少数旅居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和一打游手好闲的政治骗子,什么也没有。但是正因为如此,他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才能断言，各族人民都和他站在一起。这就是一切大人物的特点：当代并不承认他们，而正因为如此，未来是属于他们的。而这个未来，我们的哈罗已白纸黑字地添写在自己背包里的团结友爱宣言上。

可是从这时起，哈罗开始倒霉了。他的第一个苦恼是：“‘青年德意志’于1836年脱离了‘青年欧洲’”。但是德国因此而受到了惩罚。就是说，由于这一脱离，“1848年春天，德国对于民族运动毫无准备”，所以一切事情的结局都是极其可悲的^①。

但是这时出现的共产主义使我们的哈罗感到更为痛心。在这里，我们听说，共产主义的发明者不是别人，而是

“柏林的犬儒主义者约翰奈斯·弥勒，1831年在阿尔滕堡出版的一本关于普鲁士政治的非常有趣的小册子的作者”^①，他到英国去了，在那里他“除了大清早在史密斯菲尔德市场上照料猪，没有任何事情可做”^①。

共产主义很快在法国和瑞士的德国手工业者中间传播开来，而且成了我们的哈罗的非常危险的敌人，因为他的著作的唯一销售泉源因此被堵死了。这就是“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可怜的哈罗直到现在还遭受它所带来的苦难，而且正如他忧郁地承认的，现在的苦难甚至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沉重，“他的戏剧《王朝》的命运可以证实这一点”^①。

这种共产主义者的间接的书报检查甚至把我们的哈罗赶出了欧洲，这样他便到了里约热内卢（1840年），在那里他在一个时期内以画画为生。他“处处都忠实地遵循着自己的目标”，在那里出版了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2000册),这部作品,由于在水手中流传,从这时起仿佛成了海上读物”^①。

但是可惜,“由于对‘青年欧洲’的严肃的责任感”,他很快又回到了欧洲,

“连忙到伦敦去看马志尼,并且很快就看出了共产主义对欧洲人民事业的危险性”^①。

新的事业等待着他。邦迪埃拉兄弟已作好了远征意大利的准备。²²⁰为了支援这次远征和牵制专制制度,哈罗

“又回到了南美,联络加里波第共同为了各国人民的未来,全力协助南美合众国的成立”^①。

然而,专制君主预先识破了他的使命,于是哈罗便逃之夭夭。他到纽约去了。

“在海洋上航行的时候,我展开了频繁的脑力活动,除了其他作品之外写成了属于戏剧集《人民》的《思想的威力》,这部作品到现在同样地还只是一份手稿。”^①

他从南美把当地的一个所谓的组织“人类”的委任状带到了纽约。

二月革命的消息鼓舞了他,他用法文写了《苏醒了法国》一书,而在登船去欧洲的时候

“我又一次把自己对祖国的爱永记在诗集《斯堪的纳维亚》中的几首诗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编者注

里”^①。

他到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在这里,他发现

“离开了 27 年后,国际法、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概念被弄得无比混乱,这些概念就像腐烂的草料和稻草一样堆在党派狂热和民族仇恨的奥吉亚斯牛圈里”^①。

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

“他的政治著作,以及从 1831 年起他的一切努力和活动,在祖国的这些边疆地区人们从来是陌生和不知道的”^①。

奥古斯滕堡党²²18 年来一直以沉默的阴谋来窒息他。为了摆脱这个不幸,他带了 1 把军刀,一支步枪、4 支手枪、6 把匕首,号召成立志愿部队,但没有成功。作了各种冒险之后,他最后在赫尔上了岸。在那里,他急忙公布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人的,另一封是给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德国人的,而且据说也给伦敦的两个共产主义者寄去了一张字条,内容是:

“我代表 15 000 个挪威工人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

虽然发出了这一奇怪的呼吁,但是由于过去的团结友爱宣言,他很快又成了欧洲中央委员会的隐名合伙人,同时又是

“泰晤士河畔的格雷夫森德的更夫和仆役,在那里,我要用 9 种不同语言为新成立的经纪商行寻找商船船长,直到我被怀疑弄虚作假,这类事至少是作为猪倌的哲学家约翰奈斯·弥勒所没有遇到过的”^①。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 年伦敦版。——编者注

哈罗把他的充满了丰功伟绩的生活总结如下：

“除了诗歌，很容易算出，我献给民主运动的德文著作有 18 000 册以上（按照汉堡的行市，每册价格从 10 先令到 3 马克，总价值约 25 000 马克），出版费用没有一次得到补偿，更不用说，我从中得到任何收入来维持我的生活。”^①

关于我们的来自南日德兰半岛的拉曼彻的蛊惑人心的骑士的冒险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在希腊和巴西，在魏克瑟尔河和拉普拉塔河，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纽约，在伦敦和瑞士，忽而是“青年欧洲”的代表，忽而是南美的“人类”的代表，忽而是画家，忽而是更夫和仆役，忽而又是在推销自己著作的小贩；今天在水上波兰人中间，明天在南美牧人中间，后天又在商船船长中间；他被误解，被嘲笑，被忽视，但是又到处都以自由的游侠姿态出现，深深地蔑视一般的市民行业，——我们的英雄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头脑糊涂、妄自尊大和自以为是。他不顾整个世界，总是讲话、写作和发表文章，把自己说成 1831 年以来世界历史的主要驱动轮。

^① 哈·哈林《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 年伦敦版。——编者注

十

阿尔诺德虽然获得了迄今为止意想不到的成功,但是仍然没有达到他辛劳的目的。由于马志尼的恩宠,他成了德国的代表,因此他有责任一方面至少使德国流亡者确认这一身分,另一方面把服从他的领导的人们摆出来给中央委员会看。固然,他断定在德国“在他背后有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但是,只要马志尼和赖德律所看到的仅仅是卢格这个前面部分,那么这背后部分就根本无法引起他们的信任。一句话,阿尔诺德必须在流亡者中间给自己寻找“轮廓鲜明的”尾巴。

这时,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来到了伦敦,和他一起来的,或者紧跟着他来的还有一些其他被驱逐的人,一部分来自法国,一部分来自瑞士和比利时,这就是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奥本海姆、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这些新来的人当中有一部分已有在瑞士建立临时政府的经验,他们给伦敦流亡者带来了新的生活气息,而对我们的阿尔诺德来说,这真是个前所未有的好时机。同时,海因岑在纽约重新接管了《快邮报》,因此,阿尔诺德现在已有可能除了在不来梅的小报^①上,还在大洋的彼岸实现他的再次出现。如果阿尔诺德有一天找到了自己的施特罗特曼的话,那么这个施特罗特曼一定会认为 1851 年头

^① 指《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编者注

几个月的《快邮报》是不可估价资料。阿尔诺德的那种没完没了的空谈、愚蠢、无耻和他在堆积自己的排泄物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蚂蚁般的勤勉认真，非亲眼所见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海因岑把阿尔诺德描绘成欧洲的大国，阿尔诺德则把他的海因岑看作美国报界的贤哲。他告诉海因岑欧洲外交的秘密，特别是流亡者的世界历史中每天的最新变化。他有时作为伦敦和巴黎的匿名通讯员向美国公众报道伟大的阿尔诺德自己的时髦举动。

“阿·卢格又一次使共产主义者陷入了困境。”——“阿·卢格昨天（注明地点为巴黎，但日期出卖了老宫廷小丑）从布莱顿躲到伦敦。”^①还有：“阿尔诺德·卢格写信给卡尔·海因岑说，亲爱的朋友和编辑——马志尼向你致意^②——赖德律-罗兰允许你翻译他的论6月13日的文章”^③如此等等。

关于这一点，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中说道：

“我在卢格的信中（登在《快邮报》上）看到，海因岑告诉卢格（私下里）关于他的报纸在美国的重要性的各种趣闻，而卢格对他则以大欧洲政府自居。只要卢格给海因岑一条重要的新闻，他总不放过机会附带说，你可以要求合众国的其他报纸转载这一新闻。好像它们真的认为值得长时间地等待卢格的允许似的。顺便说说，虽然有卢格先生的建议和许诺，但是我还一次也没有看见这些重要新闻在什么地方转载过。”^④

卢格老爹利用这张小报，同时利用《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是为了用下面这类阿谀奉承的话来笼络新到的流亡者；现在这里有天才诗

① 阿·卢格的1851年1月30日巴黎[通讯]。——编者注

② 阿·卢格《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5月1日于布莱顿》。——编者注

③ 阿·卢格《赖德律-罗兰论六月大搏斗》（《流亡者之声》第2卷第4期）。——为《快邮报》作。——编者注

④ 见1852年5月27日阿·克路斯致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人和爱国者金克尔，伟大的作家施特罗特曼，既可爱又勇敢的青年人叔尔茨，此外还有几位杰出的革命统帅等等。

在此期间，和马志尼的委员会相对立，成立了平民的欧洲委员会，委员会的拥护者是“流亡者下层”和欧洲各民族的流亡者中的下等人。在布龙采尔大战²⁰⁸期间，发表了一篇宣言，参加签署宣言的有下面这些杰出的德国人：格贝尔特、迈尔、狄茨、谢特奈尔、沙佩尔、维利希。这个用非常独特的法文写成的文件宣布了一条最新消息：暴君们的神圣同盟这时（1850年11月10日）已集中了133万士兵，在他们背后还有君主们的70万武装起来的仆役作为后备军，“德国的报纸和委员会本身的联系”使它有可能知道华沙会议²²²的旨在屠杀欧洲一切共和党人的秘密计划。于是，最后不可避免地号召武装起来。这个宣言^①（收到这篇宣言的《祖国报》把它叫作法农—卡佩隆—古泰宣言）遭到了反革命报刊的无情嘲笑。《祖国报》称它为

“二流人物的宣言，写得毫无色彩，毫无风格，只是戴了几朵‘恶魔’、‘刺客’和‘屠杀’这类极可怜的雄辩之花”^②。

《比利时独立报》报道说，宣言的起草人都是些“民主派中的无名小卒”，这些可怜虫还把宣言寄给了它在伦敦的通讯员，虽然该报是保守派。他们极其渴望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但是该报为了给以

① 《告各国民主主义者书》，见1850年11月8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编者注

② 见古·德·莫利纳里《伦敦的红色流亡者》，并见1850年12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惩罚,不想刊载这些签名者的名字^①。这些显贵尽管百般乞求反动派,但是仍然没有人承认他们是阴谋家和危险人物。

这一新的竞争机构促使阿尔诺德加强他的活动。例如,他企图和司徒卢威、金克尔、鲁·施拉姆、布赫尔等人共同创办一张名叫《人民之友》的报纸,或者,如果古斯塔夫坚持的话,那就叫《德国旁观者》。但是事情遭到了失败,一部分原因是其余的伙伴反对阿尔诺德作保护人,一部分原因是“温情的”哥特弗里德要求稿费付现金,可是阿尔诺德坚持汉泽曼的观点: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²²³。阿尔诺德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专门的目的,这就是向读者协会,一个由工资优厚的工人和小资产者组成的德国钟表工人俱乐部勒索钱财。然而这件事也没有成功^②。

但是,不久又有了阿尔诺德再次出现的新机会。赖德律和他的法国流亡者中的追随者,不能放过2月24日(1851年)而不庆祝欧洲各民族的“团结友爱日”⁶³,不过出席的只有法国人和德国人。马志尼没有来,寄来一封信表示歉意。哥特弗里德出席了,但是愤怒而归,因为他的无声无息的出现并没有引起预期的奇妙效果。阿尔诺德的遭遇是:他的朋友赖德律装作不认识他;而他走上讲台后,张皇失措,连得到他的上峰同意的法文讲稿也没有掏出来,只是用德语结结巴巴地讲了几句话,最后又用法语喊了一句:“为恢复革命而斗争!”,便在大家都表示不满意的的情况下匆忙离去。

同一天,在上述竞争委员会的旗帜下举行了反宴会。路易·勃朗

① 1850年11月19日《比利时独立报》(布鲁塞尔)第323号第2版。——编者注

② 见1851年2月2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恼恨马志尼—赖德律的委员会一开始没有吸收他参加，因而加入了平民流亡者队伍，并声明“天才贵族也必须消灭！”^①流亡者下层全到齐了。宴会由侠义的维利希主持。大厅里挂满了旗帜，墙上赫然排列着伟大的名人的名字：加里波第和科苏特之间是瓦尔德克，布朗基和卡贝之间是雅科比，巴尔贝斯和罗伯斯比尔之间是罗伯特·勃鲁姆。衣装讲究的卖弄风情者路易·勃朗如泣如诉地宣读了他的老应声虫，即未来的社会共和国的贵族、1848年在卢森堡宫里开会的代表们²²⁴的献词。维利希宣读了来自瑞士的献词，这个献词上的签名有一部分是用虚假的借口骗取到的，为了炫耀，轻率地公布了献词，签名人后来大批地遭到了放逐。德国没有寄来献词。然后便是演讲。尽管充满了无限的团结友爱的感情，但是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了无聊的神情。

这个宴会引出了一件大有教益的丑事，这件丑事就像平民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切英雄业绩一样，在反革命报纸上宣扬开来。原来是，在这个宴会上有一个叫作巴泰勒米的人当着路易·勃朗的面宣读了对布朗基的夸张的颂词，这令人感到非常稀奇。不久真相就大白了。《祖国报》发表了布朗基应请求而从贝尔岛寄给致祝词者的祝酒词²²⁵。在祝酒词中布朗基尖锐而中肯地抨击了1848年临时政府的全部成员，尤其是路易·勃朗先生。《祖国报》故作惊讶地写道，这个祝酒词在宴会上被扣压了。路易·勃朗立刻在《泰晤士报》上声明，布朗基是卑鄙的阴谋家，他根本没有给纪念委员会寄来这样的祝酒

^① 《平等者的纲领。纪念欧洲革命三周年》，见1851年6月7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8期第62页。——编者注

词^①。由勃朗、维利希、朗道夫、沙佩尔、巴泰勒米和维迪尔诸先生组成的纪念委员会同时给《祖国报》送去一个声明，说委员会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祝酒词^②。但是《祖国报》在向转寄祝酒词给它的布朗基的妹夫安东先生查明实际情况以前，并没有发表这一声明。它把安东先生的回答发表在纪念委员会的声明下面，安东在回答中说，他把祝酒词寄给了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巴泰勒米，并得到了他的收条^③。这以后，巴泰勒米先生不得不声明这是事实，他撒了谎，他确实收到了祝酒词，但是认为祝酒词写得不恰当而把它压下了，并没有将此事通知委员会^④。但是，不幸还在这以前，声明签署人之一，前法国上尉维迪尔，背着巴泰勒米写了一封信给《祖国报》，在信中他声明说，他的军人荣誉感和正义感迫使他承认，他本人和路易·勃朗、维利希及所有其他人在委员会的第一个声明中都撒了谎。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6个而是13个。他们都看到了布朗基的祝酒词，大家讨论了这个祝酒词，经过了长时间的辩论，以7票对6票的多数决定不宣读这个祝酒词。维迪尔是投票赞成宣读的6个委员中的1个^⑤。

当《祖国报》在收到了维迪尔的信之后又收到巴泰勒米先生的声明时，它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它发表这一声明并加上了下面的《前

① 见路·勃朗《致〈泰晤士报〉编辑》。——编者注

② 见《[平等者宴会委员会的声明]》。1851年3月1日于伦敦。——编者注

③ 见古·安东《致〈祖国报〉编辑先生》。1851年3月6日于巴黎。——编者注

④ 见艾·巴泰勒米《致〈祖国报〉主编》。1851年3月8日于伦敦。——编者注

⑤ 见茹·维迪尔《编辑先生……[就布朗基的祝酒词发表的声明]》。——编者注

言》：

“我们常常给自己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蛊惑者的身上什么更多一些，是吹牛还是愚蠢？从伦敦来的第四封信，使我们更加作难了。我们不晓得他们当中竟有那么多可怜虫，他们是这样迷恋于写作和看到他们的名字被登载在反动的报纸上，甚至甘愿蒙受无穷的耻辱和自卑自贱。公众的嘲笑和愤慨同他们有何相干——只要《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祖国报》刊载他们的作文练习就行了。为了得到这种幸福，这个世界主义的民主派付出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出于对文坛的同情心，我们刊载了‘公民’巴泰勒米的下面这封信，这封信是一个新的、我们希望也是最后的证据，证明十分著名的布朗基祝酒词是真实的。他们起初全都否认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现在为了确证这个祝酒词的存在而互相争吵起来。”①

① 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巴黎)第71号第1版。——编者注

十一

“真正发展的力量”(用我们的阿尔诺德的极其美丽的表达形式之来说),是这样发展的:2月24日卢格在外国人面前使自己和德国流亡者都出了丑。少数还想同他一起干的流亡者感到失去了信心和支持。阿尔诺德把一切都归罪于流亡者中间的分裂状态,并且比以前更坚决地主张联合起来。他已经出了丑,却还在积极寻求新的机会再一次出丑。

因此,利用维也纳三月革命周年纪念日来组织一次德国人的宴会^①。狭义的维利希拒绝参加,因为他属于“公民”路易·勃朗,不能同属于“公民”赖德律的“公民”卢格一起工作。前议员赖辛巴赫、施拉姆、布赫尔等人也避免接近阿尔诺德。出席的有马志尼、卢格、司徒卢威、陶森瑙、豪格、隆格、金克尔,除了不发言的客人,他们都发表了演说。

卢格的行为^②“愚蠢透顶”,就连他的朋友也这么说。但是出席宴会的德国公众还要忍受更大的苦难。陶森瑙的小丑戏、司徒卢威发出的沙哑声、豪格的空谈、隆格的唠叨弄得听众毫无兴趣,大部分听众

① 见阿·卢格《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5月1日于布赖顿》。——编者注

② 见阿·卢格《3月13日在伦敦“共济会酒家”的演说》。——编者注

等不到听耶利米²²⁶—金克尔在上甜食时发表压轴演说,就纷纷溜走了^①。哥特弗里德以受难者的身分,“代表受难者”,为受难者向所有的人,“从维护宪法的普通战士到红色共和党人”,发表了悲伤的和解的讲话^②。他们全都再次作为共和党人呻吟,个别人,如金克尔,作为红色共和党人唉声叹气,同时他们全都怀着恭顺钦佩的心情拜倒在英国宪法面前。《纪事晨报》在第二天早上就提醒他们注意这种矛盾。

但是,在同一天晚上,卢格仍然达到了自己期望的目的,这可以从发表的一份呼吁书中看出。我们现在把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摘引如下:

“告德国人书!”

祖国的弟兄们和朋友们!我们,下面的签名人,现在,在你们作出具体决定之前,成立了德国事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务)委员会。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给我们派来了阿尔诺德·卢格,巴登的革命派来了古斯塔夫·司徒卢威,维也纳的革命派来了恩斯特·豪格,宗教运动派来了约翰奈斯·隆格,监狱送来了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我们要求社会民主派的工人们给我们派来一名代表。

德国弟兄们!事变夺去了你们的自由……我们知道,你们不能永远放弃你们的自由;我们自己将尽一切努力来成立委员会和发表宣言(阿尔诺德可以证明),来加速重新赢得自由。

当我们……当我们支持马志尼的公债并为它作担保的时候,当我们……当我们……成立各国人民的神圣的同盟来对抗他们的压迫者的非神圣的同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你们衷心希望做的事情……自由要在人类的世界法庭面前对暴君们进行伟大的审判(在阿尔诺德当检察官时,“暴君们”可以安

① 见 1851 年 3 月 17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② 《金克尔的演说》,见 1851 年 3 月 25 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 531 号第 3—4 版。——编者注

心地睡觉)…… 火灾、谋杀、破坏、饥饿和破产不久就会成为德国的普遍业绩。

请你们把目光转向法国,法国全国正燃烧着怒火,比任何时候都一致要求解放(见鬼,谁能预见到12月2日!①)。请看看匈牙利,甚至克罗地亚人也改变了立场(多亏《德国旁观者》和卢格的锯末制造的衣服)。并且请相信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情况,波兰是永生的(这一点在严守秘密的保证下已由达拉什先生告诉了他们)。

强权对强权——这就是公正,公正的时刻就快到了。而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争取成立比预备议会²²⁷更有效的临时政府(啊哈!)和比国民议会¹⁹更强有力的人民政权(关于这些先生们想用彼此哄骗的办法来争取些什么东西,请看下面)。

我们要特别向你们介绍我们在财政和出版方面的草案(强大的临时政府的第1号和第2号指令——责令关税主管人克里斯蒂安·弥勒执行本决定)。它们主要地是提供实际利益。广大的社会人士都清楚地知道,每认购一次意大利公债就是对我们的委员会和我们的事业的直接帮助,而目前你们能够给我们的实际援助主要是多提供资金。我们会把钱转换成社会舆论和社会力量(阿尔诺德声称自己是转换者)……我们告诉你们:请认购1000万法郎,我们将解放大陆!

德国人,请记住……(你们用低沉的声音唱着歌,在山上生起篝火)请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这在目前非常需要,几乎同需要金钱一样),把你们的钱袋给我们(这一点可不要忘记),把你们的手伸给我们!我们期待着,你们的热情将随着对你们的压迫而增强,并且在决定性的时刻,你们的及时的支援将充分加强委员会的力量(否则委员会就不得不借助于烧酒了,这是违背古斯塔夫的良心的)。

责成全体民主派传播我们的呼吁书(其余的工作由关税主管人克里斯蒂安·弥勒去做)。

德国事务委员会:阿尔诺德·卢格,古斯塔夫·司徒卢威,恩斯特·豪格,
约翰奈斯·隆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

1851年3月13日于伦敦。”②

① 指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编者注

② 见1851年3月22日威廉·皮佩尔致恩格斯的信和1851年3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我们的读者认识哥特弗里德，认识古斯塔夫；阿尔诺德的再次出现也十分频繁地一再重复着。因此，剩下的只有两位“有效的临时政府”的成员还需要加以介绍。

约翰奈斯·隆格或者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他喜欢在密友中这样称呼自己）自然不曾写过启示录²²⁸。他身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这是个庸俗的、平凡的、像水一样、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像洗涤用的温水一样淡而无味的人。大家知道，约翰奈斯所以成为有名的人物，是因为他不愿让特里尔的圣衣¹⁴²庇护他，虽然无论谁庇护他实际上都一样。当约翰奈斯出现时，老保罗斯惋惜黑格尔已死，因为后者现在当然已经不能再把他叫作肤浅的人，而已故的克鲁格却死得高兴，以此避免了负有深谋远虑者之名的危险。约翰奈斯属于在历史上经常碰到的这样一些人，这些人在某个运动发生又灭亡后几个世纪，还硬把这一运动的内容当作最新的新闻，以最枯燥无味的方式向某些变种的庸人和8岁的孩童述说。当然不能长久靠这种行业为生，我们的约翰奈斯在德国很快就陷入了一天比一天难堪的境地。他的德国假文明这种浅薄的脏水已经再也没有人要了，于是约翰奈斯来到了英国，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作为加瓦齐长老的竞争者从事活动，但是并无特殊成绩。这个无能的、单调的、枯燥无味的乡村教士在热情充沛、演技精湛的意大利修道士面前当然显得逊色了，而英国人下了很大的赌注打赌，断定这个令人讨厌的约翰奈斯不可能是那个把思想深刻的德意志民族导向运动的人。但是，阿尔诺德·卢格为此安慰他，阿尔诺德·卢格发现我们的约翰奈斯的德国天主教同自己的无神论在血缘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路德维希·冯·豪克，前奥地利皇家工兵上尉，后来，1848年是维也纳《宪法报》的编辑，以后是维也纳国民自卫军的营长，他在10

月30日以雄狮般的勇猛守卫着城市的大门,抵抗皇帝的军队,只是在全线崩溃以后才离开了岗位。他逃到了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参加了贝姆的军队,在军队里由于勇敢而晋升到总参谋部的上校。戈尔盖在维拉戈什城下投降⁴⁵之后,路德维希·豪克被俘,并且在绞架上英勇就义。奥地利人由于经常遭到失败而进行复仇,并对他们越来越无法忍受的俄国人的庇护恼恨得发狂,因而在匈牙利设立了无数的绞架。豪格在伦敦长时间被认为就是被俘的豪克(在匈牙利战役中著名的军官)。现在,似乎已经确定,他并不是已故的豪克。正如罗马陷落¹⁰⁰后他必须同意马志尼把他提升为将军一样,他也不能拒绝阿尔诺德把他临时变成维也纳革命的代表人物和强大的临时政府的成员。后来他在音乐的伴奏下,从地质学观点出发作了关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天体演化论的经济基础的优美演讲。在流亡者中间,这个忧郁的人以可怜虫或者如法国人所说的好心的傻瓜这个外号闻名。

结果超出了阿尔诺德的期望。宣言、一个强大的临时政府、1 000万法郎的公债,再加上一张小型周刊,由豪格将军主编,名称叫得很谦逊:《宇宙》。

宣言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谁也不去读它;《宇宙》出到第3期便憔悴而死;钱没有收到;强大的临时政府重新分裂成了它的几个组成部分。

在《宇宙》上首先登载了关于金克尔的演讲的广告^①、关于正直的维利希为流亡者募集捐款的广告^②和关于哥林格尔的啤酒店的广

①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讲演》,见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编者注

② 《维利希的信》。——编者注

告。此外,它还刊载了阿尔诺德的讽刺文章^①。老宫廷小丑给自己在德国捏造了一个好客的朋友名叫默勒,而自己则是他的朋友舒尔采^②。默勒对于在报纸上读到的英国好客的种种情况感到惊奇,并且表示担心,这种“奢侈享乐”会妨碍舒尔采管理“国家事务”。不过,随他去吧,因为舒尔采回到德国后将会因完全忙于国家事务而不得不拒绝默勒好客的款待。最后默勒感叹地说:“被邀请到温莎去的并不是叛徒拉多维茨,而是马志尼、赖德律-洛兰、公民维利希、金克尔和您自己(阿尔诺德·卢格)?”^③不过,如果说《宇宙》出到第3期就长眠了,那无论如何不是由于不善于做推销工作,人们在英国的一切群众大会上把报纸塞给演讲人,请演讲人代为介绍,说它专门支持了演讲人的原则。

关于号召认购1000万公债的呼吁书刚刚登出,突然谣传伦敦西蒂区正在传递一个为司徒卢威(偕同阿马利亚)赴美捐款的名单。

“当委员会决定出版一张德文周刊,并委托豪格为编辑的时候,自己想当编辑并给小报起名《德国旁观者》的司徒卢威,提出了抗议并决定赴美。”^④

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的报道就是这样。该报没有提到(海因岑有自己的理由),马志尼已把不伦瑞克公爵的《德意志—伦敦报》撰稿人我们的古斯塔夫的名字从德国委员会的名单中一笔勾销了。

① 阿·卢格《英国的好客》。——编者注

② 默勒(Möller)和舒尔采(Schulze)是许多德国民间笑话中的人物。——编者注

③ 《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讲演》,见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编者注

④ 阿·戈克《伦敦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阿·卢格《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5月1日于布赖顿》。——编者注

古斯塔夫立刻把《德国旁观者》移植到纽约。但是不久便从大洋彼岸传来了紧急情报：“古斯塔夫的《旁观者》完蛋了。”照古斯塔夫的说法，这完全不是由于缺少订户，也不是由于他没有空闲写文章，而仅仅是由于有支付能力的订户不多的缘故；而现在按民主主义观点加工罗泰克的《世界史》已成为不容拖延的需要，因为早在15年前他就开始了这一工作，这样一来，他要用《世界史》的形式，而不是用《德国旁观者》的形式提供给订户以相应的印张；但是，他不得不请求先付预订款，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应该为这个请求而抱怨他的。当古斯塔夫在大洋此岸的时候，海因岑宣称，他同卢格是欧洲头号大人物。但是，他刚刚到达彼岸，两个人之间就大吵大闹起来了。古斯塔夫写道：

“当海因岑6月6日在卡尔斯鲁厄看到人们把大炮架起来的时候¹⁸⁶，他就在女眷的陪伴下逃到斯特拉斯堡去了。”

海因岑则称古斯塔夫为“占卜者”。

《宇宙》正好是当阿尔诺德在信仰坚定的海因岑的报纸上为它大肆吹嘘^①的时候毁灭了，而“强大的临时政府”则恰好是在罗多芒特-海因岑在他的报刊上对它宣布“军人的服从^②”的时候停止了存在。海因岑在和平时期偏爱军事，这是大家知道的。

“在司徒卢威离去不久，金克尔也退出了委员会，于是委员会便停止了工

① 阿·卢格《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6月20日于布赖顿》。——编者注

② 《我们让这篇文章……为（1851年3月28日伦敦[通讯]）加的编辑部按语》，见1851年4月11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75号。——编者注

作。”(纽约《德意志快邮报》第23号)①

因此，“强大的临时政府”就只剩下了卢格、隆格和豪格三位先生。甚至阿尔诺德也已经明白，这个三位一体不但不能创造世界，而且什么也创造不了；不过，无论怎样排列、改变和组合，这三个人总是政府以后成立的各种委员会的核心。这个不倦的人还不愿承认自己输了；对他来说，全部问题仅仅在于做点什么事情，使他能像个繁忙的、长于政治计谋的人，首先是能为他装腔作势地高谈阔论，实现再次出现和散布自鸣得意的谰言提供些材料。

至于哥特弗里德，那么他为伦敦西蒂区的体面的商人作的戏剧性的演讲丝毫也没有使他丢脸。另一方面，十分明显，3月13日的宣言所追求的只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巩固阿尔诺德先生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连哥特弗里德事后也一定发现了这一点，但是承认这一点对他丝毫也没有好处。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宣言公布后不久，严厉的太太莫克尔便在《科隆日报》上登载了如下的声明：她的丈夫根本就没有在宣言上签名，他根本就没有想到公债，并且已经退出了刚刚成立的委员会。对此阿尔诺德在纽约《快邮报》上挑拨是非地说，金克尔由于生病的确没有在宣言上签名，然而他是赞成宣言的；宣言的草案是在他的房间里拟定的，他还转寄了一部分到德国去，而他退出委员会是因为任命的主席不是他而是豪格将军。阿尔诺德在作此声明时怒不可遏地攻击了“绝对的受难者”、“民主派的贝克拉特”金克尔的虚荣心，并且对约翰娜·金克尔太太也表示怀疑，因为像《科隆日报》这种被唾弃的报纸为她效劳。

① 阿·戈克《伦敦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阿·卢格《致卡尔·海因岑 1851年5月1日于布赖顿》。——编者注

可是阿尔诺德撒下的谷种并不是落到了多石的土地上。“美丽的灵魂”哥特弗里德决定用巧计胜过对手，并且独自去挖掘革命的财富。约翰娜刚刚在《科隆日报》上否认这件令人可笑的事，我们的哥特弗里德就已经在大洋彼岸的报纸上单独出面号召认购公债，并且说，应当把钱寄给“享有最大信任”的人。除了哥特弗里德·金克尔，谁还能是这样的人呢？他要求先交纳 500 英镑作为印制革命纸币之用。卢格立刻在《快邮报》上宣布，他才是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司库，在他那里可以买到现成的马志尼纸币。因此，对于想丧失 500 英镑的人来说，取得现成的纸币无论如何总比拿还不存在的东西来投机好。而罗多芒特-海因岑则喊叫道，如果金克尔先生不放弃自己的计谋，那就要公开宣布他是“革命的敌人”^①。于是哥特弗里德在《快邮报》的直接对手《纽约州报》上发表了回击的文章。这样，在大洋彼岸已经在进行一切形式的战争，而在此岸还在交换犹大之吻。

但是，哥特弗里德很快就观察到，由于他直截了当地以自己的名义宣布推销国民公债，有点激怒了民主派庸人们。为了纠正这一错误，现在他便让人说明：

“这个为了推行德国国民公债而发出的交款号召根本不是他发表的，很可能是他在美国的过分热心的朋友为此利用了他的名字。”^②

这个说明引出了维斯博士在纽约《快邮报》上发表的以下的回答：

① [卡·海因岑]《支持德国革命的目标》。——编者注

② 《趁此机会……为阿曼德·戈克(伦敦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一文加的编辑部按语》。——编者注

“大家知道，这个为德国公债进行宣传的号召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寄给我并且迫切地请求我在所有的德文报纸上发表的。谁要是对此表示怀疑，我可以把这封信给他看。如果这个声明确实是金克尔发出的，那么为了他的荣誉，他应当公开收回这个声明，并且公布我同他的来往信件，以便向党表明，我的行为并不取决于他，也根本谈不到‘过分热心’。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金克尔就有责任把这个声明的可敬的作者公开叫作不怀好意的诬蔑者，或者，如果这样会发生误解，就叫作轻率的、不负责任的空谈家。我自己这方面不能相信金克尔会做出这样闻所未闻的背信弃义的事。爱·维斯博士。”（纽约《德意志快邮周报》）^①

哥特弗里德该怎么办呢？他又推出了这位严厉的夫人，他声明说，“轻率的、不负责任的空谈家”是莫克尔；他断定，他的夫人是背着他在进行公债的事情。无庸争辩，这个策略是非常“唯美主义的”。

我们的哥特弗里德像芦苇一样容易动摇，他随着他所确认的人民感情的风向，忽而出现在前面，忽而躲在后面，忽而着手一项事业，忽而又把它抛弃。他让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在伦敦为他这个革命的受难者举行公开的庆祝会，同时却背着这个资产阶级同以维利希为代表的流亡者下层进行被禁止的交往。他的生活状况同他在波恩时的俭朴比起来，可算是豪华的，但是他当时却往圣路易斯写信说，他生活和居住得像一个“穷人的代表”^②所应该的那样。总之，他遵照必要的礼仪对待资产阶级，同时也对无产阶级表示应有的尊敬。但是，作为一个想象力大大超过理性的人，他不可能不表现出一个暴发户的无礼和狂妄，这使得流亡者中的某些自负的庸人离开了他。他在《宇宙》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工业博览会的文章最能反映他的性格特征。最使他惊讶的是挂在水晶宫⁶⁴里的一面大镜子。对他来说，客观

① 爱·维斯的《声明》。——编者注

② 哥·金克尔《[给圣路易市公民的信。1851年2月21日]》。——编者注

世界已化为一面镜子，而主观世界则化为一句空话。借口展示一切事物的美的一面，他对一切事物卖弄风骚，并且随着需要的不同而把这种卖弄风骚叫作诗，牺牲，或宗教。老实说，他需要这一切只是为了卖弄自己。可是，当想象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就免不了在实际中暴露出丑的一面。不过可以预先告诉我们的哥特弗里德，一旦他落到古斯塔夫和阿尔诺德这些经验丰富的小丑手里，那他不了多久就只好丢掉狮子皮了。

十二

工业博览会¹³⁰在流亡者的生活中开辟了一个纪元。在这个夏季德国的庸人们像潮水一般地涌到了伦敦；德国庸人在巨大的、喧闹的水晶宫里，以及在更加巨大得多的、隆隆作响的、嘈杂的和人声鼎沸的伦敦感到很不舒服；当他们经过整天劳苦汗流浹背地完成了参观博览会和其他名胜这一任务之后，便到谢特奈尔的哈瑙饭店或哥林格尔的星星饭店里去休息，在这里那才是杯中乐融融，烟雾腾腾起，一片酒店政治的气氛。在这里，“整个祖国都聚到一起”，况且还可以免费观看德国头号大人物。他们也坐在这里，有议会议员、议院代表、统帅、1848年到1849年这段美好时期里的俱乐部演说家，他们像其他人那样吞云吐雾，日复一日地在公众面前以不可动摇的尊严议论着祖国的最高利益。在这里，德国小市民，只要不吝惜几瓶极廉价的酒，那就能详细地得知欧洲各国内阁的最秘密的会议上所发生的一切。在这里可以准时地得知什么时候“开始冲击”。于是人们便一瓶又一瓶地冲击起来，各种派别的人虽然已经步履蹒跚，但是带着他们已为拯救祖国尽了自己一份力量这种令人鼓舞的意识回家去了。流亡者们在有支付能力的庸人大批来到伦敦的这段时期里酒喝得比任何时候都多，而花费则比任何时候都少。

流亡者的真正的组织就是这个在锡仑-谢特奈尔的庇护下设在朗-埃克街上的靠博览会兴旺发达的酒店组织。真正的中央委员会经

常在这里开会。其他一切委员会、组织、党的机构都纯粹是这个真正德国懒汉酒馆的常客组织的骗人幌子和爱国主义小摆设。

另外，流亡者的队伍当时还因为梅因、孚赫、济格尔、戈克、菲克勒尔等等先生的到来而得到加强。

梅因，这个由于疏忽而生下来就没有刺的小刺猬，早就被歌德用**潘辛涅**的名字描绘如下：

“在文学中，就像在社会上一样，常常能遇到这样一些矮小的、奇特的、滑稽可笑的人物，他们有某种天赋，是死乞白赖和死皮赖脸的人；因为他们容易被每个人看透，所以他们让人有机会拿他们随意开心。而这些人就从中获得许多好处：他们生活着，活动着，他们的名字被人提到，受到人们的热情款待。如果他们遭到失败，他们也不惊惶不安，而是把失败看作个别的情况，并且等待将来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文学世界里的潘辛涅便是这样的人物。人们捉弄他，引诱他，欺骗他，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甚至他在西班牙因溺水而惨死，也丝毫不能消除他的一生所造成的滑稽可笑的印象，正如火火匠的爆竹不会由于噼噼啪啪响了一阵最后发出一声巨响而提高身价一样。”^①

相反地，同时代的作家们谈到他时这样说：**爱德华·梅因**属于那些“坚定的人物”，他们代表同德国其他地方普遍存在的愚蠢相对立的柏林的智慧。他同他的朋友**缪格**、**克莱因**、**察贝尔**、**布尔**等人也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梅因甲虫协会**。每一个**梅因甲虫**都坐在自己的独占的小叶子上，而**爱德华·梅因**则坐在**曼海姆**的小晚报上^②，他在这上面每星期以极大的努力生产一个绿色小粪卷，即一篇通讯。这个**梅因甲虫**实际上达到了这一地步：他1845年要出版一本月刊；人们从各方

① 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编者注

② 原文是“Abendblättchen”，指《曼海姆晚报》。德语中“Blättchen”既有“小叶子”的意思，又有“小报”的意思。——编者注

面给他寄来了文章，出版者^①等待着，但是整个事情一下全垮了，因为爱德华在出了8个月的冷汗后声明他写不出刊物的广告。因为我们的爱德华对待自己的一切幼稚行为都很认真，所以在柏林三月革命后，他被认为是一个对待运动严肃认真的人。在伦敦他同孚赫一起参加了由一个20年前略懂德文的老太婆主编和审查的《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的工作，但是被当作不能胜任工作的人而辞退了，因为他顽固地非要把自己早在10年前就已在柏林发表过的关于雕刻艺术的深奥的文章排进这本杂志。当金克尔派流亡者后来任命他为秘书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是个实际的政治活动家，并且在石印的通告里宣布他已获得“稳固的观点”^②。在他去世之后，在这个梅因甲虫的遗物中将会发现许多为计划中的著作写好的标题。

梅因在编辑工作和秘书工作中的同事**奥本海姆**同他有不可避免的联系。关于奥本海姆，有人说他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一个寓言中的人物，也就是说，无聊女神以犹太珠宝商儿子的形象出现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伏尔泰写“除了枯燥无味，一切风格都好”^③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已预感到我们的亨利希·伯恩哈德·奥本海姆的出现。我们宁愿把奥本海姆当作作家，而不愿把他看作演说家。你可以逃避他的作品，但是要想回避听他的演说，那是不可能的。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转生说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亨利希·伯恩哈德·奥本海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用的名字却无法重新发现，因为无论在哪一个世纪里都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以令人厌恶的空谈而出名的。他的生活体现在三个

① 克里斯蒂安·宾索。——编者注

② 爱·梅因《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1851年8月30日于伦敦》。——编者注

③ 伏尔泰喜剧《浪子》的序言。——编者注

辉煌的时期中，这就是阿尔诺德·卢格的编辑、布伦坦诺的编辑、金克尔的编辑。

这个同盟的第三个成员是尤利乌斯·孚赫先生。他属于柏林移民区中那些善于以非常的经营本领发挥自己的小小才能的胡格诺教徒²²⁹之列。他最初是以自由贸易派²³⁰的旗手毕斯托的角色登上了社会活动的舞台，而他是以此角色受雇于汉堡商人去进行宣传的。在革命风潮时期他们允许他打着气势汹汹的无政府主义招牌鼓吹贸易自由。当这样做已不合时宜的时候，他便被抛开了，于是他同梅因一起编辑柏林的《晚邮报》。他在国家应当根本消灭并且应当实行无政府主义的借口下，在这里避开了反对现存政府的危险立场^①，而当后来该报由于没有钱交纳保证金而停办的时候，《新普鲁士报》对于民主派中唯一称得上作家的孚赫的命运表示了惋惜。同《新普鲁士报》的这种亲切的关系不久便达到了非常亲热的程度，以致我们的孚赫竟开始在伦敦为这家小报写起通讯来了^②。孚赫参加流亡者的政治活动并不太长久。他的自由贸易论使他明白，他的使命是从事企业活动，他热切地恢复了这一活动，他在这方面所完成的工作直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过，——他根据非常完善的浮动指数制定了他的文章的价目表。由于《布雷斯劳日报》的不谨慎，这个文件也已为大众所知。

同柏林的智慧的这个三星相对立的是南德意志的坚定信念的三星，即济格尔、菲克勒尔和戈克。

弗兰茨·济格尔，如他的朋友戈克所描绘的，是个“个子不大、没

① 见恩格斯《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编者注

② 见1851年8月1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有胡须、整个气质酷似拿破仑的人”，他，按照同一个戈克的说法，是“一个英雄”，“一个未来的人”，“首先是个天才的、富于创造精神的、不倦地忙于新计划的人”^①。有人私下说，济格尔将军是巴登的一个富有信念而又野心勃勃的年轻尉官。他读过法国革命的战役²³¹史，从中知道，由一个少尉一跃而成为总司令，这完全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没有胡须的小个子便下定决心：弗兰茨·济格尔总有一天要成为某个革命军队的总司令。他由于重名而在军队中博得的声望^②和 1849 年的巴登起义帮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他在内卡河畔进行的战斗和在黑林山没有进行的战斗都出了名^③，而他向瑞士撤退甚至他的敌人也称赞是适时的和正确的机动^④。他的军事计划证明他研究过革命战争。为了忠实于革命的传统，不考虑敌人，不考虑作战和退却的路线以及其他这类小事的英雄济格尔，认真地从莫罗在当时选择的一个阵地转到另一个阵地，尽管如此，如果说，他没有能在所有的细节上都模仿莫罗的进军，如果说，他不是帕拉迪斯，而是在埃格利绍渡过莱茵河，那么应当说这是由于敌人的眼光短浅，不会赏识这种非常科学的机动。济格尔在自己的命令和指令中表现出他是个传教士，虽然他文采不如拿破仑，然而信念比拿破仑坚定。后来，他制定了各兵种的革命军官手册；我们可以从这本手册中举出下面这样一段重要的话：

“按照章程，革命军官必须备有：一块头巾（除便帽外），一把军刀连同挂刀皮带，一条黑红黄三色的驼绒腰带，两副黑色皮手套，两套军服，一件斗篷，一条

① [阿·戈克]《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革命》。——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105—106 页。——编者注

③ 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 4 章。——编者注

呢裤,一条领带,两双皮靴或鞋,一个12英寸长10英寸高4英寸厚的黑皮旅行袋,6件衬衣,3条衬裤,8双长袜,6块手帕,两条面巾,一副刮脸和洗脸用具,一套文具,一块规定式样的石板,一把刷子,一本野战勤务章程。”^①

约瑟夫·菲克勒尔(按照他的朋友戈克的描绘)是“诚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知名人士的榜样,这个人曾经使整个上巴登和湖滨边区团结一致地支持他,并由于多年的斗争和苦难而博得了差不多同布伦坦诺一样的声誉。”^②和一个诚实的、坚定的、不屈不挠的名人的身分很相称,约瑟夫·菲克勒尔有一张胖得滚圆的脸、一根粗胖的脖子和一个同样肥胖的大肚子。关于他过去的的生活,人们只知道他是靠15世纪的一件雕刻品和几件同康斯坦茨宗教会议¹³⁸有关系的圣物过活的,他让旅行者和外国的艺术爱好者出钱观赏这些珍品,并且把各种“古董”卖给他们,而这些东西,就像菲克勒尔自己扬扬得意地说的那样,都是他让人“仿照古董的样式”不断地重新制造的。

他在革命时期的唯一的事迹是:第一,预备议会之后被马蒂逮捕,第二,1849年6月在斯图加特被勒麦逮捕。由于这两次被捕,他幸运地避免了出丑的危险。后来符滕堡的民主派为他交纳了1000古尔登的保证金,于是菲克勒尔隐姓埋名地到图尔高州去了,他的销声匿迹,使保证人感到非常痛心。不可否认,他在《湖滨小报》上成功地用油墨表现了湖滨农民的感情和意向。此外,他看到他的朋友卢格的情况,便认为,书读多了会使人变得愚蠢,因此他也警告他的朋友戈克,不要到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去。

① 1850年7月3日德朗克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信。——编者注

② 阿·戈克《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革命》。——编者注

阿曼德·戈克,从他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可爱的人^①,他“的确不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然而是个朴实的公民,他的高尚和谦逊的行为使他到处都有朋友”(《西美周刊》)^②。戈克因行为高尚而成了巴登临时政府的成员,但是他自己承认,在政府里他不能做任何反对布伦坦诺的事情,并且由于谦逊,他听任人家给他冠以独裁者先生的称号。谁都不否认,他当财政部长时所取得的成就是很微小的。由于谦逊,他在已经部署向瑞士总退却的前一天宣布在多瑙埃兴根成立“社会民主共和国”^③。由于谦逊,他后来宣称(见1852年海因岑的《雅努斯》),12月2日巴黎无产阶级所以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他那种法属巴登的民主派洞察力和通常在法属德国南部流行的民主派洞察力。谁想找到进一步证实戈克的谦逊和“戈克派”的存在证据,那他可以到他本人所著的《回顾巴登革命……》1850年巴黎版中去找。他谦逊的最高表现要算是他在辛辛那提的公众集会上谈到的下面这件事情:

“巴登革命失败后有些可敬的人到苏黎世来看他,并对他说,参加巴登革命的有德国各个种族的人,所以必须把巴登革命看作德国的事件,正如罗马革命应当看作意大利革命一样。他是坚持到底的活动家,所以他应当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由于谦逊,他拒绝了。”^④

为什么?一个曾经是“独裁者先生”而且又是“拿破仑”-济格尔的挚友的人,也是可以“成为德国的马志尼”的。

① 阿曼德(Amandus)一词有“愉快的”和“可爱的”的意思。——编者注

② 1852年5月13日阿·克路斯致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③ 阿·戈克《从德国现状回顾巴登革命》。——编者注

④ 可能引自1852年4月4日阿·克路斯致威·沃尔弗的信。——编者注

由于这些人,以及类似他们但不如他们那样杰出的一批人的到来,流亡者就算是到齐了,他们可以开始进行伟大的战斗了,关于这些战斗,读者可以从下面这支歌中看到。

十三

Chi mi darà la voce e le parole,
E un profferir magnanimo e profondo!
Che mai cosa più fiera sotto il sole
Non fù veduta in tutto quanto il mondo;
L'altre battaglie fur rose e viole,
Al raccontar di questa mi confondo;
Perchè il valor, e'l pregio della terra
A fronte son condotti in questa guerra.

(Bojardo, orlando innam. canto 27.)

谁赐我文字，谁赐我声音，
为描写这场战斗之伟大崇高？
亘古未见比之更自豪的战斗，
充满着狂野的愤怒与喧嚣；
其他战役激烈而残酷，
却不过玫瑰紫罗兰之貌，
我的笔亦变得笨拙，当战斗篇章中
勇敢与荣誉之光共同闪耀。^①

由于这批最后的高贵人物到来充实了流亡者的队伍，流亡者必须努力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使自己凑成整整一打的时刻来到了。可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27首歌。——编者注

以设想,这种努力将导致新的激烈的敌对行动。在大西洋彼岸的报纸上展开的笔战现在已达到了高潮。个人的苦难,互相倾轧,玩弄诡计,自吹自擂——大人物们的全部力量都投到这些无聊的事情中去了。但是流亡者却因此获得了一点东西,这就是存在于世界历史之外的自己本身的历史,同公众的政治并存的自己小圈子政治。从彼此攻击中,流亡者感觉到了彼此的重要性。因为在所有这些追求和斗争的后面都隐藏着对民主派的资产这只圣杯²³²的盘算,所以先验的竞争,关于巴巴罗萨皇帝的胡须的争论,立刻就成了小丑们的庸俗的竞赛。谁要想根据原始材料研究这一场老鼠与青蛙之战^①,那他可以在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德意志总汇报》、《州报》、《巴尔的摩通讯员》、《巴尔的摩警钟报》及其他美国德文报纸上找到一切有关的文件。但是,这种卖弄虚构的同盟和臆想的谋叛的把戏,这一切流亡者的吵嚷并不是没有引起某些严重的后果。它们给了各邦政府以其所希望的借口,在德国逮捕许多人^②,在全国各地镇压运动,并且把伦敦的可怜的草扫帚当作稻草人用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这些流亡的英雄们对于现状决不构成任何危险,他们希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使德国国内呈现出一片死寂的沉静,以便他们的声音显得更响亮;使公众的觉悟水平极度地降低,以便甚至像他们这样的人也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伟人。

新到的德国南部的市侩们对哪一方都没有承担义务,因而在伦敦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他们可以充当各种集团的调停人,同时

① 指古希腊的一首诙谐叙事诗《老鼠与青蛙之战》,荷马《叙事诗》的模仿,作者不详。——编者注

② 见1851年5月28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可以把大批流亡者像一个合唱队似的集合在“杰出人物”的周围。他们高度的责任感要求他们不放弃这种机会。

同时他们已经认为，赖德律-洛兰坐上了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坐椅，而赖德律-洛兰自己也这样想。对于他们这些法国的近邻来说，重要的是由法国临时政府承认他们是德国的临时统治者。对济格尔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让赖德律保障他的总司令的职位。但是，只有通过阿尔诺德这一关口才能走向赖德律。况且，阿尔诺德所戴的性格面具那时还使他们敬仰，而且他还作为哲学上的北极光照耀他们德国南部的黄昏。因此，他们首先去向卢格请求援助。

站在另一方面的首先是金克尔及其周围亲近的人——叔尔茨、施特罗特曼、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等等，然后是以赖辛巴赫为首的前议会议员和议院代表，以及作为文学代表人物的梅因和奥本海姆，最后是维利希及其一伙人，但后者仅居于幕后。在这里，角色的分配如下：作为西番莲的金克尔代表全体德国庸人；作为伯爵的赖辛巴赫代表资产阶级；而作为维利希的维利希则代表无产阶级。

关于奥古斯特·维利希，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古斯塔夫因他的尖头盖骨而总是对他怀有戒心，在这种头盖骨里面，自负这个器官异常发达，以致压缩了其余的一切能力。有一个德国庸人在伦敦的一家啤酒酒店里看到前尉官维利希的时候，惊恐地抓起自己的帽子逃跑了，他边跑边喊道：我的上帝，这个人多么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为了增强这种相似性，维利希在革命前不久，做了一个时期的木匠^①。后来，在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他当了游击队^②领袖。

① 见 1852 年 6 月 14 日恩·德朗克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② 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编者注

游击队领袖,这个古意大利佣兵队长的后代,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在德国,是一种特殊现象。游击队领袖习惯于擅自行动,不服从任何最高总司令。他的游击队员只服从他,而他也完全依赖于他们。因此,在志愿部队里执行着一种特殊的纪律:看情况而定,有时它严格到野蛮的程度,有时而且经常是极端松懈。游击队领袖不能够总是摆出一副发号施令的威严面孔,他必须经常迎合他的游击队员,以实惠来笼络他们每一个人。一般的军人品质在这里并没有多大用处,为了使下层敬重,必须用其他的品质来加强勇敢。如果领袖没有高贵的出身,那他必须具有哪怕是高尚的意识,而这种意识又往往补充以阴谋、诡计和隐蔽的卑鄙行为。这样就不仅能博得部下士兵的好感,而且也能收买居民,突袭敌人,同时还被认为,特别是被敌人认为是个有性格的人。但是,有了这一切还不足以掌握志愿部队,因为他们大部分或者一开始就是由流氓无产阶级组成的,或者是很快就被流氓无产阶级所同化。为了掌握志愿部队,需要有一种高级观念。因此,志愿部队的领袖必须具有某些固定观念的精华,他必须是有原则的人,经常意识到自己负有解放世界的使命。他应当在阵前向士兵进行说教,对每个士兵经常进行个别的有教益的宣传,从而把这种高级观念灌输给他的士兵,并使整个部队变成自己的信仰上的子弟。如果这个高级观念具有思辨的、神秘的性质,并且超过一般的智力水平,如果它具有某些黑格尔的特色,正如维利森将军企图灌输给普鲁士军队的那种观念^①,那就更好了。这样,每一个游击队员便具有高尚的意识,整个部队的行动就因此而获得思辨的神通,这使他们远远地超

① 卡·威·维利森《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编者注

越于一般的缺乏头脑的勇敢之上,这样的部队即便能获得荣誉,与其说是靠了它的成绩,不如说是靠了它的救世主的使命。如果使每一个战士都宣誓,说他们决心同他们为之而战的事业共存亡,宁愿高唱着圣歌直到最后一个人被杀死在边境上的最后一棵苹果树下,那么部队就能够更加坚强^①。

这样的部队和这样的领袖如果同普通的世俗的军队编在一起,自然一定会感到自己受了玷污,并且一定竭力寻找机会脱离军队,或者立刻把那些未行割礼者甩掉;他们最痛恨大规模的兵团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在这时靠高度的士气来支持的阴谋行为,如果忽视军事艺术的一般规则,就会毫无作用。因此,游击队领袖应当是个地道的十字军骑士:他应当一身兼扮隐士彼得和穷汉瓦尔特两个角色。面对他的部队的复杂的成分和松懈的生活方式,他应当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不能让人把他灌醉,而他自己只能偷偷地,比如说在夜里躲在被子里痛饮。如果在他身上发生了合乎人之常情的事情,在尽情地同女人寻欢作乐之后,超过规定的时间,到深夜里才回到兵营,那他就[不]要直接走大门,而要绕个弯,[越过]无人守卫的墙,以免引起不满。对于女人的魅力他应当表示冷淡,但是,如果他偶尔让一个裁缝帮工在自己的床上休息,就像克伦威尔对待自己的下级军官那样,那他就会给人以良好的印象;总之,他在生活品德方面决不应当成为过分的禁欲主义者。因为在冒险骑士的后面站着他的部队的主要是靠征调和免费住宿度日的食客骑士,而穷汉瓦尔特总是不得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仅仅由于这一点,隐士彼得就必须经常有现成的安慰话,说采取这种不愉快的办法,纯粹是为了拯救祖国,因而

^① 见马克思《高尚意识的骑士》。——编者注

也是为了有关人员的切身利益。

游击队领袖在战时所表现的这一切品质也表现在平时,但发生了某些不十分有利的变化。首先他应当为新的部队保存骨干,并经常派出招募新兵的下级军官。这个主要是由志愿部队的残余和流亡者下层组成的骨干,被编入兵营,他们的生活或者由政府维持(例如在贝桑松¹⁸³),或者用其他的方法维持。兵营生活不能缺少观念的神通;这要通过兵营共产主义来实现,由于实行兵营共产主义,对庸俗的平民活动的鄙视获得了更大的意义。但是,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兵营已不再受军事条例的约束,而只是服从于精神上的权威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训条,所以偶尔因共同的金库而打架的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拳头也会落到精神上的权威的头上。如果附近什么地方有个手工业者协会,那么这里就可以用来作为行将组建的部队补招新兵的据点,并且给手工业者描绘将来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游击队员冒险活动的远景,以补偿他们现在所担负的沉重的劳动。此外,有时可以做到使手工业者协会出钱供养部队,因为这样的兵营对于无产阶级的未来具有重要的原则性的意义。不论在兵营里,或者在协会里,说教和个人交往中的家长式的说三道四的作风都不是没有影响的。

游击队员就是在平时也不会失去他所绝对必需的信心,而且,正如他过去在每次失败以后总是预告明天将获得胜利一样,现在他也经常宣告,再过两星期就会有所谓的“开始冲击”,这一点在精神上是无疑的,在肉体上是必需的。因为他必然会有敌人,因为高尚的人总有无耻的人反对,所以他在后者中间将发现对自己的强烈的敌意,并且确信,后者出于痛恨他应得的声望将会毒害他或刺死他;因此,他总是在枕头底下放一柄长刀。游击队领袖在战时如果不设想他受到居民的崇拜,就不可能获得任何胜利,同样,在平时就是没有取得实

际的政治联合,他也不断地设想或想象着这些联合,而这有时会造成惊人的骗局。征调才能和免费住宿办法又以愉快的寄生生活的形式重新表现出来。反之,我们的罗兰的严格的道德上的禁欲主义,像一切高尚的和伟大的行为一样,在和平时期受到了严重的非难。博雅多在第26首歌中唱道:

特平说,布拉瓦伯爵,
童贞一生,纯洁无瑕,
愿意相信就相信吧,先生们!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后来布拉瓦伯爵由于美丽的安吉利卡的眼睛而失去了理智,而阿斯托尔弗不得不在月亮上寻找这个理智,就像洛多维科·阿里欧斯托大师令人神往地描写的那样^①。但是,我们的现代的罗兰竟把自己同诗人本人混淆起来,诗人在讲到自己时说他也因恋爱而失去了理智,并且用嘴唇和手在他的安吉利卡的胸乳上寻找理智,他这样干了,而所得到的回报是被赶出了房门。

在政治上,游击队领袖要表现出他在用各种手段进行小型战斗方面的优势。他按照游击队员这个字的本义,从一个党派转到另一个党派^②。小小的阴谋活动、卑鄙的手腕、不时的撒谎、以义愤掩饰的阴险的勾当在他那里都表现为高尚意识的自然标志,他对自己的使命及自己的言行的崇高意义满怀信心,他坚决地宣布:“我从来也不说谎!”固定观念成了伪装起来的背信弃义行为的最好的掩护,并且使缺乏任何观念的蠢笨流亡者们认为,他,这个有固定观念的人,不过

① 阿里欧斯托《疯狂的罗兰》第34首歌。——编者注

② 德语 Parteiläufer 本义是“游击队员”,也有“党派成员”的意思。——编者注

是个傻瓜而已，——而对这样一个精明的正派人来说，这正是所需要的。

唐·吉河德和桑乔·潘萨集于一身，既热爱干粮袋又热爱固定观念的、对游侠的免费膳食和他们的光荣同样表示赞赏的、进行小型战斗和搞小阴谋活动的英雄，以有性格的面具来掩盖自己的欺骗行为——这就是维利希。他的真正未来是在北里奥格兰德大草原上。

关于上述两批流亡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戈克先生在给纽约《德意志快报》的信中作了如下的说明：

“他们（南德人）决定同其余的派别联合起来，以便恢复奄奄一息的中央委员会的声望。但是，完成这个善意的工作的希望很渺小。金克尔继续在搞阴谋活动；他同他的拯救者①、他的传记作者②和几个普鲁士尉官③组成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秘密行动，逐渐扩大，尽量把民主派的钱弄到手，然后突然作为强大的金克尔派公开出现。这样做既不诚实，又不公平，也不合理。”④

南德分子在这些联合企图中的“诚实”想法可以从济格尔先生写给同一家报纸的下列一封信中看出：

“如果说，我们少数几个有正直想法的人也部分地进行了秘密活动，那么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抵御金克尔和他的同谋者的卑鄙的阴谋活动和无理要求，并且向他们证明，他们并不具有主宰一切的天赋。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强使金克尔出席一次大会，在那里我们要向他和他所谓的那些亲密的政治朋友证明，并不是一切发光的東西都是金子。首先让乐器（叔尔茨），然后是让歌手（金克尔）去见鬼吧。”（1851年9月24日《纽约德文周报》）

① 卡·叔尔茨。——编者注

② 阿·施特罗特曼。——编者注

③ 亚·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古·阿·泰霍夫。——编者注

④ 卡·海因岑《支持德国革命的目标》。——编者注

领导南德分子的是卢格的“理智”，而领导北德分子的则是金克尔的“感情”，只要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判断，这两个互相谩骂为“南德人”和“北德人”的集团是多么奇特了。

为了了解下面就要谈到的伟大的战斗，必须稍微谈一下这两个震动世界的派别的外交手腕。

阿尔诺德(以及他的伙伴们)首先关心的是组织一个“不公开的俱乐部”，它打的公开的幌子是“进行革命活动”。他所特别喜爱的“德国事务委员会”应当从这个俱乐部里产生，而卢格本人应当再从这个委员会选进欧洲中央委员会。阿尔诺德从1850年夏天起就已经在坚持不懈地追求这个目的。他希望在南德人中“找到理想的中间派，在他们之中他可以愉快地作为统治者主宰一切”。因此，成立正式的流亡者组织、组织各种委员会就构成了阿尔诺德及其同盟者的必要的政策。

从金克尔及其同伴这方面来说，他们应当竭力设法不让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中篡夺到的地位有合法化的可能。金克尔发出关于先认购500英镑的号召之后，从新奥尔良得到了寄钱来的许诺^①，于是他就同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赖辛巴赫、泰霍夫、叔尔茨以及其他一起组成了**秘密的财务委员会**。他们这样想：如果我们有了钱，流亡者就会拥护我们；如果流亡者拥护我们，我们也就会成为德国的统治者。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让全体流亡者忙于形式上的各种集会，但是阻挠他们成立任何超出“松散团体”范围的正式组织，尤其是不让组织任何委员会，这样就可以拖住敌对的派别，阻挠他们的活动，

① 哥·金克尔《给南部中央联合会的回答。1851年8月20日》。——编者注

而在他们背后耍手腕。

这两个派别即“有名的人物”的共同之处是蒙蔽流亡者群众，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的，只是把他们当作幌子，一旦目的达到，就把他们抛弃。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民主派的马基雅弗利们、达来朗们和梅特涅们是怎样互相攻击的。

第一场。1851年7月14日。“同金克尔进行的关于共同上阵的私下协商失败”之后，卢格、戈克、济格尔、菲克勒尔、隆格就邀请所有派别的有名人物都来参加7月14日在菲克勒尔处召开的会议。有26人出席。菲克勒尔提议组织一个德国流亡者的“不公开的小组”并且从中产生一个“促进革命目的实现的工作委员会”。主要是遭到金克尔和他的大约6个信徒的反对。经过了许多小时的激烈争论之后，菲克勒尔的提案通过了（16票对10票）。金克尔和少数派声明，他们不再参加这种事情，并且离开了会场^①。

第二场。7月20日。上述的多数派组成了协会，在新加入者中间有菲克勒尔介绍的陶森瑙^①。

就像隆格是德国民主派的路德，金克尔是它的梅兰希顿一样，陶森瑙先生是它的亚伯拉罕·圣克拉拉。如果说西塞罗的两个肠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²³³，那么陶森瑙先生也不可能对着镜子中自己的严肃面孔而不哈哈大笑。如果说卢格曾经获得巴登人对他的敬仰，那么命运报复了他，给他派来了一个令他敬仰的奥地利人陶森瑙。

^① [阿·戈克]《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编者注

根据戈克和陶森瑙的建议,会议延期了,为的是再次设法同金克尔派达成一致^①。

第三场。7月27日。会议在克兰伯恩饭店举行。“有名的”流亡者全都到齐了。金克尔派也出席了,但不是为了来参加已经成立的协会。相反地,他们坚持“组织不设工作委员会和没有任何明确目的的‘公开的辩论俱乐部’”。叔尔茨在所有这些议会式辩论中扮演了年轻的金克尔的良师益友的角色,他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本团体以**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名组成不公开的政治协会。新成员从德国流亡者中,根据协会的一名成员的建议,由多数票通过吸收之。”

提案一致通过。俱乐部决定每星期五集会一次。

“这个提案的通过赢得全场的鼓掌和欢呼:德意志共和国万岁!!!人们都感到,经过互让互谅,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为革命做了件有益的事情。”(戈克,1851年8月20日《快邮周报》)

爱德华·梅因因这个胜利而欣喜若狂,他在自己的《石印通讯》中欢呼道:

“现在全体流亡者组成了一个严密的方阵,连布赫尔也参加了,只有怙恶不悛的马克思集团除外。”

梅因的这些话也可以在柏林政府的《石印通讯》中看到。

于是,在互让互谅的情况下,在祝贺德意志共和国的欢呼声中,伟大的**流亡者俱乐部**诞生了,它必定举行非常令人振奋的会议,并且在金克尔赴美几星期以后就皆大欢喜地解体。不过,这并不妨碍它在

^① [阿·戈克]《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编者注

美国仍然作为存在的机构发生作用。

第四场。8月1日。在克兰伯恩饭店举行第二次会议。

“很遗憾，我们现在必须报告：我们希望这个俱乐部能取得成就，但这个希望落空了。”（戈克，8月27日《快邮周报》）

金克尔不经多数人预先通过便把6个普鲁士流亡者和6个工业博览会的普鲁士参观者引进了俱乐部。**达姆**^①（主席，前巴登制宪议会议长）对这种背叛性的破坏章程的行为表示惊奇。金克尔声明说：

“俱乐部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它除了提供人们互相认识的机会和进行任何人都可以来听的谈话，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因此，最好是尽量让外面的人来拜访本团体。”

大学生**叔尔茨**连忙来掩饰他的教授的鲁莽，提出一个关于准许拜访者参加的修正案。修正案通过了。亚伯拉罕·圣克拉拉-**陶森瑙**站了起来，板着面孔提出了下面两个严肃的提案：

（1）“任命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它每周要提出关于当前政治、特别是德国当前政治的准确报告；这些报告应当归入协会的档案，在必要的时候应当公开发表；（2）任命一个委员会（“那个”委员会），把反动派的奴仆们在过去3年中对民主派的拥护者干出来的以及现在还在干的违法行为和残暴行为的尽可能详细的材料记载到协会的档案中”。

坚决反对这个提案的

① “达姆在这里！”

谁在这里？

“达姆在这里！”

谁？

“达姆，达姆，难道你不知道达姆？”

赖辛巴赫：“他在这两个毫不含糊的提案里看到了可疑的见不得人的想法和用意，这就是想通过选举这些委员会来赋予会议以他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希望的官方的性质。”

席梅尔普芬尼希和叔尔茨：“这样的委员会可能攫取具有密谋性质的职能，因而可能逐渐导致形成官方的委员会。”

梅因：“他所希望的是言论，而不是行动。”

如戈克所断言的，多数人似乎都倾向于通过这两个提案。马基雅弗利-叔尔茨提议延期表决，亚伯拉罕·圣克拉拉-陶森瑙由于随和而同意了 this 提案。金克尔认为，

“表决必须延期到下一次会议再举行，主要原因是，今天晚上他那一派看来是居于少数，因此他和他的朋友们认为，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表决‘对他们的良心没有约束力’。”

决定延期^①。

第五场。8月8日。在克兰伯恩饭店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陶森瑙的提案。金克尔和维利希违反协议，带来了“流亡者下层”，即平民，以便在这一次“约束自己的良心”。叔尔茨提出一项有关自愿报告当前政治问题的修正案，于是，由于事先申通好了，梅因立即表示要谈普鲁士，叔尔茨谈法国，奥本海姆谈英国，金克尔谈美国和未来（因为他的最近的将来是在美国）。陶森瑙的提案被丢到了一边。他激动地声明说，他愿意为祖国牺牲他的正义的愤怒，他愿意留在同盟者的圈子里。但是卢格—菲克勒尔派立刻像美丽的灵魂受了骗似的，怒不可遏。

① [阿·戈克]《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编者注

插曲。金克尔终于从新奥尔良收到了160英镑,这笔钱,金克尔必须在其他有名人物的参与下,使它为革命赢利。本来就已经为上一次的表决结果恼火的卢格—菲克勒尔派知道了这件事。现在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行动起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用“鼓动者协会”的名字为自己腐朽停滞的存在装璜门面的新的流亡者渊藪。它的成员是陶森瑞、弗兰克、戈克、济格尔、黑尔特勒、隆格、豪格、菲克勒尔、卢格。协会立刻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

“它不是搞辩论,而主要是进行活动,它将提供的不是言论,而是行动,并且首先是敦促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现金”。

鼓动者协会把执行权托付给陶森瑞,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外事通讯部长;同时,它承认卢格在欧洲中央委员会里的地位(帝国摄政者的地位),也承认他迄今为止的活动,承认他代表“真正的德国人民”。^①

在这个新的组合中可以立即看出那个原型,即卢格—隆格—豪格集团。这样,阿尔诺德在经过了多年的奋斗和努力之后,终于达到了他所希望的目的;他被承认为民主派中央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并且在自己的背后有了由整整8个人组成的一部分轮廓鲜明(可惜太鲜明了)的人民。但是连这一点乐趣也被破坏了,因为就在他被承认的同时也被间接免去了职务,而且他只是在粗汉菲克勒尔提出的条件下被承认的,根据这个条件,卢格必须从现在起就停止“给世人写他的那些无聊的东西”。粗暴无礼的菲克勒尔认为,阿尔诺德的作品中只有那些他本人没有读过也用不着去读的作品,才是“实在的”。

^① 卡·陶森瑞《伦敦德国鼓动者协会》。——编者注

第六场。8月22日，克兰伯恩饭店。首先是叔尔茨的“外交上的杰作”（见戈克）：提议由属于各派的6人组成流亡者总委员会，并吸收维利希的手工业者协会的已成立的流亡者委员会的5个成员加入（在这种情况下金克尔—维利希派将总是处于多数的地位）。提案被接受。选举举行了，但是卢格统治下的那一部分成员拒绝参加选举，因此，这个外交上的杰作便破产了。此外，过了4天维利希就退出了早就名存实亡的手工业者的流亡者委员会，而在此之前桀骜不驯的“流亡者下层”进行的多次叛乱使这个委员会的解体早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由此可见，没有人把这个流亡者委员会当作一回事。有人对鼓动者协会的公开出场提出质问。有人建议流亡者俱乐部同鼓动者协会脱离一切关系，并且公开否定它的全部活动。在场的“鼓动者”——戈克和小济格尔（也就是大济格尔，见下面）^①遭到了疯狂的攻击。鲁道夫·施拉姆宣布，他的老朋友卢格是马志尼的奴仆和“老牌的恶语中伤者”。布鲁土斯，你也在内！^②戈克不是作为伟大的演说家，而是作为一个正直的公民进行反驳，并且无情地攻击表里不一的、优柔寡断而阴险的、教士般故作庄重的金克尔：

“不让那些希望工作的人有机会参加工作，这是不负责的！但是这些人要求一种表面上的、无所作为的联合，为的是他们在这种幌子下能够作为宗派达到某种目的。”

当戈克谈到鼓动者协会在英国报纸上发表的公开声明时，金克尔庄严地站起来说道：

① 见本卷第404页。——编者注

② 凯撒被刺后发现他的好友布鲁土斯也是谋刺者之一时所说的话。——编者注

“他已经控制了整个美国新闻界，并且已经采取措施，要法国新闻界也服从他的统治”。

德国派的提案被通过了，因而“鼓动者”提出了声明，说他们协会的会员再也不能留在流亡者俱乐部里了。

于是，流亡者俱乐部和鼓动者协会之间发生了大分裂，在整个现代世界历史上形成了一道大裂口。最有趣的是，这两个东西只存在到它们之间发生分裂时为止，而现在它们只是在考尔巴赫的异教徒灵魂之战²³⁴中苟延残喘，而这场战斗还在旅美德国人的会议和报刊上继续进行着，并且看样子将继续进行到时代的结束。

不承认任何纪律的施拉姆也攻击起维利希来了，他断言，流亡者俱乐部同这个骑士联合是丢了脸，这时整个会议更加骚乱了。主席——这一次是胆怯的梅因——绝望了，已经几次放弃了对会议的控制。而讨论鼓动者协会的问题以及它的会员退场，使混乱达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叫喊、喧嚷、鼓噪、威胁、狂哮声中，这个有教益的会议开到了将近深夜两点，最后老板熄灭了煤气灯，使愤怒的各派陷入一片漆黑，并且在惊恐中结束了这场拯救祖国的事业^①。

在8月底侠义的维利希和温情的金克尔企图解散鼓动者协会。他们向诚实的非克勒尔提出了如下的建议：

“他应当同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密的政治朋友们一起组成**财务委员会**以管理新奥尔良寄来的钱。这个委员会将一直存在到能够组成这个革命的官方的财务委员会时为止，但是，只要接受这个建议，迄今为止存在的一切德国的革命团体和鼓动团体都必须解散。”

正直的非克勒尔愤怒地反对这个“钦定的、秘密的、不负责任的

^① 见1851年8月14日和1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编者注

委员会”。

他喊叫道：“仅仅是一个财务委员会怎么能把一切革命政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不论是现在要收到的或是已经收到的钱都永远不能成为要求民主派中各个意见不同的派别牺牲自己的独立的理由。”

这样，这个唆使开小差的企图非但没有引起预期的解散，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陶森瑙可以宣布，两个强大的派别——流亡者和鼓动者之间的破裂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了。

十四

为了表明鼓动者和流亡者之间的战争打得多么令人开心，我们从美国德文报纸上引用几个片断。

鼓 动 者

卢格宣布，金克尔是“普鲁士亲王的代理人”。

另一个鼓动者发现，流亡者俱乐部中的杰出的人物，

“除了牧师金克尔，还有3个普鲁士尉官、两个来自柏林的平庸的作家和一个大学生”。

济格尔写道：

“不可否认，维利希获得了几个信徒。但是，既然向人们进行了3年的说教并且只说他们爱听的话，那么只有非常愚蠢的人，才不能把这些人变成自己的信徒。金克尔一伙力图把维利希的这些信徒拉到自己这方面来。维利希的信徒和金克尔的信徒便开始勾搭起来了。”

第四个鼓动者宣布，金克尔的追随者都是“偶像崇拜者”。

陶森瑙对流亡者俱乐部作了如下的描绘：

“在和解的面具下坚持分立的利益，一贯对多数进行欺骗，不知名的大人物以做组织工作的党派领袖的身分出现，企图钦定秘密的财务委员会和玩弄各式各样的阴谋诡计，不成熟的政治家们总是想通过这些手法在流亡中支配祖国的

命运,可是革命的烈火一燃烧起来,这类华而不实的东西就化为烟云了。”①

最后,罗多芒特·海因岑宣布,卢格、戈克、菲克勒尔和济格尔是他个人所认识的在英国仅有的几个值得尊重的流亡者。流亡者俱乐部的会员都是“利己主义者、保皇党人和共产党人”。金克尔是“不可救药的爱虚荣的蠢才和夸夸其谈的显贵”;梅因、奥本海姆、维利希等等都是他海因岑“只有把身子弯到膝盖才能看清的小人物,他们甚至还没有长到卢格的踝骨那样高”。(1851年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警钟报》等等)

流 亡 者

“一个悬在空中的钦定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就自命为全权代表,它既不是由任何人选出的,也不询问一下它想代表的人是否愿意让这些人来作他们的代表。这样的钦定委员会有什么用处呢?”——“凡是知道卢格的人都晓得,宣言狂是他的不治之症。”——“在议会里,卢格甚至还不如拉沃或特利尔的西蒙有影响。”——“凡是需要革命的埋头苦干精神、组织工作、谨慎或沉默的地方,卢格就成了危险人物,因为他既不能闭口不说,又无法停笔不写,而且总希望代表整个世界。卢格同马志尼和赖德律-洛兰结交,这翻译成卢格的话并刊登在所有报刊上就是: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结成了兄弟般的革命联盟。”——“这种妄自尊大地钦定委员会的做法、这种吹大牛的无所作为,促使卢格的最亲近和最明智的朋友,如奥本海姆、梅因、施拉姆,为了共同的活动而同其他人建立联系。”——“站在卢格背后的不是一部分轮廓鲜明的人民,而是一个轮廓鲜明的和平守旧派。”②

“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询问,这个陶森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谁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有时会碰到个维也纳人断言,他是为了把维也纳民主主义搞臭

① 1851年11月14日卡·陶森瑙致泽登施提克尔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转引自爱·维斯《伦敦鼓动者协会》。[1.]1.。——编者注

② [爱·维斯]《德国国民公债和它的反对者》。——编者注

而经常责难它的反动性的维也纳民主派中的一个。但是这应由这些维也纳人负责。无论如何,这个大人物是不知名的;但是他究竟是不是个大人物,更是不得而知。”^①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把其余一切人都看作不成熟的政治家的可靠的人物,究竟是些什么人。总司令济格尔。如果有人问历史的缪斯,这个平庸的微不足道的人是怎样达到总司令的地位的,那她就会陷于极端狼狽的境地。济格尔只是他弟弟的哥哥。他的弟弟由于讲些反政府的逆耳的话而成为知名的军官,不过,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有无聊的放荡行为而经常坐禁闭。年轻的济格尔认为这是在革命起义中的最初的混乱时期宣布自己是总司令和陆军部长的充分理由。在经常证明自己是精锐部队的巴登炮兵队里,有足够的年长的和可靠的军官,在他们面前,年轻无知的尉官济格尔不能不感到逊色,而当他们必须服从这个无名的、既缺乏经验又缺乏才能的年轻人时,他们感到相当的气愤。但是这里有个布伦坦诺,他是十分愚蠢而又背信弃义的人,可以做出任何必然毁灭革命的事情…… 济格尔在整个巴登战役中表现出极端的无能…… 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是,在拉施塔特城下和在黑林山中,济格尔把共和国军队的英勇的士兵们丢下不管,不给他们派出他答应派去的增援部队,而同时他自己却带着菲尔斯滕贝格公爵的肩章,坐着他的轻便马车在苏黎世城里环游,并且以引人注意的失败的统帅的角色自我炫耀。这位成熟的政治家的众所周知的伟大就是如此,他有理由为自己以往的英勇业绩自豪,又一次把自己钦定为鼓动者协会的总司令。我们这位伟大的熟人,弟弟的哥哥就是如此。”

“的确可笑,当这些人(如鼓动者协会的会员们)指责别人是半拉子的时候,他们自己却是政治上的零,既不是半个东西,又不是完整的东西。”——“个人野心,这就是他们的原则基础的全部秘密。”——“鼓动者协会作为一个协会只具有私人的意义,就像一个什么文艺小组或台球俱乐部一样,因此,它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重视它,也没有任何权利颁发委任状。”^②——“骰子是你们自己掷出来的!不了解内情的人大概了解了内情,可以自己来判断,你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巴尔的摩通讯员》)^③

① [爱·维斯]《伦敦鼓动者协会。[I.]I.》。——编者注

② [爱·维斯]《伦敦鼓动者协会。I.》。——编者注

③ [爱·维斯]《伦敦鼓动者协会。[I.]》。——编者注

应当承认，这些先生们彼此的了解，几乎达到了了解自己的程度。

十五

这时，“流亡者”的秘密的财务委员会选出了管理委员会，由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组成，并且决定认真对待发行德国公债一事。大学生叔尔茨（正如 1851 年底的纽约《快邮报》、《纽约德文报》和《巴尔的摩通讯员》所报道的那样）被派到法国、比利时和瑞士去，在那里寻找一切过去的、下落不明的和销声匿迹的议会议员、帝国摄政、议院代表和其他有名的人物，直到已故的拉沃，争取他们为公债作保证。这些已被遗忘的不幸者便急忙为这一事业提供自己的保证。如果说为公债作保证所能起的一点作用就是互相保证有名无实的政府职位，那么金克尔、维利希和赖辛巴赫等先生也就以此取得了自己未来前途的保证。而在瑞士的这些不幸的正直人，对于“组织”和保证职位热中到这样一种程度，甚至老早就在他们中间论资历按号码排定了在未来政府里的座次，而在决定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职位归谁时，总要吵得不亦乐乎。总之，大学生叔尔茨口袋里带着保证书回来了，于是人们便开始了工作。固然，几天以前，金克尔在同“鼓动者”进行的又一次会商中曾答应不搞“流亡者”的单方面的公债；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带了保证人的名单及赖辛巴赫和维利希的全权委托书离开了，据说是要到英国北部去兜售他的美学演讲，而实际上是要从利物浦横渡大洋到纽约去，就像帕威法耳那样到美国去寻找圣杯²³²，即民主派的金银财宝。

于是开始了关于流亡者和鼓动者在大洋两岸再次激烈进行的持久的伟大斗争的动听的、神奇的、夸张的、从未听说过的、真正的和充满冒险情节的故事，开始了哥特弗里德为了同科苏特竞争而进行的十字军征讨。他在经受了千辛万苦和难以形容的磨难之后终于带着装在旅行袋里的圣杯回到了故乡。

Or, bei Signori, io vi lascio al presente,
E se voi tornerete in questo loco,
Dirò questa battaglia dov'io lasso,
Ch'un'altra non fù mai di tal fracasso.

(Bojardo, canto 26.)

先生们，我现在要离开你们了；
如果你们再到这里来，
我将告诉你们战斗的喧嚷和叫嚣，
没有任何战斗可以与之相比。①

① 博雅多《恋爱中的罗兰》第26首歌。——编者注

卡·马克思

克拉普卡将军²³⁵

我们从可靠的来源得到的克拉普卡将军的下述纲领，是准备科苏特来伦敦后给他的。它证明科苏特在他的主要的拥护者当中已经威信扫地。纲领全文如下：

“政 治 纲 领。”

因为我要在一段时间，也可能很长时间离开一切政治活动舞台，而且为了自己的原则和观点不被误解，所以，我在这里向我的朋友们的作以下声明：

(1)在人民对独裁问题表示自己的意愿以前，无论在祖国还是在祖国以外的地方都不应有任何独裁。

(2)出于对多数同胞和我个人信念的尊重，我承认我们的尊敬的同胞路德维希·科苏特是匈牙利流亡者联合会的首领，但同时我声明，我认为抓住长官的职位和头衔不放是与我们革命活动的基本原则完全不相容的，是对我们的事业非常有害的。

(3)关于我们在国外的活动：

(a)为了领导工作，除了上述首领之外，还应当有几个由全体流亡者选出的委员同他一起共同组成中央委员会；

(b)在分配借助于匈牙利的声誉而得来的资助时，遵循的原则不应当是个人的状况，而只应当考虑他是不是祖国的忠实的儿子，他为祖国作了什么贡献，他究竟是否有权得到资助。根据这个原则，中央委员会确定的资助私人的钱款应当交给由各个流亡者团体自己选

出的委员会公正地和公开地加以支配。

关于我们在国内的活动。

一旦匈牙利能够对自己的暴君开始进行殊死的斗争，那时将领导公共事务的人们，就有责任在最短期内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召开立宪国民议会作为唯一的革命政权，而政府只应是这个议会的产物。

(4)因为干涉未来的国家代表的活动和现在就为我们祖国制定宪法不可能是我们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指出那些将会给我们带来祖国未来的繁荣、复兴、强大、幸福并保证所有民族的团结一致和牢不可破的联合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如果除此之外我们还愿意考虑我们民族的精神和过去的话，——对个人和民族都同样适用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这是我个人的原则，但是，因为老天爷往往不考虑我们的微不足道的想法，而正是往往在难以料到的地方对国家命运施加它的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在我看来，匈牙利未来的宪法问题目前仅居于次要地位，而生死存亡问题是推翻威胁着民族生存的奥地利的压迫，所以我声明，我将以我的利剑和我个人的影响为任何一个旨在推翻奥地利王朝，从而恢复匈牙利的独立和国家的存在的外国效劳。

格奥尔格·克拉普卡将军

1852年4月”

根据上述纲领可以对克拉普卡的性格作出非常准确的判断。他坚持坐在两把椅子之间，他非常想成为一个独立的坚毅的人，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天生的本能胜于意志。他想要科苏特，同时又不想要他。他一只手抚摩他，另一只手又去打他耳光，但是为了耳光打得轻一些，他带上丝手套。克拉普卡忘记了，带不带手套，打耳光总是打耳光，科苏特这样一个虚荣心重、容易激动和沽名钓誉的人，受到一点点冒犯，他都会像受了奇耻大辱一样，耿耿于怀。克拉普卡这样摇摆不定、没有主见的人总是不幸，做什么事情都半途而废。克拉普卡的这一纲领显示出他政治上的幼稚，而他那句结束语甚至带有笨拙和轻率的痕迹。克拉普卡忘记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足以泄露

全盘计划。但愿作为将军的克拉普卡不会落到对作为外交家的克拉普卡的笨拙感到后悔的地步。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5 月
10 日前后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 年俄文第 2
版第 44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
和《宪章派》两篇文章的德文手稿片断²³⁶

[……]现政府,英国的社会变革开始。

我们终于要来谈谈宪章派¹⁵⁷这个英国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所要求的宪章六条,无非是要求普选权,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劳动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无记名投票、给议员支薪、每年改选议会等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工人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同资本家进行的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工人阶级已经逐渐具有了明确的阶级意识,甚至在那里也不再有什么农民,而只有地主、产业资本家(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是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所不可比拟的重大社会主义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组,我下次再谈^①。现在我只讲讲刚刚结束的选举。

① 见本卷第465—470页。——编者注

谁要想成为英国议会的选民，如果是在城镇选区，他就得占有缴纳 10 英镑济贫捐的房产；如果是在郡里，他必须是一个 40 先令的自由农²³⁷，或者是一个 50 英镑的土地租佃者。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说明他们参加选举的实际情况，我应该把英国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是：

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

当议席的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们第一步要经过举手表决当选。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赞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经举手表决当选。可见，到此为止实行的是无限制的普选权。可是事情总有它的另一面。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纯粹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因为，如果享有特权的选民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投票表决则只有享有特权的选民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被宣布正式当选。第一次选举，即举手表决的提名是一瞬间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而在一瞬间过后则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发明这种举手表决的提名，这种危险的手续，是为了嘲弄普选权，同那些贱民、即 rabble（陆军大臣贝雷斯福德用语）开个贵族式的玩笑。这样想是错误的。古代日耳曼的习俗能够无阻碍地作为传统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它能给英国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廉价的和没有危险的人民性外衣。统治阶级从这里得到的自我满足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派别利益作为民族事务来参与。只是从资产阶级在托利党¹⁴⁹和辉格党¹⁴⁵之

旁采取独立的立场之后，工人群众才在提名日以自己的名义出现在官方的英国之旁。然而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没有哪一年像在最近这次 1852 年选举²³⁸中表现得这样富于原则性，这样尖锐，这样势不两立，这样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而在投票表决时就必定落选。在投票表决中过了关，就必定会受到人民的烂苹果和石头的欢迎。正式当选议员要千方百计地首先保障他这个议员的皮肉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 1/12 和占男性居民 1/5 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抛弃了自己的独特标志的党派，保持自己的保守主义的自由派，保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另一边是保持自己的人民。一边是一台破烂的机器，它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是所有的官方政党互相间的无意识的磨擦，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要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台官方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工人群众的声势浩大的竞选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许多的城镇选区中，我只举一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城镇选区即哈利法克斯的选举为例。

在这里，相互竞选的有爱德华兹（托利党人）、弗兰克·罗斯利（曼彻斯特派）、查理·伍德爵士（辉格党人，罗素内阁的财政大臣，格雷勋爵的姐夫），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最有才干、最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领导人。

哈利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在那里托利党没有希望。曼彻斯特派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休戚与共。所以，激烈的斗争只是

在**查理·伍德爵士**和**厄内斯特·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阶级大报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摘录(下接演说)。

从这篇演说中,你们难道听不出正在临近的革命惊雷吗?琼斯所预言的事情发生了。厄内斯特·琼斯以 20 000 票被提名,而辉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以 500 票当选。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7 月

25 日—8 月 2 日之间

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翻译

NEW-YORK DAILY TRIBUNE.

VOL. XII. NO. 2440. NEW-YORK, SATURDAY, AUGUST 21, 1852. PRICE TWO CENTS.

卡·马克思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²³⁹

1852年8月6日星期五于伦敦

不列颠议会大选的结果已经揭晓了。关于这个结果，我将在下一篇通讯①中更详细地加以分析。

在竞选运动中，互相攻击或者互相支持的有哪些党派呢？

有托利党¹⁴⁹、辉格党¹⁴⁵、自由派保守党人（皮尔派）²⁴⁰，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²⁴²），最后，还有宪章派。

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联合起来反对托利党。真正的竞选斗争就是在这个联盟和托利党之间展开的。至于宪章派，他们既反对辉格党、皮尔派和自由贸易派，也反对托利党，就是说，他们反对整个官方英国。

大不列颠的政党在合众国是大家都相当熟悉的。因此，这里只要把每个政党的显著特点略提几笔就够了。

① 见本卷第439—445页。——编者注

托利党在 1846 年以前以旧英国传统的卫道者闻名。人们说，他们把英国宪法奉为世界第八奇迹；他们是往事的赞美者，是王位、高教会派²⁴³以及不列颠臣民的特权和自由的狂热的拥护者。在不祥的 1846 年谷物法²⁴⁴被废除时，托利党人叫苦连天，这就证明了他们正是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同时也揭露了他们之所以对旧英国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恋恋不舍的秘密。原来，这些制度正是最适合于大土地所有制的，他们（土地贵族）一直依靠这些制度统治着英国，而且直到现在还企图以此保持自己的统治。1846 年赤裸裸地暴露了构成托利党的现实基础的物质的阶级利益。1846 年从托利党身上撕下了一直用来掩盖它的阶级利益的那张为传统所尊崇的狮子皮^①。1846 年使托利党变成了保护关税派。“托利党”是个神圣的名字，“保护关税派”则是个凡俗的称呼；“托利党”听起来是政治上的战斗的呐喊，“保护关税派”听起来却是经济上的绝望的哀鸣；“托利党”似乎标志着一种思想、一种原则，“保护关税派”则代表着物质利益。这些保护关税派所保护的是什么呢？是他们自己的收入，是他们自己的地租。可见，托利党人归根到底是和其他资产者一样的资产者；难道世界上还有不保护自己钱袋的资产者吗？托利党人和其他资产者的区别，也就等于地租和工商业利润的区别。地租是保守的，利润是进步的；地租是民族性的，利润是世界性的；地租信奉国教，利润则是天生的非国教徒^②。1846 年废除谷物法，只是承认了一件既成的事实，承认了不列

① 在伊索寓言《披着狮子皮的驴》中，驴披着狮子皮到处吓唬其他野兽，后来被狐狸识破。——编者注

② 非国教徒(dissieleut)来自拉丁文(dissidere)，即不同意者，这里指不遵奉国教教会信条的英国新教教徒。——编者注

颠市民社会的成分中早已发生的变化,这就是:土地贵族服从于金融贵族,地产服从于商业,农业服从于工业,乡村服从于城市。当英国农村和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经是一比三的时候,怎么能够不肯定上述事实呢?托利党实力的物质基础就是地租。地租是由食物的价格来调节的,而食物的价格又是靠谷物法人为地保持在高水平上的。谷物法的废除降低了食物的价格,食物价格的降低又使地租下降,而随着地租的下降,托利党的政治权力所依靠的实力也就被破坏了。

现在托利党人企图干些什么呢?他们企图保持住已经丧失了社会基础的政治权力。用什么方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除了反革命,即国家对社会的反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力图用强力保持那些从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两倍时起就已注定要覆灭的制度和政治权力。这种企图必然要以托利党人的失败而告终;它一定会加速和加剧英国的社会发展;它一定会造成危机。

托利党人在农场主中间争取拥护者,这些农场主或者还习惯于把地主看作自己天然的尊长,或者在经济上依赖地主,或者还不懂得农场主与地主之间利益的共同点并不比债务人与高利贷者之间利益的共同点更多。追随和支持托利党人的,是殖民者、船主、国教会派,一句话,所有那些认为必须反对现代工厂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必然后果和它所酝酿的社会革命以保护自己利益的分子。

托利党的世仇是辉格党,一个与美国的辉格党²⁴⁵除了名称以外毫无共同之处的政党。

不列颠的辉格党人在政治博物学上属于这么一个种类,像所有的两栖类一样,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但要加以描写却很困难。我们还是像他们的对手那样,称他们为在野的托利党人呢?还是像大陆上的作家们所爱做的那样,把他们看作一定的大众原则的代表者呢?在

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重蹈辉格党的历史学家库克先生的覆辙而陷入窘境,这位先生在他的《政党史》中非常天真地承认,辉格党所依据的确是一些“自由的、道德的和开明的原则”,但是,非常遗憾,在辉格党存在的一个半世纪以上的时期内,每当它执政的时候,总是有些什么东西妨碍它实现这些原则。这就是说,连辉格党自己的历史学家也承认,辉格党的实际行为同它所宣布的“自由的、开明的原则”完全是两回事。因此,这个党很像一个酒鬼,在市长面前声称,他拥护戒酒的原则,但是每逢礼拜天总是由于某种偶然情况喝得酩酊大醉。

现在我们还是不要去管辉格党人的原则吧;我们根据历史事实可以更好地判断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不是他们曾经信仰什么,以及现在希望别人认为他们的性质是什么。

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一样,也属于大不列颠的大土地占有者。不仅如此,辉格党的核心正是由英国最古老、最富有和最傲慢的土地占有者构成的。

他们和托利党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辉格党人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贵族代表**。由于资产阶级把行政管理的垄断权和国家官职的独占权让给了辉格党这一贵族寡头,后者就向中间阶级作了一切已由社会和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是**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推延的**让步,并且帮助中间阶级实现这些让步。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而每当辉格党人采取这种不可避免的措施时,他们就大声疾呼,说这样一来历史进程已经达到了终点,整个社会运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最终目的,然后他们就“抓住顶点不放”。²⁴⁶辉格党人要比托利党人易于忍受地租收入减少之苦,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不列颠帝国收入的天生的**管理人。只要他们像保持自己的世袭财产那样保持着对政权的垄

断，他们就可以放弃谷物法为他们造成的垄断。自从1688年“光荣革命”²⁴⁷以来，除了若干次短期的中断（主要是由于第一次法国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反动²⁴⁸所造成的），执掌国务的一直是辉格党。谁要是回忆一下这一段英国历史，他就会发现：力图保持自己世袭的寡头政治乃是辉格主义的唯一特征。除此以外辉格党有时也加以维护的那些利益和原则，并不是它自己的，而是工商业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强加于它的。就像1688年以后辉格党和当时新兴的拥有极大权势的金融巨头联合在一起一样，在1846年我们看到它又和工业巨头联合在一起。辉格党对1831年改革法案²⁴⁹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正像它对1846年自由贸易法案的实行没有尽多大力量一样。这两个改革运动——政治的也好，商业的也好——都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一当这两个运动中的任何一个发展到不可遏止的地步，一当它同时变为使托利党下台的最可靠手段，辉格党便上台执政，并把同政权有关的那一部分胜利果实据为己有。1831年辉格党人把政治方面的改革扩大到刚好不致使中间阶级过分不满的程度；1846年以后他们又把自己的自由贸易措施限制在刚好能替土地贵族保留尽可能多的特权的地位。他们每一次都操纵运动，以便阻止运动向前发展并同时恢复自己的地位。

非常明显，一旦土地贵族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再也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来争夺政权，一句话，当托利党彻底垮台的时候，不列颠历史上也就不会再有辉格党的地位了。既然贵族已经消灭，那些反对这个贵族的资产阶级贵族代表还有什么用处呢？

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德国的皇帝曾经给当时兴起的城市委派了帝国的总督——“advocati”——以保护它们不受其周围贵族的攻击。

但是当城市由于人口和财富的增长而十分强大，完全独立，不仅能打退而且还能进攻贵族时，那些城市就立刻把高贵的总督赶走了。

辉格党就是不列颠中间阶级的这种总督，而一旦托利党丧失对土地的垄断，辉格党也必定会立刻丧失对政权的垄断。随着中间阶级的独立力量的增长，辉格党也就由一个政党蜕化为一个小集团了。

很清楚，不列颠辉格党只能是令人厌恶的、各色各样的分子的混合物，其中有拥护马尔萨斯的封建主义者，抱着封建偏见的财主，丧失荣誉感的贵族，无力经营产业的资产者，满嘴进步词句的顶点派，狂热迷恋保守主义的进步分子，一点一滴地贩卖改革的掮客，各式各样裙带关系的庇护人，营私舞弊的老手，假信徒，政治上的伪君子。英国人民群众向来具有健全的审美感。他们对一切杂七杂八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对蝙蝠和罗素派都抱着本能的嫌恶。英国人民群众，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和托利党一样仇恨“财主”。他们也和资产阶级一样仇恨贵族。而人民恨的是辉格党中的两种人：贵族和资产者，即压迫他们的地主和剥削他们的金融巨头。人民恨的是辉格党所代表的寡头政治，它一百多年来统治着英国，不让人民管理自己的事情。

皮尔派（自由派保守党人）不是一个政党，他们不过是对一位同党，对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一种纪念而已。但是，英国人过于讲求实利，对他们来说，进行纪念无非是编写挽歌而已。而现在，人民已在全国各地为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建立起青铜的和大理石的纪念碑，他们更加认为没有格雷厄姆、格莱斯顿、卡德威尔等这样一些活的皮尔纪念碑也未尝不可。所谓的皮尔派，不过是罗伯特·皮尔为自己训练的一帮官僚而已。而由于这批官僚为数甚多，所以他们也就一时忘掉了他们背后没有任何人马。这就是说，皮尔派就是过去的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拥护者，目前他们还没有决定归附哪一个政党。

他们要构成独立的势力,持这种犹豫态度显然是不行的。

剩下的还有自由贸易派和宪章派。关于他们,我将在下一篇通讯中简略地加以说明。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7 月
25 日—8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8 月 21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54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

5.11.]

LONDON, SATURDAY, OCTOBER 9 1852.

[Price 3pence]

卡·马克思

宪章派²³⁹

1852年8月10日星期二于伦敦

托利党¹⁴⁹、辉格党¹⁴⁵、皮尔派²⁴⁰，——总之，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分析过的一切党派，或多或少都属于旧的时代，而自由贸易派（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信徒、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²⁴²则是现代英国社会的官方代表者，即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是自觉的资产阶级的党派，是竭力想把自己的社会势力也变成政治势力并把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批傲慢的残余加以铲除的工业资本的党派。领导这个党派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中最积极最坚强的部分——工厂主。他们要求让资产阶级取得完全的、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要求全社会公开地、正式地服从现代资产者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自由贸易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使用。应该有纺纱业和棉织业工厂主，也应该有食

品业工厂主,但不应该再有任何地主。简言之,就是不允许有任何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表达这个党派反对英国旧制度——这是社会发展中的过了时的、行将告终的阶段的产物——的斗争口号是:使生产尽可能地节约,消除生产中的一切 faux frais (即生产中一切多余的、不必要的开支)。这个口号不仅是向个人提出的,而主要地是向全民族提出的。

王权,连同它的“穷奢极侈”、宫廷、王室费以及侍从人员,难道不正是生产中的 faux frais 吗?没有王权,国家一样能够进行生产和交换,所以,要搬掉王位!贵族的薪高而清闲的职位,上院,——这是些什么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庞大的常备军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殖民地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国教会连同它通过掠夺和募化而掌握的财富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还是让神父们互相自由竞争吧,让每个人愿意给他们多少钱就给他们多少吧。英国法的一整套繁琐惯例及其大法官法庭²⁵⁰是什么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国家之间的战争呢?生产中的 Faux frais。英国如果同别的国家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

可以看出,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认为,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都是既昂贵又无用的机器,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国家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和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总共只留下一个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且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管理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

济。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政党就会叫作**民主党**。但它必然是革命的，而且它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彻底消灭作为贵族国家的旧英国。然而，它最近的目的却是实现议会改革，议会改革会使进行这种革命所必需的立法权转到它的手里。

但是不列颠的资产者不像法国人那样容易激动。虽然他们也力求实现议会改革，他们却不会为此而进行一次二月革命。相反地，在1846年由于废除谷物法²⁴⁴而取得了对土地贵族的巨大胜利以后，他们就满足于从这一胜利中获得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从中得出必然的政治和经济结论，从而使辉格党得以恢复它世袭的行政管理的垄断。在整个1846—1852年期间，他们由于高喊“伟大的原则，实际的（应读作：**渺小的**）行动！”这样的口号而受到人们的嘲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在每一次强大的运动中，他们都不得求助于**工人阶级**。但是，如果说贵族是他们垂死的对手，那么工人阶级却是他们新生的敌人。他们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妥协，也不愿通过切实的让步去加强新生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所以，他们极力避免同贵族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但是历史必然性和托利党人都在推着他们向前走。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完成自己的使命，把旧英国、把过去的英国彻底破坏；而一旦他们成为政治统治权的唯一执掌者，一旦政治统治权和经济大权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因而反对资本的斗争不再同反对现政府的斗争割裂开来，那时就会爆发**英国的社会革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¹⁵⁷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的六条，所包括的内容，无非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来说普选权等于政治权力，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

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再有机民,而只有地主、产业资本家(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称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关于宪章派的复兴和改组,我另找机会再谈^①,现在我只讲讲不久前的选举。

一个男子要想享有不列颠议会选举权,如果是在城镇选区,他就得除缴纳济贫捐外再缴纳不少于 10 英镑的房租;如果是在各郡,那他必须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 40 先令的自由农²³⁷,或者是一个每年收入不少于 50 英镑地租的土地租佃者。单单从这一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宪章派在刚刚结束的选举斗争中能够正式参加活动的只是很少数的人。但是为了说明他们在实际上怎样参加了这次选举斗争,我应该把不列颠选举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再提一提,这就是:

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 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

当候选人在选举日出面向人民发表公开演说以后,他们第一步要经过举手表决当选。每一个人都有权举手,不管他是选民还是非选民。多数人举手赞成的人,选举主持者就宣布他经举手表决(暂时)当选。可是事物总有它的另一面。举手表决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仪式,是对“有主权的人民”的形式上的礼貌;一旦特权受到威胁,这种礼貌马上就不要了。因为如果享有特权的选民的候选人在举手表决中落选,这些候选人就会要求投票表决;而投票表决则只有享有特权的选

^① 见本卷第 465—470 页。——编者注

民才能参加，只有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的人才被宣布正式当选。第一次举手表决的选举是一瞬间给予社会舆论的一种表面上的补偿，而在一瞬间过后则更加有力地向它证明它的软弱无力。

也许有人会觉得，发明这种举手表决的选举，这种危险的手续，是为了嘲弄普选权，同“贱民”（陆军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用语）开个有趣的贵族式的玩笑。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一切条顿民族最初所共有的古代习俗所以能够作为传统延续到 19 世纪，就是因为它不必承担很大的费用和 risk，就能给不列颠的阶级议会披上一件人民性的外衣。统治阶级从这种习俗中得到的好处就是，人民群众总是在不同程度上热情地把统治阶级的派别利益作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来参与。只是当资产阶级开始在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官方政党之旁采取独立的立场时，工人群众才开始在提名日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行动。但是举手表决和投票表决之间、提名日和选举结果揭晓日之间的对立，没有哪一年像在最近这次 1852 年选举中表现得这样明显，这样鲜明地表现为敌对原则之间的冲突，这样势不两立，这样广泛，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请看这是什么样的对立！谁在举手表决时被提名，他就会在投票表决时落选。谁在投票表决中获得多数选票，他就会饱尝人民投掷的烂苹果和砖头。正式当选的议员首先得好好地考虑自己作为议员的皮肉的安全。一边是人民的大多数，另一边是占全人口 $\frac{1}{12}$ 、占全国成年男性居民 $\frac{1}{5}$ 的人。一边是热情，另一边是贿赂。一边是一些抛弃了自己的特点的党派，主张保守主义的自由派，宣扬自由主义思想的保守派；另一边是宣告自己的存在和捍卫自己的事业的人民。一边是一台破烂的机器，它在原地不停地打转、一步也不能前进，是所有

的官方党派互相磨擦倾轧、逐渐把对方碾得粉碎这样一个无益的过程；另一边是奋勇前进的国民群众，他们要消除这种原地打转的状态，打碎这台官方机器。

我不打算详细叙述提名同投票表决之间的对立、选举期间工人阶级的声势浩大的示威同统治阶级的偷偷摸摸的竞选手法之间的对立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在许多城镇选区中，我只举一个集中表现出这种对立的选区即哈利法克斯的选举为例。在这里，互相竞争的候选人有爱德华兹（托利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前辉格党内阁财政大臣，格雷伯爵的姐夫）、弗兰克·克罗斯利（曼彻斯特派），最后还有厄内斯特·琼斯，他是一个最有才干、最彻底、最坚决的宪章派。哈利法克斯是个工业城市，在那里托利党的希望不大。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同辉格党人联合在一起。所以，激烈的斗争只是在伍德和琼斯之间、在辉格党人和宪章派之间展开的。

“查理·伍德爵士发表了历时约半小时的演说，开头和后半段都被广大听众的不满的喊声吵得根本听不清。据一个坐在他近旁的记者的报道，他的演说只不过是罗列已经实行的自由贸易派措施，攻击德比勋爵政府和吹嘘‘国家和民族的空前繁荣！’（喊声：“听啊，听啊！”）他连一个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提出来，只是模糊地、简略地提到了约翰·罗素勋爵的选举法改革法案²⁴⁹”^①。

因为你们不会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报上找到厄内斯特·琼斯的演说，所以，下面我就从中作一些比较详尽的摘录。

“厄内斯特·琼斯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说：

‘选民和非选民们！你们到这里来庆祝一个庄严隆重的节日。宪法今天在理论上承认普选权，也许只不过为了明天在实践中把它抛弃。今天站在你们面前

① 《1852年7月6日在哈利法克斯选举大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的有两种制度的代表，你们必须决定要哪一种制度的代表来统治你们7年。7年——这是整整一小段生命啊！我请你们在这7年的大门前停一停，今天让这几年在你们的眼前缓慢地平静地走一趟吧。你们20 000人今天采取的决定，也许就是为了让500个人明天违反你们的意志！（喊声：“听啊！听啊！”）我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两种制度的代表。不错，在我的左边有辉格党人、托利党人和财主，但是实质上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财主说：要贱买贵卖。托利党人说：要买得贵，卖得更贵。对于工人说来他们是一模一样，但是这第一种制度现在占上风，虽然它的根子已经因大众赤贫的脓疮而糜烂。这个制度是建立在同国外竞争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可以断言，在同国外竞争中运用的贱买贵卖的原则下，工人阶级和小生意人阶级的破产还会继续下去。为什么？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哪怕是长一粒粮食，织一码布，都要人去劳动。可是在这个国家里，工人没有任何独立的营生。劳动是以雇佣方式出卖的商品，劳动是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既然劳动创造一切财富，所以首先必须购买劳动。“要买得便宜，要买得便宜！”劳动是在最廉价的市场上购买的，而跟着来的是：“要卖得贵，要卖得贵！”卖什么？劳动产品。卖给谁？卖给外国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也卖给工人自己。因为工人既然不是自己劳动的主人，就不能分享自己劳动的第一批果实。“要贱买贵卖！”你们喜欢这种事情吗？“要贱买贵卖！”买工人的劳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种交易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让人吃亏。雇主以便宜的价钱购买劳动，他又出卖产品并必然从中获得利润。他把产品卖给工人自己，结果，雇主同雇工之间的每一次买卖，都是雇主的有意的欺骗行为。这样，劳动由于不断的亏损而不得不降低，资本则由于经常的欺骗而得到提高。但是这种制度还不仅仅限于这些。它被运用于同国外的竞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经破坏了本国的劳动一样。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关税高的国家必须比关税低的国家卖得便宜，但是外国的竞争总是不断增长的，结果价格也就总是不断降低。因此，在英国工资就要不断下降，怎样使工资下降呢？通过过剩的劳动。这种劳动的过剩又是怎样造成的呢？通过对土地的垄断。把超过工厂需要的人手赶向工厂；通过对机器的垄断，把这些人手赶到街头；通过使用女工，夺走男工手中的织布梭；通过使用童工又把女工从织布机上排挤下来。雇主站在这种由活人堆成的过剩劳动的基础上，脚下踩着它的破碎的心灵，大声喊道：“会饿死的！谁愿意做工？有半个面包总比根本没有面包强啊！”于是备受折磨的群众就如获至宝地抓住这个机会，同意雇主提出的条件。（有人高喊：“听啊！听啊！”）对于工人来说，这一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这样。而这对你

们选民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这对国内商业，对小商人，对济贫捐，对一切捐税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国外竞争的任何一点加强都必定会相应地使国内价格进一步下降。劳动价格的任何下降都是以过剩劳动的增加作为基础，而过剩劳动的增加又是靠扩大机器生产达到的。我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这对你们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我左边的这位曼彻斯特自由派采用了一项新的发明，把对他说来已成为多余的300人抛到了街头。小商人们！这样你们就会失掉了300个顾客，济贫捐缴纳者们！这样就增加了300个贫民。（人们向演说者高声喝采）但是请注意，邪恶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300个人首先会使还在同一生产部门中工作着的那些人的工资降低。雇主说：“从现在起我降低你们的工资。”工人们反对，于是他补充说：“你们没有看见刚刚走上街头的这300人吗？要是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尽可以同他们调换一下位置。只要让他们回来，他们是愿意接受任何条件的，因为他们正在挨饿。”工人们感到，事情的确是那样，于是他们的反抗也就垮了。喂，你这个曼彻斯特自由派，政治上的伪君子啊！在听我们讲话的这些人面前，你现在怎样回答我？但是，邪恶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被赶出自己原来生产部门的人要到其他部门去谋生，这就会使过剩劳动增加和使工资降低。今天工资很低的职业，过去曾经是工资很高的，而今天工资高的在不久的将来工资也会降低。这样，工人阶级的购买力就一天一天地缩小，国内商业也将随之而萧条下去。小商人们，请注意这一点！你们的顾客越来越穷，你们的利润越来越少，而要你们救济的贫民将越来越多，你们必须缴纳的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数目将越来越大。你们的收入降低，你们的支出增加，你们挣得少，花得多。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有钱的工厂主和地主把济贫捐以及其他捐税的全部负担都转嫁到你们身上。你们中间阶级成了为富翁缴纳捐税的机器。他们制造出了为他们创造财富的贫困，却要你们为他们亲手制造的这种贫困负担代价。地主靠特权逃避这种负担；工厂主从工人的工资方面得到补偿，从而逃避了这种负担，而这又会影响到你们。你们喜欢这种制度吗？我左边的这些先生所维护的就是这种制度。那么我自己向你们提出的意见是什么呢？我向你们指出了邪恶，这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还要更进一步。我在这里要指出正义何在，并加以证明。（热烈鼓掌）”^①

接着厄内斯特·琼斯就开始阐述自己对政治经济改革的观点，

^① 《1852年7月6日在哈利法克斯选举大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并继续说道：

“选民和非选民们！我刚才向你们讲述了几项社会和政治措施，现在我也像在 1847 年做过的一样，呼吁立刻实行这些措施。但是，因为我力求扩大你们的自由，结果他们夺去了我的自由。（喊声：“听啊！听啊！”）因为我努力为你们所有的人建立自由之宫，他们就把我抛进重犯牢房。这里，在我左边就坐着一位管过我的看守长。（听众对坐在左边的人发出一片激烈的长时间的责难声）因为我企图说出真理，我就会被责令闭口。他把我投入单人牢房，禁止与人接触，达两年又一个星期之久，不但不给我纸笔墨水，反而强迫我撕乱麻。啊！（演说人转向查理·伍德爵士）在两年又一个星期的期间内，你们是战胜者，可是现在我的出头之日到了！我要唤醒在场的每个英国人心中的复仇之神。（场内爆发热烈的掌声）听吧！你们难道没有感到，在这广大群众的呼吸中复仇之神在振动他的翅膀吗！（场内再次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有人会说这不是社会问题。不，这正是社会问题！（喊声：“对呀！对呀！”）我所以说这是社会问题，是因为不同情被捕者的妻子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工人的妻子。不同情被监禁者的儿女的这个人，也绝不会同情劳动奴隶的儿女。（掌声和喊声：“对呀！对呀！”）他过去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他今天的许诺也推翻不了这一点。是谁投票赞成爱尔兰非常法，赞成禁口律法案，赞成压制爱尔兰的报刊？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 15 次投票反对休谟关于扩大选举权的提案²⁴²，反对洛克·金关于各郡选区的提案^①，反对尤尔特关于短期议会的提案，反对贝克莱关于秘密投票的提案？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释放弗罗斯特、威廉斯和琼斯²⁵¹？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调查在殖民地的暴行，包庇华德和托林顿这些伊奥尼亚群岛和锡兰的暴君？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反对减少剑桥公爵的 12000 英镑薪俸，反对陆海军费的任何削减，反对废除窗口税？是谁 48 次投票反对缩减一切其他的捐税（其中也包括减少他们自己的薪俸）？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废除纸张税和广告税，反对废除知识税？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赞成增设一批主教职位和受俸牧师职位，赞成给予梅努特学院津贴²⁵²，反对削减这类津贴，反对免除非国教徒的教会税？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对食品掺假的事件作任何调查？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降低

① 见本卷第 251—254 页。——编者注

食糖税和取消麦糠税?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是谁投票反对缩短面包师的夜班工作时间,反对调查针织工厂工人的状况,反对对习艺所²⁵³进行卫生检查,反对禁止未成年工人早上6时以前上工,反对由教区给贫苦孕妇以救济,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⁵⁴?辉格党人!此人就在场;打倒他!以人道和上帝的名义打倒他!哈利法克斯人!英国人!两种制度摆在你们面前,请你们加以抉择吧!(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在演说结束时所引起的热烈反应。广大的听众都聚精会神地倾听每一句话,演说每一停顿,立刻就像滚滚波涛一样响起了对辉格党代表和阶级统治的愤慨之声,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经久难忘的场面。在举手表决的时候,赞成查理·伍德爵士的只有很少几个主要是被收买或者被胁迫的人。几乎全体与会者都在难以描绘的热情和欢呼中高举双手赞成厄内斯特·琼斯。)市长宣布厄内斯特·琼斯先生和亨利·爱德华兹先生经举手表决当选。于是,查理·伍德爵士和克罗斯利先生随即要求投票表决。”^①

事情的结局正如琼斯所预言的那样:他以20 000票被提名,但是辉格党人查理·伍德爵士和曼彻斯特派克罗斯利却以500票当选。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7月

25日—8月2日之间

载于1852年8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1852年7月6日在哈利法克斯选举大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卡·马克思

选举中的舞弊²⁵⁵

1852年8月20日星期五于伦敦

上届下院在解散之前决定给自己的继任者进入议会设置尽量多的困难。它通过了一条严峻的法律，禁止行贿、舞弊、恫吓和一切竞选活动中的诈骗行为。

它拟定了一大串详尽的和琐碎得难以想象的问题，根据上述法律，这些问题可以向呈请者提出，也可以向当选的议员提出。可以要求他们宣誓说明：他们的代理人是谁，他们和代理人的关系如何。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并迫使他们说明：不仅就他们所知，甚至就他们“推测、估计和猜想”，在选举中他们自己花了多少钱，别人经他们同意或者没有经他们同意替他们花了多少钱。一句话，任何一个议员，只要稍微怀疑也许有人曾为了他而违犯法律，他就无法经住这种奇异的严酷考验而不犯伪证罪。

总之，即使新的立法者也会像僧侣对待三十九信条²⁵⁶那样自由地——只相信其中几条，却在全部信条上签名——对待这个法律，在这种条件下，这个法律中也仍然有足够的条款使新的议会成为曾经

代表3个王国^①发表演说并为它们制定法律的历届议会中最清白的一届。但是，我们只要把这个法律和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紧接着进行的大选对比一下，就会看出这个法律使托利党获得了这样的光荣：在他们执政期间，理论上宣布了最纯洁的选举，而在实践中却发生了最大规模的选举舞弊。

“新的选举正在进行，其间演出了从过去托利党人垄断最高统治权力以来空前未有的行贿、舞弊、暴行、酗酒和谋杀的活剧。我们听说确有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抓住自由派选民，强迫他们在地主的监视下违背自己的信念投票；如果有人胆敢对被抓住的选民表示同情，这些士兵就瞄准他们开枪，大批地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指六里桥、利默里克和克莱尔郡的事件）。也许有人会说：这都发生在爱尔兰啊！不错，可是在英格兰，托利党人利用警察去捣毁对手的讲坛；他们派遣自己的有组织的打手到街上去拦截和吓唬自由派选民；他们把一些人灌得醉薰薰的；他们不惜巨资进行收买，例如在德比就是这样；几乎在每一个竞选的地方，他们都不断地进行恫吓。”^②

上面是厄内斯特·琼斯的《人民报》描写的情形。听了这个宪章派周报的报道以后，现在我们来听听同宪章派敌对的政党的周刊——工业资产阶级最稳健、最理智、最温和的刊物，伦敦的《经济学家》怎样说吧。

“我们确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次大选中发生的谄媚、舞弊、恫吓，狂热和放肆，都是以往任何一次所不及的。据说，这次选举中行贿的规模比以往多年大得多……最近这次选举中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恫吓和非法影响选民的手段，超过了最大胆的想象……大摆酒宴，玩弄卑劣的阴谋，大规模地行贿，野蛮地恐吓，诬蔑候选人的声誉，蹂躏正直的选民，收买和侮辱软弱的选民，光天化日之下露骨地无耻地进行造谣、陷害、诽谤，亵渎神圣的语言，诋毁高尚的名声——

① 指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编者注

② 厄·琼斯《托利党的优势》。——编者注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东西集合在一起,我们就会在一大堆肉体被践踏、灵魂受折磨的牺牲者面前感到毛骨悚然;而新议会就是在这些牺牲者的坟墓顶上建立起来的。”^①

舞弊和恫吓是司空见惯的方式。首先是政府直接施加压力。例如,在德比,有一个竞选代理人在行贿时被当场抓住,从他身上搜出了陆军大臣贝雷斯福德少校的一封信,这位贝雷斯福德借给他一笔钱作竞选费用,要他凭信到一家商行去支取。《普尔先驱报》公布了一个海军基地司令官签署的海军部给支半薪的军官的通告,要他们投政府提名的候选人的票。此外,还直接使用了武力,例如在科克、贝尔法斯特和利默里克(在利默里克打死了8个人)。地主威胁要驱逐佃户,除非佃户和他们投一样的票;德比勋爵的地产管理人在这方面给他们的同行做出了榜样。小店主遭到失去主顾的威胁,工人遭到解雇的威胁;还使用把选民灌醉的办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除了使用这些世俗的舞弊方法外,托利党还采用了宗教的手段。人们颁布了禁止罗马天主教举行游行仪式的女王告谕,借以煽起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到处都是“禁止罗马天主教仪式!”的喊声。斯托克波尔特的骚动²⁵⁷就是这个告谕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当然,爱尔兰的神父也使用了类似的武器予以回敬。

在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只是一个王室法律顾问就已经收到25个地区递来的抗议书,要求由于选举中的行贿和恫吓事件而宣布议会选举无效。在德比、科克茅斯、巴恩斯特珀尔、哈里奇、坎特伯雷、雅茅斯、韦克菲尔德、波士顿、哈德斯菲尔德、温莎及其他许多地区都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当选的议员的抗议书,并筹集了诉讼费用。

^① 《新议会的代价》,见1852年8月7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可以肯定,即使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德比派议员中也至少会有8个到10个人由于这些抗议书而被取消议员资格。

行贿,舞弊和恫吓的主要场所,自然是农业郡和贵族控制的城镇选区,因为在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²⁴⁹时,辉格党曾费尽心机尽可能多地保存这些城镇选区。大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工业郡的选区,由于情况特殊,是非常不适于采用这些手段的。

举行大选的日子,在不列颠向来是狂饮滥醉的酒神节,是照例进行政治信仰贴现的证券交易期,是酒店老板生意最兴隆的日子。有一家英国报刊说:

“这种定期举行的农神节每一次都长久地留下伤风败俗的痕迹。”^①

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道地的古罗马的农神节。在这个节日里,主人变成了奴仆,奴仆变成了主人。可是如果奴仆只当一天主人,那么这一天便会无法无天。主人原是统治阶级的或统治阶级中某些集团的达官显贵,奴仆则是这些阶级的群众,在享有选举特权的人的周围还有大批没有选举权的人,成千上万只能跑龙套的人,这些人的口头支持或举手赞成向来都是很需要的,——即使只是为了获得戏剧效果。如果回溯一下不列颠百余年来的选举史,那么人们要提出的问题就不会是:不列颠历届议会为什么这样糟糕,反而是:它们为什么居然还搞得不错,并且能模模糊糊地多少反映出一些不列颠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样,反对代议制的人在发现下面的事实时定然会感到惊奇:只凭抽象的多数、只凭票数的偶然对比来决定一切的立法机关,却能按照形势的要求作出决定和解决问题——至少在其全盛时

① 《新议会的代价》,见1852年8月7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期是如此。任何时候,单从票数的对比,即使借助于最牵强的逻辑推理,也不能得出表决必然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相反,议员的一定的对比的必然性,却是由当前的情况自然而然产生的。不列颠选举中传统的行贿,不正是表现互相竞争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另一种既露骨又常见的形式吗?这些政党在其他场合以寻常的方式施加影响和进行操纵的手段,在选举的这几天中则以特殊的、相当离奇的形式付诸实行。但前提仍是:互相竞争的政党的候选人代表着选民群众的利益,而这些有特权的选民又代表着没有选举权的群众的利益,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没有选举权的群众还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德尔斐的女巫必须被一种气体迷倒,才能得到神谕;不列颠人民必须用杜松子酒和黑啤酒把自己灌醉,才能找到它的神谕发现者,立法者。至于到哪里去找这些神谕发现者,那是不说自明的。

从工商业中间阶级即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官方的政党在辉格党和托利党旁边出现的时候起,特别是从1831年通过改革法案后,各个阶级和政党彼此间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产者对耗费颇大的竞选手腕,对大选的这些不必要的开支丝毫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同土地贵族竞争,利用一般的道德手段要比个人出钱来得便宜。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他们代表着普遍的在现代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利益,因此他们能够要求选民本着全民的利益、而不按个人或地方的动机行事;他们越是坚持上述要求,后一种影响选民的手段就越是(由于选民的成分本身)主要地成为土地贵族的武器,而不为中间阶级所使用。因此,资产阶级就为建立在道德原则基础上的选举而斗争,并且强迫议会通过根据这种精神制定的法律,使其中每一项法律都成为抵御土地贵族的地方势力的保障。的确,从1831年起,贿赂行为采取了比较文明、比较隐蔽的形式,大选也在比过去更平静的状态下进

行了。现在，人民群众总算是不再当合唱队了，过去他们或多或少热心地参与了那些抽签决定胜负的官场英雄们的斗争，当议会偶像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像克里特岛上的库雷特在丘必特诞生时一样痛饮狂欢²⁵⁸，并因热烈地参加对这些偶像的歌颂而获得酬金和款待。现在，宪章派则成群结队，来势汹汹，团团围住了要演出官方的竞选斗争的舞台，并且用充满怀疑的目光仔细地监视着台上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条件下，1852年这样的选举不能不引起公愤，甚至使保守的机关报《泰晤士报》也破天荒第一次替普选权说了几句话，而且使不列颠的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异口同声地发出呼喊。改革的敌人给改革者提供了最好的论据；在现存的阶级制度下的选举就是这个样子！在这种选举制度下产生的下院就是这个样子！

要了解最近这次选举中所采用的这一套行贿、舞弊、恫吓手段的真正性质，必须注意到同样也在这一方面起作用的一个情况。

如果看一下1831年以来的各次大选，那就会发现，占国内人口大多数的没有选举权的居民对享有特权的选民圈施加的压力越大，中间阶级要求扩大选民圈的呼声和工人阶级要求彻底消灭享有特权的选民圈的呼声越高，真正参加投票的选民也就越来越少，因而，选民圈也就越来越缩小。这在最近这次选举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我们就拿伦敦作例子来看吧。在西蒂区，有26 782个选民，参加投票的只有10 000人。在陶尔哈姆莱茨区，登记的选民有23 534人，参加投票的只有12 000人。在芬斯贝里，20 025个选民中投票的还不到一半。在竞选斗争最剧烈的利物浦，17 433名登记的选民中投票的只有13 000人。

这些例子已经足够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

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²⁴⁴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作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一整套破旧机器的总冲击中来。

因此,托利党人使用贿赂和恫吓手段,只不过是拼命挽救那个已不能有什么积极作为的、在选举中再也不能起决定作用和选出真正国民的议会的垂死的选民圈而已。结果怎样呢?旧议会解散了,因为在它快要完结的时候,它已经分裂成一个个互相使对方不能有丝毫作为的派别集团了。新议会开始时的情形则同旧议会完结时一样。它一生下来就陷于瘫痪状态。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4 日—17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9 月 4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5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选举的结果²⁵⁵

1852年8月27日星期五于伦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最近这次大选的结果。

如果我们把辉格党、自由贸易派和皮尔派合在一起总称之为反对党并把它们同托利党相对立,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关于新议会的统计资料,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在过去的一篇通讯^①中已经指出的那种巨大的对立,即城市 and 农村之间的对立。

在**英格兰**,城镇选区选出了104名内阁拥护者和215名反对党拥护者,而各郡却选出了109名内阁拥护者和仅仅32名反对党拥护者。从作为托利党的堡垒的各郡中,应当除去最富庶和影响最大的地方,即约克郡的西区、南兰开夏郡、米德尔塞克斯、东萨里等;把派遣代表参加议会的城镇除开不算,这些地方拥有各郡的1000万居民中的400万人。

在**威尔士**,如果把城镇的选举和农村的选举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到,选举结果恰恰相反。这里的城镇选区选出了10名反对党拥护者

① 见本卷第415—421页。——编者注

和 3 名内阁拥护者，而各郡则选出了 11 名内阁拥护者和 3 名反对党拥护者。

苏格兰给我们提供了最鲜明的对比。城镇选区选出了 25 名反对党拥护者，没有选举一个内阁拥护者。各郡则选出了 14 名内阁拥护者和 13 名反对党拥护者。

在爱尔兰，这里的比例不同于大不列颠，爱尔兰的民族党在农村地区势力最大，这里的居民更直接地受天主教僧侣的影响，而在北方城镇中占优势的是英格兰人和新教徒。所以在这里农村是反对党的真正的地盘，虽然按照现行的选举方式，这一点不能十分清楚地显示出来。在爱尔兰，城镇选区选出了 14 名内阁拥护者和 25 名反对党拥护者，各郡则选出了 24 名内阁拥护者和 35 名反对党拥护者。

如果你们问我究竟哪个政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答复是：所有政党全都战胜了托利党，因为后者很明显地处于少数地位，尽管它使用了收买、恐吓和政府的压力等等手段。根据最精确的材料，共选出了 290 名内阁拥护者，337 名自由派，或者说联合反对党拥护者，以及 27 名动摇分子。即使把这 27 名动摇分子算作是内阁拥护者的力量，自由派仍然保持 20 票的优势。可是，托利党人本来是指望获得至少 336 票的多数。即使不谈这个在数字对比上失利的问题，托利党人也已经在竞选中遭到了失败，因为他们的领袖被迫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关税原则。在 290 个德比派之中，有 20 个表示根本反对任何保护关税，而在其余的人中间，大多数人——包括迪斯累里本人在内——都反对谷物法。²⁴⁴

德比勋爵在他提交议会的咨文中曾经断言，只有在绝大多数人赞成的情况下，他才会改变英国的贸易政策。他远没有想到他自己可能成为少数派。但是，虽然选举的结果完全不符合托利党人的乐观的

愿望,这种结果对托利党人来说仍然要比反对党所期望的好得多。

没有一个政党曾遭到过比辉格党更惨重的失败——而且这恰好是发生在这个党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即它的一些历任大臣们身上。辉格党的群众一方面同自由贸易派混在一起,另一方面同皮尔派混在一起。不列颠辉格主义的真正的重要原则集中地体现在辉格党的官方上层人物身上。不错,伦敦西蒂区重新选举了上届辉格党内阁的首脑约翰·罗素勋爵,但是,在1847年西蒂区的选举中,马斯特曼先生(托利党人)曾经比约翰·罗素勋爵少得415票。而在1852年的选举中,他却比罗素勋爵多得819票,成为第一名当选人。上届辉格党政府的11个成员失去了议会的席位,他们是:财政大臣威·吉·克雷格爵士、财政大臣理·孟·贝留、检察长戴·邓达斯爵士、内务大臣乔·格雷爵士、爱尔兰首席检察官约·哈奇尔、财政部秘书长乔·康沃尔·刘易斯、军械总长秘书克·爱·帕吉特勋爵、海军部秘书长约·派克、爱尔兰事务大臣威·萨默维尔爵士、海军大臣斯图亚特海军上将,此外,还应当把议院委员会²⁵⁹主席贝尔纳先生算上。一句话,自从改革法案¹⁵⁹公布以来,辉格党¹⁴⁵人还没有遭到过这样的失败。

皮尔派²⁴⁰在上届议会中所占的数目就已经很少,他们已经变成一个更加微不足道的集团;他们的许多最有影响的领袖都失去了自己的席位,例如:卡德威尔和尤尔特(两人都代表利物浦)、格林(代表兰开斯特)、马洪勋爵(代表赫特福德)、朗德尔·帕尔默(代表普利茅斯)等等。卡德威尔的失败引起了最强烈的反应,这不仅由于他曾代表过的城市具有重大的意义,并且由于他同已故的罗·皮尔爵士的私人关系。他同马洪勋爵都是皮尔爵士的遗嘱执行人。卡德威尔遭到失败的原因是他拥护废除航海法令²⁶⁰和不同意“禁止罗马天主教

仪式!”的口号。而在利物浦，国教信徒给了选举以很大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一个机关刊物说：“这个只会做生意的、只想赚钱的团体，很少有时间去培养宗教情感；因此它必须依靠僧侣，变为僧侣手中的工具。”^①

此外，和曼彻斯特的选民不同，利物浦的选民不是普通“人”，而是“有身分的人”；而维护宗教上的旧的正统观念，是对有身分的人的首要的要求。

最后，自由贸易派在这次竞选中有几个最有声望的人落选：例如，在布拉德福德，最老的自由贸易派宣传家和政论家之一汤普森上校（绰号“鹅妈妈”^②）；在奥尔德姆，自由贸易派最有名的鼓动家和最有辩才的演说家之一威·约·福克斯。甚至连布莱特和吉布森本人也仅仅以微弱的多数在该党的堡垒曼彻斯特战胜了自己的对手辉格党人。不言而喻，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不指望也不能指望在议会中占多数。但是，许多年来他们吹嘘说，一旦辉格党被打倒，托利党重新执政，他们就会展开大规模的鼓动并完成英雄的业绩。而现在情况却不是这样，在不久以前的竞选中我们又看到他们谦恭地同辉格党携手合作，单单这一点就已经表明了他们道义上的失败。

但是，尽管没有一个官方政党获得胜利，甚至相反地，它们每一个都遭到了失败，而不列颠国民却可以从以下的事实得到安慰：这一次不是某一个政党，而是一种职业——律师在议会中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有力的代表权。下院有一百多名议员是律师；看

① 《选举》，见 1852 年 7 月 10 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② 传说中童话的讲述者。——编者注

来,这个数字不论对于希望自己的事业在议会中获得成功的政党来说,还是对于企图根据国民的同意作出决定的议会来说,都不是一个吉兆。

上面援引的数字对比毫无疑问地说明,整个反对党和托利党相比获得了否决的多数。如果它采取联合行动,那么它在议会召开的最初几天就能把内阁推翻。但是它没有能力组织自己的巩固的政府。为此必须重新解散议会并举行新的大选;而举行新的大选又只会导致重新解散议会。要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进行议会改革。但是腐朽的党派和新的议会宁肯要托利党统治,也不愿采取这样英勇的步骤。

如果单独地来考察每一个政党,那么托利党人虽然同联合起来的反对党相比是少数,但他们仍然是议会中最有力量的党派。此外,他们巩固地占有最重要的职位;他们拥有一支训练良好的、紧密团结的和相当统一的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最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这一次失去时机,他们就永远没戏了。而与他们相对峙的是一个由四支军队组成的联盟,每一支军队都由不同的长官率领,这个联盟是由利益、原则、回忆和欲望各不相同的一些集团构成的一个不稳定的混合物,这些集团反对把议会纪律宣布为最高原则,它们以嫉妒的目光注视着它们各自提出的要求。

显然,各个反对党集团在议会中所占的比例同它们在国家中所占的比例是完全不符合的。例如,辉格党在议会中仍然是反对党的一个人数最多的部分,其余的集团都以它为核心,集结在它的周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因为这个经常把自己想象为管理国家的首脑的政党,关心得更多的是如何回避自己的同盟者的要求,而不是如何打败共同的敌人。第二个反对党集团皮尔派,共有 38 个代表;它的首领是

詹·格雷厄姆爵士、悉·赫伯特和格莱斯顿。詹·格雷厄姆爵士依靠同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结成联盟来进行投机活动。他对首相的职位垂涎欲滴，因而丝毫也不愿意帮助辉格党人恢复他们旧日的管理国家的垄断权。另一方面，许多皮尔派赞同托利党人的保守观点，自由派只能在贸易政策问题上指望得到他们的经常的支持。

一家自由派的报纸写道：“在许多其他问题上，要设法使自己的措施得到绝大多数的支持，这对大臣们来说并非难事。”^①

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的力量比在上届议会中加强了，他们现在拥有 113 名代表。同托利党人的斗争将使他们更前进一步，超过辉格党人的稳健政策认为适当的界限。

最后，还有一个拥有大约 63 名代表的“爱尔兰旅”²⁶¹。虽然它自从丹王^②死后就没有获得什么成就，但是它的人数却完全可以左右力量的对比；除了对德比的憎恨以外，它同不列颠的反对党毫无共同之处。在不列颠议会中，它代表爱尔兰反对英格兰。在比较长期的运动中没有一个是议会党派能够有把握地指望它的支持。

现在我们把上面所作的分析作一个简单的总括：虽然与托利党人相对抗的是一个否决的多数，但是没有一个党能够代替它执掌政权；托利党人的失败必然会引起议会改革；他们拥有一支紧密团结的、统一的、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占据着最重要的国家职位；反对党是 4 个各不相同的集团的堆积物，而混合的军队往往打不好仗并且缺乏机动性；加之，否决的多数仅仅为二三十票；占议会 $\frac{1}{4}$ 的 173 名

① 《选举结果》，见 1852 年 7 月 24 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② 即丹·奥康奈尔。——编者注

议员是新人，他们竭力避开做可能使他们丧失用高价买到的议员席位的任何事情。综上所述，我们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托利党人将拥有相当的力量，这种力量虽不足以克敌制胜，却足以把事情引向危机。看来，他们已经决心这样做。伦敦所有的日报和周刊都流露出对于这种危机的恐惧，因为它会变革整个英国官场的面貌。《泰晤士报》、《纪事晨报》、《每日新闻》、《旁观者》、《观察家》都大声疾呼，因为它们都各有各的恐惧。它们都想通过发表激烈的言论说服托利党人辞职，从而防止危机。但是，不论是激烈的言论还是道义上的愤慨，都不能使它们逃避冲突。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8 月
14 日—17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9 月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58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 逼近的商业危机²⁶²

1852年10月15日星期五于伦敦

商业大臣亨利先生不久以前向他的一伙朋友，在班伯里的制罐厂聚会的农场主们解释说：贫困减轻了，其原因与自由贸易无关，而首先是由于爱尔兰的饥荒²⁶³，海外黄金的发现，爱尔兰居民的大批外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英国船舶的巨大需求等等。所以，我们应当承认，“饥荒”是对付贫困的特效药，正如砒霜对付老鼠一样。

伦敦的《经济学家》说：

“至少，托利党人不得不承认现今的繁荣和它的必然结果——习艺所²⁵³的荒废。”^①

《经济学家》接着试图向表示怀疑的商业大臣证明，由于实行自由贸易，习艺所已经荒废，如果自由贸易被允许充分发展，习艺所也许就会从不列颠的土地上完全消失。然而很遗憾，《经济学家》的统计

① 《亨利先生和贫困》，见1852年10月2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根本没有证明它试图证明的东西。

大家都了解，现代工商业经历着5—7年的周期性的循环，在此循环中，有规律地相继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沉寂，然后是好转，信心渐增，活跃，繁荣，狂热发展，贸易过度扩张，崩溃，压缩，停滞，衰竭，最后，又是沉寂。

我们在回顾这一事实之后，现在再来谈谈《经济学家》的统计。

1834年，济贫费的数额达6 317 255英镑，到1837年，这个数字降到最小限度，只有4 044 741英镑。后来，这个数字又逐年增加，至1843年增加到5 208 027英镑。在1844、1845和1846年，它又降到4 954 204英镑，但是在1847和1848年又有增长，1848年它达到6 180 764英镑，几乎达到1834年实行新济贫法²⁶⁴之前的水平。在1849、1850、1851和1852年，它又降到4 724 619英镑，但是1834—1837年这个时期是繁荣时期，1838—1842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3—1846年是繁荣时期，1847—1848年是危机和停滞时期，1849—1852年又是繁荣时期^①。

那么，这种统计说明了什么呢？它至多不过证明那个陈腐的同义反复：不列颠的贫困现象随着停滞和繁荣时期的更替而加剧和减轻，这不取决于自由贸易或保护关税。此外，我们发现，在自由贸易时代的1852年，济贫费的总额比保护关税时代的1837年多679 878英镑，尽管有爱尔兰的饥荒、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

英国的另外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出口随着自由贸易而增长，繁荣随着出口而增长；随着繁荣的出现，贫困必将减轻，以至

^① 《亨利先生和贫困》，见1852年10月2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于最终消失。它援引下面的数字作为论据。有劳动能力但又需要靠教区的救济来维持生活的人数如下：

1849年1月1日在590个济贫院——201 644人
 1850年1月1日在606个济贫院——181 159人
 1851年1月1日在606个济贫院——154 525人^①

把这个表同出口的统计作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产品出口额是：

1848年 48 946 395 英镑
 1849年 58 910 883 英镑
 1850年 65 756 032 英镑^②

这个表说明什么呢？1849年，由于出口额增加了9964488英镑，有20 000多人摆脱了贫困；1850年，由于出口额进一步增加了6 845 149英镑，又有26 634人得到了生路。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自由贸易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周期及其盛衰交替现象，那么，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50 000 000英镑，即几乎增加100%。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还敢谈论“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

我手头有济贫委员会公布的几份文件。诚然，这些文件表明，从1848—1851年贫民的数目有所减少。但是，同时从这些文件中也可以看出：1841—1844年间，贫民的平均数是1 431 571；1845—1848

① 可能引自1851年2月8日《经济学家》上的《贫困率》。——编者注

② 《1850年贸易和航运报告》，见1851年2月15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年间,这个平均数是 1 600 257。在济贫院内和济贫院外受到救济的贫民,1850 年有 1 809 308 名;1851 年有 1 600 329 名,即比 1845—1848 年的平均数略有增加。现在如果把这些数字同人口普查提供的人口数对照一下,我们就会发现 1841—1848 年每 1 000 个居民中有 89 个贫民,而在 1851 年有 90 个贫民。由此可见,与 1841—1848 年的平均数字相比,实际上贫困是加剧了,尽管有自由贸易,饥荒、繁荣,尽管有澳大利亚的自然金块和川流不息的移民。^①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罪犯的人数也增加了。只要看一看医学杂志《柳叶刀》就足以使人相信,食物掺假和食物掺毒一直是同自由贸易同步发展的。在伦敦每周都由于《柳叶刀》揭露新的秘密而引起新的恐慌。这家杂志成立了一个由医生、化学家等等组成的完备的调查委员会来检验在伦敦销售的食品。在这个委员会的报告中经常公布咖啡、茶、醋、胡椒、酸辣菜等掺毒的情况——可以说所有这些食品都掺上了毒。

显然,资产阶级贸易政策的两个方面,即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都同样地无力消除那些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和自然结果的现象。100 万贫民在不列颠的习艺所度日的情况,正如在英格兰银行存有 1 800—2 000 万英镑的黄金一样,也是与不列颠的繁荣分不开的。

必须向资产阶级的幻想家永远肯定地指出这一点,他们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商业循环中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自由贸易的结果,或者,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带来的东西。虽然应当永远肯定这一点,但毫无疑问,1852 年

^① 1852 年 10 月 12 日《晨报》(伦敦)第 19127 号第 4 版。——编者注

是英国所经历过的特别繁荣的年代中的一年。国家收入的数额——虽然废除了窗口税，——关于海运的报告，出口的清单，金融市场的牌价，而首先是工业区的空前活跃，都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

但是，对于 19 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任何人相信，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刻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过度投机和崩溃阶段。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交易所的投机买卖都不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使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润，并且刺激扩大再生产。”

换句话说，现在这种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过剩资本已经直接投入到，并且还在继续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根据工厂总监伦纳德·霍纳先生最近的报告，1851 年，仅仅棉纺织厂中就增加了 3717 马力。他列举的正在建设中的工厂几乎多得不可胜数。这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 150 马力的纺纱厂，那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 600 台织布机的生产花布的织布厂，另一个地方又在建设一个拥有 6 万纱锭、120 马力的纺纱厂，还有一个地方正在建设一个拥有 200 马力的纺纱厂和一个拥有 300 马力的织布厂等等。而最大的一个生产驼绒和各种衣料的工厂正在布拉德福德(约克郡)附近兴建起来。

“据计算，为泰特斯·索尔特先生建造的那个工厂占地 6 英亩，从这一点可以判断这个工厂的规模大小。主体工程将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式样非常奇特的石头建筑物。它有一个长达 540 英尺的大厅；机器设备将包括最新的、公认有价值的发明。曼彻斯特的费尔贝恩兄弟将建造一批预计有 1 200 马力的蒸汽发动机来开动这许多机器，仅其煤气厂就相当于一个小城镇的煤气厂；这个厂将按照怀特的碳氢化合物系统进行建设，估计将花费 4 000 英镑。据统计，需要 5 000 个喷嘴，这些喷嘴每天要消耗 10 万立方英尺煤气。除了这个大规模的工厂以

外,索尔特先生要在这个工厂附近为工人建筑 700 所住宅。”^①

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 1847 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因为 1847 年的危机主要是商业和金融危机,而不是工业危机。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 1838—1842 年这个空前的停滞时期,它也是工业生产过剩的直接结果。过剩资本越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是通过投机买卖的多种渠道而分散,则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中间阶级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越加广泛、持久和直接。如果发生激变,充斥市场的全部商品突然变成沉重的累赘,那么对于这一大批扩建和新建的工厂来说,这种情况必将更加严峻;因为这些工厂已经装备到能够开工生产的程度,而且立即开工生产对这些工厂来说乃是生命攸关的问题。如果资本放弃了它的通常的商业流通渠道,从而产生混乱,这种混乱甚至会进入英格兰银行的营业厅,那么当巨大的金额变成那些或者在危机开始时才投入生产,或者部分地需要先追加流动资本才能开始工作的工厂、机器等等固定资本时,“能自救的人,自救吧”这样的呼声也就必然喊得更高。

我从《印度之友》中引用另外一个可以说明日益迫近的危机的性质的事实。根据它所公布的 1852 年加尔各答的商业材料来看,1851 年加尔各答进口的棉织品和各种棉纱的价值是 4 074 000 英镑,几乎占贸易总额的 $\frac{2}{3}$ 。今年这种进口的总额还要增加。而且这还不包括关于孟买、马德拉斯和新加坡进口的资料。但是,1847 年的危机已经

^① 可能引自 1852 年 9 月 22 日《泰晤士报》上的《棉纺织业》。——编者注

向我们揭示了有关对印贸易的这些情况，所以现在没有人能对这种向“我们的印度帝国”的输入额占总额 $\frac{2}{3}$ 的工业繁荣的最终结局抱有丝毫的怀疑。

关于现在的繁荣状态之后将要出现的崩溃状态的特点，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许多征兆，特别是英格兰银行中的黄金盈余以及促使金块急剧流入的那些特殊情况，都预示这个崩溃将在 1853 年到来。

目前在英格兰银行的地下室中储存着价值 21 353 000 英镑的金块，有人试图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黄金采掘过剩来解释这种黄金流入的情况。但是，只要略微看一看事实，我们就会相信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的增加，实际上只意味着其他商品进口的减少，换句话说，意味着出口大大超过进口。实际上，最近的贸易报告说明，大麻、糖、茶、烟草、酒、羊毛、谷物、油类、可可、面粉、靛蓝、皮革、马铃薯、熏肉、猪肉、黄油、干酪、火腿、猪油、大米，以及欧洲大陆和英属印度的几乎全部产品的进口都大大减少了。1850 年和 1851 年，进口额显然是过大了。这种情况，再加上大陆上由于歉收而引起的粮食价格的上涨，就造成了缩减进口的趋势。只有棉花和亚麻的进口增加了。

这种出超的情况也说明为什么汇率有利于英国。另一方面，由于出超部分是以支付黄金来平衡的，因此，相当大一部分英国资本闲置起来，从而扩大了银行的准备金。银行和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这些闲置的资本寻找投资门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借贷资本充裕和利率低的原因。头等票据的贴现率是 1.75% 到 2%。如果参阅一下任何商业史，例如图克的《价格的历史》，你就会看出，英格兰银行地下室中

的金块的大量储存、出口超过进口、有利的外币汇率、借贷资本的充裕和低利率等等这些征兆的同时出现,正在有规则地导致商业循环中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一定会开始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种种诱人的欺诈性投机买卖肆无忌惮。但是这个狂热发展状态也只不过是崩溃状态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爆发。

我很清楚地知道,英国官方的经济预言家会把这种观点看作是异端邪说。但是,自从著名的财政大臣“繁荣的鲁宾逊”^①在1825年,即出现危机的前夜,在议会开幕时预言将有空前的持久的繁荣以来,这些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哪怕有一次预测或预言过危机吗?相反地,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事物没有它的另一面了。这一次严酷的命运被战胜了。而在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就作出一副无罪的样子,用道德的、庸俗的说教来训斥商业家和工业家,说他们缺乏先见之明和没有谨慎从事。

关于暂时的工商业繁荣所造成的那些特殊的政治情况,我将在下一篇通讯中加以论述。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2年
10月9日—12日之间

载于1852年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弗·约·鲁宾逊,葛德里奇子爵。——编者注

卡·马克思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²⁶²

1852年10月19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在前一篇通讯^①中描述了目前英国工商业的状况；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种状况所引起的政治后果。

如果说预期的工商业崩溃的发生，会使即将到来的反对托利党¹⁴⁹人的斗争带有更激烈和更革命的性质，那么，现在的繁荣则是这个党暂时的最好的盟友。诚然，这个盟友不允许他们恢复已由他们自己废除的谷物法²⁴⁴，却有效地巩固了他们的政权并帮助他们实现社会反动，如果这种反动不遇到什么阻碍，最后就一定会使他们取得根本的阶级优势，因为从一开始这种反动就是为了实际的阶级利益而实行的。迪斯累里说，不要实行什么谷物法，但为了负担过重的农场主的利益，要重新分配税收负担。为什么农场主的负担过重呢？因为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必须交纳保护关税时期那么多的租金，而保护关税时期的谷物价格却一去不复返了。同时贵族也不想降低自己土地的地租，但是想实行一种新的税收办法，使农场主必须向贵

^① 见本卷第446—453页。——编者注

族多缴纳的地租得到补偿。

我再重复一遍：当前的商业繁荣有利于托利党的反动。为什么？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抱怨说：“爱国主义想栖身于餐柜之中，只要它能在那里找到饮食。因此，自由贸易现在是德比伯爵的支柱；他安卧在用科布顿和皮尔采集的玫瑰花铺成的床榻上。”①

人民群众能充分就业，并且生活也还不错——当然那些与不列颠的繁荣分不开的贫民除外；因此在目前人民是不大听信政治鼓动的。但是，促使德比勋爵的诡计得以实现的首先是中间阶级投身于强大的工业生产过程的那种狂热：开办工厂，制造机器，建造船只，生产棉毛纺织品，充实库存，成批地进行生产，交换，出口，进口，以及其他各种多少有收益的活动；他们从事这些活动的目的总不外是发财致富。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这样幸运的时机将越来越少、越来越难遇到，所以它只想并且一定要赚钱，赚更多的钱；赚钱就是一切。资产阶级让自己的职业政治家监督托利党人。但是这些职业政治家（例如，请看约瑟夫·休谟致《赫尔报》的信）完全正当地抱怨说，他们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鼓动，正如人的机体在没有大气压力的情况下很难作出反应一样。

这时资产阶级的确有某种不愉快的预感：在政府的高层中正酝酿某种可疑的事情，内阁厚颜无耻地利用目前的繁荣所引起的政治冷淡。所以它有时在自己的刊物上用这样的话来警告内阁：

“民主派（应读作：资产阶级）会把自己现在的这种英明的忍耐，对自身力量和对别人权利的尊重保持到什么程度，而不设法利用贵族曾经使用过的手段来

① 《休谟先生的“靠不住的结合”》，见1852年10月10日的《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编者注

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我们难以预测的;但是贵族不应当从民主派的一般行为中得出结论说:民主派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温和态度。”(伦敦的《经济学家》)①

对此,德比回答说:难道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傻瓜,以为我会在天空晴朗之时让你们给吓住?在商业风暴和贸易停滞使你们更加认真地关心政治以前会无所事事?

托利党人的活动计划日益清楚地暴露出来。

他们首先是阻挠召开露天群众大会;在爱尔兰他们迫害刊登对他们不利的文章的报纸;现在他们对那些散发小册子反对在民军中使用体罚的和平协会¹⁵⁵的活动家提出控诉,说他们造谣惑众,煽动骚乱。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不声不响地击退那些在大街上和报刊上进行活动的孤立的反对党。

然而他们却逃避同自己的反对者作任何重大的公开的争论,延迟议会的召开,并且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以便在议会开会之时,让它所关心的只是“死去的公爵^②的葬礼,而不是活着的人民的利益”(引自一家激进的报纸^③)。议会将在11月的第一周召开,但是毫无疑问,重要的会议不会在1月以前开始。

托利党人用什么来填补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呢?用选民登记运动和建立民军来填补。

选民登记运动的目的是把反对托利党的人从明年的议会选举的新选民名单中删除,或者阻挠把他们列入这些名单;为此就提出这样

① 《约翰·罗素勋爵与民主》,见1852年10月2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② 即阿·韦·威灵顿公爵。——编者注

③ 即《人民报》。——编者注

或那样的异议,以便从法律上阻挠把某人登记为选民。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律师作为代表,并由自己开支诉讼费用。王座法庭²⁶⁵庭长所任命的校勘律师决定对提出的要求或异议是否加以受理。这个运动的主要活动场所一直是兰开夏郡和米德尔塞克斯。为了获得在北兰开夏郡开展运动的经费,托利党人发出了认捐签名簿,上面有德比勋爵本人的签名,他慷慨地捐献了500英镑。在兰开夏郡,就选举人问题提出的异议非常之多,达到6749条,其中南兰开夏郡4650条,北兰开夏郡2099条。在南方,托利党人对3557人的选民资格提出了异议,自由党人对1093人的选民资格提出异议;在北方,托利党人对1334人的选民资格提出了异议,自由党人对765人提出异议(当然,这里所谈的只是农村选民,而不涉及位于该郡的城镇选区的选民)。托利党人在兰开夏郡成了胜利者。在米德尔塞克斯郡有353个激进派和140个保守派被从选民名单上除名,这样一来,保守派就赢得了200多票。

在这场斗争中一方是托利党人,另一方是辉格党人和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代表。大家都知道,后者成立了一些自由农协会,即制造新选民的机构,托利党人不去触犯这些机构,而是破坏它们的产品。根据米德尔塞克斯的校勘律师沙德韦尔先生的决断,许多属于自由农协会的选民被剥夺了选举权;他宣布,凡是土地的价值不足50英镑的土地占有者不得享有选举权。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所以对于这个决断不能向高等民事法院²⁶⁶提出上诉。大家都很清楚,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所作的这种区分,就会使始终为现存内阁所左右的校勘律师在编制新的选民名单方面握有极大的权力。

托利党人在选民登记运动中所花费的巨大努力以及他们的领袖

对这个运动的直接干涉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德比伯爵对于新议会的长久存在没有寄以特别的希望，如果议会不俯首听命，他就要解散它，同时，他企图借助校勘律师来帮助保守党人在新的大选中获得多数。

因此，托利党人一方面掌握住他们通过选民登记运动而操纵的选举机器，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实行民军法案来支配刺刀，而刺刀是实施最反动的议会法令和沉着地对付和平协会的威胁所必需的。

宪章派的机关刊物惊呼：“只要反动派控制了赋予它以合法外表的议会和赋予它以常备军事力量的武装民军，它在英国什么都干得出来！”^①

正在这个特别危急的时刻，“铁公爵”^②这位平淡无奇的滑铁卢英雄之死使贵族摆脱了讨厌的守护天使。这位天使在军事上是颇有经验的，他往往为了实行掩护得很好的退却而牺牲表面的胜利，为了实行及时的妥协而牺牲十分顺利的进攻。威灵顿是上院中的稳健派；在决定关头，他可以全权代表 60 个或更多的人发表意见；他阻止了托利党人向资产阶级和社会舆论公开宣战。但是现在，由于存在着一个以争论的爱好者^③为首的、寻衅的托利党内阁，上院

“不再像公爵领导时那样，是稳定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物，而可能成为危及它的安全的多余的索具”。^④

说上院作为压舱物对于国家的安全是必要的这种意见，当然不是我们的意见，而是自由派的伦敦报纸《每日新闻》的意见。现在威灵

① 《德比勋爵与人民》，见 1852 年 10 月 9 日的《人民报》。——编者注

② 即阿·韦·威灵顿公爵。——编者注

③ 即德比。——编者注

④ 1852 年 9 月 24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1979 号第 4 版。——编者注

顿公爵，即原来的杜罗侯爵，立即从皮尔派阵营转到了托利党人阵营。所以，有各种迹象说明，贵族准备孤注一掷，力争重新占领失去了的阵地，恢复 1815—1830 年的黄金时代。而目前资产阶级既没有时间进行鼓动，也没有时间造反，甚至没有时间适当表达自己的不满。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9 日—12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0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²⁶⁷

1852年11月2日星期二于伦敦

让我们来继续考察随着当前的工商业繁荣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种种政治后果。

在工业普遍活跃、商业周转加速以及人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气氛下，摆脱了一切外来压力的议会中的各政党十分平静地完成着它们自己的解体过程。

“目前皮尔派和罗素派彼此具有极其强烈的吸引力。皮尔派——这些单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出来的、不可缺少的‘国务活动家’，现在竭力想同当权派攀亲。只要看看他们的机关报《纪事晨报》对约翰·罗素勋爵在珀斯发表的那篇十分平庸的演说作了多么热烈的称赞就够了！”

这是政府的半官方报纸《先驱晨报》说的。

《卫报》说，完全相反。只要听听商业大臣亨利先生在班伯里的制糖厂对自己的那一批农场主朋友谈论皮尔派的那番话就够了。

亨利先生说：“这个党派有自己的原则，并且始终忠实于这些原则。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的问题，本来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只是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把它变成了党派的问题。”他在谈论皮尔派时是怀着敬意的，说“在恢复

伟大的保守党的统一方面已不再有什么严重的障碍。”

完全正确，——《卫报》喊道——要抛弃保护关税，要恢复保守主义！换言之，《卫报》预料，既然谷物法问题²⁴⁴已不再是争论的对象，皮尔派准备同托利党结成反动的联盟。而《每日新闻》是把一部分皮尔派已转到德比派阵营作为既成事实而加以报道的。可是，人们怀疑一部分辉格党人也做了这种不体面的事，而只要注意到他们的贵族核心是由一伙追求利禄的人组成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就拿达尔豪西勋爵来说吧；这位大人在皮尔执政的自由主义时期，是他手下的大臣。在皮尔倒台以后，罗素又在自己的新内阁中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他同纽卡斯尔公爵、圣日耳曼兹勋爵以及前政府的其他成员一起在上院中支持辉格党人玩弄的手腕，从而获得了奖赏，补到了印度总督这样一个肥缺——这是寡头政治的彩票中的头奖。他从这里大大地捞了一把。辉格党人曾经由于他们作出的这种“空前的”牺牲——没有让自己的心腹去担任这个大家都看着眼红的职位——而自吹自擂。现在，又有一个诱饵摆在达尔豪西勋爵面前——五港总督²⁶⁸之职，这是一个年进万金的闲差事。据说，这位可敬的大人并不嫌遗产过多，他认为甚至在德比内阁时期确保五港使之不出任何意外，也是他的爱国的天职。

在自由派的周刊上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丑闻录，即关于某某辉格党人就他投到托利党人方面去的最低价格进行谈判的趣事。它们说明辉格党已经腐败透顶；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同该党的两个主要领袖——罗素和帕麦斯顿之间的分裂比较起来，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关于同最近的竞选有关的一些事件，我们已经早有所闻；帕麦斯顿勋爵在这次竞选中对内阁派的候选人所给予的支持，——按照自由派报

纸自己的说法，——看来是令人迷惑不解的。有一天早晨帕麦斯顿本人的报纸《晨邮报》在一篇社论中提到了一些传闻，说帕麦斯顿打算或者以大臣和下院领袖的身分参加内阁，或者，——如果德比内阁很快倒台的话，——就用旧内阁遗留下来的那些不太“难以接受的人”组织一个新的内阁。《晨邮报》发现整个说来这些传闻非常耐人寻味，于是它声明它不是以帕麦斯顿勋爵的名义讲话，而是以它自己的名义讲话的。但是，帕麦斯顿却不顾辉格党报刊和自由派报刊的所有这些刨根问底的、甚至是令人讨厌的探询，还是认为不需要反驳这种有损他的名誉的报道。皮尔派²⁴⁰的《纪事晨报》在谈到这些传闻时的口吻清楚地表明，格莱斯顿及其伙伴们在想到这种合并时并不会产生任何对死亡的恐惧。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报纸《每日新闻》揭露了这一情况，并且慷慨激昂地要求辉格党和皮尔派中间的变节者公开地与德比联合起来。这样，我们看到，迄今为止轮流执政的每一个议会集团都既不信任所有其他集团，也不信任自己的成员；他们彼此都以临阵脱逃、贪污腐败、妥协退让来互相责难，然而它们又毫无例外地全都承认：如果把谷物法问题撇开不谈，那么，除了私仇和个人虚荣心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妨碍它们同德比派联合起来。它们对德比采取的态度，同去年12月2日前夕秩序党各个派别对波拿巴采取的态度几乎一模一样。

不难理解，反对党在展望即将到来的议会竞选运动时是相当胆怯的。

小个子约翰·罗素被授予了装在一个小皮包里的珀斯城荣誉公民证书，于是在盛大的午宴以后，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作为答谢，下面就是这篇演说的最重要的部分：

“我认为，正义感责成我们，理智也同样提醒我们，要等待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使农业、殖民活动和航运的利益得到以往曾遭到无理拒绝给予的一切补偿(笑声)；这些良好的措施的使命就是结束长期的斗争。”

现在还归罗素支配的唯一的一家报纸《地球》(晚报)对这些话作了如下的评述：“任何一个像 1835 年反对罗·皮尔爵士的那样的反对党，都必然会因各个自由派领袖之间的竞争而遭到失败。”这就是说，利用联合的反对党一致投票的办法在会议开幕后立即推翻德比内阁的企图已经完全打消了，而约翰·罗素勋爵仍旧扮演了他那第一个发出退却信号的角色。关于议会反对党的整个前途，它的领袖约·休谟先生在致《赫尔报》的一封信中作了如下的自白：

“我与过去出席下院的爱尔兰议员接触的经验说明，爱尔兰议员绝不是那种能够在这个或那个领袖的影响下采取一定的立场并且坚持这种立场的人。爱尔兰议员过于乖僻，过于急躁，过分注意爱尔兰的屈辱和灾难。直到现在，据我所知，还没有作任何努力去促使那些对德比政府的行动可能抱不信任态度的自由派联合起来。当我听到德比勋爵的前任(辉格党人)发表空洞的声明，并看到他们准备洗手不干，而不是号召改革的拥护者同他们联合起来，为人民的事业坚持到底的时候，我对他们在加强政党联合方面所能做的一切也就不能寄予很大的信任了。我担心，人们会听任他们翻来覆去地重弹老调，而同时德比派却依旧滥用一切权力来保证自己的事业获得成功，使自己的支持者得到好处，只有在这种状况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以后，才可能出现建立人民党的某种可能性。”

尽管曼彻斯特学派的现在的领袖约翰·布莱特在午宴后向贝尔法斯特的厂主们发表演说时，竭力向爱尔兰议员们献殷勤，企图用这种办法来冲淡约瑟夫·休谟对他们的攻击所造成的恶感，但是在一切有关议会纪律的问题上，“老约”^①的意见仍然是权威的意见。

^① 指约·休谟。——编者注

由此可见,议会反对党已经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

的确,旧的议会反对党已经过于衰朽了,以致它的奈斯托尔——休谟现在在他漫长的生涯结束之际,竟然也公开声明,在下院中不存在“人民党”,而采用这个名称的东西只不过是“用沙子搓成的绳索”。

总之,目前笼罩着整个反对党阵营的是一片分崩离析、萎靡不振、束手无策的景象。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3 日—16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9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62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²⁶⁷

1852年11月9日星期二于伦敦

随着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个政党的解体以及它们的特征的消失,越来越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这是很自然的。这种需要正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约翰·罗素勋爵在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演说中第一个提出了这个问题^①。他宣称,德比勋爵发出的警报部分地是由于妄加在他约翰·罗素勋爵头上的那些谣言——所谓他持有“极端民主的观点”——而引起的。

“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没有必要再指出,这些谣言是毫无根据的,是荒唐无稽的。”

但是他宣布自己的确是一个民主主义者,接着,他就从毫无害处的意义上阐明了这个词:

“这个国家的人民,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国家的民主。民主也像君主政体和

^① 见本卷第463页。——编者注

贵族政体一样有权享有自己的各种权利。民主并不意味着要削弱任何君权。民主也不想废除上院的任何合法的特权。这种民主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财富的增长、智力的增长，就是那些更加开明的和更加适合于以开明的方法统治世界的观点的形成。但是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我想说，在民主的阵地日益巩固的情况下，不能再使用连我过去也非常熟悉的那种旧的强制作法了。相反，民主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必须有一个法律所认可的合法机构来表现它的力量 and 影响。”^①

对此，《先驱晨报》慷慨激昂地说道：

“约翰·罗素勋爵有两套原则，在他执政的时候使用一套，在他是反对党的时候则使用另外一套。在他执政的时候，他的原则是不做任何事情，而在他不执政的时候，则保证要做一切事情。”^②

如果《先驱晨报》竟把我们在上面援引的约翰·罗素的那些胡言叫作是“做一切事情！”如果它以弗罗斯特、威廉斯以及其他人的命运²⁵¹来警告小个子约翰·罗素，说他搞的是爱戴国王、尊重贵族和保护主教的“民主”，那么，《先驱晨报》所说的“不做任何事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而整个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德比勋爵在上院宣称自己是“民主”的公开反对者，并且谈论民主就像谈论必须与之进行斗争的唯一的党派一样。于是，不可避免的约翰·罗素出场了，他出来研究这种民主的实质，即财富的增长，这种财富的智力的增长，以及它的通过舆论和合法的机构来影响政府的要求的增长。由此可见，民主正是资产阶级即工商业中间阶级的要求。德比勋爵以这种民主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而约翰·罗素勋爵则自告奋勇地充当这种民主的旗手。两人都一致默认：他们本阶级即贵族阶级内部的旧的内江

① 厄·琼斯《虚伪的政策。——罗素在珀斯》。——编者注

② 1852年10月7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1971号第4版。——编者注

已经不能引起国内的任何兴趣。因此，罗素已经准备抛弃“辉格党人”这个称号而改名“民主主义者”——如果这是打倒他的对手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辉格党人实际上将继续扮演过去的角色，正式充当中间阶级的奴仆。由此可见，罗素所提出改组党的计划，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给党起一个新的名称。

约瑟夫·休谟也认为必须成立一个新的“人民党”。然而，他说，不能根据保障租佃者权利的要求和类似的建议来成立这样的党。“这样办，在 654 个代表中，您甚至连 100 个也联合不起来。”那么，他的灵丹妙药是什么呢？

“人民同盟——或人民党，或人民联盟——应当一致赞同一点，譬如说，秘密投票；实现这一点之后，继续一步一步地实现其他各点。尽管这个运动只能由下院中为数不多的一些代表发起，但是运动要获得成功需要议会外的人民和选民懂得他们必须参加，并支持议会中的那个小小的人民党。”^①

这个休谟曾经是人民宪章¹⁵⁷的起草人之一。后来他由人民宪章和它的六条要求退到了财政改革和议会改革派²⁴²的那个仅仅由三条要求构成的“小宪章”²⁶⁹。而现在我们看到，他已经满足于秘密投票这一条了。从他给《赫尔报》的一封信的结尾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自己的新的灵丹妙药也只寄托多么小的希望：

“请告诉我，有多少编辑会冒险去支持在议会保持目前这样的成分的情况下永远不可能执政的政党？”^①

因此，既然这个新的政党不打算在目前多少改变一下议会的成分，而只限于要求秘密投票，那么连它自己也承认，它是永远不可能

^① 约·休谟[《给〈赫尔报〉编辑部的信。1852年9月15日》]。——编者注

执政的。建立这样一个软弱的政党，而且已公开承认是软弱的政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除了约瑟夫·休谟的尝试之外，还有一个创立新政党的尝试。这就是所谓的民族党。这个党不要人民宪章，而想以普选权作为自己唯一的口号，于是它就恰好忽视了那些能够把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变为全民运动并使这个运动得到人民支持的条件。下面我还有机会谈到这个民族党。它是由那些力图争得体面地位的前宪章派，以及那些企图使宪章运动听从自己支配的激进派即中间阶级思想家组成的。站在他们后面的——不管“民族党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信徒，这些人驱使和利用他们为自己打先锋。

因此，任何人都很清楚，所有这些可悲的妥协和后退行为，所有这种追逐蝇头小利的行为，所有这些动摇不定和江湖妙药都只能证明：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城门口²⁷⁰；有决定意义的斗争即将到来；反对党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和无力反抗；一切建立新的防御中心的企图仅仅在所谓“后退政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民族党”从宪章后退到普选权；约·休谟从普选权后退到秘密投票；其他的人从秘密投票后退到各选区一律平等，如此等等，最后一直到小个子约翰·罗素为止，除了民主这样一个空洞的字眼之外，他已经提不出任何可以作为口号的东西。约翰·罗素勋爵的民主，实际上就是民族党、休谟的“人民党”和其他一切有名无实的政党的最终目标——假定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党具有某种生命力的迹象的话。

一方面由于进入物质繁荣时期而产生了政治上的萎靡不振和冷淡态度，而另一方面却坚信托利党人毕竟是一个有威胁的祸害；一方面资产阶级的领袖确信他们很快就会需要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某

些有声望的领袖知道人民过于冷淡,因而不可能在目前发动一个独立的运动,——所有这些情况使各个政党努力做到相互友好,并使议会之外的反对党的各个派别,从最激进的到最不激进的,力图通过互相让步结成联盟,直到最后重新得出了关于要求罗素勋爵所乐于称之为民主的东西的结论。

关于建立一个所谓的“民族党”的企图,厄内斯特·琼斯发表了以下的公正的见解:

“人民宪章是现行政治改革的最全面的措施,宪章派是大不列颠政治和社会改革者的唯一的真正的民族党。”^①

而宪章派执行委员会²⁷¹的委员之一罗·乔·甘米奇是这样告诉人民的:

“你们拒绝中间阶级的合作吗?当然不,如果这种合作是根据公正的、光明正大的条件提出的话。什么条件呢?宽松的和简单的条件。要承认宪章,而在承认宪章之后就同它的为了实现它已经组织起来的朋友联合起来。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那么你们不是反对宪章本身,就是因自己的阶级优势而自傲,以为它可以给你们领导权。在第一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忠实的宪章派会同你们结成同盟;在第二种情况下,没有一个工人会这样损害自己的尊严而屈从你们的阶级偏见。工人只能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同时也接受任何真诚的帮助,但是他们的行动方针是:他们要想得救,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②

目前,宪章派的群众也被物质生产吸引住了。但是党的核心到处都在重新组织起来,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都重新建立了联系。一旦商业

① 厄·琼斯《虚伪的种族》,见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伦敦)第23号第1版。——编者注

② 罗·乔·甘米奇《上流社会的民主》,见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伦敦)第23号第7版。——编者注

和政治的危机到来,目前宪章运动总参谋部毫不声张的活动就会在整个大不列颠显示出重要作用。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13 日—16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5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6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²⁷²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 1852 年
10 月 25 日—12 月 6 日
1853 年以小册子形式在巴塞尔
出版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并参考《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1960 年德文版第 8 卷翻译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ss

zu Köln.

Basel,

Duchbruderei von Chr. Kräftl.

1853.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
巴塞尔第1版的扉页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前 言

1851年5月10日,诺特荣克在莱比锡被捕²⁷³;不久以后,毕尔格尔斯、勒泽尔、丹尼尔斯、贝克尔等人也被捕了²⁷⁴。1852年10月4日,科隆陪审法庭开始审讯被捕者,他们被指控犯了反对普鲁士国家的“密谋叛国”罪。这样,审前羁押——单独监禁——竟拖了将近一年半之久。

在诺特荣克和毕尔格尔斯被捕时,查获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一个共产主义宣传协会的章程)、同盟²⁷⁵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以及一些地址和印刷品²⁷⁶。诺特荣克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出8天以后,科隆才开始搜查和逮捕²⁷⁷。可见,如果当时还能发现一些东西的话,那么现在,无疑一切都已经无影无踪了。实际上,查获到的只不过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信件。过了一年半之久,当陪审法庭终于审讯被捕者的时候,原告方面所掌握的真实材料一份也没有增加。可是,据检察机关(以冯·泽肯多夫和泽特为代表)断言:普鲁士的整个国家机构曾进行了极其紧张的多方面的活动。它们

究竟干了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审前羁押异乎寻常地一再拖延，理由说得非常巧妙。最初，说什么萨克森政府不愿把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引渡给普鲁士。科隆的司法机关曾向柏林的内阁要求引渡，但是没有结果；柏林的内阁也曾向萨克森当局要求引渡，但是也没有结果。其实，萨克森政府已经同意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已经被引渡。最后，到了1851年10月，事情有了一些进展，材料终于交给科隆上诉法院的检察院。检察院作了决定，认为“缺乏起诉所必需的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²⁷⁸。司法机关的这种敬业精神是由于前不久刚颁布的纪律法¹⁶¹所致，这一法律规定：普鲁士政府有权清除它不称心的任何一个司法官员。这一次，审判由于缺乏犯罪构成而宣告延期。而在下一个陪审法庭开庭季度，审判则不得不由于材料太多而延期。据说，文件太多了，起诉人来不及细心研究。起诉人慢吞吞地细心研究了材料，起诉书²⁷⁹交给了被告，规定在7月28日开庭审讯。这时，这个案件的政府主要台柱警察局长舒尔茨病倒了。由于舒尔茨的健康欠佳，被告们不得不再坐3个月的牢。好在舒尔茨死了，公众也已经迫不及待，政府才不得不把幕布拉开。

在这整个时期里，科隆警察局、柏林警察总局、司法部和内务部经常对侦查的过程进行干涉，同样，后来它们的可尊敬的代表施梯伯也经常以证人身分对科隆举行的公开的法庭审讯进行干涉。政府成立了一个在莱茵省的编年史上空前未有的陪审团。其中除了上层资产阶级的成员（黑尔施塔特、莱顿、约斯特），还有城市贵族（冯·比安卡、冯·拉特），乡绅（黑布林·冯·兰岑瑙尔，菲尔斯滕贝格男爵等人），两个普鲁士参议：一个是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一个是普鲁士教授（克罗伊斯勒）。由此可见，在这个陪审团中，德国的

各统治阶级都有代表,而且也只有它们才有代表。

有了这样一个陪审团,普鲁士政府似乎可以选择一条直路,可以组织一次完全有倾向的审判了。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莱克等人承认属实的文件和从他们那里查获的文件,的确丝毫不能证实有什么密谋;这些文件根本不能证实法兰西刑法典²⁸⁰所规定的任何行为的存在,而只是不容置辩地证实被告们对现存政府和现存社会的敌意。但是,立法者的智力所忽略的东西可以由陪审员的良心来加以弥补。被告们让他们对现存社会的敌意不违犯法典的任何一个条文,这难道不是他们的一种奸计吗?没有列入治安卫生条例的病名录的疾病难道就不传染了吗?如果普鲁士政府仅仅是根据实有的材料证明被告们是一些有害的人,而陪审团满足于通过判决被告“有罪”使他们不致为害,那么谁能攻击政府和陪审团?谁也不能,除非是那种呆头呆脑的幻想家。因为这种人认为,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的统治阶级非常强大,只要它们的敌人停留在辩论和宣传的范围内,也可以给他们以自由活动的余地。

然而,普鲁士政府自己把政治审判的康庄大道堵塞了。由于审判异乎寻常地一拖再拖,由于内阁对侦查的过程进行直接干涉,由于暗示将有出乎意料的骇人听闻的事件,由于大肆吹嘘什么全欧洲性的密谋已被揭穿,由于令人发指地虐待被捕者,这个案件便扩大成为一个大案,成为欧洲报刊注意的中心,公众的猜疑的好奇心达到了顶点。普鲁士政府已经使自己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原告方面为了顾全面子不得不提出证据,而陪审团为了顾全面子也不得不要求证据。陪审团本身已经站在另一个陪审团——社会舆论的陪审团面前。

政府为了补救第一次失策,必然又再一次失策。在侦查时执行检察官职务的警察,在审讯时不得不以证人的身分出面。除了平常的起

诉人以外，政府还得再物色一个不平常的起诉人；除了检察机关以外，还得叫警察出面；除了泽特和泽肯多夫以外，还得派出施梯伯和他的维尔穆特、他的鸟儿格赖夫以及他的小家伙戈尔德海姆。为了用特效的警察手段不断向司法当局的起诉提供它白费力气、捕风捉影地寻找的事实，第三种国家力量对法庭的干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法庭很了解这种情况，所以庭长、法官和检察官一个个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让给警务顾问兼证人施梯伯，并经常躲在他的背后。在阐明检察院无法找到的“客观的犯罪构成”所依据的这些警察启示以前，我们还要再说几句开场白。

从人们在被告那里查获的文件以及他们本人的供词中发现：曾经有过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它的中央委员会最初设在伦敦。1850年9月15日，这个中央委员会分裂了²⁸¹。多数派——起诉书称它为“马克思派”——把中央委员会²⁸²迁往科隆。少数派——他们后来被科隆人开除出同盟——在伦敦组织了独立的中央委员会，并在伦敦和大陆上建立了宗得崩德²⁸³。起诉书把这个少数派及其追随者叫作“维利希—沙佩尔派”。

泽特和泽肯多夫硬说，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分裂是由某些纯私人的纠葛引起的。早在泽特和泽肯多夫以前，“侠义的维利希”就已经在伦敦流亡者中间散布了关于分裂的原因的卑鄙无耻的流言蜚语，而且利用阿尔诺德·卢格先生这个欧洲民主派中央⁶¹这辆马车的第五个轮子以及其他类似的人作为甘愿在德国和美国报刊上散播这类流言蜚语的渠道²⁸⁴。民主派曾经认为，只要即席把“侠义的维利希”描绘成共产党人的代表人物，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共产党人。“侠义的维利希”方面也认为，“马克思派”不出卖德国的秘密协会，特别是不让科隆中央委员会去接受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慈父般的监护，就

不可能揭露分裂的原因。现在这些情况再也不存在了,因此,我们不妨从 1850 年 9 月 15 日举行的伦敦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的记录中引证几段话。

马克思在说明他的关于分裂的建议时,曾经说过以下的一段话:“少数派用教条主义观点代替批判观点,用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唯物主义观点。少数派不是把现实关系、而仅仅把意志看作革命的动力。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 15 年、20 年、50 年的内战和国际斗争,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笨拙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正像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像民主派一样,用革命的空话代替革命的发展”等等。

沙佩尔先生作了回答,他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发表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件事情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先动手去砍掉别人的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沙佩尔甚至保证说,一年以后,即 1851 年 9 月 15 日,有人将要把他的脑袋砍掉。)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了,因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躺下睡大觉,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轮到我们,我们就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见解”等等。

由此可见,中央委员会的分裂并不是由私人原因引起的。但是,如果说是原则性分歧,那也是不对的。沙佩尔—维利希派从来不以具有自己的思想为荣。他们只有别出心裁地曲解别人的思想的本领,他

们把别人的思想奉为信条,并且认为已经把这些思想连同词句都掌握了。如果指责维利希—沙佩尔派是“实干派”也同样是错误的,除非把实干理解为在酒徒的叫嚣、臆想的密谋和毫无内容的表面的联系掩盖下的无所作为。

二

狄 茨 档 案

在被告那里查获的《共产党宣言》是二月革命前出版的,几年来一直公开出售,无论从它的形式或者从它的使命来说,都不可能是“密谋”的纲领。被查获的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只谈到共产党人对未来的民主派政府的态度,因而根本没有涉及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府。最后,章程是一个秘密的宣传协会的章程,但是,在法兰西刑法典里并没有规定要惩罚秘密的协会。这种宣传以破坏现存社会为最终目的,但是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①,以后还可能灭亡十次,以至最终灭亡,而现存社会决不会因此掉一根毛。共产党人能够帮助加速资产阶级社会瓦解的过程,但是可以让资产阶级社会去瓦解普鲁士国家。如果有人把推翻普鲁士国家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并且告诉人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破坏社会,那么,他岂不就是一个为了清除道路上的粪堆而打算炸毁地球的疯狂的工程师。

但是,既然同盟的最终目的是**推翻社会**,那么它的手段必然是**政治革命**,而推翻社会包含有推翻普鲁士国家的意思,就像地震包含有

① 指 1807 年 7 月 7 日提尔西特和约后普鲁士降到拿破仑法国附属国地位。——编者注

破坏鸡窝的意思一样。然而被告们却抱有这样一种罪恶观点：没有他们，当前的普鲁士政府也会垮台。因此，他们并没有组织过目的在于推翻当前的普鲁士政府的同盟，也不曾犯过任何“密谋叛国”罪。

什么时候曾经有人控告过第一批基督徒图谋打倒任何一个罗马土地方官呢？普鲁士的国家哲学家们，从莱布尼茨到黑格尔，都致力于推翻神，可是，如果我要推翻神，那我也同样要推翻神所恩赐的国王。难道曾经有人以危害霍亨索伦王朝的罪名追究过他们吗？

这样看来，事情可以任意翻转和颠倒，已发现的犯罪构成在舆论的阳光之下像幽灵一样消失了。检察院依然在诉苦：“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马克思派也真够狡猾的，侦查了一年半还没有给现有的犯罪构成提供任何一点东西。

这样的苦楚是需要帮助解除的。维利希—沙佩尔派就和警察当局串通起来完成了这项工作。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派的接生婆施梯伯先生是怎样把这一派拖进科隆案件中去的。（见施梯伯1852年10月18日在法庭上的证词。）

1851年春季，当施梯伯以保护工业博览会的参观者不受坏蛋和小偷之害为名而逗留在伦敦²⁸⁵时，柏林警察总局寄给他一份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的复制品。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我特别注意密谋的档案。根据从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来看，这个档案一定是在伦敦的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狄茨的人手里，档案里面一定有同盟盟员的全部信件。”

密谋的档案？同盟盟员的全部信件？但是狄茨曾经是维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秘书。因此，如果说他那里有密谋的档案，那就是维利希—沙佩尔派的密谋的档案。如果说狄茨那里有同盟的信件，那只能是敌视科隆被告们的宗得崩德的信件。但是，查阅一下从

诺特荣克那里查获的文件可以另有发现,即这些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奥斯瓦尔德·狄茨这样一个档案保管人。在莱比锡的诺特荣克怎么能知道在伦敦的“马克思派”本身所不知道的事情。

施梯伯不能直截了当地说:陪审员先生们请注意!我在伦敦有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发现。很遗憾,这一发现所涉及的密谋,同科隆的被告们毫不相干,科隆的陪审员不能根据它作出判决;但是它能够提供把被告们单独监禁一年半的口实。施梯伯是不能这样说的,为了把在伦敦发现的线索和偷来的文件同科隆案件表面上联系起来,就有必要把诺特荣克牵连到这个案件里去。

于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有人建议他用现金去收买奥斯瓦尔德·狄茨手中的档案。这不过是这样一事情:有一个叫作罗伊特的普鲁士密探,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共产主义协会,和狄茨住在同一幢房子里。他乘狄茨不在家,撬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文件。施梯伯先生很可能为这种偷窃行为而付给罗伊特一笔钱,但是,如果这一勾当在施梯伯逗留伦敦时被人发觉,那么施梯伯他就难免要到范迪门地²⁸⁶走一趟。

1851年8月5日,施梯伯在柏林收到了从伦敦寄来的“用结实的油布包裹”的狄茨档案,即一大包文件,共有“60份”。这是施梯伯发誓证实的,同时他还发誓作证说,在他1851年8月5日收到的包裹里面,除了其他东西以外,还有柏林总区部1851年8月20日的书信。如果有人一定要说,施梯伯担保他在1851年8月5日收到了1851年8月20日的信,是在作伪证,那么他会振振有词地回答说,普鲁士王室顾问和福音书作者马太都有权利创造这种时间顺序上的奇迹。

顺便提一下。从维利希—沙佩尔派那里偷走的文件的清单和这些文件的日期可以看出,维利希—沙佩尔派虽然对罗伊特撬桌行窃

有所防备,但还是想出高招让文件被偷走,并让文件落到普鲁士警察当局手里。

当施梯伯得到了用结实的油布包裹的这个宝贝时,他简直高兴得心花怒放。他发誓说:“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我的眼前了。”但是,这个有关“马克思派”和科隆被告们的宝贝究竟是些什么货色呢?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词,什么也没有,根本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

“标有‘1850年9月17日于伦敦’字样、显然是构成马克思派核心的几个中央委员会委员关于因1850年9月15日发生的著名分裂而退出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原声声明。”

施梯伯本人是这样说的,但是,即使在提出这个无害的证词时,他也不能限于简简单单地叙述一下事实。他不得不把它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使它成为值得警察重视的东西。上述的原声声明除了提到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及其朋友们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工人协会²⁸⁷、但决不退出“共产主义者协会”这几行字以外,别无任何内容。

施梯伯可以为他的通信者省下油布,为他的上司省下邮资。施梯伯只要翻阅一下1850年9月份的几家德国报纸,他就会发现黑字印在白纸上的“马克思派核心”的一项声明^①,他们在声明中宣布同时退出流亡者委员会¹⁷⁰和大磨坊街的工人协会。

可见,施梯伯在调查工作中获得的直接成果,就是“马克思派核心”于1850年9月17日退出大磨坊街的公开的协会这一闻所未闻的发现。“科隆密谋的全部线索都已经暴露在他的眼前了。”但是公众并不相信他的眼睛。

① 即《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8月1日—9月10日的财务报告》。——编者注

三

舍尔瓦尔的密谋

然而，施梯伯懂得从偷来的宝贝中捞好处。他 1851 年 8 月 5 日收到的文件使他发现了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这些文件中有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使阿道夫·迈尔的 6 份报告（上面标有“巴黎”的字样）和巴黎总区部给维利希—沙佩尔派中央委员会的 5 份报告。（施梯伯于 10 月 18 日在法庭上作的证词）。施梯伯到巴黎作了一次愉快的外交旅行，并且在那里亲自结识了伟大的卡尔利埃；这个人刚刚在臭名远扬的金条彩票事件^①中证明他虽然是共产党人的大敌，但更是他人私有财产的挚友。

“因此，我在 1851 年 9 月前往巴黎。当时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给了我极其热情的支持…… 在法国警探的帮助下，敏捷而准确地查出了在伦敦的信件上发现的线索；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对他们的一切活动，特别是他们的一切会议和他们的一切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在那里发现了非常危险的东西…… 我不得不向卡尔利埃局长所提出的要求让步，于是在 9 月 4—5 日的午夜采取了果断的行动。”（施梯伯在 10 月 18 日作的证词。）

施梯伯是在 9 月份离开柏林的。我们假定他是在 9 月 1 日离开

^① 见本卷第 193 页。——编者注

的。他到达巴黎最早也得在9月2日晚间。9月4日夜里采取了果断的行动。这样，跟卡尔利埃谈判和采取必要措施的时间，只剩下36小时了。而在这36小时之内，不仅“探查到了”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而且还对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的一切会议、他们的一切信件都进行了“监视”，当然，这一切都只能在“探查到了他们的住所”之后进行。施梯伯的光临不仅激起了“法国警探们”的创奇迹的“敏捷性和准确性”，而且还使得进行秘密活动的首领们变得“热情”起来，在24小时之内进行了那么多的活动，举行了那么多的会议，写了那么多的信件，以致在第二天晚间就可以对他们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3日这一天探查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并且对他们的一切活动，一切会议和一切信件都进行了监视，这还不够。施梯伯还发誓作证说：

“法国警探们找到机会出席了密谋者的一些会议，并听到他们关于在下次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

这样看来，警探们刚刚对会议进行监视，就通过监视找到机会出席了会议；他们刚刚出席了一次会议，会议就变成多次会议；刚刚举行了几次会议，就通过了关于在下次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天。就在施梯伯结识卡尔利埃的那一天，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打听到密谋的各个首领的住所，首领们结识了卡尔利埃的警察局人员，在当天请他们出席自己的会议，并在当天举行了许多次会议来迎合他们，直到急急忙忙地通过关于在下次革命中的活动方式的决议，才同他们分手。

不管卡尔利埃怎样热情，——当然谁也不会怀疑他在政变前3个月内破获共产主义密谋的那股热情，——施梯伯期望于他的东西

要比他所能办到的多。施梯伯要求警察创造奇迹；他不仅要求这种奇迹，而且还相信这种奇迹；他不仅相信这种奇迹，而且还发誓证实这种奇迹。

“当开始行动时，即当采取果断的行动时，我亲自跟一位法国警官一起首先逮捕了法国共产党人的首脑——危险的舍尔瓦尔，他顽强地反抗，于是同他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格斗”。

这就是施梯伯在10月18日作的证词。

“舍尔瓦尔在巴黎曾经谋害过我，而且是在我的住宅里进行的。他在夜里进入了我的住宅，当我们两人格斗时，我的妻子赶来帮我，结果受了伤。”

这就是施梯伯在10月27日作的另一个证词。

4日午夜，施梯伯对舍尔瓦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舍尔瓦尔进行了顽抗。3日午夜，舍尔瓦尔对施梯伯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们之间发生了格斗，在格斗中施梯伯进行了顽抗。但是，就在3日这一天，密谋者和警探之间还充满着友好的谅解，正因为如此，才可能在一天之内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现在看来，不仅施梯伯在3日发觉了密谋者的意图，而且密谋者也在3日发觉了施梯伯的意图。当卡尔利埃的警探们发现密谋者的住所时，密谋者也发现了施梯伯的住所。当施梯伯对密谋者扮演“监视者”的角色时，密谋者对他扮演了采取行动的角色。当施梯伯梦见密谋者的反政府密谋时，密谋者正在组织对他本人的谋害。

施梯伯在他的10月18日的证词中继续说道：

“在这次格斗中（当时施梯伯是进攻的一方），我发现舍尔瓦尔竭力要把一片纸塞进嘴里并要把它吞下去，我好不容易抢救出半片纸来，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

可见,当时这一片纸是在舍尔瓦尔的嘴里用牙齿咬住的,因为只抢救出半片纸来,而另外半片已被他咽下去了。施梯伯和他的同谋者——警官或其他什么人——只有把手伸进“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喉咙里去,才能抢救出另外半片纸来。舍尔瓦尔在这种进攻面前能够进行自卫的最好办法就是咬人。据巴黎的一些报纸报道,舍尔瓦尔真的把施梯伯夫人咬伤了,但是在演这场戏时,跟施梯伯一起在场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位警官。施梯伯明明说,施梯伯夫人是舍尔瓦尔在施梯伯的住所进行谋害时由于赶来帮他才受伤的,如果把施梯伯的证词同巴黎报纸的报道对照一下,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印象:舍尔瓦尔为了夺回施梯伯先生在4日午夜从他嘴里撕下的纸片而在3日午夜咬伤了施梯伯夫人。施梯伯将会这样回答我们:巴黎是个奇迹的城市,拉罗什富科早就说过,在法国一切都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对奇迹的信仰,那就会明白:前一些奇迹的发生是由于施梯伯把一些在不同时间发生的活动硬凑在一起,并把它硬塞在9月3日这一天里;而后一些奇迹的发生则是由于他把在同一个晚间、同一个地方发生的各种不同事件安排在两个晚间和两个地方。现在让我们来把实际情况同他的《一千零一夜》故事比较一下,但首先我们还要谈一个奇迹般的事实,虽然它并不是奇迹。施梯伯把舍尔瓦尔正要咽下去的纸片撕下了一半。在这半片抢救出来的纸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呢?有施梯伯所要寻找的一切。他发誓作证说:

“在这片纸上有给驻斯特拉斯堡的特使吉佩里希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指示以及他的详细地址。”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事实。

我们从施梯伯那里得知，他是在 1851 年 8 月 5 日收到用结实的油布包裹的狄茨档案。1851 年 8 月 8 日或 9 日，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叫施米特的人。看来，施米特对化名旅行的普鲁士警探来说是一个惯用的姓。1845—1846 年，施梯伯曾化名施米特完成了西里西亚山区的旅行，1851 年，他在伦敦的警探弗略里也化名施米特完成了巴黎的旅行。他在巴黎寻找维利希—沙佩尔派密谋的各个头子，而首先发现了舍尔瓦尔。他佯称，他是从科隆逃出来的，曾经给当地同盟出纳处捐助了 500 塔勒。他用德累斯顿和其他各个地方的委托书来证明自己的身分，他谈到了同盟的改组情况，谈到了各个派别的联合情况，因为分裂纯粹是由某些私人纠葛引起的，——当时警察当局已经在宣传团结与和睦了——而且他保证要用上述的 500 塔勒来重新把同盟引向繁荣。施米特在巴黎逐渐地认识了维利希—沙佩尔派同盟支部的各个头子。他不但知道他们的住址，而且还拜访他们，侦查他们的信件，监视他们的活动，钻进他们的会议，并且充当奸细向他们进行煽动。施米特把舍尔瓦尔吹捧得越厉害，越是把他誉为同盟中的一个尚被埋没的伟人，一个至今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就像许多伟大人物所经历的那样）的“首脑”，舍尔瓦尔就越是特别自鸣得意。有一天晚上，施米特和舍尔瓦尔一起去参加同盟的会议，舍尔瓦尔把他写给吉佩里希的一封著名的信在寄出之前念给施米特听了。这样，施米特才知道有吉佩里希这么一个人。施米特说：“既然吉佩里希已经回到斯特拉斯堡，那么我们就应当马上把领取存放在斯特拉斯堡的 500 塔勒的票据寄给他。现在我把保存这笔款项的那个人的住址给您，请您把吉佩里希的住址给我，我可以把它当作一个证件寄给吉佩里希准备找的那个人。”施米特就这样弄到了吉佩里希的住址。当天晚上，舍尔瓦尔把写给吉佩里希的信寄出了，过了一刻钟，按

照来电指示，逮捕了吉佩里希；在他的住所进行了搜查，那封著名的信被截获了。吉佩里希是在舍尔瓦尔被捕以前被捕的。

此后不久，施米特告诉舍尔瓦尔说，一个名叫施梯伯的普鲁士警棍已到达巴黎。他不仅已打听到了施米特的住所，而且据对面的一个咖啡馆的招待说，施梯伯居然商量好要逮捕他施米特。他说，舍尔瓦尔准能把这个卑鄙的普鲁士警察好好教训一顿。舍尔瓦尔回答说：“我要把他扔到塞纳河里去。”他们约定第二天闯进施梯伯的住所，找出某种借口说他在家里，并且要记住他的特征。第二天晚上，我们的这两位英雄真的出动了。在路上，施米特认为，最好舍尔瓦尔进房子里去，而他留在门外放哨。他还说：“你可以问一下看门人，施梯伯不在家，如果看门人让你进去，你就对施梯伯说，你打算跟施彼尔林先生谈谈，打算问他一下，他是否从科隆带来了急需的期票。还有，你的白帽子太惹人注意，民主气味太重。真的！把我的黑帽子戴上吧！”他们交换了帽子。施米特留在外面看守。舍尔瓦尔拉了一下铃，走进施梯伯住的房子。看门人说施梯伯可能不在家，舍尔瓦尔刚想走开，忽然从楼梯上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呵，施梯伯在家。”舍尔瓦尔顺声走去，走到了一个戴绿色眼镜、自称是施梯伯的人的面前。舍尔瓦尔把早就商量好的关于期票和施彼尔林的那一番话说了一遍。施梯伯急忙打断他的话：“这可不行，您跑进这所房子里来打听我，等有人把住所告诉了您，然后您就准备离开……我看这是非常可疑的。”舍尔瓦尔很不客气地作了回答。施梯伯按了按铃，马上出来几个小娄罗把舍尔瓦尔包围起来；施梯伯一把抓住他那装着一封信的上衣口袋。虽然这不是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指示，但毕竟是吉佩里希给舍尔瓦尔的信。舍尔瓦尔竭力想把信咽下去，施梯伯把手伸进他的嘴里。舍尔瓦尔连咬带推，又动手打人。当施梯伯拼命抢救信的这一

半的时候，他的夫人则拼命抢救信的另一半，而且由于她的忠心而受了伤。这一场面所掀起的喧闹声惊动了许多邻居，他们纷纷从自己的房间里走出来。这时，施梯伯手下的一个小娄罗从楼梯栏杆上面扔下一块金表来，当舍尔瓦尔高喊“密探”的时候，施梯伯及其同伙就一齐高喊“捉贼！”。看门人把金表送来，这时“捉贼”的喊声四起。舍尔瓦尔被逮住了，他在门外已找不到他的朋友施米特了，而迎接他的却是四五个士兵。

在事实面前，施梯伯发誓作证的一切奇迹都云消雾散了。他的警探弗略里活动了3个多星期；他不仅发现了密谋的线索，而且还帮助捏造了这些线索。施梯伯只需要从柏林来一趟，并且高喊一声：我来到了，我看到了，我胜利了！他可以把现成的密谋当作一件礼物赠给卡尔利埃。而要求卡尔利埃的只是采取果断行动的“热情”。施梯伯夫人没有必要在3日被舍尔瓦尔咬伤，因为施梯伯先生是在4日才把手伸进舍尔瓦尔的嘴里去的。在吉佩里希的地址以及重要指示被咽下一半之后，它们无须像从鲸鱼的肚子里爬出来的约拿那样完全从“危险的舍尔瓦尔”的大嘴里爬出来。唯一算得上奇迹的，不过是陪审员对奇迹的信仰，施梯伯竟敢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和盘托出他臆造的谎言。他们真不愧是狭隘臣民意识的不折不扣的体现者！

施梯伯(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

“在监狱里，我把舍尔瓦尔寄到伦敦去的一切原本报告都给他看了，结果使他大吃一惊，他发觉我已了解一切，于是他就全都向我交代了。”

施梯伯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东西，决不是舍尔瓦尔寄到伦敦的那些原本报告。这些原本报告不过是施梯伯后来让别人跟狄茨档

案里的其他文件一起从柏林寄来的。他最初拿给舍尔瓦尔看的东西是舍尔瓦尔刚刚收到的由奥斯瓦尔德·狄茨署名的一封通知信以及维利希最近写的几封信。施梯伯究竟是怎样弄到这些信的呢？原来当舍尔瓦尔同施梯伯及其夫人又咬又打的时候，勇敢的施米特—弗略里跑到舍尔瓦尔太太（一个英国女人）那里去，并告诉她，——当然，这位伦敦的德国商人弗略里讲的是英语——她的丈夫被捕了，危险得很，她可以把舍尔瓦尔的文件交给他，以免再损害舍尔瓦尔的名声，舍尔瓦尔委托他把文件转交给第三者。为了证明他是一个真正的使者，他拿出一顶白帽子来，这顶白帽子是他从舍尔瓦尔那里拿过来的，因为它的民主气味太重。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弄到了这些信件，而施梯伯又从弗略里那里得到了它们。

不管怎样，施梯伯现在已拥有比以往在伦敦时更为有利的作战基地了。他能够偷到狄茨的文件，同时还能够捏造舍尔瓦尔的口供。这样，他就迫使他的舍尔瓦尔（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供出“他同德国的联系”的问题：

“他长期住在莱茵地区，在这期间，1848年住在科隆。在那里，他结识了马克思，并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后来他在巴黎，在那里现有的一些人的基础上积极协助扩大同盟。”

舍尔瓦尔是1846年在伦敦由沙佩尔介绍并接收入盟的，而马克思当时在布鲁塞尔，而且还根本不是同盟²⁷⁵盟员。可见，舍尔瓦尔不可能是1848年在科隆被马克思接收加入该盟的。

三月革命爆发后，舍尔瓦尔到莱茵普鲁士呆了几个星期，但后来他又从那里回到伦敦，从1848年春末到1850年夏天他一直呆在伦敦。这样看来，他在这一个时期不可能“在巴黎积极协助扩大同盟”，除非能创造时间顺序的奇迹的施梯伯还能创造空间的奇迹，甚至还

能使第三者有一种分身的本领。

马克思只是被驱逐出巴黎之后，于1849年9月在伦敦加入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时，才同包括舍尔瓦尔在内的几百名工人有了一面之交。由此可见，马克思不可能在1848年在科隆认识他。

舍尔瓦尔起初向施梯伯真实地交代了所有这些问题。施梯伯企图迫使他招假口供。他是否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呢？只有施梯伯本人的证词才能说明这一点，因而，回答是否定的。当然，对施梯伯来说，全部问题就在于使舍尔瓦尔同马克思之间有一种虚构的联系，从而使科隆被告们和巴黎密谋之间有一种生造的联系。

施梯伯刚一感到必须详尽地述说舍尔瓦尔及其同伙跟德国的联系和通信的问题的时候，他甚至不敢提一下科隆，可是却洋洋自得地大谈特谈不伦瑞克的黑克、柏林的劳伯、美因茨的莱宁格尔和汉堡的蒂茨等等，等等，一句话，大谈特谈维利希—沙佩尔派。施梯伯说，这一派“手里有同盟的档案”。由于粗心大意，档案已从该派的手里转到了他的手里。在这个档案里，他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在1850年9月15日伦敦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给伦敦或者给马克思个人写过任何信件。

他通过施米特—弗略里从舍尔瓦尔太太那里骗取了她丈夫的文件。但是，他仍然没有发现舍尔瓦尔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任何信件。为了帮助解除这种苦楚，他强迫舍尔瓦尔按照他的口授笔录：

“他和马克思的关系很紧张，原因是，虽然中央委员会在科隆，但是马克思还是要求同他通信。”

如果施梯伯没有发现马克思同舍尔瓦尔之间在1850年9月15日以前的来往信件，那不过是由于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舍尔瓦

尔同马克思完全断绝了通信联系。上吊吧，费加罗！你再不要想到这一点了！^①

普鲁士政府侦查了一年半所搜集到的对付被告们的材料（一部分是由施梯伯本人提供的），否定了被告们同巴黎支部、同德法密谋的任何联系。

1850年6月的伦敦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证明：巴黎支部在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前就已经解散了。狄茨档案中的6封信证明：巴黎各支部是在中央委员会迁到科隆以后由维利希—沙佩尔派的特使阿·迈尔重新组织起来的。该档案中的巴黎总区部的信件证明：这个总区部极端敌视科隆中央委员会。最后，法国的起诉书也证明：对舍尔瓦尔及其同伙所指控的一切事件只是在1851年才发生的。因此，泽特（在11月8日的法庭上）不顾施梯伯的种种揭露，认为只能稍微猜测一下，马克思派可能于某年某月通过某种方式参与了巴黎的某种密谋，但是人们对于这个密谋的时间和密谋本身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泽特是根据上级指示认为这是可能的。那些妄谈泽特有洞察力的德国报刊，它们的迟钝是可以想见的！

普鲁士警察当局老早就企图在公众面前把马克思并通过马克思把科隆被告们说成是德法密谋的参与者。在审理舍尔瓦尔的案件时，警探贝克曼给《科隆日报》寄去下面这样一则标有“1852年2月25日于巴黎”字样的简讯：

“有些被告已经潜逃，其中有个名叫阿·迈尔的人，据说是马克思及其同伙的代理人。”

^① 马克思在这里以改写的方式引用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一句台词。——编者注

在这以后,《科隆日报》刊登了马克思的一个声明^①,声明说:“阿·迈尔是沙佩尔先生和前普鲁士尉官维利希的一个密友,他同马克思毫不相干。”现在,就连施梯伯本人在他1852年10月18日作的证词中也声称:“1850年9月15日在伦敦被马克思派开除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派遣阿·迈尔到法国去”云云,甚至还引证了阿·迈尔同沙佩尔—维利希的来往信件。

马克思派的成员之一康拉德·施拉姆正赶上巴黎在迫害外国人,于1851年9月间在一家咖啡馆里和其他五六十个顾客一起被捕,他被指控参与爱尔兰人舍尔瓦尔所领导的密谋,并被监禁了将近2个月。10月16日,一个德国人^②在警察局的监狱里访问了他,向他说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我是普鲁士官员。您知道,在德国各地,特别是在科隆,由于共产主义协会被破获,已经有许多人被逮捕。只要有一封信提到什么人的名字,他就要遭到逮捕。目前,政府的处境相当尴尬,因为它逮捕了許多人,但不知道他们是否同这个案子有牵连。我们知道,您并没有参加过法德密谋,但是,您很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您无疑很了解德国共产主义联合会的一切详情。假如您能给我们提供有关这一方面的必要情报,并愿意比较准确地指出哪些人是有罪的,哪些人是无罪的,那我们将感激不尽。这样,您就能帮助许多人获得释放。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把您的话写成正式记录,您不必为这些话担心”等等。

当然,施拉姆向这位温和的普鲁士官员下了逐客令,并向法国内阁抗议这类访问,于是,施拉姆在10月底被驱逐出法国。

关于施拉姆是“马克思派”的成员,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

① 见本卷第274页。——编者注

② 可能是格莱夫。——编者注

从狄茨那里发现的关于退出协会的一项声明中了解到的。关于“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毫无关系，这一点是普鲁士警察当局自己向施拉姆承认过的。如果“马克思派”同舍尔瓦尔的密谋之间的联系能够得到证实，那么，这不可能发生在科隆，而只能发生在巴黎，因为该派的一个成员跟舍尔瓦尔同时在那里坐牢。但是，普鲁士政府最怕舍尔瓦尔和施拉姆之间的对质，因为这种对质事先会把政府希望从巴黎案件中得到的、用以对付科隆被告们的全部结果统统推翻。法国的检察官在释放施拉姆时作出的判决，承认科隆案件和巴黎密谋毫无关系。

施梯伯作了最后的尝试：

“至于上述的法国共产党人的头目舍尔瓦尔，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最后，从马克思本人向一个警探所作的一项秘密声明中才弄清楚，原来此人曾因伪造期票被关进亚琛监狱，1845年越狱潜逃，1848年，在当时的风潮中被马克思接收入盟，并以同盟特使的身分被派往巴黎。”

马克思不可能对这位家神——施梯伯的警探说，他于1848年在科隆把早在1846年就已被沙佩尔在伦敦接收入盟的舍尔瓦尔接收入盟；或者他派舍尔瓦尔住在伦敦，并同时让他在巴黎进行宣传；同样，马克思也不能在施梯伯提供证词之前对施梯伯的第二个我——老牌警探说，舍尔瓦尔于1845年在亚琛坐过牢并伪造过期票，这一点他恰好是从施梯伯的证词中知道的。这一类逆序法只是给施梯伯之流准备的。古代世界留下了它的垂死的角斗士²⁸⁸，普鲁士国家会留下它的发誓的施梯伯。

很久很久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打听，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但是毫无结果。9月2日晚上施梯伯到了巴黎。4日晚上舍

尔瓦尔被捕,5日晚上他被从他的牢房押到一个灯光暗淡的房间里去。施梯伯在那里,跟施梯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法国警官、他是阿尔萨斯人,德语说得结结巴巴,但是完全能懂,具有警察的记忆力,对飞扬跋扈而又卑躬屈节的柏林警务顾问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在这个法国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施梯伯用德语说:“您听着,舍尔瓦尔先生,您用法国姓和爱尔兰护照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很清楚。我们了解您,您是莱茵普鲁士人,您的名字叫K.。您能否逃避一切后果,这完全取决于您自己,而且取决于您老老实实地把一切都向我们坦白出来”如此等等。

舍尔瓦尔表示拒绝。

施梯伯说:“有这么一个人,他伪造了期票并从普鲁士越狱潜逃,现已被法国当局引渡给普鲁士。因此我再一次提醒您,您得考虑考虑,这是一个关系到12年单独监禁的问题。”

法国警官说:“我们给这个人时间,让他在自己的牢房里好好想一想。”

舍尔瓦尔被押回他的牢房。

当然,施梯伯不能把话说穿,他不能向公众承认,他企图用引渡和12年单独监禁的威胁手段来吓唬舍尔瓦尔,逼他招出假口供。

但是,施梯伯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个舍尔瓦尔到底是谁。他在陪审员面前仍然叫他舍尔瓦尔,而不是叫K.。不仅如此,施梯伯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在哪里。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他仍然硬说那个人是在巴黎。律师施奈德第二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质问说:“曾经再三提到的舍尔瓦尔现在是不是在伦敦?”施梯伯狼狈不堪,只好回答说,“他不能透露有关这一方面的任何消息,而只能告知关于舍尔瓦尔躲在巴黎的传闻”。

普鲁士政府总是逃脱不了一贯被愚弄的命运。法国政府允许它

从火中取出德法密谋之栗，但是不允许它把栗子吃掉。舍尔瓦尔竟能博得法国政府的好感，法国政府让他在巴黎陪审法庭结束案件的审理工作以后过几天就跟吉佩里希一起逃到伦敦去。普鲁士政府本以为可以让舍尔瓦尔作为科隆案件的工具，但是普鲁士政府只不过为法国政府又物色了一个密探。

在舍尔瓦尔假逃跑的前一天，有一个普鲁士的无赖来到他那里；这个人身穿黑礼服，镶着袖头，长着蓬乱的小黑胡子，留着稀稀落落的，浅灰色短发，总之，这是一个挺像样的小伙子。后来据介绍，这个人是普鲁士的警监格赖夫，随后他也自我介绍说他是格赖夫。格赖夫到他这里来，是带着他绕过警察局长而直接从警务大臣那里得到的入门证。愚弄一下心爱的普鲁士人，警务大臣感到很开心。

格赖夫说：“我是普鲁士官员，是奉命前来同您谈判的。没有我们，您永远出不去。我向您建议，您应当向法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它把您引渡给普鲁士；它早就答应我们这样做了。我们需要您在那里作科隆的证人。在您完成自己的使命和案件结束后，我们一定会把您释放，决不食言。”

舍尔瓦尔说：“我没有你们也能出去。”

格赖夫确有把握地说：“这不可能！”

格赖夫还让人召来吉佩里希，建议他以共产党特使的身分到汉诺威去5天。而这个建议也没有奏效。第二天，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就溜之大吉了。法国当局暗自高兴，不幸的紧急情报传到了柏林，而施梯伯在10月23日仍然发誓作证说，舍尔瓦尔呆在巴黎；甚至到了10月27日，他还是不能提供任何消息，而只是从传闻中得知舍尔瓦尔藏“在巴黎”。当时，警监格赖夫在科隆审讯期间曾三次到伦敦去找舍尔瓦尔，顺便从他那里打听一下奈特在巴黎的住址，指望从他手里

收买到对付科隆人的证词。这一招不灵。

施梯伯有理由把他同舍尔瓦尔的关系隐瞒起来。因此，K. 仍然是舍尔瓦尔，普鲁士人仍然是爱尔兰人，施梯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也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①。

在舍尔瓦尔同吉佩里希的来往信件中，泽肯多夫—泽特—施梯伯的三人合唱队终于得到了它所需要的东西。

“卡尔·穆尔是吸血鬼，
我把他当作榜样。”^②

为了使舍尔瓦尔给吉佩里希的信深深地印在代表陪审法庭的300名主要纳税者的迟钝头脑里去，这封信被荣幸地宣读了3遍。凡是熟悉内情的人，透过这种无害的吉卜赛人热情，一眼就能识破这是

① 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甚至在‘黑书’289里，施梯伯还是不知道舍尔瓦尔到底是谁。在该书第2册第38页上No 111‘舍尔瓦尔’写着：参见克雷默，而No 116‘克雷默’则写着：‘正如从No111中所看到的，克雷默曾化名舍尔瓦尔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展开了极其广泛的活动。他也用过弗兰克这个盟内代号。1853年（应当是1852年）2月，他化名舍尔瓦尔被巴黎陪审法庭判处8年监禁，但很快就逃出监狱，到伦敦去了。’该书第2册里载有按字母顺序排列并依次编号的嫌疑分子的履历，施梯伯在这一册里对舍尔瓦尔还是一无所知。他已经忘记了，他在第1册的第81页上曾这样承认过：‘舍尔瓦尔就是一个名叫约瑟夫·克雷默的莱茵官员的儿子，他（好一个他！老子还是儿子？）竟用自己石版匠的手艺伪造期票，因而被捕，但在1844年他从科隆（不对，从亚琛！）的监狱逃了出来，先到英国，后来又回到巴黎。’大家不妨把这一点同上面引证过的施梯伯在陪审员面前提出的证词比较一下。警察当局在任何时候都绝对不会说真话。”——编者注

② 引自海涅的《梦幻》。——编者注

一套企图吓唬自己和别人的小丑把戏。

其次，舍尔瓦尔及其同伙跟民主派对 1852 年 5 月第二个星期日的那种能奏奇效的力量抱有共同的希望；他们决定在这一天参加革命事变。施米特—弗略里力图使这种固定观念具有计划的形式。这样一来，舍尔瓦尔及其同伙就陷入了密谋的法律范畴。因此，由他们提供了一个证据：科隆的被告们并没有组织过反对普鲁士政府的密谋，但舍尔瓦尔派无论如何曾组织过反对法国的密谋。

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施米特—弗略里来制造施梯伯发誓作证的巴黎密谋和科隆被告们之间的虚构的联系。施梯伯—格赖夫—弗略里，这种三位一体在舍尔瓦尔的密谋中起了主要作用。下面我们还会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工作情形。

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

甲是共和主义者，乙自称也是共和主义者。甲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乙受警察当局的委托制造定时炸弹。甲因此被告发。如果制造定时炸弹的不是甲，而是乙，那么，甲的罪过就在于他同乙的关系是敌对的。为了揭发甲，乙被召去做反对他的证人。这就是舍尔瓦尔密谋的可笑之处。

当然，这类逻辑在公众面前已站不住脚了。施梯伯揭露的“事实的”真相已化为一股熏天臭气；检察院还只能是诉苦说“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需要警察创造新的奇迹。

四

原 本 记 录

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庭长指出:“警务顾问施梯伯已经向他宣布,施梯伯还要提供新的重要证据”,为此,他要再一次把上述的证人召来。施梯伯跳到前面,开始了表演。

在这以前,施梯伯讲述了维利希—沙佩尔派的活动,或者简言之,舍尔瓦尔派的活动,即这一派在科隆被告们被捕以前和以后的活动。至于被告们的活动,不论是被捕以前或被捕以后的,施梯伯都只字不提。舍尔瓦尔的密谋是发生在这些被告被捕以后,而施梯伯现在说:

“在这以前,我在我的证词中所讲述的,只不过是这些被告被捕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状况及其盟员的活动。”

这样说来,他承认舍尔瓦尔的密谋“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状况及其盟员的活动”并没有任何关系。他承认他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是毫无用处的。他对自己在10月18日提供的证词如此满不在乎,竟认为继续把舍尔瓦尔和“马克思派”混为一谈简直是多此一举。他说:

“首先还存在着维利希派,到现在为止,该派当中被抓住的只有在巴黎的舍尔瓦尔等等。”

啊哈！这就是说，首脑舍尔瓦尔是维利希派的首领。

但是，施梯伯现在应当提供**最重要的**报告，不仅是**最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最新的和最重要的呵！如果不强调在这以前所提供的证词的无重要性，那么这些最重要的报告就会失去它们的重要性。施梯伯说，在这以前，其实我什么也没有报告，而只是现在我才开始。注意！在这以前，我报告的是跟被告们敌对的舍尔瓦尔派的情况，这其实同案件毫不相干。现在我来报告一下“马克思派”的情况，这次案件涉及到的正是这一派。可是，施梯伯不可能说得那么简单明了。因此他说：“在这以前，我讲述的是被告们被捕以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现在，我要讲述一下被告们被捕以后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他甚至能够用他的那一套独特技巧使纯粹修辞性的词句具有伪证的性质。

科隆的被告们被捕以后，马克思组织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

“这一点可以从已故警察局长舒尔茨悄悄地派进伦敦同盟并跟马克思有直接来往的一个警探^①的证词中看出来。”

这个新的中央委员会作过记录本，而这个“原本记录”目前在施梯伯手里。在莱茵省、在科隆，甚至在法庭里的可怕的阴谋活动，这一切都在原本记录里得到了证实。这里面有被告们透过监狱高墙不断跟马克思通信的证据。一句话，狄茨档案是旧约全书，而原本记录则是新约全书。旧约全书是用结实的油布包装的，而新约全书则是用可怕的红色摩洛哥羊皮装订的。红色摩洛哥羊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明显的证据，然而，现今的世界比多马时代更多疑；它甚至不相信亲眼看到的東西。自从摩门教²⁹⁰被发现以来，现在谁还相信旧约或新约

^① 指威·希尔施。——编者注

全书呢？但是，对摩门教并不完全反感的施梯伯却要规定这样做。

“当然，”——摩门教徒施梯伯说——“当然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可鄙的警探们的人云亦云，但是，”——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但是我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他们所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可靠的。”

说得多么好听呵！正确的证据和可靠的证据！而且还是充分的证据！充分的证据！而这是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施梯伯早就知道：

“马克思同被拘押的被告们进行秘密通信，但是我没能发现他们通信的线索。而在上个星期天，一位伦敦来的特别信使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说，这种通信的秘密地址终于发现了；这是一个住在旧市场的当地商人多·科特斯的地址。这位信使还把伦敦中央委员会的原本记录交给了我；这个本子是用钱从一个同盟盟员那里买到的。”

原来，施梯伯同警察局长盖格尔和邮政局勾结在一起了。

“曾经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过了两天，晚邮班就把寄给科特斯的信从伦敦送来了。根据最高检察机关的命令，这封信被没收和拆开。在信里发现了马克思亲笔写给律师施奈德第二的一个长达7页的指示。信中指示应该怎样进行辩护……在信纸背面还写着一个大写拉丁字母B。把原信的一份抄件、原信中可以抽出的一页同原信封一起保留下来。然后把原信装入信封封好；交给外勤警官，派他去会见科特斯并向他介绍自己是马克思的特使”等等。

接着，施梯伯描绘了一出令人反感的警察和仆役的滑稽剧：外勤警官怎样扮演马克思的特使，等等。10月17日，科特斯被捕，24小时以后，他声明说：内信封上写的拉丁字母B指的是贝尔姆巴赫。10月19日，贝尔姆巴赫被捕，他的家遭到搜查。10月21日，科特斯和贝尔姆巴赫被释放了。

这个证词是施梯伯在10月23日星期六提供的。“在上星期天”，

也就是10月17日的那个星期天，特别信使带着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到来了；这个信使到达后两天，即10月19日，接到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是，科特斯早在10月17日就由于外勤警官在10月17日转交给他的那一封信而被捕了。可见，信到达科特斯手里要比带来科特斯的地址的那个信使早两天，或者说，科特斯10月17日被捕是由于他在10月19日才接到的那一封信。这不是时间顺序上的奇迹吗？

后来，施梯伯被律师们追问得狼狈不堪，只好说，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是10月10日到达的。为什么是10月10日呢？因为10月10日也是星期天，同时对10月23日来说，也正好是“上星期天”，因此，原来关于上星期天的证词仍然有效，从这一方面来说，伪证就被掩盖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信就不是信使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而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接到的。现在，伪证的内容已变成信，而不是信使了。施梯伯的誓言跟路德笔下的农夫一模一样。如果帮助他从这一边爬上马背，他就会从另一边滚下马去。

最后，在11月3日的法庭上，从柏林来的警监戈尔德海姆说，10月11日，即星期一，从伦敦来的警监格赖夫当着他 and 警察局长维尔穆特的面把记录本转交给施梯伯。这样，戈尔德海姆就是指控施梯伯犯有双重伪证罪。

盖有伦敦邮局邮戳的原信封证明，马克思是在10月14日星期四把写给科特斯的信交给邮局的。这样，信就应当在10月15日星期五晚上到达。因此，在接到信前两天带来科特斯的地址和原本记录的那个信使，应当在10月13日星期三到达。但是他既不可能在10月17日到达，也不可能10日或11日到达。

不管怎样，格赖夫作为信使毕竟已把他的原本记录从伦敦带给

施梯伯了。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本子呢？施梯伯和他的同伙格赖夫一样，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他没有马上把它提交给法庭，因为这个本子同马扎斯监狱²⁹¹铁窗后面所获得的口供无关。在这个时候，恰好收到了马克思写的信。这帮了施梯伯的大忙。科特斯只起了地址的作用，因为信本身并不是写给科特斯的，而是写给标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那个拉丁字母 B 的。可见，科特斯实际上至多只是一个地址。我们现在假定这是一个秘密的地址。其次，我们假定这是马克思同科隆被告们通信的那个秘密地址。最后，我们假定我们的伦敦侦探们通过同一个信使把原本记录和这个秘密地址同时带走，而信是在信使以及地址和记录本到达后两天接到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一箭双雕。一则，我们证明了同马克思的秘密通信，二则，我们证明了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原本记录的确实性为地址的正确性所证实，地址的正确性又为信件所证实。我们的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为地址和信件所证实，原本记录的确实性又为我们的侦探们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所证实。这就是需要证明的。然后是外勤警官演出愉快的滑稽剧；然后是秘密逮捕；公众、陪审员和被告本身都大为震惊。

但是施梯伯为什么不叫他的特别信使在 10 月 13 日到达呢，这不是轻而易举的吗？因为不然的话，他便不成其为特别了；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是他的弱点，而翻阅普通的日历有失一个普鲁士警务顾问的尊严。除此之外，原来的信封保存在他自己手里；因此，谁能够弄清楚这件事呢？

可是，施梯伯在他的证词中由于对某一事实讳莫如深，早就弄得声名狼藉。如果他的侦探知道科特斯的地址，那么他们也就知道用信封里的信纸背面上的神秘的 B 作为掩护的那个人。施梯伯对拉丁字母 B 的奥秘一无所知，因此竟在 10 月 17 日下令在监狱里搜查贝克

尔,以便从他那里找到马克思的信。他只是从科特斯的供词中才知道字母 B 指的是贝尔姆巴赫。

可是,马克思的信是怎样落到普鲁士政府手里的呢?原因很简单。普鲁士政府经常把委托给它的邮局的信件拆开,而在科隆案件审理期间,它尤其经常干这种勾当。亚琛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能提供这一方面的情况。哪一封信溜得过去,哪一封信被截住,这全靠碰运气。

原本记录同原来的信使一起无影无踪了。可是,在 10 月 23 日的法庭上,当施梯伯扬扬得意地披露他的新约全书,即红皮书的内容时,他自然还没有预感到这一点。他的证词的直接结果,就是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审讯的那个贝尔姆巴赫第二次遭到逮捕。

贝尔姆巴赫为什么第二次被捕呢?

因为从他那里查获了文件吗?不是的,因为在他那里搜查之后把他释放了。他是在科特斯被捕以后 24 小时被捕的。可见,如果他那里有使他受牵连的文件,那么它们必定会不见了。当被确定为同盟的知情人或参与者的那些证人——亨策、黑策尔和施泰因根斯,安然地坐在证人席上的时候,为什么要逮捕证人贝尔姆巴赫呢?

贝尔姆巴赫接到了马克思的信,信中除了对原告进行批评以外,并没有谈到别的东西。施梯伯承认这一事实,因为信就摆在陪审员的面前。他不过是用警察夸张手法对事实作了如下的表述:“马克思本人经常从伦敦对目前的案件施加影响。”同时,陪审员们像基佐问他的选民那样问自己:你们是否感到自己被收买了呢?那么,究竟为什么要逮捕贝尔姆巴赫呢?普鲁士政府从侦查一开始就力图在原则上系统地剥夺被告们进行辩护的手段。当局直接违犯法律,甚至在起诉书送到被告手上之后,仍然禁止律师们同被告进行联系,这一点他们曾经在公开审讯会上申诉过。根据施梯伯本人的证词,从 1851 年 8

月5日起他手头就已经有狄茨档案了。但是狄茨档案并没有附入起诉书内。只是在1852年10月18日举行的公开审讯会上才把它亮出来,而且只亮出来施梯伯认为有利的东西。必须弄得陪审员、被告和公众惊慌失措,措手不及;必须弄得律师们在警察的意外行动面前束手无策。

而在提出原本记录之后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普鲁士政府害怕揭穿真相。贝尔姆巴赫从马克思那里收到了辩护材料;不难设想,他可能收到有关记录本的说明。通过对他的逮捕,宣布同马克思通信是一种新罪行,并确定这种罪行应受到监禁的惩罚。这是要阻止每个普鲁士公民当收信人。对明白人来说,半句话就够了。把贝尔姆巴赫监禁起来是为了把辩护材料排除掉。贝尔姆巴赫要坐5个星期的牢。如果审判一结束就马上把他释放,那么普鲁士法庭就是公开承认它俯首贴耳地屈从于普鲁士警察当局。贝尔姆巴赫是为了普鲁士法官的崇高的荣誉而坐牢的。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在科隆被告被捕之后,马克思又在伦敦纠集了他那一派的残余分子,组织了一个大约由18个人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等等。

这些残余分子从来没有散伙,一直是纠集在一起的,因此他们从1850年9月起还继续组成一种私人团体。施梯伯用一道独裁的命令迫使它消失,以便在科隆被告被捕之后用另一道独裁的命令又使它复活,并以新的中央委员会的形式出现。

10月25日星期一,在伦敦收到的《科隆日报》上刊载了关于施梯伯在10月23日所作的证词的报道。

“马克思派”既没有建立过新的中央委员会,也没有作过自己的

会议的记录。它很快就猜到，新约全书主要是由汉堡的威廉·希尔施捏造出来的。

1851年12月初，希尔施以共产主义流亡者的身分参加了“马克思的协会”。在这个时候，汉堡方面的来信揭发他是一个密探。可是当时决定允许他在协会里留一个时期，以便对他进行考察，弄到他究竟有罪还是无罪的证据。在1852年1月15日的会议上，曾宣读了一封科隆来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的一位朋友通报说，审判再次延期，就是亲人也很难同被捕者见面。同时信中还提到丹尼尔博士夫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以后，无论是在“最近处”或者是在远处都不见希尔施了。1852年3月2日，马克思从科隆接到通知说，由于警察的告发，丹尼尔博士夫人的家受到搜查；据警察的告发，丹尼尔夫人写给马克思的信在伦敦共产主义协会里宣读过，并且委托马克思给丹尼尔博士夫人写回信，马克思正在忙于改组德国的同盟，等等。这个告发被逐字逐句地照抄在原本记录的第一页上。——马克思立即回信说，因为丹尼尔博士夫人从来没有给他写过信，所以他不可能宣读她写的信。整个告发是由一个叫希尔施的不正派的青年人捏造出来的；为了捞到钱，给普鲁士警察当局编造它所必需的种种谎言，这对他来说，算不得什么。

从1月15日起，希尔施再不参加会议了；现在他已被彻底开除出协会。同时还决定转移协会的集会地点和改变开会日期。在这以前是星期四在西蒂区的法林登街商场内J. W·马斯特尔斯家里集会。现在，集会日期改在星期三，地点改在索霍区王冠街上的“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警察局长舒尔茨能够不被察觉地使希尔施接近马克思”，尽管“接近”马克思，但是希尔施过了8个月还是不知道协会的集会地点和开会日期。因此，不论在2月以前或以后，他总是编造星

期四的“原本记录”，并标上星期四的字样。只要翻开《科隆日报》，就会发现：1月15日（星期四）的记录、1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3月4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13日（星期四）的记录、5月20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2日（星期四）的记录、7月29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23日（星期四）的记录、9月30日（星期四）的记录。

“玫瑰和王冠”小酒店老板向马尔伯勒街的治安法官声明说，“马克思博士的协会”从1852年2月起每逢星期三都在他的店里集会。希尔施说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是他的原本记录的记录员，而他们让上述的治安法官认证了自己的签名。最后，还弄到了希尔施在施泰翰工人协会²⁹²里所作的记录，因此可以把他的笔迹同原本记录上的笔迹加以比较。

可见，原本记录已证明是伪造的，在这里没有必要对它的内容进行批判，它的内容由于本身矛盾百出已不攻自破。

困难在于把文件送给律师。普鲁士邮局只不过是布置在从普鲁士国境到科隆一线的一个前哨，其目的在于切断对辩护人的武器供应。

人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办法，所以10月25日寄出的第一批文件，直到10月30日才到达科隆。

因此，律师们一开始就只好使用在科隆能够得到的一点点辩护材料。施梯伯受到了第一次打击，这次打击来自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方面。法律顾问、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父亲、作为法学家受人尊敬的和因思想保守而著名的市民弥勒，10月25日在《科隆日报》上发表声明说，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同马克思通过信，施梯伯的原本记录是一个“骗局”。1852年3月3日寄往科隆的信——信中马克思说希尔施是个侦探，是伪造警察假情报的人——偶尔被发现并交给了辩护人。

在归入狄茨档案的“马克思派”关于退出大磨坊街协会的声明中，发现了 W. 李卜克内西的真正笔迹。最后，律师施奈德第二从科隆济贫所的秘书比恩包姆那里得到了 W. 李卜克内西的亲笔信，从私人文书施米茨那里得到了林格斯的亲笔信。在法庭秘书处，律师们一方面把记录本同退出协会的声明中的李卜克内西的笔迹作了比较，另一方面又把记录本同林格斯和李卜克内西的信件作了比较。

已被法律顾问弥勒的声明弄得心慌意乱的施梯伯，得到了宣布要研究笔迹这一不祥消息。为了预防面临的打击，他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又跳出来声明说：

“李卜克内西在记录本上的签名同已经在其他各种文件上碰到的他的签名迥然不同，他认为这种情况很值得怀疑。因此，他作了一番进一步的调查，听说该记录的签名人叫作 H. 李卜克内西。而在其他文件上碰到的李卜克内西这个姓的前面，写的是字母——W。”

律师施奈德第二质问道：“谁告诉他还有一个 H. 李卜克内西”，施梯伯拒绝回答。施奈德第二又问他，作为记录员跟李卜克内西同时在记录本下边署名的林格斯和乌尔默是什么人。施梯伯预感到面临着新的陷阱。他三次不理睬别人的提问，竭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竭力保持镇定，一连三次毫无理由地唠叨什么他是怎样得到记录本的。最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林格斯和乌尔默也许不是真名，而只不过是“盟内代号”。对于记录本上经常提到丹尼尔斯夫人是马克思的通信人一事，施梯伯解释说，也许应当读作丹尼尔斯博士夫人，而理解为见习公证人贝尔姆巴赫。律师冯·洪特海姆质问他希尔施是个什么样的人。施梯伯发誓作证说：

“他也不认识这个希尔施，但是据传这个人并不是普鲁士侦探，原因是普鲁士方面曾经对这个希尔施本人进行过监视。”

施梯伯作了一个暗示，戈尔德海姆就跟着哼哼唧唧地说：“1851年10月，他曾经被派到汉堡去捉拿希尔施。”我们将要看到，这个戈尔德海姆第二天被派到伦敦去捉拿希尔施。由此可见，硬说什么用现款向流亡者收买过狄茨档案和原本记录的那个施梯伯，现在又硬说希尔施不可能是普鲁士侦探，因为他是一个流亡者！他是流亡者这一点已经足以使施梯伯根据需要来保证他的绝对的被收买或者绝对清白。但是，施梯伯本人在11月3日的法庭上宣布是警探的那个弗略里，难道不也是政治流亡者吗？

在施梯伯的原本记录全面揭穿以后，他在10月27日还恬不知耻地概括说：

“他对原本记录的真实性比任何时候都更深信不疑”。

在10月29日的法庭上，鉴定人把由比恩包姆和施米茨提交的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两人的信件同记录本作了一番比较以后，宣布记录本上的签字是伪造的。

检察长泽肯多夫在起诉词中说：

“在记录本上发现的材料是同通过别的途径查明的事实相吻合的，只是检察机关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记录本是真实的。”

这个本子是真实的，可就是缺乏证明其真实性的证据。真是新约全书！泽肯多夫继续说道：

“不过，辩护人本人已经证明，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因为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在那里提到的林格斯的活动的情报，而这个人的活动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

如果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知道有关林格斯的活动情况，那么记录

本也不会提供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情报。因此，关于林格斯的活动的证词不可能证明记录本的内容，而就其形式来说，它倒能够证明“马克思派”的一个成员的签字确系伪造。可见，这些证词证明，泽肯多夫的说法：“记录本里至少包含有许多真实的东西”，——也就是一种真正的伪造。检察长（泽特—泽肯多夫）和邮政局同施梯伯一道拆开了寄给科特斯的信。可见他们知道信件到达的日期；因此他们知道，施梯伯说信使是10月17日到达的，后来又说是10日到达的，先说19日接到信，后来又说12日接到信的，他是在作伪证。他们都是他的同谋者。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施梯伯保持镇定是徒劳的。他每天都担心从伦敦收到揭发性的文件。施梯伯感到情况不妙，由他所体现的普鲁士国家也感到情况不妙。眼看就要当众出丑了。因此，10月28日警监戈尔德海姆被派往伦敦去拯救祖国。戈尔德海姆在伦敦干了些什么呢？他企图在格赖夫和弗略里的协助下鼓动希尔施到科隆去，冒充H. 李卜克内西，发誓证明记录本的真实性。按规定发给希尔施国家津贴。但是希尔施身上的警察本能并不亚于戈尔德海姆。希尔施知道，他既不是检察官，也不是警监，也不是警务顾问，因此他没有作伪证的特权。希尔施已预感到，一旦事情不妙，他就会被抛弃。希尔施不愿变成羊，尤其不愿变成替罪羊。希尔施断然拒绝了。但是，普鲁士的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却永远有了在一桩关系到自己的那些被告同胞的脑袋的刑事案件中雇用假证人的名声。

这样一来，戈尔德海姆一无所获地回到了科隆。

在11月3日的法庭上，在起诉词结束之后和辩护词开始之前，施梯伯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地跳了出来。

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已经布置对记录本作进一步的调查。他已派警监戈尔德海姆从科隆到伦敦去，委托他去进行这一调查工作。戈尔德海姆 10 月 28 日动身，11 月 2 日返回。戈尔德海姆现在就在这里。”

上司作了个暗示，戈尔德海姆就跟着哼哼唧唧地发誓作证说：

“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赖夫，格赖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即把记录本转交给格赖夫的那个警探。弗略里向他——证人戈尔德海姆承认并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名叫 H. 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弗略里毫不含糊地承认了 H. 李卜克内西出卖记录本的收款条。证人在伦敦未能抓到这个李卜克内西，据弗略里断定，因为后者害怕公开露面。他这个证人在伦敦确信：除了某些错误以外，记录本的内容是完全靠得住的。尤其是，几个曾参加过马克思召集的会议的可靠侦探向他证实了这一点，但这个本子并不是原本记录，而只是有关马克思召集的会议的开会情况的笔记本。对这个的确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两种解释。或者是像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手抄本，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值，而使这个手抄本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这么说来，通过警监格赖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证人戈尔德海姆断言：他在伦敦时确信，以往关于马克思召集的秘密会议、伦敦同科隆之间的联系、秘密通信等等的一切情报都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为了证明普鲁士侦探们目前在伦敦消息还很灵通，证人戈尔德海姆报告说，10 月 27 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会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对付那个对伦敦派来说非常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有关的决议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第二。特别是在寄给施奈德第二的文件中就有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是施梯伯本人在 1848 年写给在科隆的马克思的，马克思把它保管得极其严密，因为他希望用这封信来败坏证人施梯伯的声誉。”

证人施梯伯跳出来解释说，他当时由于一次无耻的诽谤而写信给马克思，说要控告他，等等。

“除了马克思和他，任何人都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

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这样一来，按照戈尔德海姆的意见，原本记录除了不正确的部分以外，是“完全靠得住的”。戈尔德海姆之所以确信它的可靠性，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原本记录根本不是什么原本记录，而只不过是“笔记本”。而施梯伯呢？施梯伯不是觉得非常出乎意料，倒是觉得一块石头从他的心上掉了下来。在最后一瞬间，原告方面的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而辩护人的第一句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出，施梯伯就通过他的戈尔德海姆一下子把原本记录变成了笔记本。如果两个警察彼此揭露对方的谎言，那么，这是不是表明他们两个人都献身于真理呢？施梯伯利用戈尔德海姆来掩护他的退却。

戈尔德海姆发誓作证说，

“他到伦敦以后，首先去找警监格赖夫，格赖夫把他带到城区肯辛顿去找警探弗略里。”

在这以后，谁不会发誓作证说，可怜的戈尔德海姆和警监格赖夫在一道到达住在老远的城区肯辛顿的弗略里那儿以前，就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但是警监格赖夫是住在警探弗略里的住宅里，而且是住在弗略里住宅的楼上，所以，事实上并不是格赖夫带戈尔德海姆去找弗略里，相反地，是弗略里带戈尔德海姆去找格赖夫。

“住在城区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多么准确呀！普鲁士政府告发了自己的侦探，指出他们的姓名和住址，把他们全盘托出，这样，你们还能怀疑它的真诚吗？如果记录本是伪造的，那只好请你们去找“住在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了。真妙！去找十三区的私人秘书皮埃尔。要知道，如果人们想要分清是哪个人，那么，就不但要叫出他的姓，而且要叫出他的名。不是弗略里，而是查理·弗略里。人们要指出这个

人公开进行的活动，而不是他秘密从事的营生。可见，这是商人查理·弗略里，而不是警探弗略里。而如果想要说出这个人的住址，那么就不但要指出本身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伦敦城区，而且要指出城区、街道、门牌号码。因此，并不是肯辛顿的警探弗略里，而是肯辛顿区维多利亚路 17 号的商人查理·弗略里。

可是，“警监格赖夫”，这至少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说法。但是，如果警监格赖夫在伦敦追随使馆，并从警监变成随员，那么这是跟审判毫无关系的随从性。内心的趋向就是命运的声音。

因此，警监戈尔德海姆保证说，警探弗略里担保，他是从一个真的保证自己是 H. 李卜克内西，甚至把收款条交给弗略里的人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戈尔德海姆在伦敦只是未能“逮住”这个 H. 李卜克内西。这样一来，戈尔德海姆就可以泰然自若地留在科隆，因为警务顾问施梯伯的保证变得不太有分量了，原因是：他的保证只不过表现为由警监格赖夫所担保的警监戈尔德海姆的保证，而警探弗略里又为格赖夫效劳，为他的保证担保。

戈尔德海姆并不为自己的难以自慰的伦敦经历而感到难堪，他以他所固有的那种必然要代替他的判断力的巨大的自信力“完全”相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关于它同科隆的联系等等所发誓作证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而现在，警务顾问施梯伯在他的部下戈尔德海姆把一份赤贫证明书交给他之后难道不是被掩护了起来吗？施梯伯通过他那一套发誓作证的伎俩获得了这样一种结果：他把普鲁士的等级颠倒过来了。你们不相信警务顾问？好。他已败坏了自己的声誉。那么你们就会相信警监。你们不相信警监？更好。那么你们至少会相信警探，换言之，普通的侦探，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就是发誓的施梯伯造成的异端般的概念混乱。

戈尔德海姆直到现在还证明说，他在伦敦时确信，原本记录是不存在的，而关于 H. 李卜克内西的存在，他只能肯定说，在伦敦没有“逮住”他；正因为这样，他就确信施梯伯关于“马克思派”的“一切”证词都“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在这以后，除了这些否定的论据（按照泽肯多夫说法，其中包含“许多真实的东西”）之外，他最终还是不得不提供肯定的论据，来证明“普鲁士侦探们目前在伦敦消息还很灵通”。他提出 10 月 27 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了一次绝密的会议”作为例子。在这次绝密的会议上，讨论了对付记录本和“非常头痛的”警务顾问施梯伯所必须采取的措施。有关的命令和决议“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第二”。

虽然普鲁士侦探们参加了这些会议，但是这些信件的发送路线对他们来说还是“绝密的”，因此，尽管邮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截住这些信件。不妨听一听这个蟋蟀^①是怎样在断垣残壁下忧郁地唧唧叫的：“有关的信件和文件绝密地寄给了律师施奈德第二”。对戈尔德海姆的密探们来说是绝密的。

关于记录本的无中生有的决议不可能是 10 月 27 日在马克思那里召开的绝密会议上通过的，因为马克思在 10 月 25 日就已经把证明记录本是伪造的那些基本材料寄走了，虽然不是寄给施奈德第二，但是寄给了冯·洪特海姆先生。

文件毕竟寄到了科隆，这向警察当局说明它不仅坏了良心。10 月 29 日戈尔德海姆到达伦敦。10 月 30 日他在《晨报》、《旁观者》、《观察家》、《先驱》以及《人民报》上发现了一项由恩格斯、弗莱里格拉

^① 马克思在这里把警监戈尔德海姆 (Goldheim) 戏称为“蟋蟀” (Heimchen)。——编者注

特、马克思和沃尔弗署名的声明^①；这些人在声明中要求英国公众注意辩护人对捏造、作伪证、伪造文件，总之，对普鲁士警察当局所干的卑劣行径所进行的揭发。发送文件是如此“绝密”，以致“马克思派”把这件事公开地告知英国公众，诚然，这只是在10月30日，即戈尔德海姆到达伦敦和科隆收到文件以后的事。

然而，就是在10月27日，也曾往科隆寄送过文件。无所不知的普鲁士警察当局是从哪里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呢？

普鲁士警察当局的活动并不像“马克思派”那样绝密。相反，它在几个星期前就已经完全公开地在马克思的住宅前面安排了两名侦探，他们从晚到早、从早到晚在街上监视他，跟踪他。于是，马克思于10月27日在马尔伯勒街的完全公开的治安法庭上当着英国各记者的面正式确证了绝密文件。在这些文件上有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真正的笔迹以及“王冠”小酒店老板关于会议日期的证词。普鲁士的守护天使们跟踪他，从他的住所跟到马尔伯勒街，从马尔伯勒街跟到他的住所，又从他的住所跟到邮局。直到马克思绝密地到区的治安法官那里去，要求下令逮捕这两名“尾巴”时，他们才溜之大吉。

另外，普鲁士政府还有一条门路。就是说，马克思直接通过邮局把10月27日被确证过并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寄到科隆，以防绝密寄出的这些文件的副本落入普鲁士的鹰爪。这样，科隆邮局和警察当局就知道标有“10月27日”字样的文件是由马克思寄出的，而戈尔德海姆就大可不必前往伦敦去揭开这个秘密。

戈尔德海姆感到，他终于必须从“10月27日召开的绝密会议”

^① 见本卷第529—531页。——编者注

上决定“特别”寄给施奈德第二的那些东西中“特别”指出某种东西，而他举出了施梯伯写给马克思的信。但遗憾的是，马克思寄这封信的日子并不是10月27日，而是10月25日，而且并不是寄给施奈德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先生。可是，警察当局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还把施梯伯的信完好地保存起来并准备把它寄给辩护人呢？还是让施梯伯再出来谈一谈。

施梯伯打算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来阻止施奈德第二把对他来说非常“头痛的信件”公开出去。假如戈尔德海姆说，施奈德第二手上有我的信件，据施梯伯的估计，而且还是由于“同马克思的违法的联系”而得到的，那么，施奈德第二就会把这封信扣下来，借以证明戈尔德海姆的侦探们的消息不确实，证明他本人同马克思并没有违法的联系。因此，施梯伯跳出来，歪曲信的内容，最后还以令人惊讶的叫喊声结束他的话：

“除了他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件事情。当然，这是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可靠性的最好的证明。”

施梯伯有一套独特的手法，用以掩盖那些使他感到头痛的秘密。当他不说话的时候，所有的人也必须保持沉默。因此，除了他和一位上了年纪的贵夫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知道”，他曾经作为她的面首住在魏玛附近。但是，如果施梯伯有种种理由让马克思以外的任何人都不知道信的内容，那么马克思就有种种理由让施梯伯以外的一切人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现在人们知道了来自伦敦的种种情报的最好的证明。那么施梯伯的最坏证明会是什么样的呢？

但是，当施梯伯说什么“除了他和马克思，任何人都不能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在有意地作伪证。他知道，并不是马克思，

而是《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回复了他的信。²⁹³无论如何这还是“除了他和马克思之外的一个人”。我们不妨在这里把这封信发表出来，以便使更多的人了解它的内容。

“在《新莱茵报》第 177 号上刊登了一篇 12 月 21 日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发出的通讯报道，其中无耻地谎称，我作为警探到法兰克福去，伪装一个民主派人士去侦查谋杀利希诺夫斯基公爵和奥尔斯瓦尔德将军的凶手。您可以从所附的证件中看出，21 日我的确是在法兰克福，我在那里总共只呆了一天，唯一的目的是调解当地的冯·施韦茨勒夫人的私事；我早已回到了柏林，而且我在这里恢复我的律师活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此外，我不妨介绍您去看一下 12 月 21 日的《法兰克福总邮报》第 338 号和这里的《国民报》第 248 号对此所发表的正式辟谣。我相信，由于您热爱真理，我能指望您会马上把所附的辟谣刊登在贵报上，并把那个内容不实的通讯的作者的名字告诉我——按照法律这是你必须做的，因为我不能让这类造谣中伤的行为不受到惩罚，否则，非常遗憾，我本人将不得不对最可敬的编辑部采取措施。

我认为，近来正是我对民主主义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挣脱了刑事司法的罗网。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的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始终不倦地与当局相对抗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报刊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妙的一点，就是民主派报刊的迟钝。关于我作为警探到法兰克福去的谣言，最初是由《新普鲁士报》这家声名狼藉的反动派机关报放出来的，其目的是要破坏我的妨碍这家报纸的律师活动，柏林的其他报纸早已驳斥了这一点。但是，民主派的报刊却如此蠢笨，竟重复这类愚蠢的谎言。如果我想作为侦探到法兰克福去，那么这件事肯定不会事先在所有的报纸上披露；法兰克福有足够的高明官员，普鲁士何必要派警官到那里去呢？蠢笨是民主派的老毛病，而它的敌人却因精明获得了胜利。

有人硬说什么我很多年以前曾在西里西亚当过警探，这同样是一种无耻的谎言。我当时是被正式任命的警官，并作为警官履行自己的职责。有人到处散布关于我的无耻的谎言。哪怕有一个人出来证明，我企图骗取他的信任，那也行。扯谎和妄下断语每个人都会。因此，我期待您，立即给我满意的答复。因为我认为您是一个正直而正派的人，民主派报纸在我们这里由于散布大量谎言而弄得

威信扫地，您切不可追求这样的目的。

忠于您的

法学博士等等施梯伯

1848年12月26日于柏林骑士大街65号²⁹⁴

施梯伯从哪里知道，马克思是在10月27日把他的信寄给施奈德第二的呢？但是，信不是在10月27日，而是在10月25日寄的；不是寄给施奈德第二，而是寄给冯·洪特海姆的。可见，施梯伯只知道这封信还存在，并推测马克思把信告诉了辩护人中的某一个。可是，这类推测有什么根据呢？当载有施梯伯10月18日的关于舍尔瓦尔等等的证词的《科隆日报》到达伦敦时，马克思给《科隆日报》、柏林《国民报》和《法兰克福报》写了一篇10月21日声明²⁹⁵，他在声明的结尾用他的还保存着的信威胁施梯伯。为了把信保管得“极其严密”，马克思亲自在报纸上发表有关信的声明。由于德国的报纸胆小怕事，他遭到了失败，但从此普鲁士邮局便知道了情况，而同普鲁士邮局一道，它的施梯伯也知道了情况。

这样，从伦敦回来的戈尔德海姆唧唧叫什么呢？

他叫道：希尔施不会发假誓作证；H. 李卜克内西的存在不是“摸得着的”；原本记录不是原本记录；消息灵通的伦敦侦探们知道“马克思派”在伦敦报刊上所发表的一切。为了挽回普鲁士侦探们的名誉，戈尔德海姆借他们的嘴把用拆信和截信的办法探出的一点点消息说了出来。

在11月4日的法庭上，在施奈德第二推翻了施梯伯和他的记录本，揭穿了他的伪造和作伪证之后，施梯伯最后一次跳出来，并发雷霆。他气愤地喊道，有人甚至竟敢指责维尔穆特先生、警察局长维

尔穆特作伪证。施梯伯又回到正统的阶梯，回到上升路线上来。过去，他是沿着非正统的下降路线运动的。如果人们不愿相信他——警务顾问，那就必须相信他的警监；如果不愿相信警监，那就必须相信这位警监的警探。如果不愿相信警探弗略里，那终究要相信下级侦探希尔施。现在则相反，他这位**警务顾问**大概可以提供假证词；而**警察局长**维尔穆特呢？难以想像！在他愤慨时，他就用越来越痛苦的心情去颂扬维尔穆特，他就用纯粹的维尔穆特^①、作为人的维尔穆特、作为律师的维尔穆特、作为家长的维尔穆特、作为警察局长的维尔穆特、不朽的维尔穆特来款待公众。

甚至在现在公开的审讯会上，施梯伯还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完全隔离起来，并在辩护人和辩护材料之间竖起一道障碍。他指控施奈德第二跟马克思有“违法的联系”，说什么施奈德侵害他就是侵害普鲁士最高当局。就连陪审法庭庭长格伯尔，就连格伯尔本人也感到了施梯伯的压力。他无可奈何，尽管他谨小慎微、卑躬屈节，但是他也不得不在施梯伯背上抽几鞭子。不过施梯伯从他自己方面来说是有道理的。被绑在耻辱柱上的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检察机关、法庭、邮局、政府、柏林警察总局、内阁、普鲁士驻伦敦使馆——简言之，普鲁士国家及其手中的原本记录。

现在施梯伯先生允许刊登《新莱茵报》给他的回信。

让我们跟戈尔德海姆一起再一次回到伦敦。

施梯伯仍然不知道舍尔瓦尔在哪里，舍尔瓦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同样，根据戈尔德海姆的证词（在11月3日的法庭上），记录本的来源也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戈尔德海姆为了弄清楚记录本的来源，提

① 维尔穆特(Wermuth)也有苦艾酒的意思。——编者注

出了两个假设。他说：

“对于这个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本子来源问题，只有两种解释：或者是像侦探坚决保证的那样，它真的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变行为，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大家知道，W. 李卜克内西是属于“马克思派”的。但是大家也知道，记录本上李卜克内西的签名并不是 W. 李卜克内西。因此，施梯伯在 10 月 27 日的法庭上发誓作证说，这一签名并不是这个 W. 李卜克内西的，而是另一个李卜克内西，即 H. 李卜克内西的。他知道有那么一个在两地同时出现、相貌酷似的人，但是他不能指出自己的消息的来源。戈尔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弗略里证实他的确是从一个叫作 H. 李卜克内西的‘马克思派’成员那里得到记录本的。”接着，戈尔德海姆还发誓作证说：“他在伦敦未能逮住这个 H. 李卜克内西”。那么，直到目前为止，施梯伯所发现的 H. 李卜克内西究竟给一般的公众和特殊的警监戈尔德海姆提供了什么样的存在标志呢？除了他在原本记录上的笔迹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存在标志；但是，戈尔德海姆现在声明：“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到目前为止，H. 李卜克内西只是作为笔迹而存在。但是现在，H. 李卜克内西什么也没有留下，甚至连笔迹也没有留下，甚至连最后一笔也没有留下。可是，戈尔德海姆从哪儿知道，H. 李卜克内西（戈尔德海姆只是根据记录本上的笔迹才知道他的存在的）是用与记录本上的笔迹不同的笔迹书写，这一点仍然是戈尔德海姆的一个秘密。如果施梯伯能创造自己的奇迹，那么戈尔德海姆为什么就不能创造自己的奇迹呢？

戈尔德海姆忘记了他的上司施梯伯已经发誓作证过 H. 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忘记了他自己刚刚也这样作过证。但是就在他发誓

作证说什么 H. 李卜克内西确有其人的同时，他想起了 H. 李卜克内西只是施梯伯不得不采用的一种遁词，不得不散布的一种谎言。情急就不顾戒律了。他想起了只有一个真的李卜克内西，即 W. 李卜克内西，如果说 W. 李卜克内西是真的，那么记录本上的签名便是假的。他不敢承认，弗略里的下级侦探希尔施，除伪造了记录本以外还伪造了签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假设：“李卜克内西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我们也不妨提出一个假设：戈尔德海姆过去伪造过银行券。他受到了法庭审判，经查明，银行券上面的签字并不是银行经理的签字。戈尔德海姆会说，先生们，请不要见怪，请不要见怪。银行券是真的。它出自银行经理本人之手。如果他的名字不是他本人签上的，而是别人伪造的，那么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

如果关于李卜克内西的假设不成立，那么戈尔德海姆继续说道，
或者：

“或者是警探弗略里从马克思的其他两个朋友，即流亡者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了记录本的手抄本，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值，而使这个手抄本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这么说来，通过警监格赖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或者？这个“或者”是从何谈起的呢？如果像原本记录那样的一个本子是由李卜克内西、林格斯和乌尔默三个人签署的，那么，谁也不会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德朗克和伊曼特之手，而只会说，它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或者出自林格斯和乌尔默之手。不幸的戈尔德海姆现在竟然采用了选言判断，——或者，或者，——那么难道他还要说“林格斯和乌尔默不用自己的笔迹书写”吗？就连戈尔德海姆也认为有必要换个别的说法。

如果原本记录像警探弗略里所断言的那样不是出自李卜克内西之手,那么,它就是弗略里本人编造的,而且所需的手抄本他是从德朗克和伊曼特那里得到的。关于他们,警监格赖夫已经正式确定,他们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戈尔德海姆说,“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值”,弗略里使这个手抄本具有原本记录的形式。他不仅进行欺骗,而且他还伪造签名。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值”。像这位为了贪图私利而制造假记录和假签名的普鲁士侦探这样安分守己的人无论如何不会制造假手抄本。这就是戈尔德海姆的结论。

德朗克和伊曼特是在1852年4月间,即在他們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之后才到伦敦的。但是原本记录有 $\frac{1}{3}$ 是1852年1月、2月和3月的记录。可见,原本记录有 $\frac{1}{3}$ 无论如何是弗略里在没有德朗克和伊曼特在场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虽然戈尔德海姆发誓说,或者记录本是由李卜克内西编出来的,或者是由弗略里编出来的,然而根据德朗克和伊曼特的手抄本编出来的。戈尔德海姆对此发誓作证,而戈尔德海姆虽然不是布鲁土斯,但毕竟是戈尔德海姆。

可是,还是有这样的可能性,德朗克和伊曼特是从4月起就已经把手抄本交给弗略里了,因为戈尔德海姆发誓作证说,

“通过警监格赖夫已经正式确定,德朗克和伊曼特同弗略里来往频繁”。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种来往。

如上所述,在伦敦人们并不知道弗略里是普鲁士警探,而只知道他是西蒂区的商人、而且是民主派商人。他出生在阿尔滕堡,作为政治流亡者来到了伦敦,后来跟一个出身于很有声望和很富裕的

家庭的英国女人结了婚，外表上跟他的妻子和岳父——老企业家、**费格会**²⁰⁵会士过着隐居的生活。10月8日或9日，伊曼特以教师的身分同弗略里开始了“频繁的来往”。但是，根据施梯伯的经过更正的证词，科隆是在10日收到原本记录的，而根据戈尔德海姆的最后一次证词，科隆则是在10月11日收到原本记录的。可见，当弗略里素不相识的那个伊曼特在家里给他上第一堂法文课时，他就不仅已经用红色摩洛哥羊皮把原本记录装订好，而且已经把它交给特别信使带到科隆去了。弗略里就是这样根据伊曼特的手抄本创造了自己的记录本。弗略里只是在伊曼特那里偶尔见过一次德朗克，而且那是在10月30日，当时原本记录早已回到它那原来就不存在的状态了。

这样看来，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并不满足于撬开写字台，偷走别人的文件，诈取假证词，制造臆想的密谋，伪造文件，作伪证，企图购买假证人，一句话，不满足于为了判科隆被告的罪所能采用的一切手段。政府还竭力给被告的伦敦朋友扣上肮脏的嫌疑犯的帽子，以便袒护自己的希尔施。施梯伯发誓作证说，他并不认识希尔施，而戈尔德海姆发誓作证说，希尔施不是密探。

11月5日星期五，伦敦收到了一份《科隆日报》，上面刊载了关于11月3日陪审法庭听取戈尔德海姆的证词的那次会议的报道。人们马上调查格赖夫的情况，而且当天就查明，他住在弗略里那里。与此同时，德朗克和伊曼特带着《科隆日报》去找弗略里。他们硬要他读一读戈尔德海姆的证词。弗略里面色苍白，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假装惊奇的样子，说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在英国治安法官面前提供驳斥戈尔德海姆的证词。不过，他事先还必须跟他的律师商量一下。约好在第二天，即11月6日星期六下午见面。弗略里答应在这次见面时要

带上他的已经得到正式认证的现成的证词。当然，他没有露面。因此，伊曼特和德朗克星期六晚上到他家里去，在那里发现了写给伊曼特的这样一个便条：

“在律师的帮助下，一切都已办妥，一旦把那个人查明，就可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今天律师还寄来这件东西。我有事要到西蒂区去一趟：请明天到我这儿来：明天从午饭后至5点钟我都在家。弗·”

在便条的背面还写了附言：

“我刚刚回到家里，但我又不得不跟韦尔纳先生和我的妻子一道出去，这一点你们明天就会相信，你们准备什么时候来，请写信给我。”

伊曼特留下了如下的答复：

“现在没有在您家里碰见您，我感到十分惊奇，因为您这个下午还是没有赴约。我要老实对您说，由于种种情况，我已经对您有了看法。如果您有兴趣改变我的看法，那就请您到我那儿来，明天早晨就来，因为我不能向您担保，您这个普鲁士警探的身分不会成为英国报纸上的议题。伊曼特”

弗略里星期天早晨也没有去。因此，德朗克和伊曼特星期天晚上又到 he 那里去了一趟，他们假装对他的信任只是在最初一瞬间发生过动摇，让他写个声明。不管怎样踌躇和犹豫，声明还是写成了。当他们提醒弗略里不但签上自己的姓，而且还要签上自己的名字的时候，他特别动摇不定。声明的全文如下：

“致《科隆日报》编辑部

本人认识伊曼特先生大约有一个月，在这期间，他教授我法文，至于德朗克先生，本人是在今年10月30日星期六才初次见到的；

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给本人提供过同科隆案件中出现的记录本有关的情况；

本人并不认识任何叫李卜克内西的人，更不用说同这个人有什么联系。特

此声明。

查理·弗略里

1852年11月8日于伦敦肯辛顿”

当然，德朗克和伊曼特深信，弗略里会指令《科隆日报》不要接受有他的署名的任何声明。因此，他们没有把他的声明寄给《科隆日报》，而是寄给了律师施奈德第二，可是施奈德第二在案件即将结束时才收到这个声明，已经无法利用了。

弗略里虽然不是警察娼妓中的玛丽花^①，但他毕竟是一枝花，它将要开放，哪怕仅仅是一枝百合花^②。

记录本的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

11月6日星期六，汉堡的威·希尔施向伦敦弯街的治安法官作代替宣誓，供认，他本人在格赖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中出现的原本记录。

这样一来，最初是“马克思派”的原本记录，然后是警探弗略里的手抄本，最后成了普鲁士警察当局的制品，纯粹的警察制品，不折不扣的警察制品。

就在希尔施向弯街的英国治安法官泄露原本记录的秘密的那一天，另一个普鲁士国家代表在肯辛顿弗略里家里忙合起来，这一次不是把偷来的文件，也不是把伪造的文件和其他各种文件，而是把他自己的家当包上了结实的油布。这不是别人，正是鸟儿格赖夫，全巴黎

① “弗略里”(Fleury)和“花”(Fleur)在德语中发音相似。——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在法国土语中，把在犯人身上所烙的字母T.F. (travaux forcés, 即劳役)称之为‘百合花’。马克思把他的这个对手描绘得恰到好处，这可以从附录(见下面第8章第1节296)中看出。”——编者注

都熟悉的人物、跑科隆的特别信使、在伦敦的普鲁士警探头子、神秘行动的官方指挥者、被派到普鲁士使馆里去当随员的警监。格赖夫接到了普鲁士政府的立即离开伦敦的命令。一分钟也不得耽误。

在歌剧演出结束时，一直被侧面布景掩盖着的、半圆形阶梯式上升的后台布景，突然被彩色烟火照得通明，它的光耀夺目的轮廓展现在观众的面前；同样，在这出普鲁士警察的悲喜剧演出结束时，被掩盖着的半圆形阶梯式上升的伪造原本记录的小作坊也展现在观众的面前了。站在最低一个台阶上的是那个不幸的、按件取酬的侦探希尔施；站在第二个台阶上的是那个身居资产者地位的密探和奸细弗略里、西蒂区的商人弗略里；站在第三个台阶上的是那个当外交官的警监格赖夫；站在最高一个台阶上的则是格赖夫当随员的那个普鲁士使馆本身。在6—8个月当中，希尔施一直按时地、逐周地在弗略里的监督之下在工作室里伪造他的原本记录。但是，在弗略里的上面一层住的是普鲁士警监格赖夫，他监视弗略里并指导他。格赖夫本人照例地在普鲁士使馆的旅馆里度过一天的一部分时间，在那里也有人监视他并指导他。可见，普鲁士使馆的旅馆是原本记录赖以生长的真正的温室。因此，格赖夫必须溜之大吉。他是在1852年11月6日溜走的。

再也不能抓住原本记录不放了，即使抓住手抄本也不行。检察官泽特在他回答律师们的辩护词时已把这个原本记录埋葬了。

这样一来，人们又回到上诉法院的检察院鉴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而下令重新侦查时的那个出发点上去了。

五

《红色问答书》²⁹⁷的附函

在10月27日的法庭上,克雷费尔德的警察局督察员荣克尔曼提供了如下的证词:

“他没收了一个包着一些《红色问答书》的包裹,是寄给克雷费尔德的一家旅馆的招待员的,上面盖有杜塞尔多夫邮局的邮戳。其中有一封没有署名的附函。发信人不详。”“据检察机关说,看来附函是出自马克思之手。”

在10月28日的法庭上,鉴定人(???)雷纳德认为,附函是马克思写的。这一附函全文如下:

“公民!

因为我们完全信任您,所以我们现在把50本《红色问答书》寄给您,您务必在6月5日星期六晚上11点钟把它们塞进被公认为有革命信念的公民、最好是工人的家里去。我们坚信您的公民品德,因此期待您完成这一指示。革命比某些人所想象的更迫近了。革命万岁!

致以

敬礼和兄弟般的问候!

革命委员会

1852年5月于柏林”

证人荣克尔曼还说:“上面提到的包裹是寄给证人基安奈拉的。”在科隆被告的审前羁押期间,柏林的警察总监欣克尔代作为总

指挥策划了种种阴谋。莫帕的桂冠让他朝思暮想。

在审讯过程中,出场的有两个警察局长——一个活的,一个死的^①,一个警务顾问——这就是施梯伯;两个警监,其中一个经常从伦敦跑科隆,另一个则经常从科隆跑伦敦^②,许许多多警探和下级侦探,他们有的有名有姓,有的匿名,有的用化名,有的用假名,有的带尾巴和不带尾巴;最后还有一个警察局督察员^③。

载有10月27日和28日的证人证词的那份《科隆日报》一到伦敦,马克思就到马尔伯勒街的治安法官那里,把《科隆日报》上刊载的附函全文抄下来,请求予以认证;同时,他作了如下的代替宣誓的声明:

- (1)他未曾写过上述的附函;
- (2)他只是从《科隆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附函;
- (3)他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 (4)他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应当顺便指出,这个声明(declaration)是向治安法官提出的,如果它与事实不符,那么在英国就会招致作伪证的种种后果。

上述文件已经寄给施奈德第二,同时还发表在伦敦《晨报》上,因为在案件审理期间人们确信,普鲁士邮局把邮局有责任将委托给它的信件对收信人保守秘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同遵守通信秘密联系起来。最高检察机关反对审阅这个文件,即使只是为了对照一下。最高检察机关知道,只要稍微浏览一下附函原件,然后再看一下马克思

① 指维尔穆特和舒尔茨。——编者注

② 即荣克尔曼。——编者注

③ 指戈尔德海姆和格赖夫。——编者注

的经过正式认证的抄件,就会使有意伪造马克思笔迹这个骗局甚至无法逃脱那些陪审员的锐利目光。因此,为了维护普鲁士国家的道义上的声誉,它反对作任何对照。

施奈德第二指出,

“情愿给警察当局提供有关假想的发信人的情报并以密探身分直接为警察当局效劳的收信人基安奈拉,根本不是指马克思”。

即使只读过马克思写的一行字的人,都不会断言,这一封富有戏剧性的附函是马克思写的。在6月5日的仲夏夜之梦时分,把《红色问答书》塞进革命庸人们的家门这种显然是强加于人的行动,很有点金克尔的气质,同样,“坚信”以“公民品德”可以在军事上“完成”这一“指示”这一点很有点维利希的想象力。但是金克尔—维利希怎么能够用马克思的笔迹来写他们的革命处方呢?

如果可以提出关于这封用假笔迹写的附函的“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来源”的假设,那么这种假设看来就是:警察当局在克雷费尔德发现了50本《红色问答书》,还附有一封以溢美之词投其所好的附函。警察当局命令——在柏林或科隆,不都是一样吗?——把附函谱成马克思的曲调。为了什么目的呢?“为了抬高自己的货物的价值。”

可是,就连最高检察机关在它的揭露卡提利纳的演说中也不敢引用这封附函。检察机关拒绝了这封附函。可见,这封附函无助于确定所缺乏的“客观的犯罪构成”。

六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从 1848—1849 年革命失败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在大陆上失去了在这个短短时期中例外地享有的东西：报刊、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即政党组织的合法手段。尽管反动派猖獗，资产阶级自由党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党还是在它们所代表的阶级的社会地位中找到了通过某种形式联合起来并在某种程度上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所必需的条件。1849 年以后，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如同 1848 年以前一样，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秘密联合的道路。因此，从 1848 年以来，大陆上出现了一系列秘密的无产阶级联合会；警察当局破获它们，法庭诅咒它们，监狱冲散它们；而形势又总是使它们重新恢复起来。

这些秘密团体中有一部分把推翻现存国家政权作为自己的直接目的，这在法国是正当的，因为在那里，无产阶级已被资产阶级打败，在那里，攻击现存政府是同攻击资产阶级完全一致的。另一部分秘密团体则把组织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不考虑现存政府的命运。这在像德国这样一些国家里是必要的，因为在那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处于它们的半封建政府的压迫之下，因而在那里，对现存政府的胜利攻击并不是要破坏资产阶级或所谓中间等级的政权，而是首先要协助它建立统治权。不容置疑，在这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Röln.

1853.

卡·马克思的《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的

1853年波士顿版的扉页

员也会重新参加反对现状的革命,但是,为这一革命做准备工作,为它进行宣传鼓动、为它进行秘密活动和组织密谋,都不是他们的任务。他们可以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总的形势和直接有关的各个阶级去进行。如果他们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党的立场和由无产阶级总的生存条件所直接产生的历史任务,那么他们就必须把这种准备工作交给它们去进行。对他们来说,目前的政府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而现状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停留点,而跟它斗得筋疲力尽,那只应当是目光短浅和心胸狭窄的民主派干的事情。

因此,“共产主义者同盟”²⁷⁵并不是一个密谋团体,而是一个秘密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团体,因为德国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新闻出版、言论和结社等基本生存条件。如果说这样的团体在进行密谋活动,那就等于说蒸汽和电也在进行反对现状的密谋活动。

不言而喻,这种不是把组织未来的执政党,而是把组织未来的反对党作为目的的秘密团体,对于某些人来说,吸引力是不大的。这些人一方面用密谋活动的那种戏剧外衣掩盖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打算在最近革命到来时满足自己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名心,而首先是打算在目前就成为显要人物,在蛊惑宣传上捞到一份战利品,博得民主主义叫卖者的拥戴。

因此,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已分离出了一个集团,或者说也可以说,被分离出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即使不是要求真正的密谋,至少要求密谋的外表,因而要求同当代的民主主义英雄结成直接的联盟,——这个集团就是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这一集团的特征就是:维利希跟金克尔一道,在德美革命公债²⁹⁸的活动中是以承揽人的身份出现的。

关于这一派对科隆人所属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多数派的态度,刚

才已经说过了。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在科隆陪审法庭审讯时已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白而详尽的阐述。

在结束我们的叙述之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在科隆案件期间的所作所为。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施梯伯从该集团那里窃取的文件日期证明，即使在罗伊特干了盗窃勾当之后，该集团的文件还是继续通过某种途径落到了警察当局的手里。到现在为止，该集团仍然没有澄清这个不寻常的现象。

沙佩尔最了解舍尔瓦尔的过去。他知道，舍尔瓦尔是在1846年由他接受入盟的，而不是在1848年由马克思接受入盟的，等等。他对施梯伯的谎言采取默认的态度。

该集团知道，给证人豪普特的恐吓信²⁹⁹是该集团的成员哈克写的，它让被告的党蒙受嫌疑。

该集团的成员莫泽斯·赫斯，即《共产党宣言》的这个倒霉的拙劣模拟作品《红色问答书》的作者³⁰⁰，这个莫泽斯·赫斯不仅亲手写了自己的作品，而且亲自把它散发出去，所以他确切地知道，他究竟把自己的一批批《红色问答书》送给了谁。他知道，他自己储存的大批《红色问答书》马克思一本也没有拿过。莫泽斯若无其事地让被告蒙受嫌疑，似乎他们的党在莱茵省散发了他那本附有戏剧性的附函的《红色问答书》。

该集团不仅采取沉默的办法，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言论跟普鲁士警察当局狼狈为奸。在审讯期间，该集团不是在被告席上出现，而是以“王室证人”的身份出现。

亨策，维利希的朋友和恩人，自认为是同盟的知情人，在伦敦维利希那里呆了几个星期，然后到了科隆，为的是提供反对贝克尔的假

证词,说什么贝克尔在1848年是同盟的成员。其实控告贝克尔的证据要比控告他自己的证据少得多。

黑策尔,从狄茨档案可以看出,参加过该集团、从它那里得到了金钱支持、并因参加同盟而一度受到柏林陪审法庭审讯,现在以证人的身份出来反对被告。他提供了假证词,把在革命时期柏林无产阶级的偶然武装事件跟同盟的章程胡扯在一起。

施泰因根斯被他自己的信件(在10月18日的法庭上)揭穿,他曾经是该集团在布鲁塞尔的主要代理人,而在科隆不是以被告的身份,而是以证人的身份出现。

在科隆陪审法庭审讯前不久,维利希和金克尔委派了一个裁缝帮工^①充当特使前往德国。金克尔虽然不是该集团的成员,但维利希曾是德美革命公债的头目之一。

金克尔当时已经面临后来出现的危险,伦敦的保证人³⁰¹不让他和维利希掌管公债,尽管他们愤怒地表示抗议,那笔钱还是寄回美国去了。因此,金克尔当时正需要装出到德国出差和跟德国通信的样子,一方面是为了证明在那里仍有他和美元进行革命活动的余地,另一方面是为他和他的朋友维利希记入财务报告的大量通信费用、邮资和其他费用寻找借口(见奥·赖辛巴赫伯爵的石印通告)。金克尔自己也知道,他在德国不论同资产阶级自由派还是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没有什么联系,因此,他张冠李戴,把该集团的特使³⁰²当作德美革命联盟³⁰³的特使。这个特使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工人中间进行旨在反对科隆被告的党的活动。应当承认,时机选得很好,在最后时刻为进行新的侦查提供了新的借口。普鲁士警察当局完全了解特使的

^① 奥·格贝尔特。——编者注

为人、动身日期和旅行路线。是从哪里了解到的呢？我们就会看到。警察局的密探们出席了他在马格德堡召开的几次秘密会议，并报道了会上讨论的情况。科隆人在德国和伦敦的朋友们对此不寒而栗。

如上所说，11月6日希尔施向弯街的治安法官供认，他在格赖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伪造了原本记录。这一步是维利希驱使他走的。维利希和旅馆老板谢特奈尔曾陪他到治安法官那里去。希尔施的供词抄了3个不同的副本，并邮寄给科隆的不同的收信人。

在希尔施刚跨出法庭门坎的时候，就立即把他逮捕起来，这是极其重要的。根据在他身上发现的正式认证的证词，在科隆遭到失败的案件有可能在伦敦取得胜利。即使不能使被告取胜，那至少也是对政府的胜利。相反，维利希千方百计地阻挠这一步的实现。他不仅对直接有关的“马克思派”，而且对他自己的同伙，甚至对沙佩尔都守口如瓶。只有谢特奈尔一个人知道他的秘密。谢特奈尔声明，他和维利希一道把希尔施送上轮船。也就是说，按照维利希的打算，希尔施应当在科隆提出反对他自身的证明。

维利希告诉希尔施用什么方法把文件寄出去，希尔施把这一点通知普鲁士使馆，普鲁士使馆又把这一点通知邮局。文件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就不翼而飞了。过了一些时候，本来无影无踪的希尔施又在伦敦出现了，并在民主派的公开大会上声称，维利希是他的同谋者。

维利希在答复质问时承认，他从1852年8月初起又跟希尔施保持了联系。根据他的提议，希尔施1851年就被当作密探开除出大磨坊街协会。正是希尔施向维利希泄露弗略里是普鲁士密探，后来又把寄给弗略里的和弗略里寄出的全部信件都告诉了维利希。据说，维利希他曾利用这一手段来监视普鲁士警察当局。

大家知道，维利希近一年来已成了弗略里的密友，并且得到了他

的支持。但是,如果维利希从 1852 年 8 月起就知道弗略里是普鲁士密探,同时还知道他的活动,那么他怎么不知道原本记录呢?

他怎么只是在普鲁士政府本身泄露了弗略里是密探之后才出面干预呢?

他怎么采取这种干预方式呢?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他的同盟者希尔施也从英国溜走,而使正式认证的弗略里的罪证从“马克思派”手边溜掉。

他怎么继续得到弗略里的支持呢?这个弗略里曾吹嘘从他那里弄到了 15 英镑的收据。

弗略里怎么继续在德美革命公债中进行活动呢?

他怎么把自己的秘密协会的住所和开会地点告诉弗略里,致使普鲁士侦探能在隔壁房间把讨论情况记录下来呢?

他怎么把上述的特使、裁缝帮工的行程告诉弗略里,甚至从弗略里那里弄到这次出差的费用呢?

最后,他怎么对弗略里说,他指示住在他那里的亨策,叫他应当如何在科隆陪审法庭上作证反对贝克尔³⁰⁴呢?应当承认,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很清楚的。

七

判 决³⁰⁵

随着警察当局的秘密一步步地被揭穿，舆论就越来越支持被告。当原本记录的骗局被揭穿的时候，大家都在等待宣判无罪。《科隆日报》已经认为自己不得不向舆论低头，转过身来反对政府。在这以前，它通篇一直只是为警察当局诽谤开放的，现在却突然发表有利于被告和怀疑施梯伯的短评了。普鲁士政府自知这盘棋输定了。它的《泰晤士报》和《纪事晨报》的通讯员突然开始让国外舆论对不利的结局作好准备。不管被告的学说怎样有害和骇人听闻，也不管在他们那里发现的文件怎样令人厌恶，但是密谋的事实证据是不存在的，因而他们未必能被判罪。《泰晤士报》的柏林通讯员就是这样垂头丧气和无可奈何地写报道，这是一种奴才的回声，它反映了普遍存在于施普雷河城^①的上层分子中间的恐惧心理。当电报把陪审员作出的“有罪”的宣判从科隆闪电般地传到柏林的时候，拜占庭宫廷和它的宦官们就更加欣喜若狂了。

随着记录本的真相大白，案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被告有罪还是无罪，这已经不再由陪审员来决定了；现在他们必须确认被告有罪

① 指柏林。——编者注

还是政府有罪。被告无罪就等于判决政府有罪。

在答复律师们的辩护词时，检察官泽特抛开了原本记录。说什么他不愿意使用上面沾有这种污点的文件，他本人认为它“不真实”，它是一个“不吉利的本子”，它无益地浪费了许多时间，而对案件本身却毫无裨益；施梯伯由于值得赞扬的敬业精神而上了当，等等。

但是，检察机关本身在自己的起诉书中硬说，记录本里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它绝口不谈记录本是不真实的，而只是对不能证明它的真实性表示遗憾。施梯伯发誓作证的原本记录已经失去了真实性，施梯伯发誓作证的舍尔瓦尔在巴黎的那个证词（泽特在自己的答复中再一次地引证了这个证词）也失去了真实性；普鲁士国家的一切有关当局经过一年半的极其紧张的活动搜寻到的一切事实也随之不能成立了。原定7月28日举行的陪审法庭审讯拖延了3个月之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警察局长舒尔茨生病。这个舒尔茨是个什么人呢？就是第一个发现原本记录的那个人。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在1852年2月和3月间，丹尼尔斯博士夫人的家里遭到了搜查。根据什么？就是根据弗略里转寄给舒尔茨、舒尔茨转交给科隆警察局、而科隆警察局又转交给检察官的那个原本记录的头几页；原本记录的头几页把检察官引进了丹尼尔斯博士夫人住宅。

尽管有舍尔瓦尔的密谋，检察院在1851年10月还是没有找到所缺乏的犯罪构成，因此，它根据内阁的命令，指示进行新的侦查。这次侦查是谁进行的呢？是警察局长舒尔茨。所以，舒尔茨应当找到犯罪构成。那么舒尔茨找到了什么呢？找到了原本记录。他所弄到的全部新材料只不过是记录本的几张散页，施梯伯后来下令把它们加以补充和装订成册。为了给原本记录的产生和成长提供必要的时间，被告被单独监禁了12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泽特大声喊道，

而且他找到了罪证：辩护人和被告只需要 8 天的时间就能把普鲁士国家的所有有关当局忙活了一年半和被告坐了一年半监牢才填满的那个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扫干净。原本记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情节，它是政府活动的各条线——使馆和警察当局、内阁和各地方当局、检察机关和邮政局、伦敦、柏林和科隆——的汇集点。原本记录对案件具有重大的意义，发现了它，案件才能成立。派信使、发快信、扣留信件、逮捕、作伪证，都是为了使原本记录站住脚，伪造，是为了制造原本记录；收买，是为了证明原本记录是真的，原本记录真相大白就等于这个大案真相大白。

最初，需要警察当局进行创造奇迹的干涉，为的是掩盖案件的那种纯粹的倾向性。泽特在宣布审讯开始时说：“即将进行的揭发将向你们陪审员先生们表明：这一案件并不是具有倾向性的案件。”而现在他强调倾向性，以便把警察当局的揭发置诸脑后。在进行了一年半的审前侦查之后，陪审员们需要客观的犯罪构成，以期在舆论面前洗刷自己。在演了 5 个星期的警察滑稽戏之后，陪审员们又需要“纯粹的倾向性”，以期从实际材料的污秽中解脱出来。因此，泽特并不满足于迫使检察院作出“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这一判决的材料。他还更进了一步。他企图证明，惩治密谋的法律根本不要求犯罪构成，而是纯粹倾向性的法律，可见，密谋的概念只不过是合法手续烧死政治异教徒的一种借口而已。由于应用了被告被捕以后颁布的新的普鲁士刑法典³⁰⁶，他的企图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奴才法庭借口这个法典有减轻惩罚的条款，允许把它当作具有回溯效力的法律来加以应用。

可是，如果案件是具有纯粹倾向性的案件，那么一年半的审前侦查是为了什么呢？这是由于倾向。

因此,既然问题仅仅在于倾向,那么,我们是否应当跟泽特—施梯伯—泽肯多夫之流、跟格伯尔之流、跟普鲁士政府、跟科隆行政区的300名主要纳税者、跟王室侍卫官冯·明希-贝林豪森、跟菲尔斯滕贝格男爵进行一场关于倾向的原则性争论呢?我们并不那样愚蠢。

泽特承认(在11月8日的法庭上):

“几个月以前,当他被委任,而且被检察长委任同检察长一道代表检察机关干预这一案件时,当他因此开始审阅材料时,他首先想到要稍微熟悉一下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他尤其感到自己应当同陪审员分享他的研究成果,因为他认为,他必须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陪审员中间有许多人也许都跟他一样,还很少研究过这类问题。”

所以,泽特买了一本施泰因的著名的纲要。^①

“他今天学到的东西,
明天就想教给别人。”^②

可是,检察机关特别不幸。它要找马克思的客观犯罪构成,而找到的却是舍尔瓦尔的客观犯罪构成。它要找被告所宣传的共产主义,而找到的却是他们所反对的那种共产主义。在施泰因的纲要里的确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而唯独没有泽特要找的那种共产主义。施泰因还没有把德国的共产主义,即批判的共产主义登记上。不错,泽特手中有被告承认是自己的党的宣言的《共产党宣言》。而在这个《宣言》中还有一章专门批判一切先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而专门批判施泰因登记过的一切高论。从这一章里想必能看出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派别同过去所有共产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从

① 指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编者注

② 这里套用了席勒的《天之骄子》中的诗句。——编者注

而能看出泽特所反对的那种学说的独特内容和**独特倾向**。施泰因^①并不能帮助越过这块绊脚石。即使仅仅是为了提出控告,人们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现在被施泰因所遗弃的泽特怎样摆脱窘境呢?他强调说:

“《宣言》共分三章,第一章的内容是用共产主义观点阐明各类市民(1)的社会地位的历史发展。(妙极了。)……第二章阐述了共产党人对无产者的态度……末了,最后一章探讨了共产党人在各个国家里所持的立场……”(1)(在11月6日的法庭上)

《宣言》其实共分四章,而不是三章,但是,眼不见,心不烦。因此,泽特硬说,《宣言》共分三章,而不是四章。对他来说不存在的那一章正好是“不吉利的”一章,它批判了施泰因记录下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说,论述了被控告的那种共产主义的**独特倾向**。可怜的泽特!最初他缺乏**犯罪构成**,现在他又缺乏**倾向**。

然而,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³⁰⁷泽特指出,“所谓的社会问题和它的解决最近使得有使命者和无使命者都忙了起来。”泽特无论如何是属于有使命者之列的,因为检察长泽肯多夫在3个月以前已正式赋予他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使命”。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泽特们向来一致地认为伽利略“不负有”研究天体运动的“使命”,却宣布那个诽谤他的宗教裁判所审判官有这种“使命”!地球依然在运转!³⁰⁸^②

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作为被告站在陪审团所代表的统治阶

① 施泰因的德文(Stein)又有“石头”的意思。——编者注

② 恩格斯在1885年版上加了一个注:“泽特不仅‘负有使命’,而后来为了酬谢他在这一案件中的功绩,他被赋予莱茵省总检察官的‘使命’;他领取总检察官的养老金,后来,他接受了临终的圣餐,幸福地归天了。”——编者注

级面前；因此，被告的罪已经判定了，因为他们是站在这样的陪审团面前。如果有某种东西能像动摇过舆论那样在一瞬间动摇陪审员们的资产阶级良心，那就是暴露无遗的政府的阴谋、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普鲁士政府的腐败。陪审员们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普鲁士政府对被告采取如此无耻的、同时又是如此冒险的手段，如果它可以说把自己在欧洲的声誉孤注一掷，那么被告，无论他们的党怎样弱小，必定是非常危险的，他们的学说无论如何是一股力量。政府为了使我们免受这个罪恶的怪物之害，破坏了刑法典的一切法律。为了挽回政府的荣誉，我们也来破坏我们仅有的一点点荣誉。让我们来感谢，让我们来判决。

莱茵的贵族和莱茵的资产阶级用自己的有罪判决来应和法国资产阶级在12月2日以后所发出的狂吠：“只有盗贼还能拯救财产；只有假誓还能拯救宗教；只有私生子还能拯救家庭；只有无秩序还能拯救秩序！”

法国的整个国家机构都已经出卖了灵魂。可是毕竟还没有一个机关像法国的法庭和陪审团那样彻底地出卖灵魂。科隆的陪审团和法庭喊道，让我们胜过法国的陪审团和法官吧。政变后不久，在舍尔瓦尔的案件中，巴黎的陪审团竟宣判罪证比任何一个被告都要多得多的奈特无罪。让我们胜过十二月二日政变的陪审团吧，让我们通过勒泽尔、毕尔格尔斯等人来补判奈特吧。

这样一来，在莱茵普鲁士还盛行的那种对陪审团的迷信就一扫而光了。显而易见，陪审团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

耶拿！³⁰⁹…… 这就是给需要这类手段来维持生存的政府和需要这种政府来保护的社会所作的最后结论。这就是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最后结论…… **耶拿！**

弗·恩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科隆
共产党人案件审理期间寄给
辩护人的文件的目录³¹⁰

(1) 致布劳巴赫兄弟转交施奈德(原件), 合伙人于 10 月 27 日。

(2) 致 J. A. 伯克尔转交施奈德(抄件), 迈克尔·肖克罗斯公司于 10 月 27 日。³¹¹

(3) 致约·戴·黑尔施塔特转交洪特海姆——致马克思, 费舍兄弟。

(4) 致 J. H. 施泰因转交埃塞尔第一——致马克思, 合伙人。

(5) 致莱昂哈德·萨代转交施奈德第二——致马克思, 斯密斯(威尔逊)·德赖尔公司。³¹²

(6) 致杜塞尔多夫商行转交施奈德第二——10 月 25 日寄自伦敦(马克思谈舍尔瓦尔的问题, 理论的阐述)。³¹³

(7) 致埃布讷——转交冯·洪特海姆——10 月 26 日于伦敦(马克思给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三份副本³¹⁴), 贝克尔和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信³¹⁵, 希尔施的新的笔迹样本——舍尔瓦尔在《人民报》

上的声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³¹⁶。

(8) 致格·荣克转交施奈德第二, 10月27日(?)于伦敦: 1. 得到确认的笔迹样本和书面宣誓证词。2. 给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第四份副本以及希尔施的笔迹样本。3. 贝克尔写给马克思的有关维利希的信的摘录³⁰⁴。4. 贝尔姆巴赫给马克思的三封信。5. 施梯伯的信的抄件。6. 给施奈德的指示以及关于第9号和第10号邮件的通知³¹⁷。

(9) 致施奈德第二, 挂号信——书面宣誓证词的副本。10月28日。

(10) 致杜塞尔多夫的韦特转交施奈德第二——10月28日第9号邮件的挂号回执。第三号, 第四号或第五号邮件。一件供施奈德第二使用。关于罗伊特、施梯伯和狄茨的问题的说明³¹⁸。10月29日。

(11) ……^①从 B. 公司寄给冯·洪特海姆。马克思给施奈德的第一封信的摘录。关于未收到施奈德的信的通知³¹⁹。

(12) G. 布兰克父子公司。

(13) 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

弗·恩格斯大约写于 1852 年
10 月 27—31 日
第一次用俄文发表于《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1977 年俄文第 2
版第 44 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① 手稿上字迹不清。——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科隆案件

致《人民报》编辑³²⁰

阁下！

下列签名人请您注意普鲁士报界，甚至包括像《新普鲁士报》这样一些最反动的报纸对于正在审理中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所持的立场，以及在目前，当 $\frac{1}{3}$ 的证词还没有审查完毕，对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文件都还没有加以查对，辩护人还一言未发的时候，这些报纸所表现出的那种值得赞扬的审慎态度。这些报纸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按照公诉人的说法把科隆的被告及其在伦敦的朋友——下列签名人——描写成“对近四年来欧洲的整个历史以及 1848 年和 1849 年所有革命动乱要负完全责任的危险的阴谋家”，而在伦敦却有两家知名的报纸《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信口开河地把科隆的被告和下列签名人描写成“一帮游手好闲的无赖”、骗子等等。下列签名人也向英国公众提出被告辩护人曾向德国公众所提出的同样请求——在案件审理完毕以前，不要忙于作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他们现在就作进一步的说明，普鲁士政府就有可能阻碍揭发警察的诡计、提供伪证、伪造文件、篡改日期、进行盗窃等等，这些手段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

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当所有这一切在当前的审判过程中被揭露出来时,英国的社会舆论,对于扮演最下流最卑鄙的政府密探的辩护人和喉舌的《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匿名作者,将作出公正的评价。

谨向阁下致以兄弟的敬礼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0月2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最迟写于1852年

10月28日

载于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第2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科隆案件

致《晨报》编辑³²¹

阁下！

请接受我真诚的谢意，感谢您对我的朋友，科隆被告的案件所给予的慷慨援助³²²。尽管被告的辩护人将会揭露普鲁士警探^①甚至在审讯过程中所干的一系列卑鄙行为，我还是想告诉您他们在最近为了证明我和科隆的被告之间存在着违法的通讯联系这一点而干出的骗人勾当。据10月29日《科隆日报》报道，警务顾问施梯伯先生造出了他的一个新文件——一封似乎出于我的手笔的令人可笑的信，说什么我在信中委托我的一个虚构的代理人“把50份《红色问答书》²⁹⁷从门缝里塞给克雷费尔德的某些公认的民主主义者，执行这一任务的时间选定在1852年6月5日午夜”。

为了我的被告朋友们，我特作如下声明：

(1) 我未曾写过上述的信件；

① 指茹·舍尔瓦尔、查·弗略里、尤·亨策、威·希尔施和麦·罗伊特等人。——编者注

(2) 我只是从本月 29 日的《科隆日报》上才知道有这封信；

(3) 我从未见过所谓的《红色问答书》；

(4) 我从未以任何方式帮助散发过这种《红色问答书》。

这个声明我也向马尔伯勒街治安法官陈述过，因而它等于经过宣誓所作的证词，我已把它寄往科隆，如蒙贵报予以披露，我将非常感激，因为这是防止普鲁士警察当局截留这个文件的最有效的方法。

阁下，我始终是您的顺从的仆人

卡尔·马克思博士

1852 年 10 月 30 日于伦敦
索霍广场第恩街 28 号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0 月
30 日

载于 1852 年 11 月 2 日《晨报》
第 1914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³²³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阁下!

我在9月28日写了一篇说明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活动真相的通讯^①,现在我发现那篇通讯引起了许多非难,使民主派报刊有机会大放厥词、进行谩骂和大肆叫嚣。

我确实知道科苏特并没有跟着叫嚷。如果他本人出来反驳我的论断,那我就要旧事重提,为所引用的事实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

可是,我写那篇通讯与其说是想攻击科苏特,不如说是想给他一个警告。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

至于那位以权威姿态反驳我的先生,那么我要提醒他一句古老的谚语:愚友和敌人没有两样。

民主派报刊、尤其是德国的民主派报刊方面的先生们,照例是叫嚷得最响亮的;我要告诉这些先生,他们全是顽固的隐蔽保皇党人。

^① 见本卷第765—768页。——编者注

这些先生离开了国王、神明和教皇是不行的。他们刚一脱离旧的统治者的监护,就给自己制造新的统治者,并且对“异教徒和谋叛者”暴跳如雷。这些人非常令人讨厌,因为他们揭露了令人不快的真相和公布了有损名誉的事实,从而对新晋升的民主之王和民主之神犯了欺君罪和渎圣罪。

您的特约通讯员

1852年11月16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1月
16日

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 针对科隆案件结束
发表的声明³²⁴

编辑先生!

为了对下列签名人自己和最近在科隆被判罪的他们的朋友们³⁰⁵负责,下列签名人认为有必要向英国公众提供一系列事实。由于德国报刊报道不完全,这些事实的真相几乎尚未传出科隆城墙。

仅仅在这个案件的预审上面,就花去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朋友一直被单独监禁着,什么消遣都没有,什么事都不许干。患者得不到治疗,就是得到了治疗,他们所处的条件也使这种治疗完全不起作用。甚至在提出起诉书之后,竟然违犯法律,不准辩护人^①与被告接触,而且被告的所有辩护手段都被剥夺了。

人们是怎样解释这样长久的、严酷的审前羁押的呢? 9个月过去

① 即约·埃塞尔第一、理·冯·洪特海姆、纳肯、卡·施奈德第二、许尔曼和泰斯马尔。——编者注

了,检察院宣布:“缺少客观的犯罪构成,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于是重新开始侦查。3个月后,当陪审法庭的新的开庭季度到来时,又说,调查文件太多,公诉人一下子难以把它们消化掉。又过了3个月,当起诉书已经送达被监禁者手中的时候,审讯在政府方面的一个证人^①生病的借口下又得中断3个月。这种不可言状的拖延原因何在呢?普鲁士政府心虚,不敢把它所大肆渲染的揭露材料在大庭广众之下同真正的犯罪构成相对照。

日期终于无法再向后拖延了,政府总算物色到了一个在莱茵普鲁士前所未有的陪审团,它由6个最反动的贵族、4个金融贵族和2个官僚组成。

向这个陪审团提供的是些什么材料呢?首先是一伙想入非非的阴谋家的一些荒唐的宣言和信件。这些阴谋家都是一个承认自己是警探的人舍尔瓦尔的同谋和工具。

这些文件有一部分存放在伦敦某个名叫奥斯瓦尔德·狄茨的人手里。在工业博览会¹³⁰期间,普鲁士政府趁狄茨不在家,让某个叫罗伊特的人撬开他的写字台,偷走了这些文件。由于这种偷窃行为,发现了巴黎的所谓德法密谋¹⁶⁹。

在科隆审判期间,尽管有证据证明,这些想入非非的阴谋家及其代理人舍尔瓦尔是被告和他们的几个下列签名的在伦敦的朋友的政敌,但是公诉人^②却运用了一种可信的逻辑。他认为,只是个人间的敌对才阻碍了科隆的被告及其在伦敦的朋友们成为舍尔瓦尔及其一伙的同谋。他用这种荒谬的方式证明道义上的同谋。更有甚者。在

① 即警察局长舒尔茨。——编者注

② 指奥·泽特。——编者注

人们要被告和下列签名的几个人对他们的敌人的行为负责的同时，那些承认自己是舍尔瓦尔的朋友的人以及他在伦敦的同伙却以王室证人的身份而不是以被告的身份出现在陪审法庭上。

在采取这种做法时，政府本身是心虚的。迫于舆论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去寻找能够站得住脚的证据。普鲁士国家的全部警察都行动起来，为首的是在科隆充当证人的施梯伯，此人是王室警务顾问、柏林刑事警察局长。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声称，有一个特别信使在当月17日从伦敦给他带来了一批十分重要的文件，这批文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被告同下列签名的几个人一起参与了一个共同的密谋。他向法庭提供的文件中，有一份就是所谓由我们操纵的一个秘密协会的“原本记录”^①。

施梯伯首先在他的前秘密信使从伦敦到达的日期上矛盾百出。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因此当面指责他作伪证。施梯伯只知道向法庭强调他所代表的王室的尊严，并且把自己装扮成普鲁士政府的化身，以此来摆脱窘境。

至于所谓的原本记录，施梯伯曾两次发誓作证说，它是货真价实的原本记录。可是，后来他在辩护人的追问下走投无路，只得承认原本记录纯粹是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在会议之后根据记忆私自编造的笔记本。最后，而且是借助于施梯伯自己的证词可以断定：这个笔记本只不过是他在伦敦的警探格赖夫、弗略里和希尔施根据定货制造出来的货物。希尔施本人也曾书面供认，笔记本是他在格赖夫和弗略里的指使下编造的。如果不是舍尔瓦尔的一个同伙^②设法让他跑掉而

① 见本卷第502页。——编者注

② 指奥·维利希。——编者注

逃脱了法庭的追究,那他早已因伪造罪被我们送上英国法庭了。格赖夫这个普鲁士的警监和此地使馆随员在案件结束前就从伦敦消失了,而找不到这两个同谋者,肯辛顿的弗略里的身份便无法查明。此外,已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因而公诉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把这份“文件”称为一个倒霉的本子。最后,他们又拿出一封所谓的由下列签名人之一马克思的信作为证据,而起诉人同样不得不承认它是伪造的。

这样,所有不仅应当包括有革命倾向,而且应当包括有密谋的事实证据的案卷都被证明完全是政府捏造的。政府十分害怕被当众戳穿,因此,不仅普鲁士邮局扣压寄给辩护人的文件,而且施梯伯甚至在公开法庭上在辩护人讲话之前扬言要追究辩护人同下列签名人有“犯法的通信关系”,试图用这种办法恐吓辩护人,并压下提供给他们

的证据。

如果说在缺乏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能宣判有罪的话,那么在这样的陪审团面前只有把新的普鲁士刑法典³⁰⁶作为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来加以利用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照此办理,就连《泰晤士报》和“和平协会”¹⁵⁵每天也都可能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此外,这个案件由于长期拖延和政府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手段,已成了一起重大案件,因而宣判被告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有罪,而在莱茵省人们普遍认为,一宣判无罪,就会立即打击陪审法庭制度。

最后,关于普鲁士政府和普鲁士法庭的特性,我们再补充一句:雅科比博士尽管被宣判无罪,却并没能因此而被释放出狱,借口是他多年以前在给一位朋友^①的私人信件中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① 指哥·吕特盖特。——编者注

使用了侮辱性的言词。

(签名)弗·恩格斯
卡·马克思

斐·弗莱里格拉特
威·沃尔弗

1852年11月18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1月
16日—18日之间

载于1852年12月10日《纽约
刑法报》第39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关于最近的科隆案件的最后声明³²⁴

致《观察家》编辑

阁下！

为了对下列签名人自己和最近在科隆被判罪的他们的朋友们³⁰⁵负责，下列签名人认为有必要向英国公众介绍一下同最近发生在该城的这一大案有关的事实，因为这一案件在伦敦的报刊上没有得到足够的说明。

仅仅为了弄到这一案件所需要的证据，就花了 18 个月的时间。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们的朋友们一直被单独监禁着，什么事情也不许他们干，甚至连书都不许他们看，患病得不到必要的治疗，就是得到了治疗，他们所处的条件也使这种治疗不起作用。甚至在已把“起诉书”转交他们之后，竟然直接违犯法律，不准他们同自己的辩护人交换意见。而这样长久、这样严酷的监禁的借口究竟是什么呢？当头 9 个月已经过去的时候，“检察院”宣布：缺乏起诉的根据，因此必须重新开始侦查。于是重新开始侦查。3 个月之后，当陪审法庭开庭之时，公诉人推托说，因证据堆积如山，他还未能把它们加以归纳整理。

又过了3个月,由于政府方面的一个主要证人^①生病,于是审讯再次延期。

这样一再拖延的真实原因,是普鲁士政府害怕把贫乏的事实同它所大肆渲染的“闻所未闻的揭发材料”相对照。最后,政府总算物色到这样一个在莱茵省前所未有的陪审团,它由6个反动贵族、4个金融贵族、两个官僚组成。

向这个陪审团提出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证据呢?不过是一伙无知无识的幻想家、追求荣禄的阴谋家的一些荒唐的宣言和信件而已,这些人都是一个名叫舍尔瓦尔的**公认的警探**的工具和同谋。在这以前,这些文件中的绝大部分都在伦敦的一个叫做狄茨的人的手里。在国际博览会¹³⁰期间,普鲁士警察当局乘狄茨不在家,撬开了他的写字台的抽屉,这样,就用通常的盗窃办法偷得了他们所需要的文件。这些文件首先被用来揭发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¹⁶⁹。现在科隆的法庭辩论已经证明,这些阴谋家及其在巴黎的代理人舍尔瓦尔正好都是被告及其在伦敦的朋友即下列签名人的政敌。但是公诉人硬说,只是某些纯私人的纠葛才使后者没有参加舍尔瓦尔及其同谋者的密谋。有人竟然想用这类论据来证明科隆的被告在道义上参与了巴黎的密谋!当人们要科隆的被告对他们的公开敌人的行动负责时,舍尔瓦尔的一些密友和同谋就被政府传到法庭,但他们并不是以被告的身份坐在被告席上——不,他们是坐在证人席上提供反对被告的证词。不过,这种做法显得太拙劣了。由于舆论的压力,政府不得不去寻找比较不令人怀疑的证据。在一个叫作施梯伯的人——政府在科隆的主要证人、王室警务顾问、柏林刑事警察局长的领导下,全部警察机器

^① 即警察局长舒尔茨。——编者注

开动起来了。在10月23日的法庭上，施梯伯声称，有一个特别信使从伦敦给他带来了一批特别重要的文件，无可争辩地证明被告同下列签名人一起参与了他所控告的密谋。“除其他许多文件外，信使还给他送来了在被告与之保持通信关系的马克思博士主持下举行的秘密协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可是施梯伯在他那矛盾百出的证词中竟把信使应当到达他那里的日期弄错了。而当被告的主要辩护人施奈德博士当面指责施梯伯的证词不真实的时候，施梯伯除了摆出一副他是负有国家最高当局所委托的最重要使命的国王代表的臭架子以外，不敢作任何别的回答。至于记录本，施梯伯曾两次发誓作证说，它是“伦敦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原本记录”。可是后来，他被辩护人逼得无可奈何，终于不得不承认这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密探所获得的一个笔记本。最后，从他本人的证词中也可以看出，记录本是蓄意伪造的，它出自施梯伯在伦敦的3个代理人——格赖夫、弗略里和希尔施之手。希尔施本人后来也承认，记录本是在弗略里和格赖夫的指使下编造出来的。这一点在科隆已经十分清楚地得到了证明，甚至连公诉人也说施梯伯的“重要的文件”是一个十分倒霉的本子，纯粹是捏造的。这个人也不认为政府提出来作为一种证据的那封模仿马克思博士笔迹的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原来这个文件也是一个明显而粗糙的赝品。同样，用来证明被告不是有革命意图、而是实际参与了某个重大阴谋的其他一切文件，原来都是警察当局伪造的。政府生怕被揭露，因而它不但迫使邮局把寄给辩护人的一切文件退还，而且还指使施梯伯用威胁手段去吓唬辩护人，说要控告他们同下列签名人有“犯法的通信关系”。

如果令人信服的证据一件也拿不出来，却又硬要作出裁决，那么，要做到这一点即使这样一个陪审团也只能通过下列办法，即把新

刑法典³⁰⁶当作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来应用；在这样应用法律时，就连《泰晤士报》与和平协会¹⁵⁵也随时有可能被扣上叛国的可怕罪名而受审判。此外，科隆案件由于长期拖延，由于原告方面采取了种种不寻常的手段，已成了一起重大案件，因而宣判被告无罪就无异于宣判政府有罪；而莱茵省普遍认为，宣判无罪的直接后果将是陪审团这个制度本身被废除。

阁下，我们始终是您顺从的仆人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卡·马克思

威·沃尔弗

1852年11月20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于
1852年11月16日—20日之间
载于1852年11月27日《观察家》第2339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弗·恩格斯

最近的科隆案件³²⁵

1852年12月1日星期三于伦敦

你们也许已经通过欧洲报刊获得许多关于普鲁士的科隆共产党人大案及其结局的报道。但是，鉴于这些报道没有一个哪怕是比较真实地说明了事实，鉴于这些事实充分披露了使欧洲大陆受到束缚的种种政治手段，我认为有必要回头来谈谈这一案件。

由于结社权和集会权的废除，共产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政党，同其他政党一样，都失去了在大陆上建立合法组织的可能性。此外，它的领袖们都已被逐出自己的国境。但是，任何政党没有组织都是无法存在的；自由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小商人阶级都可以用自己的社会地位、物质优势及其成员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日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这类组织，而没有这种社会地位和资财的无产阶级则必然被迫求助于秘密的联合。因此，无论在法国或者在德国都出现了许多秘密团体，这些团体从1849年以来被警察当局一个个地破获，并且作为阴谋家组织加以指控。如果说其中有许多的是阴谋家的组

织，的确是为了推翻现存政府而建立起来的，——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进行密谋，那他就是胆小鬼，同样，在另外的条件下他如果这样做，那他就是傻瓜——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团体，它们的建立则是为了更远大更崇高的目的，它们懂得：推翻现存政府只不过是即将来临的伟大斗争中的过渡阶段，它们竭力保持紧密的联系，并建立以它们为核心的党去进行最后的决战。这一决战或迟或早将必然在欧洲不仅永远消灭“暴君”、“专制君主”和“篡位者”的统治，而且永远消灭比他们的力量强大得多和可怕得多的力量即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德国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²⁷⁵的组织就是这样的组织。这个政党根据它的《宣言》(发表于1848年)的原则以及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连载的题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①这组文章中所阐明的原则，从来不抱这样的幻想：似乎它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制造革命去实现自己的思想。它研究了1848年革命运动的起因及其失败的原因。它认为，社会的阶级对抗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因此它致力于研究这样的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一个社会阶级可能和必然要担负起代表民族的整体利益的使命，从而担负起在政治上统治该民族的使命。历史向共产主义政党表明：继中世纪的土地贵族之后，最早的资本家的金钱力量怎样成长起来并且夺取了政权；这个金融资本家集团的社会影响和政治统治怎样被工业资本家这一新兴力量(从使用蒸汽时起)所取代；而目前另外两个阶级即小生意人阶级和工业工人阶级又在怎样要求统治权。1848—1849年的实际革命经验证实了一种理论推理，从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必须首先由小生意

① 见本卷第3—112页。——编者注

人民主派当政,然后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才能指望确立自己的政权并消灭使它处于资产阶级压迫之下的雇佣奴隶制。由此可见,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不能抱有推翻德国现存各邦政府的直接目的。建立秘密组织不是为了推翻这些政府,而是为了推翻迟早必将取它们而代之的那个叛乱政府,这种组织的成员可能而且无疑会在一定的时候个别地积极支持反对现状的革命运动;但是,除了在群众中秘密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之外,通过其他方式为这种运动作准备,这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这个团体的大多数成员对它的这些基本原则都是十分明了的,因此,当它的某些成员^①为追逐名位的野心所驱使,企图把同盟变成即兴地进行革命的阴谋家组织时,他们很快就被开除了。

现在,根据世界上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把这样的同盟叫做密谋团体,叫做密谋叛国的阴谋家组织。如果这也算是阴谋家组织的话,那也不是反对现存政府的、而是反对它的可能的继承者的阴谋家组织。这一点普鲁士政府也是知道的。当局之所以把11名被告单独监禁了18个月,利用这段时间来施展最惊人司法伎俩,原因也就在这里。在被拘留8个月之后,被告又被押了好几个月,“因为没有证明他们犯罪的证据”,简直岂有此理!最后,当把被告带到陪审团面前的时候,竟拿不出一个说明他们犯有叛国罪的确凿事实。但是他们毕竟被判了罪,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究竟是怎样被判罪的。

1851年5月,同盟的一个特使^②被捕,根据从他那里查获的文

① 指奥·维利希和卡·沙佩尔集团。——编者注

② 即诺特荣克。——编者注

件，接着逮捕了其他一些人。一个叫施梯伯的普鲁士警官很快就接到一项命令，要他寻找莫须有的密谋团体在伦敦的据点。他终于获得了一些与上述脱离同盟的人有关的文件，——这些人被开除出盟以后真的在巴黎和伦敦建立了一个密谋组织。这些文件是通过双重的罪行获得的。收买了一个叫罗伊特的人，撬开了该同盟秘书^①的写字台，从抽屉里偷走了文件。但是这还算不了什么。这种盗窃行为的结果是揭发出所谓巴黎的德法密谋¹⁶⁹，并给其参加者判了罪，但是仍然没有提供出共产主义者大同盟的线索。顺便提一下，巴黎的密谋的领导人是住在伦敦的几个爱虚荣的傻瓜和政治骗子以及一个过去曾经因伪造行为被判了罪但目前已在巴黎当上了警探的人^②。受他们愚弄的一些糊涂虫则是用狂暴的豪言壮语和杀气腾腾的咆哮怒吼来弥补他们在政治上的极端微不足道。

因此，普鲁士警察当局不得不去寻求新的发现。它在普鲁士驻伦敦的使馆里建立了一个常设的秘密警察分署。一个叫格赖夫的警探以使馆随员的头衔为掩护进行他的卑鄙活动——这种做法足以把普鲁士的所有使馆都置于国际法的范围之外，而这是连奥地利人也还不敢这样做的。在格赖夫的带领下工作的，有一个叫弗略里的伦敦西蒂区的商人，这个人有一定的资产而且在上流社会中有某些联系，是一个天生下贱专干卑鄙勾当的下流坯。另一个警探是商店职员，名叫希尔施，不过，他一到伦敦时就有人揭发他是一个密探。他曾经混入流亡伦敦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他们为了查明他到底是个什么人，曾短时期地接纳他加入团体。他勾结

① 即奥·狄茨。——编者注

② 即茹·舍尔瓦尔。——编者注

警察当局的证据不久就被发现，这位希尔施先生从此也就隐藏起来了。这样一来，他虽然已经没有任何机会获得可供出卖的情报，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当他幽居在肯辛顿时，虽然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上述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每周都要编造一些关于普鲁士警察当局根本无法破获的那个阴谋家组织的虚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会议的虚构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荒唐透顶。没有一个名字是确实的，没有一个姓是拼写正确的，强加在这个或那个人身上的话，没有一句是多少有点像他们可能说出的话。希尔施在伪造这些假货时曾得到他的老师弗略里的帮助，而且尚不能证明那个“随员”格赖夫没有插手这一卑鄙勾当。尽管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普鲁士政府还是把这些胡说八道的东西当作神圣的真理，可以想象，把这类证言当作提交给陪审团的证据，造成了什么样的混乱。案件开始审理时，上述的警官施梯伯先生坐在证人席上，发誓作证说所有这些荒谬的捏造材料都是真实的，并洋洋自得地硬说什么他手下的一个密探和这些在伦敦的当事人建立了极密切的关系，这些人应当被看作这一可怕密谋的主要组织者。这个密探的确处于极端秘密的状态，因为8个月中他在肯辛顿一直没有露过面，生怕真的碰到那帮人中的某一个人，——可是他又每周都要捏造关于这些人的最秘密的思想、言论和活动的报告。

然而，希尔施和弗略里这两位先生还搞了另一部杰作备用。他们把他们所捏造的全部报告改编成秘密的最高委员会——普鲁士警察当局硬说有这么一个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而施梯伯先生发现，这个本子与他过去从这两个人那里得到的报告惊人地相似，所以他立刻把它提交陪审团，并再一次发誓说，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他坚信这个本子是真实的。就在那个时候，希尔施所报告的绝大

部分荒谬的捏造材料公布了。当这个秘密委员会的虚构成员听到关于他们的、而他们自己在此之前却一无所知的种种事情时，他们何等吃惊是可想而知的。洗礼时本来命名为威廉^①的人，在这里却被改名为路德维希或卡尔；一些人硬被说成在伦敦发表过演说，其实当时他们在英国的另一个地方；报告中说一些人读过某些信件，其实这些信件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报告中还说什么他们每星期四都举行例会，其实他们只不过是在每星期三照例进行一次联欢；一个初学写字的工人^②竟成了记录员之一，并且以记录员的身份签了名；他们所有的人发言时都一律用倒像是普鲁士警察局的语言，但决不是以在本国享有盛名的著作家为主的一个联欢会上使用的语言。更为恶劣的是，还捏造了一张伪造者为收买记录本而向臆造的中央委员会的虚构的秘书付款的收据。但是这个虚构的秘书的存在，其根据只不过是某个调皮的共产党人用来愚弄倒霉的希尔施的一个迷阵而已。

这种拙劣的捏造是太糟糕了，结果竟弄得事与愿违。虽然被告在伦敦的朋友们根本不可能向陪审团说明真实真相，虽然他们寄给辩护人的信件在邮局里被没收了，虽然终于送到了这些陪审员手中的种种文件和书面宣誓证词不被允许作为证据，但是激起的公愤如此之大，以致公诉人^③，甚至曾发誓担保这个记录本的真实性的施梯伯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它是捏造的。

但是，这种伪造并不是警察当局违法干出来的唯一的伪造行为。

① 即威·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即马·韦·林格斯。——编者注

③ 即奥·泽特和奥·冯·泽肯多夫。——编者注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还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警察当局在罗伊特偷来的文件上加油添醋，借以歪曲文件的原意。有一个满纸荒唐言的文件是模仿马克思博士的笔迹写成的，这个文件直到最后公诉人方面不得不承认是捏造的以前，有一个时候硬被说成是马克思写的。但是，在警察当局的每一种无耻勾当被揭穿之后，又干出五六种无法立刻揭穿的新的无耻勾当，辩护人被弄得措手不及，证据要从伦敦去搞，而辩护人同流亡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的每一次通信在法庭上都被说成是参与假定的密谋的一种行为！

上面所描述的格赖夫和弗略里其人的真实面目，已由施梯伯先生本人在他的证词中讲清楚了。至于说到希尔施，他在伦敦治安法官面前曾经供认，他在弗略里的指使和协助下伪造了“记录本”，后来他为了逃避刑事处分而逃离了英国。

在审判过程中所揭露出来的这类可耻行径，使政府狼狈不堪。它物色的陪审团是在莱茵省闻所未闻的。6个贵族——十足的反动分子，4个金融贵族，两个政府官员。这帮人根本没有心思去仔细分析在他们面前堆了6星期之久的一大批乱七八糟的证据；在此期间他们耳旁经常听到的是：被告是可怕的共产主义密谋的头子，这个密谋的目的是要消灭一切神圣的东西——财产、家庭、宗教、秩序、政府和法律！可是，如果政府在当时不向特权阶级暗示：在这个案件中宣判被告无罪，这将成为废除陪审团的信号，并将被人理解为直接的政治示威，理解为中间阶级自由主义反对派准备甚至同极端革命派结成同盟的证据，那么就会判决被告无罪。结果，把普鲁士的新刑法典³⁰⁶当做具有追溯效力的法律来应用，使政府得以给7名被捕者判了罪，而只有4人被宣判无罪。被判罪者分别被判处3年到6年的监禁³⁰⁵。毫无疑问，你们在获得这个消息时，已经及时地报道

出去了。

卡尔·马克思

弗·恩格斯最迟写于 1852 年
11 月 29 日

载于 1852 年 12 月 22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64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关于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
无产阶级代表及其
家属的呼吁书³²⁶

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工人政党的先锋战士,特别是关怀他们的无依无靠的家属,是工人政党的义务。我们希望,旅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也不会把自己置于党的这项义务之外。

给被囚者及其家属的捐款,请寄伦敦哈克尼区萨顿广场3号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

约翰·贝尔

恩·德朗克

约·格·埃卡留斯

约·弗·埃卡留斯

弗·恩格斯

斐·弗莱里格拉特

伊曼特

厄内斯特·琼斯

格·罗赫纳

卡·马克思

威·李卜克内西

F·明克斯

卡·普芬德

威·皮佩尔

马·韦·林格斯

E·伦普夫

约·乌尔默

斐·沃尔弗

威·沃尔弗

明克斯第二

1852年12月7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2月
7日

载于1853年1月21日《纽约刑
法报》第45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
——迪斯累里的预算案³²⁷

1852年12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关于议会中重新掀起的党派斗争的重要结果所作的预言已经应验了^①。在本届会议开幕时,反对党掌握了对内阁不利的多数;但从那时起,构成这一多数的几个互相竞争的派别彼此削弱了对方。11月26日下院没有通过维利尔斯先生提出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激进的”决议案,而通过了帕麦斯顿勋爵提出的那个模棱两可的修正案,这就展示了议会里各个旧党派全都尔虞我诈和普遍分崩离析的情景。

把1846年的法令²⁴⁴说成是一项“英明而公正的”法令的维利尔斯先生的决议案,是背着科布顿和布莱特这两个最道地的自由贸易派而拟定的。辉格党已决定按自由贸易派的利益行事,可是在获得预期的胜利以后,既不让他们发挥主动性,也不让他们参加政府。最先

^① 见本卷第439—445页。——编者注

建议使用“英明而公正的”这种使内阁感到难堪的字眼的罗素，表示赞同格雷厄姆的修正案^①。得到内阁拥护者赞助的皮尔派²⁴⁰提出了一项提案，这项提案承认自由贸易在将来是适宜的，而否认它在过去是适宜的；这一提案使托利党有可能补偿由于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法令²⁴⁴而给自己造成的损失。正是这些皮尔派不赞成迪斯累里的修正案^②，他们重申自己的提案，准备支持最初那个主张自由贸易的决议案。本来已经快要取得胜利的辉格党，由于帕麦斯顿的出场而遭到了失败，后者维护格雷厄姆的修正案，从而在皮尔派的帮助下使内阁拥护者获得了胜利。最后，保护关税派内阁之所以获得这一胜利，就是因为它承认自由贸易，而且只有53名最坚决的执政党拥护者对此持反对态度。形形色色的虚假论据、政党倾轧、议会手腕、相互背叛等等，就是11月26日辩论的总结，在辩论期间，自由贸易政策被正式承认，不过它是由保护关税派进行解释，由保护关税派作为代表，由保护关税派付诸实行。

我在议会开会前写的一篇通讯中已经指出：在竞选演说中已拒绝恢复谷物法的迪斯累里，打算通过税收改革来补偿地主的损失，这种改革使农场主有可能缴纳同过去保护关税政策时期同样的地租^③。迪斯累里解除了农场主目前的一部分税负，而把它转嫁给了人民群众，他自以为给日益感到拮据的地主找到了一种万应灵丹，它比直接拿群众的胃进行投机的旧的不可靠的保护关税制度更有效得

① 詹·格雷厄姆(1852年1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85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83号第2版。——编者注

② 本·迪斯累里(1852年1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见1852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81号第3—4版。——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454—455页。——编者注

多。迪斯累里先生的计划的精明之处，就在于它是拿群众的钱袋进行投机；这一计划目前体现在他本月3日提交给下院的预算案中。而今晚的辩论大概将决定这个预算案的命运。

高谈“改善劳动阶级的状况的措施”已成了德国各邦政府和德国慈善家们的习惯。而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则可以毫不夸张地称之为一系列“改善有闲阶级的状况的措施”。可是，就像这类措施在我们的德国各邦政府和慈善家们那里总是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江湖骗术一样，英国财政大臣目前为了有闲阶级的利益而想出来的这个计划也纯粹是一种欺骗，其目的是通过主张表面上减轻农场主负担的办法，促使他们更加心甘情愿地缴纳现行的高额地租；迪斯累里只有借助于某种显然是真正榨取城市居民的措施，才有可能愚弄他们。

迪斯累里早就故作神秘地宣布了自己的预算案；他向全世界保证要创造不亚于第八奇迹的东西。据说他的预算案要“限期制止各种利害冲突；结束各个阶级之间的殊死的战争”，要“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满足，而不使任何人受到侵犯”，要“把各种各样的利益融合成为一个繁荣的整体”，要“通过确立”会在将来出现的“新原则第一次建立起我们的贸易和财政体系之间的和谐”。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已不再在将来出现，而在一星期以前就向英国议会和全世界宣布了的启示吧。像在作这种神秘的启示时所应做的那样，迪斯累里按照应有的仪式十分庄严地把它交付审议。皮尔在作1842年的财政报告时讲了两个钟头；迪斯累里则至少讲了5个钟头。他第一个钟头用来详细地证明：“受害者”并没有受害；第二个钟头他用来说明哪些事情是他不打算为受害者干的，他的这些话同沃尔波尔、帕金顿、马姆兹伯里的声明以及他自己过去的声明是相矛盾的；其余3个钟头则用来说明预算案，列举种种情节来描绘爱

尔兰的状况,说明国防问题,说明未来的行政改革以及其他一些有趣的题目。

预算案的要点如下:

(1) **航运业**。部分地降低灯塔税,一年中降低的总额约为10万英镑。这就是说,每吨在一年中所减轻的负担不到6便士,而且同时这要到第二年的下半年才能对航运业发生某种影响。完全停止征收过境运输税。海军部的某些触犯商船利益的权力将被取消,例如:海军军官如果在外国港口招募海员,不得要求立即付给他们薪水;他们应当对遇险的船只提供无报酬的帮助;在港湾里不得把非军事船只从最适合于停泊的地方赶走。最后,应当委派下院的一个委员会来处理领港和船上装载压舱物等项事宜。这就是全部有利于航运业的措施。可是,为了使自由贸易派不致由于这些规定对他们作了某种实际的让步而夸口,剩余的木材税仍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2) **殖民业**。允许在缴纳关税以前对食糖加以精制,这样,今后就要根据为出售而生产的精制食糖的数量征收关税,而不再按原糖征税。此外,准备鼓励中国人移入西印度,以保证种植场主有足够数量的廉价劳动力。食糖的差别关税不予取消。

(3) **麦麵税和蛇麻草税**。麦麵税应当降低一半,据迪斯累里说,这将使收入减少250万英镑。同时,蛇麻草税也要降低一半,这又将使收入减少约30万英镑,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从1853年10月10日起实行。取消现行的禁止外国麦麵输入的规定和现行的外国蛇麻草的进口税,应当对进口外国蛇麻草和麦麵规定新的税率,其数额应相当于对这些商品所应征收的消费税。

(4) **茶叶**。把现在对各种茶叶所征的税从每磅两先令两个半便士降低到一先令;可是这种降低税收的措施应当在6年之中逐步

实行：1853年降低四个半便士，以后每年降低两便士，一直到1858年为止。就1853年来说，这将使收入减少40万英镑。

(5) **财产和所得税**。这种税原定只实施到1853年8月5日为止，现在应规定延长3年；这种税的税额照旧，但它的分配应加以改变。对不动产的税额和各种职业收入的税额应当有所区别。不动产和国家证券的税额不变，即每英镑征税7便士；各种职业(农业、商业、自由职业、领薪水的工作)的收入税额计划由3%降低到2%。以后这些收入每英镑将只征税 $5\frac{1}{4}$ 便士。另一方面，免税的收入的限额，从一年收入150英镑降低到100英镑，对不动产和国家证券，则降低到一年50英镑。为了使农场主不致因这些准备实行的改变而遭到某种损失，向他们征税时将不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地租的一半来征收，而是根据地租的 $\frac{1}{3}$ 来征收，因此，这一变革将使凡是一年缴纳的地租不到300英镑的农场主都可以免税。为了对教会表示照顾，凡是一年收入100英镑的牧师都继续免于纳税。最后，所得税第一次被推广到爱尔兰，但这决不涉及地主，而仅仅适用于国家证券的收入和薪金。

(6) **房屋税**。规定凡是每年付房租在10英镑以上的租户都要缴纳房屋税，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每年付房租在20英镑以上的租户才缴纳这种税。此外，房屋税数额本身也增加一倍：这就是说，小店铺应缴的税额由每英镑6便士增加为1先令，住房应交的税额则由每英镑9便士增加为1先令6便士。

总起来说，这一预算案意味着：

一方面，把英国的所得税扩展到那些过去免税的城市居民阶级身上，并且向爱尔兰的国家证券持有人和公职人员征收这种税；把房

屋税推广到那些过去不缴纳这种税的城市居民阶级身上，并把这种税的数额增加一倍。另一方面——把由农业负担的麦糊税和蛇麻草税减少 280 万英镑；把由航运业负担的税额减少 10 万英镑，把茶叶税减少 40 万英镑。

由于征收新的所得税、扩大房屋税的缴纳者的范围并把房屋税的税额增加一倍，城市居民的税负加重了；这样做是为了使农村居民的税负减轻 280 万英镑。因此，小店主、工资收入较高的机械工人和商店职员都成了房屋税的纳税人，并且第一次成了征收所得税的对象。与此相适应，地皮每英镑缴税 7 便士，住房则每英镑缴税 2 先令 1 便士。降低茶叶税并不会改变这种对比关系，因为其数目同增加的直接税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而且其好处对农村和城市都是一样的。

免除爱尔兰的地主的一切所得税，并使英国的农场主和僧侣不受扩大所得税范围的影响，这显然是靠牺牲城市的利益来向农村表示仁慈。可是，从降低麦糊税得到好处的究竟是谁呢？是地主，农场主，还是消费者？把税降低意味着减少生产方面的风险。按照政治经济学规律，减少生产费用必然会使价格降低，因此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地主，也不是农场主，而仅仅是消费者。

不过，这里应当注意以下两种情况。第一，能生长头等大麦的土壤，在英国是专用的土地，而且只是在诺丁汉郡、诺福克等地才有，而外国麦糊的供应，受到商品本身的性质的限制，因为不论大麦或者麦糊都经不住长途的海上运输。第二，英国的大啤酒酿造者实际上握有那种主要以现行的特许证制度为基础的垄断权。因此，甚至谷物法的废除也没有使黑啤酒和淡色啤酒的价格下降。

所以，从降低麦糊税得到好处的既不是农场主，也不是消费者，

这些好处将为地主和大啤酒酿造者所瓜分。既然消费税征收局仍然对农业进行可恶的干涉，那么，征收以往各种税的半数所需要的行政开支，将同过去征收全数时所需要的相等。现在，为征收1440万英镑的消费税所需的开支，每100英镑是5英镑6先令。而把税收减少300万英镑以后，每100英镑的开支则为6英镑到6英镑4先令。总而言之，收入越是减少，有害无益的开支就越是增加。

因此，迪斯累里的预算案可以说就是对地主的补偿，而且是“十分慷慨的补偿”。

可是，这一预算案还有另外一个同样奇特的地方。

如果你们想实行自由贸易的贸易制度，那么，你们首先就是改变财政制度。“你们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迪斯累里这样说，而迪斯累里是正确的。

直接税，作为一种最简单的征税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形式，是与以土地私有为基础的社会状况同时产生的。后来，城市实行了间接税制度；可是，久而久之，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制度，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需求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流。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搞乱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越来越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公共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实行自由贸易而不得不采取直接税制度的英国工业阶级，究竟用什么办法能够实行直接税制度，而不致激起公众的不满或增加自

己的负担呢？

这只有通过下列三种办法：

向公债进攻。可是，这将是对国家信用的破坏，是没收，是革命的措施。

把地租变成征税的主要对象。但这也是对财产的侵犯，也是没收，也是革命的措施。

收回教会掌握的财产。但这仍然是对财产的进一步侵犯，仍然是没收，仍然是革命的措施。

科布顿大声喊道：“决不能这样做，我们只应当缩减公共开支，这样，我们也就减轻我们目前的税额。”

这是一种空想。首先，英国和大陆之间的国际关系要求不断地增加国家开支；其次，科布顿所代表的工业阶级的胜利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只会变得更加紧张，用于镇压方面的开支也会越来越多。换言之，预算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缩减。让我综述一下。

自由贸易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地主和国家证券持有人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指望从自由贸易中得到的主要成果，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2年12月
9日前后

载于1852年12月28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65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卡·马克思

答科苏特的“秘书”³²⁸

致《纽约论坛报》编辑

1852年12月14日星期二于伦敦

阁下！

不久前我写的一篇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的活动的通讯^①在美国报刊上引起了一片喧嚣。因此，最近我曾寄给您一篇关于该通讯的说明^②。在那篇说明里我曾经顺便指出，科苏特本人和那些由于我的通讯而引起的无数文章是毫无关系的，而且我与其说是想攻击被提到的有关人，不如说是想给他们一个警告，等等。那篇说明谈了当时我认为关于这个问题所必须谈的一切。后来我收到了最近出版的美国报纸，其中包含有好像是出自科苏特先生的秘书之手的、对我的报道所作的类似正式辟谣的东西。关于这个“文件”我必须通知您，科苏特经我询问，已向我肯定地作了如下的说明：

（1）目前他根本就没有秘书；

① 见本卷第552—553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65—768页。——编者注

(2) 上述“辟谣”并未得到他的认可；

(3) 他在接到我的通知前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权威的”声明，我就不预备再谈这个问题了。
让那些不请自来、不适当地表现殷勤的辩护士去自寻安慰吧。

您的特约通讯员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2 月
14 日

载于 1853 年 1 月 4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65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内阁的失败³²⁹

1852年12月17日星期五于伦敦

我要赶快告诉你们昨天晚上辩论的结果，这就是内阁的失败。

在大臣们遭到这次总的失败之前，他们那位最勇敢的战士陆军大臣阿基里斯·贝雷斯福德³³⁰的单独作战就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德比选举审查委员会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这个报告确认了自由党人的起诉状中所揭发的各种事实，并且得出结论说，证明材料已经证实：在德比的选举期间普遍采用了贿赂手段。但是委员会并没有进一步审查罪证，它没有直接控告贝雷斯福德先生的行贿行为，而只限于对他的“态度轻率和不顾后果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指责^①。且看议会是否同意这个可尊敬的委员会的意见，是否容许贝雷斯福德先生继续保留他在议院里的席位吧。如果是这样，议会本身就等于认可贝雷斯福德大臣先生关于“英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贱民”这一著名的

^① 《德比选举审查委员会》，见1852年12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01号第2版。并见本卷第434页。——编者注

格言^①。不管怎样，贝雷斯福德的大臣的官职是难保了。

在谈了这一小段题外话以后，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

下院的议员们一连花了4个晚上零大半个晚上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是应当审查整个预算案还是应当审查整个决议，是研究原则还是研究事实，是研究这一点还是研究那一点。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议院目前只应当研究提高房屋税和扩大直接税征收范围的问题。

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案^②中的这一重要主张遭到了议院的否决，表决的结果是：

286票赞成，305票反对。

内阁的反对者多得了19票。在此以后，议院决定把下次会议延迟到下星期一举行。由于时间不够，我不可能尽情地在这次辩论进行详细的分析。因此，我只能谈谈迪斯累里先生最后一次发言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而他的发言无疑是在所有发言中最值得注意的。

前财政大臣查理·伍德爵士和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集中火力攻击了迪斯累里关于动用公共工程借贷资金（每年40万英镑）来弥补由于降低航运税而造成的亏空的建议。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非常起劲地论证了这笔资金的良好作用。迪斯累里先生对这一点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想向委员会指出过去曾经有过多么令人吃惊的滥用国家资金的行为，指出实际上曾经不经议会的同意、不受议会的监督而仅仅是通过主管这项公共

① 《新内阁的选举。贝雷斯福德少校著》，见1852年3月13日《经济学家》（伦敦）第386号。——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573—580页。——编者注

工程借贷资金的机关就浪费了多少金钱。”

接着他就详细地揭露了辉格党政府在这笔资金上面玩弄的卑鄙的财政手腕。然后，迪斯累里说明了他的预算案所依据的原则。

“在决定我们第一步究竟应当怎样走之前，需要解决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我们应当建议国家规定多大的直接税的数目才是任何想走上财政改革道路的内阁所必不可少的。（喊声：“听呀！”）哈利法克斯的议员（查理·伍德爵士）指责我的提案是轻率地增加国家的直接税。（喊声：“听啊，听啊！”）卡莱尔的议员（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责备我随便地把直接税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首先，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的这个提案并非轻率地增加直接税的税额，它如果被通过了的话，直接税也不会达到这位可敬的绅士、哈利法克斯的议员掌管财政时期所达到的数额。因为他不仅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甚至还征收窗口税；在实行窗口税的最后一年，他从这种税得到的收入将近 200 万英镑。（掌声）这位警告我们不要轻率地提高直接税额的可敬的绅士，在掌管财政的最后一年减少了窗口税的数额，满足于用另一种税代替窗口税而获得的 70 万英镑这样一个小小的数字。但是我不会忘记，轻率地责备我提高直接税额的这位可敬的绅士起初提出过一个完全用另一种税实行代替的议案，而这样就会使他的房屋税比我曾经提出过的要高。（热烈的掌声）但是，就只这些吗？这位责备我轻率地提高国家直接税的可敬的绅士所做的就只这些吗？正是这位征收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其确切数额的财产税的财政大臣，正是这位征收了近 200 万英镑的窗口税的大臣，有一次曾经来到下院，提出了一个使会议大吃一惊的提案：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将近一倍。（热烈的掌声）我认为这种行为才真可以说是一种毫不考虑后果的轻率态度……我们听说过把房屋税增加一倍——这是一个区区的数目；但是，如果这位可敬的绅士真的把财产税和所得税增加一倍，那么我看指责他轻率地提高国家的直接税倒是公平的。（热烈的掌声）有人在叫嚷什么轻率态度！难道在财政史上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这位可敬的绅士所表现的轻率态度相提并论吗？（热烈的掌声）究竟他有什么根据提出这样一个奇怪的不可思议的提案，一个只有在关系到国家安危的情况下才应该提出的提案呢？当他遭到抵制、遭到失败和备受嘲笑的时候，他又声明说不实施他的这个提案收入已经够用了。（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假如将来有一位历史家叙述说，这位大臣提议把所得税增加将近一倍，而第二天他又声明财源充足，大家一定都不会相信这位

历史家说了实话。(又爆发一阵掌声)”

迪斯累里这样向查理·伍德爵士进行报复之后,继续说道:

“我们应当说明,财产和收入之间,不固定的收入和固定的收入之间是有差别的。其次我们应该维护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也仍然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原则,这个原则即使现在不被承认和通过,最终也一定会被承认和通过,这个原则就是**直接税的基础应当扩大**。(执政党议席上发出赞同的喊声)……假如有人想把如下的状况作为我们的社会制度的永恒的特征:即要形成这样一些阶级,它们靠把不堪忍受的直接税重担强加在社会上一部分比较富有的人身上,而把不堪忍受的间接税重担强加在工人阶级身上,以便维持自己的政权,那么我不能设想有什么东西会比这样做对我们国家更为危险和更能引起毁灭性的后果。(掌声)不过,我深信,特权阶级将会首先体验这种毁灭性的后果。”

迪斯累里把话题转向自由贸易派,他说:

“在这里我们看到,殖民地关税的伟大的反对者们异口同声地拥护对生产者课以重税;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好像是故意要嘲笑我们似的,竟利用了我们至少是有勇气体面地放弃了的那些错误论点。(热烈欢呼)你们对我说,保护关税政策已经死亡,你们对我说,保护关税派的政党已不存在!不!它屹然挺立,它就在这里。(用手指反对党议席)他们不仅坐在我们原来的席位上,而且坚持我们的原则,不过,我相信他们也同样不会作出多大的成绩。(掌声)”

最后迪斯累里对查理·伍德爵士劝他收回自己的预算案的忠告作了如下的回答:

“有人劝我收回自己的预算案,有人对我说,皮特先生收回了自己的预算案,而且不久前其他一些人(辉格党人,其中包括查理·伍德爵士)也这样做了。(笑声)我并不羡慕皮特先生的荣誉,但也不想降低到其他一些人那样的水平。(热烈的掌声)不,先生们,我已经看到,无力实行自己措施的政府将会得到什么结果,这种结果对政府既不光荣,对国家也无好处,而且,照我看来,对我十分珍视的议院的名声颇为不利。(热烈的掌声)我想起了一个预算案,这个预算案曾

经在 1848 年提出又收回,重新提出又重新收回,再提出又再收回。(笑声)这个只是在人们忍耐的情况下才勉强存在的政府的活动造成了什么结果呢?在这个国家的财政上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结果不正是我现在必须努力加以纠正的那种代替窗口税和房屋税的可耻行为吗?(掌声)不满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党派方面的问题……是的,我很清楚我将遇到什么。我遇到的将是一个联盟。(掌声)这种联合可能会得到成功。过去也曾经有过得到成功的联盟。不过,即使是得到成功的联盟,其胜利也总是很短暂的。我也知道,英国不喜欢联盟。(掌声)我不愿意求助于联盟,我要诉诸支配着国家的社会舆论。由于自己那种英明的不可抗拒的影响,社会舆论甚至足以左右议会的决议,没有它的支持,最庄严最古老的机构也不过是没有根基的幻想的东西。(这位可敬的绅士在震耳的、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今天各报对于内阁这次失败的后果的看法如何呢?

《纪事晨报》(皮尔派²⁴⁰的机关报)和《晨报》(激进派的机关报)认为内阁一定会辞职。《泰晤士报》也同样认为大臣们会提出辞职,不过它怀疑反对党是否能像它推倒旧政府一样容易地成立起新政府。《每日新闻》(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机关报)认为倒台的内阁可能和帕麦斯顿勋爵联合起来重新组阁。《晨邮报》(帕麦斯顿的机关报)认为这种重新组阁是一种当然的事情。最后,《先驱晨报》(德比—迪斯累里派的机关报)声称如果大臣们今天提出辞呈,女王^①明天就会被迫把他们重新召回。

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大臣们由于自由贸易派的扩大直接税的决议案而遭到了失败。但是他们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如果说他们曾经以否定自己的原则为代价而胜利地击退了议会的第一次攻击,那么反对党所以能在第二次战役中战胜他们,也正是由于反对党放弃了他们自己的原则。

①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这样,这次辩论完全证实了我以前谈到的议会中各个政党的状况^①。联合起来的反对党和 286 名紧密团结的托利党人相比,仅仅获得 19 票的优势。如果由他们组织新政府,则这个政府很快就会垮台。如果反对党组成的新政府解散下院,那么,将在原来的条件下进行的新的选举,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在新的下院中重新开始旧的角逐的时候,各党派又会照旧相互削弱,英国的政治又会重新陷入兜圈子的境地。

因此我认为,现在还是同过去一样必须在二者之间作出抉择:或者是让托利党政府继续存在下去,或者是实行议会改革。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2 年 12 月
17 日

载于 1853 年 1 月 6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5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439—445 页。——编者注

卡·马克思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 前途及其他³³¹

1853年1月11日星期二于伦敦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政治千年王国³³²的开始,在这个王国中,派系纷争的风气将从地面消失,只有天才、经验、勤劳和爱国主义才会成为适合于担任官职的唯一品质。现在内阁成立了,在我们看来,它得到各派人士的赞同和支持,它的原则也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①

《泰晤士报》首先用这些话热情洋溢地颂扬了阿伯丁政府的成立。根据该报的语调,人们会认为,从今以后为英国造福的将是一个完全由年轻有为的新人物所组成的内阁。所以,当全世界发现在大不列颠的历史上开辟新纪元的几乎全是些年逾八十精力不济的衰朽老头时,无疑都会大为吃惊。阿伯丁年近八十;兰斯唐已行将就木;帕麦斯顿和罗素也近乎如此;格雷厄姆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就差不多在历届政府里供职的官僚;内阁的其他成员,由于年老体衰,已经死过两

① 见1859年1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16号第4版第2—3栏。——编者注

次,只是又人为地复活。一句话,10个百岁的老头——这就是《泰晤士报》的政论家用简单的加法组成新的千年王国的材料。

他们向我们保证说,在这个千年王国里,任何派系纷争,甚至党派本身,都必将消失。《泰晤士报》想以此来说明什么呢?从前一直享有使自己表面上成为民族政党或议会政党的特权的某些贵族集团,现在已经认识到这种滑稽剧将来不可能继续演下去了,这些贵族集团由于这种认识和近来他们所取得的惨痛教训决定停止小小的内讧,并且为了保卫他们的共同特权而联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难道仅仅因为这种原因从这个时刻起一切党派就不会再存在了吗?难道组成这类“联合”的事实本身不是清楚地表明,那两个真正在成长壮大但又局部地丧失代表资格的现代社会的的基本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要争取全国仅有的两个政党的地位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吗?

在德比勋爵执政时期,托利党人¹⁴⁹永远地放弃了自己的旧的保护关税理论,并宣称自己是自由贸易派。当德比伯爵宣布自己的内阁辞职时,他说:

“诸位先生,我记起了——而你们,诸位先生,大概也会记得——高贵的伯爵(阿伯丁)在本议院曾不止一次地宣称,除了自由贸易问题以外,他同现政府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有什么分歧。”^①

阿伯丁伯爵在证实这种说法时走得更远,他指出,“为了抵抗民主派的侵害,他准备联合高贵的伯爵(德比),但是,他无法指出,哪儿有这种民主派”^②。根据两方面的承认,在皮尔派²⁴⁰和托利党人之间

① 《1852年12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52年1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不再存在任何分歧,但这还不是全部。关于外交政策,阿伯丁伯爵指出:

“30年来,我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没有改变,尽管在执行过程中有过某些差别。”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1830年到1850年一直在阿伯丁和帕麦斯顿之间进行的整个斗争,即前者力求与北方强国结成同盟,而后者坚持同法国“友好协约”;一个反对而另一个赞成路易-菲力浦;一个反对而另一个赞成干涉³³³;总之,他们所有的纠纷和争论,甚至不久以前他们对马姆兹伯里勋爵“可耻的”外交事务决策的共同愤怒——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英国的政治关系中还能找到比它的外交政策遭到更彻底的改变的其他东西吗?1830年前同北方强国结盟;从1830年起同法国结盟(四国同盟³³⁴);从1848年起英国同整个大陆隔绝而陷于完全的孤立。

首先,德比勋爵向我们保证说,托利党人同皮尔派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随后,阿伯丁伯爵又向我们保证说,皮尔派同辉格党人、保守党人同自由派之间也没有分歧。按照他的意见:

“国家由于这些毫无意义的、对政治活动家的行动或原则没有实际影响的区别而弄得疲惫不堪。除了保守党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都是不可能的,——同样正确的是,除了自由派政府以外,任何别的政府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术语没有十分明确的含义。这些毫无意义的区别已使国家感到厌恶。”^①

这样一来,3个贵族党派——托利党人、皮尔派和辉格党人¹⁴⁵一致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此外,在另外一点上他

① 《1852年1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们也都是一致的。迪斯累里曾申明，他打算实行自由贸易的原则。阿伯丁勋爵说：

“女王陛下的现任各大臣的伟大目的和他们执政的主要特点，往往是保护和合理地扩大自由贸易。这是特别委托给他们的使命。”^①

总而言之，整个贵族阶级都同意，政府应该使中间阶级得到好处，实行有利于它的政策，但同时他们又决定不让资产阶级直接领导这方面的事务。为了这个目的，旧的寡头政体使尽全力去搜罗它那里的有才干、有影响和有威望的人，组成一个政府，这个政府的任务就是尽可能长久地阻止资产阶级直接掌管国家大权。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第一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

厄内斯特·琼斯在《人民报》上指出：

“当然，排除中间阶级的明显意图，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加以伪装，他们（大臣们）想用一种办法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把一些次要的和影响不大的职位让给如威廉·莫尔斯沃思爵士、贝尔纳·奥斯本等这些自由派的贵族。但他们不该设想，梅费尔区335的这种花花公子式的自由主义会使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那些严肃的信徒感到满意，后者所追求的就是做生意，别无其他。他们所追求的就是英镑、先令和便士，是职务和地位，是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巨额收入，这个帝国连同它的一切资源都应该专为他们的阶级利益服务。”^②

而实际上，只要浏览一下《每日新闻》，《晨报》，特别是《曼彻斯特时报》，即布莱特先生的直属机关报，就足以使人相信，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在答应给联合政府以临时支持时，只愿意遵循皮尔派和辉格

① 《1852年1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53年1月1日《人民报》上的《新的伪装》。——编者注

党人对上一届德比内阁所实行的政策,这就是要使大臣们接受体面的考验。至于这种“体面的考验”的意义是什么,迪斯累里不久以前已经有机会领教过了。

因为托利党内阁的失败是由爱尔兰旅²⁶¹决定的,所以新的联合政府自然认为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保证自己在议会中得到这个党团的支持。他们用财政大臣的职位很快地引诱上了爱尔兰旅的经纪人萨德勒先生,使基奥先生得到了爱尔兰副检察长的官职,让蒙塞尔先生当了军械局秘书。

《先驱晨报》写道:“他们指望用这三项收买来争取到爱尔兰旅。”^①

然而,我们有足够的根据怀疑,这三项收买是否能保证得到整个爱尔兰旅的支持,我们现在就已经在爱尔兰的《自由人报》上读到了这样的话:

“目前已经到了解决租佃者权利问题和宗教自由问题的决定性时刻。这些问题的成败,现在不取决于大臣们,而取决于爱尔兰的议员。德比政府是被19票推翻的。如果有10个人转向另一方,那就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在这种各党派状况下,爱尔兰议员是万能的。”^②

在前一篇的末尾,我表示了这样的意见:或者是托利党政府,或者是议会改革,二者必居其一^③,读者如果了解一下阿伯丁勋爵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那将是很有趣的。他说:

① 1853年1月4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046号第4版第1栏。——编者注

② 《我们的特约通讯员星期五早晨4时发自伦敦的报道》,见1852年12月18日《自由人报》(都柏林)第2版。——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588页。——编者注

“改善人民的状况，不能排斥(原文如此!)对代议制加以修正，因为毫无疑问，在最近一次选举中发生的事件，不能唤起人们对这种制度的热爱。”^①

阿伯丁勋爵的同僚在他们担任政府要职之后进行的选举中异口同声地宣布，代议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同时，他们每次都要自己的听众了解，这样的改革必须是“温和的、合理的，改革不应操之过急，要深思熟虑，谨慎从事”^②。可见，现在的代议制变得越腐败，而且这一点越是被公开承认，有人就越不愿意迅速和彻底地改变这种制度。

最近这次大臣的改选，对一个新的发明作了首次试验，这个发明使政治活动家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否任职，都能够保持自己的地位。这个发明就是使用至今尚未在实际中运用过的“尚待商榷的问题”这个概念。奥斯本和维利尔斯过去曾当众保证赞成秘密投票，可是现在他们又说这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莫尔斯沃思曾保证为殖民地的改革而斗争，这又成了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基奥、萨德勒等人曾保证维护租佃者权利，这也成了一个尚待商榷的问题。总之，他们作为议员时向来认为已经解决了的一切问题，在他们当了大臣之后，都变成了悬而未决的了。

最后，我还必须指出由于皮尔派、辉格党人、激进派和爱尔兰人的联合而出现的另一个新奇的情况，它们的每一个著名的活动家，都被调离适合于他们发挥某种才能或运用某种知识的那些部门，而被委派到对他们很不恰当的岗位上去。帕麦斯顿这位著名的外交大臣被委派到内务部，而在内务部干了一辈子的罗素却被调去掌管外交。

① 《1852年1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53年1月6日《晨报》(伦敦)第19201号第4版第3栏。——编者注

格莱斯顿这个皮由兹教派³³⁶的埃斯科瓦尔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作为韦克菲尔德先生的荒谬的殖民主义制度³³⁷模仿者或拥护者而获得一定声望的莫尔斯沃思，当了公共工程主任委员；在任财政大臣时经常被财政赤字或盈余而弄得到处碰壁的查理·伍德爵士，现在当了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连来复枪和火枪的区别都分辨不清的蒙塞尔被任命为军械局秘书；唯一没有调离原职的一个人是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他在任海军首席大臣时很早就由于第一个把腐烂的蛆虫带进不列颠舰队而博得了极大的荣誉。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初一—最迟 1 月 11 日

载于 1853 年 1 月 2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77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
——饿死人事件³³⁸

1853年1月14日星期五于伦敦

约翰·罗素勋爵在外交部接受外交官衔证章时宣称,他只是临时担负这个部门的工作,在不久的将来,外交部将转交克拉伦登伯爵掌管。的确,罗素勋爵在外交部门始终是个真正的外人,他没有任何特殊表现,只是搞了一部枯燥的历史汇编^①——大概是关于从尼姆韦根和约以来所签订的各个条约的历史汇编,而这本书老实说充其量不过是像这位罗素一度用来震惊世界的那本“悲剧”^②一样地引人入胜。约翰勋爵十之八九会成为下院的首领,同时又在内阁中占有一个位置,看来,他在内阁里将集中全副精力来制定新改革法案。而自从1831年罗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措施以来,议会改革就是他的传统舞台,他曾得心应手地在托利党¹⁴⁹人和辉格党¹⁴⁵人之间分配腐朽的

① 约·罗素《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1824—1829年伦敦版第1—2卷。——编者注

② 约·罗素《唐·卡洛斯。五幕悲剧》1822年伦敦版。——编者注

城镇选区³³⁹。

我曾预言，内阁为了把整个“爱尔兰旅”²⁶¹争取到联合政府方面而对三位爱尔兰议员所采用的收买手段^①，可能是无济于事的；这个预言完全被证实了。《自由人报》和《小报》的立场，卢卡斯先生、穆尔先生和达菲先生的书信和声明的语调以及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³⁴⁰的最近一次会议所通过的反对萨德勒先生和基奥先生的决议足以证明，阿伯丁政府将控制的仅仅是爱尔兰部队的极小的一部分。

众所周知，内阁的首脑阿伯丁勋爵将出席上院会议。布莱特先生不久前在曼彻斯特欢迎美国新任大使英格索尔先生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时，利用机会宣称，彻底废除上院是工业中间阶级“进步”的必要条件。自从组成联合内阁以来，这是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第一次正式声明；这个声明大概在某种程度上将帮助阿伯丁勋爵发现那个使德比勋爵恐惧万状的民主派的踪迹。

由此可见，《泰晤士报》的乐观主义的撰稿人曾声称永远消除了的党派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尽管“千年王国”的纪元是以议会会议延至2月10日而开始的。

在新年之初，人们异口同声地大肆宣扬商业和工业繁荣的继续和增长，这一点已由公布的截至本月5日为止的国家收入报告、商业部关于最近这一个月和截至1852年12月5日为止的11个月的正式报告、工厂视察员的报告以及每到新年之初发表的综述上一年整个商业情况的商业年报得到了证实。

国家收入报告表明全年收入总共增加978 926英镑，最后一个季度增加702 776英镑。除关税外，本年的各项收入均有增加，国家

① 见本卷第593页。——编者注

收入总额达 50 468 193 英镑。

被认为是人民福利标志的消费税为：

截至 1852 年 1 月 5 日为止的 1 年……………13 093 170 英镑

截至 1853 年 1 月 5 日为止的 1 年……………13 356 981 英镑

商业活跃程度的标志——印花税为：

1851—1852 年度……………5 933 549 英镑

1852—1853 年度……………6 287 261 英镑

表明上层阶级财富增加程度的财产税为：

1851—1852 年度……………5 304 923 英镑

1852—1853 年度……………5 509 637 英镑

商业部关于截至 1852 年 12 月 5 日为止的 1 个月和 11 个月的报告表明：

	1852 年	1851 年	1850 年
出口价值(按英镑计算)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 1 个月	6 102 694	5 188 216	5 362 319
至 12 月 5 日为止的 11 个月	65 349 798	63 314 272	60 400 525

可见，上述 1 个月的出口价值几乎增加了 100 万英镑，而 11 个月的出口价值增加了 200 多万英镑。至于进口价值的增长是否与出口价值的增长相平衡或者被出口价值所超过，由于缺乏进口价值的任何资料，我们无法知道。

再来看看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兰开夏郡地区工厂视察员霍纳先生在他刚发表不久的关于截至 1852 年 10 月 31 日为止的半年情况

报告中写道：

“至于毛纺厂、精梳毛织厂和丝织厂的情况，一年来在我负责的地区变化不大，亚麻厂仍处于1851年11月1日的那种状况。但棉纺织厂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减去目前停工的工厂（其中很多工厂大约很快就可以复工，特别是保全了机器设备的工厂），近两年来投入生产的新工厂有129个，总计达4 023马力。53个现有工厂增加2 090马力，因此，总共增加6 113马力。看来，这至少可以使棉纺织业增添24 000名工人。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因为目前还有许多新的工厂正在兴建。在包括阿什顿、斯泰利布里奇、奥尔德姆和利斯等城市在内的一个不大的地区，就有11个工厂在兴建。估计共达620马力。据说，机器制造厂主对定货单简直招架不住。不久前一位十分明智的、善于观察的工厂主对我说，现在许多正在建筑的工厂，由于搞不到机器设备，大约最快也要到1854年才能开工生产。尽管上述材料以及我的同行当前可引用的材料能够说明生产的巨大增长，然而，这些材料决不能反映这种增长的全貌。因为目前存在着生产增长的巨大的和十分丰富的源泉，而关于这方面还很难得到什么资料。我所指的就是蒸汽机的现代化的革新，由于这种革新，旧的、甚至新的发动机，其所作的功，能够发挥大大超过其正常的、过去认为不可能达到的马力”。

接着，霍纳先生引用一位杰出的土木工程师内史密斯先生从伯明翰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说明了加速发动机的运转并给它们装上伍尔夫的高压双重汽缸能够增加动力，结果是仍在使用的同一台发动机所作的功比革新以前至少提高50%。

从所有工厂视察员的报告的总结材料中可以看出，到1852年10月31日为止的1年中，开工生产的新工厂共有229个，它们共拥有4 771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586马力的水力发动机；扩建现有工厂69个，拥有1 532马力的蒸汽发动机和28马力的水力发动机；两项总计达6 917马力。

往下，再来看看商业年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年报都充满了像《泰晤士报》颂扬政治千年王国时的那种激情，不过，无论如何，这些

年报总比这家报纸要好些，因为它们在涉及到过去一年的情况时所依据的是事实而不是愿望。

农业也没有抱怨的理由。年初，小麦的每周平均价格是 37 先令 2 便士，年底就达到了 45 先令 11 便士。由于谷物价格的上涨，牲畜、肉类、油类和干酪的价格也提高了。

1851 年 8 月，某些产品，主要是糖和咖啡的价格空前下跌，并且一直到 1851 年年底还在继续，因为明辛街³⁴¹的混乱在 1852 年 1 月才达到了顶点。现在年报指出大部分外国产品，特别是从殖民地输入的产品，如糖、咖啡等等的价格大大上涨。

至于原料的情况，我们可以根据下列材料来加以判断。

休斯—罗纳德公司在年报中写道：

“羊毛贸易状况在去年整个一年中非常令人满意…… 国内市场对羊毛的需求量空前巨大…… 毛织品和精梳毛织品的出口规模十分巨大，甚至超过了 1851 年，而 1851 年的出口额曾是空前之大的…… 价格不断上涨，但是暴涨只是在最近一个月内发生的，因此目前可以认为，这些产品的价格与去年同期比较平均超过 15—20%。”^①

邱吉尔—西姆公司报道：

“木材贸易在 1852 年国内商业繁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852 年伦敦的输入量超过 1 200 船货物，相当于 1851 年的数字。两年来比以往几年的 800 船货物左右的平均数增加了 50%。建筑木材的数量仍然保持着过去几年的平均数，对松木薄板、条板或锯过的木料等的需求量在 1852 年却大大地增加了，达到 680 万块，而过去的年平均数是 490 万块。”^②

① 《休斯先生和罗纳德先生的年报。1853 年 1 月 1 日于利物浦》，见 1853 年 1 月 8 日《经济学家》(伦敦)第 489 期第 37 页。——编者注

② 伦·霍纳《截至 1852 年 10 月 31 日的半年报告》。——编者注

关于皮革制品，鲍威尔公司作了如下的报道：

“无疑，去年几乎对所有制革工业部门的工厂主都是有利的，在年初原料很便宜，但是后来的情况却是：皮革制品的价值比往年提高了很多。”^①

特别繁荣的是钢铁工业。铁的价格由每吨5英镑涨到每吨10英镑10先令，不久之前又涨到每吨12英镑；以后涨到每吨15英镑是可能的。有越来越多的高炉相继投入生产。

关于航运业，奥弗—甘曼公司作了如下的报道：

“去年的特点是不列颠的航运业异常景气，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对实业活动的刺激……货船载运量普遍增加了。”^①

造船业也是同样活跃的。利物浦的汤奇—柯里公司的年报中关于这个生产部门谈到以下情况：

“我们还从来没有机会在我们的年度报告中报道过关于本港在出售船只的吨数和成交价格方面像去年那样有利的材料，殖民地船舶的价格整整上涨了17%，且有进一步上涨的趋势，尚未售出的船舶的数量已减至48只，而1852年有76只，1851年有82只，预计最近不会增加……一年来开到利物浦并售出的船舶数有120只，总载重量为50 000吨，1852年在本港下水和正在建造的船舶数有39只，总载重量为15 000吨，而1851年有23只，总载重量为9 200吨。在这里已经造成和正在建造的轮船数是13只，总载重量为4 050吨……至于说到铁制帆船，我们这个行业的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些船只越来越受到欢迎。现在，无论是这里，或者克莱德、新城以及各地的造船工人都在以空前的规模建造这样的船只。”^①

关于铁路的情况，伍兹—斯塔布斯公司写道：

“报告超过了最乐观的希望，并且远远超出了一切过去的计算。上周的报告

^① 伦·霍纳《截至1852年10月31日的半年报告》。——编者注

指出线路长度比 1851 年增加了 348 哩,即 5.5%;运输营业额增加了 41 426 英镑,即 14%。”^①

最后,迪费公司(曼彻斯特)的年报指出,1852 年 12 月份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是十分广泛的,上面提到的货币充裕被认为有利于企业家到远地的市场上去开展活动,并能使他们在年初所受到的商品和产品方面的损失得到补偿。

“目前,开垦新地、开采矿山以及其他方面的各种方案正吸引着投机商人和资本家。”^②

根据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就可以看到一般工业地区,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区的繁荣情况。关于棉纺织生产的情况,约翰·里格利父子公司(利物浦)作了如下的报道:

“过去一年的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了国家普遍繁荣的标志,它导致了非常好的结果……同时也表露了许多显著的特征,但是最惊人和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美国空前丰收的 300 多万捆棉花都已非常顺利地销售出去……在很多地区,正在为进一步增加工业企业的设备能力做准备工作。因此,我们可以预料,明年将加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棉花。”^①

其他许多工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麦克奈尔—格林豪—欧文公司(曼彻斯特)写道:

“我们要指出格拉斯哥的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工业,哈德斯菲尔德、利兹、哈利法克斯、布拉德福德、诺丁汉、莱斯特、设菲尔德、伯明翰和伍尔弗汉普顿等地的各种工业部门——所有这些工业看来都处在非常繁荣的状况。”^①

^① 伦·霍纳《截至 1852 年 10 月 31 日的半年报告》。——编者注

^② 《迪费公司的年报。1853 年 1 月于曼彻斯特》,见 1853 年 1 月 8 日《经济学家》。——编者注

普遍繁荣中唯一例外的是约克郡的丝纺织工业和梳毛工业。关于工商业的总的前景,可以用曼彻斯特的一个通报的话归纳如下:

“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萧条和资金不足,不如说是投机过度。”^①

在这种普遍繁荣当中,不久前英格兰银行所采取的一个措施,引起了商业界的普遍不安。1852年4月22日,英格兰银行把贴现率降到了2%。而1853年1月6日早上宣布,贴现率由2%提高到2.5%,也就是说,增加25%。有人企图把这次提高说成是由于最近某些承包铁路的大企业家得到巨额贷款造成的。如众所知,他们的一笔为数很大的期票仍在流通。另外一些人认为(见伦敦《太阳报》),英格兰银行之所以提高贴现牌价,是想从普遍繁荣中获取自己的一份利益。总的说来,这种行动被指责为“不妥当”。为了使读者对此作出正确的评价,我在这里引用《经济学家》的一份资料:

英格兰银行

	黄金	有价证券	最低贴现率
1852年			
4月22日……	19 587 670 英镑	23 782 000 英镑	降低到2%
7月24日……	22 065 349 英镑	240 137 28 英镑	2%
12月18日……	21 165 224 英镑	26 765 724 英镑	2%
12月24日……	20 794 190 英镑	27 545 640 英镑	2%
1853年			
1月1日……	20 527 662 英镑	29 284 447 英镑	2%,但从1月6日起提高到2.5%

① 《迪费公司的年报。1851年1月于曼彻斯特》,见1853年1月8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89期第38页。——编者注

由此可见,银行的现有黄金储备与利率降到2%的1852年4月相比多100万英镑,但在这两个时期中间有显著的差别,因为黄金的周转已从流入转为流出。这种流出表现得特别猛烈,它超过了上月份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黄金输入量。此外,1852年4月有价证券比现在少550万英镑。因而,在1852年4月,借贷资本供过于求,而现在正好相反。

与黄金输出的同时,外汇牌价显著下跌,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大多数进口货价格的大大提高,部分是由于对进口货的广泛投机所致。与此有关的还有对农场主不利的秋冬两季的影响,由此而产生的对今年收成的疑虑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国谷物和面粉进行的巨额交易。最后,英国资本家大宗地入股,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和比利时建立铁路和其他公司,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在巴黎交易所进行的普遍欺诈。因此,现在充斥于所有欧洲市场的伦敦期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得多,这就引起了外汇牌价的继续下跌。7月24日,一英镑在巴黎换25法郎30生丁,而1月1日就只能换25法郎,某些生意甚至按低于25法郎的行市成交。

由于资本的需求与资本的供应成正比地增加,英格兰银行最近采取的措施看来是完全有根据的。但是,指望通过此项措施来消除投机和防止资本外流,我敢预言,这是丝毫无济于事的。

在读者们随我浏览了证明英国不断繁荣的一系列资料之后,我再请他们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名叫亨利·摩尔根的不幸的制针工人为了出外谋生而在由伦敦到伯明翰的路途上的遭遇。为了避免夸大之嫌,我特从《北安普顿报》^①上逐字地转抄了这篇报道。

^① 即《北安普顿先驱报》。——编者注

“死于贫穷”

科斯格罗夫。星期一早晨9时左右，两个工人在科斯格罗夫教区T·斯莱德先生的破烂的草棚里避雨，他们听到人的呻吟声，接着就发现一个不幸的人躺在牲口棚里，已经奄奄一息。他们对他谈话并友好地请他共进早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他们摸了他一下，发觉他的身体冰凉，于是就去叫住在附近的斯莱德先生。过了一会儿，这位绅士打发一个小孩将这个不幸的人搁在小车上，用干草垫盖着，送往约一英里以外的亚德利-戈比恩的济贫院，他到达那里正好下午1时，但是过了一刻钟就死了。这个穷人的枯瘦的、脏污的、穿着破烂衣衫的身躯，令人目不忍睹。后来查明事情是这样的：2日星期四晚上，这个不幸的人得到斯托尼-斯特拉特福德的济贫院官员发给穷人去亚德利济贫院的一张路宿证，然后，他步行3英里多到达亚德利，被收留在济贫院。他狼吞虎咽地吃完了发给他的饭食，并请求允许他再呆一昼夜。他的请求被允许了。星期六清晨，他吃完早饭（可能这就是他在这人世上的最后一餐）就上路回斯特拉特福德，大概，他由于身体衰弱，两脚走起路来很痛，他的一只脚后跟已经磨破，很想找一个随便什么样的安身之处，这是属于某农场的野外建筑物的一个离公路有 $\frac{1}{4}$ 英里远的敞棚。6日星期一的中午，在那里有人发现他躺在干草里，因为主人不愿生人留在这里，遂命令他离开，他请求允许他再稍微呆一会儿，到下午4小时左右他走了，以便在天黑前能在附近再找个休息和过夜的地方，这地方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缺少半间房顶、没有门窗的破烂的草棚。就在这个难以想象的寒冷的住处，他钻进牲口棚，在那里滴水未进地躺了七天多，正如上面所叙述的，直到13日早上他才被发现。这个不幸的人叫亨利·摩尔根，是个制针工人；大约三、四十岁，看样子是个身体结实的人。”^①

很难想象有比这更骇人听闻的事件了。一个身体结实、年富力强的的人，由伦敦到斯托尼—斯特拉特福德的漫长而痛苦的旅途，向周围“文明”求援的绝望哀求，他的七天断食，他的同胞遗弃他的那种残酷无情，寻找栖身之所的四处奔波，从容身之地的屡被驱逐，最后，那个

^① 《在富裕中的九天饥饿》，见1853年1月1日的《人民报》。——编者注

名叫斯莱德的人的惨无人道和那个奄奄一息的人的默默惨死——这是一幅足以令人震惊而又发人深思的景象。

当他在敞棚里和破烂的草棚寻找一个栖身之处时，无疑，他侵害了所有权!!!

如果把把这个在高度繁荣时期发生的饿死人事件告诉伦敦西蒂区的养尊处优的资本家，那他会用1月8日伦敦《经济学家》上的话来回答你们：

“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可以看到，在自由贸易时期，一切阶级都繁荣昌盛；获得报酬的希望激发出他们的能量；大家都在改善自己的生产，大家和每一个人都得到好处。”^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1月
14日

载于1853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伦·霍纳《截至1852年10月31日的半年报告》。——编者注

卡·马克思

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
公爵夫人和奴隶制³⁴²

1853年1月21日星期五于伦敦

作为内阁新措施的结果的改选已告结束。内阁遭到了失败。一直被认为是“爱尔兰旅”²⁶¹领袖的财政部大臣之一萨德勒先生，被亚历山大先生所战胜：亚历山大先生以6票的优势当选。亚历山大先生的当选应归功于奥伦治派³⁴³和天主教徒的联合。另一方面，内阁在牛津大学取得了胜利，那里的投票持续了15天之久，斗争十分激烈。格莱斯顿以124票的优势战胜了高教会派²⁴³的候选人达德利·派西沃。我们建议休迪布腊斯³⁴⁴逻辑的崇拜者读一读在这次斗争中相互敌对的两家报纸——《纪事晨报》和《先驱晨报》的社论。

昨天，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们又将最低贴现率从2.5%提高到3%。这种情况很快地就影响到了巴黎交易所，那里的各种有价证券又下跌了。即使英格兰银行能够制止住巴黎的投机，但仍然会有使现存黄金外流的另一途径——谷物进口，无论是

在英国,或在大陆,上一季的收成估计要比常年减产 $\frac{1}{3}$ 。此外,到下一季收成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可供消费的粮食,人们也还存在着某些怀疑,因为庄稼由于土壤潮湿而播种晚了。所以正在签订进口大量谷物的合同,而且外汇牌价还会对英国不利。用海船从澳大利亚运来的黄金也不足以补偿突然增加的谷物进口。

在上一篇中,我曾提到关于铁的投机买卖^①。英格兰银行第一次将贴现率由 2% 提高到 2.5% 就已经影响了这个商业部门。近两周售价 78 先令的苏格兰生铁,本月 19 日跌至 61 先令。利率提高以后,铁路股票市场大概也会出现萧条,因为要强制出售至今作为贷款抵押的股票,而且这种业务已经开始办理。但是,在我看来,黄金外流不仅仅是由黄金输出引起的,国内贸易的活跃,特别是工业区的贸易的活跃也充分助长了黄金的外流。

在目前政治生活暂时平静的情况下,斯塔福德宫的妇女大会就黑人奴隶制问题告美国姐妹书和《美国千百万妇女关于白人奴隶制问题给自己的英国姐妹们的充满热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对新闻界来说是很宝贵的材料。但是,没有一家英国报纸注意到斯塔福德宫会议是在萨瑟兰公爵夫人主持下在宫里举行的这个情况。而根据斯塔福德和萨瑟兰这两个名字是足以评价英国贵族的仁爱的,这种仁爱就是,尽可能远离故乡,而且最好不在大洋此岸而到彼岸去寻找它的目标。

萨瑟兰家族致富的历史,就是苏格兰-盖尔居民破产和被剥夺的历史,是把他们从世代生息的土地上赶走的历史。远在 10 世纪时,

^① 见本卷第 601 页。——编者注

丹麦人就在苏格兰登陆并侵占了凯斯内斯平原，将原住居民赶到山里。按盖尔语称谓的 Mhoir—Fhear—Chattaibh，或“萨瑟兰大人”，他经常可以找到这样的战友，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保卫他，反对他的一切敌人：丹麦人或苏格兰人，外地人或当地人。斯图亚特王朝被逐出不列颠的那次革命²⁴⁷之后，苏格兰的小克兰首领间的私人纠纷日益减少，于是，英国国王们，为了保持在这边远地区的至少是表面上的统治，就鼓励克兰首领建立氏族军队；通过这种制度，这些苏格兰地主就能够把现代的军事建制和古代的克兰制度结合起来，使二者互相支持。

为了正确地理解随后发生的篡夺，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克兰。克兰是一种社会存在形式，它在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比封建制度低一整个阶段，就是说，它属于家长制社会制度。“克兰”按盖尔语的意思就是子女。苏格兰盖尔人的一切风俗和传统都基于一个前提，即克兰的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氏族。“大人”——克兰的首领，一方面握有无上的权力，而另一方面，正如每一个家庭的父亲一样，他的权力又受到血缘关系等的限制。某一克兰，即某一氏族，所居住的地区就属于该克兰，正如俄国的农民村社所占用的土地不属于个别农民而属于整个村社一样。可见，所在地区是氏族的共同财产。在这种制度下，现代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是谈不上的，同样，克兰成员的社会存在同生活在我们现代社会条件下的个人的社会存在也是无法相比的。土地是按克兰各个成员的军事职能来划分和分配的。首领依据各个人的军事能力赐给他们一定的份地，他可以自行决定增加或削减每个小头目的封地，而这些小头目也可以在自己的大小家臣之间分配地段。但是，整个地区永远是克兰的财产，无论个人的奢望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封地的条件是固定不变的；为进行共同防

御而缴纳的贡赋或向苏格兰地主缴纳的贡赋同样也是永不增加的，首领是战时的指挥官，同时又是平时的最高统治者。一般说来，每一块地段是由缴纳固定贡税的同一个家族世代耕种的。这种贡税不多，这与其说是现代意义上的地租或收入来源，还不如说是表示承认“大人”和他的小头目的最高权力而缴纳的贡赋。直接从属于“大人”的小头目称为“塔克斯缅”，委托他们管理的土地叫“塔克”。塔克斯缅之下设下级办事员管辖各村，他们之下便是农民。

由此可见，克兰不外是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氏族，同任何氏族一样，它很少用法律来规定什么，而是受着各种传统的强烈约束。土地是氏族的财产，在氏族内部，尽管有血缘关系，但是等级差别占支配地位，正像在所有古代亚洲的氏族公社一样。

最初的篡夺是在驱逐斯图亚特王朝之后由于建立氏族军队而发生的。从那时候起，贡税成了“大人”即 Mhoir—Fhear—Chattaibh 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感染了伦敦宫廷的挥霍无度的风气，他就想方设法从自己的小头目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钱，而这些小头目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待他们的下属。最初的贡赋变成了固定的货币代役租，实行这种代役租一方面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把传统贡税固定下来；但另一方面，它却意味着篡夺，因为现在“大人”对“塔克斯缅”说来处于领主的地位，而“塔克斯缅”对农民说来则处于农场主的地位。由于现在“大人”也同“塔克斯缅”一样需要货币，因此，生产就必须不仅是为了直接消费，而且也是为了输出和交换。所以，国民生产制度必须改变，由于这种改变而造成的多余人手也要摆脱掉。这样一来，人口便减少了。但人口还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而且，在 18 世纪，人还没有明显地成为赤裸裸的暴利的牺牲品，

这点我们可以从苏格兰政治经济学家斯图亚特的著作中看到，他的著作比亚当·斯密的著作^①早发表 10 年。斯图亚特（第 1 卷第 16 章）说：

“这些土地的地租，与其面积相比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同一个农庄所供养的人数相比，那就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比最富饶地区的同样面积的一个农庄所养活的人数要多 10 倍。”^②

萨瑟兰女伯爵的管家、指导她的领地改善工作的洛克先生的著作^③（1820 年）证明，即使在 19 世纪初期，土地贡税还是很低的。例如，他举出了金特拉多尔领地 1811 年土地贡税的清单，从这里可以看出，直到这个时候，每家每年至多须缴纳几先令的现款，供给少许家禽和服几天的劳役。

只是在 1811 年以后，才实现了彻底的和真正的篡夺，即把克兰的财产强行变成了首领的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财产。领导这次经济革命的，是一位精通马尔萨斯学说的女性穆罕默德-阿里³⁴⁵，也就是萨瑟兰女伯爵，或者说，是斯塔福德侯爵夫人。

首先，必须指出，斯塔福德侯爵夫人的祖先是差不多拥有萨瑟兰郡 $\frac{3}{4}$ 的苏格兰最北部的“大人”。这个郡比法国的许多省或德国的小公国还要大。萨瑟兰女伯爵继承了这些领地，随后她把这些领

① 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 年伦敦版第 1、2 卷。——编者注

②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兼论自由国家的国内政治科学》（三卷集）1770 年版第 1 卷第 104 页。——编者注

③ 即《关于斯塔福德和塞洛普省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瑟兰领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1820 年伦敦版。——编者注

地当作嫁妆带给了自己的丈夫斯塔福德侯爵，即后来的萨瑟兰公爵，这时，领地上的人口已减少到 15 000 人，高贵的女伯爵决定进行根本的经济改革，将整个领土变为牧羊场。从 1811 年至 1820 年，这 15 000 居民（约 3 000 户）不断地遭到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所有的田地都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结果同当地居民发生了直接的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自己的茅舍而被烧死在里面。高贵的女伯爵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古以来属于克兰的 794 000 英亩的土地攫为己有。她非常慷慨地拨给被赶走的居民约 6 000 英亩——每户两英亩。而这 6 000 英亩土地原来一直是荒地，并不给所有者带来任何收益。女伯爵如此宽宏大量，她只以平均每英亩 2 先令 6 便士的租金把土地出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一直为伯爵家流血流汗的克兰成员。她把非法霸占的全部克兰土地划分为 29 个大牧羊场，每个牧羊场只住一家人，大部分都是英格兰的农场工人。到 1820 年，15 000 盖尔人已被 131 000 只羊所代替。

一部分土著居民被赶至沿海地区，以捕鱼为生。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陆上和水上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

西斯蒙第在其《社会概论》这部著作中关于对萨瑟兰郡的盖尔人的这种剥夺（而这种剥夺还成了苏格兰其他“大人”仿效的榜样）作了如下的评论：

“大规模地占有领地不单单是英国一国特有的现象。在查理大帝的整个帝国，在整个西方，好战的首领们篡夺整个整个的地区，并利用被征服的居民，有时甚至利用自己的战友来为他们开发这些地区。在 9 世纪和 10 世纪时，曼恩、安茹和普瓦图这 3 个郡，对它们的伯爵来说，与其说是公国，不如说是 3 块辽阔

的领地。在很多方面与苏格兰相似的瑞士，当时由少数封建领主所瓜分。如果基堡、伦茨堡、哈布斯堡和格吕耶尔等伯爵处于不列颠法律的保护之下，他们也会达到像萨瑟兰伯爵这样的地位。可能，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会表现出与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同样的改良倾向，那时，为了给羊群让出地方，阿尔卑斯山地区可能就不止一个共和国会消失掉，连德国最专制的君主也不会被允许干出这类事情。”^①

洛克先生在为萨瑟兰女伯爵辩护时(1820年)对这一点作了如下的回答：

“为什么正是在这个别的场合下其他一切场合所采用的原则必须有一个例外呢？为什么领主必须为了公共利益以及为了只是同公众本身有关的那些原因而牺牲他们对自己的土地的绝对权力呢？”^②

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北美南部各州的奴隶主就应当为了萨瑟兰公爵夫人殿下的虚假的慈善行为而牺牲自己的私利呢？

到处以牛羊来代替人的不列颠贵族，在不久的将来也同样会被这些有益的动物所代替。

我们刚才所叙述的苏格兰清扫领地的过程，在英格兰是在16、17和18世纪发生的。还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就曾对这一点大鸣不平^③。在苏格兰，这个过程是在19世纪初叶完成的；而在爱尔兰，现在正在全速进行。高贵的子爵帕麦斯顿不过是几年以前才把人们从自己的爱尔兰领地上清扫出去，并且用的就是上述的方法。

①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159页。——编者注

② 《关于斯塔福德和塞洛普省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瑟兰领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1820年伦敦版第141页。——编者注

③ 托·莫尔《乌托邦》。——编者注

如果说把哪一种财产称为**盗窃**更确切的话,那么不列颠贵族的财产就是名副其实的盗窃。掠夺教会的财产,掠夺公共的土地,通过骗人和杀人的办法把封建的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这就是不列颠贵族占有领地的权利根据。在这不久以前发生的过程中,奴颜婢膝的法学家等级卖了多大力气,这从上世纪一位英国法学家达尔林普尔那儿就可以看到,他在自己的著作《封建所有制史》中以极其坦率的态度证明:有关财产的每一条法律和每一份证件,都由法学家加以解释,在中间阶级致富时的英格兰,被解释得有利于**中间阶级**,在贵族阶级致富时的苏格兰,则被解释得有利于**贵族阶级**,而在两种场合下,都是敌视人民的^①。

上述的萨瑟兰女伯爵的土耳其式的改革,至少可以从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来证明是对的。但是,其他的苏格兰贵族还更进了一步。在以羊代替人以后,他们紧接着又以猎物代替羊,以狩猎区代替牧场。带头这样做的是阿索尔公爵。

“在征服英国以后,诺曼底诸王使英国的大片土地变成森林;现在这里的领主也是这样对付苏格兰高地的。”(罗·萨默斯《苏格兰高地的来信》1848年版)

为了要给阿索尔公爵的猎物和萨瑟兰女伯爵的羊腾出地方而被赶走的那许多人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他们被迫逃往何方呢?他们在哪里找到了容身之地呢?

在北美合众国。

英国雇佣奴隶制的反对者有权谴责黑人奴隶制,但是萨瑟兰公

① 《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伦敦修订第4版第162—167页。——编者注

爵夫人、阿索尔公爵、曼彻斯特的棉纺大王们——绝对无权！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21 日

载于 1853 年 2 月 8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68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
——英格兰银行的措施³⁴⁶

1853年1月28日星期五于伦敦

1月25日《泰晤士报》上有一篇题为《刽子手行当的业余爱好者》的文章,发表了如下见解:

“常常可以看到,在我国每当公开执行死刑之后通常会立即发生许多上吊自杀事件,或上吊死亡事故;这是处死某一知名罪犯对不健康的、幼稚的心灵产生强烈影响的结果。”

《泰晤士报》列举了一些事件来证实这种论断。其中一个事件是:在设菲尔德有一个疯子,当他同另一些疯子谈过关于巴尔布尔被处死的情形之后,就上吊自杀了。另一事件发生在一个14岁的男孩身上,他也是上吊自杀的。

列举这些事实来证实这种说法,大概是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也料想不到的。这简直是在公开歌颂刽子手,而死刑被称赞为社会的**最后的手段**。这一切居然登载在一家“指导性的报纸”的社论上。

《晨报》对《泰晤士报》癖好绞刑和它的血腥逻辑提出非常尖锐而又恰当的批评，并附有下面一个在 1849 年 43 天内发生的事件的很有趣的日志：

死 刑	杀人和自杀
米伦…………… 3 月 20 日	J.G. 格利森——在利物浦 4 次杀人…………… 3 月 27 日
普利…………… 3 月 26 日	在莱斯特杀人和自杀…………… …………… 4 月 2 日
史密斯…………… 3 月 27 日	在巴斯毒杀事件…………… 4 月 7 日
豪…………… 3 月 31 日	W. 贝利…………… 4 月 8 日 J. 沃德杀死了自己的母亲 …………… 4 月 8 日
兰迪克…………… 4 月 9 日	亚德利…………… 4 月 14 日
萨拉·托马斯…………… 4 月 13 日	多克西杀死了父亲…………… …………… 4 月 14 日 J. 贝利杀死了自己的两个 孩子之后自杀了…………… …………… 4 月 17 日
J·格里菲思…………… 4 月 18 日	查理·奥弗顿…………… 4 月 18 日
J·拉什…………… 4 月 21 日	丹尼尔·霍姆斯登…………… …………… 5 月 2 日①
汉纳·桑德尔斯…………… 3 月 22 日	
M.G. 牛顿…………… 3 月 22 日	

《泰晤士报》也得承认，这个统计表说明，不仅自杀而且连最残暴的杀人行为都是在处死罪犯之后立即发生的。奇怪的是，上述文章甚至没有提出任何一个论据或口实来阐明它所宣扬的野蛮理论。的确，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

① 1853 年 1 月 26 日《晨报》(伦敦)第 19218 号第 4 版第 3—4 栏。——编者注

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你有什么权利用惩罚我来感化或恫吓别人呢?况且历史和统计科学非常清楚地证明,从该隐以来,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从抽象法的观点看,只有一种刑罚理论是抽象地承认人的尊严的,这就是康德的理论,特别是当黑格尔用了一个更严谨的定义来表述它的时候。黑格尔说:

“刑罚是犯人的法。它是犯人本身意志的行为。犯人把违法说成是自己的法。他的犯罪是对法的否定。刑罚是这种否定之否定,因而又是对法的肯定;这种法是犯人自己要求的,并且是他强加于自身的。”^①

毫无疑问,这种说法有些地方好像是正确的,因为黑格尔不是把犯人看成是单纯的客体,即司法的奴隶,而是把犯人提高到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的地位。但是,只要我们稍微深入些观察问题的本质,就会发现,德国唯心主义只是通过先验的方式赞同了现存社会的法;在这里是如此,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用“自由意志”这个抽象概念来顶替有自己的现实动机和受各种社会条件影响的个人,如果只用人的许多特性的一个特性来顶替人本身,难道这不是荒谬的吗?这种把刑罚看成是罪犯个人意志的结果的理论只不过是古代的“报复法”——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思辨表现罢了。直截了当地说: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其性质如何——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比刽子

^① 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第8卷第1章第3节。——编者注

手更好的自卫手段,并通过“世界指导性的报纸”^①把自己的残酷宣称为永恒的法律,这样的社会将成为什么样子呢?

阿·凯特勒先生在他的高超的科学著作《人和人的能力》中写道:

“有一种预算,是我们分毫不差地进行开支的,这就是监狱预算、拘留所预算、断头台预算……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预计每年出生和死亡人数的方法来预算出将会有多少人用自己同胞的鲜血染红自己的双手,将有多少人进行欺诈,将有多少人进行毒杀。”

凯特勒先生在1829年发表的对可能出现的罪行的估计,不仅仅以惊人的准确性预言了1830年在法国发生的犯罪行为的总数,而且预言了罪行的种类。凯特勒引用的下面这个1822—1824年间的统计数字证明,社会的这一或那一部分国民犯罪行为的平均数与其说决定于该国的特殊政治制度,不如说决定于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条件。美国和法国的100个被判刑的罪犯的情况是这样的:

年 龄	费拉德尔菲亚	法 国
21岁以下.....	19	19
21岁到30岁.....	44	35
30岁到40岁.....	23	23
40岁以上.....	14	23
<hr/>		
合 计.....	100	100

这样,如果说大量的犯罪行为从其数量和种类就会揭示出像物

^① 指《泰晤士报》(伦敦)。——编者注

质现象那样的规律性,或者如果说,照凯特勒先生的说法,“在两个领域(物质世界或社会生活)的哪一领域中动因非常合乎规律地导致一定结果,这是很难断定的”。那么,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仅仅是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理查·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40页)的出版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之一。这本小册子的第一部分考察了1793年革命时期和革命以前的时期,由于作者公开和猛烈地抨击了英国人对这个时代的陈旧的偏见,这一部分是值得称赞的。科布顿先生证明,在革命战争中英国曾是侵略的一方。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并没有独创的见解,因为他只是重复英国过去的最伟大的小品文作家、已故的威廉·科贝特下过的结论,而且要逊色得多。小册子的另一部分虽然用经济学观点写成,却多少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科布顿先生极力证明:关于路易-拿破仑企图入侵英国的臆测是完全荒谬的,关于英国的无防御状态的流言并没有现实的根据,而且这些流言只是希望增加公共开支的人散布出来的。他根据什么来证明路易-拿破仑对英国不怀一点敌意呢?他根据的就是拿破仑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跟英国翻脸。他又根据什么来证明外国不可能侵入英国呢?照科布顿先生的说法,就是根据英国在800年间没有遭受过侵犯这一点。最后,他根据什么理由来证明关于无防御状态的叫嚷是纯粹自私自利的欺人之谈呢?他根据的就是最高军事当局的声明:他们感到非常安全!

路易-拿破仑甚至在立法议会中还从来没有遇到哪一个崇拜者是如此地轻信他的真诚与和平意愿,而现在他却十分意外地发现理查·科布顿先生就是这样的崇拜者。路易-拿破仑的一贯维护者《先

驱晨报》发表了(在昨日那一号)一封致科布顿先生的信,据说这封信是在波拿巴本人直接唆使下写的;萨托里的至高无上的英雄^①在信中向我们担保,只有在女王^②遭到起来暴动的民主派的威胁因而需要他的20万名十二月呐喊者,或者打手^③的时候,他才会光临英国。但是按《先驱报》的意思,这个民主派不是别人,正是科布顿一伙先生们!

必须承认,仔细读过上述的小册子之后,我们自己也开始担心,是不是会发生像侵犯大不列颠这样的事。科布顿先生不能算是幸运的预言家。在废除谷物法之后,他游览了大陆,甚至访问了俄国;回国后他说:一切都很正常,暴力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各国人民都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商业和工业活动,现在都平平静静地、按部就班地发展自己,不搞政治风暴、爆发和震荡。他的预言还未来得及传到大陆,整个欧洲就爆发了1848年革命,对科布顿先生温和的预言作出了某种讽刺性的反响。在根本没有和平的地方,他却说那里有和平。

如果认为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的和平论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那就大错特错了。它只是把问题说成应当用商业方法代替打仗这种封建方法,应当用资本代替大炮。和平协会昨天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大会³⁴⁷,会上几乎一致宣称,只要报刊停止它们对路易·拿破仑的统治进行的令人讨厌的攻击而沉默下来,就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他有什么侵犯英国安全的意图!尽管有这篇声明,令人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下院投票赞同增加陆海军费用,而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并且没有一个

① 指在萨托里阅兵的路易·波拿巴,并见本卷第187页。——编者注

② 即维多利亚。——编者注

③ 指波拿巴的十二月十日会的成员。——编者注

出席和平会议的议员讲一句反对扩军提案的话。

在因议会延期召开而出现的政治沉寂的时期，报刊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上：当前的**改革法案**和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

本月24日《泰晤士报》向公众报道说，新的改革法案正在草拟中。关于改革法案的性质，从查理·伍德先生在哈利法克斯的竞选演说中就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表示反对**各选区一律平等**的原则；其次，从詹姆斯·格雷厄姆在卡莱尔的演说也可以看出，他在演说中反对**秘密投票**；最后，根据私下流传的一种说法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就是：甚至约翰·罗素在1852年2月开的极小的改革药丸也被认为是过于强烈和过于危险的。但是，还有一些迹象使人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联合内阁的喉舌《经济学家》在1月22日的这一期中不仅说：

“我们的代议制的改革被列为最重要和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才是不久以前的事情”，而且说“我们还没有从事立法活动的原材料。选举权的扩大、平等化、调整、修改、保护和重新分配，这就是问题的各个方面，而其中每一方面都需要深入考虑和认真研究……不能说我们有一部分国务活动家对所有这些问题或其中若干问题缺乏大量的有用知识，不过他们的知识是**偶然获得的**，而不是经过一番功夫得来的，因而这些知识很杂乱、片面和不完全……显然，唯一的出路就是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来研究同这个问题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各种事实。”

这样，公开研究政治的任务又摆在玛士撒拉的内阁³⁴⁸面前了。皮尔的同僚们，墨尔本的同僚们，坎宁的助手，老格雷的副手，在利物浦勋爵手下任职的人和格伦维尔勋爵内阁里供职的其他人，原来所有这些半个世纪前开始自己的活动的新手，都因为经验不足而不能向议会提出什么有关选举改革的彻底的建议。看来，经验随年岁而增加这个旧谚语也得被推翻了。《每日新闻》惊叫道：

“各派老将的联盟的这种谦虚态度可笑到了难以形容的地步！”同时它质问道：“你们的改革法案又在哪里呢？”

《晨报》回答说：

“我们的意见是，在这次会议期间根本不会讨论任何改革法案。也许会试着采用一些立法措施来防止和惩罚贿选，对其他一些次要问题也可能采取这种办法；也许会努力去消除在国内议会代表名额的分配中产生的缺点，不过这种立法措施是不能称为新改革法案的。”

至于英格兰银行最近关于贴现率的规定，那么初期由于这些规定而引起的混乱，现在已经消除了。实业家也和理论家们一样相信，目前的繁荣不会再有大的中断或根本中止。但是，请读一读《经济学家》的下面这段话吧：

“今年我国种植小麦的广大地区什么东西也没有长出来。在我国土壤肥沃的广大区域有许多用来种植小麦的地方至今没有播种，某些已经播种的地方情况也不妙，因为麦苗不是死了就是很不茁壮，要不就是遭了严重的虫灾，以致这些地区的土地占有者的前景未必会比根本没有下种的好。要把全部麦地重新播种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由于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和矿井的开发而暂时推迟了的危机无疑地将在歉收时发生。银行关于贴现率的规定只不过是第一个不祥之兆罢了。1847年，英格兰银行曾13次变更贴现率，1853年这种措施将会有几十次。最后，我想向英国经济学家们提个问题：现代政治经济学在反对重商主义时曾证明，黄金的流入和流出对国家没有什么意义，产品只是同产品交换，黄金像其他产品一样也是产品。可是现在，同一个政治经济学在其生命终结的时候又以极其恐慌的心情注视着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经济学家》说：

“银行通过自己的业务所要达到的实际目的，就是阻止资本输出。”

但是，《经济学家》是否打算阻止棉织品、生铁、毛织品和衣料的输出这样的资本输出呢？难道黄金不是像其他产品一样的产品吗？《经济学家》是不是在晚年也变成了重商主义者呢？它在让外国资本自由输入之后是不是打算禁止英国资本输出呢？它在抛弃文明的保护关税制度之后是不是希望恢复土耳其式的保护关税制度呢？

当我写完这篇通讯的时候，得到一个消息说政界里广泛流传着一种说法，好像格莱斯顿先生与阿伯丁内阁的许多领导人物在所得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并且其结果可能是这位可尊敬的绅士的辞职。如果是这样，墨尔本勋爵政府的前任财政大臣弗兰西斯·贝林先生也许就是格莱斯顿的继承人了。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1 月
28 日

载于 1853 年 2 月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695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国防。——财政。——贵族的
死绝。——政局³⁴⁹

1853年2月8日星期二于伦敦

《每日新闻》断言，政府现在正在认真地研究设立海防民军的问题。

银行的报告说明，黄金的数量又减少了 362 084 英镑。最近两个星期内支出的黄金约 100 000 英镑，其中一部分运往大陆，另一部分铸成货币运往澳大利亚。尽管英国的黄金大量流入法国，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在继续减少，这表明私人已经开始在储藏黄金，而这一点又清楚地说明：人们都不相信拿破仑政权能够持久。

现在工人普遍要求提高工资，特别是造船工人、采煤工人、工厂工人和机械工人。这种要求是由普遍的繁荣引起的，不能视为十分异常的现象。更加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农业工人的组织得井井有条的罢工——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南威尔特郡的农业工人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2 先令，现在他们一周的工资只有 7 先令。根据中央户籍局局长的季度报告，去年从大不列颠迁往国外的每天有 1 000 人；人口的增长缓慢了。与此同时，结婚的人数却有显著的增加。

在最近两周内，由于墨尔本子爵和蒂康奈尔伯爵以及牛津伯爵的亡故，贵族中又有3家死绝。如果说有什么阶级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规律^①的例外的话，那么这就是世袭贵族阶级。就拿大不列颠的贵族和从男爵为例来说吧。目前，诺曼底贵族已经是绝无仅有；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最初的从男爵家族留下的也不多了。上院的绝大部分议员是在1760年被册封为贵族的。从男爵的称号始于1611年詹姆斯一世在位时期。当时获得从男爵这个称号的贵族，现今只剩下13家了；在1625年被封为这个爵位的贵族，现在只剩下了39家。这个规律的作用的另一个证明就是威尼斯贵族的异乎寻常的衰落，尽管威尼斯贵族的所有的子孙，一降生就被列为贵族。据阿姆洛的计算，在他那个时候，在威尼斯议会享有表决权的贵族有2500人。到18世纪初这种贵族只剩下1500人，而其中还包括了在这段时期补充进来的一些新的贵族。伯尔尼最高评议会在1583年到1654年这段时间里曾经把487家列入世袭贵族；其中在两个世纪之内死绝的有379家，即到1783年，剩下的只有108家。如果看看更古一些的历史时期，那么塔西佗告诉我们，克劳狄乌斯帝王册封了整整新一代贵族，“因为甚至执政官凯撒根据卡西乌斯法和元首奥古斯都根据谢尼法补充册封的那些贵族也都死绝了。”^②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大自然并不珍惜世袭贵族，同时，可以大胆地断言，如果不是经常注入新的血液，如果不是有人为地加以维持的制度，那么英国的上院恐怕早就寿终正寝了。现代生理学认为，在高等动物中间，生殖力同神经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同脑髓的增加成反比例。但是，谁也不敢

①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伦敦版第18页。——编者注

② 塔西佗《编年史》第十一编第25页。——编者注

说,英国贵族的死绝同脑髓丰富有任何联系。

看来,那些预言“千年王国”³³²的到来并且为它奠定了基础的政党,还在下院开会之前,就认为它已经崩溃了。2月4日的《泰晤士报》说道:

“曼彻斯特派对阿伯丁勋爵的政府大发雷霆……而爱尔兰天主教和爱尔兰社会主义(?)则把其值得怀疑的热烈的赞扬献给德比勋爵和迪斯累里先生。”

《泰晤士报》使用的爱尔兰社会主义一词,显然是指关于保障租佃者权利的鼓动。我打算在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再来说明,现代所有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是完全一致的。其他报纸很少赞同刚刚引用的《泰晤士报》的这篇文章的见解,这一点我们从《晨报》的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来:

“假如我们认为爱尔兰人能够背叛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原则,我们就是轻视他们。”

阿伯丁的报纸^①的盛怒,是由于“千年内阁”的希望完全破灭的事实引起的。萨德勒先生和基奥先生是爱尔兰旅²⁶¹的公认的领袖,——一个是在内阁中,另一个是在战场上。萨德勒先生是指导者和操纵者,基奥先生是发言人。人们原指望收买了这两个人,就可以控制他们全体。但是,爱尔兰旅的成员被派到议会来担负着一项义务,这就是:充当反对派,对任何一个不确立宗教上的完全平等和不实现沙曼·克劳福德关于爱尔兰保障租佃者权利法案³⁵⁰原则的政府保持独立。由此可见,《泰晤士报》所以对这些人发怒,是因为这些人不愿意毁弃自己的诺言。米斯郡的凯尔斯的集会和宴会使它发

① 指《泰晤士报》(伦敦)。——编者注

怒的直接原因。分发出去的通知号召所有收到通知的人对“不久前议会中的爱尔兰党团的背叛现象”表示愤慨；同时还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决议。

内阁在爱尔兰旅身上打的主意落空了，这是事前就可以预料到的；但是，爱尔兰各个党派的性质和立场现在正在发生变化，看来不论是这些党派本身还是英国报刊，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变化的深刻意义。主教们和绝大多数僧侣都赞同参加政府的天主教议员的行爲。卡尔洛的僧侣完全支持萨德勒先生，假如不是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成员齐心协力的话，他是不会遭到失败的。真正的天主教政党对这个分裂的看法，可以从法国的耶稣会全欧机关报《联盟报》的一篇文章看出来。这篇文章说：

“能够有充分根据地对基奥先生和萨德勒先生提出的唯一的指责，就是他们让人家把他们同两个团体（即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和宗教平等拥护者协会）牵扯在一起，这两个团体只有一个目的——使毁灭爱尔兰的无政府状态合法化。”

《联盟报》在激怒中泄露了自己的秘密：

“我们深感遗憾的是，这两个团体公开同主教和僧侣作对，而且这是发生在高级教士和僧侣过去一向是人民和国民组织的最信赖的领导者的国家里。”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假如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拥护者偶尔出现在法国的话，那么《联盟报》是会想尽办法把他们放逐到卡宴去的。取消合并派³⁵¹的鼓动纯粹是政治运动，因此天主教僧侣能够利用这个鼓动从英国政府那里争取到一些让步，而爱尔兰人民只是神父手中的工具。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鼓动则是具有深刻的根源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会使教会和爱尔兰

革命党派之间发生彻底的破裂,从而把人民从几百年以来使他们所做的全部努力和牺牲以及他们的全部斗争化为乌有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

现在,我们来谈谈兰开夏郡改革运动的领导者们和该郡的代表本月3日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聚会”。大会主席是乔治·威尔逊先生。他只谈到商业和工业区的代表名额同农业区的代表名额不平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他说:

“在白金汉、多塞特、威尔特、北安普敦和什罗普这5个郡里,52 921名选民选出了63名议员,而拥有89 669名农村选民和84 612名城镇选区选民即共计174 281名选民的兰开夏郡和约克郡也只选出同样数目的议员。所以,假如仅仅根据选民数字按比例地选举议员的话,那么这5个郡只能得到19个席位,而兰开夏郡按同样的代表比例,则有权得到207个席位。12个大城市或城镇选区(把伦敦算作两个城镇选区)拥有192 000名选民、3 268 218名居民和383 000家住户,共选举24名议员。而安多弗尔、白金汉、奇彭纳姆、科克茅斯、托特尼斯、哈里奇、贝德福德、利明顿、马尔伯勒、大马洛和里士满只有3 569名选民、67 434名居民和1 373家住户,但也同样选举24名议员……即使是最胆怯的改革家和最温和的人,大概也不会反对剥夺居民在5 000人以下的小地方的代表权而给大选民区增加20个席位。”^①

议员米尔纳·吉布森先生谈论了国民教育和知识税的问题。关于改革法案,在他的演说中只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他关于各选区一律平等这一条的声明:

“这一条也许会成为—一个重大的等级问题。”

另一位议员布拉瑟顿先生说:

① 《曼彻斯特改革派的社会聚会》,见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第8版第3—6栏。——编者注

“目前,任何一个不规定平等分配代表名额的改革法案都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最值得注意的还是议员布莱特先生、这位“曼彻斯特大人物”中间的真正大人物的演说。他说:

“政府是由辉格党和皮尔派组成的联合政府…… 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可以庆幸,以为我们的政府里已经有实行新的原则、新的政策的人,已经有即将广泛地开创事业而不需要全国各地所有的改革拥护者推动的人。(喊声:“听啊!”)”

关于议会改革,他说:

“假如路易-拿破仑在法国实行像我们这样的代议制,假如他把所有的议员席位都给了最拥戴波拿巴家族的农村地区,而不允许巴黎、里昂、马赛选举议员,那么所有的英国报刊都会对他在法国实行的这种虚伪的代议制加以谴责。(喊声:“听啊!听啊!”)…… 这里,兰开夏郡,占英国人口的 $\frac{1}{8}$,占英国的征税的财产的 $\frac{1}{10}$,占英国住户总数的 $\frac{1}{10}$ …… 我们开始懂得了我们是处在什么样的地位。(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个小障碍,这就是秘密投票碰到的障碍。(喊声:“听啊!听啊!”)我读了约翰·罗素勋爵在他竞选时发表的演说;大概,伦敦的选民们当时的情绪特别好,否则他们不会不反对他所说的‘反对任何秘密’的话。当我读这一段时,我自言自语地说:‘好,假如我是你的一个拥护者,我就会建议你带上《泰晤士报》编辑部的记者去参加内阁的最近一次会议。’(喊声:“听啊!”并爆发出笑声)”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的论点:

“他不认为,可以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①

为什么不能把秘密投票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呢?既然公开投票

① 《曼彻斯特改革派的社会聚会》,见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第8版第3—6栏。——编者注

变成了一种必要的制度，那么秘密投票也同样可以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至少，秘密投票在马萨诸塞州（或许也在北美其他州里）已经变成一种必要的制度；同时，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很了解，他在卡莱尔两三千居民面前讲的话没有什么份量。那一天下着雨，我猜想，听众们在雨伞底下不会十分仔细地斟酌他所讲的话。

布莱特先生在结束他的演说时说：

“我们不应当忘记，英国从1688年革命以来，特别是在最近几年内获得的一切成果，都是在工业和商业阶级反对这个国家的贵族阶级和特权阶级的勇敢的斗争中获得的。我们应当继续进行这种冲突，伟大的事业还有待于完成。（喊声：“听啊！听啊！”并爆发出掌声）”

一致通过的决议写道：

“大会号召同兰开夏郡有联系的自由派议员们把自己看成一个以促进有利于议会改革的任何措施为己任的委员会，以便保证兰开夏郡的代表名额能够增加得同该郡的人口、工业、财产和文化相适应。”^①

在这个大会上，曼彻斯特学派又重复了他们的战斗口号：工业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泄露了他们的政策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他们力图剥夺人民在国家事务中的代表权，并且严格维护他们自己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一切有关秘密投票、国民教育、知识税等等的议论都不过是修辞性质的点缀。他们认真提出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各选区一律平等，至少这是据以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和加给议员们以相应的义务的唯一的一条。为什么？在各选区一律平等的情况下，城市的利益就会压倒农村的利益，资产阶级就能控制下

^① 《曼彻斯特改革派的社会聚会》，见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第8版第3--6栏。——编者注

院。如果曼彻斯特派能够获得各选区一律平等，而又能避免对宪章派作重大的让步，那么后者碰到的就将不再是两个互相竞争的、双方都争先恐后地力图把他们拉到自己方面去的敌人，而是一支紧密团结的敌军，这支敌军将集中全力抵制人民的要求。这样，就会在一个时期内不仅在工业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建立起资本的无限统治。

对于联合内阁来说，那些在凯尔斯和曼彻斯特对已倒台的政府所作的热烈的赞扬可以说是一个不吉之兆。议员卢卡斯先生在凯尔斯声称：

“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反对者当中，没有比兰斯唐侯爵、帕麦斯顿勋爵、悉尼·赫伯特等人更坚决的了……辉格党的内阁和格雷厄姆的支持者不是对租佃者问题经常发表敌意的怨言吗？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托利党的官方代表；让每一个读过由各个党派提出的提案的人说句良心话：德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行为是不是比辉格党诚实一千倍？”

米尔纳·吉布森在曼彻斯特的聚会上发表声明说：

“即使上届内阁的预算案整个说来非常糟糕，它在将来对预算的政策方面总还有一些好的迹象。（喊声：“听啊！听啊！”）上届财政大臣至少是打开了局面，我指的是茶叶税。据我听到的可靠的消息说，上届政府曾经打算废除广告税。”

布莱特先生的赞扬更进一步：

“在所得税问题上，上届政府做得很大胆。由占有英国很大一部分不动产即地产的乡绅提出和支持一个议案，规定对不动产和商业收入以及其他非固定收入征收的不同税率，这是我们不应当加以忽略的一个步骤，是我们的地区应当表示欢迎的步骤。而迪斯累里先生还提到了一点，应当说，为此我向他表示感谢。在他阐述预算案的演说中，在使他遭到最终失败的那天夜里同所有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力量进行了3个小时的舌战的演说中，他谈到了继承税（而所谓继承税，按我们的理解，就是遗产税和遗嘱检验税），他认为这些税是需要加以整

顿的。(热烈的掌声)”^①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5
日—8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2 月 23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699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① 《曼彻斯特改革派的社会聚会》，见 1853 年 2 月 5 日《泰晤士报》(伦敦)
第 21344 号第 8 版第 3—6 栏。——编者注

卡·马克思

意大利起义。——不列颠的政策³⁵²

1853年2月11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意大利传来的革命消息，突然打破了在天然的浓雾覆盖下很久以来这里普遍存在的政治沉寂气氛。根据电讯得知：本月6日在米兰爆发了起义；散发了传单，一份由马志尼署名，另一份由科苏特署名，传单号召奥地利军队中的匈牙利人站到革命者方面来；起初起义曾经被镇压下去，但随后又重新爆发起来；驻守军火库的奥地利人被歼灭，等等；米兰的城门已经关闭。不错，法国政府的报纸发表了本月9日来自伯尔尼和本月8日来自都灵的两则补充消息，消息说起义在7日已被彻底镇压下去。但是意大利的朋友们却认为，英国外交部接连两天都没有获得任何直接的情报，这是一个吉兆。

巴黎传说比萨、卢卡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处在大规模的骚动中。

在都灵，内阁在接到奥地利领事的通知以后，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伦巴第的局势。最早的消息传到伦敦是2月9日，这一天恰好是1849年罗马共和国宣告成立的纪念日，是1649年查理一世被斩首的日子，也是1689年詹姆斯二世被推翻的日子，这真是一个巧合。^①

^① 见朱·巴里利《致〈每日新闻〉编辑》。——编者注

如果没有几个奥地利团的兵力转到革命方面来，那么目前的米兰起义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最近我会收到一些从都灵寄来的私人信件，也许，这些信件会使我有可能会对所发生的一切作详细的报道。

关于不久前路易-拿破仑恩赐的大赦的性质，报刊上发表了法国流亡者的一些评论。维克多·弗龙德(过去的军官)在布鲁塞尔的《民族报》上声明说：他在赦免的名单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感到惊奇；5个月之前他从阿尔及尔逃跑的时候，就已经自己赦免了自己。

《通报》最初报道说，有 3000 名流放者被赦免，只有大约 1 200 名公民继续被剥夺公民权。但是过了几天之后，这同一家有威望的报纸又报道说，被赦免的有 4 312 人；这就是说，路易-拿破仑实际上赦免的人数比过去被他判罪的全部人数还多 100 人！仅巴黎和塞纳省被流放的就达 4 000 人，其中获赦免的只有 226 人。埃罗省被流放的有 2 111 人，其中被赦免的有 299 人。涅夫勒被流放的有 1 478 人，其中有 1 100 人是平均有 3 个孩子的家庭的家长，他们当中被赦免的有 180 人。在瓦尔省的 2 281 名流放者中被放回的有 687 人。在被流放到卡宴去的 1 200 名共和党人当中，被赦免的人数不多，而且确切地说是已经从这个服苦役的移民区逃跑的人。流放到阿尔及利亚而现在被放回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个数目是根本没有办法同被押解到非洲去的大批人的数目相比的。据估计后者共达 12 000 人。现在居住在英国、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的流亡者，除了极少数之外，几乎全部都没有获得赦免。另一方面，被赦免的名单上包括很多从来没有离开法国或者在很久以前已经被允许回国的人；不但如此，甚至有些人的名字，在名单上出现好几次。而最荒唐的是，名单上还有很多谁都知道已经在 12 月的血腥“围剿”³⁵³中被杀害的人的名字。

昨天,议会又开始举行会议。作为千年内阁的未来活动的一个应有的序幕,在上院演出了一场戏:德比伯爵质问阿伯丁伯爵,政府打算提出什么措施交议会审议。后者回答说,他早先已经说明过自己的原则,再重复一遍是不必要的,而在向下院宣布这些原则之前,在这里再作进一步的说明是过早的。接着是一场十分奇妙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德比伯爵的话一句接一句,而阿伯丁伯爵只是意味深长地不住地点头。

德比伯爵:“我想请问勋爵阁下,在这次会议期间,您打算向上院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哑场几秒钟;勋爵阁下并未起座。

德比伯爵:“也许,沉默就意味着没有措施?”(笑声)

阿伯丁伯爵嘟囔了一句什么,谁也没有听清。

德比伯爵:“我是否可以请问一下,将向本院提出什么样的措施?”

没有任何回答。

议长提议休会,上院通过了休会的决定。

假如我们从上院转到“忠于女王陛下的下院”的话,那么我们就看到:阿伯丁伯爵用他的沉默对内阁纲领所作的阐述,比约翰·罗素勋爵昨天晚上用冗长而费解的演说所作的阐述要清楚得多。罗素的演说可以简单地归纳如下:“重要的不是措施而是人”;把所有应由议会审议的问题的解决推迟一年;而在此期间,女王陛下的大臣们的薪俸将按时发给。约翰·罗素勋爵大致用下面的话表达了政府的这个意图:

“至于应当加以确定的陆军、海军和炮兵的人员数目,那将不会超过圣诞节前所确定的数目。至于预算中各个支出项目的数额,它们将比去年的预算大大增加…… 将提出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加拿大立法机关将有权使用加拿大

的教会后备基金…… 商业大臣^①将提出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 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权利限制将要废除…… 将提出有关教育问题的提案。我还不能说,我将以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提出一项关于这个问题的非常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有关贫苦阶级的教育的措施,以及关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建议…… 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将要废除…… 将提出有关第二等刑罚制度的法律草案…… 在复活节之后,财政大臣^②将立即或尽快地提出本年度的财政报告…… 最近几天,大法官将说明他准备提出的有关修正法律的措施…… 爱尔兰事务首席大臣^③准备几天后提出设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将负责研究关于爱尔兰的大地主和租佃者的一个法律草案…… 大臣们将尽全力来重新规定今年的所得税,而不必再进行任何讨论和辩论。”^④

关于议会改革,约翰·罗素勋爵声明说,它可能成为下次会议的讨论题目。这就是说,目前不会提出任何改革法案。并且,小约翰^⑤还竭尽全力否定这样一种看法:似乎他曾在什么时候答应提出比他在上次会议期间提出的法案¹⁵⁹更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代议制的草案。他甚至对于把这种诺言硬加在他的身上感到生气。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想到过这一点。他甚至不能担保,他打算在下次会议上提出的法案能像1852年的法案那样全面。关于贿赂和舞弊行为,他说:

“关于进一步制止贿赂和舞弊行为的措施是否必要,我认为最好等一等再发表自己的意见。我只想指出一点: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简直无法形容下院对顶点约翰²⁴⁶的这篇演说的反应冷淡得多

① 爱·卡德威尔。——编者注

② 威·格莱斯顿。——编者注

③ 约·杨格。——编者注

④ 见约·罗素《1853年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⑤ 约·罗素。——编者注

么令人感到惊奇。很难断定，究竟是他的朋友大惑不解还是他的敌人幸灾乐祸占主要地位。但是，看来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篇演说彻底推翻了卢克莱修的关于“无中不能生有”^①的学说。至少约翰勋爵是从无中生出了一种东西，这就是一篇冗长的枯燥无味的演说。

原来人们认为，内阁是把自己的命运同新的所得税税额和新的改革法案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的。但结果是：关于所得税，建议以现有的形式继续保留一年。关于改革法案，甚至是在辉格党所规定的限度内的改革法案，则宣布说，大臣们只有在他们继任一年的条件下才准备提出。除了改革法案以外，一切都是上届罗素政府的纲领。甚至作财政报告都要推到复活节以后，这样，大臣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领到一季的薪俸。

关于部分改革的提案几乎完全是从迪斯累里先生的纲领^②中抄来的。例如，修正法律、废除流放到澳大利亚去的制度、关于领港员问题的法案、设立保障租佃者权利问题委员会等等。真正是现任内阁提出的少数几条只有设想中的教育改革（这个改革的规模，根据约翰勋爵自己告诉我们的话来看，不会比他本人更大）和废除对于莱昂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权利限制。赋予这个犹太高利贷者、波拿巴政变的声名狼藉的同谋者之一以选举权，³⁵⁴是否能使英国人民十分满意，那是值得怀疑的。

由在最近的大选中遭到完全失败的两个政党组成的内阁的这种无耻行径，除了下面这个原因之外，是很难用别的理由来解释的，这就是：任何新的改革法案都会要求解散现在的下院，而下院的大多数

① 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编者注

② 参见本卷第 573—580 页。——编者注

却牢牢抓住他们的议员席位不放,因为这些席位是他们高价买来的,是靠微不足道的多数选票获得的。

《泰晤士报》试图用来安慰读者的办法可以说是最妙不过的了:

“下次会议,决不是一个像明天那样不确定的期限,因为明天不仅取决于办事拖拉者的意志,而且取决于他的生命。而只要世界不毁灭,下次会议就一定会到来。既然如此,我们就把整个议会改革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召开时再谈,而让内阁安静一年吧!”^①

至于谈到我的看法,我认为,在目前社会舆论消极冷淡的情况下,“在贵族联合内阁的冰冷气氛的笼罩下”,改革法案不由大臣们赏赐给人民,这对人民来说倒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应当忘记,阿伯丁勋爵曾经是托利党内阁成员,这个内阁在1830年曾经拒绝同意实行任何改革措施。全国性的改革必须通过全国性的宣传鼓动来实现,而不能依靠阿伯丁阁下的恩赐。

最后,我还想提到一件事:上星期一,全国保护不列颠工业和资本协会³⁵⁵的总委员会在里士满公爵的主持下在南海公司大厦召开了一个专门会议,会上该协会通过了解散协会的明智的决议。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
11日

载于1853年2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01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① 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第4版第3—4栏。——编者注

卡·马克思

弗兰茨-约瑟夫遇刺。——米兰
起义。——不列颠的政策。
——迪斯累里的演说。
——拿破仑的遗嘱³⁵⁶

1853年2月22日星期二于伦敦

来自施图尔韦森堡的电报报告了如下的消息：

“本月18日下午1时，当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在维也纳城堡散步时，一个名叫拉斯洛·李贝尼的匈牙利的裁缝帮工、原维也纳的骠骑兵突然袭击皇帝，用短剑刺杀他。侍卫官奥当奈尔伯爵拦挡了这一刺杀。弗兰茨-约瑟夫脑后被刺伤。这个21岁的匈牙利人被侍卫官用马刀砍倒在地上，并当场被捕。”

据另外一种传说，行刺者使用的武器是火枪。

在匈牙利，最近刚刚揭发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旨在推翻奥地利的统治的密谋。

《维也纳日报》发表了几份军事法庭关于三十九人案件的判决书，这些人的主要罪名就是他们曾经参与科苏特和汉堡的鲁萨克的密谋。

米兰的革命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拉德茨基立即颁布命令断绝

同皮埃蒙特和瑞士的一切来往。也许在收到这封信之前，你们已经得到从意大利传到英国的点滴消息。我希望你们能注意到米兰事件的一个特征。

拉德茨基元帅的助理施特拉索尔多伯爵在他本月6日发布的第一道命令中坦率地承认，大多数居民根本没有参加这次起义，虽然如此，这并不妨碍他宣布米兰实行特别戒严。拉德茨基在后来即2月9日于维罗纳发布的公告中，推翻了他的部下的声明，力图利用起义的事捏造一些借口来捞一笔钱。除了显然属于奥地利党的人之外，他对所有的人都处以大量罚款，把这些钱拿来给卫戍部队用。他在本月11日的公告中说，“大多数居民除了少数值得赞扬的例外，都不愿服从帝国政府”，他命令所有的司法机关即军事法庭没收所有同谋者的财产，而他给同谋下的定义是：

“拒绝告密本身就是同谋，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告密的义务。”

根据这个理由，他可以拿6日发生起义，而5日居民没有告密为借口，立即把整个米兰没收。谁不愿作哈布斯堡王朝的间谍和密探，克罗地亚兵³⁵⁷就可以依法加以处置。一句话，拉德茨基宣布了一个新的进行大规模掠夺的办法。

米兰起义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它是整个欧洲大陆革命危机逼近的信号。这次起义是值得钦佩的，它是少数无产者的一次英勇的行动。这些手中只有短刀作为武器的少数无产者，竟敢于向驻有卫戍部队和四周驻扎着4万名欧洲精锐之师的堡垒发动进攻；而与此同时，意大利的财神的子孙们却在自己的民族饱受凌辱和蹂躏、流着鲜血和眼泪的时刻，沉湎于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生活。但是，把这次起义当作马志尼的种种不朽的密谋的最后结局来看，当作他针对着法国人

民而发表的种种言过其实的宣言和盛气凌人的说教的最后结局来看,这次起义却未免太可怜了。不过,我们只希望这种像法国人所说的即兴的革命能够从此结束。有谁听说过,伟大的即兴作者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呢?在政治方面,道理也同诗歌方面一样。任何时候革命都不能按照命令制造出来。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可怕的经历之后,要唤起民族的革命,只是身在远方的领袖的纸上的号召已经不够了。科苏特利用一个机会,公开地完全否认自己同起义的联系,特别是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宣言。但是,他在事后要求大家承认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比他的朋友马志尼高明,这一点看来是十分令人怀疑的。《先驱》就这一点写道:

“我们认为有必要预先告诉我们的读者,这件事所涉及的完全是科苏特先生和马志尼先生的相互关系,而后者目前不在英国。”^①

马志尼的朋友德拉罗卡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就科苏特先生和阿戈斯蒂尼先生的种种否认写道:

“有人怀疑他们是在坐观起义的成败,准备或者分沾成功的荣誉,或者推脱失败的责任。”

前匈牙利大臣贝·瑟美列在致《纪事晨报》编辑的信中抗议“科苏特非法盗用匈牙利的名义”,他说:

“谁想要对作为国务活动家的科苏特作出自己的评价,他就应当仔细研究一下最近一次匈牙利革命的历史;谁想要了解他作为一个密谋家的才能,他就应当回顾一下去年的不幸的汉堡远征。”

革命虽败犹胜。这一点,从米兰的骚动在大陆各国的统治者中间

^① 梅·里德《致〈先驱〉编辑》。——编者注

引起的恐怖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只要读一读下面这封发表在官方的《法兰克福总邮报》上的信就可以知道了：

“柏林 2 月 13 日讯。米兰事件在这里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个消息的电报是本月 9 日传到国王^①那里的。那时正是宫廷舞会进行得最热烈的时候。当时国王立即宣布说，运动是同一个有深刻根源的密谋相联系的，这个密谋的网络遍布各地。他说，面对着这些革命运动，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建立紧密的联盟……一位高级官员喊道：‘也许，我们不得不在波河上保卫普鲁士王位了’。”^②

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以至于在柏林逮捕了大约 20 个居民，对米兰事件的“深刻的印象”就是这次逮捕的唯一理由。极端保皇主义的报纸《新普鲁士报》就因刊登了据说是科苏特的一份文件而被没收。13 日，大臣冯·威斯特华伦向上院提出了一个匆匆拟定的法案，这个法案授权政府没收所有一切不是在普鲁士出版的报纸和书刊。在维也纳，逮捕和家宅搜查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立即进行了会谈，以便就政治流亡者问题向不列颠政府提出共同的抗议。所谓的欧洲“列强”是这样脆弱，这样软弱无力。革命地震的预报刚刚发出，他们就感到欧洲所有的王位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虽然他们在自己周围布满了军队、绞架和监狱，他们却在被他们称之为“少数被人收买的恶棍的暴乱”面前发抖了。

“已经恢复平静”。是的，是恢复平静了。但这是在狂风首次大作和其后随之而来的怒号这期间的不祥的、可怕的平静。

让我们从大陆上的暴风骤雨的场面转到风平浪静的英国来吧。

① 即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② 1853 年 2 月 15 日《法兰克福邮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第 39 号附刊第 1 版第 1 栏。——编者注

看来,似乎小个子顶点约翰²⁴⁶的精神主宰着官方世界的一切领域;似乎整个民族也像统治它的那些人一样变得麻木不仁了,甚至《泰晤士报》也发出了这样的悲叹:

“这也许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这也许是大火之前的烟雾……目前时期的特点就是阴郁沉闷。”^①

议会恢复活动了。不过,到目前为止,联合内阁的最富有戏剧性的和唯一引人注意的行动,还是阿伯丁勋爵的三鞠躬。关于约翰勋爵的纲领给他的敌人留下的印象,可以根据他的朋友的议论作出最好的判断。

《泰晤士报》说:“约翰·罗素勋爵发表的演说还不如一个普通的拍卖商在拍卖旧家具、残破货物或小店铺设备之前的那一套兜揽生意的诳动听……对约翰·罗素勋爵的演说的反应十分冷淡。”^①

众所周知,由于有更迫切需要立法者处理的更加紧要的实际改革,新的改革法案被搁置下来了。目前,已经有实例可以说明,在实现改革的工具即议会本身尚未进行改革的时候,这些改革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2月14日,克兰沃思勋爵在上院说明了他的法律改革的纲领。他的冗长的、枯燥无味的、含糊不清的演说的一大部分,是列举了人们期待他做而他完全不准备做的那些事情。他为自己辩解说,他在羊毛口袋³⁵⁸上总共才坐了7个星期。但是,正如《泰晤士报》指出的,“克兰沃思勋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了63年,当了37年律师”。依据

① 1853年2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0号第4版第6栏。——编者注

道地的辉格党精神，他从以往的细小的法律改革所获得的比较大的成就当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继续以同样的方式实行改革，就会违反一切谦虚的规则。按照道地的贵族精神，他避免涉及教会法，因为“这会同既得利益完全相违背”^①。既得利益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使社会蒙受损失。在克兰沃思勋爵所准备的措施中只有下面两项多少还有点意义。第一是“关于简化转卖土地的手续的法案”，这个法案的主要特点是，它使转卖土地更加困难，因为它增加了这方面的费用和技术上的障碍，而同时却并不减少拖延现象和简化转卖财产的复杂手续。第二是关于成立整理成文法的委员会的提案，该委员会的全部功绩将是编纂出全部40大本法令全书的索引，一个可怜的少女可以在听忏悔的神父面前为自己辩护说，她虽然的确是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非常小；毫无疑问，克兰沃思勋爵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为自己的措施辩护，以抵御法律改革的最顽固的反对者的攻击。

由本月18日迪斯累里先生就英法关系问题向内阁提出的质问而引起的辩论，是到现在为止下院中唯一有趣的辩论。迪斯累里从普瓦捷和阿津库尔³⁵⁹讲起，一直讲到卡莱尔的竞选讲坛和哈利法克斯的圣职大厅。他的目的是要指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和查理·伍德爵士对拿破仑第三所作的无礼的批评。迪斯累里竟然出面为他所领导的政治派别的夙敌波拿巴分子辩护，这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老托利党的彻底的瓦解。他不可能采用比为法国现在的制度辩护更不恰当的方式来开始自己的反对党活动。我们只要对他的演说的这一部分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就可以看出它的软弱无力。

① 1853年2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2号第4版第3栏。——编者注

当他企图说明公众对于英法关系的现状感到不安的原因时，他不得不承认，正是在他本人执政时开始的大规模的军备活动，是这种不安的主要来源。尽管如此，他还是力图证明，增加和完善大不列颠的国防手段的唯一理由是现代科学运用于军事艺术而引起的那些巨大变化。他宣称，权威人士很久以前就已经承认必须采取这种措施。1840年在梯也尔先生内阁时期，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政府曾经作了一些努力，其目的是至少为在国防方面实行新的制度打下基础，但是这些努力都白费了。在1848年大陆上爆发革命的时候，关于国防问题，当时的政府又一次得到机会把社会舆论引导至它所希望的方向。但这次还是没有得到结果，只是在他和他的同僚出来领导政府的时候，国防的问题才最终成熟。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可以归纳如下：

(1)成立了民军。

(2)整编了炮兵。

(3)采取了充分巩固国家的军火库和沿海某些重要据点的措施。

(4)提出了为海军补征5 000名水兵和1 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提案。

(5)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原有的实力，建立一支由15—20艘战列舰以及相当数量的巡航舰和较小的船只组成的海峡舰队。

从所有这些陈述来看，迪斯累里所论述的和他所想要证明的恰好相反。当叙利亚问题³⁶⁰和塔希提岛问题³⁶¹使同路易-菲力浦的友好协约³³⁴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的时候，政府没有能够增加军备；当革命在整个大陆蔓延开来并且似乎已经威胁到不列颠的最根本的利益的时候，政府也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为什么现在才能做到这一点，为什么迪斯累里先生的政府做到了这一点呢？就是因为拿破仑第三的行动使人们有理由比1815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担心英国的安危。

此外，科布顿先生说得很对：

“所计划的海军力量的增加不在于增加蒸汽机的数量，而在于增加人员；但从使用帆力舰过渡到使用蒸汽舰并不需要增加水兵的数量，而是恰恰相反。”^①

迪斯累里说：

“法国存在着一个军人政府，这是设想同法国的关系可能即将破裂的另一个原因。但是，如果各国军队渴望征战，那么这是因为它们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不巩固。而法国现在所以为军队所控制，并不是因为军队有军事野心，而是因为公民有不安情绪。”^②

迪斯累里先生似乎完全没有看到，问题在于：军队感到在自己国家中的地位巩固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整个民族迁就一个人数不多的公民阶级的利己主义的不安情绪，而对军事专制（它归根到底不过是狭隘的阶级利益的工具）的现代恐怖制度屈服，这种情况将维持多久。

迪斯累里举出的第三个原因是：

“我们国家里对今天法国的统治者的很大的成见……人们抱定这样一种见解：他一掌握政权就取消了在我国受到极大尊重的议会宪法，取缔了新闻出版自由。”^②

但是，迪斯累里并没有能够举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种成见。他自己也说：“要对法国政治作出自己的评价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即使英国人民不像迪斯累里先生那样深知法国政治的秘密，仅仅常识也告诉他们，那个既不受议会管辖、也不受报刊监督的

① 理·科布顿《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本·迪斯累里《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也就正是当自己的国库因为疯狂的浪费和挥霍而枯竭的时候，可能对英国实行海盗式袭击的人。

接着，迪斯累里先生举例证明波拿巴和前届政府之间的诚意协商对于维护和平起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他举了下列一些例子：在法国和瑞士之间即将爆发冲突³⁶²的问题上，在开放南美河流自由通航问题³⁶³上，在普鲁士和纳沙泰尔问题³⁶⁴上，在逼迫美国参加签订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问题³⁶⁵上，在为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³⁶⁶而在近东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上，在改变关于希腊王位继承次序的条约³⁶⁷的问题上，以及在对突尼斯的主权采取协调一致态度的问题³⁶⁸上，等等。这使我不禁想起法国秩序党的一个代表在1851年11月底关于波拿巴和议会多数派之间的友好协约的演说，据说这种协约使议会很有可能很容易地解决关于选举权、联合和出版等问题。但两天之后却发生了政变。

迪斯累里演说的这一部分软弱无力，矛盾百出，但是他演说的末尾对联合内阁所作的攻击却十分精彩。

他在演说的末尾说道：

“还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使我现在不能不作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这个理由就是这个议院的各政党的现状。目前的状况是十分特殊的。现在我们有一个保守派内阁，同时我们又有一个保守派反对党。（掌声）关于伟大的自由党，我怎么也找不到。（掌声）辉格党人和他们的伟大传统何在呢？……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又一次掌声）我想问问，激进主义的青春的活力，它那过分乐观的期待，它那巨大的希望何在呢？我担心，当它一从青年时代所常有的那种由于热情奔放和阅历太少而形成的梦幻中苏醒过来时，它会发现自己是一个已被利用过并且已被抛弃的无用之物。（掌声）利用时毫不留情，抛弃时毫不客气。（掌声）激进派在哪里？在这个议院里是否还有一个人自称为激进派呢？（喊声：“听啊，听啊！”）一个也没有。他害怕人们会抓住他，把他变成保守党的大臣。（哄然大笑）怎么会产生这样一种奇特的情况呢？造成这种非常不幸的政治局面的机

制何在呢？我认为，为了说明目前的事态，我有必要去求助于那个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这个武库就是海军首席大臣（格雷厄姆）。也许议院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两年前，海军首席大臣曾经按照他的习惯奉送给我们一个政治信条——他的演说中有很多这种信条。他声明说：“我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先生们，当时我就想：如果进步可以作为一个人的立场，那它该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东西啊！（大笑和掌声）当时我想：这大概是演说者一时的失言。但是，请原谅我这一时的怀疑吧。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在目前已经付诸施行的制度。因为我们现在的内阁是一个进步的内阁，而且每一个人都岿然不动。（掌声）“改革”这个词我们已经再也听不到了，已经再也没有改革内阁，而只有进步内阁了。在这个内阁里，每一位阁员都决定什么事情也不做，一切困难都被搁置一旁，一切不能达成协议的问题都被变成了尚待商榷的问题。”^①

迪斯累里的对手们无言以对。只有“取之不尽的政治手腕的武库”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是一个例外，因为他至少在这样一个方面还保持了体面：他没有完全收回那些被说成是他的过失的、对路易-拿破仑的侮辱性的言词。

约翰·罗素勋爵指责迪斯累里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变成了党派问题，并劝导反对党说，

“在去年的种种纠纷和冲突之后，如果能有一个哪怕是短期的和平进步而避免各种重大的激烈的党派之争，那将是国家之大幸。”^②

辩论的结果，用于海军的全部开支将被议院通过。但可以使路易-拿破仑放心的是：这一切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只是基于科学的观点。方式温和，实质强硬。在上星期四上午，皇家律师出席了大主教法庭³⁶⁹，以外交大臣^③的名义要求约·多德森爵士把档案中

① 本·迪斯累里《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约·罗素《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③ 乔·克拉伦登。——编者注

的拿破仑·波拿巴的遗嘱的原本及其附录交给法国政府。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如果路易-拿破仑愿意打开这个遗嘱,并打算实现它,那么这个遗嘱很可能会成为现代的潘多拉的盒子。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2 月
22 日

载于 1853 年 3 月 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710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议会辩论。——僧侣反对社会主义。——饿死人³⁷⁰

1853年2月25日星期五于伦敦

本周的议会辩论是不大令人感觉兴趣的。22日斯普纳先生在下院提出一项取消梅努特神学院津贴²⁵²的议案，而斯科菲尔德先生提出一项“废除由国家负担教会或宗教事宜的任何开支的全部现行条例”的修正案。斯普纳先生的提案以192票对162票被否决。斯科菲尔德的修正案要等到下星期三才讨论；可是这个修正案也有可能根本撤回。在关于梅努特的所有讨论中，值得注意的只有（爱尔兰旅²⁶¹的）达菲先生的发言，他认为：

“美国总统^①或法国新皇帝^②会乐于恢复他们的国家同爱尔兰僧侣之间的联系，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③

在昨天的会议上，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出了他的“废除对女

① 富·皮尔斯。——编者注

② 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③ 查·加·达菲《1853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权利限制”³⁵⁴的提案。这一提案以 29 票的多数被通过。于是，这个问题又一次在下院获得了解决，但是毫无疑问，它在上院还是要成为悬案的。

高利贷精神早已统治了不列颠议会，却不准犹太人进入下院，这当然是很荒谬的，尤其是当犹太人已经有资格被选举担任一切地方公职的时候，这就更加荒谬了。但是，顶点约翰²⁴⁶没有提出他曾经向英国广大人民许诺的那个消除他们的无权状态的改革法案，而只是提出废除对莱昂内尔·路特希尔德男爵的权利限制的法案，这件事倒是完全符合他这个人和他的时代的特点的。从以下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广大群众对这件事情多么不感兴趣：在整个大不列颠，没有一个地方向议会提出一封要求准许犹太人进入议会的请愿书。小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演说揭穿了这场可怜的改革滑稽剧的全部秘密：

“说实在的，议会管的只是勋爵阁下的私事。（高声喝采）勋爵阁下让一位犹太人作为伦敦的代表，（喝采声）他并且起誓每年要提出一个有利于犹太人的提案。（喊声：“听啊！”）毫无疑问，路特希尔德男爵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这丝毫也不能使他有权利格外受到人们的尊敬，特别是当人们想到他这些财产是如何得来的时候。（内阁党席位上发出“听啊！听啊！”和“哦，哦！”的喊声）昨天我刚刚从报上读到，路特希尔德银行同意在有可靠保证的条件下以 9% 的利息贷给希腊一笔款项。（喊声：“听啊！”）利息这样高，难怪路特希尔德银行大发横财。（喊声：“听啊！”）商业大臣^①曾经谈到压制报刊的问题。其实，谁也没有像路特希尔德银行这样厉害地、用贷款帮助专制国家的手段来压制欧洲的自由了。（喊声：“听啊！听啊！”）可是，即使男爵是一个像他无疑拥有财富那样拥有威望的人，我们也还是有理由期望在下院中代表由一切反对前任内阁的政治派别领袖组成的政府讲话的勋爵阁下，能够提出比今天所讨论的更重要

① 查·伍德。——编者注

的措施。”^①

对选举申诉书的审查工作已经开始了。坎特伯雷和兰开斯特的选举,已被宣布无效,因为情况证实了某一选民等级的资格通常可以用金钱买到。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案件都将通过妥协暗中了结。

《每日新闻》写道:“很明显,那些使改革法案的意图化为乌有并在本届议会中重新取得优势的特权阶级,是非常害怕完全的彻底的揭发的。”^②

本月 21 日,约翰·罗素勋爵辞去了外交大臣的职务,他的继任人克拉伦登勋爵宣誓就职。约翰勋爵是第一个没有任何官职而参加内阁的下院议员。他现在只是一个享有特权的幕僚,没有职位,也没有薪俸。可是,凯利先生已经宣布,对于可怜的小约翰没有薪俸这种尴尬情况,将提出一项提案来加以补救。外交大臣一职在目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德意志联邦议会“突然决定要求大不列颠把一切政治流亡者驱逐出境,而奥地利人则提议把我们全部装上轮船,送到南太平洋的一个荒岛上去。

在以前的一篇通讯里,我已经指出过,保障爱尔兰租佃者权利的鼓动,不管它现在的领袖们的观点和意愿如何,很可能有一天会变成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③我指出了上层僧侣已经开始对同盟采取敌对的立场,从那时起,舞台上又出现了一种把运动朝这个方向推进的力量。北爱尔兰的地主竭力要使他们的租佃者相信,保障租佃者权利

① 罗·皮尔(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编者注

② 1853年2月2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09号第4版第2栏。——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28—629页。——编者注

同盟和保卫天主教徒协会是同样的东西，他们正假借反对天主教的传播为名，努力组织力量来对付这个同盟。

爱尔兰地主就是这样号召他们的租佃者反对天主教僧侣的，而另一方面，英国新教僧侣则号召工人阶级反对工厂老板。英国工业无产阶级以双倍的力量重新展开了长期以来的争取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²⁵⁴、废除厂内店铺和实物工资制的斗争。这样的要求必然会在已经接到许多有关这方面的请愿书的下院提出来，因此，在以后的通讯里，我将有机会详细地谈谈那些惯于把报纸和议会讲坛变成散布他们的自由主义的花言巧语的传声筒的暴虐的工厂主所使用的种种残酷而卑鄙的手段。这里我们只需提起这样一件事情：从1802年起，英国工人就不断地为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工厂工作时间而斗争，直到1847年通过了有名的约翰·菲尔登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这个法令禁止任何工厂中强迫女工和童工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但是自由主义的工厂主们很快就看出这一法令为在工厂实行轮班工作制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1849年，有人向财务法庭提出控诉，法官的判决是：实行童工两班轮流工作而成年工人在机器转动的全部时间内不停地工作的轮班制是完全合法的。因此，又必须把问题提到议会里；1850年，轮班制被议会宣布为非法，可是在这同时，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却变成了十小时半工作日法令。目前工人阶级要求不折不扣地恢复原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而为了使之更加有效，工人们又加上了一条要求：限制机器转动时间。

简单说来，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公开的历史就是如此。至于这个历史的内幕则如下述：资产阶级以通过1831年的改革法案²⁴⁹打败了土地贵族，工厂主因要求自由贸易和废除谷物法²⁴⁴而侵犯了土地贵族的“最神圣的利益”；因此土地贵族就决心支持工人反对厂主的

斗争和要求,特别是支持他们的限制工厂工作时间的要求,以此来反击中间阶级。这些所谓的慈善家老爷们当时在一切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会议上都是打先锋的。阿什利勋爵甚至由于他在这个运动中的言论而获得了某种“声誉”。土地贵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1847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1850年,地主老爷们的怒气渐渐平息了,他们和厂主老爷们取得了妥协,即一方面宣布轮班制非法,另一方面作为对强制实施该法律的一种惩罚,迫使工人阶级每天加上半小时的额外劳动。而目前,贵族们感到同曼彻斯特学派²⁴¹决斗的时候迫近了,所以又想来操纵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可是,他们又不敢亲自出面,于是就通过**国教会的教士**来鼓动人民群众反对棉纺大王,企图用这种手段来拆后者的台。这些神父怎样毫不留情地对工厂主进行十字军征讨,从以下的几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来。在克兰普顿曾举行过一次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集会,主持会议的是布拉莫尔牧师(国教会的代表)。在这个会上,斯泰利布里奇的教区牧师约·雷·斯蒂芬斯宣称:

“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那时各民族是受神权政体统治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可是法律的精神依然如故……劳动者应当首先分享他亲手生产出来的大地的果实。工厂法律被肆无忌惮地破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这里的工厂区的首席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先生不得不亲自写信给内务大臣说,没有警察的保护,他不敢派也决不派他手下的任何视察员到某些区里去……要防的是谁呢?防的是工厂主!防的是区里最有钱有势的人,防的是区里的地方官,防的是女王陛下的治安法官,防的是以王室代表的身分出席即决法庭的人……

可是老板们犯法受到过处罚没有呢?……在我那个区里,星期日睡到9、10点钟甚至11点钟已成了工厂男工和大部分女工的习惯,因为一星期的劳动已

经把他们累得精疲力竭了。星期日是他们疲乏的躯体能获得休息的唯一的一天……而且，一般总是工作时间越长，工资越少……我宁愿在南卡罗来纳州当奴隶，也不愿在英国工厂里当工人。”^①

在伯恩利举行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大会上，哈伯厄姆-伊夫斯的教区牧师 E·A·维里蒂向听众发表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当兰开夏郡的人民受尽压迫的时候，科布顿先生、布莱特先生以及其余的曼彻斯特学派的先生们在做什么呢？……富翁们暗地里在打什么主意呢？他们在盘算怎样从工人阶级那里再骗取一两个钟点。这就是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们所抱的目的。这就使他们成了如此无耻的伪君子，如此狡猾的流氓。我以英国国教会牧师的身分对这种行为提出抗议。”^②

这些可敬的国教会牧师们所以会摇身一变成了保护工人权利的游侠骑士，而且是如此见义勇为的骑士，其原因我们已经指出过了。他们不仅要能笼络人心，以防苦难的日子、民主主义胜利的日子的来临，他们不仅意识到国教会实质上是一个和地主寡头政权共存亡的贵族机构，而且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都是国教会的反对者，他们都是非国教徒，而光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国教会每年就要从他们腰包里掏去 1 300 万英镑，这首先就使他们非常心痛，他们决心要让这些世俗的金钱和僧侣阶层断绝关系，以便使这阶层的人更不愧为上帝的使徒。这就是说，这些虔诚的教士进行斗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切身利益。曼彻斯特学派的代表们可以从这种转变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除非他们决心——不管他们怎样不乐意——把人民所应当享有的一份权力完全给予人民，他们就不可能把政权从贵

① 约·雷·斯蒂芬斯《1853年2月18日在克兰普顿的演说》。——编者注

② E·A·维里蒂《在伯恩利的演说》。——编者注

族手中夺过来。

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自己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作**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作**饿死人**。

本月在伦敦又发生了一些饿死人的事件。我只指出其中的一件：玛丽·安·桑德利，年43岁，死于伦敦市沙德韦尔的煤巷。参加验尸的医生托马斯·皮恩先生指出，她是因饥饿和寒冷致死的。死者躺在一小堆干草上，身上什么也没有盖。屋子里面用的、烧的、吃的什么也没有。5个小孩子坐在靠近母亲尸体的光秃秃的地板上，由于饥寒而不住地号哭。

关于“强迫移民”的问题，我将在下一篇里加以论述。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1853年2月
25日

载于1853年3月1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1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2卷翻译

卡·马克思

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
——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
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³⁷¹

1853年3月4日星期五于伦敦

从上月即2月份公布的关于1851年和1852年贸易和航运的报告中我们看到,已宣布的出口总值,1851年为68 531 601英镑,1852年为71 429 548英镑;在1852年的出口总值中,棉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和丝织品占47 209 000英镑。1852年进口的数额比1851年小。由于供国内消费的进口的比重没有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所以,英国有若干数量的金银代替通常数量的殖民地产品而成为再输出口品。^①

殖民地移民局公布的1847年1月1日至1852年6月30日期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向世界各地移民的统计数字如下:

① 《人民报》在转载时删去了这段话。——编者注

年份	英格兰	苏格兰	爱尔兰	总数
1847年.....	34 685	8 616	214 969	258 270
1848年.....	58 865	11 505	177 719	248 089
1849年.....	73 613	17127	208 758	299 498
1850年.....	57 843	15154	207 852	280 849
1851年.....	69 557	18 646	247 763	335 966
1852年(到6月止).....	40 767	11 562	143 375	195 704
总计.....	335 330	82 610	12 00 436	1 618 376

移民局指出：“从利物浦出境的移民十分之九估计是爱尔兰人。从苏格兰出境的移民约有四分之三是克尔特人，他们不是来自苏格兰高地，就是来自爱尔兰转道格拉斯哥出境。”

由此可见，在全部移民中，将近五分之四是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以及苏格兰附近岛屿上的克尔特人。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关于上述移民的事是这样说的：

“移民是以拥有小块土地和种植马铃薯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崩溃的结果。”该杂志接着又说：“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的过剩人口的迁出，是实行任何一种改良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无论是1846—1847年饥荒或是随之而来的移民，都没有使爱尔兰的财政收入受到任何影响。相反，它的纯收入在1851年达到4 281 999英镑，比1843年增加184 000英镑。”^①

先是把本国居民弄到赤贫的境地，而当从这些人的身上再也榨不出任何利润的时候，当他们成为影响收入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就把他们赶走，然后来结算自己的纯收入！这就是李嘉图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所阐明的学说。假定一个资本家每年获得2 000

① 上面的数字以及相关的引文均引自《经济学家》1852年2月12日第494期上的《移民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编者注

英镑的利润，那么雇用的是 100 个工人还是 1 000 个工人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李嘉图说：“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①只要一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地租和利润保持不变，这些收入是来自 1 000 万人还是来自 1 200 万人则无需考虑。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中针对这种说法指出，根据这种观点，即使英国全部人口都消失了，岛上只剩下一个国王（当时不是女王，而是国王^②），只要那架自动机器能使他获得和今天 2 000 万居民所创造的同样多的纯收入，那么英国对此也会毫不介意。的确，在这种情况下，字面意义上的“国民财富”是不会有减少的。^③

我在先前的一篇通讯中曾经举过在苏格兰高地圈地的例子^④。从下面这段引自《戈尔韦信使》的话可以看到，同样的过程正继续在爱尔兰造成强迫移民现象：

“在爱尔兰西部，居民正在迅速地从土地上消失。康诺特的地主们心照不宣地采取联合行动，清除所有的小土地占有者，对他们进行着一场真正的有计划的歼灭战……在这个省里，每天都发生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对此，公众是丝毫也不了解的。”

但是，不仅绿色埃林^⑤和苏格兰高地的陷于赤贫境地的居民由于农业的改良和“过时的社会制度的崩溃”而被赶走，不仅英格兰、威

①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 年伦敦第 3 版第 416 页。——编者注

② 乔治三世。——编者注

③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 年巴黎第 2 版第 2 卷第 331 页脚注。——编者注

④ 见本卷第 608—614 页。——编者注

⑤ 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

尔士和苏格兰低地的强壮的农业劳动者(他们的船费等是由移民局支付的)被赶走,而且另一个阶级——英格兰最稳定的阶级,现在也被卷到这个“改良”的车轮之下。在英格兰的小农场主中间,特别是在那些种难以耕作的粘性土地的小农场主中间,也发生了惊人的移民运动。这些小农场主眼看不可能有好收成,又缺乏足够的资本来大力改良农场以便能够偿付他们原来的租金,他们就只好远涉重洋去寻找新的家园和新的土地,此外别无出路。我这里不是在谈由淘金热引起的移民,只是在谈由地主占有制、农场的集中、机器用于农田、以及农业大规模现代化而造成的强迫移民。

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形成了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那些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数量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本身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对那些国家来说,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是完全闻所未闻的。为了保持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否则,它们就难免体力劳动之苦,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地位就要依赖于一种不得打破的一定的人口比例。强迫移民是唯一的出路。

也就是这种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旧大陆。在这里,仍旧是同一个原因在起作用,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为了继续作野蛮人,他们就只能保持少量的人口。这是一些从事畜牧、狩猎和战争的部落,他们的生产方式使部落的每一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的空间,就像现在北美的印第安部落那样。这些部落的人口增长,使它们相互压缩生产所必需的地盘。因此,过剩人口就不得不进行那种为古代和现代欧洲各民族奠定基础的冒险大迁徙。

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相反。现在,不是生产力不足造成人口过剩,而是生产力增长要求人口减少,并且通过饥荒或移民来赶走过剩的人口。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我既不同意李嘉图的见解,也不同意西斯蒙第的意见。李嘉图把“纯收入”看做摩洛赫,认为所有的居民都应该心甘情愿地做它的祭品;西斯蒙第则从他那悲天悯人的慈善心肠出发,硬要保持已经过时的农业经营方法,把科学从工业中驱逐出去,就像柏拉图把诗人从他的共和国中驱逐出去³⁷²一样。社会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无声的革命,一切都得服从它,它并不顾及被它摧毁的人的生存,正像地震不理会被它毁坏的房屋一样。无力掌握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必遭淘汰。但是,有一些经济学家竟当真以为,这种悲惨的过渡状态只能意味着要使社会适应资本家(地主和金融巨头)的贪欲,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看法更幼稚更浅薄的呢?在大不列颠,这一过程表现得最为明显。现代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把农村居民从土地上赶走,而使人口集中于工业城镇。

《经济学家》写道:“除了斯皮特尔菲尔兹和佩斯利³⁷³的少数手工织工之外,工业工人没有一个人得到移民局的帮助,自己花钱移居海外的寥寥无几或者说根本没有。”

《经济学家》清楚地知道,他们是不可能自己花钱移居海外的,工业中间阶级也不会在这方面帮助他们。这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农业人口这种现代社会中最稳定最保守的因素正在消失,同时工业无产阶级正是由于现代生产的作用,在大城市中围绕着巨大的生产力聚集起来,这巨大的生产力的创造史到现在为止是一部劳动者的殉难史。谁能阻挡他们再前进一步去占有这种迄今占有着他们的力量呢?

哪里有抗拒他们的力量呢？哪里也没有！到那时，乞灵于“所有权”是没有用的。按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说法，现代发生的生产技艺上的变化摧毁了过时的社会制度及其占有方式。这些变化剥夺了苏格兰的克兰成员、爱尔兰的小农和租佃者、英格兰的自耕农、手工织工、无数的手工业者以及整代整代的工厂童工和女工；有朝一日他们也将剥夺地主和棉纺大王。

现在，大陆是天上电闪雷鸣，英国则已是脚下地动山摇。现代社会真正天翻地复的剧变已在英国开始。

我在本月1日的通讯中曾经说，马志尼会公开反驳科苏特。^①果然，本月2日的《晨报》、《晨邮报》和《每日新闻》登出了马志尼的信。既然现在马志尼本人已经打破沉默，那么我也可以告诉大家，科苏特在他巴黎的朋友们的压力下已经否定了他自己发表过的文件。^②在科苏特以往的活动中我们就看到过许多这种反复多变、极端矛盾和表里不一的表现。他具有“艺术家”身上的一切令人喜欢的优点，但也具有“艺术家”身上的一切女人式的缺点。他是一位“口头上的”大艺术家。谁要是不愿意为流行的盲目崇拜所左右，而希望有一个以事实为根据的判断，那我就介绍他读一下不久前出版的、瑟美列先生所写的一本关于拉约什·鲍蒂扬尼、阿尔图尔·戈尔盖和拉约什·科苏特的生平的书^③。

① 马克思提到的这篇通讯没有刊登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642页。——编者注

③ 即贝·瑟美列《拉约什·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拉约什·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编者注

至于伦巴第的情况，可以相信，如果说马志尼没有能够把意大利中间阶级吸引到运动中来，拉德茨基却一定能够做得到。目前他正准备没收所有移居国外的人的财产，甚至连那些经奥地利当局允许出境并已经取得别国国籍的人也包括在内——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同最近的起义没有联系。据奥地利报纸的估计，可以没收的财产，价值达 1200 万英镑。

在 3 月 1 日的下院会议上，帕麦斯顿勋爵在回答达德利·斯图亚特勋爵提出的问题时宣称：

“大陆列强没有提出过驱逐政治流亡者的要求，如果提出，将会遭到断然的，坚决的拒绝。不列颠政府从来不愿意为别国的国内安全承担义务。”

不过，从证券交易人的《通报》上，从《辩论日报》上，可以看出确有提出这种要求的打算。不久前，有一天^①的《辩论日报》曾猜测，英国对将由奥地利、俄国、普鲁士和法国联合提出的要求已有附首听命之意。该报还补充说：

“如果瑞士联邦拒绝让奥地利对毗邻其边境的瑞士各州实行监视，那么奥地利就很可能侵犯瑞士的领土，占领泰辛州；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为了保持政治均势，也会把它的军队开进与它的国境毗连的瑞士各州。”

《辩论日报》实际上是建议用 1770 年普鲁士的亨利希亲王以玩笑方式向叶卡捷林娜女皇建议的解决波兰问题的简单方法³⁷⁴，来解决瑞士的问题。与此同时，名叫德意志联邦议会⁶的那个可敬的机关，正在郑重其事地讨论“即将向英国提出的要求”，而且在这个庄严的问题上大声疾呼，其汹汹之气势足以鼓起德意志舰队的所有

^① 1853 年 3 月 1 日。——编者注

风帆。

在本月1日的下院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很有代表性的事情。代表布里奇诺思和布莱克本的议员因行贿被宣布属于非法当选。约·雪莱爵士就此事提议,把分别处理他们案件的两个委员会所收到的证据提交议院审查,并在4月4日前暂不发出改选令。关于这个问题,约·特罗洛普男爵阁下说,“已经委派了14个委员会去审查一些市镇选区的舞弊情况,而且还需要再委派约50个委员会”,接着他又说,要组成若干审查有争议的选举的仲裁委员会,同时还要组成若干处理议院日常事务的委员会,在议院为此找到足够的议员是有困难的。如果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议院本身的基础,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议院将垮台,议会机器将停转。

科布顿先生在他最近的一本小册子中,也像他在曼彻斯特和平大会³⁴⁷上和各种有关教育问题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讲演时一样,都以抨击报刊为乐事。整个新闻界都对他进行了反击,其中最重的一击是“一个英格兰人”^①打出的。这个人写的一些评论路易-拿破仑的通讯在政变时期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此后他就把自己的矛头转向丝织业巨子和棉纺大王们。他在一篇有意写给科布顿先生看的通讯的结尾处,把这位西区的圣哲^②大大挖苦了一番。他这样写道:

“只要有一点小小的胜利,他就会洋洋得意,冲昏头脑,就想充当万民归心的独裁者。这个小集团的先知,不停地蛊惑,贪求荣誉、不容异见,异想天开,不讲逻辑,耽于空想,一意孤行,傲慢不逊,他是一个爱吵架的和平鼓吹者,咬牙切齿的博爱信奉者,他高唱的是‘自由’,信奉的是专制教条;他为新闻界不受他欺不上他当而恼火,他要把新闻界的影响、智慧和独立性一刀砍光,想要

① 即英国记者阿·贝·理查兹。——编者注

② 即代表约克郡西区的议会议员科布顿。——编者注

使尽是有学有识之士的新闻界堕落成以他作唯一领袖的一帮每行挣稿费一便士的文人。”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写于 1853 年 3 月 1
日—4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3 月 22 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第 37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卡·马克思

科苏特和马志尼。——普鲁士
政府的诡计。——奥普通商条约。
——《泰晤士报》和流亡者³⁷⁵

1853年3月18日星期五于伦敦

今天议会将因复活节而休会到4月4日。

在先前的一篇通讯中我按照一种流行的传闻报道了李贝尼的妻子在佩斯遭到奥地利人的鞭笞^①。后来我查明,李贝尼根本就没有结过婚;同样,英国报刊传播的他要为其父受奥地利人虐待报仇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他的行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他一直表现得坚定而英勇无畏。

读者在此之前想必已经从英国报纸上看到科苏特对马志尼的声明的答复。在我看来,科苏特只是把本来就很糟糕的情况弄得更糟。他前后两次声明矛盾异常明显,无需我在此多讲。此外,这两个文件在语言上的差别也令人厌恶:前者是用大先知的东方式夸张语言写

① 马克思提到的这一事件可能被《纽约每日论坛报》收入1853年3月4日的一篇通讯。——编者注

的,后者却用了律师打官司的诡辩腔调。³⁷⁶

马志尼的朋友们现在异口同声地说,米兰起义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势态强加于他和他的同志们的。但是,从一方面来说,密谋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即一旦有人叛变或者发生意外情况,只能被迫过早地发难起事。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你们在三年的时间里老是叫喊行动,行动,行动,而你们的全部革命词汇又只有“起义”一个词,那你们就不要指望在某个时刻能享有足够的权威下令说:不许起义。不管怎么说,奥地利人的残暴已经使米兰的失败变成了民族革命的真正开端。作为例证,请听帕麦斯顿勋爵的喉舌、灵通的《晨邮报》今天是怎样说的:

“那不勒斯人民期待着在奥地利帝国必将发生的运动。那时从皮埃蒙特边境到西西里岛,整个意大利都将起来反抗,悲惨的灾难就将随之而来,意大利的军队将解散。从1848年革命中征募来的所谓瑞士兵拯救不了意大利的君主们。等待着意大利的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共和国。毫无疑问,它将是1848年开场的那出戏的下一幕。在拯救意大利君主方面外交已经再也无能为力了。”

在马志尼的传单^①上署名并在起义爆发前走遍意大利各地的奥雷廖·萨菲,在给《每日新闻》的信中公开承认:“上层阶级已陷入颓唐、冷漠和绝望的境地”,只有“米兰人民”,只有无产者,

“在无人引导的情况下,全凭他们自己的本能保持着对祖国命运的信念,面对奥地利总督们的专制统治和军事法庭的合法谋杀而一致地决心复仇”。^②

现在,马志尼派终于相信,即便在反抗异族专制统治的民族起义

① 见本卷第634页。——编者注

② 见萨菲《致〈意大利与人民〉编辑》,1853年3月9日《每日新闻》转载了该信。——编者注

中,也存在着阶级差别这种东西,在当今这个时代不能去指望那些上层阶级开展革命运动,这是马志尼派的一大进步。也许他们还会前进一步,认识到如果他们希望他们的口号“上帝和人民”能得到响应,他们就必须认真研究意大利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我打算将来详细地谈谈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直到现在还使他们对意大利的民族斗争即便不是站在反动立场上,至少也是漠不关心。

不久前我在巴塞尔出版的题为《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ss》)^①的2 000本小册子在巴登边境被没收,并按普鲁士政府的要求焚毁了。巴塞尔政府已经没收了还在出版者手里的一批小册子。按照大陆列强强加于瑞士联邦的新新闻出版法,还要对出版者沙贝利茨先生、他的儿子以及印刷者^②加以迫害。这将是瑞士的第一桩这类案件,而且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激进派和保守派争论的题目。普鲁士政府多么急切地要对公众掩盖它在科隆审判期间的卑鄙行为,这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外交大臣^③发出了搜查令(Fahndebriefe),要求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发现这本小册子便一律加以没收,但是他却连指明小册子的真实名称都不敢。为了迷惑公众,他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学说》,尽管这本小册子除了揭露普鲁士国家的秘密之外并无其他内容。

1848年以来,德意志政坛取得的唯一“成绩”就是签订了奥普

① 见本卷第471—545页。——编者注

② 即雅科布·沙贝利茨和克·克吕西。——编者注

③ 奥托·冯·曼托伊费尔。——编者注

通商条约^①，——其实这哪里算得上什么通商条约！这个条约加了那么多的附款，规定了那么多的例外，把那么多重大问题留待尚未出世的各种委员会到将来去解决，而关税税率实际降低的幅度又是那么小，结果，条约仅仅成了一种对于真正的德意志商业同盟的向往，毫无实际意义。条约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即它是奥地利对普鲁士的又一次胜利。这个阴险、卑鄙、怯懦、多变的冒牌强国又一次屈服于比它更残暴、然而更赤裸的对手。奥地利不仅迫使普鲁士接受一项它十分不愿接受的条约，而且强迫普鲁士恢复实行旧关税同盟^②和旧关税税率，或者说，答应在12年内，不经关税同盟内部各小邦一致同意，也就是不经奥地利允许（德意志南部各邦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商业上都是奥地利的附庸，或者说普鲁士的对头），不在其商业政策上有任何变动。普鲁士自从恢复“神授君权”以来地位每况愈下。普鲁士的国王^③这位“一代贤人”似乎认为，他的处于残暴专制统治下的人民，可以从他们的政府在国外不得不忍受的屈辱得到慰借和补偿。

流亡者问题还没有解决。半官方的《奥地利通讯》否认奥地利目前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一个新照会的说法，因为“最近事态表明帕麦斯顿勋爵重又得势，故帝国政府不能置自身之尊严于必然受损之境地”。在此以前，我已经向读者报道了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的演说^④。现在读者在英国报纸上可以看到阿伯丁在上院所作的亲奥的演说^④，这

① 签订于1853年2月19日。——编者注

②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③ 见本卷第664页。——编者注

④ 1853年3月4日的讲话。——编者注

个讲话表明英国政府愿充当奥地利的密探和首席检察官。帕麦斯顿的报纸^①现在这样评论他的同僚的声明：

“就连显然有阿伯丁勋爵看来想作出的有限让步，我们也不能说一定能办到…… 没有谁敢向不列颠政府提出充当一下外国政治工具和政治陷阱试试看的建议。”

请看，在玛士撒拉内阁³⁴⁸里，“老朽无能与蓬勃的自由精神”之间配合得多么好。伦敦的整个报界都同声怒斥阿伯丁和上院，只有《泰晤士报》是唯一可耻的例外。

读者记得，《泰晤士报》先是痛骂流亡者并敦促外国列强提出驱逐他们出境的要求。然后，当它确知内阁关于恢复外侨管理法³⁷⁷的提案将被下院轻蔑地否决时，便立即花言巧语地大谈它为维护避难权而不惜作出牺牲（天哪！）。终于，在上院的议员大人们彼此亲切交谈之后，它又对自己所唱的充满公民道德的高调进行了报复，在3月5日的社论中大动肝火：

“在大陆许多地方，人们都以为我们引以为快的是，我国成了一个展览流亡者的动物园，聚集着来自各个国家的无恶不作的暴徒…… 这些外国作者抗议英国收留他们自己的为法律所不容的同胞，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以为，在这个国家生活的流亡者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我们奉劝他们不要误会。这类可怜的生灵中的大部分都过着贫穷堕落的生活，吃异国人的残羹剩饭还要碰运气，可以说是沉入这个泱泱大都会的污波浊浪之下的深渊…… 对他们的惩罚就是最残酷的放逐。”

最后一点《泰晤士报》说得很对；英国是个挺可爱的国家，只是你

① 即《晨邮报》，以下的引文见该报1853年3月10日的社论。——编者注

不要住在那儿。

但丁在“火星天”上遇见了他的祖先卡却基达·迪·西利基利，后者用下面的话向他预示他即将被逐出佛罗伦萨：

“Tu proverai sì come sa di sale
Lo pane altrui, e com'è duro calle
Lo scendere e'l salir per l'altrui scale.”

“你必将体味到吃人家的面包
是如何辛酸，在人家的楼梯上
爬上爬下是多么艰难。”^①

但丁真幸运，他虽然也属于“被称为政治流亡者的这类可怜的生灵”，他的敌人却未能用《泰晤士报》社论描写的悲惨景象来吓唬他！《泰晤士报》更是幸运，它免遭但丁在《地狱篇》里给它“留下一个席位”。

如果照《泰晤士报》所说，流亡者吃着异国人的残羹剩饭（它忘了说，他们还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么《泰晤士报》本身难道不是靠异国人的血和肉养肥的吗？这家报纸的那些匿名的皮蒂娅利用法国革命、德国起义、意大利暴动和匈牙利战争，利用法国的集体枪杀和奥地利的绞刑，利用被没收了的头颅和被砍了头的财产制造出多少篇社论和弄到了多少英镑啊！如果大陆没有“暴徒”，如果《泰晤士报》一天天混日子靠的都是在大陆无事可写之时充当它固定存货的那些东西：斯密斯菲尔德市场的粗劣食品、伦敦烟囱的煤烟、粗暴的马车夫、泰晤士河上的六座桥、市区内的葬礼、传播疫病的教堂墓地、肮脏的饮用水、铁路上的事故、不准确的度量瓶以及其他可以引起人

① 但丁《神曲·天堂篇》第17首歌。——编者注

们兴趣的题材,如果是这样,那它该是多么难过啊!《泰晤士报》从它敦促不列颠政府杀害拿破仑第一以来没有什么变化。

这家报纸在1815年7月27日那一号上曾写道:“他还活着的消息必然会对欧洲各地的不满分子产生什么影响。这一点考虑过没有?他们会认为,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联盟各国的君主们对一个有如此众多的拥护者和崇拜者的人的性命是不敢去碰的。”

它仍然是那家鼓吹对美利坚合众国发动十字军征讨的报纸。它那时曾写道:

“只有消除这个民主主义叛乱得胜的恶例,才能同美国讲和。”

《泰晤士报》编辑部里没有“暴徒型的”大陆人物。有的完全是另一种人。例如,这里有一位可怜巴巴的小人物,一位名叫奥托·冯·文克施特恩的普鲁士人。他起先曾经当过一家德国小报的编辑,后来在瑞士陷入贫穷堕落的境地,不得不向弗莱里格拉特和其他流亡者告贷,最后投效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驻伦敦公使本生,同时又成为印刷所广场^①的圣哲的不可缺少的一员。《泰晤士报》编辑部还有不止一位这种亲善型的大陆人物,他们成了把大陆警察当局和英国这家头号大报连结在一起的纽带。

下面这件事可以作为说明英国新闻出版自由的例子。住在滨河街的爱·特鲁拉夫先生由于国内税务署根据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第六和第七年法令^②第七十六章提出控告而受到伦敦弯街警察局的审

① 印刷所广场是《泰晤士报》的所在地。——编者注

② 1836年的《关于减少报纸税及修改报纸税与广告税法的法令》。——编者注

讯；他被控出售未按规定贴印花的报纸。报纸的名称是《波特里斯自由报》。这家报纸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出了四号。报纸名义上的业主是废除知识税协会书记科勒特·多布森·科勒特。他发行该报“依据的是印花税局的惯例，即允许《雅典娜神殿》、《建筑师》、《笨拙》、《赛马新闻》等报刊刊登有关时事的报道和评论免贴印花”；他显然是有意引起政府方面的追究，目的在于让陪审团确认什么样的新闻报道可以免贴那一便士的印花。地方法官亨利先生还没有作出决定。不过这个决定也不会有多大意义，因为该报的出版并不是有意违抗印花税法，而只是想钻一下此项法律还存在着的一个空子而已。

今天的英国报纸刊登了一条君士坦丁堡3月6日电讯说，外交大臣傅阿德-埃芬蒂已由利法特帕沙接替。这个让步是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缅施科夫公爵迫使土耳其政府作出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³⁷⁸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因为路易-拿破仑非常痛恨俄国和奥地利阴谋阻挠教皇为他加冕，他打算借土耳其人之手进行报复。在下一篇通讯里我将谈谈这个老是不断出现的东方问题，这个欧洲外交上的绊脚石。

卡尔·马克思

卡·马克思大约写于1853年3月11—18日

载于1853年4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733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
12卷翻译

附 录

约翰·格奥尔格·埃卡留斯

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³⁷⁹

在过去的两年里,现行制度的吹捧者和辩护士们一直在为我国最近所实行的贸易政策的成功而兴高采烈。关于收入、进出口等方面情况的报告一个比一个令人鼓舞,——这是繁荣和财富增加的新标志。赢利的统计人员得意扬扬地要那些反动的和革命的对手们去看一看统计数字,他们以极端傲慢的神气告诉全世界,现行的资本、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的统治是通向幸福的唯一可靠途径。

在同一时期,资产阶级报刊的撰稿人特别注意在他们的振奋人心的报告中添加一些关于工人幸福生活状况的比较详细的描写。工人的命运被涂上了非常绚丽的色彩,工人的幸福生活使现存秩序的捍卫者们普遍感到满意。

为什么我们的压迫者对这一问题如此关心呢?是因为他们爱雇佣奴隶,把工人看作人,看作自己的同类吗?不!是因为他们确信,只要工人还有一块骨头可捡,还有一片面包干可啃,他们就能进行榨取。

除了雇佣供他们寻欢作乐和从事卖淫的工具和傀儡之外,资本家不雇佣任何人,也不支付任何工资,除非他能从中得到利益并增加他的财富。因此,认为雇佣奴隶即商品创造者在空前繁荣的时期比在

萧条的时期可能稍微过得好一点，这不令人感到惊奇吗？但是，面对随处可见的苦难的、悲惨的、压迫的景象，有人却硬说，工人阶级确实生活得相当富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为了证实这种幸福的舒适的状况，政治经济学家们求助于关于贫困状况和食品降价等等的统计表，不过，他们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工人得到的工资的实际数量。

众所周知，人的需要——当然也包括工人的需要——随着他所处的文明发展程度而变化，这是事实。因此，幸福生活的标准是**相对的**。在文明的社会中，幸福生活并不在于单个人所消费和支配的商品的实际数量，而在于相对数量，也就是单个人在本国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量中占有多大的数额，在于作为社会的一员的单个人的**份额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现行制度的拥护者无视这一点，而提出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标准。他们认为，卖苦力的人，只要不挨饿，就是过幸福生活。依照他们的原则，工人的状况或许确实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好；然而，这一时期工人的**相对地位却比以前任何时期更糟**——所以，工人实际上是被欺骗了。

假定某个国家，在一个特定的时期中，年劳动所创造的总收入为4亿英镑。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行业的劳动者，从政府雇员到街道清洁工，每人所得工资的平均数为50英镑，这个数目使工人能够生活并繁衍后代，使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足。

现在，让我们假设，在50年中，人口增加一倍，年总产量的货币价值也增加一倍，但是总产量增加到四倍，这样，工人现在就能够用50英镑买到过去用100英镑所能买到的东西。如果他的货币工资同过去一样，他的状况就会得到百分之百的改善；他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也会增加一倍；他的**相对地位**还会同过去一样。

现在让我们假定,在这个时期内,机器的发明和改进有了迅速的进展;由此引起的体力劳动的减少使它的名义价格降低 25%,因懈怠和人手过多而造成的时间的浪费,又使它的名义价格每年降低 15%,那么,我们会发现,在这个时期終了时,工人的工资每年只有 30 英镑。

假定在这个时期的初期用 50 英镑所购买的商品数量相当于 100 英镑购买的东西,那么,到这个时期終了时用 30 英镑购买的商品就会相当于 120 英镑购买的商品。约瑟夫·休谟会认为,这样,工人的实际工资就增加了 20%。但是,尽管绝对值会增加 20%,工人的相对收入却会减少 40%! 因为他的收入只有达到相当于 200 英镑的水平,才能获得他从前所占的比例。

这样,在 50 年中,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他们所支配的社会产品会增加 20%,但是,资本家的实际收入不仅由于生产的进步会增加 100%,而且他们还会额外获得相当于工人阶级减少的相对收入的增长额。

这就是在幸福的、繁荣的 1851 年里我们的实际状况。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时时都在扩大;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具有对抗性;生产越便利,增长得越多,财富积累得越快,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就降得越低。

但这还不是一切。50 年前,关于构成人类生活内容的东西的观念同今天大不一样。随着艺术和科学的普遍进步,我们的视野扩大了;随着生产的增长,我们的需求也多样化了。我们制造了丰富多彩的奢侈品和使生活舒适的用品——它们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经常过往的街道上挂着种种招牌和广告,它们标明娱乐场所和写明经售我们需要的各种商品。商业资本家就是策划这一切的主谋;

一切想得出来的可以掏走我们腰包里的每一分钱的花招都被贪婪地使用了；但是，当我们抱怨我们的辛勤劳动所得甚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却是一片指责声，说我们耽于酒色，奢侈浪费。他们迫使我们变成政治家，好帮助他们把他们同贵族的争吵进行到底；现在当我们已成为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家的时候，他们把我们称为嗜血成性的暴徒、煽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为了获取利润，他们命人出版报纸、杂志、书籍和小册子供我们阅读，而一旦我们得出不利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结论，他们就指责我们是热中于幻想的野心家。在到处都是财富和奢侈品，人的需求和知识都提高了的文明社会中，他们设想我们应当像我们的前辈一样，满足于最普通的生活必需品、睡眠和繁重的工作。且不说是否应当允许任何个人对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实行任何的私人支配这一思想在工人阶级中已广为传播，就是我们的需求，在目前这种从属地位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至少已提高了一倍，但是，我们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收入却只增长了 20%。

而且，这还只是处境较好的工人的情况。还有千千万万工作认真、愿意干活的好工人，由于缺乏就业机会，即使在繁荣和食品较便宜的今天，也经常没有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必需品。

但这也还不是一切。只要一个工人还能保住一个栖身的地方，有几件家具，即使他的工作可能很糟糕，或者，有时根本没有工作，即使他和他的家庭经常食不果腹，他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一员——他生存在人世上——他可以与其他工人交往、联系，总还可以偶然享受片刻的幸福。尽管他的状况很糟糕，他的社会地位还可能继续下降——他可能失掉一切，失掉他的毫无保障的一点点舒适，他的最后一点独立性；他可能成为乞丐，并且被排除于一切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之外；总之，他可能被关进令人屈辱的巴士底狱。

如果说,对于那些耗尽了他们的劳动能力,他们的力量和青年与成年的活力的人来说,在习艺所²⁵³里结束他们的生命是非常悲惨的和令人难受的,那么对于那些身体强壮的成年人来说,甚至被剥夺了赐给工人的那一点点东西,在生命的最旺盛时期实际上像囚犯那样在习艺所中消磨日子,那就更难受无比和更悲惨了。

由于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产品和制成品的出口一般被看作是衡量不列颠贸易和制造业情况的温度表,因此,很明显,我们的对外贸易对整个贸易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对劳动的需求和劳动的价格。因此,不列颠工人的命运取决于中国人、美国人和德国人等等是否有能力和是否愿意购买我们的制成品,而犯罪和贫困现象也随着出口的上升和下降而增加和减少。

因缺少食物而犯罪的人和到习艺所获得救济的穷人,实际上都是同一类工人;两者之间的唯一差别在于,前者只要没有被法律这个武器和警察所制服,就不会自己投进监狱,而后者则温顺地服从,并走进巴士底狱。两者都被资本的统治驱入各自的囹圄。但是,在这里我们不算谈论犯罪者,我们将只限于谈论第二类可怜的同胞。

不得不依靠教区的救济而生活的身体强壮的成年人的数目是:

1849年1月1日 201 644人(据590个济贫院的统计)

1850年1月1日 181 159人(据606个济贫院的统计)

1851年 154 525人^①

在同一时期,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产品和制成品的出口额1848年为48 946 395英镑,1849年为58 910 883英镑,1850年为65 756 032英镑。因此,1849年出口增长了9 964 488英镑,使20 000多人

^① 《贫困率》,见1851年2月8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摆脱了贫穷,1850年,出口又增长了6 845 149英镑,使26 634人摆脱了贫穷。^①

这些结果已使资本家们非常满意。他们把这些数字公布出来,好像在此之前贫民数量的临时减少是大家至今还不知道的事情;其实这种事情已经一再发生过。多少年来,贸易和商业一直经历着不断的起落;商业危机的周期性复发像日出日落一样带有规律性。他们是否想告诉我们,由于自由贸易,贫穷现象一定会消失?请看一看这些数字:在现行制度下,为了拯救所有身体强壮的成年贫民,我们的对外贸易每年还需增加5 000万英镑。难道我们的自由贸易政策或者已经允诺的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能够使国外顾客购买将近两倍于他们现在购买的我们的货物吗?这是不可能的!

尽管棉花收成不足,原料价格高昂,国外市场上已经充斥着我们的优质棉织品;现在,原棉由于丰收,价格已经下跌,我们的工厂主又在忙于将大量货物堆积到市场上。此外,几乎在一切贸易部门中都普遍存在着不景气现象;当原料和殖民地产品的进口量很大时,需求和价格却在下降。这一点和最近的衰退表明,我们已经处于另一次危机的前夜,贫困现象将会再次加剧,直到经过大量破产和灾难下一次繁荣高潮的到来。

这样,我们看到,那些在巴士底狱里打发日子的人在现行制度下是没有希望获得最终解放的。即使在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也有相当数量身体强壮的人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游手好闲,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人们住得太好,穿得太好,吃得太好了吗?或者是因为没有荒地可

^① 《1850年贸易和航运报告》,见1851年2月15日的《经济学家》。——编者注

以开垦,没有原料可以加工等等吗?不!这是因为社会的寄生虫已经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雇用更多有生产能力的劳动会妨碍资本家谋取利润。

不彻底改变制度就无法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即使我们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增长,足以按合算的工资雇用所有的人手,机器的发明和改进也很快就会使原来的状态重新恢复。饥荒和移民几乎没有减少爱尔兰的劳动大军。他们往往在割草和收获庄稼的季节在全国范围内到处流动,干活几乎不讲价钱,因此把工资压低了,——他们抢在收割机之前从四面八方涌来,不仅立即使农业工人提高工资的希望化为泡影,而且甚至使农业工人迄今为止在收获季节所得到的一点额外收入也面临被全部剥夺的危险。

另一方面,收割机以及其他的发明和改进,将使农场主在夏季越来越没有必要雇用额外的人手,把他们留在农业区(虽然必须留在习艺所中),这曾经是对农场主有利的。由于这些人手的服务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将被赶向工业城市,使待业人口进一步过剩,而这必然又会使工资下降。

另一个说明工人阶级状况不稳定的事实是,即使在对劳动的需求达到了最大限度的空前繁荣时期,工资率也无法保持不变。几乎没有一个贸易部门的资本家在最近两年没有企图降低工资,可悲的是,他们得逞的机会太多了。生意兴隆时的情况尚且如此,在环境不利时情况又会怎样呢?

这就是现代雇佣奴隶的地位,这就是被大肆吹嘘的实际状况,现行制度的辩护士们厚颜无耻地把这种状况称作**工人阶级的真正幸福生活**。如果我们在读他们的宣传品时会上当受骗,相信他们,那么,胃部的疼痛,我们的衣着,我们的住房等等,很快就会提醒我们,我们完

全是被假象所迷惑了。如果社会的进步、状况的改善和工人阶级的幸福生活意味着，资本家每前进一百步，较为幸运的工人才前进一步，而不太走运的苦力则被肆意践踏；如果那意味着，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无权分享他们所创造的使生活舒适的用品和奢侈品，如果那对一些人意味着毁灭，对所有人意味着繁重的工作和贫困，那么，我们的对手就是完全对的。但是，工人对幸福生活有不同的理解：超越世俗的幻想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生活在唯物主义的时代；穷人现在不会像过去那样为他们的富有的压迫者的荣耀而高兴；他们也不相信统治阶级天生高人一等，不相信他们自己的苦难是由超自然的力量所决定的——归根结蒂，只有完全享有劳动成果才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约·格·埃

格·埃卡留斯写于 1851 年 8
月—9 月之间

载于 1851 年 9 月 27 日《寄语人
民》第 2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合 作

它的现状和它应当是什么样的³⁸⁰

内容：当前运动的失误。实例：帕迪厄姆，布拉德福德，等等。较好的风气：宾利，贝里。——真正的合作计划。——两者的对比。

如果你指责教士的权术，教士就会说你是基督教本身的敌人。同样的，如果你指责那种实际上是赢利的所谓合作，合作论者也会说你是合作本身的敌人。然而，情况恰恰相反。正像真正的基督徒力图从教士的权术中拯救基督教一样，合作的真正的朋友也在尽力拯救合作，使之避免正在出现的有害倾向。

本刊第二期上已经说明^①，现在的这种不良的合作制度实际上导致竞争，并且通过竞争导致垄断。我不想在这里重述那些论据，使已经读过那篇文章的读者感到重复而厌烦。但是，我非常真诚地希望没有读过的人注意那篇文章。

① 见厄·琼斯《致合作原则的拥护者和合作社社员的公开信》。——编者注

在本文中,我将详细阐述合作的某些实际活动,它的现状,以及在我看来,它应当是什么样的。

现在指导合作组织的计划是从批发市场上低价买进——然后高价卖出。

商品在不少情况下仅仅卖给入股者本人——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卖给顾客的。

在商品卖给入股者的情况下,利润的一部分被用来支付劳务费,余下的由入股者在年终进行分成。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入股者从批发市场上购买商品,他们在零星购买时支付的价钱比他们应该支付的多得多,他们整整一年不能使用这部分钱,但在12个月后收回了被夺走的钱。还有比这更愚蠢的行为吗?人们故意向自己要高价,然后在年终时再还给他们自己,而在整整这个期间,他们不能使用自己的钱!为这种做法辩护的理由是,他们必须索取比批发价格高的价格,以支付劳务费,而他们事先无法知道劳务费将是多少。首先,可能知道要扣除的劳务费是很少的,——但是,事实是:他们根本不必或者几乎不必花这些劳务费。如果20个人可以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合作商店,然后间接地由他们的代理人把他们所需要的商品零售给他们;那么,他们也可以派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去批发市场直接购买货物,并在他们中间按照需要的比例分配货物。这样,除了一笔外出(如果需要的话)的旅费和一笔货物运输费以外,不必花任何劳务费,或任何其他费用。举例来说,如果20个家庭同意一起大量成批地购买杂货——每家说明自己需要多少——每家每周都积攒若干钱,把钱放在家里,或者交到任何一个可能被指定负责为大家管钱的人手中(以代替现在把钱交给商店的方式),在一定时期,这个小小的家庭联盟中的一个或几个成员到批发市场去买杂货,在那里或回

来后依照每个成员订购的数量将货物分成若干份——每个成员得到他所订购的一份——那么，交易也就完成了。富裕的中间阶级家庭每天都在这样做。两三个家庭联合起来成批地买煤或土豆等，其中一人买来一批，——以批发价格购入——节省了全部零售加价，然后在他们当中分配这些商品。20 或 30 个家庭可以这样做，两三个家庭也可以这样做。这里，你得到了合作商店的一切好处，而免去了合作商店的一切费用和困难。你不用支付租金、国税和地方税；不用支付办事员的薪金；不用货架和柜台；不用广告和招贴；不用付钱给律师；不用登记，注册或获得执照；不用以支付劳务费为借口赢利；——整个事情仅仅是几个家庭之间的家务安排——这样你便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你把你的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如果不注册的话你并不违法，如果注册的话你不会成为法律的奴隶——每个成员都受到通常的法律保护，能免遭他人侵害，——为了成批地买进并出售给入股者的目的，合作商店毫无必要，那是在掠夺你们自己，那是在做转手买卖，这种买卖你们可以直接做，而节省一大笔钱！有人说，我们将直接买进货物，但是我们不把它们带回家去，我们将把它们留在半路上，我们将向自己索取高价，我们将为一个昂贵的机构支付费用，以便我们可以被勒索，然后，在年终时，我们将把支付劳务费即支付使我们能够欺骗自己的那个过程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偿还给我们自己，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加可笑吗！

这就是那种声称专门向入股者出售货物的合作商店的真正活动。但是，这类商店寥寥无几——大部分都声称面向顾客。前者是绝对无害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愚蠢至极，他可以欺骗自己，而不给别人造成巨大损害。

但是，如果说一个人有权欺骗自己，他却无权欺骗别人。而在现

存的其他形式的所谓合作中已发生了这种情况。

第二类合作是指那种不仅把货物卖给入股者,而且也卖给一般顾客的合作。在第一类合作中,我们已经看到,那是在为一件根本不要合作商店会办得好得多的事情,而荒唐地浪费时间、精力和钱财。但是,在当前这个场合,这种导致竞争和垄断的整套赢利的做法,又在合作这个诱人的名义下出笼了。

在这里,利润直接取自购买者,根本不会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合作论者”以在最廉价的市场上买进,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卖出,并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他这样做是为了破坏生意经中可怕的赢利原则。可怜顾客付给他“利润”——年终时他把这些利润在他和他的合作伙伴之间进行分配!然后他们夸口说,他们一年净赚2 000英镑!这2 000英镑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呢?是由扣除劳务费之外批发价格(他们买进的价格)和零售价格(他们卖出的价格)之间的差额构成的。这2 000英镑中的一分一文钱都是最肮脏的赢利,因为这是在合作的名义下干出来的;这2 000英镑中的一分一文钱也是对普通顾客的直接掠夺。

这种新的赢利做法在过去几个月里被揭露出来以后,所谓的“合作论者”一致坚决否认对他们的指责,并试图在他们的章程中增加一些令人信以为真的“保留条款”,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例如,伦敦的成衣匠庄严宣布,他们认识到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使合作趋势全国化的决议^①的全部重要性和正确性,因此,他们愿意拿出他们的纯

① 指《[宪章派公会1851年3月31日、星期一及以后几日在伦敦召开]通过的鼓动的纲领》,见1851年4月12日《人民之友》第18号。——编者注

利的5%来建立全国基金。5%!那么,他们就可以把95%的纯利装进自己的腰包!这95%的纯利中的一分一文钱都是对他们的顾客的蓄意掠夺!因为,任何人都无权从社会获得比他贡献给社会的东西的价值更多的价值。一切多余的就是掠夺。所以,伦敦的成衣匠有权获得公平的劳动报酬,仅此而已。如果劳动者尽力为社会劳动,公平的劳动报酬就是使他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的报酬。

因此,扣除劳务费(一部分劳务费是付给已完成的劳动的公平报酬)后的分文纯利都是对社会的敲榨和欺骗。

但是,一些团体却企图用一种更迂回的、但同样容易识破的手法来逃避说它们赢利这种指责。我想以布拉德福德合作商店为例来说明这一点。这家商店声称只在它的成员中分配一半利润。让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章程。

第1条说,联合体的宗旨是“以买进价格向其成员提供物品和衣服。”

第6条说:“所有货物都按合理的市场价格出售,只收现金。扣除劳务费和5%的股息后的全部剩余利润,将按照每个成员购买的数量每半年在成员中间分配一次,但是任何成员都不得领取部分股金的利息。”

现在,首先,如果货物以“买进价格”出售,那就不会有“剩余利润”。既然“成员”只是按“买进价格”得到货物,“剩余利润”就必须来自顾客。

这太妙了!首先,成员按买进价格得到他们的货物,他们甚至不必负担他们那份劳务费——可怜的、秉性善良的“顾客”支付这笔费用。

其次,成员可得到“5%的股息!”又太妙了!**第3条**规定成员愿意购买多少股份就可以购买多少股份(虽然只有一票表决权)。多么惬意的投资!5%!在别的地方,他们只能得到3.5%。而在这里他们可

以得到的是5%！首先，他们按买进价格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其次，他们按照自己的投资又得到5%。可怜的、秉性善良的顾客还要支付这笔钱！

第三，“**剩余利润**将按照每个成员购买的数量每半年在成员中间分配一次”。又太妙了！这样，这些幸运的成员可以按买进价格得到他们的货物，得到5%的股息，除了这一切以外，还可得到“**剩余利润**”，并且每半年在他们中间分配一次！可怜的、秉性善良的顾客还得支付所有这些钱！

真是生财有道！这比店主还坏。你们用三股绳子把我们捆住——还一直说你们是我们的恩人。

在罗奇代尔和帕迪厄姆，“合作”采取了对人类和进步的最大利益更为有害的形式。在帕迪厄姆，已建立了一家“合作”工厂，25 英镑 1 股，每次可以支给 5 先令。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劳动者的工厂！——在这里，像在英国几乎所有的合作组织里一样，全部利润都在入股者之间进行分配——至于从顾客身上究竟榨取多少利润，那就要凭赢利者们自己的良心了。

工人们！民主主义者！难道你们能片刻容忍或认可这种做法吗？

据我们所知，招人非议最少的商店是在宾利和贝里的商店。

在这两个地方，大量硬币发出的铿锵声表明，它们还没有像帕迪厄姆、罗奇代尔、布拉德福德、伦敦和大多数其他地方那样蒙上一层厚厚的由赢利产生的锈。

在宾利，他们以 2 英镑 1 股建起了一个食品杂货和布匹商店。这个商店的章程第 1 条说：“**纯利润**的一半每年在成员中间分配一次，另一半交给团体，不再进行分配，而是用来把它的业务扩大到其他营

业部门。”

这条规定倒是有点像承认原则，但实际上，这是换汤不换药。尽管成员只是直接得到利润的一半，但是，另一半既被用来扩大联合体的业务，它实际上是被用来增加他们的利润，因为通过扩大商店，它扩大了可以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的那“一半”。

在贝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们采用了这样一种规章，即任何一个普通顾客，只要他愿意在他们的商店买东西，并且每周向该商店缴纳1便士，他就有资格分享一份与他购买货物的数量成比例的利润。同迄今为止的各种“合作”尝试相比，这是一个巨大进步。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合作应当是什么样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对合作原则的理解很不完整。人们以为，只要几个人共同合作开办一个商店，并且尽可能多赚钱，这就是解放了的和联合的劳动的真正合作。

决非如此！如果是这样，每家铁路、银行和船舶公司就都体现了真正的合作原则。

我们所理解的合作（顺便说一下，这是个很不恰当的字眼）的含义是，通过发展独立的和联合的劳动来消除赢利原则和雇佣奴隶制。但是，这只有在本文已经提出的下述原则的基础上才能办到。任何人都无权从社会获得比他贡献给社会的东西的价值更多的价值。

因此，联合的劳动无权从自己的顾客那里获得比它付出的产品的买进价格更多的东西，而只能使把自己的全部时间都投入财富的生产或分配的人过适当的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联合的劳动有两种选择：只是在买进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收取一点足以弥补零售费用的附加额；或者，再多收一些，不过要将多收的一分一文都用于公共事业，如购买土地、机器等，以

便使现在的雇佣奴隶从事独立自主的劳动。

考虑到目前的社会环境，我倾向于后者，因为这是促进劳动解放的最适当的措施。

让我们看一看怎样实现这一措施。成立一个合作团体；在支付劳务费（包括生产和分配中消耗的劳动）后，它发现年终时自己手头上还有剩余；它没有把这部分剩余分给各个成员，而是用来购买土地或机器，根据协作的原则把它们租借给其他工人团体。土地或机器的租金，以及每个商店在支付劳务费之外的剩余，根据同样的原则，在同样的条件下，又被用来购买机器和土地；如此等等，不断扩大团体的力量、实力和财力。这就是合作。它之所以是合作，是因为它建立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每个“分支机构”的成就都促进其他“分支机构”和整个共同体的成就。不可能有利害冲突——不可能有对抗——不可能有**竞争**——因为每个企业取得的成就越大，整个共同体的稳定和持久就越有保障。这使合作团体的发展和扩大对每个人都有利。我再强调一遍，这才是真正的合作。

但是，现在的孤立的做法是什么呢？它建立在个人的和对抗的利益的基础上。它使“合作论者”出于切身利益去阻止他人进行合作——阻碍联合原则得到扩展。为此，它采取的办法如下：按照现在的孤立的计划成立一个合作商店；也就是说，这个商店形成一个“封闭的自治区”，在它的疆界内不再容许有任何商店，尽量多赚钱，然后把它们装进加入合作商店的少数几个人的腰包。那么，这些人的切身利益是什么呢？是阻止在紧挨着他们的地方成立另一个合作商店，阻止另一个工人团体分享合作的好处。因为，如果最初那家商店繁荣了，它就会囊括当地的全部贸易（即使一个商店做不到，两个或几个商店就能做到，这只是一个数量问题，即在一个地方有多少顾客的问题）；

如果另一个独立的商店成立了，它就必须要有一部分顾客，否则它就无法存在。因而，它就成了另一个联合体的对手；它开始进行竞争；由于各家都没有足够多的顾客，这家多余的商店必须努力从已经成立的商店那里拉走顾客。为此，它必须廉价出售——它必须更廉价地买进货物和支付更少的劳务费，这样，才能廉价出售；其他商店为了自卫也不得不这样做；这样，在已经指出的构成现在计划的整个基础的赢利原则之外，又加上了旧的竞争制度及其必然结果：雇佣奴隶制、掠夺、一方面破产而另一方面垄断！

因此，现在的计划不是真正的合作；它在根本上是敌视扩大联合劳动的；它不是消灭赢利原则，而是使之花样翻新；它不是消除竞争，而是使之改头换面；它不是废除垄断，而是使之重新出现，它使劳动解放的希望化为泡影。

朋友们，现在，我恳求你们考虑一下这些观点和本刊以前提出的那些观点，不带有任何偏见或怒气。我是抱着对真理的诚挚信念，抱着对克服极端有害的错误倾向这一最高职责的真诚信念来写这篇文章的。我不是合作的敌人，而是它的朋友，它的真正朋友。我不反对合作，只希望从正在自我毁灭的途中挽救它。我相信这些意见不会伤害那些曾经支持按照现在的计划实行“合作”的人。这些意见是本着极其友好的精神诚心诚意地提出来的。我相信那些拥护现在的做法的人都是真诚的，诚实的，善意的。但是，如果我还说，我认为他们对于自己正在热情鼓吹的东西的性质和后果非常无知，难道人们不会指责说我傲慢无礼吗？相信我吧！当你们自以为在为合作制造摇篮时，你们是在为它挖掘坟墓。请比较一下你们的计划与我在这里提出的计划——并作出公正的评判。

我知道，按照自身利益的要求我应当写一些赞成而不是反对现

在的运动的文章。我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妨碍《寄语人民》的发行。但是，与其做不敢写出真理的奴隶，我宁可什么也不写。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要写出真理。值此众说纷纭之际，我发表这篇短文，把它奉献给我的读者的明智的判断力和诚实的感情。

厄内斯特·琼斯

厄·琼斯写于 1851 年 9 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1 年 9 月 20 日《寄语人民》第 21 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三比一。或工人阶级的力量³⁸¹

道义力量以物质力量为基础。少数人即使手中有真理，也绝对不能战胜多数人。少数人往往最终获胜，但这只是在他们说服了**多数人站到他们一边**的时候。那时候，错误的支持者就变成了**少数人**，并且就被击败了，因为他们同**多数人**相对抗。他们通常是被和平地击败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心怀敌意的少数人爱好和平，而是因为他们**无力进行斗争**。

这少数人是如何成功地使多数人站到他们一边的呢？除非他们向构成多数的个人表明，站到他们一边符合**个人利益**，否则是绝对做不到的。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人相信实行民主和社会权利符合他们的个人利益，那么民主和社会权利的真理就会占上风；如果情况相反，社会民主就无从建立。

这是对无产阶级能否在英国获胜的检验。这是对力量的计算——这个问题，虽然要估计到由无知和偏见构成的各种反作用因素，毕竟是像任何数学问题一样能够得到明确而肯定的解决的。

那么，工人阶级在英国是否占多数，这是每一个无产阶级改革者在敢于设想彻底的民主制的基本轮廓之前必须提出并得到回答的关

键问题。

我们决不能指望得到很富有的人们支持，因为民主制会使他们变得穷一点(尽管不是贫穷)，——不能指望得到懒汉的支持，因为民主制将迫使他们工作，——也不能指望得到那些依靠在自己之上的少数人的财富和怠惰为生的人的支持，还不能指望得到那些依靠在自己之下的许多人的贫困难为生的人的支持。

因此，工人阶级必须自己进行斗争，自己帮助自己去争取自身的权利。他们这样做的力量在于他们占多数，在于他们的联合和组织，这将使富人先前所作的准备归于无效。

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许多人曾说：真正的无产阶级即雇佣奴隶和贫民在我们国家占少数；贵族、资本家、专业人员、中间阶级、小零售商和工人贵族占大多数。

那么，让我们根据波特，麦克库洛赫和兰格^①的著作中的数字来衡量一下这种说法是否正确。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工人阶级的相对实力如何呢？试以 1845 年为例。

I. “上等阶级”：

属于贵族、资本家、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有教养的阶级的
年满 20 岁以上的男子有 214 390 人，占人口的 $\frac{1}{20}$ 。

在这些人当中， $\frac{1}{5}$ 生活优裕， $\frac{1}{10}$ 属于“上流”阶级，1—2% 为巨富。

II. “中间阶级”：

^① 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赛·兰格的获奖论文《国民的贫困》等。”——编者注

根据上述权威材料,这个阶级包括:

1. 较低的专业技术部门、著述、商业等部门的成员,他们是介于这个阶级与“上等阶级”之间的过渡阶级。

2. 店主、各种零售商人。

3. 农场主。

4. 熟练工匠和高明的手工业者。

5. 普通手工艺人,或靠耍手艺为生的人,而这要求较长的学徒期,并要求报酬应明显高于一般劳动的报酬。

后一类人是介于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过渡阶级。

包括所有这些人在内的中间阶级占总人口的 $\frac{1}{4} - \frac{1}{5}$ 。

上面所说的都是兰格先生的原话。

这样,“上层”阶级和中间阶级加在一起(中间阶级中的第五类人全部计算在内)只占人口的 $\frac{5}{20}$,而无产阶级占 $\frac{15}{20}$ 。因此,民主分子和保守分子的对比为三比一!

但是,如果分析一下上面的说法,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划分过分偏袒特权阶级。在对中间阶级的分析中,第四类和第五类人完全划错了位置:“熟练工匠”和“报酬优厚的普通手工艺人”毫无疑问应属于工人阶级。虽然他们肯定会形成工人贵族,但是他们与真正的中间阶级有很大的差别,就像他们与贫民有很大的差别一样。特权阶级不可能长期依靠他们中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他们将增加无产阶级在力量上的巨大优势。的确,迄今为止,他们是阶级统治的支柱,因为他们对中间阶级和贵族抱同情态度;他们对富人“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他们向富人卑躬屈膝,并以此为荣——他们是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障碍——因为他们是工人阶级上层的保守分子,他们把民主压在自己

下面,就像冰盖住冰洋里的水一样。在所有的贵族中,工人贵族向来对人民危害极大。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在迅速发生变化。无产者的力量正在增长,而特权者的力量正日益受到他们所支持的制度本身的作用的限制:工人贵族正被迅速驱入雇佣奴隶的行列——小零售商和小农场主正迅速沦落到雇佣工人的低贱地位之下——而在他们之下的阶级又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让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第四个等级——社会的!不!是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的!用兰格先生的话来说,“处在地位最低的独立自主的工人之下的阶级”。它包括:

1. 贫民	1 300 000
2. 在济贫院外接受救济的人	170 096
3. 接受私人施舍的人	159 118
总 计	1 629 214
4. 犯人,赤贫者和游民之类的大城市	
中被遗弃的人约	1 000 000
总 计	2 629 214

“这样,处在最低的独立自主的工人之下的整个阶级,包括接受救济的贫民、犯人、娼妓、游民和主要靠私人施舍为生的穷人达 200 万或 250 万人,——占总人口的 $\frac{1}{7} - \frac{1}{8}$ 。”(!!)

现在请注意两者的对比,“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 $\frac{1}{20}$ ——被遗弃的阶级(处在地位最低的雇佣工人之下的人)占 $\frac{1}{8}$!从富人和穷人这两个等级的整体来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呢?计算结果是:三比一——一个国中之国!近 300 万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无业游民还在等待着最后判决和解放的时刻。

所以,下列事实是确定无疑的:

第一,胜利的物质保证在工人阶级这边——最重要的东西已经有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取胜。**

第二,由于财富的集中不断将小店主驱入工人队伍,而且将工人推入贫穷的深渊,工人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我们的敌人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少。**

不应忘记:无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如士兵、水兵、民兵和警察被利用来反对其余的人;大量的人还受到无知和偏见的束缚;民主还远未深入整个工人阶级的心中。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工人阶级每天都在吸收成千上万的成员,并迅速扩大自己的队伍。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用启蒙这个日晷来测定的时间问题。

宣传! 宣传! 写作! 写作! 让民主的圣经传播四方! 最重要的基础已经有了:广大的多数人,他们真正的利益(不管他们现在是否知道)是民主的利益。让他们了解这一点,这就是需要做的一切。

穷人就无法可想吗? 我的帕麦斯顿勋爵!

有! 就在**数量和知识。**

厄·琼斯写于 1851 年 9 月底
—10 月中之间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日《寄语
人民》第 26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科苏特是什么人³⁸²

他终于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谁不拥护我就是反对我。”

对于自己应该拥护谁，看来科苏特先生的心中一直在进行痛苦的斗争。一段时期以来，他确实在试图取悦于一切党派。不过，发现这做不到，（谢天谢地！花言巧语的年代已开始逝去！）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党派——他把宝押在压迫者身上。在公众愚昧和充满激情的时刻，说明事情的真相也许不太受欢迎，但是，人们应该认清自己的朋友和敌人，这毕竟是十分重要的。欧洲即将来临的大革命这次决不允许失败，尽管上一次失败了，因为人民信赖了他们的敌人！

科苏特先生在伯明翰发表的演说中已经告诉我们：“3年前，奥地利王朝没有被1848年3月维也纳革命^①的浪潮所冲走，主要应当

① 琼斯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读者应把这次革命与同年十月发生的那次革命区别开来，《寄语人民》已对后一次革命的事件作了叙述。”——编者注

由我负责。”^①

他的言行给民主、自由、真理和正义造成的损害，也许几个世纪都无法弥补——他让毒蛇昂起头，他知道得很清楚，这条毒蛇敌视自由和进步的任何一星半点火花，这个恶魔的存在与人民的安全绝不相容。

他对意大利的所作所为本刊已有记载。他来到英国后企图对此加以否认。他的使者鲍蒂扬尼被奥地利人谋杀了，除了他的一帮朋友和奴才之外，没有任何人追随他；否认是容易的，但是，事实会大声讲话：匈牙利军团决没有从意大利召回！这一点他不能否认——事实摆在那里，任何东西都无法抹杀。

他从他在布鲁萨的住所，往美国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匈牙利民族热爱自由，把自由看作是上帝赐给的最好礼物，但是，它从来没有想到要以自由的名义发动一场反对国王的十字军征讨。匈牙利根本没有这种使旧世界的统治者们胆颤心惊的鼓动家。

我的同胞们没有受到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理论的影响，我国也没有保守派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②

在马赛，对拿破仑这个卑鄙的阴谋家的憎恨，光荣的法国人民所显示的令人钦佩的精神，以及人民不久就会获得自由的想法，使他勉强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一向轻信的民主派把这些话说成是同情的誓言。

在南安普敦，科苏特拒绝出席工人在那个城镇举办的宴会，后

① 拉·科苏特《1851年11月12日在伯明翰的演说》。——编者注

② 拉·科苏特《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编者注

来，他又拒绝出席伦敦工人举办的宴会——他拒绝接受工人的欢迎，不过，他却从来不拒绝工人的敌人举办的任何宴会和他们的阿谀奉承。

在温切斯特，他宣称他敌视民主派，他是红色共和国的敌人。

在伦敦，经过无数次恳求、恭维和劝说后，他才屈尊俯就，承认“示威委员会”³⁸³的存在，并接受“伦敦居民”的敬意，条件是不提民主，决不提及宪章运动，而且（正像汉特先生所说的那样）应把非格斯·奥康瑙尔先生排除在外，这一禁令的适用范围还扩大到另一位宪章主义者身上（证据相当充分，尽管不十分确凿），虽然此人是上面所说的那个委员会的委员！

在哥本哈根大厦，他作了一次反动的演讲。听众照例被几句反对专制（指的是沙皇和皇帝们的专制，而不是棉纺大王、地主、中间阶级的专制）的漂亮话所感动，对演讲大声喝采。至于宴会他郑重地拒绝出席。

之后，据报道，他曾向一个法国代表团作了一次社会主义的演讲，后来他正式否认这是他的演讲，说这是新闻记者捏造的。

情况就是这样，群众凭着那个演讲又开始信任他了，他们蜂拥地来到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他要经过的街道上。那次演讲无疑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人们相信了这样一个演讲，才跑在他的前面，到工业地区去准备对他的欢迎。那是一个聪明的政治手腕，因为他看到他在温切斯特的恫吓言论已使哥本哈根集会的人数有所减少。这次极其热烈的欢呼过去后，科苏特先生便表明自己的立场，发表他的最终纲领——请注意他选定宣读这个纲领的时间、地点和听众。

在兰开夏郡下院议员亨利先生家举行了一个盛大茶话会。聚集

的人相当多，曼彻斯特的——也许是欧洲的——最大代办商的优雅的大厅里挤满了金融寡头的代表。没有无产者参加那个茶话会。“贱民”在外边离得远远的，在他们的阶级灾难和商业封建主义的主要代表的停车场门口，用他们的破嗓子声嘶力竭地欢呼。《每日新闻》告诉我们，在这座豪华的公馆内，“集中了北部地区的财富、权势和生产智慧的精华。曼彻斯特、利物浦、奥尔德姆、阿什顿、贝里、博尔顿、斯托克波特、布拉德福德和利兹的少数几个最有影响的制造商也都出席了。”^①这样，依照这家《每日新闻》的说法，科苏特先生向他们阐述了他的信条和未来行动计划：

“我认为欧洲的现状是这样的，例如，法国在3次革命中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成果。60年中遭到3次这样的失败，自然就会促使人民探寻规划世界未来的新学说。这类学说有些人称之为共产主义，有些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在我能够理解共产主义，但是不理解社会主义。我翻阅了有关这一问题的许多著作，请教了许多博士，但是他们的看法如此各不相同，以致我简直无法理解他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不过，对世界的看法是受某些词所赋有的含义支配的，它既可以是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可以是这个词的假定的含义。但是，社会主义，据我的理解，是与社会秩序和保障财产相矛盾的。（热烈欢呼）情况既然这样，我完全相信，一个平凡的或普通的不管多么渺小的人，如果能够以自己的行为和活动对欧洲的下一次斗争多少发挥一些影响，这对人类是重要的和有益的。我之所以能够对欧洲不可避免的下一场革命多少发挥一些影响，这并不是由于我有什么长处，而是由于我在我国所处的地位。我宣布，我在发挥影响之时决不会违背我认为构成社会秩序基础的那些原则——（热烈欢呼）——也决不会违背保障个人财产的伟大原则……对于每一个渴望保护人身和财产的有理性的人来说，帮助世界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如果人们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处理他们的事务，所有这些新学说都会消失……我坚定不移地决定在下一场伟大斗争中运用上天可能赋予我的全部影响，不让任何破坏社会秩序的学说支配人类的学说。但是，

① 拉·科苏特《1852年11月12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说》。——编者注

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欧洲各民族就必须有自由，否则，人类就会寻找其他办法，而我看哪儿的骚动也平息不了。但是，像我这样只是希望实现合乎理性的自由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将丧失自己的一切影响，而其他可能对上述原则有威胁的人，则可能获得影响。”(欢呼)①

终于现出了原形！即使最滑溜的鳝鱼迟早也会上钩的。科苏特加入了秩序推销员的行列。他还企图把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因为他知道，共产主义在世界现阶段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反对它的偏见势力很强大。他知道，社会主义对阶级统治的无政府状态是致命的打击，它是秩序的真正保障。他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和平，意味着对财产和生命的保障——但是，他也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垄断、竞争、高利贷、赢利和雇佣奴隶制的终结。他知道，社会主义意味着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的垮台，而他在资本家的簇拥下，竟向唯一的自由原则宣战！并且参与下流的号叫，随声附和无耻的诬蔑（虽然他始终明白，他内心深处在撒谎），胡说社会主义是无政府状态和财产无保障！

他是什么人？岂不就是那个人吗？他曾傲慢地告诉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示威委员会”说，不许在他面前提及宪章运动，他竟然希望该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多少有点自尊心或对自己所代表的事业有自豪感的成员，会使自己和自己的伟大组织如此丢人出丑，以至到哥本哈根大厦前的场地去并且根据他的那些言论向他表示敬意。他是什么人？岂不就是那个人吗？他不允许我们在他面前说明我们是什么人，或者表露我们的真面目，——然而他却可以在我们最可恶的敌人面前，在我们兰开夏郡的那帮掠夺者的热烈欢呼声中谴责我们，

① 拉·科苏特《1852年11月12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说》。——编者注

诬蔑我们。他不允许我们保护我们自己，然而却自称有权反对我们！

无耻！无耻之至！科苏特先生告诉我们：欧洲必定会爆发一场革命；欧洲人民，即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的红色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只有这些人现在能够发动革命）必定会帮助他和匈牙利进行斗争。然而，正是在这篇演讲中，他宣布与社会主义者和红色共和主义者血战到底！实际上，他期望得到这种帮助，因为他多少提了一下自由和普选权。拿破仑和科苏特之辈刺刀下的普选权！哈！哈！

确实，人们可能被这些谎言所欺骗！科布顿、布莱特、亨利、克肖之流都打算踩在科苏特的背上爬进知名人士之列。

啊！科苏特是上帝赐给他们的！大选在即——他们需要一些声望来进行竞选，不可能有更廉价的获得声望的手段了。他们可以谈论“自由”、“暴政”、“专制”、“民族自治权”，等等，等等——但是，这始终是指沙皇和皇帝们的专制，而不是指金矿大王、煤炭大王和棉纺大王的专制，可是在这两种专制中，后者要强大一万倍。“民族”始终是指与侵吞了匈牙利绝大部分利益的奥地利贵族和资产阶级以及俄国独裁者相对立的卑劣的匈牙利贵族和匈牙利资产阶级。人们误认为这一切就是民主，就是对社会权利的热爱。英国的金融寡头为什么痛恨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例如俄国和奥地利的专制制度，向来敌视贸易扩张。之所以敌视，是因为贸易扩张会提高中间阶级的地位，而强大的中间阶级（虽然他们自己对工人阶级实行的专制更厉害得多），作为众人（资产阶级）的专制，当然与个人专制（独裁的政府形式）是不相容的，并且是敌对的。

科苏特先生泄露了布莱特们、科布顿们和亨利们仇恨俄国和奥地利的的原因，——因为在实行独裁统治的国家，英国产品受

到排挤。在每个场合，他都旧调重弹——而在曼彻斯特，他补充说：

“你也许觉得奇怪，但是我要说，自由贸易并没有实行；便宜的面包有了，但自由贸易还没有，”——这就是说，穷人需要办的好事已经办了，但资本家还没有从中获得足够的好处。那么，什么时候会实现自由贸易呢？让我们听他讲：——“当英国工业生产者能够畅通无阻地进入专制主义现在把他们排斥在外的欧洲市场时，自由贸易才会实现。”^①

不，先生！当垄断组织被打倒的时候——不仅仅是当垄断组织被允许扩大它的业务和贸易的时候，——自由贸易才会实现。

科苏特先生告诉我们，“他将影响欧洲的大革命，使它朝着反社会的方向发展。”当然，他会以“保障财产”这一嗜血成性的秩序推销员的陈词滥调为幌子和借口来表达他对社会权利的宣战。他将影响欧洲的革命，是吗？他将扭转即将迅速冲破无知和恐惧的障碍的一亿人的汹涌潮流。太谦虚了！不过，我要告诉他和他现已与之结拜为兄弟的所有无政府主义的秩序推销员，欧洲的革命不会受任何一个被残忍奸诈的资产阶级操纵的动摇不定的傀儡所影响。我要告诉他，欧洲的革命是劳动对资本的讨伐，我还要告诉他，劳动者不会被降低到像马扎尔人那样的蒙昧的半野蛮人的智力和社会水平，马扎尔人仍然处在16世纪的半文明状态中，竟敢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伟大启蒙运动发号施令，并从容易上当的英国那里骗来一片喝采声。

记住科苏特的话：

^① 拉·科苏特(1851年11月10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说)。——编者注

“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责任是”同**社会权利**，或他称为无政府状态和生命与财产无保障的社会主义血战到底。

厄尔斯特·琼斯

厄·琼斯写于 1851 年 11 月 23
日—27 日之间

载于 1851 年 11 月 29 日《寄语
人民》第 31 期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 针对卡尔·海因岑的声明³⁸⁴

(燕妮·马克思译)

我亲爱的魏德迈：

我在1月29日的《纽约民主主义者报》上读到了一封由您署名的答复一个叫卡尔·海因岑的人的信。我虽然不认识这位先生，但是由于他影射了我的政治观点并提到了我的名字，所以请允许我借您的报栏就有关事宜作几点说明。

海因岑先生显然对现在正在英国进行决战的阶级斗争一无所知，这一事实证明，他完全不了解这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

参加这个斗争的有3个不同的社会阶级：贵族阶级，分裂成辉格党和托利党；资本家阶级，以科布顿、布莱特、沃姆斯利和其他一些领袖们为代表；以及工人阶级，它的积极的有组织的力量主要是宪章运动。^①

作为中间阶级的资本家阶级的势力和对抗是随着封建贵族没

^① 见本卷第411—421页。——编者注

落、手工业工场兴起以及都铎家族登上王位而出现的。而在后来几个世纪中，辉格党或所谓的自由派贵族成为金钱反对派的旗手。

这种金钱反对派一直存在到现代。当金钱利益集团的势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便提出与土地贵族的安全互不相容的要求，进而成为一个激进党。它不仅在托利党执政时期，而且在辉格党政府时期都在议会中组成单独的反对派。鼓吹自由贸易是他们与辉格党之间的最后一个共同点。在这当中，辉格党贵族采取从商业阶级的手中夺过商业运动的领导权的办法来拯救自己。而商业阶级从此时起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力图通过获得政治优势来纠正这一错误，而当初它忽略了为自己确保这种政治优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都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但是工人阶级认识到，它的利益与这两个互相敌对的力量利益同样都是对立的。

对这一点来说，能够作为证明的是，工人阶级本身虽然是自由贸易派²⁴¹，但采取了反对反谷物法同盟²⁴⁴的立场；能够作为证明的还有，现在它对中间阶级改革派采取敌对态度，中间阶级改良派试图像辉格党从商业阶级手中夺走商业运动那样从工人阶级手中夺走工人运动；构成中间阶级改革派的听众的大多数的工人们在中产阶级改革派的全国各地的会议上提出并贯彻修正案，这也是证明；所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团体的正式文件也是证明；工联及其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也是证明；上升和发展为劳动人口反对雇主阶级的阶级运动的合作运动^①也是证明。

一个对英国事务有最起码了解的人竟然能够忽视阶级战争，这对我来说是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这样一种见解在英国会遭到所有阶

① 见本卷第 654—663 页。——编者注

级的嘲笑。实际上,不是不同的社会阶级互相融合,而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正在日益尖锐化;不是工人阶级成百上千地过渡和上升到中间阶级,而是这个国家的剩余劳动力正在日益增多。竞争每年都使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小土地占有者和佃农、小商贩和小商人的总数正在减少,富人阶级的财富在增加,而人数在减少;这样便急剧地加速了斗争的最后结局。

我政治的和私人的朋友马克思博士一定能够从自己的观察中证实上面所说的一切。

永远忠实于您——我亲爱的魏德迈的

厄内斯特·琼斯

1852年3月3日于伦敦

厄·琼斯写于1852年3月3日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燕妮·马克思的德译文
翻译

阿道夫·克路斯

*关于在科隆被关押的
共产党人的境况³⁸⁵

(为《高地哨兵》而作)

我们现在必须履行一项令人伤心的党的义务,因为每当我们回顾德国时,眼前便浮现出一连串最干练的革命者的身影。他们是普鲁士政权的牺牲品,整整一年以来,他们被扣上叛国以及诸如此类的莫须有的罪名,在科隆坐牢。他们是:贝克尔博士、丹尼尔斯博士、奥托、克莱因、毕尔格尔斯等人。

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所编辑的《西德意志报》曾十分勇敢地填补了因《新莱茵报》遭到查禁而出现的空白,从而使广大人士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两个早已在他们党内同志中间赫赫有名的人,所以我们只需让贵报的读者记忆起他们两人的名字就够了。1850年贝克尔在几次新闻案件中发表的洋溢着革命精神的辩护词被美国德文报刊全文刊登出来,他那大无畏的态度和绝妙的讽刺使朋友和敌人都不由地对他所代表的党肃然起敬。我们仍清楚地记得《西德意志

报》为赢得人们对“被捕诗人金克尔”的同情和“物质的帮助”所作的努力，因此，至今尚未听到“被释放的诗人”所利用的许多报刊说过一句同情的话，这一点不能不令我们惊异。我们尤其感到自豪的是，我们依然享有最先向故乡不幸的党内同志越过重洋伸出友谊之手这样一种美好的优先权。

丹尼尔斯博士是一位出色的、学术上有造诣的医生。被捕前他一直住在科隆，把他自身和他的知识都交给了革命。他的一篇可望引起党极大兴趣的生理学论文在他入狱时被没收了；但是我们希望，这篇论文不会永远得不到发表。

奥托是一位知名的、卓有建树的化学家。

侦查程序在去年秋天就已经结束。因此，被监禁者由检察厅移交给 1851 年第 4 季度的陪审法庭。然而检察院在 11 月底宣称，它在 1 月 6 日陪审法庭开庭之前无法阅读完非常浩繁的记录和案卷。此举产生了效果，于是政府——它自然可以同它的得心应手的警察一起随心所欲地插手法庭的审理工作——跟着声明说，缺乏原始文件，案件错综复杂，困难重重，必须重新开始侦查。

政府这种欺骗行为显而易见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要把这个案件一直拖延下去，直到莱茵省的陪审制度垮台为止。因为尽管这个陪审法庭成员是卑劣的，但是陪审团宣判无罪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即使这种希望仅仅是根据资产者因为缺少确认某个违犯普鲁士王国“法律”的“罪行”的证据而不敢宣布他们有罪这一情况产生的。

政府无论如何要实现它的计谋，使可能遭到的失败尽可能长久地向后拖延，在这期间摧残“秩序、宗教和国家的敌人”的健康，用普鲁士监狱里常用的一切阴险恶毒的语言刺伤他们并把他们折磨得

发疯。

柏林对如何处置被监禁的人作出过极为详尽的指示，这是肯定无疑的。然而这些指示的专横和残忍，在各方面都超出了任何人能够想象的程度。在这里勃兰登堡的伪劣政治通过它的最低贱的工具以令人厌恶的方式显露出来。

根据莱茵省的法律，可以允许被监禁者的家属每天至少与被捕者见面和交谈十分钟。然而，从一开始，他们的妻子就连每星期在宪兵在场的情况下探监六分钟都难以得到同意。例如，有一次当丹尼尔斯的妻子经过一周的努力而被允许进入监狱里面的时候，她不得不在监狱院子里在一帮流氓无赖中间忍受着他们以及负责监视的普鲁士下级军官的无耻粗鲁的品头论足，在极其恶劣的天气里，在露天等了三个小时之久，最后才被允许和丈夫谈上两分钟的话。

整整四个月以来，任何人都不允许探望被监禁者。他们互相之间被严格地隔离开来，同时备受虐待，几乎每天都要受到反复搜查，甚至是搜身，几乎在极小的琐事上都要找麻烦。不允许他们阅读任何读物、一切可以书写的东西都被收走了，他们的换洗衣服必须在狱中自己处理；总之，他们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那些普鲁士的阴险的伪君子们让他们读圣经来修身养性。

在普鲁士受上帝恩宠的容克官僚反动派就是如此地猖獗，它的教训对人民党来说不会是毫无益处的。我们党的同志们在监狱中一身骨气，坚定勇敢，不屈不挠。向勇士们、向永不动摇的人们致敬!!!

在巴黎德朗克博士也遭受到和他在科隆的朋友们同样的命运。他从瑞士返回巴黎，被普鲁士的老密探罗德认出来，将他告发。德朗克现在被关在巴黎的警察监狱里。我们毫不怀疑，监狱这笔帐他今后

将如数地、负责地偿付给拿破仑·奥古斯图路斯^①！这类债务他总是按照借据偿还的。

C. St.

4月7日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阿·克路斯写于1851年4月7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2年4月14日《高地哨兵》
第28(80)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奥古斯图路斯是罗马皇帝的名字,这里用来讽刺拿破仑第三。——编者注

查理·德纳

普鲁士的司法³⁸⁶

文明世界最近被格莱斯顿先生披露的那不勒斯政府对一些人所采取的暴行所震惊,那些人的唯一罪行就是他们所持的政见与那个国家的声名狼藉的国王和他的御用工具的政见相左。的确,这种暴行是同施暴者的性格和历史完全相符合的;然而当读到关于这种肆意践踏正义和人性的行为的消息时,人们不能不义愤填膺。考虑到那不勒斯的统治者本来就是十足的恶棍,他们一定会这样做,没有人想要掩饰迄今一直折磨着可敬的波埃利奥和他的同志们的罪恶用心。对轻微的罪过可以作部分的宽恕,但对这样的滔天罪行不能宽恕。

但是有谁会想到自吹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都更开明的国家普鲁士的满口仁义道德的政府会罪恶地、以并不比意大利专制统治者^①逊色的极不公正态度对待政治犯呢?不过,我们将要提到的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在莱茵地区和在维苏威火山附近,政治迫害基本上是一样的;信仰新教的德意志亲王的统治所能干出的事和在意大利的波旁王朝的统治所能干出的事相比,即使不是程度上,那么在性质上是同样见不得人的。

^① 指斐迪南二世。——编者注

1851年5月,前《西德意志报》编辑贝克尔博士、一个名叫毕尔格尔斯的著作家、以及一个名叫勒泽尔的工人,由于被指控参加共产主义密谋而在科隆被捕并遭到监禁。后来,丹尼尔斯博士、一个名叫奥托的 chemist 以及其他一些人也因同样的罪名而被捕。去年11月,这一控告被送到地区的高等审判厅,并被提交即将举行的巡回法庭审判。圣诞节前不久,检察院——一个履行我们的大陪审团的职能、然而是由政府直接指定的机构——对这个案件作出了一项决定,下面是摘自这个决定的一段话:“鉴于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公开行动的证明,而且我们发现没有任何支持控告的根据,我们把这个案件退回初审法官,以便对各点作进一步的调查。”^①这就几乎等于说,“尽管警察已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调查可以给他们定罪的每一件事情,但由于没有针对被告的证据,我们将把他们再送回监狱,因为政府希望这样做;我们确信,他们在受审时肯定会被宣判无罪;因此,我们将设法不让他们受审。”

与此同时,政府正争取从它的唯命是从的议会那里得到一项法律,该法律将剥夺那些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其实只是一般政治犯的人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①。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交给那些简直可以和秉承那不勒斯的专制统治者的意志办事的法官媲美的法官去任意处置。

这些不幸的、公认没有罪证的犯人,被严密监禁在地牢里,即使对已被定罪的重犯也不应该如此。把他们囚禁在只有看守才可以接近的单人牢房中,不准互相看望,不准收阅信件,或者,得到外界的其他消息,甚至连书籍——在普鲁士从来没有禁止一般犯人阅读书

^① 参看本卷第257页。——编者注

籍——也不给他们。虽然政府的强大无比的力量在 8 个月中进行了全面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指控他们的证据,然而还是干了这一切。确实,普鲁士实行的司法并不比它的那不勒斯榜样逊色多少。二者都是残暴的、专横的、不人道的,容忍它们存在,是时代和人民的耻辱。

查·德纳写于 1852 年 5 月 4 日
以前

载于 1852 年 5 月 4 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 344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德国的运动及其“尖顶”³⁸⁷

“……但是，先生们，……如果德国也能够把它的人民的意志人格化，如果它能够推举出一个人，从他身上来评判整个运动，那么这对世界的未来将是何等有份量。把德国置于斗争的最前列！！！！！将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如果！>不对各项计划加以总结，那么在制定草案时这个没有代表的国家就可能不被考虑进去。”这是科苏特在向波士顿的德国人发表的演说中说的。

“为了有效地进行斗争，为了最终推翻极其沉重地压在不幸的德国身上的专制政体，古老而又年轻的祖国的所有民主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的呼声，迫切地要求建立一个中心和产生一个首脑，以形成对民主运动的领导。”这是历史上尚不闻名的大城市布里德斯堡的尊敬的市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那里的“德国解放支援协会”说的。

科苏特警告说，德国将被开除出共同协商和共同行动的民族之列——可怜的德国！——布里德斯堡的市民们没有发出警告说，他们使自己的未来受到了威胁，他们想要消除弊端，写信给“我们的同胞弗·黑克尔先生、哥·金克尔先生和阿·戈克先生”，由衷地“请求”他们同意“在协会中担当德国解放运动的领导”。然而，命运已经抢到了他们前头，因为所缺少的领导已经产生出来了，而且不像他们

所谦逊地要求的那样，是一个领导，尽管这一个也要以神为榜样一分为三，——不是的，“德国运动”有了两个正式的领导，因此，现在可以要求有两个所在地和两种声音。

那是在美好的5月，一些“优秀人物”聚集在伦敦，讨论我们大洋彼岸的祖国的幸福和痛苦并作出了决定。他们是：武装力量的四位代表，普鲁士军队前尉官维利希、席梅尔普芬尼希、泰霍夫和施莫尔策；五位新闻界代表，原教书先生比斯康普、卡塞尔消极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原大学生海泽、许多家报纸的通讯员波克罕、所有五大洲的通讯员爱·梅因以及奥本海姆——从前是加格恩的通讯员，然后是法兰克福的通讯员，然后是斯图加特摄政的通讯员，然后是布伦坦诺的通讯员，然后是科拉切克的通讯员，然后是金克尔和其他人的通讯员；法兰克福蛤蟆坑的一位代表、来自美因茨的许茨先生；两位二流人物伊曼特和左尔格；而这些先生中为首的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先生——原神学教授，德意志民族的殉道者即多愁善感的德国市侩的殉道者。——这是一次第二个瓦尔特堡会议³⁸⁸，但是人们不是选举中世纪的皇帝，而是顺应新时代的精神选举了一个临时政府。

金克尔、维利希、许茨、卡尔伯的勒韦和菲克勒尔为中选者。然而德国国民议会前议长却以令人不解的傲慢态度拒绝接受奉送给他的这个荣誉，就像从前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提供的德国皇位一样。

金克尔先生在他留下的建议书中说道：“每个了解欧洲的人都知道，革命现在已经仅仅是个钱的问题了。马志尼、科苏特和德国革命党手中有1 200万，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有把握地进行革命，就像一旦有了建设资本，就可以修建一条铁路一样。”照此看来，现在的情况是，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很快就会爆发革命了。所需的1 200万中的

9 000 美元已经筹集在临时政府手中,再加上其成员的[……]和办公室的[……]

例如,“流亡者协会”,一个领导机构的成员就是从这个组织里产生的。除了“流亡者协会”,还有一个“鼓动者协会”,它虽然原则上与前者毫无区别,但是也必须另立起来,以免把太多的大人物都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磁体的同极之间无吸引力,这是一条众所周知的自然定律。“鼓动者协会”已经先期解散了,以便在德美“革命联盟”的更广泛的基础上使自己更具有重要性。卢格是它的灵魂,海因岑是它的记者,阿曼德·戈克是它的总代理,布里德斯堡市民们的注意力也都放在他身上。谁愿意断言这些人所领导的一个联盟不应首先博得“革命联盟”的称号呢?

卢格先生这位现代德国哲学的看门人(此外,他还把现代德国哲学译成了波美拉尼亚文),虽然在德国表现得对革命毫无用处,但是,他到了伦敦之后,立即与赖德律-洛兰和马志尼一起组成了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⁶¹,即一个革命的中央政府,结果,现在当他只是主持德国革命时,这似乎有点屈尊了。卡尔·海因岑先生,谁不认识这位反对暴君和人民的压迫者的勇敢的雷神? 1848年他为了从瑞士掩护德国革命,不畏海上旅行的艰险,竟然勇敢地到达了卡尔斯鲁厄,而此时在附近的内卡河地区正进行殊死的战斗。现在终于轮到了阿曼德·戈克! 他曾经属于这样一批人,他们为逃走了的大公的生计操劳,据说是为了不让这位祖国之父过早地饿死而逃脱掉罪有应得的断头罪。遗憾的是,这位好人毕竟还是自然死亡了! 阿曼德·戈克先生作为巴登革命的财政部长曾经是伟大的,而作为德美革命联盟的代理人为什么就不应该更伟大呢? 长期下落不明的戈克先生又突然出现在尼亚加拉瀑布边,支持“伟大的马扎尔人”科苏特。他有幸得到

在普尔斯基伯爵身边当个侍从者这样的特殊荣誉。——顺便说一下，这个伯爵爵位的真实性常常遭到居心叵测的人的怀疑；而我们却可以为此担保，因为是现在的嫡系继承人的祖父用重金买下了这个爵位。同时，普尔斯基先生出身于古老的家族，他的直系家谱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马加比家族[……]

“我担心，一旦暴风雨发作，
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
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
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①

约·魏德迈写于1852年6月初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2年6月8日《总汇报》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编者注

约瑟夫·魏德迈

*普鲁士的司法和《普鲁士报》³⁸⁹

普鲁士司法和《普鲁士报》。——当我再次翻阅以前的《刑法报》时，我在第4号上发现了一篇以前未曾注意到的简讯：

“柏林，3月12日。——今天的《普鲁士报》声称，悬而未决的共产党人案件（对贝克尔、诺特荣克等人的诉讼案）可望很快了结，因为巴黎的案件已经结束。该报称，对德法密谋的审理为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密谋提供了真正关键性的证据。在普鲁士人们之所以拖延，只是因为有关的原始文件全部寄往巴黎，现在才还回来。”

众所周知，《普鲁士报》是一家内阁的机关报，如果它在说谎，那么至少是内阁、即普鲁士政府间接地在说谎，因为在普鲁士政府的姑息和纵容下，谎言——符合它的利益的谎言才得以传播开来，而对于违背它的利益的谎言，官方马上便会出面更正。如果人们能迫使政府不得不乞灵于这种可怜的手段，那么这无疑是对政府所能进行的最直截了当的和最切中要害的批评。而该报道是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是一个蓄意编造的谎言，简短地报告一下有关真实情况，便能充分证实这一点。

在科隆，逮捕1851年6月就开始了。原《西德意志报》编辑贝克尔博士、工人勒泽尔、著作家亨·毕尔格尔斯、医学博士丹尼尔斯、化

学家奥托和其他几个人都相继被捕。罪名是搞共产主义密谋。11月，该案件通过了高等审判厅，该厅宣布移交陪审法庭。检察院还在圣诞节之前作出了决定——这是一种暗示：在这里巴黎的案件没有发生影响，没有造成拖延。这个决定的陈述理由的部分写道：

“鉴于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因而也缺乏维持起诉的理由——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将此案退给初审法官去逐项进行调查。”

实际上，作出这样的决定，需要君主制下的法官的十足的奴性；对这样的决定听之任之，则需要新闻界的十足的卑鄙。然而，资产阶级报刊，如《科隆日报》及诸如此类的文痞出于胆怯而保持沉默，那些所谓的民主报刊出于对共产主义者的仇恨，对丧失自己的重要性的恐惧，对殉道者的嫉妒而保持沉默。就连在国外用“革命公债”这笔资金出版的《石印通讯》也不例外。是的，新闻界的卑鄙无耻才使法官变得卑鄙无耻。然而，普鲁士政府对拖延案件有特殊的利害关系。它要在此期间在高等审判厅下面设立一个审理叛国罪的特别高级法庭，即现代的星法院³⁹⁰，为此，已经在初审法庭上提出了提案。因为当初使得政府担心可耻地遭到陪审法庭方面驳回的那些原因现在依然存在，所以宁可设想，新的拖延将再次推迟此案的最终于了结，而不是像最近所说的那样，此案真的可望很快了结。

在此期间，被捕者受到极不人道的待遇。这种事只有诸如炮弹国王³⁷的政府和法国强盗^①的政府那样的政府才能干得出来。他们被关在单人牢房中，互相隔离和与世隔绝，既不允许写信，也不允许探访，就连在普鲁士通常最普通的犯人都有权得到的书籍也被扣留。据

① 指路易·波拿巴。——编者注

说,这些“政治犯”中不少人的健康状况已经遭受严重损害,几乎无法想象他们还能完全康复。这样一来,政府不用判决也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约·魏·

约·魏德迈写于 1852 年 6 月 8 日
—7 月 2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7 月 2 日《纽约刑法报》第 16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即将来临的危机及其原因³⁹¹

商业危机在这个国家以及一切实行与现今支配着英国命运的制度相同的制度的国家周期性地发生。原因何在？因为垄断组织的投机将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直至基础动摇和整个大厦轰的一声倒塌；因为作为基础的劳动缩减了；因为多数人的利益被迫围绕着少数人的利益转；——一点小小的困难就立刻会破坏整个精巧而不健康的上层建筑。

危机不久就会到来。原因何在？

我们想追溯一下其必然因素。

且看国内：一些日报告诉我们，曼彻斯特等地工业品生产过剩；但同时它们还告诉我们，金块正在从银行提取出来去购买谷物！！

这里有两个因素：商品积压，没有市场；食物匮乏，黄金外流以弥补这种匮乏。

马铃薯发生病害、谷物遭受虫灾、未收获的庄稼受到可怕的暴风雨袭击，——尽管努力减轻灾害，——这些都是食物严重不足的预兆。这是第三个因素。

这些因素已在开始发生作用——正像上周证券交易所中的破产所表明的那样。

再看国外，你会发现相应的征兆——请看《纽约先驱报》上的这些话：

“这是1852年，当前在商业和银行事务方面的征兆同1832年和其他灾变年代相比本质上非常相似，只是更加明显一些。银行在这个城市的每个部分建立起来；新的最豪华的住宅修建起来；从来无人问津的企业在着手兴办；各种各样的股票、债券和信用状以任何价格在华尔街抛售；整个商业结构似乎都在趋向于极度膨胀；——发财致富，最后出现灾变，就像大约20年前发生的情形一样。

现在是那些拥有资本的人发财致富的时候了；然而他们必须小心，以免在大门关闭和发生爆炸时被弄得束手无策。银行、货币和各种信用状正以最可怕的势头增长着。社会生活正向极其奢华的方向发展，奢侈和铺张浪费的恶习正在遍及城乡每个角落，继之而来的就是可怕的爆炸和新潮企业的 $\frac{2}{3}$ 倒闭。每隔20年我们这里就发生一场政治革命，而且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也发生一场社会和金融革命。没关系！只要银行提供货币、资本和贷款，就建筑宫殿、修建铁路、建造工厂、建造一切。这些建筑物将存在下去；然而建设者、贷款者和资本家都将一起毁灭。下一代将享受这一切。”

欧洲和美洲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这是欧洲普遍革命的前奏。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法国。英国、美国和法国这三个世界上的商业大国是一切波及其他国家的伟大运动的发源地。前两个国家的状况我们已经分析过了——后一个国家的状况也岌岌可危。

我们的巴黎通讯员发来的第二篇通讯刚刚送到，由于来得太晚而无法排在通常的栏目内——我们就利用它来结束对即将来临的危机的描述。

这篇通讯说：

“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头几年的平均费用是115 000万法郎，或者说比复辟时期的平均费用多24 000万法郎，比拿破仑统治下的平均费用多40 000万法郎。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期的后几年中，支出达到140 000万法郎，1852年提出的共和国开支的第一个预算是1 447 091 096法郎。然而，

报告告诉我们，3月17日提出了1852年的第二个预算，它所确定的支出增加到1 563 898 846法郎。这笔费用由总统法令予以规定，然而当权者并不打算鼓舞对法国财政制度的信心。1853年预算额是1 489 341 586法郎，比1852年的第一个预算超出42 250 490法郎；但比1852年的第二个预算减少了74 557 260法郎。——如果老是风调雨顺的话，将近6 000万英镑的开支在太平时期对法国也会是有害的，像现在这样的坏天气，这个开支肯定是极端毁灭性的，因为《农业报》宣称，收获量将低于平均年成的 $\frac{1}{3}$ ；这在法国几乎意味着饥荒。

肯定不会低估国家资源的那个委员会估计（甚至还假定总统不增加这一年的预算）1853年的赤字可能为49 825 917法郎，而今年肯定有64 485 242法郎的赤字。事实上，在过去的3个月内，浮动债务已增加了将近600万英镑，现在总额几乎达到3 100万英镑，即使目前的开支规模不被超过的话，明年的债务也肯定会大大增加。

尽管由于最近转换了一部分债务而节约了1 800万法郎，但1853年增加的开支恰恰是应予削减的政府额外浪费的费用。再加上坏收成。你们将会看到，法国几乎处于可怕的危机中。”

我们请我们有头脑的读者把这些事实，把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这些预兆综合起来，并思考一下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同时发生的商业危机将会产生什么后果。

工人们！为暴风雨的来临作好准备吧，你们的工厂不久就会开工不足，或者停工，惶恐和饥饿迫在眼前，被大肆吹嘘的你们的“繁荣”、你们奴隶般的和可怜的“满足”将没入悲惨和不满的深渊。

我们及时警告你们：不要再昏睡不醒了，进行准备吧！

厄·琼斯写于1852年8月18

日前后

载于1852年8月21日《人民报》第16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关于 1852 年的英国议会选举³⁹²

伦敦, 8月6日。您大概早已从报纸上获悉了议会选举的结果^①, 因此您想不到我会事后利用贵报的版面发表一份报告。我现在给您写文章评论这次选举, 那只是因为我必须向您作几点您在报纸上所读不到的说明。——首先, 这场关于选举结果的争执是再可笑不过的了, 每个党都扬言自己取得了胜利, 而作为裁判的公众都不能判定谁应当得奖。究竟多数是拥护内阁的还是反对内阁的, 这是一个大问题。多数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 为了保证自己赢得多数, 托利党内阁不得不同意放弃恢复谷物税的一切企图, 即出卖自己党的利益, 因废除谷物税而处于半破产状态的土地贵族的利益。在这种条件下, 德比伯爵在自己周围联合一个很大的反革命多数。工业资产阶级在 1846 年已经占有了很大优势, 以致能实行一些使其敌人在物质上破产的法律, 但是它还是未能抓住机会让它的胜利结出政治成果, 即修改选举法, 使自己在国家立法代表机构中的优势在将来也有所保证。现在, 它看到自己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了。关于这一点, 卡尔·马克思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了。旧选民

① 见本卷第 439—445 页。——编者注

选举了旧议会。在旧议会里,至今占统治地位的各政党正从内部解体,彼此力量不相上下,都使对方无能为力,于是不得不重新诉诸于选民,并如此无休止地循环下去,直到这种循环被来自外部的武器冲击所打破为止。”^①——没有一次革命的示威运动,就不能把内阁从它的位置上排挤掉,这个年老力衰的议会也就不会被炸毁,这一点变得越来越不容置疑了。

然而,议会和议会选举与一家刑法报有何关系呢?依我之见,关系甚大。因为如果一个人侵犯他人的财产是犯法的话,那么处境优越和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群众的剥削则同样是犯法。议会正是保障这种剥削的机关。这些群众的利益和那些少数人的利益之间的矛盾越是公开地和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个矛盾越是表现为一种已经存在于群众意识中的矛盾,这个犯法机构的更新就越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起着犯法的作用。最近这次选举与历次的选举相比更是如此。众所周知,在英国人们采取了一种双重的选举方式,即全体人民均可参加的预选,即“举手表决”,和真正的选举,即只有真正有选举权的人才允许参加的“投票表决”。从前,这两种选举的结果经常、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致的,然而今年通过举手表决所提名的人没有一个人当选为议员,而由投票表决产生的议员则没有一个人是通过举手表决所提名的人。在哈利法克斯,与辉格党内阁财政大臣伍德对阵的是宪章派领导人厄内斯特·琼斯,他在举手表决时至少获得了 14 000 票,人们在庆祝胜利时把他抬起来穿过城市,而财政大臣先生则遭到了人们的一片嘘声。在投票表决时琼斯只得到 36 票。——厄内斯特·琼斯的被提名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就在几个月之前,老宪章

^① 1852 年 7 月 20 日马克思致阿道夫·克路斯的信。——编者注

派的另一领导人朱利安·哈尼曾企图把宪章派引入歧途,放弃该党的政纲,与激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达成妥协。厄内斯特·琼斯全力反对这种阴险的企图,这导致了公开的决裂,大量支持琼斯的声明从四面八方涌来,证明英国工人根本不愿意为了把他们的幸福重新纳入缓慢的有限的进步轨道而再次同敌对的任何派别联合。

X.

约·魏德迈写于 1852 年 8 月

21 日—25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8 月 27 日《纽约刑法报》第 24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等

*评有关政变的著作³⁹³

有一个与我国有关、迄今我们未能详细讨论、但我们认为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这就是，几乎所有论述法国**政变**的性质和结果的作家，对12月2日以来法国民众命运的变化所持的看法都是极其肤浅和幼稚的。简略地评论一下各国出现的论述这个问题的出版物，就会使上述说法的真实性变得更加明显和更加重要，因为所有这些出版物都或多或少地自称是代表作者分别所属的党派或阶级的看法和情感。

在12月2日，面对波拿巴分子的**政变**，一切反对政变的党派自然应该统一口径，——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的。在进行自卫、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联合的保皇派发出的抗议和山岳党⁷³人发表的宣言的差别仅仅在于，山岳党人至少有勇气拿起武器，而前者则只是怯懦地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二者都把**宪法**挂在嘴上，但那部宪法一方面经常遭到保皇派抨击、破坏、停止实施、甚至推翻，另一方面却受到共和派可笑而又不自量力的维护。但是，从那以后他们又干了些什么呢？正统派接受了**政变**，奥尔良派谴责**政变**，共和派诅咒**政变**。然而有谁说明了，有谁理解了政变的奥秘？正统派把过失归咎于社会主义者，奥尔良派——归咎于山岳党人，共和派——归咎于波拿巴的

罪行。当代政界的圣贤们把一国人民状况的巨大变化归结为某几个议员的错误政策或某个人的狂妄野心之类的偶然性。而且，他们还把自己在过去的事件中的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企图在公众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未来的缔造者，尽管他们和他们的党派已被永远击败并早已化为乌有。这是解释历史的多么拙劣的论据！不过这又是编写种种小册子、进行反唇相讥，以及对政敌发动各式各样攻击的多么丰富的材料来源！我们当然不是波拿巴先生的同党；他用他自己和一帮军人恶棍的独裁统治取代了中间阶级议会统治的暴政，我们不准备为此感谢他，因为他并没有打算以此为我们谋利益。但是，我们为他的成功感到高兴，为他的暂时胜利而欢呼——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则获得胜利、我们的阶级获得胜利的保障。他的胜利是转瞬即逝的荣耀，是暂时的狂欢，而我们的胜利则将是最终的胜利，决定性的胜利。波拿巴的独裁为工人阶级掌权作了准备。所有这些关于法国文明衰落的悲叹是些什么货色呢？所有这些出自中间阶级作家笔下的、与罗马帝国的崩溃所作的绝妙对比，不是悲哀地承认他们的光荣在法国已一去不复返又是什么呢？他们所理解的文明不是地主和资本家以及他们的附庸——神父和律师——的统治又是什么呢？他们感到惋惜的是工人阶级的毁灭吗？老天爷！让工人阶级感到高兴吧！它的毁灭并不取决于中间阶级的灾难。恰恰是中间阶级政治上的毁灭，为工人阶级登台作好准备，保证它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得到拯救。这些作者多么沉痛地惋惜，几乎是痛哭法国的没落和无可挽回的衰败：这个不幸而盲目的国家竟然能够为了一个暴君随心所欲的欢乐而牺牲民众的自由(?)！这些据说已被牺牲的自由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普选权吗？你们忘记了5月31日的法令¹²⁰。是新闻出版自由吗？——为什么你们过去用钳制、罚款、没收手段压制新闻出版自由。是结社自由

吗？——对俱乐部领袖来说从未有过诸如取缔法令、高等法庭、地牢或流放这类事。不，——布朗基从未在贝勒岛¹²⁷被监禁。你们从未进行过挑衅，你们从未对人民打过伏击！你们从未在鲁昂、里昂屠杀人民，也从未在巴黎街头向他们开枪！据你们说，人民在12月2日以前是自由的和自主的，就像他们是愉快的和幸福的一样。你们真是一些了不起的演说家和作家！是的，肯定是；那么，当那些忠诚无私的领袖宣告国民的自由正受到威胁的时候，人民竟然抛弃他们，那就简直是一种发疯和无耻的行为了。但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人民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丧失，如果受到威胁的仅仅是你们的自由、你们对人民的统治，那么你们会说什么呢？没关系，出于道义，人民也应该反抗一个公然违背向他们立下的誓言的人。向他们？什么话！他从来没有宣誓要服从或忠于他们！设想“粗鄙而邪恶的群众”会拥护道义，是多么荒唐可笑！是谁让人民养成背弃誓言的习惯的？不是梯也尔，不是贝里耶，不是摩莱——，而是天真、纯洁和诚实的良心！发明这个前所未闻的勾当的是波拿巴。这个世界太年轻、太善良、太完美，在12月那不祥的一天之前，几乎不知罪恶为何物；而政治上天真无邪的天堂也就在这一天幻灭了。没有人吃过作伪证的苹果；然而一支喝得醉醺醺的、穷凶极恶的军队刺杀和平群众（如果他们的自由受到威胁，他们怎么会是和平的？）、奸污处女、破坏公民的财产（这后一条是他们最大的罪行）——这一场面难道不会激发人民起来进行自卫吗？为什么？人民没有财产，富人给他们留下的处女也为数很少；而且，如果说被杀害的人原来是和平的，那么，要是他们没有被杀害，就仍然会是这样的。人民允许波拿巴为他们向他们的敌人进行报复，而且等待着有朝一日向两者进行报复。人民是正确的。但是，忍受独裁者强加给人民一部只不过是嘲笑他们最珍贵的原则即普选权的宪

法！——被事实上仍然是残暴的奴隶制的所谓无限自由的假象所欺骗和愚弄，这对一个民族来说多么可耻！首先，他们既没有被愚弄也没有受欺骗，因为他们像任何一家英国自由派报纸一样懂得这一点。其次，他们怎么能忍受呢？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想返回祖国的奥尔良派和共和派无疑会觉得这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可是人民没有这种愿望；此外，他们并不着急。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你们不是常说，“人民应当安安静静，专心工作，少管闲事”吗？是的，在他们还有工作可做时，他们会专心工作的；一旦没有工作了，他们会照料自己的。照料自己吗？是的。看到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愿为了一个亲王的复辟或者为了中间阶级议会的复活去冒生命危险，他们竟然愿意只为杀人犯拿起武器！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吗？再见，法国文明——《泰晤士报》对你感到失望！如果没有人民法国便没有希望。这是相继掌权的每一个政党都不断预告法国人民说的一场可怕的洪水。洪水正在来临，在劫难逃。啊！贤明的梅德斯通勋爵！我们英国的洪水何时来临？

从下一篇起，我们将开始扼要介绍海峡两岸评论法国政变的著作，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克萨维埃·杜里厄的《路易·波拿巴的政变》，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社会革命》。

第 一 篇

帝国尚未宣告成立，关于新的饵雷警察滑稽戏³⁹⁴没有什么可谈的，或者说无可奉告。我打算在这一篇中对我在上一篇中列举的有

关十二月二日事件的一系列著作进行评论。这些著作至今在英国公众中还不流行，并且在英国报刊上得到的评价极为肤浅。我对这些著作进行评论的顺序将与我先前按其重要性排列的顺序不同，但是，可以看出，这样做将更符合进行循序渐进而又详尽无遗的评论的目的：从仅仅说明历史资料和事实的那部著作开始；接着剖析能用流行的传统观念的基本观点对同一些事实进行研讨的那部著作；然后，讨论另一部著作，它虽然朝着革命方向前进了一步，但仍然想使人们把波拿巴给法国命运带来的全部变化看作是对作者的教条式社会主义方案的正确性和必然性的证实；最后，作为结束，评论一下这样一部著作，我们在这里可以立即指出，它是唯一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能满足当代人理解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其中的革命运动这个要求。

I. 《路易·波拿巴的政变》

人民议员克萨维埃·杜里厄著

这本书的优点在于叙述相当可靠，或者无宁说，在于它叙述的是完全真实的情况。十二月二日事件的见证人，凡是站出来谴责路易·波拿巴罪行累累和大逆不道的，都被《通报》和政府其他喉舌指责为竭力夸大事实，所以该书作者以他的证词立了很大的功劳，这个证词肯定不会被任何人谴责为企图用修辞学的或诗歌的夸张来迷惑公众。如果说杜里厄先生的写作才能在英国可能还未获得公认（在那里你们的每行挣稿费一便士的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但他是一个巴黎

记者,他描述他作为目击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所见到的那些恐怖行为的权利,毕竟是无可争辩的,他敢于面对公众的勇气也只能赢得我们的钦佩。以下是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在这些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简要介绍。

他从勾勒路易·波拿巴及其策划政变阴谋的主要同谋开始。我们略去关于政变头子的部分,因为对他的描绘远不如其他作家,尤其是维克多·雨果对这个十足的恶棍的描绘。我们将只浏览一眼对他的部长们的描绘。街头大屠杀的指挥者马尼昂将军在1840年曾被指控协助波拿巴在斯特拉斯堡和布洛涅的行动¹²³。他被传唤到贵族的法庭时抛弃和背叛了他那位当时时运不济的主子,他的那种冷酷无情和卑鄙的利己主义甚至使贵族们这些搞变节勾当的老手感到厌恶。1848年有一家民主派报纸指责他被奥尔良派收买,他亲赴报社,乞求刊登一则郑重声明。他在声明中谴责奥尔良派,并赌咒发誓说,作为国民公会指导下的老共和国的一个战士,他始终拥护共和制度。3年后,他为了偿还自己欠下的债而扼杀了共和国。陆军部长圣阿尔诺将军在1835年时还只是一名上尉,由于他曾在监禁不幸的昂古莱姆公爵夫人的布雷城堡执行了某些任务,而被突然提升为将军。若不是他先前的罪行保护了他,他的腐化堕落和骄奢淫逸会使他触犯刑律。他起先受到路易-菲力浦的庇护,如今又受到路易-拿破仑的庇护。现任内务大臣佩尔西尼伯爵先生在12月2日还缺乏担任这一职务的勇气。他从一个每行挣稿费一便士的文人平步青云,成为路易·波拿巴的心腹和密友——他的主子寻欢作乐的帮闲箴片,甚至据说他在这种活动中陷得很深,同时,他还是路易·波拿巴搞下流阴谋和弄虚作假的代理人;他今日窃据显赫地位的奥秘就是他参与了犯罪活动。最后,莫尔尼公爵先生可以说是高级扒手的典型,是赌徒、诈骗犯、伪

造者那一类人，这种人总是能通过一些无法无天的犯罪活动逃脱下级警察的爪子。本来他在12月3日要被关起来的，但他却在12月2日把他的债权人和控告人关起来了。对这四个人的形象描绘逼真，就像每个巴黎人都很熟悉的那样。

很遗憾，在这里我不能让你们欣赏替他们涂脂抹粉的作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先生的大作。他是一个可怜但厚颜无耻的加斯科涅人。他几乎是在十二月叛乱还弥漫着硝烟的废墟上为刽子手们树立雕像，把他们抬到了半神的地位，把波拿巴崇奉为社会救主。顺便说一句，有一件事你们听到后定会感到滑稽可笑：他的地区的宪兵队和牧师在一座凯旋门下迎接了这位新使徒，凯旋门上写着——“欢迎秩序和宗教的保护人！”在这之后，难道我们不能希望迅速看到阶级社会的这两大支柱的倒塌吗？

现在回头谈杜里厄先生。12月2日早晨，他匆匆赶到《革命报》社（《革命报》是赖德律-罗兰创办的一家报纸，在该报的敌手——真正的革命被他在6月的斗争中扑灭以后，它取了这个名字）。正如在巴黎常见的那样，在激动人心的时刻，所谓的革命知名人士，即一小撮小野心家在报社召开了一次会议。杜里厄负责起草一个宣言。“宪法和谋反”是宣言抓住的两个把柄，这是民主派离开革命后剩下的无足轻重的唯一武器。宣言张贴出来了；它就是这样由“报”社出版的。杜里厄先生埋怨说，宣言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但是，宣言是由谁签署的，它是向谁呼吁呢？在那些签名的人中有一位人民的领袖——得到人民承认并且作为斗士受到人民爱戴吗？他们确实全都是著名的山岳党，“自由派”作家、演说家、讲坛上的吹鼓手，但是，他们的伟大是从无产阶级政党的毁灭中产生的，他们的雄辩是以人民的捍卫者的沉默为条件的；总之，他们总是在应

当进行战斗的时候鼓吹温顺和冷静，而当革命已经对战斗没有兴趣的时候，却号召人们拿起武器；但是，杜里厄先生本人天真地透露了原因：为什么他的同党对群众没有影响，为什么他们报警的呐喊像寓言中那个牧童的惊呼一样没有人相信。在狼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叫喊的次数太多了；事实上，已把人弄得筋疲力尽了。他告诉我们，当惊讶的共和派议员被装在囚车里送到万塞讷去的时候，在他们经过的宽敞的林荫大道上，人民试图截断押送他们的卫兵的行列，实际上是想释放那些囚犯。这些讲坛英雄们怎样回答呢？“看在老天爷的面上，不要乱来！让我们到我们的监狱去吧，我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这样胆战心惊，怕得要死的无辜者——难道不该受到人民耻笑吗？这些没有骨气的和怯懦的灵魂——这些不可侵犯的，但也是不侵犯别人的人物——这些愁容骑士竟被推荐给人民充当他们的向导，甚至是指挥官。不，如果人民有机会选择的话（但当时他们既没有机会选择，也不想选择），他们定会宁肯选择波拿巴，尽管他是一个无赖，一个贼，一个凶手，或者随便你怎么称呼他都可以（因为任何这类称呼他都当之无愧），即使波拿巴在他们脸上打上一个巴掌，——也不愿选择一伙埋葬了革命以便获得哀悼革命的权利的爱管闲事的哭丧人。这些人的说教已使人民堕落和麻痹，而波拿巴的厚颜无耻却唤醒了人民的理性。我的这些话是针对山岳党和民主派领袖作为一个整体而说的。我骂那个党的话，并不是指它的每个党员（不能把法国民主派同英国民主派混为一谈。在法国，民主派代表小业主和租佃者，但与其说代表他们的现实需要，不如说代表他们的虚假的愿望。在英国，民主派与工人阶级的运动有直接联系）；像英雄的沙尔·博丹和本书作者本人这些勇敢和宽厚的人，以他们的行为重新赢得了他们因自己的狭隘的原则和观点而可能已经

失去的尊敬。但是，这些人是例外。从来没有哪个英雄或烈士值得受到人民的拥护，除非他为群众的直接利益而斗争，而不是为一级阶级宪法的死条文，或某些**抽象真理**的虚假的光荣而奋斗。但是，这后一个问题我将在我的下一篇中加以探讨，因为雨果先生还在为我提供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件事情。至于杜里厄先生，让我再补充两句。他在他的宣言发表以后便置身街垒之中，他在那里战斗到夜晚，在一切都失去以后，他从那里逃了出来，但立即被捉住了，并被押送到马扎斯监狱，随后被从那里押送到比塞特尔和伊夫里要塞。关于这两个地方的恐怖情形，他作了很机智的描述；然后他又从那里被押送到迪盖克兰号船上流放到卡宴，最后，被独裁者驱逐出国。

第 二 篇

读者无疑会原谅我过了一个星期才来叙述和评论构成当代官方历史的那些众所周知的、卑鄙的、骗人的把戏——一切庆宴、狂欢、游行、示威、阴谋、祝捷，以及最后的大合唱，这些东西在法国拼凑成一出帝国“戏”，有些人希望通过这出戏能够对公众产生影响，然而在公众看来，除了“技艺是由电报指挥的”而外，这出戏本身并无其他新奇的东西。事实上，那是阴郁的时日，人们在能够推出“一出新戏”之前，当然还需要松弛一下。因为优秀的演员首先应当是批评家，所以，让人民成为评论他们自己的革命的过去的批评家，让那些渴望当人民领袖的人在领导人民完成他们的学业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才能，则未来的革命戏剧就会获得成功，而不会失败。现在我继续阐述我的观点。

II. 《小拿破仑》

维克多·雨果著

当我坐下来评论一切法国作家中声名最显赫的作家的最近这一部享有广泛的声誉,但却没有多少经久不衰的价值的著作时,我很难确切地描述自己的心情。其中我所珍惜的,如果略去不提定会感到内疚的,是初读它时我感受到的愉快。每一个初读它的人,特别是那些阅读原文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维克多·雨果在19世纪法国文坛上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如果像他的某些同胞,或者,毋宁说他的政敌那样,把维克多·雨果同一些人相比,例如,同作为诗人的拉马丁,同作为戏剧家的亚历山大·大仲马,同作为传奇作家的欧仁·苏,或者同作为演说家的奥迪隆·巴罗相比,那就不啻是把拜伦同华兹华斯,把莎士比亚同布尔沃,把瓦尔特·司各脱同詹姆斯,或者把谢立丹同奥斯本相比。拉马丁这位一切作家中最爱虚荣的作家,一切人中最伪善的人,在他的《东方游记》中说,他年轻时认为,对一个人来说,集诗人的桂冠、演说家的棕榈枝和政治家的权杖于一身,是人的全部伟大的顶点。他向我们吐露了他自己的隐蔽的野心。

但是,这个野心多么明显地失败了!历史未必会承认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毫无疑问,雅典人会授予他一所修辞学学校校长的职位。啊!子孙后代将把你徒劳无益地渴望的荣誉授予你的对手。是的!桂冠属于维克多·雨果!我不能不从他最近的这部著作中援引一段富有诗意的话:——

“人们会醒悟吗？”

“我们在俄国，涅瓦河已经封冻，在冰上盖起了房子。沉重的马车在冰上隆隆转动。它不再是水，而是岩石。人们在这块原来是河流的大理石上成群结队地来来往往。一座城市建筑起来了，街道修造好了，商店开张了，人们在原来是水的东西上面做买卖、吃、喝、睡、生火。你可以做你喜欢在那里做的任何事情。什么都不怕。欢笑，跳舞；它比陆地更坚实。为什么，脚踩在它上面发出的响声像踩在花岗岩上一样。严冬万岁！坚冰万岁！这将持续到世界末日！抬头看一看天空，这是白天？还是夜晚？这是什么？一道幽暗的、微弱的光从白雪上掠过；为什么，太阳正在死去！

不，你并非正在死去，啊，自由！在这些日子里，当人们对你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当人们将把你忘得干干净净的时候，你将灿烂地升起！人们将看到你的容光焕发的笑脸突然从地下涌现，在地平线上熠熠生辉！你将射出你的金色的箭、你的炽热的霞光，使之飞越白雪、坚冰、坚硬和白色的平原、已变成岩石的水——飞越那逞凶肆虐的寒冬！光、热、生命！于是，请听！请听那淙淙的声音！请听那到处发出的、猛烈的、噼噼啪啪的响声！那是坚冰在破裂！那是涅瓦河在融化！那是大江在恢复它的行程！那是水，活生生的、欢快的、汹涌澎湃的水在卷起并捣碎那讨厌的、死寂的冰。你们说那是花岗岩，瞧，它像玻璃一样破碎了！那是冰在破裂，我告诉你们：那是真理在复苏，那是进步正重新开始，那是人类正在重新向前进军，不仅把路易·波拿巴的崭新帝国，而且也把古代专制国家的一切建筑和一切城墙连根铲除，彻底摧毁，运走，深深地永远埋葬。请看这些东西正在消逝；它们将永不复返，你们将永远见不到它们了。那本半泡在水里的书是不公正的旧法典；那张正在沉没的凳子是宝座；另一张放在它上面的凳子是绞架！

要造成这种天塌地陷的景象，要实现这种生命对死亡的辉煌胜利，需要什么呢？啊太阳，只需要你的一次闪耀！啊！自由，只需要你的一道华光！”

是的，雄辩的棕榈枝属于维克多·雨果！不仅如此，插在起义者坟墓上的永不凋谢的菊花也是属于他的。他也在12月间的街垒上进行过战斗。但是如果他从未渴望得到政治家的权杖该多好啊；因此我们必须绝对拒绝授予他，决不把它交到他的手里。他的拥护者们可能

把民主派的领导权托付给他。他没有看到民主派已一蹶不振吗？他的虚荣心可能为幻想具有某种并未赋予他的才干而感到满足。他没有感到这使他真正具有的那些才干的光荣受到多大的危害吗？唉！难道一切伟人，一切英雄和烈士，一切明星和名人，在他们道路上真的都有绊脚石，会把他们绊倒吗？狂欢吧，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你们在天秤上正在上升；这使你们的伟大人物下降。让他们全被这块政治绊脚石绊倒，摔断他们的脖子吧，让他们被扔进大海里去，如果他们猜不出现代斯芬克司之谜——阶级战争这一革命解决办法的话。但是，我把小拿破仑忘得一干二净。这个头衔选择得很好，如果它的意思是使路易·波拿巴丢脸的话。那么，为什么不把它贯穿到著作本身中去呢？曾经有过一个拿破仑大帝；但是维克多·雨果并没给我们描绘出一个小拿破仑。如果下面这些事都是一个人干的：解散议会——废除法律——压制民众自由——监禁议员——屠杀共和派——流放成千上万的人——亵渎宗教——滥用司法——宣布新宪法——没收国有财产，甚至私人财产——肆意蹂躏最自豪的民族——复辟一个王朝，一个帝国，那又会怎样呢？雨果先生，如果像您断言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人干的，那您怎么能在您的著作中用“小”字来称呼他呢？但是，您不是这样。相反，除了头衔而外，您到处都使他的身子膨胀起来，把他变成一个头号的说谎人、骗子、发假誓的人、杀人凶手，那是一点不假；然而当您这样把他同尼禄、阿提拉、成吉思汗或炮弹国王³⁷并列在一起时，您不能同时又断言，他是“小”拿破仑。您用您的一切精彩比喻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例如，如果您已指出：当议会被波拿巴埋葬的时候，它已经死亡和腐朽了；法律已经暂停生效和废除了；对民众自由的蓄意压制已经相当厉害，实际上没有多少余地让这位独裁者来再加一把劲了；你们的议员已经习惯于被曾经屠杀

过你们共和派的同一些党派实行监禁和流放了；宗教由于总是充当政府压迫的工具已经使自己遭到亵渎了；在你们的五月高等法院和六月军事法庭上，司法已经表明它被滥用了。总之，你们的整个中间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彻头彻尾地腐烂了，散发出一股浓厚的贪污、腐败的气味，就像一脚把它踢翻的军队散发出一股同样浓厚的白兰地和香肠的气味一样——假使你已指出这一切，那么，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他为“小”拿破仑。只有他的名字，而不是他本人在领导一次由军队、教士、官吏和暴民的垂死挣扎所发动的政变中是需要的。他们发动政变是为了拯救他们自己，以免必然被日益临近的工人阶级革命所毁灭，他们感到，由于主张议会制的资产阶级软弱无能，他们自己已面临毁灭的下场。既然如此，留给波拿巴的还有什么呢？把他自己变成形势的工具。驾驭形势者伟大，顺应形势者渺小。这样的话，您就还了他的本来面目，您就不会对他的誓言这样大肆渲染——难道他在违誓时不像他在立誓时一样不由自主和渺小吗？那样，您的书名就会真正表情达意了。不管怎样，人们赞赏您所作的对比。“残忍的彼得搞过屠杀，但他没有偷；亨利三世搞过暗杀，但他没有骗；帖木儿让马蹄踩死的儿童跟波拿巴先生在林荫大街上消灭的妇女和老人一样多，但他没有撒谎。”^①

第 三 篇

在说明维克多·雨果的主要错误在于把12月2日前后事情的

^① 维·雨果《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第215页。——编者注

整个转变归因于路易-波拿巴个人的政策和行动之后,我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进一步揭示必然使这位作者陷入这种谬误的原因。维克多·雨果从一般原则,即统治阶级制定的并体现在他们的信条本身中的社会的一般原则出发进行推理,这是从错误的观点出发进行判断;他把那个人看作动力,而不是到阶级利益、阶级对抗和阶级革命中去寻找动力,需知那个人只不过是此次变化的临时代表,就像风信标指示风向一样。维克多·雨果所属的阶级就这样把结果看成原因,把工具看成使用工具的手。在这个阶级中当然有些人用激愤和往往比革命阶级本身所使用的词句更激烈的豪言壮语来谴责现行制度的不平等和恐怖行径。听他们的演说,你会认为,他们比整个工人阶级更拥护社会主义。但他们究竟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反动派。我将不把他们称为无赖;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学说和活动的真正倾向,尽管在我们当前的时代,接触现实世界的人不大可能产生幻觉。然而,十分肯定,他们是受作为社会生活的一般原则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阶级观念愚弄的人。由于他们不能理解,在本世纪的初期被极口称颂的那些如像“个人自由”、“实业”、“繁荣”和“人道”之类的一大堆的词句,正好是必然导致中间阶级社会的一切结果的许诺,所以他们认为,那些结果都是负有促进社会原则发展责任的政府道德堕落造成的过失。维克多·雨果尤其持有这种观点。在他眼里,现行社会管理的原则是正确的,应受谴责的是那个人。这就是进行道德说教的所有中间阶级改革派的看法。不管出现了什么错误的和堕落的、邪恶的和有害的东西,都是个人的过失——而支持那些个人的阶级呢?噢,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阶级。关于社会由阶级构成并受阶级利益支配这种愤世嫉俗的概念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提高你们的道德和国民素质,你们的政府就会十全十美。”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他们总是把人

民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总是向作为整体的人民讲话,认为人民信仰同样的信条,有一颗共同的良心,对事物都有普遍一致的看法。如果认为这些都是当然的,那么那些人就似乎是人类最伟大的(所谓的)造福者,新纪元的缔造者,失去的乐园的重建者。要对他们的这些论调加以驳斥;要向人民指出:在利益对立的不同阶级之间从来不可能有共同的道德,也不可能有共同的良心,或共同的见解;一个阶级的制度不仅必然产生我们的慈善家们为之伤感的事实,而且还必然产生他们认为应对国家的一切有害措施承担责任的人;——请把他们的威严的半神还原为无用的伪预言家吧。脱去充满了维克多·雨果著作的风格、华丽辞藻和诗意等这些外衣,剩下的一切就是向可怜的农民宣讲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充满了贵族的呵斥和中间阶级的责骂,而可怜的农民仍然既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落入贵族的掌心的,也不知道,他们如何才能逃脱中间阶级的魔爪。

第 四 篇

[III.]《从政变看社会革命》

约·皮·蒲鲁东著

你们删掉我前一篇的大部分,毫无疑问,是出于政治上的种种考虑,对于这些考虑,在当前情况下,我是几乎无法反对的。在我撰写的一组评论文章中,现在已经轮到对下面这位作者的最近一部著作进行剖析了,这位作者由于发表“大胆的”意见,在大陆上已享有相当高的声誉,他有时被英国中间阶级作家看作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在法国

的化身,但是,正像我将证明的那样,他的唯一真正功绩在于对平庸的共和主义和形式民主的一切空洞概念作了严厉而正确的判断。他在抨击和揭露上述党派的政治领袖和写作精英时所使用的嘲讽口吻,使他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法国民主的“靡菲斯特斐勒司”的绰号。由于这个绰号的含义读者们可能未必全都了解,所以我认为简单地说明一下是适宜的。有一个古老的德国传说,通过马洛早已成为英国人家喻户晓的了^①,但是,由于歌德把它写成一个无与伦比的悲剧^②它才传遍全世界。在这个悲剧中,人对想象的完美状态的模糊的理想的渴望,被世界的魔鬼(靡菲斯特斐勒司)的崇尚物质的和实际的建议巧妙地歪曲了。剧中的主人公浮士德同这个魔鬼缔结了牢不可破的联盟条约。根据这则中世纪的传说,浮士德是一位离群索居,对人类社会一无所知,头脑里充满了奇奇怪怪的梦想哲学家,或“黑色艺术家”,他请求控制物质世界的魔鬼帮助他实现他达到完美境界的想入非非的计划。于是靡菲斯特斐勒司使他熟悉生活的现实。但是,浮士德越是了解我们这个普通世界,越是相信用积累肉体上的快乐的办法来实现他达到完美境界的强烈愿望,他就越多地忘掉他原来的那些值得骄傲的想法,他就越来越从道德的顶峰上掉下来;直至经过种种冒险和经历(在各个场合他都由靡菲斯特斐勒司陪伴着,后者是他懦弱和优柔寡断的见证人和冷酷无情的嘲讽者),我们“高贵的、抱负不凡的和胸怀宽广的”浮士德终于变成一个同样卑微的、堕落的和自私自利的人,而他曾经认为,自己最有能力改造这种人,他是这种人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把“高贵的”浮士德换成“高贵的”民主,你就可

① 克·马洛《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编者注

② 歌德《浮士德》。——编者注

以恰当地把蒲鲁东称为后者的靡菲斯特斐勒司，因为他的确不仅记载和强调了法国民主的五花八门的骗人把戏和弱点，而且还以最辛辣的笔调嘲讽了它的吹得天花乱坠的主张和滑稽可笑的野心。自从临时政府中的民主派显示了自己的无能和国民议会中的共和派把自己的反动的形式主义载入 1848 年宪法以来，他就扮演了那种角色。蒲鲁东批驳说，民主派靠革命起家，这个革命如果说有任何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所抱的始终不变的目的，“用为被压迫阶级谋福利的政府来代替先前的统治”，但民主派却让一切敌视进步的人不受干扰地拥有像军队、行政机关、教会、法庭和警察等社会堡垒，从而使他们有组织他们的反革命征讨的手段。蒲鲁东抨击了共和党，辛辣地指出，他们关于自由的伟大公式，他们的“纯粹的和崇高的”民主，只是由于屠杀了几乎整整一个阶级和通过建立由卡芬雅克将军控制的军事独裁才得以实现的。但是，他把他的最有力的论据用来驳斥普选权这一教条，由于这个缘故，他给了虚伪的法国民主以致命的一击。我记得很清楚：人们也曾试图说服英国人民，他们说，普选权本身是医治使人民遭受痛苦的一切社会罪恶的唯一良药；有一个时候，谈论社会权利或工人问题几乎被认为是亵渎圣物，或诅咒神灵。幸运的是，他们已经懂得，普选权远非政治发展的终点，它只是朝着革命方向迈进的决定的第一步，是人民组织自己的队伍所必需的一块地盘，是迄今以隐蔽的形式进行的阶级战争可能最终借以公正地打到底的公开战场，一言以蔽之，是人民解放的手段，而不是其目的。但是，由于我们缺乏自己的经验，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法国民族为整个世界所作的实验，这个民族如果不是由于布朗基和其他革命领袖所进行的谴责而终于不再受民主派的欺骗的话，人们自己可能几乎没有希望收获这个实验的果实，民主派曾使他们陷入

致命的迷误之中，把普选权描述成一根魔杖，似乎只要一挥动它，新的社会乐园的财宝就会突然摆在世界面前。

不能说蒲鲁东是发现和揭露了普选权不足以实现人民的社会解放的第一个人。早在1848年4月，当时领导着巴黎无产者的布朗基就深信，第一次大选的结果将会成立一个反动的议会，他敦促临时政府推迟原定的选举期限，以便设法通过组织革命委员会来更好地影响选举。正像他当时指出的那样，组织革命委员会是可能把普选权变成人民手中的武器的唯一条件。这样，和官方的民主派相反，他已经表明，他认为，普选权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工具，如果使用得当，它可能变得有利，但是，他说，这种工具也可能为掌权的任何特定政党所利用，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的观点已为随后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由于他决心不顾一切强制实行的伪称合法的法令要使革命获得胜利，他竭力摧毁作为普选权的第一次表现的国民议会。5月15日是一个失败³⁶，布朗基进了监狱，而蒲鲁东却汲取了这个教训而平安无事，他只限于在报刊上发表反对普选权的言论，认为它是一种政治上的虚构。然而，他的和平的规劝并没有使他逃脱同样的命运，他也蹲了三年监狱，现在他已经出来了，重新以其令人赞赏的精力继续进行他从前的攻击。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蒲鲁东尽管仍然只是从理论的角度着眼的，但他赞成革命党的论据。我将在下面向你们提供他最近一部著作中有关普选权的整段论述。如果说立论本身必然导致极端的结论，那么人们会发现他的语言却缺少那样一种精神和决心——一个有坚定原则的人、革命的人尽管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写作时可能不得不使用隐晦的口气温和的措辞，但在每一部著作中都会透露出来的那种精神和决心。

蒲鲁东替自己辩解道，由于在一个独裁者的多疑的眼光

下写作，他不能允许自己随心所欲地使用那种会立即暴露出自己是
最可怕的革命斗士的激烈言词。但是，我认为，他在这部著作中还是
像他在任何情况下打算做的那样，坚决地说出了一切，因为他企图用
临时编造的、带有阿谀奉承味道的推测来迷惑路易-拿破仑的书报检
查制度的那些段落，全都和他的评论的语调毫不相干，并且完全没有
使之受到破坏。无论如何，蒲鲁东先生绝不能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坚
决的革命斗士，我记得，在除了他之外再没有别人的旷野，他的嗓门
总是最高的，但他并没有向人民提出应立即采取的措施；而在真正的
革命行动即将发生的地方，他几乎不是销声匿迹，就是完全埋头于阐
释学说。

当布朗基领导无产者前进，去直接摧毁横在人民解放道路上的
阶级障碍时，蒲鲁东四处传播关于廉价的合作的种种奇妙的恩惠；当
六月的惨败把工人阶级的全部要求连同他们那部分最优秀和最勇敢
的队伍一起一笔勾销了的时候，蒲鲁东在中间阶级的议会里突然跳
出来提议废除财产。但是，关于这个提议的性质，关于构成蒲鲁东著
作的主要内容的那种特殊的社会主义学说，我将在下一篇中予以论
述。以下是上面提到的关于普选权的那些段落：

“正是共和派以最可疑的传统为依据，总是重复说，人民的选票就是上帝的
选票。那么说，使路易-拿破仑当选的就是上帝的选票了！按照被表达的民众的
意志，他是你们的真正的和合法的统治者。但你们希望人民本来应该把选票投
给谁呢？你们已经用1789年、1792年和1793年款待了共和派。人民除了帝国的
神话而外一无所获。在人民的记忆里，帝国已经扫除了共和国。他们还记得米拉
波伯爵、罗伯斯比尔、他们的《人民之友》、马拉或《度申老头》（雅各宾派报纸）
吗？人民现在只知道善良的上帝和皇帝，就像他们曾经只知道善良的上帝和查
理大帝一样。你们曾宣传‘人权’，或者，你们曾使君主宣誓尊重共和国，就像尊
重上述普选权一样，这是徒劳无益的。人民只承认武力的权利。

你们由于你们自己的原则而失败了。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们依据卢梭和1793年的一些最可恶的演说家的言论,你们不愿意承认君主国正是民众自发性的直接和必然的产物;是因为在废除了上帝恩赐的政府以后,你们妄图用另一种人为的方法建立一个人民恩赐的政府;是因为你们不是把自己变成民众的教育者,而是把自己变成民众的奴隶。你们像群众一样需要的是看得见的表现形式,摸得着的象征,一句话,你们需要的是傀儡。你们把国王赶下宝座之后,用一群暴民来代替了他,殊不知暴民正是或迟或早会长出一顶新王冠来的根,是会长成一朵‘百合花’(百合花是法国正统王朝的标志)的球根。你们刚刚抛弃一个偶像就已不得不另造一个新的偶像,在这里就像梯特的那些士兵一样,他们在占领耶路撒冷庙宇后惊讶不已地发现,在犹太人的圣殿里既没有雕像,也没有公牛,没有驴子,没有阴茎,没有荡妇。他们想象不出看不见的耶和華,就像你们想象不出没有侍从的自由。

但愿这些严厉的评论能得到经常扮演珈桑德拉(特洛伊人的一位女大祭司,她预言了特洛伊城的陷落)这个角色的一位作者原谅。我既不非难民主派,也无意谴责更新了路易-拿破仑的委托书的投票。但是,是这帮伪装革命的家伙该立即销声匿迹的时候了,他们主要是依靠鼓动而不是依靠对人民进行教育,主要是依靠手腕而不是依靠思想进行投机,他们已把自己变成讨好巴结民众的人,他们已成为革命最危险的绊脚石。

是谁任命了充斥着正统派、统治家族、贵族、将军们和主教们的制宪议会呢?是普选权。是谁制造了1848年12月10日⁸⁰呢?是普选权。是谁选举了立法议会呢?是普选权。是谁赦免了波拿巴的政变呢?是普选权。

但愿人们也不会说,普选权开创了4月16日³⁵的反动,普选权在5月15日³⁶因罩上巴尔贝斯事件的阴影而黯然失色,普选权对6月13日¹⁰⁹的呼吁置若罔闻,普选权允许通过了5月31日的法令¹²⁰,普选权在12月2日袖手旁观。

我重复一遍,我这样非难普选权并不是想攻击已制定的宪法和现政府的原则。我本人曾经捍卫普选权,把它当作宪法权利和国家法律;它既然已经存在,我并不要求废除它;但是,最好让普选权有指导地和有组织地实现。然而,为了解释历史和预告未来,必须允许哲学家论证:给予像我们这样缺乏教育的人民的普选权,远非进步的工具,而只是自由的障碍。

可怜的、不彻底的民主派!你们曾经痛斥专制政治,提倡尊重每一个民族,提倡自由行使人民的主权;你们曾经准备拿起武器捍卫所有那些崇高的和无可争辩的学说,使之免遭任何人的破坏。——如果普选权是你们的准则,那么当

我们自己的人民,不顾他们的议员的呼吁,不顾宪法这种成文法,不顾流血和残酷无情的流放,出于恐惧、无知、强迫或感化(随你选择哪种原因),把760万张选票投给一个民主派极其仇视的人(民主派相信经过3年的嘲弄、侮辱和憎恨他已经毁灭、声名狼藉和精疲力竭)的时候,当人民使这个人成为独裁者和皇帝的时候,你们根据什么理由认为俄罗斯民族在他们的沙皇的统治下感到有一丁点不舒服,认为波兰、匈牙利、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农民在为自己求得解放而哭泣,认为那不勒斯的流浪汉憎恨他们的炮弹国王³⁷和特拉斯泰韦雷人厌恶安东内利阁下,认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为他们的女王唐·玛丽亚和伊萨伯拉感到脸红呢?”^①

第五篇

当被称为法国参议院的那个由波拿巴的仆从们组成的议会正在考虑举行仪式,以便宣告盼望已久的帝国终于成立,巴黎官方人士全都在用心猜测加冕典礼的方式,亲王的婚礼,谁可能成为继承人等等的时候,我利用我得到的可以进行写作的闲暇时间,并且不理睬那些供给崇尚空谈的中间阶级报纸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闲谈材料的“重大事件”,在今天继续进行我对蒲鲁东最近那部著作的评论。我们已经看到蒲鲁东对法国各种共和党派的活动和政治主张的批评;现在,让我们也来评论一下他自己的主张。关于这位在英国还鲜为人知的作者的生平,只能首先简单地说几句。蒲鲁东出生于贝桑松。这个城市因诞生了一批杰出人物而闻名。在这些杰出人物当中,维克多·雨果和贝朗瑞名列前茅。蒲鲁东是一个贫穷的种植葡萄的农民的儿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第80—84页。——编者注

子,他经济拮据,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但是,由于他的坚毅的性格,他一长大成人并当上印刷工人之后,便开始弥补他的知识缺陷。他拼命学习语言、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总的说来,蒲鲁东是一个自学成才者,因此他主要具有这种人几乎共同具有的特性,那就是固执坚持最先形成的概念。看到他不断重犯批评他的人经常揭露的、他自己有时似乎也已意识到的那些错误,会使人感到奇怪。拿破仑(当然是指叔父)为这种人发明了一个专门名词,它用在蒲鲁东先生身上非常合适。拿破仑把这种人称为“观念论者”。他想用这个名词来泛指所有那些有思辨头脑的人,哲学家和政治家,他们脱离现实的历史运动,不能或不愿积极参加这种运动,或履行任何实际使命,但仍然想给历史过程规定其发展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应当说,那些哲学家决不应受到拿破仑对他们所持的那种藐视,拿破仑只重视人身上的两种品质,即军事天赋和行政才能。那些哲学家往往是客观事物的敏锐的观察家和已发生的种种事件的高明的批评家;他们的弱点仅仅在于:他们不善于作出恰当的、符合他们精辟阐明的前提的结论。在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中,他们一成不变地用思辨的独断专横的法令来代替环境的力量,代替各种对抗因素的决断,代替物质的力量,然而实际上动力和方向都只能从物质力量中派生出来。他们在评价过去时是唯物主义者,不过一旦他们企图指出,或者毋宁说规定未来的结构时,他们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空想主义的无底深渊。使他们犯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只是:我们的“观念论者”把事实本身拿来同它们在思想上的表现进行比较,他们对过去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对于推断未来却忽视了运用同样的比较方法,而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保证人的概念正确无误。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他们要么站在由于本身的条件而没有前途的政党或阶级的基础上,要么(这种情况更为普遍)企

图同现存的一切政党保持距离，并用思辨的方式来推断解决问题的办法，而这种解决办法只能是那些政党本身进行合作的结果，或者，更可能是发生冲突的结果。他们把历史设想为一道数学题，一个方程式。因而他们设想可以在纸面上进行计算。把已知各个因素按它们各自的顺序排列，划一道线，结果便轻而易举地得出来了。但是，在现实中情况是这样的吗？历史上有过什么冲突是由一个哲学家的命令，是由一个个人的想法决定的吗？难道所有的冲突都是仅仅由他们的某个想法的力量决定的吗？它们是由人们决定的，它们是由一个政治阶级的胜利来解决的。这就是包括蒲鲁东先生在内的我们的“观念论者”所忽略了的東西。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蒲鲁东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在整个欧洲社会，自然法国也包括在内，都存在着敌对的利益的冲突——阶级战争。这个冲突将导致某种最后结果；战争必定会以这个或那个政党的胜利而告结束。用蒲鲁东的话来说，这就是：“有一个问题悬挂在现代社会之上，一个必定会找到它的明确解决办法的问题。这个解决办法就是19世纪的社会革命。”噢，你们会说是一个革命的解决办法。那么，蒲鲁东是我们的人吗？等一下！等一下！难道你们以为蒲鲁东会把他的“问题”的解决交给一个政党去办吗？他要自己去解决；他的功劳就是发现了哲人之石。那个解决办法包含在社会革命的思想中。那个思想是什么呢？“问题的因素是由我们的历史提供的。”让我们来扼要地叙述一下这些因素。法国的实际情况如何？首先，这个国家是由下列因素构成的：——

“第一，一个有组织的教士阶层，包括约5万名神父，以及同等数量的居住在各种宗教设施内的善男信女；他们拥有3亿法郎的资本，而且教堂、构成神父私人财产的教会财产、赎罪金、募捐的收入等等都还不计算在内；他们还拥有一家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的机关报，它被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且由于它是在家

庭生活范围内秘密地、私下地发挥影响的,所以更有威力。

第二,一支 40 万训练有素、毫无家庭连累、用蔑视国民自卫军的精神培养起来、完全听命于行政权、被认为是唯一既能保卫,也能镇压国民的军队。

第三,一套集中化的行政管理机构,即公安部长、民众教育部长、国务部长等——它管辖税收,关税,疆土;它的领取薪金的公职人员超过 50 万人;它直接或者间接地控制每一种工业、手工业;它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所有的人和事;它统治和管理一切事情;它使纳税人关心的事只是进行生产和缴纳他们的税款。

第四,一套按等级制组织起来的、以其不可避免的仲裁活动影响每一种社会关系和每件私人利益的司法机构,即最高上诉法院、上诉法院、民事法庭和商务法庭、治安法官等等,它们全都同教会、行政机关、警察和军队有极好的默契。”

至于国民,它分成

“第一,资产阶级——它包括所有那些靠自己的资本收入、靠自己的租金、官方特权、地位和闲职为生,而不是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果实为生的人。这样划分的现代资产阶级,以他们拥有的财富和权势形成一种类似已往的世袭贵族的资本和金钱贵族;他们控制着银行、铁路、矿山、保险业、大工业、批发商业,他们有 10 亿英镑的公债和抵押债款作为他们开展业务活动的基础。

第二,由投机商人、师傅、店主、土地耕种者和专业人员等等组成的小中间阶级,他们主要是靠他们的个人所得,而不是靠他们的资本、特权、或财产为生,但是,他们同无产者又有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他们为他们自己工作,自担风险,自己享受自己辛勤劳动的收益。

第三,工人阶级,或无产者,他们靠自己的工资为生,他们没有经济上的或经营方面的主动权,因此,完全可以称他们为受雇佣的或领薪金的群众^①。

这个国家有 3 600 万人口。它的年产品价值为 90 亿法郎,其中 $\frac{1}{4}$ 用来维持国家、教会和其他非生产性的、或寄生性的职能;另 $\frac{1}{4}$ 以利息、租金、贴水、佣金等名称由资产阶级分享;留给工人阶级以及小中间阶级的收入或薪金是,平均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 年巴黎版第 19—20 页。——编者注

每人每日 41 生丁($3\frac{1}{2}$ 便士),但在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每日还不到 15 生丁($1\frac{1}{4}$ 便士)。”^①

这就是法国实际情况的一幅图画——由于它的精确性和显著特点,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这里蒲鲁东收集了为真正的社会革命奠定根基、奠定基础的一切因素。那么,他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第 六 篇]

“如果这样把国民分成三个自然范畴(请注意这个术语!),其中一个范畴的公式是:财富和非生产性消费;另一个是:工业,商业和企业,自由,但没有保证;第三个是:绝对服从和日益贫困;那么革命的问题就是把第一类人和第三类人融入第二类人当中去,把两个极端融入中间,从而达到下述目的,即所有的人将无一例外地享有同样多的资本、工作、交换品、自由,并且过同样幸福生活。本世纪的作用,鲜为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宗旨就在于此。”^②

在这里“观念论者”立刻变成肉眼凡胎都能看见的了。历史过程的因素变成了数学题中的因素;阶级变成了抽象的“范畴”——结果,结论不再取决于主要的和固有的因素的作用,而是取决于计算者的笔对它们的任意编排。数学方法被用来代替了对现实“问题”的历史解决。他的一笔一画,就是新的魔杖的一次次挥舞,依靠挥舞魔杖,蒲

① 皮·约·蒲鲁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第22—23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7页。——编者注

鲁东先生立即发现了社会革命的秘密。小中间阶级今后是社会的中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无疑必须使每个人成为店主！该做些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必须把政权委托给店主；为什么必须把信贷、工作的分配，组织共同体的全部事务交到他们手里——而他们则将向每个人（不管是资产者还是无产者）提供置身于他们的阶级之中的手段呢！一个很不错的解决办法——不过是纸面上的！它能为世人所接受吗？让我们来看一看。资产者、大工厂主、银行家、1万英亩土地的地主、经营铁路的百万富翁、种植棉花的奴隶主、富有的投机商，这些人会接受蒲鲁东的理论，会心甘情愿地断然放弃他们的宫殿似的会计室，而代之以小店主的柜台吗？另一方面，在大工厂和大作坊里体会到了联合劳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的无产者，一旦占有那些无穷无尽的生产资料和使他们获得最终解放的强大手段时，会放弃这些东西，而换来一幅拥有10英亩土地，或租金10英镑房产的田园诗般的图画吗？假定他们愿意，蒲鲁东先生，这就是19世纪的社会解决办法吗？唔，先生，您落后于您的时代了，您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您作为新理论来宣传的东西是一件陈旧不堪的东西——那是18世纪企图采取的、已在你们自己的国家实行过的解决办法。1789年不是给予每个农民10英亩土地了吗？——你们城市的店主和市民不是拥有他们的租金10英镑房产了吗？——自由不是1793年的伟大公式，不是你们的“人权”宪法的一切不朽格言的福祉吗？那么，资产者和无产者是从哪儿出现的呢？这两个极端是哪儿产生的呢？难道不正是从享有完全支配国民利益权利的中间阶级，即您的小中间阶级中产生的吗？而您却建议再开始进行一遍同样的事情！由于您没有汲取教训，您想让全体国民重走老路。奇怪的哲学家，更奇怪的19世纪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有其因必有其果。个人有支配他的资本和他的劳动的

自由——财富集中在强者和更机敏或更聪明的人手里，——“贷款将平等地提供给一切人”，非常好。但这能立即做到吗？信贷是什么？是在保证支付利息，贴现等等的情况下，允许把另一个人或国家（如果您喜欢这样说的话）的一部分积累起来的劳动，比如说，资本用于生产性的目的。

现在，已积累起来的资本，甚至假定它是掌握在个人，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的资本，那么，这笔资本的数量是否已如此之大，如果把它分成等量的份额，就足以把每一个人都置于店主或小土地耕种者的地位呢？问题就在这里，先生，如果您有关于信贷的任何概念的话，不是这样吗？那么，您将如何着手进行呢？您将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信贷。很好，他们将处于比那些暂时还不得不靠挣工资为生的人优越的地位。这就是无产者。噢，但是往后，随着第一批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您将向无产者提供同样的信贷，并使他们摆脱奴隶地位。那么，假定人口的增长速度没有超过资本积累增长的速度，按照您的规定，由谁来决定扩大国家信贷的问题，是您，还是您在开始时曾经把资本交到其手中的那个阶级？您不认为那个物质上和经济上已经形成的阶级会把国家的资本控制在自己手中，而当您把政权也交给它时它更会这样做吗？于是，您得承认，无产者将得不到信贷；他们的社会解放不会实现，这是一点。现在，显而易见，在占有资本的阶级中，机敏、发明、才能、势力、欺诈和竞争，早晚会有一种明显的破坏；一部分人将握有较大部分资本，或者，控制全部信贷。这便是资产阶级。在过了一段同样长的时间之后，也许就在 20 世纪初，您又会到达另一次“社会革命”的起点，而另一位蒲鲁东可能重新出现，并第三次提出同样的解决办法。蒲鲁东先生，人民感谢您为他们展示了这个前景；他们将始终高兴地聆听您对其他制度的谴责，但是，请相信我，他们决

不会接受您自己的制度。

[第七篇]

IV.《路易·波拿巴先生的雾月十八日》^①

卡尔·马克思著

有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即所有向当代世界阐述了他们对最近这次政变的看法的法国作家,尽管他们可能被人认为不仅对那次事件的后果,而且对它的起因都了若指掌,但是,当他们试图解释这次事件的真正原因时,都失败了;然而,恰恰是一位在远处观察法国事件进程的德国作家却提供了关于波拿巴主义者篡位史的不仅是最优秀的,而且是唯一合格的述评。这是一个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事实。或许有人会认为,正是作者不在法国这个情况,使他能够用比较公正的观点来判断形势的特点和各个党派的行为;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相信,情形不是这样。没有一个人不尽量表现出那种被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是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的客观公正性。这种公正性纯属虚构,现实中绝对没有;多亏没有——因为它除了使作者本人而外,还能使谁感到满意呢?因此使马克思先生能够令人满意地说明他记载的那些事件的原因和结果的,不是他超脱于党派原则和党派观点之

^① 见本卷第127—240页。——编者注

上,而是他在他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方法的正确性和所遵循的原则的合理性。用简单的话来说,他成功的秘诀是,他加入了一个党,这个党并未直接卷入斗争,然而,由于它的条件,它的日益增长的和不可摧毁的力量,以及由于它的未来,它最终必定会成为构成日后法国官方历史的一切偶然纠纷和种种成败的最高仲裁人。随着 1848 年 6 月的起义,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便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从那时以来,它仅仅是这场历史戏剧的见证人,而一切其他党派如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主义者、共和派和民主社会主义者还在这场戏剧中扮演角色。因而只有工人阶级的政党才是上面提到的每个党派所犯的一切错误、过失、“罪行”等等的**不偏不倚的法官**。

现在让我简短地陈述一下何以除了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而外,其他任何党派的代表都不可能对法国最近这个历史时期的性质作出合理的和正确的判断。谁是正统派?大地主的代表,土地贵族。谁是奥尔良派?商业的代表,金钱贵族。他们当中哪一派会承认:我们的统治在 1830 年被金钱的利益推翻了,——我们的统治在 1848 年被劳动的利益推翻了;在依靠我们共同力量的联合重新掌握政权以后,保持我们的阶级地位的必要性,社会斗争的偶然事件,迫使我们大大加强和集中行政权的手段,把行政权交到一个人手中,以致如果这个人后来剥夺了我们的特权,并成为一个专制独裁者和皇帝,那么,这只不过是我们所作的努力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都懂得,既然这可能是说明他们的失败原因的唯一方式,那么,对他们来说,最好是闭口不言。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共和派、民主派、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但是,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历史,人类的历史,它在各种社会制度下的发展,完全是一个物质过程,是一连串的变化、解体、形成、再形成、革命,就像我们地球的历史一样,这

个地球也有不断变化和周而复始的转动,事物的变迁,季节的变换等等现象。正像这个永恒的物质变化——即使我们的理解不能探索到它的直接根源——的每一个表现都有赖于某种特殊原因一样,一个国家事务中的任何事件,任何情况都有其必然的、预先的推动力。无论什么地方我们都看不到奇迹,也看不到偶然事件。而且,既然社会现象的诸因素全都是我们所了解的,是易于进行研究的,是可凭经验加以认识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完全是可以充分而详细的说明的东西,除非成见或利益蒙蔽了人的眼睛。共和派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竭力避免得出那些不会再允许他们维护没有生命力条件的利益和宣布表面上重要的原则的结论。他们不肯得出这样的结论,而宁愿歪曲现实,对他们的真正失败轻描淡写,夸大他们的敌人的个人功劳,总之,他们宁愿伪造历史,用偶然事件,不测风云,残暴罪行来代替简单的因果规律,必然规律。

按照革命无产者的观点,不会发生这类欺骗行为;不可能编造出任何历史骗局;马克思先生不仅在他的这部著作中采取了这个立场,而且在他的一切批判著作中也都非常突出地采取了这个立场:他,工人阶级运动革命理论的代表,欧洲民主派中最先进的派别的著述能手,他还表明自己是评述路易·波拿巴的就任总统,建立独裁政治和帝国的最优秀的历史学家。

[第 八 篇]

本书第一章可以看作是该书的纲领,在这一章的开头,作者把1789年革命的性质同1848年革命的性质作了对比。前者是中间阶

级的事情,后者宣称它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前者由于它的倡导人有能力并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取得了胜利;后者由于它的领导人和群众犹豫不决和愚昧无知,结果遭到了失败。必须进行一次社会革命。但没有人知道该如何进行。人民除了回顾以往的历史,从中寻求指导外,还能做别的什么事情呢?因此他们交替试行成立国民议会,宣布共和国,建立独裁政治,接受国民公会,造出另一个拿破仑。他们刚刚画完了一大批描绘一个死亡了的时代的漫画,这个时代的精神就一去不复返了。但是这些试验是不是徒劳无益的,或者,对于完善人民的教育来说还有哪些教训是必不可少的,工人阶级从这些试验中学到了什么东西?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可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历史,以便向自己隐瞒自己的目的。19世纪的革命一定要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①,为的是清楚地意识到它们自己的结局和目的。从前是辞藻胜于内容,现在是内容远远胜于辞藻。

1848年的二月革命使现存社会的政府堡垒大吃一惊,而人民则宣称这个意外的打击是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的极其重大的历史事件。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政治骗子所葬送;社会没有为历史发展新阶段赢得基础,它似乎只是恢复了最陈旧的国家形式,即宝剑和教士长袍的赤裸裸的和厚颜无耻的统治。

但不管怎样,时光并没有白白流逝。在1848—1851年,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训和经验,这些教训和

① 《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8章第22节。——编者注

经验在正常的,即按部就班的发展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预先获得,这样,这次革命才会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荡。社会现在似乎倒退到它的起点后面去了;但是实际上,它只是在创造革命的出发点,即创造使现代革命能具有严肃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情况和条件。

中间阶级革命,例如18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清醒地领略它青春时代的奔放的激情造成的成果之前,长期处于冷漠状态。相反,无产阶级革命,例如19世纪的革命,则经常中断自己的进程,以怀疑的态度来批判自己的所作所为,定期地返回到它们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做一遍;它们用自己获得的无情的然而却是优越的经验对它们初次实验的不彻底、不坚定和不适当的地方进行自责;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好像只是为了使敌人像安泰一样从土地里汲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面前重新挺立起来;每时每刻它们都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⁸²

我很遗憾,由于篇幅有限和必须为我评述关于政变的一般著作规定一个期限,所以我们不能更详细地评论马克思先生的这部专著,这部著作除了包含一些历史篇章而外,还有对法国各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的实际状态的描写,这样的描写我在别处还不曾见到过。

我已经说过,六月起义是1848年革命潮流的转折点。因而这次

事件必然在其萌芽中包含着其后的全部历史(包括政变和另一个帝国的宣布成立在内)的最初的和最后的解释。让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作者是否已成功地论证了这一思想。我再次摘录他涉及工人阶级失败后阶级斗争变化情况的言论。

“这次失败后,每当运动似乎要重新开始时,无产者的确就企图向前进;但是他们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弱,成效也变得越来越小。一旦某个较高的社会阶层进入革命动荡,无产者就立即跟它缔结同盟,从而分享了各个政党依次遭到的失败。但是,这些相继而来的打击,随着它们触及的社会面的扩大,也越来越弱了。工人阶级在议会和报刊方面的一些比较杰出领袖,相继成了法庭的牺牲品,代替他们的是些愈益模棱两可的人物。其中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如成立工人交换银行和合作社,这样,他们就是在从事一种新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放弃用占有全世界的巨大资源并将其投入运动的办法来推翻全世界的思想,却企图可以说是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他们的实际情况所规定的狭隘范围内实现他们的解放,因此,他们当然要遭到失败。他们在6月里与之奋战的所有那些阶级还没有在他们身旁倒下之前,他们大概既不能从他们自身的力量中恢复他们以往革命的伟大,同样似乎也不能从他们同其他阶级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但是,尽管他们失败了,他们仍然享有重大的历史战斗的光荣;不仅法国——整个欧洲都被6月的地震所震撼了,而随后对各个上层阶级的胜利的取得所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少,以致只有胜利者最厚颜无耻地进行吹嘘,才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什么事件,而且失败的阶级离无产阶级越远,这些胜利就越卑鄙无耻”^①。

“一切阶级和党派都团结成一个维护秩序的党来反对无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党。它们从‘社会之敌’手里救出了社会。它们选择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格言‘财产、家庭、宗教、秩序’作为自己的军队的口令,并用‘在此标记下你必胜!’⁹²这句神圣的誓言激励反革命十字军。”

从这时起,那些曾经团结在这个旗号下反对六月起义者的政党中的任何政党只要企图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守住革命的战场,它就要被‘财产、家庭、宗教、秩序’这一口号所战胜。每当社会的统治者的人数被更具排他性的利益对广泛的

^① 参看本卷第139—140页。——编者注

和比较普遍的利益的胜利所减少时,社会就得救了。任何最单纯的中间阶级的财政改革要求,任何最平凡的自由主义的要求,任何最表面的共和主义的要求,任何最浅薄的民主主义要求,都会被立即污蔑为‘对社会的攻击’,并被打上‘社会主义’的烙印,最后,连那些宗教和秩序的最高祭师自己也被踢出他们的皮蒂娅的座椅,半夜里被拖下床,关进囚车,投入监狱或流放;他的神殿被拆毁,他们的嘴被封住——他们的笔被折断——他们的法律被撕毁——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秩序、财产和家庭’。一群群酩酊大醉的兵士对那些在自家阳台上的‘令人尊敬的’资本家,即秩序的狂热信徒开始射击——褻渎他们的家庭圣地——炮击他们的房屋以取乐,这一切都是为了‘宗教、家庭、秩序和财产’。最后,全社会的败类组成维护秩序的神圣队伍,而主人公克拉普林斯基^①就作为‘社会教主’扬扬得意地进入了土伊勒里宫。”^②

格·埃卡留斯等写于1852年9
月中—12月中之间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2年9月25日,10月
2、9、16和23日,11月6和13
日,12月11和18日《人民报》
第21、22、23、24、25、27、28、32
和33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① 见海涅《罗曼采罗》1851年汉堡版。——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140—141页。——编者注

查理·德纳

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
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³⁹⁵

(《纽约论坛报》通讯)

1852年9月28日星期二于伦敦

下面我报道关于意大利和匈牙利流亡者的活动的几件确凿的事实：

不久前，匈牙利将军费特尔受科苏特和马志尼之托，带着一位美国画家的护照游遍了整个意大利。一位经常举办音乐会的匈牙利女歌唱家费伦齐女士和他同行。因此他得以深入上层官方人士之间，而他所携带的马志尼的信又为他打开了秘密团体的大门。他游遍了全国各地，从都灵和热那亚经米兰到罗马和那不勒斯。不久前他回到了英国，并作了一个使民主派的大天使马志尼先生大为震惊的报告。费特尔报告的主要点是：说意大利已完全变成讲求实利主义的国家了；丝织品、植物油和其他土产品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构成当前最引人注意的话题；中间阶级（马志尼对它抱有很大的希望）极其仔细地盘算着革命所付出的代价和造成的损失，因而热切希望通过精心经营

来弥补这些损失；所以根本不可能设想，革命运动会在意大利首先爆发。费特尔在这个文件里说，在法国的火山口没有再喷出火焰之前，意大利这个国家里不可能爆发任何起义，特别是因为那部分最地道的革命居民由于长期遭受迫害和自己的打算经常落空而心灰意冷，而且首先是他们没有群众的支持。

根据费特尔的这个报告，马志尼对法国声嘶力竭地、愚蠢地咆哮一番之后，发现自己**不管愿意不愿意**，还是不得不把**首创权**再次让给古老的巴比伦^①。

但是，这些先生决定再同法国结盟后，你们猜，他们已开始同哪个派别打交道？**同路易·波拿巴先生**。

经马志尼同意，科苏特把一个叫基什的人派往巴黎同波拿巴分子建立联系。基什从前曾和日罗姆·波拿巴的儿子们相识。现在他经常逍遥自在地出入于巴黎的咖啡馆和其他类似的场所，老是围着皮埃尔·波拿巴转，对他大加恭维，并不断向科苏特发送堂而皇之的报告。这样看来，匈牙利的解放从今以后毫无疑问是要靠路易-拿破仑和科苏特的合营公司了。革命者的首脑同“暴君”结成了生死同盟。

还在这一切事件发生之前，波兰人列列韦尔老头和俄国神父塔杰乌什·哥若夫斯基代表所谓波兰的“集中”³⁹⁶来到了伦敦，把起义的计划交给了科苏特和马志尼，这个计划的关键自然是波拿巴的合作。他们在伦敦有一个密友，即兰茨科隆斯基伯爵，这位伯爵同时又是俄国皇帝的密探，而他们的计划已荣幸地预先经过圣彼得堡的审查和修正了。这位兰茨科隆斯基伯爵目前正在巴黎监视基什，他将在那里前往奥斯坦德接受圣彼得堡发来的新指示。

① 指巴黎。——编者注

基什从巴黎给科苏特送去了各式各样的保证，这些保证放在神话集里是很合适的，但是在法国的神话般的状况中，这些保证却可能是可信的。据说科苏特收到了路易-拿破仑邀请他到巴黎去的一封亲笔信。科苏特正在让人把这封信的副本散发到匈牙利全国各地。他已经在这个国家里为总起义作好了一切准备。参加密谋活动的甚至有皇家的官吏。科苏特希望在10月间起事。

以上我只是几乎逐字逐句地转述了我从别人那儿听到的东西。如果你们现在问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怎样，那么我认为路易·波拿巴是想一箭双雕。他企图讨好科苏特和马志尼，然后把他们出卖给奥地利人，以此作为奥地利人同意他攫取法国皇冠的交换条件。此外，他估计，一旦人们知道科苏特和马志尼同他进行了谈判或建立了联系，他们在革命党人之中就会威信扫地。另外，他发现在专制强国中有一股反对他登上帝位的强大势力，而像他这样一个冒险家，完全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想要同密谋叛乱者结合在一起去碰碰运气。

至于说到意大利，路易·波拿巴希望把伦巴第和威尼斯也并入自己的领土，而把那不勒斯划归他的表兄缪拉特。马志尼先生的前途真美妙啊！

既然我又谈起了意大利，就请允许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意大利最近这次争取自由斗争的女英雄之一维斯康蒂伯爵夫人，不久前来过这里并同帕麦斯顿勋爵进行过一次长谈。勋爵阁下告诉她说，他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成为不列颠政府的首脑，那时欧洲很快就能得到改造；尤其不能让意大利再继续遭受奥地利的蹂躏，因为归根到底，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被火药和铅弹长期统治。总之，帕麦斯顿表明，他期望法国成为他的盟友。不过，他希望，如果爆发总起义，伦巴第应立即并入皮埃蒙特，而使伦巴第成为共和国的问题，应完全留待将来去

解决。

我个人深信,老奸巨猾的帕麦斯顿完全是想入非非,特别是不了解,即便他在议会党徒中间还享有一点威望,但他在全国范围内则毫无威望。

查·德纳写于1852年10月中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2年10月19日《纽约
每日论坛报》第3590号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关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延期审判的短评³⁹⁷

科隆,9月底。据说,10月陪审法庭终于将开庭审理共产党人大案;我说据说,是因为在此案真正了结之前,没有人再会相信政府此话是完全认真的。此外,上次延期的原因并非像法庭所陈述的那样,是柏林舒尔茨顾问生病。真正的原因是,主要证人店员豪普特从汉堡逃走了。此人竟如此害怕去科隆,以致宁可移居巴西。他父亲从前曾恳求柏林内阁让审讯在汉堡进行,但没有如愿。还跑掉了第二个主要证人^①。这样一来,政府便失去了最后的举证手段,去年11月政府机关已经不得不宣布“缺乏客观的犯罪构成”。每个人都宁肯相信到了10月又会找出新的理由来拖延这个大案,而不愿相信将作出最终的判决。假如“合法”的途径不能达到复仇的目的,便选择非法的途径。

① 指路·施泰翰。——编者注

不能进行判决,但可以在判决之前长久地进行监禁。

A. H.

约·魏德迈写于 1852 年 10 月
15 日—21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10 月 22 日《纽约
刑法报》第 32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威廉·皮佩尔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³⁹⁸

(特约通讯)

科隆的“共产党人大阴谋”现在正由陪审法庭在该城进行审判，《人民报》的栏目已利用各种机会对这个案件的进展，或确切地说，拖延情况，作过简单的说明。德国报纸一致宣称，值得全欧注意的这个案件于10月4日开庭。被告多达11名，就出身和教育来说，几乎属于所有社会阶层，但全都献身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他们已被关押将近18个月之久，因而普鲁士政府有充裕的时间来收集反对他们的文件和证据；现在，王权的代理人拿着精心炮制的起诉书出场了。

有两个原因促使我在此刻向你们提供一篇关于整个事件的全面的、原原本本的报道。我想公众会有兴趣了解与对被告（他们的所谓罪行在于公然信仰与整个欧洲工人阶级的辩护人所坚持的政治学说相同的学说）的控告和审判有关的一切情况；此外，这个国家的中间阶级的御用报刊对他们的观点和行动全部和部分地进行了歪曲。看来你们的自由派报纸的受雇佣的笔杆子似乎特别热衷于支持一个专制政府的计划；这个政府并不满足于随意关押和由高贵的贵族及有钱的“自由派”组成的陪审团预先作出的“判决”来整垮它的对手，而

且把他们说成是他们国家的“最危险的和最有活动能力的社会公敌”，甚至还力图用无耻的诽谤来迫害他们，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骗子和乞丐，从而使他们受到外国的蔑视。对被告的辩护讳莫如深；对证人没有进行反复讯问；法官没有作过概述，陪审团没有进行过宣判。除了起诉书和警察的证词而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然而这些正义的爱好者，这些权利的维护者——当法国警察和奥地利警察对搞阴谋的资产阶级或逃亡在外的贵族采取任何行动时，他们就几乎火冒三丈——已经认定，一切证词都完全确凿无误；警察已提供了最公正的、实事求是的陈述；这些“共产党人肯定是”永无谬误的普鲁士政府所说的那“伙罪恶的和可鄙的政治骗子”。

10月4日，11名囚犯被从监狱带到法庭。尽管各公共场所已被军队占领，尽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护卫着囚车，但人们到处向他们的斗士热情地欢呼致敬，即使当场有许多人被逮捕，他们也没有被吓倒。陪审团宣誓之后，庭长开始宣读被告的姓名。他们是：格·勒泽尔，工人；亨·毕尔格尔斯，《新莱茵报》副编辑；约·雅·克莱因，医生；彼·诺特荣克，裁缝；弗·列斯纳，工人；罗·丹尼尔斯，医生；威·约·赖夫，工人；卡·奥托，化学家；亨·贝克尔，《威斯特伐利亚报》^①编辑；阿·雅科比，医生；和阿·埃尔哈德，店员。

然后把起诉书交给了他们。宣读起诉书用了两天时间。它指控这11名囚犯策划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阴谋，因此犯了叛国罪。起诉书的开头对工人阶级和为了工人阶级利益通过密谋，或者通过公开起义而进行的推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种种尝试作了总的评述；它硬说最近几年来的一切革命运动都应主要归咎于某些秘密协

^① 指《西德意志报》。——编者注

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警察尽管一直在追踪秘密协会,然而,到现在为止,还是未能发现他们的协会的所在地或者逮捕到协会的会员。突然,一个名叫诺特荣克的外出旅行的裁缝在莱比锡被捕了,因为他没有合格的通行证,并且在他的财物中不仅发现了某个共产主义协会的若干会员的名单,而且还发现了关于这个协会设在科隆的无可争辩的证明文件,这就立即揭示了这个协会的活动和倾向的性质。这些文件主要是《德国共产党人宣言》,和伦敦中央委员会发布的、通过该协会的科隆支部送交德国的各个支部的两封通告信^①。这些文件的倾向是通过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和彻底改变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来摧毁一切现存制度。这种改变将使贵族和中间阶级的现有社会特权被剥夺,将使私有财产制度,作为个人利用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来为一己谋取私利的权利,被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后者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社会组织下,一切劳动工具将人人有份。这些文件中表达的“可恶的”观点,使政府对那些起草这些文件的人的“犯罪意图”确信无疑,于是决定对整个德国共产主义协会的一切可疑会员提起诉讼,并相继付诸行动。警察当局进行的普遍调查现已弄清下述事实:确实存在过一个秘密共产主义协会;直到1850年9月15日为止它的总部设在伦敦;后来,发生了分裂,结果伦敦协会的多数派开除了少数派;后者自行成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同协会在巴黎、日内瓦、布鲁塞尔、柏林等地的一些支部建立了联系,而前者则把自己的权力转交给了协会的科隆支部。由于这次分裂,科隆支部就成了宣布支持伦敦多数派的德国各支部的首领;勒泽尔和毕尔格尔斯代表科

^①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编者注

隆委员会发出了革命通告信并派遣了特使；由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伦敦少数派指导的另一协会，与在巴黎的某个舍尔瓦尔曾有书信往来；后者已被法国警察逮捕，因搞密谋而受审，被判处7年监禁，这一下共产党人的危险活动更加昭然若揭；最后有60多个证人都宣誓作证，提出了不利于出庭受审的被告的证词；起诉书在结尾部分提到，警方掌握的其他文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应受处罚的，以致陪审团不会有任何借口在宣布在押犯“有罪”这一点上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读完这个起诉书后，接着开始对在押犯进行审问，审问中，毕尔格尔斯和勒泽尔声明说：是的，他们曾是科隆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是的，他们签署了所提到的各种通告信；是的，他们承认是共产党人，并准备不顾一切、不顾任何人的反对，捍卫他们的观点和原则；是的，他们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这些观点和原则；是的，他们曾派出特使同其他地方进行联系——他们要告诉那些地方的工人，他们为什么参加秘密协会。哪里有工人阶级的报刊？哪里有公开结社的权利？哪里有邮政通信的安全？正是政府践踏了这些自由，没收了自由宣传的工具。难道被告们曾经料到，为了服从专制君主的这些专横的命令，他们应该放弃鼓吹他们的原则的权利。他们被指控企图发动一场暴力革命。然而，他们所发出的通告信的内容是什么呢？他们曾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吗？他们曾煽动举行起义吗？根本没有这种事。所说的通告信的用意是要使人民认识自身的利益，使他们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斗争。他们有能力制造这类事件吗？仅靠个人的行动能发动一场革命吗？那么他们的罪行是什么呢？就是警告人民谨防政府奸细和愚蠢的狂热分子的挑衅，那些人用尖锐的宣言这样的极端激进的词句掩盖他们的狂妄野心；就是力求告诫他们的阶级要谨防从事贸

易的自由派和开办商店的民主派将来背信弃义；就是指出了阶级的历史发展的结局；就是呼吁工人不要被任何不包含实现他们的社会解放的允诺所欺骗。如果这在现行法律看来是一种犯罪行为的话，那么他们将挺身捍卫它——那么他们将不怕被认为“有罪”。

诺特荣克同样声明说，他曾是科隆协会的一个会员，并曾作为他们的特使外出旅行。他努力设法把在他那里发现的那些文件交给其他协会。那是他的使命。但他认为，就法律意义而言，那些文件中根本没有任何煽动性的东西，如果当局指控他还把某一份宣言散发了军队，那么他是在不知道该宣言的内容是什么的情况下确实这样做了，这个文件与科隆的协会毫无关系。宣言是由另一个党的巡回特使交给他的，他只是后来才得知那是伦敦少数派的代理人、一个名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先生的作品。

其余的在押犯声明，他们不是任何秘密协会的会员，他们让他们的代理人替他们辩护，他们等待着将要对他们提出的证词。

他们全都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自己的生活简历。

然后开始询问政府的证人。我不能给你们提供他们的证词的记录，这些证词大多平平淡淡，谈的都是一些与强加于在押犯的罪行毫不相关的事情。唯一有点重要意义的消息是普鲁士警方的一个头目、警官施梯伯提供的，他陈述了他手下的密探用以发现“密谋”的各种各样的手段。他两次出场，他的第一次陈述如下：

“1851年，他被政府派往伦敦协助英国警察监视国际博览会上的外国扒手。在他到达后没有几天，一个陌生人向他表示愿意给普鲁士警方提供共产主义协会伦敦中央委员会（被开除的少数派）所拥有的、存放在该协会的一个名叫狄茨的秘书那里的原本文件。他，施梯伯先生，拒绝与这事情发生任何联系，因为他没有得到指示。然而，不久后，柏林的当局告诉了他关于已逮捕诺特荣克的事，并授权他，如果可能的话，就去搞到诺特荣克和其他科隆在押犯与伦敦有联系

的证据,于是他便约见了那个‘陌生人’,那个人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提议,声称‘只要肯花钱,共产党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搞到。’于是他给了那个人一些钱,没过几个星期,当他已经返回柏林后,他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伦敦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和通信。”^①

(很明显,要么是那个“陌生人”从狄茨先生那里偷走了所说的文件,要么更可能是,后者有意把它们卖给了警官的密探。)

他(施梯伯先生)确信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但是在仔细研究它们时,他却被措辞的激烈和这些策划者的大胆所震惊并且几乎被吓倒。在那些人所写的东西和决议中包含有最可怕的威胁。所幸的是,这些“社会之敌”的不同派别之间所存在的敌意和分裂,使社会仍有机会拯救自己。

(这些文件全都是伦敦少数派委员会的,只有一件除外,其中多数派通报了他们关于把“同盟”执行委员会迁移到科隆去的决议,并声明他们与少数派打算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再有任何关系。)

接着,施梯伯先生作证说,这些文件使他去追查在巴黎的一个密谋¹⁶⁹。他到那里去了,并敦促法国警方逮捕了他向他们通报的那些密谋分子。这一回,巴黎协会的首领舍尔瓦尔同已被他控制的全欧其他地方之间的全部通信的材料被更清楚地揭露出来了。舍尔瓦尔已被巴黎巡回法庭判处7年监禁,施梯伯希望科隆陪审团也照此办理。

然而,施梯伯先生的这一非常详尽的证词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尤其是因为它一点儿也没有谈到科隆的在押犯参与了那些被传送的文件的起草,所有这些文件恰恰是属于他们的对手,即伦敦少数派中央委员会的,文件的日期恰恰是在少数派从协会(它的执行委员

^① 见本卷第482页。——编者注

会由科隆的在押犯们组成)中分裂出去以后。于是,施梯伯先生想出了另一个计划来诋毁被告,上星期六,他第二次跳出来宣布,现在他终于掌握了证明科隆与伦敦有直接联系的文件。上星期日,一个从伦敦来的特别信使,告诉他,伦敦共产党人要送一封信给科隆的一个朋友,这封信中装有重要文件,警方安置在伦敦的密探也已搞到了多数派协会的记录本。那个记录本现在会证实,即使在 11 名被告被监禁以后,科隆与伦敦之间仍然进行着犯罪的通信,协会仍然扩展到了全国,对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并阴谋危害政府的安全。因此又进行了一些逮捕,社会不得不面临这个协会一手造成的巨大危险,所以他再次提醒陪审团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①

当那个所谓的记录本摆在在押犯面前时,他们一致声明,那是警方伪造的,他们在辩护时将能够证明,信使以及警方代表刚才描述的一切详细情节完全是同一个当局的捏造。本周对证人的传讯将要结束,然后在押犯将开始进行辩护,他们的律师将发表辩护词。因此,可能不会很快作出“判决”,下周我将继续报道这个案件的进展情况。^②

——威·皮·

1852 年 10 月 24 日于科隆

威·皮佩尔写于 1852 年 10 月
25 日—28 日之间

载于 1852 年 10 月 30 日《人民报》第 26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① 见本卷第 483 页。——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 778—788 页。——编者注

卡尔·施奈德第二

* 在科隆共产党人 案件中的辩护词³⁹⁹

先生们！我首先要为勒泽尔辩护，同时也是为毕尔格尔斯辩护。毕尔格尔斯本人也要申诉几点意见。所有被告都被指控犯有组织密谋罪。因为在诉讼过程中对密谋这个概念除了在检察机关的开庭报告中有所暗示之外，并未作进一步的讨论，所以应当首先对这个概念加以确定。鉴于此，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看法国的法律条文，因为该法律条文直到对被告起诉时仍然有效。法兰西刑法典第 86、87 和 88 条明文规定，危害一词可以理解为实施犯罪或开始实施犯罪的一种表现于外部的暴力行为，如谋杀君主、改变王位继承、推翻政府等等。这个论断是从危害一词的概念和各种危害的总括中，而主要是从第 88 条下的定义中得出的，而且在法学上对此也并不存在疑义。而密谋是在数人之间作出的实施某种危害的决定。由此可见，密谋包括以下内容：1) 作为犯罪意图的客观表现的一定暴力行为，即危害；2) 密谋者之间关于实施这种行为的办法、地点、时间、手段的协定；3) 密谋者实施这种一定行为的最终决定。就本案来说，密谋者之间协定和决定的行动，即危害是直接以暴力推翻宪法为目的。构成密谋的根据不

是某个团体的目的和目标,即使这个目标是推翻宪法,而是一定的行为的目的,同谋者采取的直接实施犯罪意图,以暴力推翻宪法的一定行动的目的。由此可见,如果检察机关想要证明这个团体的最直接目的是以暴力推翻宪法,这是不够的,何况,检察机关连一个证据都拿不出来。如果人们坚持密谋的正确概念,那么即使人们可以向检察机关承认它在事实方面对被告所指控的一切,但也并不存在什么密谋。

辩护人现在准备暂且沿着检察机关在其开庭报告中所选择的证明路线来证明,尽管人们可以对共产主义原理进行非难,但共产主义的本质本身并无触犯刑法之处,实际上共产主义在各国至少在试验中被容忍并不受干扰地得以传播。检察机关方面还错误地援引了一些事例,从中得出结论:共产主义者受到了重罚。检察机关所提到的巴贝夫、菲埃斯基、阿利博等人被判刑,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进行危害,搞密谋,而且菲埃斯基及其同伙,以及阿利博等人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如果说有人曾经谈到共产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到处对此所采取的严厉措施,那么他所指的是——就优先列举出的瑞士来说——布伦奇里的报告和联邦议会的决议,其中都建议改善物质生活并决定驱逐外来的手工业帮工。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规模,证人维尔穆特的报告是近乎可笑的,该报告估计,仅在汉诺威就有大约 10 名真正的同盟成员,而工人协会的成员有数百之众,外来帮工和工人有 8 000 多人,他们都按照那 10 个人的意愿行事。最后,检察机关援引 1849—1850 年对黑策尔及其同伙的起诉本身也是毫无成效的。那次起诉与目前的起诉完全相似,而且甚至还证实了该组织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宪法,此外还有武器等等。尽管被告的供词十分详尽,勃兰登堡的陪审员们仍然作出了无罪释放的判决,而这里的陪审团想必也会作出同样的判决。

辩护人转到这次起诉的直接证据上,而首先要详细驳斥检察机关有关同盟的产生的陈述,尤其要说明,1848年和1849年在科隆并不存在什么同盟,证人亨策、黑策尔和罗伊施等人的证词是不足为凭的。为了证明1848年在科隆有同盟存在,人们还提到了在巴黎对舍尔瓦尔及其同伙起诉的结果。在这里只有证人施梯伯的证词,从其中只能看出巴黎人同科隆有联系。施梯伯作证说,舍尔瓦尔在狱中告诉他,他在1848年被马克思吸收入盟,并根据马克思的委托在巴黎建立了一个与科隆保持联系的支部。辩护人接下去说:我想就在这里仔细考察一下,这位就一些问题提供证词的证人是否可以信任。首先谈一谈施梯伯先生的过去,已经查明,早在1845年,施梯伯先生当年的同事们,即一些高等法院的见习法官,在写给他们院长的一篇呈文中请求禁止施梯伯先生继续从事任何司法工作,因为他使用化名(画家施米特)潜入西里西亚的一些家庭去寻找证据,证明众所周知的西里西亚织工暴动仅仅是煽动的结果,而不是真正贫困的后果。据我所知,当时施梯伯先生退出了司法工作。他曾向诸位提到,我收到马克思从伦敦寄的一封信,此信是这位证人1848年为了反驳关于他在法兰克福从事间谍活动而写给《新莱茵报》编辑部的。我手头上确有此信。信中有一段话我认为最能说明施梯伯先生为人的话是这样写的:

“我认为,近来正是我对民主主义所作的贡献比任何人都要大。是我使成百的民主派被告挣脱了刑事司法的罗网。是我甚至在这里实行戒严的情况下,当胆小的无耻小人(所谓民主派)早已从战场上逃之夭夭的时候,英勇无畏地始终不倦地与当局相对抗,一直继续到现在。如果民主派机关报这样对待我,这就难以鼓励我作进一步的努力。”^①

^① 见1848年12月26日威·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编者注

先生们，你们记得，施梯伯先生曾向我们较详细地陈述过他是在何种情况下得到所谓记录本的，以此说明记录本的真实性。现在，检察机关和施梯伯先生自然不再坚持这个记录本形式上的真实性，但是，他们却还继续咬定它的内容是真实的。然而，即使是在现在，对真实性进行考察也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这恰恰能够使证人施梯伯的行为举止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给贝尔姆巴赫的信是16日到达这里的，至迟17日星期日由警探交给了商人科特斯。施梯伯先生在其10月23日的第一次证词中告诉我们，他在前一个星期日通过信使收到了记录本，同时得到通知，秘密通信是通过科特斯进行的。施梯伯先生还告诉我们，两天之后确有一封给科特斯的信寄到了，而在他的第二次审问时又说，信使10日星期日就到了。如果这个本子10日就收到了，那么两天之后就收到给科特斯的信的说法就是不真实的，因为此信16日才到；而施梯伯的关于17日收到了这个本子的前一种说法则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科特斯的信已经到了。或者关于记录本比给科特斯的信早两天到达的另一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如果施梯伯先生今天说，信使是11日到的，这也许是正确的，那么这也无济于事，而且可以肯定，施梯伯先生隐瞒了这个本子到达的真实时间，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如此矛盾的境地。

先生们，你们知道，我们已经证明，无可争辩地属于伦敦同盟并与马克思有来往的W. 李卜克内西，并没有写作那本值得怀疑的记录，虽然上面的签名是李卜克内西的。施梯伯先生很会自我开脱。我可以证明，当他得知我们已经能够证明李卜克内西的签名是假的之后，他便声称，这个李卜克内西的名字是H.。施梯伯先生是否能够证实H. 李卜克内西这个人的存在呢？施梯伯先生完全有机会证明这一点。我曾经向施梯伯先生询问过有关林格斯和乌尔默这两个人的情

况,在所谓的记录上除了李卜克内西之外还有他们的签名。施梯伯先生起初根本不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再次描述他是如何获得这个本子的。直到重提这个问题时,他才说他不认识林格斯和乌尔默。还是这个施梯伯,曾经向我们发誓保证说,通过他的密探每周一次的报告,他对伦敦同盟所有的人及其个人关系都了如指掌。施梯伯认为,这两个名字大概是盟内代号,然而,李卜克内西却应当用真实姓名签名,而且在记录上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等所有的人时写的都是正确的姓名。施梯伯先生现在说,他自己也不相信这种真实性。然而,还是这个施梯伯,曾经向我们发誓保证说,他根据对情况与人员的了解,对这种真实性确信无疑。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到,施梯伯先生进而从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他又是如何由此认为,贝克尔博士的盟员身份以及丹尼尔斯夫人的秘密通信已得到充分的证实。施梯伯先生从前绝口不谈他对真实性的任何怀疑,却硬是向我们保证说,弄到记录的密探本人就在同盟内部,此人完全可靠。是啊,此人是可靠的。他可以为了达到所要求的目的而去犯罪,但是,他不是盗贼,他蒙骗了施梯伯先生,他是一个伪造者。施梯伯先生以前向我们保证,他对这个本子进行了仔细研究,他根据对一切有关人员和种种情况的充分了解,认为它的真实性是可信的,他可发誓保证这一点。

当时的检验必定是十分马虎的。单是这个自然是写在一个有红色封面的本子里的记录的形式和语言本来就可以使施梯伯先生确信,有教养的人(里面所提到的人显然都是这样的人)是不会写出这种东西的。在此仅列举众多明显不真实之处中的几处:3月4日报告,在科隆有5个支部,而5月13日则报告,只有1个支部。而4月20日又说,尽管已有了5个支部,仍然有必要再建立1个支部,因为与科隆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此后不久(5月13日),人们得知,科隆

人与提到的临近的一些城市保持着良好的联系。5月27日的记录中提到K. 沃尔弗的提案和L. 沃尔弗的另一个提案。人们总是断言,住在伦敦与马克思保持联系的两个沃尔弗是前《新莱茵报》的两个编辑,他们实际上在伦敦都与马克思有来往。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编辑名叫威廉·沃尔弗和斐迪南·沃尔弗,这里有报纸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施梯柏先生现在在场的话,那么他也许又会习惯地跳出来,然后解释说,在伦敦有4只狼^①。7月29日恩格斯报告了审讯处在记录的某些地方所表现出的愤怒。生于巴门、常与莱茵法院打交道的恩格斯怎么会使用审讯处这个用语呢?9月23日的记录中说,贝克尔的医生曾经写信说,贝克尔博士已近乎失明。在这里本来有不少人相信的关于贝克尔失明的传言;通过我作为辩护人在科隆对贝克尔的探望,早已被批驳了。可见,这样一封信寄到伦敦是不可能的。

先生们,如果记录本像早些时候证实的那样是假的,另外,如果人们想一想我在一些地方所暗示的证人施梯伯的所作所为,那么人们大概会和我一样对这位先生是否值得信任产生极大的怀疑。

仅就舍尔瓦尔一案而言,除了只有证人施梯伯曾经报告过,而且可能是在巴黎报告过有关事实之外,还应该考虑到,舍尔瓦尔和吉佩里希在他们被判决之后不久即被交给警方,然后潜逃,现在正逗留在伦敦。正如施梯伯先生自己向我们所暗示的,这次密谋被警察局长卡尔利埃用于政治目的,因为这次密谋是在政变前不久被揭露出来的。于是,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怀疑:舍尔瓦尔是密谋者之一,密谋者是在警方事先就知道的情况下扮演了这个角色。因而他还向施梯伯先生供述了马克思的情况。舍尔瓦尔知道,施梯伯主要寻找的是什

^① 德语中的姓沃尔弗(Wolff)和狼(Wolf)发音相似。——编者注

么,于是便按照需要作了报告,以便捞取酬报。施梯伯先生最后把他推荐给警方。舍尔瓦尔的那些信一派胡言,人们已经向你们读过三遍,对这些信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而案卷中舍尔瓦尔及其同伙的其余的众所周知的信和报告也偏偏否定了他们与科隆有密切联系的可能性。他们绕过科隆往北德寄信,此外还往斯特拉斯堡寄信,却从来没有往科隆寄过信,他们甚至还劝说一个特使不要到那里去。

现在我来研究一下,从被告本人的供诉材料或指控他们的其他证据中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引出危害或密谋的概念。在这个方面,有必要提醒诸位注意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的提法,特别是,要考虑一下根据新的立法详细规定的条文。犯罪需要有两个条件,即行动必须是经过协定和决定的,这从法国的法律条文来看是清楚的,不会产生歧义。行动(危害)这一概念本身乍一看来也许并不是无疑问的。草拟新的刑法典之前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报告人的报告都使人们不再怀疑,犯罪构成所要求的行为必须是暴力的行为和直接图谋叛国的行为,因此,任何一种距离行动较远的准备、一种仅仅可以间接导致预期的结果的行为,都不足以使这种行动受到惩处。因此,就本案而言,必须是协定和决定一种以直接导致暴力改变普鲁士国家宪法为目的的行为,问题的提法也将是如此。检察机关提出了3条属于犯罪概念的原则:1)改变国家宪法的图谋;2)向他人申明这种图谋;3)这种图谋变成一项决定。我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错误的。如果这三条原则是正确的,那么,例如,一个人告诉另一个人说,他不满意现存的国家宪法,因此他要坚决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推翻国家宪法,而如果另一个人也流露出这种图谋,两个人于是相互发誓实施他们的图谋,这就足以成为密谋的犯罪构成。此外,检察机关根本没有用事实来进一步支持它提出的这3条原则,可见它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原则的

前提确实存在。相反，人们却只是力图把被告的基本原则说成是令人厌恶的，把他们的倾向说成是令人诅咒的，还有，竭力证明他们的图谋是以暴力推翻宪法为目的的。

辩护人现在来从相反的含义上说明一下为了证明同盟具有叛国目的而从个别同盟文件中摘引的那些地方，特别是，检察机关为此而引用的那些地方，并援引其他地方来加以驳斥。在这方面，辩护人指出，首先，在《宣言》和《共产党的要求》中没有谈到某种表现于外部的行动，即危害，也没有谈到协定这种行动，更没有谈到采取行动的决。人们只能像检察机关所作的那样，从中推断出某种倾向，然而，问题不在于倾向。至于那些不同的章程，检察机关力图证明它们是一致的。然而，即使个别条文的内容是一致的，1847年章程、后来1848年的黑策尔章程以及1850年12月1日的章程之间依然存在着重大的区别。例如，从前规定叛变要处死，而后来这项规定作为不恰当和不合时宜的东西而被取消；甚至关于同盟的目的，在1848年黑策尔章程和1850年12月1日的章程中也作了完全不同的规定。前者规定的目的是建立社会共和国，而后者则完全看不出有现在就推翻某个国家宪法的企图。这个章程的第一条主要是以《宣言》及其表述方式为依据，如果说《宣言》把即将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和变革仅仅理解为合乎自然规律的、由现实关系引起和制约的历史发展的结果，那么1850年的章程所规定的奋斗目标显然也不是通过同盟所能够直接达到的。辩护人宣读了个别地方，以便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说明。再者，这些章程还根本没有获得最终的通过，只有代表大会才能决定是否保留它们。最后，从章程本身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被告不可能采取某种导致变革的行动。因为按照章程，不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个别区部和支部都不能作出采取行动的决。只有代表大会能

够这样做,如果人们真的企图推翻宪法或者仅仅以同盟的名义插手正在发生的革命,那就首先必须召开代表大会。那些告同盟书仅根据其性质和目的就不可能有关于协定、密谋的内容,因为它们仅仅是关于同盟状况的报告,因此人们从中同样只能推断出倾向。检察机关特别指出三月告同盟书中提出的革命时期和革命后的措施,但是这些规定中并不存在协定,独立武装无产阶级的必要性仅仅是就革命胜利后的时期而言的,到那时,宪法已经被推翻了,问题在于保卫胜利成果了。1850年6月的告同盟书被告并不知道,不过它的真实性可能不存在什么争议。另外,即使它的确是真实的,被告也没有理由否认它,因为它在本案提出的问题上毫无危害性。最后,在1850年12月1日的告同盟书中,被告不过是给自己签发了一张赤贫证明书,其中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同盟的窘迫处境。这篇告同盟书清楚地证明,当时不可能有人想要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根据书中的记述除了少数区部之外,整个同盟组织已经十分涣散,并且有一部分遭到了破坏。沙佩尔—维利希派的文件——人们同样想从中找出指控被告的证据——提供的仅仅是有利于被告的证据,证明该派的立场与被告的立场相距甚远。证人们讲述过,贝克尔以何等轻蔑的方式对待维利希寄给他的建议举行一次革命的信件,他如何嘲笑这个建议并转给他人作为笑料。并非同盟成员的贝克尔给毕尔格尔斯和其他同盟成员看了这些信件,他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在贝克尔与马克思的通信中也可以看出同样的态度。特别是从科隆马克思派的十二月告同盟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两派之间有着多么大的分歧。马克思派在其中谴责另一派求助于在德国发动一场革命。而沙佩尔—维利希派则反过来指责马克思派打算进行长达80年之久的批判。人们在这一方面还求助于其他文件,如拉绍德封方面的来信、布朗基的祝酒词,但是他们

从中充其量只能看出与被告所代表的党相敌对的倾向,然而正如我们所一再提到的,问题不在于此。证人施梯伯曾经借鲁齐乌斯就那篇祝酒词的前言的作者提供证词的机会,试图怀疑证人鲁齐乌斯本人是个共产主义者,这种做法又一次证明,警方是怎样得出它的结论的。施梯伯断定,贝克尔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鲁齐乌斯有来往,而鲁齐乌斯也是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与贝克尔有联系。如果说人们还援引各工人协会及其 1848 年期间在其内部开展的活动作为被告企图直接进行颠覆活动的证据,那么上面已经证明,当时在科隆还根本不存在同盟,因此所有与之有关的推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对于报刊也是如此,人们奇怪地把报刊视为达到目的的实际手段。如果说 1848 年同盟尚不存在,那么就不可能把常常被引用的 1848 年刊物与同盟联系在一起,至少不能把它们视为达到颠覆目的的手段。最后,人们还援引散发红色问答书和致后备军的呼吁书一事作为同盟目的的证据,但是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个人,至少是同盟本身散发过这些东西。施泰翰在 1851 年 3 月 24 日的信中称,他收到了科隆的一封信,信中指责他不愿意散发红色问答书。施泰翰的这封信不能提供这方面的证据,因为施泰翰属于另一派,因此这封可疑的信也只能是从那一派那里收到的,并且在个别同盟文件中还提到沙佩尔—维利希派试图在科隆建立一个支部,可见至少与那里有来往。寄给克雷费尔德的基安奈拉的红色问答书所附的便条,由于笔迹相似而说成是出自马克思的手笔。它只可能是有人故意模仿了马克思的笔迹,因而完全是伪造的,因为在这张便条或附函中强调指出革命已迫在眉睫,这与马克思在以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观点是大相径庭的。再者,恰好从施泰翰的信中可以得知,而且警方也证实,当时那个传单早已散发过,所以马克思自己从伦敦那里寄送这类东西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最后,

收件人基安奈拉虽然主动向警方告发了可能的寄件人并自愿充当侦探,但他根本没有想到马克思,因而只能设想,有人为了陷害马克思而故意伪造了这张便条。因此,辩护人断言,撇开检察机关提出的三条原则本身就是站不住脚这一点不谈,人们无法证明被告符合这三条原则中的任何一条,更谈不上符合法律规定的密谋的真正必不可少的条件。最后,辩护人还要驳回常常向被告提出的指控,说他们隐瞒了真情或提供了假情况。检察机关向被告提出的证据大多来源于被告自己的供词,特别是来源于侦查之初毕尔格尔斯向警务顾问舒尔茨所作的供词。虽然毕尔格尔斯在供词中并没有牵连某个人,但是他在认为他的行为合法的情况下,公开说明了同盟的组织情况,从而为起诉提供了线索。同时,关于有人试图以欺骗手段诱骗工人的指责他不能栽到这些人身上,相反,他们毫不隐瞒地告诉工人们,即使下次革命爆发也不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还必须首先经历长期的多次的斗争。

卡·施奈德第二发表于1852
年11月3—4日

载于1852年11月5日《科隆日
报》第284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威廉·皮佩尔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判 决⁴⁰⁰

(特约通讯)

1852年11月12日于科隆

今天，这宗大案终于结束了。正如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案件以6名主要被告被定罪而结束。虽然如此，但毕竟不应忘记，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提供任何类似的判例；所以，被告既未触犯任何现行法律，就不能按照法律受到惩罚。陪审团发现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即要在共产主义与现政府之间作出选择。既然问题是这样，所以律师的一切剖切陈词、对警察阴谋、伪证、捏造的文件等等的一切揭露，都没有对陪审员产生任何影响。这些陪审员一部分是贵族，一部分是金融寡头，他们感到自己的职责是保护一个他们只是有时不得不对其所作所为熟视无睹的政府，而不是要维护某些原则，这些原则宣称自己所抱的目的是要在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搞垮那些大

人物。实际上，这就是对不顾一切法律悍然宣告判决的唯一解释。毫无疑问，这将在各界特别是在民众当中引起极大的轰动；政府的这种表面上的胜利对它的稳定所造成的威胁，将比可以预料到的危险大得多。它还证明：那些制定法律的人也能多么轻而易举地破坏法律；那些十分关心维护阶级社会的人，为了反对革命，怎样践踏一切所谓不可侵犯的权利、永恒的正义等等。

法官就案件所作的总的说明，连同我在最近一次报道^①中提到的对被告和证人的讯问，占用了大约3周时间；而政府则用了18个月来编造起诉书。然而，辩护人还被指责替被告辩护而干扰了法庭整整一个星期。主要辩护人施奈德先生的辩护词如下：

“政府代言人，即公诉人及其代理人，警务顾问施梯伯描绘了一幅关于共产主义协会对欧洲近代史、特别是普鲁士近代史的可怕影响的恐怖图画。现在，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除了代表工人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公开宣布的要求外，没有提出关于那个‘密谋’的其他任何证据，如果把上述要求和科隆市议会自由派议员1848年提出的某些要求相比，那后者的直接目的显然是最粗暴的，因而也是最危险的。根据这个理由，他想说，优美的科隆市的议会应对1848—1851年这一整个历史时期的种种事件负责。很明显，在缺乏一切可信的证据或材料的情况下，起诉纯粹是以政府方面的报复愿望为依据，而且，实际上指控的不是那些人的行动，而是他们的观点的倾向。现在，他想告诉陪审团，如果他们打算把被告当作他们的政敌来加以反对，他们就要在报刊上把这场战斗进行下去，用论据来反驳论据，或者跑到街上去进行决战。然而，不顾一切真实情况和有说服力的事实，根据最卑鄙、最下等的警探的告密，在对他们的对手执行法律的虚伪借口下打垮他们的对手，这对他们来说会是一场悲哀的滑稽戏。关于被告的行为，证词说了些什么呢？它除了证明政府代理人方面的密谋外，难道还证明在其他任何方面有什么密谋吗？为了证明同盟科隆支部的犯

^① 见本卷第771—777页。——编者注

罪企图，伦敦少数派协会的文件被盜走或从这个机构的某些内奸那里买走了。那么，关于这两个协会之间假定存在的关系的性质，起诉书本身说了些什么呢？由于伦敦少数派的愚蠢的和妥协的行为，科隆共产党人严肃地把他们开除了，对他们的一切不承担责任。舍尔瓦尔既是维利希派的巴黎代理人，又是普鲁士警方的警探，他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假冒共产党人身分，而是因为他威胁说要在1852年5月组织起义。要科隆共产党人为他们的敌人的行动负责，这简直太过分了。甚至施梯伯先生——谁都知道他完全是一个不择手段、信口发誓作证、随意利用极不正当手段搞到各种文件的人——也承认这是走了错误的一步。至于施梯伯先生的人品，那么他早已扮演过这样的角色：通过使用化名和千方百计乔装打扮混入一些党派，出其不意地揭发它们的机密。例如，1846年，他通过泄露他先前使西里西亚纺织工人接受的计划，使大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家破人亡。1848年，此人在写给当时任《新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博士的一封信（这封信在法庭上宣读时，公众对施梯伯先生发出了嘘声）中曾郑重声明他坚信民主主义；现在，辩护人看到他再次表演了他的撒谎和欺骗的拿手好戏。作为一张王牌，施梯伯先生在法庭上出示了一本据说包含有伦敦多数派协会成员的言论的记录本。这个记录本纯系捏造。姓名是杜撰的，签名也完全是伪造的。这一点他可以作证。三个受他（施梯伯）雇用的名叫希尔施、弗略里和格赖夫的厚颜无耻的人杜撰了那本记录。记录本的内容纯粹是对事实的荒诞不经的歪曲，虽然那些话被蓄意强加于共产党人，然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那完全是由警方一手制造的。”

辩护人最后说：

“陪审团的先生们，人们请你们对一个阴谋作出判断，我们已向你们指出阴谋在哪里。尽管如此，如果你们一定要对被告作出判决，那么这个判决就不再是对‘罪犯’宣告‘有罪’，而将是对一个伟大事业的捍卫者施加暴行，你们要把他们变成这个事业的第一批殉难者”。

随后，陪审团退席，经过4个小时的评议之后，宣判毕尔格尔斯、勒泽尔、诺特荣克“有罪”，判处6年监禁；宣判奥托、贝克尔和赖夫“有罪”，判处5年监禁；对列斯纳也判处3年监禁，其他被告释放。但雅科比博士因另外被指控冒犯普鲁士国王陛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

世而立即被捕。

1852年11月12日于科隆

威·皮佩尔写于1852年11月
14日—18日之间

载于1852年11月27日《人民
报》第30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
第11卷翻译

约瑟夫·魏德迈

秘密协会和共产党人案件⁴⁰¹

我们不久前看到的科隆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应该被看作是在德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在这里，无产阶级第一次作为一个有别于其他一切社会阶级的、具有不同的表述得非常明确的利益和不同的革命目的的政党出现。革命工人的秘密组织在资产阶级法庭上被揭露出来，它的代表被判刑，不是因为他们搞密谋，而是因为那些合法党派不愿意承认他们有作为政党存在的权利。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规定工人们只能充当任人摆布的生产工具，任何一点点自主要求都是造反，都是犯罪。科隆资产者陪审员们的判决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共产主义同盟是史无前例的；在它之前的所有已知的秘密协会都是以直接准备一次行动、发动一次革命为目的的，而共产主义同盟的行动则要推迟到遥远的将来进行，它只应当始于革命之后或革命之中，当前的目的仅仅是让工人政党作好准备，去同在革命中获胜的政党进行斗争。这一点从同盟章程和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通告信中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其中十分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革命不是通过密谋所能发动起来的，革命是社会危机，这种危机不是由个人的势单力薄的努力，而是由一些主要状况的共同作用引起的。此外，工人革命永远不能把像在德国依然存在的那种封建或半封建国

家作为自己的直接对象,因为封建国家的直接继承人首先是资产阶级国家,在那里对工人的奴役表现得更赤裸裸和更残酷。如果说工人帮助摧毁封建国家,那么这不是他们作为政党所干的事情,他们是其他政党的同盟者,而他们马上又得与这些政党争夺统治权,而获得第二次胜利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他们事先作好新的战斗准备,已经认识到他们目前的同盟者便是未来的对手,或者,他们遭到未来的对手突然袭击,被解除武装和受到排斥。同盟的奋斗目标主要是促使工人们认识到这一点,使他们在公开斗争爆发之前就已经从理论上对各种阶级对立有所认识,这些阶级对立在封建官僚主义暴政对所有社会阶级实施普遍压迫的情况下不可能发展到足够尖锐的程度。被告毕尔格尔斯在陪审法庭上发表的演说中说:

“同盟不是要把规律和规则强加给按照它的信念社会所必须经过的历史进程,它没有设想,可以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事先规定社会发展进程。相反,它处处服从于这种发展,处处使自己受到现实关系的支配,以现存状况为依据,而现存状况则取决于各个民族的政治和经济的进步,取决于各个阶级在不同时代和在不同情况下所作的努力;总而言之,同盟并不想以密谋的方式搞出什么名堂,确切地说,它的思想是运用政治斗争的手段维护一个被它视为文明国家中一切政治运动的基础的原则。”^①

同盟如此坚定地坚持它的这一本来的目的,以至于当其少数派成员——一些只考虑自己飞黄腾达,成为站在无产阶级的肩膀上的强权者和大人物,并且迫不及待地再次提起马刀装扮革命英雄的冒险家——试图使同盟放弃这一目的,使之变成一个像烧炭党那样的协会的时候,它便立即将他们驱逐出去了。这便是那些偏离正道的人所大吵大嚷的同盟“大分裂”。他们的种种活动的产物就是被卡尔利

^① 见 1852 年 11 月 6 日《科隆日报》第 285 号。——编者注

埃所发现的可笑的德法密谋¹⁶⁹，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写下的充满卡尔·穆尔式的长篇血腥独白的案卷，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为了证明同盟进行阴谋活动所试图强加于同盟的东西，这个少数派的成员终于以国家证人的身份来反对被控告的同盟成员。

任何人只要稍微留意一下 1848 年以来的党派斗争，都会看清工人政党建立一个优良的与众不同的秘密组织是合理的和必要的。无产阶级的拳头曾经在法国推翻了金钱贵族和戴着王冠的钱袋的统治，在德国动摇了它的掠夺成性的君主们的宝座。但是，无论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无产者手中的武器又都被花言巧语的资产阶级夺走了。在法国，他们一直相信利益的一致，直到 6 月他们被抛到街头；在德国，他们一直沉醉于极度的欢乐狂喜之中，直到被民众的期望所吓倒的资产阶级与被推翻的容克地主阶级结成新的神圣同盟把这层秘密揭开，直到他们吃惊地看到所有政治权力又落入他们的被认为已经消灭的敌人的手里。这时，只剩下小资产阶级这个最后的同盟者了，由于它的背叛，后来的所有想重新夺回失去的阵地的努力，如维也纳、萨克森和巴登的起义，都失败了。因此，革命的发展越来越迫使无产阶级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同盟的组织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

在德国，资产阶级已经表明自己没有能力成为统治阶级。站在它旁边的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任何其他阶级都不能通过德国的下一次革命而被推上领导地位，但是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则掌握在站在革命后面的群众的手中。每一项“改善劳动阶级状况”的措施都要求劳动阶级不断廉价化，也就是要求不断“恶化劳动阶级状况”的资产阶级制度和资产阶级生产出丑。根本的问题在于，要么完全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要么出现一次新的反动，资产阶级的阶级

统治得到新的加强,工人受到新的奴役。一个有组织的、认识到它的利益的、了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无产阶级将把革命推上前一条道路,而发动一场这样的革命就是同盟的任务。同盟是不可瓦解的,这是时势的必然产物,而不仅仅是章程上的言辞;它将存在下去,直至达到目的为止,直到宣布和巩固工人政党的最后胜利为止——尽管同盟的成员遭到种种迫害和判决;在同盟的保存与继续存在问题上,大洋此岸的工人与大洋彼岸的无产阶级具有同样的利害关系,因为在所有国家中,无产阶级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

约·魏德迈

约·魏德迈大约写于 1852 年

12 月底

载于 1853 年 1 月 15 日《体操报》第 19 号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1 卷翻译

厄内斯特·琼斯

暴风雨的第一声响雷⁴⁰²

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第一声响雷在意大利发出了轰鸣，它已淹没在血雨之中，或者说，只是在牢笼的高墙之内引起了回声；响雷已经过去；民众和民族复仇的那些著名的受害者一旦得救便大声高呼：“已经恢复平静！”是的，这是狂风首次大作和其后随之而来的怒号之间的不祥的、可怕的平静。筋疲力尽的巨人这次短暂的暴怒，被压在燃烧着熊熊烈火的山底下的恩克拉德的这次翻动，对于世界的压迫者们是一个可怕的警告。只要有一次电的接触，有一个呼声，有一个“起来！”的号召，哪怕是来自千里之外，意大利全国各地就会动荡和行动起来。拿破仑会在他的新婚的御座上发抖，在巴黎接二连三地实行大逮捕；奥地利军队内部会出现一个危险的运动——欧洲各国的王座在空前沉重的打击下摇摇欲坠。千真万确！意大利和世界有希望了。

同胞们！这次辉煌起义的事实将被、而且正在被一切千尽党派坏事者中的无耻之尤，即不列颠的报刊所歪曲。它们将对起义肆行诽谤，而且那些被特许的谎言炮制者，即那些阶级的报刊，将竟相对起义挖苦讽刺，或者破口大骂。因此，我们要向你们对当代世界上这一最辉煌的英勇果敢的行动、从头开始作一简明扼要的说明。

米兰是伦巴第的巨大的、声誉赫赫的首府，是一个筑垒城市——处在坚固堡垒的高压之下，由4万名奥地利士兵卫戍和包围着，这一大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士兵可以同时调集起来向任何一个指定地点发动进攻。在该城的堡垒上安装了一门威力强大的大炮，威慑着没有任何武装的全城。米兰人手中连一枝步枪、一根长矛也没有。奥地利凭借着这种武力，绞死、鞭笞、监禁、杀害了无数的米兰人；在这种可怕的暴政下，到处血泪斑斑，无法无天，杀人如麻；这一切已使当代世界震惊、甚至激起了大概是最不情愿帮助被压迫者的普鲁士各邦君主以及不列颠贵族的同情和抗议。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两个最卑鄙无耻的阶级，即意大利的贵族和资产阶级，都俯首贴耳地屈从于压迫：前者只要能够在现在由奥地利奴隶掌管的旧伦巴第王公宫殿中充当奴仆的奴仆，就感到心满意足；后者只要能够做生意，并且掠夺本国人，或欺骗在他们城市闲逛的英国和法国的蠢人，就感到心满意足。工人即无产者则不是这样，世界的希望和解放只能从他们那里、只能通过他们而获得。马志尼在英国发出了号令——他认为黑山战争⁴⁰³使奥地利撤走了部队，从而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在撒丁王国对新教徒的迫害将激发皮埃蒙特人的反抗情绪；意大利的成功的起义所造成的可怕的骚动，将防止拿破仑从巴黎调动他的军队；而随后匈牙利的爆炸将阻止俄国入侵并分散奥地利的力量——号令既已发出，光荣的米兰和蒙扎工人便坚决地、奋不顾身地、英勇地举行了起义。哎呀！那些领导人的估计完全错了：黑山恰恰吸引了20万俄军到土耳其—匈牙利边境，他们准备向匈牙利施加压力，这完全足以防止起义。这种预期的与法国的交战，恰恰使奥地利的武装力量集中在西南部；而且已经作出的自由主义的宗教让步——在撒丁王国许诺的让步更多——，也已消除了皮埃蒙特人的愤怒。没有一个场合会

比这更不适当了。但伦巴第的光辉的工人无所顾忌。他们的领导人让他们举行起义——于是他们就像火山中冒出的火焰一样举行起义；然而形势对他们是多么不利啊！

这个光荣的城市弥漫着欢乐的气氛。富人们竭力博取他们的奥地利主子的欢心。这些富有的贵族和商人欢迎他们的德国暴君，因为后者使他们避免看到将扫除他们的垄断和显赫权势的民主制的胜利。意大利的这些杂种们的寻欢作乐，早就激怒了人民；这帮与外国杀人凶手结成同伙的流氓，竟然在自己同胞的坟墓上歌舞欢笑。人们义愤填膺，以致一些普通报纸的报道竟然说，起义是忍饥挨饿的穷人对富人的这些庆宴愤怒不平所引起的。有一则这样的报道说：“主要的目的是要吓唬富人，因为他们举行这么多的舞会，而且如此频繁地去斯卡拉（歌剧院）……收到了一些匿名的恐吓信，因为他已经举办了而且还要举办一些大型舞会。”请想想看，财神爷的这些儿子们在他们的惨遭凌辱和迫害的民族血泪横飞之时，竟然轻歌曼舞狂欢饮宴！！

当天晚上原本要在维斯康蒂公爵夫人那里举行一个豪华舞会，在一个高级俱乐部即马里诺俱乐部举行另一个豪华舞会。

这是发生在2月6日即狂欢节中的一个星期日的事。奥地利政府得悉将发生一起爆炸，所以在各处实行了戒备。早晨，一个传闻开始扩散，说将在两点钟举行起义；但城内十分安静，而且由于下了一场大雨，街上的行人比往常稀少。爱国者本身察觉到了自己的敌人正严阵以待——但流亡在英国的领袖既然已经发出号令，他们决不三心二意。5点钟的时候，人们看到50个人列队向堡垒开去。他们除长刀之外别无其他武器，其他一切武器早已被奥地利人收缴去了，所以人民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读者们，我请你们赞扬这50个人的英雄主

义，他们仅仅用刀武装起来，便向卫戍部队和四周驻扎着 4 万欧洲精锐之师的堡垒发动进攻。他们都是工人。为了迄今为止只有武器才能解决问题的最神圣的事业，他们响应自己的流亡在外的领袖关于拯救祖国的号召，举行了起义。而《泰晤士报》和其他一些报纸却说这些人是“一帮子坏人、该城的最下等的人”，是“一伙下贱的穷光蛋”。敢于刊登这样一些话的报刊真是恬不知耻。《巴塞尔日报》说：“资产者没有参加”；《议会报》说：“这些穷鬼们全都属于劳动阶级”。是的！为了意大利而举行起义的是人民，而当时贵族却在准备自己的庆宴，牧师则在为杀人凶手的刺刀歌功颂德；商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胞们被屠杀而袖手旁观，只图发财致富。

这一小队人雄赳赳地去攻打堡垒，只是起义者在 3 个教堂敲响警钟才打破了当时的普遍寂静。卫兵急忙拿起武器，但他们来不及关闭大门，起义者就已经冲进去了，于是在武装精良的卫兵和这少数只拥有短匕首的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战。有几个奥地利军官和士兵在战斗中倒下了，但在进攻者冲到存放卫戍部队的武器的地点之前，他们前前后后的大门都已紧闭。经过长时间的英勇奋战，他们牺牲了，直到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在倾听着大街上是否有响应的声音。此外，还有三四十人去攻打总督府，在这里，他们也制服了卫兵，杀死了一些军官和士兵，用简陋的武器，在敌人的要塞内孤立无援地坚持了长达一个多小时之久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直到集合起来的部队开到他们的背后，胆怯地用齐射把他们打死。我们听到和读到过许许多多关于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的事迹，然而这里总共只有不到 100 人的两个小队，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攻打一支 4 万人的军队的两个要塞，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这种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能够激励这个首府毫无反抗精神的千万人行动起来，点燃全意大利革命

的烽火。但是在外面一切依然是一片沉寂。除了这一小批光荣的密谋家中少数单独行动的人稀稀拉拉地向零散的卫兵发起了一些孤立的进攻,以及少数出于病态好奇心的人三三两两地集在一起之外,城里居民仍然死气沉沉和无精打采!要么是他们对马志尼号召他们举行起义的宣言是否真实抱怀疑态度,要么是马志尼已经丧失了自己对意大利人民的影响和控制能力。哎呀!这样一些英雄竟然如此白白地牺牲了!人们不应当把这种英雄主义叫作鲁莽;这些人服从了自己的领袖的命令,——而且,实际上,看来如果群众起来了的话,起义就一定会成功,至少是暂时成功。因为奥地利报刊自己就说:“军队瘫痪了一个小时,如果发生总起义,十之八九它就会获得成功。”失败的原因何在呢?马志尼号召匈牙利士兵实行哗变,命令意大利人民举行起义,他向米兰人保证:士兵将倒戈,起义将成为全国范围的。然而只有两三个掷弹兵一声不吭地被解除了武装。不过,我们的一些意大利朋友向我们保证说,人民这次遭到惨败的原因,不是意大利精神已一蹶不振,它仍然同过去一样慷慨激昂和始终如一。也许,如果科苏特亲自露面的话,那种昔日的热情就会激发出来,科莫恩和佩斯的老战士^①就会兴高采烈欢呼着团结在普遍自由旗帜的周围。也许,如果马志尼或萨菲从他们在贝林佐纳的避难所回来了的话,他们会给无产者以信心,并且唤起中间阶级中那部分自由派的同情。而当时的情况是,在有了1848年和1849年的惨痛经验之后,只是由远在异国他乡的领袖们在纸面上号召米兰人使那些可怕的火山——包围着他们的曾经被炮击过的平原城市的堡垒和要塞——再次起火,就显得不够了。

① 指匈牙利解放运动中科莫恩和佩斯的守卫者。——编者注

很难做到不在中途被捕而到达行动现场，这是那些驱使别人拿生命去作孤注一掷而自己不冒生命危险的人可以被原谅的唯一理由。不过，马志尼已凭他的胆量靠近现场：他出没于意大利的边境，毫无疑问，他准备在兵刃已经突破奥地利的严密封锁线时闯入冲突的中心。

但是，革命从来不是订做的；革命是下层的长期苦难和抑郁的自发燃烧，遇到偶然事件而爆发，而且只有在勇气与良好机会兼备时才能取得胜利。

我们之所以简明扼要地叙述这一伟大事件，是因为我们相信，它是其他一些更伟大得多的事件的前奏；是因为它充分暴露了欧洲暴君们的软弱：100个几乎没有武装的人竟然把吓得胆战心惊的久洛伊总督驱逐出了米兰，与军事专制政府对峙了两个小时，使欧洲大陆上每一个戴皇冠和主教冠的脑袋惶恐万状——妙哉！它甚至使英国的贵族反动派怕得发抖；最后，是因为有人将对这帮英雄们横加诬蔑。有人把他们称之为“杀人凶手”，因为他们使用匕首（奥地利人实行解除武装后他们留下的唯一的武器），但他们是在英勇的公开的战斗中、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正在严阵以待的（如奥地利报纸自己告诉我们的）武装的敌人使用匕首；有人把他们称之为“下贱”和“无耻的”“暴徒”，因为他们都是穷人；有人还会把他们称之为抢劫犯和强盗——虽然他们并没有干过任何这类为非作歹的事，因为他们要把美丽的祖国从强盗和抢劫犯的手中夺回来。他们是正在出发的民主大军的前卫，只是出动得太早和太缺乏准备，因而成了争取自己伟大事业的无谓牺牲者，但是他们的出动和牺牲这一事实本身表明，他们所属的大军正在静静地然而却是确定无疑地集结着，并且正跟在他们的后面向前挺进。他们的英名永垂不朽，他们的业绩壮丽辉煌！枪决

和绞刑已经开始,监禁和空前的屠杀已经开始,但是历史将把自己的笔蘸上他们的神圣鲜血,写下欧洲解放的最光辉的篇章。

厄·琼斯写于 1853 年 2 月 14
日—17 日之间

载于 1853 年 2 月 19 日《人民
报》第 42 号

原文是英文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1984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
第 12 卷翻译

注 释

索 引

注 释

- 1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8月至1852年9月写成的，共19篇。1851年7月底，《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查理·德纳约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当时马克思正忙于经济学研究，而且他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为英文报纸撰稿。所以他于1851年8月14日写信给恩格斯，请他写一些关于1848年以来的德国革命的文章。恩格斯在写这些文章时利用了《新莱茵报》合订本以及马克思提供的其他一些资料，并经常和马克思交换意见。这些文章在寄出之前都经马克思看过。他本来还打算写一篇结束语，可惜没能写成。

这一组文章从1851年10月25日到1852年10月23日陆续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德国”栏目里，标题是：《革命和反革命》，同时用罗马数字标明篇序。署名是卡尔·马克思。直到191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来往书信发表后，才知道作者是恩格斯。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这组文章没有出过单行本，只有开头的几篇曾被译成德文在美国的德文报纸《纽约晚报》以及柏林出版的《德意志总汇报》上转载过。

1896年，马克思的女儿爱·马克思-艾威林编辑出版了第一个英文单行本。书名是《革命和反革命或1848年的德国》，此外她还给每篇文章加了标题。同年还出版了卡·考茨基翻译的德文版，书名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两个版本均收入了《最近的科隆案件》（见本卷第563—570页）以代替恩格斯原打算写的最后一篇文章。1900年，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法格将此书译成法文出版。刘镜圆根据爱·马克思-艾威林的英文版译出该书第一个中译本，1930年由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书名为《革命和反革命》，其中也收入了《科隆的审讯共产党人事件》（即《最近的科隆案件》）

一文。

本卷选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作为总标题，并保留了爱·马克思-艾威林为19篇文章所加的标题。——3。

- 2 被法国兼并的莱茵河左岸地区，农奴制度同贵族、教士的特权，以及教会的房地产特权，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已被废除。——8。
- 3 大陆体系或大陆封锁，是拿破仑第一在1805年法国舰队被英国舰队消灭后，于1806年11月21日宣布的命令。它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进行贸易。参加大陆封锁的有西班牙、那不勒斯、荷兰、普鲁士、丹麦、俄国和奥地利等国。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遭到失败后，所谓的大陆封锁便瓦解了。——8。
- 4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德意志所有的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贝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9、670。
- 5 德意志联邦于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由德意志各邦联合组成，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其中还有藩属丹麦王国的荷尔斯泰因公国和尼德兰国王的领地卢森堡。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这就加深了德意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是以奥地利代表为会议主席的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拥有有限的权力，是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工具。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于1850年恢复。联邦的两个最大的邦奥地利和普鲁士曾不断地进行争夺霸权的斗争。联邦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3、46、94。
- 6 联邦议会是德意志联邦唯一的中央机关，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履行中央

政府的职能,事实上成了德意志各邦政府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它干预德意志各邦内部事务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各邦的革命运动。1848年三月革命以后,反动势力企图加紧联邦议会的活动,以达到反对人民主权的原则和反对德意志民主联合的目的。从1851年起普鲁士驻联邦议会的全权代表是俾斯麦,最初他力求和奥地利结盟,后来采取了坚决反奥的立场。1859年初乌泽多姆被任命为普鲁士的全权代表以代替俾斯麦。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德意志联邦由北德意志联邦取代,联邦议会也不复存在了。——13、24、46、321、653、664。

- 7 指1834年5月1日成立的税务同盟。由愿意同英国进行贸易的德意志各邦汉诺威、不伦瑞克,奥登堡和绍姆堡—利珀单独组建而成。1854年该同盟瓦解,其成员并入了关税同盟(见注4)。——13。
- 8 维也纳会议是欧洲各国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断断续续召开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是英、普、俄、奥等反拿破仑战争联盟国家的君主和代表,法国因波旁王朝复辟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缔结的旨在恢复各国王朝统治和满足战胜国领土要求的条约和协议,统称为维也纳条约。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奥地利获得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威尼斯等地,普鲁士获得莱茵河两岸及北部萨克森的土地;瑞典从丹麦获得挪威;俄国获得芬兰,并把华沙大公国改为波兰王国,由沙皇统治;克拉科夫成为俄、普、奥共同保护的共和国。奥地利的尼德兰(比利时)合并于荷兰称为尼德兰王国。德意志组成松散的德意志联邦;瑞士重新恢复中立;英国得到荷兰的好望角与锡兰殖民地以及法属殖民地马耳他岛。会议的最后决议规定,恢复法国1792年的疆界,恢复波旁王朝在法国的统治,并将法国置于列强的严格监督之下;法国不得再侵占欧洲领土。1815年9月关于成立神圣同盟(见注11)的决议是对维也纳决议的补充。——14、24。
- 9 指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和相继在比利时、波兰、德国和意大利等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革命和起义。——15。
- 10 “青年德意志”或“现代派”,是德国19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七月革命和德国人民起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一种文学流派。“青年德意志”又是一个文学团体,其核心人物是古茨科、劳伯、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一批文人,他们在世界观方面受黑格尔思想和圣西门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文艺和政论作品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主张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实行宪制、解放妇

女等等。——15。

- 11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同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见注8）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

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1818年亚琛会议，1820—1821年特罗保会议，1821年5月来巴赫会议和1822年的维罗纳会议。根据会议的决议，曾于1820—1821年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1823年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并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 12 指历史法学派，它是18世纪末在德国兴起的一个法学流派。它的特征是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反对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该派的代表人物是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7。

- 13 正统派是法国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的波旁王朝（1589—1792年和1814—1830年）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为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标榜自己维护劳动者的利益，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把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叫作封建的社会主义。这里的“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是指那些极端仇视法国革命的保皇派著作家和政客。——17、261。

- 14 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是根据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而建立的。它们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原则从其成

员中选举产生,组成纯粹的咨议性机关。——19。

- 15 联合委员会是普鲁士各等级委员会组成的联合机关,行使咨议职能。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2年10月18日至11月10日召集联合委员会会议,打算按照1820年1月17日颁布的《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来实行新的税收和获得公债。关于省议会等级委员会的情况,可参看马克思的《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19。
- 16 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成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经纪人,1820年1月起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20。
- 17 联合议会或联合(省)议会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11日至6月26日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议会。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第一届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说,他决不会让“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天经地义的联系”变成“受到制约的、宪制的”联系;他决不会让一张“写上了字的纸”来代替“真正神圣的王权”。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议会大多数代表拒绝给国王以新贷款的保证。国王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21、40。
- 18 指“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是从1844年起在德国传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学说。代表人物有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他们拒绝进行政治活动和争取民主的斗争,崇拜爱和抽象的人性,他们的假社会主义思想,同沙文主义、市俗行为和政治上的怯懦结合在一起,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1847年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参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反克利盖的通告》、《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等)。——22。
- 19 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于1848年5月18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其目的是消除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和制定全德宪法。它的选举采取两级制,不是直接选举。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除了勃鲁姆、福格特等人的左翼外,还有卢格、施略费尔、齐茨、特留茨什列尔等人的极左翼,或称激进民主党。议会的多数派是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它又分裂成中间派右翼和中间派左翼。中间派拥护君主立宪政体。但是由于自由派多数的胆怯和

妥协,以及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动摇和不彻底性,议会害怕接管国家的最高政权,没有成为真正统一德国的机构,最后变成了一个没有实际权力,只能导致群众离开革命斗争的纯粹的争论俱乐部。

当德意志各大邦召回本邦议员,而法兰克福城市当局又禁止留下的左翼议员在当地开会时,左翼议员于1849年5月30日决定把议会地点迁到斯图加特,并试图组织保卫帝国宪法的合法运动。1849年6月6日,国民议会宣布废除帝国摄政及其阁员,建立由温和民主派弗·拉沃、卡·福格特、亨·西蒙、弗·许勒尔和奥·贝谢尔组成的五人摄政。但是没有成功。同年6月18日,议会被军队驱散,停止了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新莱茵报》上发表许多文章,对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评。——24、46、75、85、88、93、97、368。

20 哥达派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以弗·达尔曼、马·西姆桑、弗·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布吕格曼等人为首的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属于右翼自由派。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建立帝国摄政政府的决议之后,他们有148名代表宣布退出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25—27日在哥达城单独召开三天会议,故而得名。最后有130名与会代表签署了一项声明,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之下实现德国统一。于是“哥达派”一词被习惯地用来指背叛革命的自由资产阶级。——25。

21 “德国天主教”是1844年在德意志一些邦中产生的、吸引了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参加的宗教派别。“德国天主教”不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位,反对天主教会的许多信条和仪式,竭力使天主教适应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是19世纪40年代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的不满和要求全国政治上统一的愿望在宗教上的反映。

1859年,“德国天主教”与自由公理会合并。——26、321。

22 自由公理会是在“光明之友”运动的影响下,于1846年和1847年从官方新教教会中分化出来的宗教团体,它曾试图成立全德国的教会。“光明之友”是产生于1841年的一种宗教派别,它反对在新教教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主义和伪善行为为特征的虔诚主义。自由公理会也反映了19世纪40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本国反动制度的不满。自由公理会于1847年3月30日获得了进行自由的宗教活动的权利。

1859年,自由公理会和“德国天主教”合并。——26。

- 23 一位论派或反三一论派,是反对“神的三位一体”教义的宗教派别。一位论派运动产生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最初在波兰、匈牙利、荷兰等地流行,17世纪以后又在英美等国出现。19世纪,一位论派的教义反对宗教的表面仪式,把宗教中的道德伦理因素提到了首位。——26。
- 24 这里的德意志帝国是指中世纪欧洲封建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成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1034年帝国正式称为罗马帝国。1157年称神圣帝国,1254年称神圣罗马帝国。到1474年,神圣罗马帝国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帝国在不同时期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法国东部、捷克、奥地利、荷兰和瑞士。它是由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法律和传统的封建王国和公国,教会领地和自由城市组成的松散联盟。1806年,对法战争失败后,弗兰茨二世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这一帝国便不复存在了。——26。
- 25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这一口号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前夕提出的(见马克思1847年10月底写的《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1848年3月,他们在拟定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时,又把这个口号作为最主要的要求列在第一位。——27。
- 26 1846年2—3月在加利西亚爆发了乌克兰农民起义,当时在奥地利所辖的波兰地区,以克拉科夫为中心恰好也爆发了波兰民族解放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乌克兰农民与当时准备进行反奥暴动的波兰贵族之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多次使起义农民将矛头指向波兰起义者的队伍。起义农民一开始就解除了波兰贵族起义部队的武装,随后大规模摧毁地主庄园。奥地利政府在平息了波兰贵族的起义运动之后,又镇压了加利西亚的农民起义。——29。
- 27 奥地利的财政状况在19世纪初依然极度拮据。人们曾想用发行纸币的办法来克服支付和信贷上的困难;1810年流通的钞票超过十亿盾,全值兑现已不可能。1811年2月20日的特许令规定兑现面值的五分之一,从根本上说,这意味着国家的破产。—30。
- 28 指大学生军团,它是一个准军事性的学生团体,1848年3月组建于维也

- 纳。参加该团体的还有一些大学讲师以及其他知识分子,主要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它在1848年奥地利的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维也纳十月起义失败后该军团被解散。——37、65。
- 29 指1848—1849年的奥意战争。1847年底和1848年初在并入奥地利版图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地区,意大利居民掀起了反对奥地利的群众运动。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以皮埃蒙特为首的意大利各君主国于1848年3月底向奥地利宣战。战争的第一阶段,皮埃蒙特的军队于1848年7月25日在库斯托扎被击败,8月9日签订了奥地利—皮埃蒙特停战协定。1849年3月20日由于意大利国内革命运动重新高涨,皮埃蒙特的君主被迫继续进行战争。但在21—23日,他的军队在莫尔塔拉和诺瓦拉又被彻底击溃。皮埃蒙特在军事上的失败及其统治集团的投降,使奥地利恢复了在意大利北部的统治。——38。
- 30 马尔默停战协定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关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的停战协定。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意志居民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政府实际上在作战中采取消极态度,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默同丹麦政府签订了为期七个月的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了这一协定,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抗议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1849年春天,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事再起,结果,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仍然留在丹麦王国中。——49、62。
- 31 第一次瓜分波兰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圣彼得堡签订的协定进行的。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51。
- 32 胡斯战争是1419—1434年间“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见恩格斯的《匈牙利的斗争》)。由捷克爱国者和宗教改革领袖胡斯而得名。胡斯严厉谴责教皇兜售“赎罪券”,反对教会占有土地,抨击教士的奢侈堕落行为,主张用捷克语举行宗教仪式。1415年7月胡斯作为异教徒被处以火刑。这一处决激起

捷克人民更大的义愤,1419年7月30日布拉格发生起义,拉开了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胡斯战争的参加者分为两大派,即代表农民和平民的塔博尔派和代表捷克贵族和中产阶级的圣杯派。战争期间,塔博尔派的军队,击退了教皇和德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反对捷克的十字军征讨。只是由于圣杯派同国外的封建反动势力实行叛变性的妥协,人民起义才遭到失败。胡斯派的运动对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53。

- 33 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于1848年6月2日在布拉格举行。在代表大会上,受哈布斯堡王朝压迫的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中的两个派别展开了斗争。温和的自由主义右派(属于该派的有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帕拉茨基和沙法里克)为了维护和巩固哈布斯堡王朝,试图使之变为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联盟,从而解决民族问题。民主主义左派(萨宾纳、弗利契、里别尔特等)坚持反对这一点,竭力主张同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民主力量一致行动。代表大会中属于激进派和积极参加1848年6月12—17日布拉格起义的那一部分代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布拉格其余的代表,即温和的自由派代表6月16日宣布代表大会无限期休会。——56。
- 34 宪章派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计划前往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通过人民宪章。政府当局禁止这次游行示威,派出大批军警阻止游行队伍。宪章派的许多领导人表现了动摇,决定放弃游行示威并且劝说游行的群众解散。——60、245。
- 35 1848年4月16日巴黎工人在路·勃朗影响下举行和平示威,向临时政府提出关于“劳动组织”和“消灭人对人的剥削”的请愿书,示威队伍被资产阶级国民自卫军驱散。——60、750。
- 36 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的革命行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其中主要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游行向当天讨论波兰问题的制宪议会走去,闯进了波旁王宫的会议大厅,要求议会兑现诺言,要求对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波兰给予军事援助,要求采取断然措施消除失业和贫困,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部;他们企图驱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但5月15日的示威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他曾提出向富人征收10亿税款)、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这次革命行动失败后,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废除国家工场(见注124)的措

- 施,实施了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封闭了许多民主派俱乐部。1849年3月7日至4月3日,在布尔日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巴尔贝斯被处以无期徒刑,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60、138、179、748、750。
- 37 1848年5月15日,那不勒斯国王斐迪南二世镇压了那不勒斯的人民起义,解散了议会和国民自卫军,取消了1848年2月在群众压力下实行的一些改革。1848年1月斐迪南炮轰巴勒莫,同年9月又炮轰墨西拿。所以被人们称为“炮弹国王”。——60、723、742、751。
- 38 指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无产阶级起义。这次起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起义遭到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镇压。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莱阿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被处死刑。起义失败后,保守的帝制派的地位更加巩固。——61、63、139、150、161。
- 39 指1848年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法兰克福国民议会9月16日批准马尔默停战协定(见注30)是这场人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曾有1000多人参加街垒战,起主要作用的是工人协会和体操协会的成员。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取得了议会中占多数的自由派的同意,镇压了这次起义。——62。
- 40 1848年10月6日维也纳人民起义是由于大资产阶级所支持的保皇派试图取消1848年奥地利三月革命的成果、恢复专制制度而引起的。德国皇帝派遣维也纳守备部队征讨革命的匈牙利的命令是起义的直接导火线。经过1848年10月24日到11月1日的激烈战斗,起义最后被德国政府军队镇压。——63。
- 41 指1848年4月1日奥地利政府公布的新闻出版暂行条例。该新闻出版法规定必须交纳大量保证金才能取得出版报纸的权利。由于保留书报检查制度并且规定“在新闻出版方面犯罪”的人必须交由行政法庭(而不是陪审法庭)审判,政府官员就有可能禁止任何一本著作的出版。——64。
- 42 1848年4月25日宪法规定在选举议会方面实行苛刻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居住资格限制,决定建立两院,即下院和上院,并保留各省的等级代议机

关。宪法将行政权和军权交给皇帝,并授予皇帝对两院通过的法律的否决权。

1848年5月11日选举法剥夺了短工和仆役等的选举权。上院议员一部分由皇帝任命,另一部分则按照两级选举制从纳税数目最多的人中间选举。下院的选举也实行两级制。——65。

- 43 根据约翰大公的决定,1848年7月22日在维也纳召开了奥地利制宪议会会议。根据民主派议员的提议,奥地利议会1848年7月31日发出请愿书,要求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无条件地返回维也纳。当年8月12日斐迪南一世回到维也纳。——66。
- 44 指1848年10月6日成立的帝国议会常设委员会,最初有10名议员参加。该委员会由温和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阿·费希霍夫主持。——69。
- 45 1849年4月19日,奥军在纳迪—夏尔洛被击溃,1849年4月26日,奥军撤出科莫恩(科马罗姆),当时匈牙利军队司令部和匈牙利革命政府没有组织力量追击向维也纳方向撤退的奥军,而是去围攻布达。恩格斯认为,这个决定给匈牙利革命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因为它使奥军在沙皇军队开始入侵匈牙利以前得以发动新的进攻,最终导致匈牙利军队在1849年8月13日在维拉戈什向派来镇压匈牙利起义的沙皇军队投降。匈牙利军队当时还有战斗力,并且受到匈牙利革命群众的积极支持,它的投降是由总司令戈尔盖的叛卖行动造成的,戈尔盖所依靠的是匈牙利资产阶级中和贵族中的反革命势力。另一方面,科苏特和革命政府的其他领导人在与戈尔盖的叛卖行为的斗争中也很不坚决。——74、370。
- 46 《新莱茵报》在1849年1—5月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匈牙利人民革命战争的文章。其中大部分出自恩格斯的手笔。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匈牙利的斗争》,发表在该报1849年1月13日第194号。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的最后一号上,发表的是恩格斯的总结性文章《匈牙利》。——74。
- 47 东罗马帝国指拜占庭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东罗马帝国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地中海东南岸地区,其首都是君士坦丁堡。1453年土耳其军队占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中国史籍中称东罗马帝国为拂菻或大秦。——76、89。
- 48 兰开斯特学校是以英国教育家约·兰开斯特的名字命名的贫民子弟学

校。在这些学校中实行学习互助制度,年龄较大和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帮助其他学生学习,以弥补师资的不足。19世纪上半叶,英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曾经广泛建立兰开斯特学校。——76。

- 49 1637年约·汉普登(下院议员,后来成为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拒绝向皇家收税官交纳一种未经下院批准的捐税——“造船费”,并且在法庭上坚持英国人有抗交皇家非法征收的捐税的权利。就汉普登拒绝纳税一事进行的审判使英国社会中反对专制制度的情绪更加高涨。

美国人反对英国政府在殖民地征收捐税的斗争,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战争(1775—1783)的序幕。1766年英国议会被迫取消前一年开始征收的印花税;后来美国人宣布抵制交纳间接税的英国商品。1773年英国强行向美国输入交纳高消费税的茶叶,货物在波士顿港口被销毁。这些冲突导致了美洲殖民地举行反对英国的起义。——79。

- 50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于1848年11月15日通过的一项决议。决议指出:“只要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继续在柏林召开会议,政府就无权动用国家的资金并征收捐税。本决议从11月17日开始生效。”(见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45号特刊发表的《不再纳税!》一文)11月15日的会议是议员们在柏林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12月初,一部分议员,主要是右翼议员已集中到了勃兰登堡。12月5日,国王发布了关于解散国民议会并实施钦定宪法的敕令。至此,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即告成功。——79。

- 51 旺代是法国西部的一个省。1793年春季,该省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在贵族和僧侣唆使和指挥下举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暴动,围攻并夺取了共和国军队所防守的索缪尔城。暴动于1795年被平定,但是在1799年和以后的年代中又多次试图叛乱。旺代因此而成为反革命叛乱策源地的代名词。——85、230。

- 52 无能的中央“政府”指根据法兰克福国民议会1848年6月28日决定成立的由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组成的临时中央政府。该政府没有财权、军权等任何实权;唯一能做的就是支持德国各邦君主推行反革命政策。——88。

- 53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演出的皇帝滑稽剧,指1848年3月21日在力图恢复国王权威的普鲁士资产阶级阁员们的倡议下,在柏林举行的普鲁士国

王出巡的盛典。与此同时还举行了要求德国统一的游行示威。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沿柏林的街道巡视，臂上戴着黑红黄三色臂章——德国统一的象征——并且发表了假爱国主义的演说，把自己装扮成“德国自由和统一”的捍卫者。当天他发布了《告陛下的臣民和德意志民族书》，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他答应成立等级代议机构，实施宪法，确立内阁责任制，规定公开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以及陪审制等。——91。

- 54 各邦君主会议是1849年5月17日在柏林召开的有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巴伐利亚和符腾堡的君主参加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修改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拟定的所谓帝国宪法。5月26日会议结束时，普鲁士、萨克森和汉诺威的国王缔结了协定（“三个国王的联盟”），到1849年9月共有29个邦加入了这个协定，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德意志邦。帝国的摄政由普鲁士国王充任，议会由两院组成。“联盟”是一次使普鲁士君主制在德国取得霸权的尝试。但是，在奥地利和俄国压力下，普鲁士不得不退却，并于1850年11月退出了“联盟”。——95。
- 55 莱茵普鲁士各市议会代表会议于1849年5月8日在科隆召开。代表们明确主张重新召开第二议院会议，赞成1849年3月28日的德意志帝国宪法，反对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的政府。——96。
- 56 1849年5月26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第228次会议讨论一个措词极为温和的《告德国人民书》时，威·沃尔弗发表演说，要求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并且说“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结果被哄下台。——100。
- 57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没有写成。1896年的英文版以及后来的许多版本都收录了恩格斯的《最近的科隆案件》（见本卷第563—570页）一文，把它作为最后一篇。实际上它并不属于《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112。
- 58 马克思的这篇为揭露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在伦敦的活动而撰写的文章可能写于1851年8月下半月，马克思以书信的形式寄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报人埃布讷，希望通过他的关系予以发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埃布讷原是奥地利秘密警察机构的情报人员。他将马克思这篇文章的抄件寄给了维也纳的奥地利内务部。这份抄件

后来转到维也纳国家档案馆。1956年首次发表于《奥地利国家档案公报》维也纳版第9卷第263—272页。

以往,这篇文章作为书信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书信卷。但是从档案上的批语来看,这是马克思准备直接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之加上标题编入本卷。——113。

- 59 《石印通讯》刊登的这篇文章是一封伦敦来信,信中说,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于1851年7月27日召开了各派别主要代表人物的大会。为解决各派之间的纠纷、维护各派之间的团结,会议通过了为谋求共同利益建立一个组织的决议;同时决定不设立代表委员会,以防止流亡者在德国以反对党领袖自居。马克思派是唯一没有出席大会的一派。

这个“完整的组织”每周召集一次会议。每星期五晚上在温德米尔大街14号召开会议时,除非有人介绍,陌生人是不能参加的。该组织认为有些问题必要时可在一般代表中间进行讨论。——113。

- 60 柏林协商派是指革命时期为了根据同王室达成的协定制定宪法而于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113。

- 61 民主派中央即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它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一个国际性的组织。马志尼的倡议曾得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还有赖德律-洛兰、达拉什和科苏特。这个无论成分和思想都极其复杂的组织存在的时间不长。由于意大利和法国民主派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该委员会于1852年3月实际上已经瓦解。马克思在《时评(三)》中批判了该委员会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113、346、478、720。

- 62 德国中央委员会即德国事务委员会。关于阿·卢格1851年春在伦敦建立德国中央委员会的活动,见《流亡中的大人物》第10章和第11章(见本卷第359—376页)。——114。

- 63 “团结友爱日”指1851年2月24日,在这一天为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三周年,路·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泰尔米、亚当以及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流亡者在伦敦举行了国际宴会。——116、362。

- 64 水晶宫,用金属和玻璃构成,是为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建造的。——118、317、375。
- 65 阿·卢格在1851年7月4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说:“我们计划建立一个俱乐部或者协会,……如果你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对此感兴趣,请参加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见马克思1851年7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119。
- 66 嘉布遣会,又译卡普勤会。1525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于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分支。卡普勤为意大利文Cappu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的意思。该会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119。
- 67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对德国警察当局从1851年5月起在各地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马克思1851年10月4日写出这篇声明,当天分别寄给《总汇报》和《科隆日报》。1851年10月9日《科隆日报》发表了这篇声明的全文。《总汇报》则在一个多星期之后才发表,而且还删掉了某些字句。——122。
- 68 指在科隆逮捕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家勒泽尔等人的事件。这次逮捕是普鲁士警察当局于1851年5月间继萨克森当局在莱比锡逮捕同盟特派员诺特荣克之后进行的。普鲁士政府企图通过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判来破坏无产阶级的独立运动。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见本卷第471—545页)揭示了科隆案件的实质。——122。
- 69 马克思于1851年3月底4月初与威·倍克在伦敦相识。人们把她当作1848—1849年匈牙利革命战争期间拉·科苏特的情报员。恩格斯打算详细地描写这次战争,马克思与她会面是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有关资料和特殊细节。——122。
- 70 威·倍克1851年8月底因诈骗嫌疑在伯明翰被捕,预审前突然死亡。在她的证件中找到了她在1851年5月伦敦世界博览会的头几个星期为英国警方从事间谍活动的凭据。她还有奥地利间谍的嫌疑。关于她神秘地死亡以及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问题报纸曾作过详细报道。——122。
- 71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针对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撰写的一部评述法国政局的著作。

1851年12月2日政变后不久,马克思动笔撰写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马克思经常同恩格斯交换看法。除了英法两国的书刊和官方资料之外,马克思还利用了寄自巴黎的私人书信。这部著作原来准备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约·魏德迈在美国筹办的德文周刊《革命》上连续发表。最初计划大致写三篇,但在撰写过程中不断扩充,最后共写了七篇,于1852年3月20日前后完稿。《革命》周刊1852年1月只出了两期,因经济困难而停刊。1852年5月,魏德迈以单行本形式将这部著作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出版,然而,他在扉页和自己写的前言中误将标题写成了《路易-拿破仑的雾月十八日》。

1869年,这部著作由汉堡出版商奥·迈斯纳在德国汉堡再版。再版前,马克思重新审订了原文。改正了大量的印刷错误,删去了重复的语句,省略了某些段落,把书名改正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并亲自写了第2版序言。这里发表的中译文是根据1869年的版本译出的。马克思对1852年版本所做的重要改动,均在脚注中作了说明。

马克思逝世后,这部著作于1885年6月在汉堡出版了第3版。这个版本由恩格斯负责编辑,对第2版作了少量修辞上的改动。1891年这部著作被译成法文,当年1月7日至11月12日分32节连续发表在法国工人党机关报《社会主义者报》上。同年还在法国利尔出版了单行本。另外,1889年出版了波兰文译本,1894年出版了俄文译本。

1930年5月,上海南强书店出版了这部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译者是陈仲涛,书名译为《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法国大革命后共和八年雾月十八日,即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第一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1851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号称拿破仑第三。马克思给自己的这部著作冠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一标题,显然含有讽刺意味。——127。

- 72 马克思是指黑格尔在《历史哲学》第3部第2篇《从第二次普尼克战争到皇帝当政时期》中的论述。黑格尔指出,盖·尤·凯撒消灭共和国和建立个人独裁是历史的必然。所以他认为,布鲁图斯、卡西乌斯和西塞罗把凯撒实行个人独裁看成是他的个性所致,以及不杀凯撒便不能恢复共和国的观点是错误的。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如果某种国家变革重复发生,人们总会把它当作既成的东西而认可。这样就有了拿破仑的两次被捕,波旁王

室的两次被驱逐。由于重复,开初只是偶然和可能的东西便成了现实和得到确认的东西了”。——131。

- 73 1793—1795年的山岳党,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革命民主派,因在国民公会开会时坐在大厅左侧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成员大都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1792年10月,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的同义语。

1848—1851年的山岳党,指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集合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领袖人物为赖德律-洛兰、皮阿等人。以路·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也参加了这一党。他们自称是1793—1795年法国国民公会中的山岳党思想的继承人。1849年2月后该党又称新山岳党。——131、158、731。

- 74 指路易·波拿巴流亡伦敦期间曾自愿充当特别警察。这些特别警察是由平民组成的警察后备队,他们曾帮助正规警察驱散1848年4月10日的宪章派示威队伍。伦敦的特别警察代替小个军士指路易·波拿巴代替拿破仑第一。——131、149。

- 75 1800年6月14日,拿破仑的军队经圣伯纳德山口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北部的马伦戈击溃奥地利将军梅拉斯的军队。这一决定性胜利最后导致英、俄、奥等国反法同盟的解体。——131。

- 76 指1851年12月至1852年1月间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当局引渡法国共和派流亡者而发生的法国和瑞士两国之间的冲突。——131。

- 77 圣安德烈勋章是沙皇俄国的最高勋章。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指路易·波拿巴需要得到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承认。——131。

- 78 使徒保罗是圣经中的人物,原名扫罗,是虔诚的犹太教徒。据《新约全书·使徒行传》记载,当他前往大马士革追捕基督教徒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显现,嘱他停止迫害基督徒。他从此转信耶稣基督,后来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被派往各地传教,改名保罗。《新约全书》中的《保罗书信》传说为他所写,其主要思想成为基督教教义和神学的重要依据之一。——132。

- 79 哈巴谷是圣经中12个所谓小先知之一。他以其诗一般热情的话语为人们

所称道。约翰·洛克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处事注重实际而缺少诗意，只相信人的理智。在这里马克思把哈巴谷当作洛克的对立面。——133。

80 1848年12月10日，路易·波拿巴经大选成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134、750。

81 “惋惜埃及的肉锅”出典于圣经传说：被奴役的以色列人逃离埃及，行至旷野，饥饿难忍，于是开始抱怨摩西，说他不应该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因为他们在埃及虽然世代为奴，但毕竟可以围着肉锅吃饱肚子。（参看《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6章第1—3节）“惋惜埃及的肉锅”后来逐渐成了一句谚语。——134。

82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出典于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上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意就是：这里就是最主要的，你就在这里证明吧！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这句话是上面那句话演变而来的。罗陀斯在希腊语中既是岛名，又有“玫瑰花”的意思。黑格尔在《法哲学》一书的序言中曾使用这种说法。——136、762。

83 按照1848年11月4日宪法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任期为四年，新总统的选举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将离任的总统不能参加竞选。1852年5月的这一天，路易·波拿巴的总统任期届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特别是流亡者，希望民主党派在这一天能够上台执政。——136、213。

84 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ilioi，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耶稣再生和在地球上建立公正、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在基督教早期这种信仰流传很广，后来经常出现在中世纪的各种教派的学说中。——136。

85 卡皮托利诺是罗马城市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那里建有尤诺纳教堂等。据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时，尤诺纳教堂里鹅的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136。

86 指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正统派是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奥尔良派支持在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年)统治法国的奥尔良王朝，代表了金融贵族

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年),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联合组成“秩序党”。——136。

- 87 蓝色共和党人指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其机关报是《国民报》,故又称《国民报》派,亦称三色旗共和派、纯粹的共和派。1848年革命时期,这一派的领导人参加了临时政府,后来靠卡芬雅克的帮助策划了六月大屠杀。红色共和党人指其他各种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136。
- 88 “非洲的英雄”指曾经参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法国军官。在法国,人们曾把他们称作“非洲人”或“阿尔及利亚人”。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卡芬雅克、拉莫里谢尔和贝多等将军,他们是国民议会中共和派集团的首领。——136、242。
- 89 “一切现存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这句名言出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137。
- 90 王朝反对派是七月王朝时期法国众议院中的一个以奥·巴罗为首的议员集团。这个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观点,主张实行温和的选举改革,认为这样就能避免革命并维持奥尔良王朝的统治。——137。
- 91 别动队是根据法国临时政府1848年2月25日命令,为对付革命的人民群众而成立的。这支由15至20岁的巴黎流氓无产者组成的队伍被利用来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当时任陆军部长的卡芬雅克将军亲自领导了这次镇压工人的行动。后来,波拿巴分子将其解散,他们担心波拿巴与共和党人发生冲突时,别动队会站在后者一边。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克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对别动队作过具体描述。——139。
- 92 相传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征讨马克森提乌斯时,中午时刻看见天上出现一个光芒四射的十字架,旁边有一行字:“在此标记下你必胜!”有人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君士坦丁从迫害基督教到皈依和保护基督教与这个杜撰的传说有关。——140、763。
- 93 维也纳条约即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召开的维也纳会议缔结的条约和协议。关于维也纳会议,见注8。——142。
- 94 1848年2月24日,路易-菲力浦让位给他的年幼的孙子巴黎伯爵。奥尔良

公爵夫人打算让法国众议院拥戴她来摄政，立其年幼的儿子为国王。但是，在起义人民的压力下，法国后来成立了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共和国。——143。

95 执行委员会是法国制宪议会 1848 年 5 月 10 日为了代替辞职的临时政府而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它存在到 1848 年 6 月 24 日卡芬雅克上台为止。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多半是温和的共和派。赖德律-洛兰是这个委员会中的左翼代表。——143。

96 法国 1830 年宪章是七月王朝的根本法。宪章在表面上宣布了国民的自主权并对国王的权力作了某些限制，但是，那些反对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官僚警察机构和苛刻的法律仍然原封未动。

关于“新的宪法”，马克思在《1848 年 11 月 4 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中作了专门评述。——144。

97 指路易·波拿巴的总统府邸。“极乐世界”的德文是“elysäische Gefilde”，与波拿巴的总统府邸巴黎的爱丽舍宫“Palais de l’Elysees”谐音。——146。

98 “兄弟，要准备牺牲！”(Frère, il faut mourir)是特拉伯天主教修道会修士见面时的问候语。特拉伯修道会成立于 1664 年，以严格的规章及其成员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而出名。——146。

99 近卫军是古罗马帝王或将相拥有的享有特权的武装力量，经常参与内讧，扶助主子登上王位。马克思在这里是指支持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法国部队和军官。——149。

100 指 1849 年 5—7 月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一事。1848 年秋，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境内重新掀起反对奥地利统治和争取统一的民族解放运动。1848 年 9 月 16 日，罗马爆发人民起义。1849 年 2 月 9 日在罗马由全民投票产生的制宪议会，废除了教皇的世俗权力并宣布成立共和国。政权集中在以马志尼为首的三执政手中。此后，庇护九世逃到那不勒斯要塞加埃塔，卡芬雅克同意他到法国避难。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庇护九世于 1848 年 12 月 4 日号召所有天主教国家共同镇压罗马革命者，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立即响应。法国政府于 1849 年 4 月派出了由乌迪诺将军率领的所谓意大利远征军。当年 4 月 27 日法军在意大利要塞港口奇维塔韦基亚登陆，4

月30日被朱·加里波第领导的罗马共和国军队击退,双方签订了停火协议,同年6月3日,乌迪诺撕毁协议,再次炮击罗马。法军于1849年7月1日占领罗马城。由于法国、奥地利和那不勒斯的武装干涉,罗马共和国于1849年7月3日被推翻。——149、370。

101 1832年路易·波拿巴在图尔高州加入瑞士国籍。——149。

102 卡利古拉是罗马皇帝(37—41年)。他执政后立即同元老院一起参加他的御用军的阅兵式并发表演讲。——153。

103 议会总务官原是古罗马元老院中的下级官员——财务官和档案官。这里是指在法国国民议会中负责经济、财务和安全保卫事务的官员委员会。

1851年11月6日,保皇党人议会总务官勒夫洛、巴兹和帕纳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把调动军队的权利授予议会。阿·梯也尔支持这项提案,波拿巴分子圣阿尔诺表示反对,经过激烈的辩论。这项议案于11月17日被否决。在表决中山岳派支持波拿巴派,因为他们认为保皇党人是主要危险。——154。

104 弗伦特运动是1648—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运动。弗伦特(Fronde)原意是一种投石器,曾为当局所禁,违令者应受惩罚;这个词的转义为破坏秩序、反对当局。因此,弗伦特运动又译投石党运动。

这个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高等法院弗伦特”(1648—1649年)。路易十四未成年期间,摄政太后安娜(1643—1653年)及首相马扎里尼的专横引起国内广大阶层的不满。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监督政府财政,取消各省巡按使,遭到拒绝,8月,巴黎市民起义支持高等法院,曾迫使王室逃出首都,1649年3月起义被政府军镇压,高等法院被迫与王室妥协。第二阶段称为“亲王弗伦特”(1650—1653年)。1650年1月后,以孔代亲王为首的贵族资产阶级在外国军队支持下,利用城乡人民运动,与专制政府抗衡,1653年被政府军击败。弗伦特运动的失败为路易十四当政后的专制独裁铺平了道路。——157。

105 策划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波拿巴统治集团和反革命报刊在1852年5月总统选举之前用无政府状态、革命阴谋、新的农民起义和侵犯私有财产来恐吓善良的遵纪守法的法国公众。前警察局长罗米厄所写的一本小册子《1852年的赤色幽灵》在这个宣传运动中起了特殊的作用。——157。

- 106 弗利基亚帽,或红色尖顶帽,是古代弗利基亚(小亚细亚)人的头饰。后来在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成为雅各宾党人的帽子样式,从此它就成了自由的象征。——157。
- 107 埃姆斯是德国威斯巴登附近的一个疗养地。法国王位追求者、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德·尚博尔伯爵经常住在此地。这里指的是1849年8月当地举行的一次正统派代表大会,尚博尔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60。
- 108 克莱尔蒙特是伦敦附近的一个城堡。二月革命后路易-菲力浦从法国出逃后曾住在该地。这里指的是奥尔良派同路易-菲力浦在那里进行的谈判。——160。
- 109 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见注73)在巴黎组织和平示威,抗议法国派兵镇压罗马共和国的违宪行为。示威被警察和军队驱散。
1849年8月10日,国民议会通过一项法令,将“6月13日暴乱的主谋和从犯”送交“布尔日最高法院”审讯。34名山岳派议员(其中包括亚·赖德律-洛兰、弗·皮阿和维·孔西得朗)被提交法庭审判。
6月13日,民主派和社会主义派报纸编辑部遭到搜查,其中许多报纸被查封。——163、166、750。
- 110 这项议会规则是由国民议会多数派制订的,它限制议员发言自由并赋予议长开除议员和扣除议员津贴的权利。1849年6月13日起义后的第十天,提出了这项规则的草案,经过多日的讨论,于1849年7月6日通过(见1849年6月25日巴黎《总汇通报》第176号第2174—2178页)。
当时国民议会议长是安·杜班。——163。
- 111 在巴黎1849年6月13日起义的影响下,里昂工人于6月15日举行了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经过8小时的战斗,最后被贝·马尼昂将军指挥的军队镇压下去。——164、208。
- 112 使耶利哥城墙应声倒塌的号角声出典于圣经传说:公元前2000年的下半年,占领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吹响用羊角制成的号角,使久攻不破的耶利哥城墙随之塌陷(见《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6章第2—5、12—20节)。——164。
- 113 据圣经传说,犹太王大卫是由撒母耳主持涂油仪式而登极的(见《旧约全书·撒母耳记(上)》第16章)。这里暗指路易·波拿巴在恢复罗马教皇庇

护九世的世俗权力之后,指望在他复辟称帝进入土伊勒里宫时,能得到教皇的支持。——168。

114 奥斯特利茨是现在的斯拉夫科夫的旧称。1805年12月2日,拿破仑第一在这里击败了俄奥联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68。

115 所谓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是指教皇庇护九世1846年就职时实行大赦,在教会国家开始实行广泛的改革,以及1848年3月在教会国家实施立宪制并建立某种程度的世俗内阁等做法。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第1版和1869年第2版中此处都错印成“教皇的非自由主义行动”,1885年出版第3版时改为:“教皇的自由主义行动”。——172。

116 制宪议会原来决定从1850年1月1日起取消葡萄酒税,但是在这个期限前10天,国民议会又通过了恢复这项税收的法律。关于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意义的论述,见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篇《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件的后果》。——174。

117 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国民议会讨论了教育法并在3月15日通过了这项法律。这项废除无神思想的教育法,实际上是把学校置于教士的控制之下。具体论述见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74。

118 伏尔泰是自然神论者,他对僧侣主义、天主教和专制政体的猛烈抨击曾对他的同时代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伏尔泰主义特指18世纪末期的进步的、反宗教的社会政治观点。——174。

119 《卫戍官》是维·雨果的一部描写德国中世纪生活的历史剧。在中世纪的德国,卫戍官是皇帝指派的城堡和地区的统治者。1850年5月1日,根据内务大臣的命令成立了立法议会新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它的17名成员属于奥尔良派和正统派,由于贪图权力和立场反动而被称之为卫戍官。——178。

120 新选举法即法国1850年5月31日通过的《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修正案》。该法案规定,在固定居住地居住3年以上并直接纳税的人才享有表决权。此项法案使300多万选民丧失了选举权,实际上废除了普选权。——180、181、260、732、750。

- 121 新的新闻出版法于1850年7月16日由立法议会通过。它大大提高了报纸出版者应交付的保证金数额,并开始征收印花税,小册子也不例外。新出版法是实际取消法国新闻出版自由的又一项反动措施。——180。
- 122 卡宴是法属圭亚那的首府,是法国流放政治犯的地方。政治犯在这里大批被折磨致死,故有“不流血的断头台”之称。——185。
- 123 指七月王朝时期路易·波拿巴企图实行政变的两次武装叛乱。1836年10月30日,他在一些赞成波拿巴主义的军官的帮助下策动了斯特拉斯堡驻防军的两个炮兵团的叛变,但几小时后叛乱分子就被解除了武装。路易·波拿巴本人被捕并被流放到美洲,1837年回到瑞士。因为他在举事时是瑞士国民,所以称之为瑞士兀鹰。1840年8月6日他利用法国波拿巴主义抬头的机会,和一小撮密谋家一起在布洛涅登陆,企图在当地驻防军中发动叛乱。这个企图也遭到了完全的失败。路易·波拿巴被判处终身监禁,但他1846年就逃往英国去了。——185、736。
- 124 国家工场是1848年二月革命结束后根据法国临时政府的法令仓促建立起来的。国家工场一律采取军事化方式进行生产,对工人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发给面包卡和军饷。临时政府这样做的目的的一方面是使路·勃朗关于劳动组织的思想在工人中丧失威信,另一方面是想利用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国家工场工人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但是这个分裂工人阶级的计划没有成功,革命情绪在国家工场中继续高涨,政府就采取减少工人人数,派他们去外省参加公共工程等办法来达到取消国家工场的目的。这些做法引起了巴黎无产阶级的极大愤怒,成了巴黎六月起义的导火线之一。起义者曾经利用了国家工场内已有的军事组织。起义被镇压后,卡芬雅克政府于1848年7月3日下令解散了国家工场。——186。
- 125 指波拿巴派的报纸。爱丽舍宫是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期间在巴黎的官邸。——188。
- 126 旧法国高等法院是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许多城市设有这种高等法院。作用最大的是巴黎高等法院,它办理国王敕令的登记,并具有所谓谏诤的权力,即对不合习惯和国家法律的敕令提出反对意见的权力。但是高等法院没有实权,因为只要国王亲自出席会议,敕令就一定要作为法律登记下来。法国大革命时期这种高等法院于1790年被

解散。——197。

127 贝勒岛是比斯开湾的一个岛。1849—1857年是法国囚禁政治犯的地方，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奥古斯特·布朗基也被囚禁在这里。——200、733。

128 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古希腊作家阿泰纳奥斯(2—3世纪)的著作《哲人宴》中的一个情节。埃及法老泰俄斯讥笑带兵前来支援他的斯巴达王阿革西拉乌斯身材矮小，他说：“山怀孕了，宙斯很吃惊，但山生了个老鼠。”阿革西拉乌斯回答说：“你把我看作老鼠，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狮子的。”——201。

129 指复辟时期正统派阵营中在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路易十八和让·维莱尔主张谨慎从事，而达尔图尔伯爵(1824年起为国王查理十世)和茹·波林尼雅克却不顾法国局势的变化，主张完全恢复革命前的秩序。

巴黎的土伊勒里宫是路易十八的皇宫，马松阁是宫里的建筑之一，复辟时期是达尔图尔伯爵的府邸。——207。

130 伦敦工业博览会是1851年5—10月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工商业博览会。——213、377、555、560。

131 布利丹的驴子这句俗语出自14世纪法国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在论述意志自由问题时讲的一个故事：一头驴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218、299。

132 12月4日轰隆的炮击声指波拿巴派的将军圣阿尔诺率军摧毁巴黎街垒的炮击声。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政变后，巴黎曾爆发了一次共和派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立法议会左翼议员和工人联合会秘密组织的领导人。12月4日夜在镇压这次起义时，波拿巴派的军队不仅用大炮摧毁了共和派构筑的街垒，还向过路人、窗口、阳台上的观望者任意射击。资产者的楼房，包括萨兰德鲁兹的房屋在内也遭破坏。——219。

133 长期国会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存在长达13年(1640—1653年)没有改选的一届英国国会。它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政府经费于1640年11月召开的，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成为立法机构和领导机构。1649年宣布处死国王，成立共和国。1653年4月，克伦威尔建立军事专政后解散。——219。

- 134 1851年12月共和派在巴黎举行了反对波拿巴政变的起义。外省农民、小城镇手艺人、工人、商人和知识分子等也纷纷起义。反抗波拿巴的运动波及法国东南部、西南部和中部20多个省,将近200个地区。但是,由于缺乏统一领导,起义很快就被警察和政府军队镇压。
- 马克思在这里把波拿巴当局对包括农民在内的共和派运动采取的报复措施,同19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当局对所谓蛊惑者采取的迫害行动作了类比。——229。
- 135 塞文是法国南部朗基多克省的一个山区,1702—1705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被称为“卡米扎尔”(“穿衬衫的人”)起义。由于新教徒遭受迫害而引起的这些起义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质。个别地方直到1715年还有这类起义发生。——230。
- 136 指正统派首领沙·蒙塔朗贝尔1850年5月22日在一篇演说中要求国民议会议员“同社会主义进行严肃的斗争”。——234。
- 137 西奈山是阿拉伯半岛上的山脉。据圣经传说,摩西在西奈山上聆听了耶和华的“十诫”。(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19—20章)——235。
- 138 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年)是在宗教改革运动开始后为巩固天主教会的已经动摇的地位而召开的。这次会议谴责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首领约·威克利夫和杨·胡斯的教理,消除了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并选出新的教会首脑以代替三个争夺教皇皇位的人。——236、382。
- 139 “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一概念原是指1845年左右德国流行的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见注18),马克思在这里是指大约1850年初法国的所谓社会民主派。——237。
- 140 指法国奥尔良王室的菲利浦摄政时期(1715—1723年)。当时路易十五尚未成年。——239。
- 141 德·日拉丹夫人关于“法国已不止一次地有过姘妇的政府,但是从来还没有过面首的政府”这句话,见1852年2月23日马克思致拉萨尔的信。——239。
- 142 特里尔的圣衣是保存在特里尔教堂里的天主教圣物,据说是耶稣受刑时脱下的。特里尔的圣衣是朝圣者的崇拜物。——240、369。

- 143 旺多姆圆柱(Vendome-Colonne)又称凯旋柱。它是为了纪念拿破仑第一的战功,于1806—1810年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修建的。
- 整个圆柱全部用缴获的武器上的青铜制成,顶上铸有一座拿破仑雕像,雕像在复辟时期被拆除。但在1833年又重新复原。1871年根据巴黎公社的决议,旺多姆圆柱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推倒。1875年圆柱又被资产阶级政府修复。——240。
- 144 这两篇关于英国的时事评论是恩格斯为魏德迈计划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而写的。恩格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1月底共写了四篇文章,前两篇在寄往美国的途中遗失,魏德迈只收到这两篇,但因杂志停刊未能发表。1852年11月,魏德迈曾把其中第一篇删节发表在《体操报》上。该报是德国民主派流亡者在纽约创办的报纸,魏德迈是编辑之一。
- 魏德迈曾打算《革命》复刊后发表这两篇文章,为此用罗马数字“I”和“II”给这两篇文章编号,并删去第一篇的作者署名和第二篇的标题《英国》。——241。
- 145 辉格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反对詹姆斯王位继承权的一批议员,被敌对的托利党人讥称为辉格。辉格(Whig)为苏格兰语,原意为盗马贼。辉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利益,曾与托利党轮流执政,19世纪中叶,辉格党内土地贵族的代表和保守党的皮尔派以及自由贸易派一起组成自由党。从此自由党人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241、412、415、422、441、591、596。
- 146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政变后,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勋爵在和法国驻伦敦大使谈话中,表示支持路易·波拿巴。因这一表态事先未征得辉格党其他阁员的同意,导致帕麦斯顿于1851年12月19日被撤职。英国政府与帕麦斯顿的观点实质上并没有分歧,它是欧洲第一个承认法国波拿巴政权的政府。——241。
- 147 卡弗尔人是欧洲殖民主义者对操班图语的南非各部族(主要是科萨人)的称呼。卡弗尔战争是指18—19世纪南非卡弗尔人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之间进行的战争。英国从1811年起在开普地区多次挑起武装冲突。这里所说的“英国武装力量近年来的英雄功绩”显然是指1846—1853年英国发动

- 的第五次反对卡弗尔人的战争。战争的头几年,当地居民多次打败英国军队。1851年,英国为侵占西非奴隶海岸,曾利用当地尤鲁巴部族的内讧,于当年12月在非洲登陆并用炮火袭击了拉格斯城,结果仍然没有征服当地居民。英国殖民主义者只是在1861年“购买”了拉格斯城以后,才在奴隶海岸站住了脚,为建立尼日利亚殖民地打下了基础,19世纪80年代初才占领了科萨部落居住的领土。——242。
- 148** 法国诗人贝朗瑞在他的一首歌曲《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中讽刺了复辟时期渺小、无能的法国统治者。据传说米尔米东人是南特萨利亚的一个部落,在特洛伊战争中,这个部落的战士曾在阿基里斯的率领下作战;“米尔米东”一词在法语中的意思是小胖子、矮子、渺小的人、无能的人。——245。
- 149** 托利党是英国的政党,于17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1679年,就詹姆斯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是否有权继承王位的问题,议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拥护詹姆斯继承王位的议员,被敌对的辉格党人讥称为托利。托利(Tory)为爱尔兰语,原意为天主教歹徒。托利党,一贯是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捍卫者,坚决维护国家制度中保守和腐败的体制,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曾与辉格党轮流执政。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托利党逐渐失去它先前的政治影响和在议会的垄断权。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进入议会。1846年废除谷物法削弱了英国旧土地贵族的经济基础,并造成了托利党的分裂。到19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在老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245、412、415、422、454、590、596。
- 150** 指导迦太基灭亡的布匿战争。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在公元前264—241年、218—201年和149—146年进行了三次布匿战争。
- 在第一次战争中,罗马人最初无力对付迦太基庞大的海军,后来他们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舰队,并靠这支配备有接舷跳桥的舰队取得了胜利。结果迦太基被迫把对西西里和附近岛屿的统治权让给了罗马。
- 在第二次战争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率领雇佣军从西班牙出发向意大利北部进军。公元前218年10月汉尼拔在提契诺河打败了前去迎战的罗马军队的一支先头部队,同年12月又在特雷比亚河击溃了罗马的两支联合军队,汉尼拔突入意大利中部后,于公元前216年8月在阿普利亚的

坎纳又迎头击溃了罗马军队。然而,罗马军队在西班牙和西西里的胜利以及在北非的登陆,迫使迦太基元老院从意大利召回汉尼拔,从而使汉尼拔的胜利化为乌有。公元前 202 年,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败北。这次战争使迦太基丧失了舰队和所有非洲以外的领地(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等)并向罗马缴付巨额赔款。

第三次布匿战争的结果是,罗马人粉碎了迦太基的实力,消灭了迦太基国家,毁灭了迦太基城。——246。

- 151 在反对第一次反法同盟的战争(1792—1797 年)中,拿破仑·波拿巴因屡建战功,在 1796 年 3 月 20 日又被法国政府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拿破仑统率的法国军队当年就攻下了皮埃蒙特,占领了伦巴第。1797 年 1 月在向曼图亚进军途中又击败奥地利的几路大军,在胜利进军中于当年 5—6 月又占领了中立的威尼斯共和国,最后拿破仑在他所夺取的意大利北部土地上建立了南阿尔卑斯共和国。

在法奥双方签订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中,威尼斯共和国的一部分领土包括威尼斯城在内划归奥地利,作为交换,法国得到了除科隆以外的莱茵地区。——246。

- 152 指停泊在葡萄牙塔霍河河口的英国舰队。19 世纪,英国地中海舰队曾利用塔霍河河口作为印度航线的中间站。——247。
- 153 布洛涅兵营是拿破仑第一为实现入侵英国的计划,于 1803—1805 年在布洛涅地区建立的军事基地,他在这里集中了约 2500 只小运输船和 10—15 万名登陆战士。由于法国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被英军打败,以及 1805 年俄奥普等国参加的第三次反法同盟的建立,拿破仑被迫放弃了他的入侵计划。——248。
- 154 丹麦进攻埃肯弗德是 1848—1850 年丹麦和普鲁士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中的一次战役。1849 年 4 月 5 日,由 10 只船组成的丹麦分舰队,从海上向石勒苏益格的埃肯弗德发起攻击,以便陆战队登陆。分舰队被海岸炮兵的交叉火力击溃。——250。
- 155 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派于 1816 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协会得到自由贸易派的支持。自由贸易派认为,在和平条件下,英国通过自由贸易可以更充分地利用自己的工业优势,进而取得经济上和政治上的

统治。——251、456、557、562。

- 156 此处在手稿上加了一个编者注：“讨论帕麦斯顿撤职的文章，我们没有收到。显然它是从英国寄出后在途中遗失了。”此注可能是魏德迈加的。——251。
- 157 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是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人民宪章包括了宪章派的下列六条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和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
- 争取实现人民宪章的宪章运动是19世纪30—50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出现过三次高潮。由于资产阶级收买工人上层和工人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到50年代中期运动终于失败。宪章派的领导机构是“全国宪章派协会”，左翼代表人物是哈尼、琼斯等。恩格斯称宪章派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列宁把宪章运动称作“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上已经成型的无产阶级运动”(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292页)。——252、411、424、467。
- 158 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联合成立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合并法案取消了苏格兰议会，苏格兰在英国议会中获得几十个席位，但保留了苏格兰教会的自治权。——253。
- 159 1852年2月初，约·罗素勋爵在下院提出一项选举改革的新法案，以供讨论。但是，这项法案没有进行宣读，因为罗素本人后来建议推迟3个月再讨论，这表明，这项法案不再列入议程。马克思在1855年夏写的《约翰·罗素勋爵》一文中，分析了罗素这一提案的特点及其未能通过的原因。——253、441、637。
- 160 这封信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用英文写的。1852年1月28日恩格斯将此信寄给了马克思。第二天马克思将该信抄件寄给《泰晤士报》编辑部，但当时并未发表。抄件没有保存下来，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的这封信是恩格斯在1852年1月28日给马

·克思的信的背面所写的该信的草稿。

这封信第一次用德文发表于奥·倍倍尔和爱·伯恩斯坦编辑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53年)》1913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第290—291页。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3卷第313—314页。——256。

- 161 “纪律法”是1851年5月7日普鲁士当局颁布的、惩处法官渎职和将法官强行调离或解除职务的法律。——256、476。
- 162 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出12至23个“忠厚老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决定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257。
- 163 这组文章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商定由恩格斯为《寄语人民》而写的。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支持这家由琼斯在伦敦出版的宪章派周刊。第一篇文章大约写于1852年1月底至2月初之间，第二篇写于1852年3月21至22日之间，第三篇写于1852年4月5日至10日之间。这三篇文章发表于1852年2月21日、3月27日和4月10日的《寄语人民》第43、48和50号。它们都是匿名发表的。只有第一篇用了《去年12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这个标题，后两篇只注明“本刊外国通讯员来信”。从第三篇文章的结尾来看，恩格斯曾打算写续篇，但是，由于《寄语人民》1852年4月底停刊，这个想法未能实现。——259。
- 164 “禁口律”原指1819年英国议会通过的限制出版和集会等自由的六项法令。恩格斯有时借用“禁口律”这个词指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1848年8月9—10日，1849年7月27日，1850年7月)通过的一系列有关出版物的法律。这些法律规定，出版报刊要缴纳很高的押金，对书报征收印花税，对攻击“所有制原则和家族权利”以及“煽动内战”的出版物要严加惩处。这些法律实际上取消了法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260、432。
- 165 贝尔格莱夫广场一带是伦敦西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豪华居住区。——270。
- 166 指根据1852年1月22日路易·波拿巴的命令没收的奥尔良王室的财产。——271。
- 167 本文是马克思为斐·弗莱里格拉特的诗《致约瑟夫·魏德迈》第一部分写

- 的序言。这首诗是弗莱里格拉特应马克思的要求,为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革命》周刊而写的。由于《革命》周刊1852年1月停刊,这首诗预计要到1852年6月该刊复刊时才能在美国发表。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于1852年2月中旬计划在德国发表这首诗。为此,弗莱里格拉特请马克思写一篇序言。序言的原稿没有保存下来,因而无法证明弗莱里格拉特对原稿是否作过改动。本文连同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第一部分第一次发表在1852年3月7日《知识界晨报》第10号上。——272。
- 168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继1851年10月4日《声明》(见本卷第122—125页)之后,对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第二次公开表态。后来,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文中马克思又谈到这篇声明,并指出《科隆日报》驻巴黎记者、写过攻击马克思的通讯的贝克曼是普鲁士政治警察的密探(见本卷第494页)。——274。
- 169 1851年9月法国当局逮捕了1850年9月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出去的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属巴黎地方支部的一些盟员。这个集团无视现实状况,采取密谋策略,指望立即组织起义,致使法国和普鲁士警察当局能够依靠领导巴黎一个地方支部的密探舍尔瓦尔捏造了所谓德法密谋的案件。1852年2月,被捕者被判刑。舍尔瓦尔被安排越狱逃跑。马克思揭穿了施梯伯在科隆案件中捏造的用以证明被告参加了德法密谋的伪证(见本卷第485—500页)——274、555、560、566、776、795。
- 170 流亡者委员会,即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原名是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附属机构,1849年9月成立。马克思当选为委员会委员,1849年12月3日根据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人的提议,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参加了它的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流亡者委员会大多数成员都受到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影响,1850年9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委员会被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控制。——274、484。
- 171 《流亡中的大人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公开揭露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活动家(卢格、金克尔、维利希等人)而写的抨击性著作。1852年5月6日至27日,马克思和恩·德朗克在伦敦合作,由德朗克执笔,写出本著作第一篇。1852年5月底到6月21日,马克

恩到曼彻斯特,和恩格斯一起讨论,由恩格斯执笔,共同写出了本著作的第二篇至第十五篇。马克思返回伦敦后,由马克思接手稿口授,由他的妻子和德朗克笔录成一份付印稿。6月底将付印稿委托给一个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出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警察局的暗探,他把小册子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马克思不久便在1853年4月写的、发表在美国报纸《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上的文章《希尔施的自供》中公开揭露了这个曾一时迷惑了他的班迪亚的行为。

原稿没有标题。在当时的一些书信中提到这部著作时使用了《大人物》、《革命中的大人物》等不同的标题,使用最多的标题是《流亡中的大人物》。作者在世时,虽多次努力,但该著作一直没能出版。1930年,这一著作才第一次被苏共马列主义研究院译成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V卷中。收入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译出的。——277。

- 172 指18世纪德国文学中的感伤派盛行的时期。风行一时的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1776年出版)是该派这一时期的代表作。——279、313。
- 173 浮士德的两个灵魂,一个是高尚灵魂,象征对真善美的向往和永恒的求知欲;另一个是丑恶灵魂,象征与魔鬼结盟而产生的消极和虚无主义。——283。
- 174 即约翰·亨利希·荣克,施梯林是他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中主人公的名字,故又名荣克-施梯林,该小说于1778年出版,是伪善的虔诚的文学作品的典型。——295。
- 175 《小公鸡、小母鸡和小鸡蛋》是克·布伦坦诺的一篇童话。在德文中小公鸡(Gockel)和小母鸡(Hinkel)与莫克尔和金克尔的发音相似。——298。
- 176 格丁根的林苑协会是1772年在格丁根成立的一个德国学生和诗人的团体。因克洛普施托克的诗歌《山丘与林苑》而得名。协会主张重新起用德国抒情诗和民歌中感伤的、朴素的和自然的题材,以表达对德国社会状况的不满。该协会于1774年解散。——298。
- 177 当时德国行会中把那些既无师傅的权利又不是行会成员的手工业帮工的独立劳动称作非法独立经营。——304。

- 178 温克尔布莱希哀歌在这里指 1848 年在德国许多城市里召集的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根据德国经济学家卡·格·温克尔布莱希的空想理论,提出了恢复行会制度的纲领。1848 年 7 月 15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集了全德手工业者代表会议,制定共同纲领。由于师傅们不愿让帮工平等地参加代表会议,后者便自己组织了一个代表会议。但是,这个代表会议的纲领也是根据亲自参加这两个会议的温克尔布莱希的反动学说制定的。——305。
- 179 1849 年 6 月 29—30 日,巴登革命军和普鲁士军队在拉施塔特城下展开了最后一次激战,于 7 月 23 日无条件投降,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就此结束。见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 4 章《为共和国捐躯!》。——310。
- 180 金克尔的《1849 年 8 月 4 日在拉施塔特普鲁士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刊登在 1850 年 4 月 5 日和 6 日《晚邮报》(柏林)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曾尖锐地批评了金克尔的这个辩护词。——311。
- 181 英国国王狮心理查被他的对手奥地利大公莱奥波德俘获。根据传说,忠于他的吟游诗人布朗德尔探明了他被囚禁的地点,于 1194 年将其赎回,布朗德尔遂成为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314。
- 182 《金克尔的讲演。[署名]:一个工人》,载于 1851 年 5 月 17 日《宇宙》第 1 期第 3 页。1851 年 5 月 28 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全文抄录了这篇讲演。1852 年 6 月 11 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马克思又提到过刊登这篇讲演的《宇宙》。——317。
- 183 巴登战役指三次巴登起义。第一次起义是 1848 年 4 月 12 日爆发的德国共和派的武装起义。1848 年 4 月 2 日,以弗·黑克尔和古·司徒卢威为首的共和派少数为了抗议自由派多数的政策退出了预备议会。慑于共和运动蓬勃展开的巴登政府通过了关于扩大军队人数的决议,请求毗邻的德国各邦给以军事援助,并根据自由派分子马提的告密逮捕了共和主义者菲克勒尔。巴登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行动便成了起义的导火线,起义的领导者是黑克尔和司徒卢威,由于起义的准备不足,组织不力,4 月 24 日被镇压下去,黑克尔逃亡瑞士,后去了美国。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黑克尔起义。

第二次起义是1848年9月21日以司徒卢威为首的一批德国流亡者从瑞士进入巴登发动的。在巴登民主派武装队伍和当地市民自卫团的支持下,司徒卢威宣布成立德意志共和国。起义于9月24日被镇压下去,司徒卢威和许多起义者被捕,被判处长期徒刑,押解到巴登的布鲁赫萨尔城监狱。

参加过巴登起义的人后来加入了维利希于1848年11月在法国贝桑松组织的志愿部队。这支由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志愿部队到1849年初为止,一直领取法国政府的津贴。后来编入维利希军团,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于1849年5—7月参加了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军的战斗行动。这就是第三次巴登人民的起义。——318、321、390。

- 184 帝国宪法指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9年3月28日通过的德国宪法。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派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却遭到了普鲁士国王和其他德意志大邦君主的拒绝。结果当年5—6月在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巴登和普法尔茨爆发了支持宪法的起义。起义的领导者就是本文提到的大人物。1849年7月起义失败。恩格斯在《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评述了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318。
- 185 德国流亡者事务中央局是古·冯·司徒卢威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企图于1850年4月建立的组织,其目的是为了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相抗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中彻底地揭露了他们阴谋分裂的活动。——319。
- 186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鲁厄成立的,该俱乐部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对政府中右派势力加强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共和主义者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并吸收激进分子参加政府的工作。俱乐部的成员们在建议被否决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妥协。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支持,强行解散了“坚决前进俱乐部”。——320、325、374。
- 187 鲁·施拉姆的弟弟康·施拉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

- 的朋友。——320。
- 188 德国大学里传统的四个系是神学系、法学系、医学系和哲学系。——321。
- 189 法兰西共和国历是法国从1793年10月24日至1806年1月1日期间为取代格雷哥里历所采用的历法。为消除基督教的影响,该历法日和月的名称都取自自然界和不同的时令。如雾月、果月等。附在格雷哥里历日期上的圣徒名字则代之以种子、树木、花和水果的名称。——324。
- 190 蛊惑者指19世纪2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反政府运动的参加者。他们组织政治性的示威游行,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1819年大学生桑德刺杀神圣同盟的拥护者和沙皇代理人科采布成了镇压蛊惑者的借口。1819年8月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这之后“蛊惑者”一词开始流行开来。——324。
- 191 阿·卢格遵守的一种原则,见他的《小说家。以主人公日记中数十个教训组成的故事》(1839年莱比锡版)。马克思1844年3月底出于世界观和政治方面的原因就与卢格断绝了关系。他对卢格关于婚姻的观点,在未保存下来的1844年3月26日的信中也持否定态度,认为卢格的观点是“不人道的”和“庸俗的”。这里所说的通过婚姻给自己奠定了“物质基础”是指卢格于1832年5月与路·迪法尔结婚,1833年秋,迪法尔死后,他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1834年8月,又与亡妻的表妹阿·尼茨施克结婚。——325。
- 192 皇宫是巴黎的一座宫殿。17世纪初为红衣主教黎塞留修建的,后来,成为奥尔良王室的财产。法国革命时期曾多次易主更名。18世纪末这里成了商场、剧院等大众娱乐场所。——329。
- 193 1845年1月11日,法国内务大臣迫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颁布了将《前进报》编辑和撰稿人驱逐出境的命令。遭到驱逐的有马克思、卢格、伯恩施太因和贝尔奈斯。后来,在萨克森公使馆的干预下收回了对卢格的驱逐令,他不是《前进报》撰稿人。伯恩施太因答应不再继续将每周出版两期的《前进报》以月刊的形式办下去而被允许留在巴黎,贝尔奈斯也获准留在巴黎,但对马克思的驱逐令依然没有撤销,马克思于1845年2月1日在毕尔格尔斯的陪同下离开了巴黎。——330。
- 194 “光明之友”是德国1841年产生的一个宗教派别,它反对在官方新教教会

- 中占统治地位的、以极端神秘和虚伪为特征的虔诚主义。它是 19 世纪 40 年代德国资产阶级对德国反动制度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1846 年,“光明之友”运动引起了官方新教的分化,分化出来的部分组成了“自由公理会”。——330。
- 195 暗指阿·卢格《我们的哲学和我们的革命。给芬尼·莱瓦尔德的一封信》,见 1851 年 5 月 27 日—6 月 9 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 114—125 号。——330。
- 196 讽指阿·卢格《维护人道主义的公开信》,见 1846 年《模仿者》(莱比锡)第 3 卷第 244—276 页。——330。
- 197 费尔巴哈刚刚“重新发现了人”,指 1841 年出版的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331。
- 198 关于卢格退出议会的原因,见他的《公开信。致我的选民,布雷斯劳市的法兰克福议会选举人。1848 年 10 月 16 日于柏林》,该信载于《9 月 7 日以来的普鲁士革命和 11 月 10 日以来的反革命。日记》1849 年莱比锡版第 23—24 页。——332。
- 199 指 1848 年 10 月 26—30 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德国各城市的民主派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 220 人。大会选出了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包括德斯特尔、赖辛巴赫、赫克扎梅尔),讨论了关于宪法原则的问题,并通过了人权宣言。但是,由于代表的成分复杂,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存在着严重分歧。10 月 29 日大会通过了由卢格起草的呼吁书《告德国人民书!》,呼吁书中要求德国各邦政府援助革命的维也纳。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告德国人民书”》一文,对这个呼吁书作了尖锐的批评。——332。
- 200 1848 年 11 月 12 日,柏林宣布戒严,禁止政治性结社和公开集会,所有出版许可证都要接受审查。戒严状态持续到 1849 年 7 月底。——333。
- 201 1849 年 5 月 3 日,在德累斯顿爆发了武装起义。起义的原因是由于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并与普鲁士联合,以武力压制人民。起义的领导者是契尔奈尔和巴枯宁等人。起义者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并在 5 月 4 日国王出逃后成立了临时政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人相信与国王达成的和平协议,实行了休战。然而军队撕毁和平协议,于 5 月 5 日

- 向缺乏武装的人民群众进攻。1849年5月8日起义被军队镇压下去。——333。
- 202** 三月同盟革命指1849年5月12日至7月23日的第三次巴登起义。三月同盟是主要在德国南部和中部成立的各种民主同盟的统称。它们加入了中央三月同盟。中央三月同盟是1848年11月底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翼议员为了集结激进小资产阶级和左翼自由资产阶级各派力量而建立的。其宗旨是保卫德国1848年三月革命的成果。同盟的领导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福祿培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来代替革命行动，不是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是幻想走议会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8年12月起就已经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和许多著作中尖锐地抨击同盟的领袖们对反革命斗争畏首畏尾、犹豫不决。1849年春，革命力量脱离了中央三月同盟。——337。
- 203** 比林格斯盖特是伦敦的鱼市，以市场商贩粗野的吵骂而恶名昭著。——339。
- 204** 1811年，在德国的法国占领区内采用法国的诉讼程序。莱茵省在1815年归并于普鲁士后，仍沿用这种诉讼程序，法国的诉讼程序后来才逐渐地被普鲁士司法制度所取代。——340。
- 205** 贵格会（正式名称是“教友会”）是基督教新教的一派，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产生于英国，在北美也流传很广。教友会信徒反对官方教会和它的仪式，鼓吹和平主义思想。19世纪20年代产生的主张革新教友会信条的拥护者被称为“湿的”贵格会（区别于信奉正统教义的贵格会——“干的”贵格会）。——345、525。
- 206** “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信天主教，他于是便说了这句话。——347。
- 207** 水上波兰人原指17世纪以来居住在上西里西亚、在奥得河上以运送木材为生的波兰人，后来成为德国人对几百年来受普鲁士统治的上西里西亚波兰居民的称呼。——347。
- 208** 布龙采尔大战是黑森选帝侯国争端中普鲁士先头部队和奥地利先头部队之间于1850年11月8日发生的一次小冲突。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争端是为了争夺对黑森选帝侯国的控制权，以便镇压那里日益高涨的反对选帝

- 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及其大臣的制宪运动。奥地利得到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的支持，普鲁士被迫作出了让步。对这次争端的评价，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时评(三)》。——347、361。
- 209 马克思和恩格斯借以进行讽刺的这些词句出自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告德国人民书!》(载于1850年11月22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29号第4版)。——348。
- 210 和平代表大会即1850年8月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起显著作用的人物是美国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伊·伯里特，英国自由贸易派的领袖科布顿，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日拉丹，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施塔特的前自由派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教友会的代表，以及一名印第安部落的首领。——348。
- 211 希腊于1821年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群众性的起义席卷全国。1822年1月，在厄皮达尔夫召开的国民议会上宣布了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351。
- 212 1830年11月至1831年10月波兰发生了民族解放起义。起义军最初赶走了沙皇军队，但起义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波兰小贵族手里，他们由于拒绝满足农民群众废除农奴依附地位的要求，未能把农民吸引过来，最后遭到沙皇的残酷镇压。——351。
- 213 汉巴赫大典于1832年5月27日在巴伐利亚邦普法尔茨的一个城堡汉巴赫附近举行，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前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集会，参加者约3万人。集会发言人大多数提出了民主的和带有共和倾向的要求，号召反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力量联合起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这里首次获得群众基础，他们要求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并联合法国、波兰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民主力量组成欧洲民主联邦；他们还宣布了以武装抵抗对付暴力镇压的革命原则。——351。
- 214 法兰克福骚动指1833年4月初发生在美国河畔法兰克福的袭击岗哨事件。一群多半是学生的激进分子企图占领法兰克福，推翻联邦议会，宣布成立共和国，以此来反抗联邦议会在汉巴赫大典之后所采取的警察措施。但是，他们只袭击了岗哨，很快就被军队驱散。——353。

- 215 硫磺帮最初是 18 世纪 70 年代耶拿大学学生联合会的名称,因其成员捣乱生事而恶名昭著。后来,“硫磺帮”一词便成了一切成帮结伙的犯罪分子和流氓无赖的同义语。——353。
- 216 1834 年,马志尼组织的一支各国流亡起义者部队,在拉莫里诺的指挥下,由瑞士攻入萨瓦,试图以此促使皮埃蒙特共和派举行起义。这支流亡者部队最后被皮埃蒙特的军队击溃。——353。
- 217 “青年欧洲”是各国政治流亡者组织的国际联合会,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 1834 年在瑞士成立,1836 年解散。“青年欧洲”由“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等民族组织组成,其宗旨是在欧洲各国建立共和制度。——354。
- 218 “青年德意志”是德国政治流亡者和流动的手工业帮工 1834 年在瑞士伯尔尼成立的共和派秘密组织,是青年欧洲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在瑞士开展活动,使在瑞士的众多德国地区性组织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1836 年曾因警方的搜捕而解散,19 世纪 40 年代恢复活动,1845 年再次解散。——354。
- 219 “青年意大利”是 1831 年由马志尼建立的一个秘密组织,主张建立意大利共和国,在实现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从 1831 年起秘密出版杂志《青年意大利》。1834 年,马志尼倡议成立“青年欧洲”,“青年意大利”成为它的一个分支,于 1848 年解散。——354。
- 220 邦迪埃拉兄弟是意大利籍奥地利海军军官,“青年意大利”的成员。他们于 1844 年 6 月率领一支意大利爱国者队伍在卡拉布里亚登陆,目的是要在意大利发动起义,反对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和奥地利的统治。由于队伍中有人叛变,当局俘虏了远征队的参加者,邦迪埃拉兄弟遭枪杀。——356。
- 221 奥古斯滕堡党指德国奥古斯滕堡王朝的拥护者,该王朝否认丹麦国王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统治权。——357。
- 222 华沙会议是根据俄国的倡议 1850 年 10 月在华沙举行的有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参加的会议,会上沙皇尼古拉一世以仲裁人身份,裁决普奥在统一德国问题上的争端。普鲁士在俄、奥压力下被迫放弃在它领导下建立德意志各邦联盟的计划。——361。

- 223 “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出自汉泽曼《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省议会的演说》，见《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第3部分：《辩论。根据速记记录整理》1847年柏林版。——362。
- 224 指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它是临时政府在工人压力下于1848年2月28日成立的。二月革命后，巴黎工人要求临时政府采取组织劳动的措施和设立劳动部。临时政府中大多数成员予以拒绝，路·勃朗和工人阿尔伯以退出政府相威胁。多数派由于害怕爆发新的起义而作出让步，同意成立政府工人问题委员会，由路·勃朗主持工作。这个委员会设在卢森堡宫，又称卢森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国民议会召开之前研究社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但是，它既无经费又无权力，实际活动仅限于调停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冲突。1848年5月15日巴黎人民群众游行示威后，该委员会于1848年5月16日被撤消。——363。
- 225 指奥·布朗基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给伦敦流亡者委员会发出的祝酒词。在祝酒词中，布朗基把包括路·勃朗在内的1848年临时政府中的委员看作威胁未来革命的暗礁，所以1851年2月24日的群众大会（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企图向公众隐瞒这篇祝酒词，但1851年2月27日巴黎出版的《祖国报》第58号及其他许多法国报刊都登载了这篇祝酒词的全文。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它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加了按语（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奥·布朗基祝酒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附祝酒词全文]）。祝酒词德译文发行量很大，并在德国和英国广为流传。关于隐瞒祝酒词的一些情况，见1851年3月17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363。
- 226 圣经中哀悼耶路撒冷被毁的《耶利米哀歌》，在文学作品中被作为悲叹和诉苦的例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用圣经中的先知耶利米的名字来称呼金克尔。——367。
- 227 预备议会是指1848年3月31日至4月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德意志各邦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代表属于君主立宪派。预备议会作出了召开全德国国民议会的决定，并制定了《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草案，该草案仅仅宣布了德国公民享有某些权利和自由，并未触及当时德国半封建专制制度的基础。——368。
- 228 《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中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一世纪。该书

- 被认为是圣徒约翰所著,所以又称《约翰启示录》。《启示录》中关于“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神秘预言,在中世纪经常被用来掀起异教徒的人民运动,后来又被教会用来恐吓人民群众。——369。
- 229 胡格诺教徒是法国加尔文派新教教徒的别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胡格诺教兴起于法国,其教徒曾长期遭受迫害。1562—1598年,胡格诺教徒和法国天主教徒之间发生宗教战争。1598年,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了宽容胡格诺教徒的南特敕令。然而,1685年10月,路易十四宣布撤销南特敕令,许多胡格诺教徒被迫流亡国外,仅在德国就出现了约240个法国移民区。流亡者给德国带来了法国文化和众多的手工行业,如织造业、钟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等。——380。
- 230 这里的自由贸易派指1848年尤·孚赫、亨·贝塔、爱·维斯和普林思-史密斯等人在柏林成立的德意志自由贸易协会。——380。
- 231 法国革命的战役是指1792—1801年为保卫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而进行的战役。——381。
- 232 根据中世纪德国传说,圣杯是一只由绿宝石雕刻而成具有神奇力量的宝杯,骑士帕西沃历尽艰辛找到了它,并成了它的守护者。——386、406。
- 233 “两个肠卜者不可能互相对视而不发笑”是西塞罗在《论预言》一书中引用的老卡托的一句话。肠卜者是古罗马查看祭神牺牲品的内脏而卜神意的预言者。——394。
- 234 指德国艺术家考尔巴赫于1834—1837年间创作的一幅名画《匈奴人之战》。此画描绘了451年卡塔洛尼平原战役中阵亡战士灵魂之间的战斗场面。——400。
- 235 这篇手稿是马克思为发表匈牙利将军克拉普卡的《政治纲领》而写的评语。他1852年5月10日左右在致克路斯的信中表示要把这篇手稿寄给《纽约论坛报》。但它是否被译成英文并寄往纽约,至今情况不明。这篇手稿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1卷第312—314页。——408。
- 236 这篇手稿是马克思亲自动笔为《纽约论坛报》写的第一篇通讯的片断。恩格斯在译成英文时,将这篇通讯分为两篇独立的文章:《选举》。——托利

党和辉格党》(本卷第 415—421 页)和《宪章派》(本卷第 422—431 页)。这是《宪章派》一文的片断,这里省略了查·伍德的演说词和厄·琼斯的演说词,这大概是因为在伦敦能够找到英文的演说词,马克思不必再寄给恩格斯。

这篇片断第一次用原文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5 年历史考证版第 1 部分第 11 卷第 315—317 页。——411。

- 237 自由农是英国小土地所有者的一种,这个名称起源于中世纪的“自由所有者”。自由农向大地主交纳少量固定的货币地租,并有权自由支配自己的土地。自由农的选举财产资格规定为年纯收入 40 先令(2 英镑)。——412、425。
- 238 1852 年 7 月 1 日,议会被维多利亚女王解散。数天后,开始选举新的下院,选举持续到 7 月底。直到 1852 年 8 月初才产生出完整的选举结果。马克思在《选举中的舞弊》(本卷第 432—438 页)和《选举的结果》(本卷第 439—445 页)两篇文章中对此作了详细论述。——413。
- 239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是马克思亲自动笔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第一篇通讯。在这以前,他在该报上署名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恩格斯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本文和《宪章派》一文是马克思用德文写的一篇通讯,写后于 1852 年 8 月 2 日寄给了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马克思在这以后写的一些文章,也是这样由恩格斯译成英文的,这种做法一直继续到 1853 年 1 月底,那时马克思自己已经能够用英文写通讯了。在翻译当中,恩格斯有时把长篇文章分为两篇,然后马克思就把它们作为单篇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这一次恩格斯就是把马克思寄来的文章分成了两篇:《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和《宪章派》。
- 英国宪章派的周报《人民报》在 1852 年 10 月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为标题连续转载了上述文章以及《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这两篇文章。《人民报》发表《宪章派》一文时,删掉了马克思从这份报纸上引用的某些材料。——415、422。
- 240 皮尔派是英国那些拥护罗·皮尔爵士的温和的托利党人。他们支持皮尔在保持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政治统治的条件下向工商业资产阶级让步的政策。1846 年,皮尔为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废除了谷物法,引起托利党保护关税派的不满,导致了托利党的分裂和皮尔派的孤立。19 世纪 50 年

- 代,皮尔派在议会中是一个没有固定纲领的小政治集团。50年代末60年代初,皮尔派并入自由党。——415、422、441、462、587、574、587、590。
- 241** 曼彻斯特学派,即自由贸易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出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19世纪20—50年代,曼彻斯特是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该学派提倡自由贸易,要求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则,要求减免关税和奖励出口,要求废除有利于土地贵族的、规定高额进口税的谷物法。1838年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派建立了反谷物法同盟(参看注244)。40年代和50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后来成为自由党的左翼。——415、422、442、457、462、468、587、592、597、621、656、711。
- 242** 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派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个政治流派。其代表人物在1849年建立了全国议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1855年瓦解),他们提出所谓“小宪章”(见注269)表达了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要求。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议会议员约·休谟在1849—1851年间曾根据“小宪章”在议会中多次提出新的改革法案。——415、422、430、467。
- 243** 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416、607。
- 244** 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法令有时被称作皮尔爵士的法令。谷物法是从1815年起在英国实行的对谷物征收高额进口税的法令。它维护土地占有者的利益,影响了国内贸易的发展。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反对谷物法。曼彻斯特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了反谷物法同盟,从而开始了有组织的斗争(参看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最后帝国议会终于在1846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案》和《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案》,从而废除了谷物法。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而实际上,该同盟一直存在到1849年。——416、424、438、440、454、461、573、574、654、709。
- 245** 美国的辉格党存在于1834—1854年。主要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资产

- 阶级的利益，一部分种植场主也参加了该党。当时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尖锐化，引起国内各政党的分裂和改组。大多数辉格党人同部分民主党人和自由土地党人一起组成了反对奴隶制度的共和党。其余的辉格党人则加入了维护种植场奴隶主利益的民主党。——417。
- 246 1837年，在关于改革法案的讨论中，辉格党领袖约·罗素认为，1832年的议会改革已经是英国宪制发展的顶点，他因此而得到了“顶点约翰”的讽刺性绰号，“抓住顶点不放”的人就是指这种观点的拥护者。——418、637、644、652。
- 247 “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419、609。
- 248 托利党领袖威·皮特在1783—1801年和1804—1806年任英国首相时，使英国成为反法同盟中的主力军。辉格党的多数人曾支持皮特的这一反动政策。——419。
- 249 1831年改革法案是辉格党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当年3月在议会中提出的一项法案。这个提案旨在打破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地位，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经过议会内外的斗争，1832年6月7日这个法案被英国上院最后批准。但是为此项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仍未获得选举权。见恩格斯《英国十小时工作制法案》。——419、427、435、654。
- 250 大法官法庭，或称正义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在1873年司法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这个法院由大法官主持，其权限是审理有关继承、契约义务、股份公司等方面的案件。其他法院使用英国习惯法，而该法院则使用所谓的正义法。大法官法庭以诉讼费用昂贵和办案拖拉而著称。——423。
- 251 约·弗罗斯特、泽·威廉斯和威·琼斯于1839年11月初参加领导南威尔士矿工起义。起义被军队镇压下去。他们三人遭到逮捕，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为流放。奥康瑞尔1848年4月6日在下院提议释放这三名宪章

派成员,但是遭到大多数人拒绝,直到 1854 年才完全撤销了上述判决。——430、466。

252 从 1846 年起,英国议会定期拨给梅努特(爱尔兰)神学院经费,用以修建和维修校舍,目的在于把天主教僧侣笼络到英国统治阶级方面来,从而削弱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430、651。

253 习艺所是依据 1834 年英国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济贫法的法案》而设置的“救济”贫民的机构。法案规定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提供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是让他们在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它所采取的制度与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一书。——430、446、681。

254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 1847 年 6 月 8 日通过的,1848 年 5 月 1 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第 8 章中作了详细考察。——430、654。

255 本文和《选举的结果》最初是马克思用德文写的一个整篇,1852 年 8 月 17 日寄给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恩格斯翻译时将文章分为两篇,马克思将这两篇文章分别以《选举中的舞弊》和《选举的结果》为标题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第一篇文章标明的日期是 1852 年 8 月 20 日,第二篇是 1852 年 8 月 27 日,分别发表在 1852 年 9 月 4 日和 11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3552 号和 3558 号。英国宪章派周刊《人民报》在 1852 年 10 月 16 日和 23 日以《大不列颠的大选》为标题转载了这两篇文章。——432、439。

256 三十九信条是 1563 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宣誓恪守的英国国教会信条。最初为四十二条。1571 年英国议会声明信奉这些信条。——432。

257 斯托克波特的骚动发生于 1852 年 6 月 29 日和 30 日。英国柴郡斯托克波特城的英格兰新教徒在地方当局和警察的纵容下,袭击占该城居民约三分之一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冲突中 1 人死亡,60 多人受伤,许多爱尔兰天

- 主教徒的房屋被捣毁,100多名爱尔兰人以所谓参与骚乱的罪名被捕。——434。
- 258 根据希腊神话,宙斯(罗马神话中的丘必特)的生父狄坦神克罗诺斯害怕其亲生儿子将来篡夺自己的王位,将他们一一吃掉。宙斯的生母女神瑞亚将新生的宙斯藏到克里特岛上。库雷特,即崇拜女神瑞亚的祭士狂欢痛饮时用矛击盾发出的响声掩盖宙斯的啼哭声,从而保护了宙斯。——437。
- 259 根据英国议会沿用的议事程序,在讨论某些重大问题时,下院可以宣布自己为全院委员会,并由下院议长指定主席名单上的一名议员担任委员会主席。——441。
- 260 航海法令是为了保护英国海运,对付外国竞争而制定的一系列法令。法令规定,进口货物只能用英国船只或货物出产国的船只;英国沿海的航行和与殖民地的贸易只限于英国船只。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航海法令是1651年克伦威尔为对付荷兰的转口贸易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而颁布的法令。航海法令在19世纪20年代已受到很大限制,1849年只保留了有关沿海贸易部分,1854年被全部废除。——441。
- 261 爱尔兰旅是19世纪30—50年代英国议会中由奥康奈尔领导的爱尔兰议员所组成的派别。该派大部分成员是民族运动中的右派即妥协派的代表,他们代表了爱尔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大地主和天主教教权派集团的利益。同时,在这一派中还有依靠富裕租佃者的爱尔兰自由派人物。50年代初,该派部分议员与激进的“爱尔兰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见注340)联合,在下院形成一个独立的反对党。1859年由于爱尔兰旅的领袖与英国统治集团达成妥协,该反对党瓦解。——444、593、597、607、627、651。
- 262 本文和《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一文最初是马克思用德文写的一个整篇。马克思于1852年10月12日寄给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恩格斯将它分为两篇。马克思把这两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52年10月15日和1852年10月19日,发表在1852年11月1日和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和3602号。——446、454。
- 263 1845—1847年爱尔兰的饥荒是由爱尔兰居民的主要食物马铃薯连年歉收引起的。加之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见注244),开始实行自由贸易,外国的廉价谷物涌入英国,英国对爱尔兰粮食的需求大大减少,大部分从事谷

- 物种植的农民破产,被逐出家园,大地主和农场主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畜牧业。这次饥荒造成100多万人饿死,100多万人背井离乡。——446。
- 264 新济贫法指英国1834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的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那就是把他们安置到习艺所(见注253)。——447。
- 265 王座法庭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457。
- 266 高等民事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其诉讼程序根据英国普通法进行。民事法院除了审理一般民事纠纷之外,还审理对校勘律师就选举人名单所作的决定提出的上诉。根据英国普通法,上诉法院只审理那些违反法规和诉讼程序的问题,而事实问题,即有关案件的实际情况问题则由陪审法庭审理。——457。
- 267 本文和《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一文最初是马克思用德文写的一个整篇。马克思于1852年10月16日把它寄给恩格斯,由他译成英文。恩格斯将它分为两篇。马克思把这两篇文章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时标明的日期分别是1852年11月2日和1852年11月9日。但是,《纽约论坛报》于1852年11月25日在第3622号上的“英国”专栏中,先发表了第二篇,发表时未加标题。在同年11月29日第3625号上,才发表了这篇《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本卷收入这两篇文章时,是按马克思寄往纽约的时间顺序编排的。——460、465。
- 268 五港是英国东南部形成于中世纪的五个沿海城市(黑斯廷斯、桑威奇、多佛尔、拉姆尼和海特)的联盟,它享有海洋贸易和捕鱼方面的种种特权,同时它也担负给国王提供战船和军事装备的义务。五港总督在中世纪时曾经握有广泛的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但是随着常备皇家海军的建立,五港总督逐渐变成英国君主政体中一种领高薪的闲差。——461。
- 269 小宪章是一个关于选举改革的法律草案的名称,这个草案是由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首领休谟多次在英国议会中提出来以与宪章派的人民宪章(见注157)相对立。休谟的法律草案规定:凡有住房或部分住房的人都有选举权,议会每三年改选一次,用秘密投票的方式进行。小宪章是全国议

会改革和财政改革协会(见注 242)的纲领。——467。

270 “汉尼拔已经站在城门口”是西塞罗用来比喻国家受到威胁时说的一句话。在 1789 年法国制宪议会的一次会议上,议员古·德普雷费尔套用了这句谚语,将谚语中迦太基统帅汉尼拔换成了罗马元帅卡提利纳。所以“卡提利纳已经站在城门口”也被用来说明情势紧迫。——468。

271 宪章派执行委员会即 1840 年 7 月成立的宪章派全国协会的执行委员会。这个协会是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群众性的工人政党,其成员曾经达到 5 万人。执行委员会由全体大会和代表会议选举产生。1848 年宪章运动的失败和宪章派的分裂使该协会丧失了群众性。但是,在厄·琼斯和其他宪章派成员的领导下,协会在 1851—1852 年期间仍然为在革命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贯彻人民宪章及 1851 年宪章派大会所宣布的社会主义原则进行了斗争。协会于 1858 年停止活动。——469。

272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是马克思为揭露普鲁士政府打击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无耻手段而撰写的一部抨击性著作。1852 年 10 月下旬,对科隆共产党人的审讯尚未结束,马克思就已经着手写这一著作。虽然马克思当时生活困难,并忙于为辩护人搜集证据,仍然在 12 月初写完了这一著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利用了 1852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13 日《科隆日报》上发表的有关文件和记录、各报刊的有关报道以及他和恩格斯还有他们的朋友所搜集的资料。12 月 6 日,手稿寄给了瑞士的出版商小沙贝利茨。1853 年 1 月,小册子在瑞士的巴塞尔出版,但是,在秘密运往德国途中,于 3 月 6 日在巴登边境的一个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 2 千册)被警察没收。另一份手稿在第二天寄给了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克路斯,以便在那里出版。在美国,波士顿的《新英格兰报》从 1853 年 3 月 5 日至 4 月 23 日陆续发表这一著作,1853 年 4 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1853 年匿名出版的这一著作没有能够在德国流传。

1875 年第一季度在莱比锡出版了该书第 2 版以后,这一著作在德国才得以流传。在李卜克内西安排下出版的这个版本不仅署上了作者的姓名,而且内容也有所增加。李卜克内西领导的《人民国家报》曾于 1874 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18 日,分 13 次连载了这一著作。在准备出单行本时,马克思将 1860 年写的《福格特先生》的附录四《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作为对这部著作的补充,发表在 1875 年 1 月 20 日的《人民国家报》上。1 月 27

日又在该报发表了注明写于1875年1月8日的结束语。最后,将《人民国家报》发表的这些内容汇集起来出版了这一著作的第二个版本。

1885年,这本书经过恩格斯的编辑出版了第3版,恩格斯还写了一篇引言《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和前几版不同的是,恩格斯把1850年3月和6月写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告同盟书也加进了小册子。

本卷的中译文是根据1885年版本翻译的,翻译过程中参考了1853年和1875年的版本。——471。

- 273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彼·诺特荣克1850年11月5日左右离开科隆,途经哈根、比雷菲尔德、汉诺威、基尔、罗斯托克和施韦林,1850年12月中旬到达柏林。原计划继续前往莱比锡,但是,不知何故,却在柏林停留了几个月,而且参加了当地的政治活动。1851年5月8日,他没有重新征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前往莱比锡,5月10日,在抵达莱比锡火车站时被捕。诺特荣克违反秘密工作常规随身携带大批文件,导致当局对同盟盟员进行大规模搜捕。——475。
- 274 彼·格·勒泽尔和海·贝克尔1851年5月19日在科隆被捕,亨·毕尔格尔斯1851年5月23日在德累斯顿被捕,阿·雅科比1851年5月25日在柏林被捕,罗·丹尼尔斯,可能还有卡·奥托,1851年6月12日在科隆被捕,弗·列斯纳1851年6月18日在美因茨被捕,威·赖夫1851年7月25日在科隆被捕。约·雅·克莱因曾经逃离科隆,但返回后于1851年9月26日被捕。最后,阿·埃尔哈德1852年7月17日在科隆被捕。此案的同案人斐·弗莱里格拉特逃亡伦敦。——475。
- 275 指共产主义者同盟。它是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1847年在伦敦成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1836年成立的正义者同盟,这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秘密组织,后期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人参加。随着形势的发展,正义者同盟的领导成员终于确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正确,并认识到必须使同盟摆脱旧的密谋传统和方式,遂于1847年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正义者同盟,协助同盟改组。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恩格斯的倡议把同盟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还批准了以民

主原则作为同盟组织基础的章程草案,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代替了正义者同盟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同年11月29日—12月8日举行的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章程,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问世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1848年2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巴黎以后,巴黎于3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年3月下半月到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仍然于1849—1850年进行了改组并继续开展活动。1850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反对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同盟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陷于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前身,相当多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了国际工人协会的组建工作。有关同盟的概况见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475、492、535、564。

- 276 警察当局在诺特荣克那里没收了科隆中央委员会1850年12月1日提交讨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章程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3月告同盟书和科隆中央委员会1850年12月1日告同盟书的抄件,毕尔格尔斯和海·贝克尔转交给诺特荣克的两张通讯处便条,贝克尔写给门辛格博士的介绍信,勒泽尔和毕尔格尔斯1850年11月4日给诺特

- 荣克开具的同盟特使全权证书,海·贝克尔致诺特荣克的信(1850年12月23日)和勒泽尔致诺特荣克的信(1850年12月27日),以及亚·席梅尔普芬尼希的一封信(1851年4月13日)。诺特荣克否认后一封信是写给他本人的。在毕尔格尔斯那里搜查到一些文件的草稿和雅科比给他的一封信(1851年5月14日)。——475。
- 277** 在科隆的同盟盟员最迟从1851年5月12日起陆续得知诺特荣克被捕的消息(见1851年6月24日阿·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信)。当1851年5月19日开始查抄勒泽尔、海·贝克尔和毕尔格尔斯的时候,大部分文件都已安全转移或销毁。警方在海·贝克尔等人那里查获了马克思1851年1—5月间写给贝克尔的五封信,起诉书摘录了其中四封信。这四封信的摘要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475。
- 278** 马克思从贝尔姆巴赫那里得知检察院的这项决定(见1852年1月26日马克思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马克思最迟于1852年1月24日收到贝尔姆巴赫的信(此信下落不明)并当即转寄给恩格斯(见1852年1月24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报纸上揭露了普鲁士司法当局继续关押被告人的行径(见本卷第559—562页)。马克思1852年2月13日把检察院的决定写信告诉了约·魏德迈,于是魏德迈本人在《纽约刑法报》上,查·德纳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阿·克路斯在《高地哨兵》上谴责了普鲁士司法当局的阴谋。——476。
- 279** 起诉书是1852年6月12日在科隆印发的,长达67页,由莱茵省王室上诉法院总检察长尼科洛维乌斯签署。马克思未能看到起诉书的全文。贝尔姆巴赫把起诉书的主要内容通告了马克思,并告诉他,起诉书中把他致海·贝克尔的几封信作为贝克尔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证据。此外,贝尔姆巴赫还告诉了马克思陪审法庭开庭的日期。(1852年7月9日和7月中旬贝尔姆巴赫致马克思的信)——476。
- 280** 18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法兰西刑法典(Code pénal)规定:陪审法庭是定期开庭的法庭。判罪由陪审员执行,量刑由法官负责。法兰西刑法典在被拿破仑第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也通行。1815年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这部刑法典依然有效。由于普鲁士各邦的刑法典于1851年7月1日生效,法国刑法典随之失效,陪审法庭在莱茵省逐渐被取消。——477。

281 1848—1849年革命失败之后,设在伦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进行了改组。经过改组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有:亨·鲍威尔、格·埃卡留斯、弗·恩格斯、萨·弗伦克尔、阿·列曼、卡·马克思、卡·普芬德、康·施拉姆和奥·维利希(施拉姆和维利希是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约·莫尔1849年6月在革命中战斗身亡。卡·沙佩尔从1849年6月起被拘留在威斯巴登待审,他于1850年7月初来到伦敦后成为中央委员会成员。

1850年9月15日,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尖锐地批评了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策略。会上同盟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发生了分裂。后来,奥·迪茨、萨·弗伦克尔、奥·格贝尔特、阿·列曼、奥·谢特奈尔、卡·沙佩尔和奥·维利希等七人单独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478。

282 指1850年9月30日成立的新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勒泽尔当选为主席,毕尔格尔斯当选为秘书,奥托当选为出纳。从马克思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出,丹尼尔斯和弗莱里格拉特也曾是科隆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见1851年5月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和1860年2月23日马克思致弗莱里格拉特的信。——478。

283 宗得崩德原是瑞士七个经济落后的天主教州为对抗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和维护教会的特权而于19世纪40年代建立的单独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个名称来讽刺1850年9月15日同盟分裂后另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478。

284 阿·卢格在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74号上发表了一篇伦敦通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工人教育协会进行诽谤和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此撰写了《为驳斥阿尔诺德·卢格而发表的声明》并寄给了不来梅的《韦瑟尔报》,但该报未予刊登。威·魏特林出版的《工人共和国报》在维利希的唆使下于1851年2月发表了一篇攻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讯。这家报纸还从1851年8月23日到9月6日刊登了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中央委员会1851年5月告同盟书中恶毒诽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一部分文字。1851年5月,正当在德国开始逮捕同盟盟员的时候,卡·海因岑在纽约主编的报纸《德意志快邮报》在1851年6月13日第129号刊登的科隆通讯中,污蔑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没有影响的阴谋家。

该报 1851 年 6 月 28 日第 142 号又在科隆通讯中把同盟盟员的被捕归罪于他们。——478。

285 伦敦警察当局曾经要求其他国家在工业博览会期间(1851 年 5—10 月)协助保卫工作。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诏谕,施梯伯被派往伦敦。但是,他的使命不是侦察刑事犯罪案,而是调查政治流亡者的情况。——482。

286 范迪门地是欧洲人对塔斯马尼亚岛的最初的称呼,在 1853 年以前一直是英国苦役犯的流放地。——483。

287 大磨坊街工人协会是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别称,该协会是 1840 年 2 月由正义者同盟成员卡·沙佩尔、约·莫尔等人成立的。19 世纪 50 年代协会设在伦敦索霍区的大磨坊街,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维利希-沙佩尔的拥护者聚集在这里。

1847 年和 1849—1850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维利希-沙佩尔少数派之间的斗争中,协会大多数成员站在少数派一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许多拥护者 1850 年 9 月 17 日退出了协会。这里所说的声明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484。

288 指罗马的古罗马神殿博物馆里的一尊公元前 3 世纪的大理石塑像,塑造的是一个垂死的、可能是高卢的斗士形象。——496。

289 指德国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该书第 1 部(1853 年在柏林出版),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作为警察的必修课,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中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第 2 部(1854 年在柏林出版)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499。

290 摩门教是 1830 年在美国成立的宗教教派。其创始人约·斯密特(1805—1844 年)由于得到所谓神的启示而写了《摩门经》(1830 年),以先知摩门的名义讲述了仿佛古代曾经发生过以色列部落向美洲迁移的故事。《摩门经》是摩门教教义和组织的基础。——502。

291 马扎斯监狱设在巴黎,所谓德法密谋案件的被捕者就关押在这里。——

505。

- 292 施泰翰工人协会是在马克思支持下 1852 年 1 月在伦敦成立的工人协会，该协会的主席是汉诺威的流亡者施泰翰。加入该协会的，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威·沃尔弗、威·李卜克内西等人以外，是那些脱离了受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影响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密友、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工人罗赫纳也曾积极参加协会的筹建工作。希尔施曾是该协会创建人之一，他的普鲁士警探身分暴露之后，从 1852 年 2 月初起不再参加协会的活动。后来，该协会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施泰翰本人在内又都接受了沙佩尔集团的影响，重新加入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509。
- 293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保存下来一份马克思 1848 年 12 月 29 日亲笔写给施梯伯的回信草稿。在抄寄给施梯伯的这封回信上签字的《新莱茵报》的另一位编辑很可能是威·沃尔弗，因为他了解施梯伯在西里西亚的活动。——519。
- 294 施梯伯写给马克思的这封信，由燕·马克思抄录，作为附件寄给了恩格斯。见 1852 年 10 月 28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520。
- 295 马克思的这篇声明至今下落不明。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是 1852 年 10 月 23 日《科隆日报》第 271 号发表的该报编辑部拒绝发表马克思这篇声明的一封信。——520。
- 296 恩格斯指《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这一著作的 1875 年版和 1885 年版上所加的一个补遗。在这个补遗里重刊了马克思 1860 年写的《福格特先生》的附录四《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但没有加标题。附录中说，科隆案件发生后不久，弗略里以伪造罪被判处了几年苦役。——527。
- 297 《红色问答书》指莫·赫斯写的文章《德国人民的红色问答书》，可能于 1850 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匿名出版，既没有标明出版地也没有标明出版日期。1850 年 12 月 13 日《1841 年人民报》(巴黎)用法文摘要发表了这个回答书，并说明作者是赫斯。——529、550。
- 298 德美革命公债是金克尔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其他领导人于 1851—1852 年企图在德国流亡者和旅美德国人中间举借的公债，其目的是为了再次在德国唤起革命。这个活动的领导人是哥·金克尔、爱·梅因、奥·赖辛

- 巴赫、卡·叔尔茨和奥·维利希。1851年9月—1852年3月，金克尔一直在美国动员那里的德国流亡者认购。这个活动遭到各方的非议，金克尔等人受到亨·伯恩施太因、威·魏特林、约·菲克勒尔和阿·戈克的攻击。金克尔回国后，1852年4月16日在伦敦召开了德美革命公债组织委员会的会议，决定恢复地方支部的活动。为此分别发出了由金克尔和维利希起草的通告式命令。1852年9月，赖辛巴赫提出了第一个财务报告，它宣告了德美革命公债运动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金克尔这一企图的冒险性，认为这是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人为地唤起革命的有害而无成果的一种尝试。——535。
- 299 约·卡·哈克给豪普特的信至今下落不明。哈克在汉堡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旅居伦敦后，于1851年9月加入维利希—沙佩尔集团。
-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很可能想利用这封来信威胁豪普特。所以戈德海姆1852年10月22日作证说，豪普特一再受到威胁，因此不愿意在科隆案件中充当证人。
- 落到警方手中的只有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伦敦的成员卡·奥·斯塔克1851年9月23日或25日给汉堡的弗·约·佐伊伯特的一封信。这封信在案件审理期间宣读过。——536。
- 300 马克思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75年德文版的跋中曾指出《红色问答书》的作者并不是赫斯，而是一个姓列维的人。后来查明，马克思弄错了。马克思当时所不知道的种种文件，特别是赫斯本人在1850年7月21日写给魏德迈的信件，都证明《红色问答书》确实出于赫斯之手。——536。
- 301 伦敦的保证人即赖辛巴赫，他在1852年10月28日的通告《致保证人和德国公债委员会》（见1852年11月20日《纽约州报》第47号）中，公布了革命公债的结算帐目。金克尔和维利希打算独享公债债款的支配权，而赖辛巴赫则建议除一部分已支出的捐款外把现有的钱全部归还给捐赠者。——537。
- 302 这个特使是奥·格贝尔特。马克思是从亚·班迪亚那里得知他活动情况的。1852年8月30日和9月3日，马克思分别写信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恩格斯、贝尔姆巴赫以及克路斯。班迪亚提供的消息可能有误。——537。

- 303 德美革命联盟(美国革命联盟)是在美国的德国流亡者的一个组织,由到美国推销所谓德美革命公债的戈克和菲克勒尔于1852年1月在美国费城建立。它反对金克尔在美国的筹款活动。1852年9月,在惠林代表大会上联盟改名为“新旧大陆人民联盟。”——537。
- 304 指维利希和贝克尔的关系,见贝克尔在1851年1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其中写道:“维利希给我写了几封非常有趣的信,我没有回答;但是他情不自禁地向我陈述了自己的新的革命计划。他指定我去发动科隆卫戍部队起来革命!!!不久前我们曾对此捧腹大笑。他的这种蠢举还会使许许多多的人倒霉,因为只是这样一封信就足以保证成百个审判蛊惑者的法官能得到3年的薪俸。如果我在科隆发动了革命,他是不会拒绝担负下一步行动的领导者的责任的。真够朋友!”——539、547。
- 305 1852年11月12日的判决如下:勒泽尔、毕尔格尔斯和诺特荣克6年徒刑;海·贝克尔、奥托和赖夫5年徒刑;列斯纳3年徒刑。他们必须负担诉讼费用。其余被告丹尼尔斯、埃尔哈德、雅科比和克莱因无罪释放。——540、554、559、569。
- 306 新的普鲁士刑法典指1851年4月14日为普鲁士各邦制定的刑法典。原先,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实施的是1811年在法国以及被法国人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实施的法兰西刑法典,莱茵省归并普鲁士以后,直到1851年春天,这个刑法典在莱茵省同民法典一起仍然有效。普鲁士刑法典于1851年7月1日起在普鲁士所有地区生效。它对作伪证、诽谤以及诸如此类的罪行规定了刑事处分。——542、557、562、569。
- 307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这句名言出自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544。
- 308 “地球依然在运转”这句话据说是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逼迫他放弃他的地球运动学说时喊出来的。——544。
- 309 指耶拿会战。耶拿会战和奥尔施泰特会战都发生在1806年10月14日这一天,通常统称为耶拿会战。这次会战中的失败,最后导致普鲁士向拿破仑法国投降,并于1807年7月7日签订了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丧失了将近一半领土,实际上降到了拿破仑法国附属国的地位。所以马克思在本卷第451页说“普鲁士国家已经灭亡过一次”。——545。

- 310 恩格斯拟的这份目录完整地列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 年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期间寄给辩护人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把文件安全转交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曾经使用过目录中列出的商人和商号的姓名地址。——546。
- 311 按照(1)和(2)两个通讯处寄出的文件中包括威·施梯伯 1848 年 12 月 26 日致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 519—520 页)的抄件。恩格斯 1852 年 10 月 27 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谈到这些文件。——546。
- 312 恩格斯按照(3)—(5)的通讯处先写好信封,于 10 月 28 日把这些信封寄往伦敦马克思处,以便把给洪特海姆、埃塞尔第一、施奈德第二的信装进这些信封里寄出去(见 1852 年 10 月 28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546。
- 313 马克思给施奈德第二的这封信,是寄到弗莱里格拉特认识的一个德国商人的名下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关于它的内容,见 1852 年 10 月 28 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546。
- 314 指 1852 年 10 月 26 日马克思致施奈德第二的信。马克思认为这封信非常重要,托别人寄给科隆的施奈德第二,这封信共有四份副本,其中一份经维尔特从曼彻斯特寄出(见马克思 1852 年 10 月 26 日致恩格斯的信),另外两份恩格斯在本目录(1)和(8)中提到。这封信至今下落不明。——546。
- 315 指 1851 年 1 月 27 日海·贝克尔给马克思的信(见注 304)和丹尼尔斯就他的手稿《小宇宙。生理人类学概论》致马克思的几封信。——546。
- 316 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28 日的信中通知恩格斯此信已寄出。威·希尔施的笔迹的样本取自希尔施 1852 年 1 月底至 2 月初在新的伦敦工人协会中所作记录的几个地方。关于舍尔瓦尔在《人民报》上的声明是指“通讯介绍”栏目中所作的说明。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的原件是指 1848 年 12 月 26 日施梯伯致马克思的信(见本卷第 519—520 页)。——547。
- 317 关于这封信和随信寄出的文件,马克思在 1852 年 10 月 28 日的信中向恩格斯作了说明。“27 日”后面的问号的意思是这封信也可能是迟一天寄出的。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得到确认的笔迹样本是指威·李卜克内西和马·林格斯的笔迹样本,他们被认为是施梯伯在科隆交出的伪造的“原本

记录”的记录人。宣誓证词是指马克思及其朋友从1852年3月起每星期三定期集会的地方的房东的证明,并见本卷第508—512页。

关于海·贝克尔写给马克思的有关维利希的信的摘录,见注304。阿·贝尔姆巴赫写给马克思的三封信大概是指:1.1852年1月24日以前的信;2.1852年3月初的信;3.1852年7月17日和24日之间的信。可以证实马克思收到了这些信。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物中有其他9封贝尔姆巴赫写于1851年和1852年的信,但是这几封信未能保存下来。

施梯伯的信的抄件,指马克思通过当时住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格·荣克捎给施奈德第二的一些文件,文件证明“原本记录”是伪造的,希尔施参与了伪造,并揭露了施梯伯证词的虚伪性(见本卷第485—500页)。——547。

- 318 指普鲁士在伦敦的密探罗伊特盗窃狄茨档案一事,并见本卷第481—484、550页。——547。
- 319 寄给洪特海姆的这封信是恩格斯写的。他在1852年10月31日的信中将这一情况告知马克思。——547。
- 320 这篇主要由马克思撰写的声明是驳斥《泰晤士报》等英国报刊利用当时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对马克思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所进行的诽谤的。马克思于1852年10月28日将声明寄给英国各报,10月30日《晨报》、《先驱》、《旁观者》、《观察家》、和《人民报》这五家报纸以不同的标题同时刊登了这篇声明。——548。
- 321 马克思写这篇声明的原因是1852年10月27日和28日科隆法庭审理共产党人案件时,原告出示了一封据说出自马克思手笔的《红色问答书》的附函。马克思后来在《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第五篇中专门论述了这一事件(见本卷第529—531页)。马克思在撰写此声明的当天就把声明寄给了辩护人施奈德第二(见1852年11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施奈德第二11月4日将此声明用在他的辩护词(见本卷第778—788页)中。马克思担心普鲁士当局扣留给施奈德第二的信件,便于10月30日将声明的抄件连同有关消息一起寄给《晨报》发表,并敦促《人民报》予以转载。——550。
- 322 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审理期间,伦敦的日报《晨报》发表了一名科隆通讯

员的报道,其中客观地报道了案件的审理过程,抨击了普鲁士政府的所作所为。这名通讯员大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和一些被告人相识的记者吉恩。参看1851年5月25日罗·丹尼尔斯给马克思的信和1851年6月21日威·皮佩尔给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4年历史考证版第3部分第4卷)。——550。

323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针对美国报刊对《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本卷第765—768页)一文的反应而写的。发表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552。

324 这篇声明是马克思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结束之后发表的一篇党的公开声明。由于当时欧洲大陆的报刊不肯发表共产党人的稿件,这篇声明只能在英国和美国发表。声明的德文稿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18日(可能写于11月16—17日),1852年12月初寄到了纽约,由魏德迈发表在《纽约刑法报》上。1852年11月19日,马克思将声明的英文草稿寄给恩格斯,请求恩格斯加以润色,供英国报刊发表。这篇声明的英文草稿经过恩格斯审定形成《关于最近的科隆案件的最后声明》一文(本卷第559—562页),注明的日期是1852年11月20日。这篇英文声明刊登在伦敦的《观察家》、《旁观者》和《晨报》上。——554、559。

325 本文是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写成的时间不晚于1852年11月29日。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经爱·马克思-艾威林整理于1896年出版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这组文章的单行本里,代替恩格斯已经许诺过但未见报的这组文章的最后一篇。——563。

326 为了救济在科隆被判刑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及其受难家属,少数仍滞留德国的同盟盟员和旅居英国的一些前盟员在马克思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马克思大约于1852年11月19日或此后不久,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起草了这篇向旅美德国工人发出的呼吁书。马克思把呼吁书寄给了阿·克路斯,以便在美国的德文报刊上发表。呼吁书在1853年1月刊登在《加利福尼亚州报》、《纽约刑法报》和《纽约州报》等报刊上。——571。

327 本文是马克思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而中断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近两个月之后,又重新开始为该报撰写的第一篇通讯。由于当时恩格斯的健康状况不佳,这篇通讯是威·皮佩尔译成英文的。——573。

- 328 马克思从克路斯那里得知,科苏特的一名所谓秘书对《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一文(本卷第765—768页)进行了攻击,并称这篇文章是无耻的诽谤。马克思写下这篇声明,予以反驳。——581。
- 329 本文是马克思在研究了1852年12月17日伦敦报刊公布的对英国政府的预算案的最后辩论和表决的情况之后,当即又为《纽约论坛报》写的一篇通讯。这篇通讯首先刊登在1853年1月6日该报的晚报上,1月7日,又刊登在该报的晨报上。——583。
- 330 贝雷斯福德原名威廉,马克思在这里把他讽喻为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中最勇敢的英雄阿基里斯。——583。
- 331 这是马克思在英国新的阿伯丁政府上台后写的一篇通讯,1853年1月8日左右写成。——589。
- 332 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589、627。
- 333 这里指的是帕麦斯顿对于1830年8月的比利时革命以及比利时脱离荷兰王国(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定将比利时并入荷兰)问题的态度。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对比利时独立。法国七月王朝暗中计划将比利时并入法国,因此支持比利时独立。帕麦斯顿与法国结盟建立了所谓“友好协约”,与此同时又坚决反对将比利时并入法国。英法的努力获得成功。1831年欧洲列强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比利时独立和中立的条约。荷兰国王拒绝承认该条约,导致了1832年英法对比利时的武装干涉。1833年荷兰国王被迫承认比利时独立。——591。
- 334 1830年七月革命后,英法之间建立了名为“友好协约”(entente cordiale)的同盟关系,直到1834年4月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签订了所谓的四国同盟条约,这种同盟关系才具备了正式的条约手续。但是,在签订条约的时候英法利益的矛盾就已暴露出来,致使后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这个条约在形式上反对专制政体的“北方列强”(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实际上它使英国得以在对付葡萄牙的王位追求者唐·米格尔和西班牙的王位追求者唐·卡洛斯的借口下,向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提供军事援助,扩

- 大自己在这两个国家中的影响。——591、646。
- 335** 梅费尔区是伦敦的一个区,许多英国贵族的私邸都在这里。——592。
- 336** 皮由兹教派是19世纪30—60年代英国国教会中倾向于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流派,以它的创使人之一牛津大学的神学家皮由兹的名字而得名。该派是英国贵族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宣传恢复传统教义和教会权威,崇尚隆重礼仪。——595。
- 337** 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现代殖民理论》中专门批判了这一荒谬的殖民理论。——595。
- 338** 马克思的这篇通讯写于1853年1月14日。可能是威·皮佩尔把它翻译成英文的。邮送通讯的邮船1月30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于1853年2月2日第3681号发表了这篇通讯。——596。
- 339** 腐败的城镇选区是19世纪初英国议会改革者首先使用的专名词,指英国那些到18—19世纪时居民已经稀少或根本无人居住的小城镇和乡村。这些城镇和乡村从中世纪起就享有选举代表进入议会的权利。然而这些议员的选举是由行贿受贿决定的,实际上是由当地的大土地贵族指派的。这种特权被1832、1867和1884年的改革所取消。——597。
- 340** 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是1850年8月由一些爱尔兰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创立的。同盟的宗旨是废除阻碍爱尔兰资本主义发展的、对爱尔兰农民的半封建的和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尽管这个同盟的领导过于温和,但它仍然反映了为反对大地主和土地投机者而斗争的爱尔兰租佃者的利益。同盟的纲领包括以下要求:禁止大地主任意废除租约,租约期满时补偿租佃者改良土壤的开支,确定公平合理的租金,承认租佃者有通过自由买卖转让租佃的权利。在1852年的议会大选期间,同盟的要求得到了爱尔兰广大租佃者,包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拥护。在1853年1月的改选中,同盟宣传反对那些奉行妥协政策而进入联合政府的爱尔兰议员。爱尔兰大地主由于害怕国内掀起民主运动便与天主教和新教的高级僧侣联合起来反对同盟。50年代末,同盟停止了活动。——597。
- 341** 明辛街是伦敦的一条街,是殖民地商品批发交易的中心地。——600。

- 342 以萨瑟兰公爵夫人为首的英国贵族成员发表了告美国妇女书,号召反对美国的奴隶制。来自美国的复信指出了英国工人的极端贫困,并劝告它的起草者把她们的慈悲用在自己的家乡。马克思就此事件写了这篇文章,由恩格斯译成英文,发表在1853年2月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7号上,3月12日《人民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又利用了这篇文章中援引的资料。——607。
- 343 奥伦治派是指爱尔兰的秘密组织奥伦治会的成员。奥伦治会成立于1795年,以镇压过1689—1691年爱尔兰起义的奥伦治亲王威廉三世命名。奥伦治会以维护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为目标,采取大屠杀和政治谋杀及其他暴力手段迫害爱尔兰天主教居民,在新教徒聚居的奥尔斯脱、北爱尔兰有很大影响。但是与大地主和新教、天主教的高级僧侣的愿望相反,在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见注340)在爱尔兰积极活动期间,新教奥伦治派和天主教的普通百姓一致拥护同盟的土地要求,他们在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改善了相互之间的关系。——607。
- 344 休迪布腊斯是英国诗人巴特勒的同名讽刺长诗中的主人公,他的特点是喜好无意义的谈论和争辩,并善于用不切实际的一般性论断证明最荒谬的论点。巴特勒这首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的虚假道德和宗教上的伪善行为的长诗写于1663—1678年。——607。
- 345 马克思在这里把萨瑟兰女伯爵的措施与穆罕默德-阿里的措施相比较。穆罕默德-阿里的经济政策促进了埃及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但是没有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611。
- 346 本文是马克思自己用英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第一篇通讯。在此之前,马克思一直用德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然后由恩格斯或威·皮佩尔译成英文。这篇通讯在笔记上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53年1月28日。——616。
- 347 指1853年1月底和平协会(见注155)召开的国际和平大会。自由贸易派在大会上表现得十分活跃。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反对在英国进行的反法战争宣传和反对扩充军备的决议。然而这些决议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621、665。
- 348 暗指阿伯丁联合政府成员的老迈的年龄。玛土撒拉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

- 传说他活到 969 岁,是亚当子孙中最长寿者。“玛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语。参见《旧约全书·创世纪》第 5 章第 27 节。——622、671。
- 349** 马克思在 1853 年 2 月 8 日之前已经动笔写这篇通讯,但在笔记上注明的写作日期是 2 月 8 日。邮送通讯的邮船 2 月 21 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 年 2 月 23 日第 3699 号发表了这篇通讯。——625。
- 350** 指爱尔兰激进主义者舍·克罗弗德 1835 年第一次向下院提出的法案。该法案规定,在废除租约时,对租佃者在土地改良方面的开支予以赔偿。1836 年,法案被下院否决。后来,该法案又多次被重新提出讨论(1847、1852 和 1856 年),均被下院否决。——627。
- 351** 取消合并派是取消英爱合并的拥护者。英爱合并是英国政府在镇压了 1798 年的爱尔兰起义之后强加给爱尔兰的。合并自 1801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它剥夺了爱尔兰的最后一点自治权,并解散了爱尔兰议会。从 19 世纪 20 年代起,取消合并的要求在爱尔兰成为深得人心的口号。但是,领导民族运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奥康奈尔等人)却把取消合并的宣传鼓动仅仅看作是促使英国政府作出小小让步的一种手段。1835 年,奥康奈尔和英国辉格党达成妥协后就完全中止了这种鼓动工作。但是在群众运动的影响下,爱尔兰自由派不得不在 1840 年建立了取消合并派协会。然而,他们却力图使这个协会对英国统治阶级采取妥协的政策。——628。
- 352** 1853 年 2 月 6 日意大利米兰反对奥地利统治的起义是马克思写这篇通讯的最重要的原因。通讯提到 1853 年拿破仑恩赐的大赦和不列颠的政策。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上注明的写作日期是 2 月 11 日。邮送通讯的邮船 23 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 年 2 月 25 日第 3701 号发表了这篇通讯。——634。
- 353** 12 月的血腥“围剿”指路易·波拿巴在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对人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在 1851 年 12 月的这些日子里,据布鲁塞尔《民族报》披露,约 26000 名法国人受到法律追究,1 万多人被放逐国外。仅巴黎就有 2800 人遭杀害。——635。
- 354** 指约·罗素勋爵提出的“废除对女王陛下的犹太臣民的某些权利限制”的提案。过去英国信仰犹太教的公民既不能担任国家公职,也不能充当议员,因为所有的议员都必须“以基督徒的真正信仰宣誓”。——638、652。

- 355 全国保护不列颠工业和资本协会,即保护农业和不列颠工业协会,该协会最初的名称是保护农业协会,为同自由贸易派作斗争于1845年建立,代表大地主的利益,反对废除谷物法(见注244)。——639。
- 356 马克思在这篇通讯中进一步评述了米兰起义。在此之前,马克思就与琼斯一起在《人民报》上刊登了一篇社论(本卷第797—803页)。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上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53年2月22日。邮送通讯的邮船3月6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3月8日第3710号发表了这篇通讯。——640。
- 357 指驻扎在奥地利帝国与土耳其边境特殊军事地带的克罗地亚边防军。他们由奥地利人指挥,被用来镇压各行省的、特别是意大利北部的民族解放运动。——641。
- 358 根据英国议会的传统,上院议长的座位用一个羊毛口袋作为座垫。羊毛口袋曾是英国国民财富主要来源的象征。——644。
- 359 指英国和法国在百年战争(1337—1453年)时期的两次大会战。1358年9月19日在普瓦捷,1415年10月25日在阿津库尔,英国步兵击败了法国骑兵。——645。
- 360 叙利亚问题是1839年土耳其和埃及发生冲突的导火线(叙利亚1833年被埃及强占)。在这一冲突中,法国支持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导致了英法关系恶化。英国不愿法国的影响在这个通向它的亚洲殖民地的要冲得到加强,便向土耳其提供军事援助,并从外交上通过俄国、奥地利和土耳其对法国施加压力,迫使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援助。——646。
- 361 塔希提岛问题指1844年3月英国代办被驱出不久前被宣布为法国保护领地的塔希提岛一事。它使在太平洋区域殖民竞争中的英法两国关系又告紧张。——646。
- 362 法国和瑞士的冲突发生于1851年12月—1852年1月,它是由于路易·波拿巴要求瑞士把反对1851年12月2日政变的法国共和党人流亡者驱逐出瑞士而引起的。——648。
- 363 1845—1849年,英国和法国对阿根廷施加压力,要求开放巴拉那河和乌拉圭河,让英法商船通行,由于沿海遭到英法海军的长期封锁,阿根廷最后

- 被迫让步,于1852年签订了开放上述河流让外国船只通行的条约。——648。
- 364 纳沙泰尔是瑞士的一个州,1815年维也纳会议将它划归普鲁士。在1848年2月29日—3月1日的资产阶级革命期间,纳沙泰尔宣布完全脱离普鲁士,并制定了共和主义的宪法,由此引起了普鲁士和瑞士之间的冲突。法国、英国、俄国和奥地利对此进行了外交干涉。直到1857年普鲁士才最终放弃了对纳沙泰尔具有维也纳会议承认的“最高统治权”的要求。——648。
- 365 1852年,英国和法国害怕美国强占隶属于西班牙的岛屿古巴,因此向美国政府提议签订关于不侵入古巴的三边协定。由于美国的拒绝,协定未能签订。——648。
- 366 坦吉马特政策是1839年起在土耳其实行的一种改革政策,其目的是通过新兴资产阶级的妥协来巩固君主政体。1851年,土耳其借口向埃及推行坦吉马特政策,要求埃及实行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将会使埃及重新置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在英国和法国的压力下,埃及被迫部分地接受了土耳其的要求。——648。
- 367 1852年11月,英国、法国、俄国、巴伐利亚和希腊在伦敦签订了一份议定书,指定无嗣的希腊国王奥托的弟弟、巴伐利亚的阿德尔伯特亲王为王位继承人。——648。
- 368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英国和法国一直阻挠突尼斯的独立,干涉突尼斯内政,支持土耳其实现统治突尼斯的野心。——648。
- 369 大主教法庭是法国1857年以前处理遗嘱事务的宗教法庭。——649。
- 370 马克思在本文中利用1853年2月19日《人民报》(伦敦)第42号上琼斯的文章和有关伯恩利会议的报道论述了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
这篇通讯在笔记本上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853年2月25日。邮送通讯的邮船3月13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3月15日第3716号发表了这篇通讯。——651。
- 371 《强迫移民》是马克思在1853年2月25日通讯中预告的(见本卷第657页)那篇文章。1851—1853年,在英国掀起了一股移民潮。宪章派、尤其是

《人民报》对此持反对态度。马克思利用他当时的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就移民和纯收入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马克思继续剖析科苏特和马志尼密谋性的策略;并继续报道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等。

这篇文章于3月4日写成后寄出,邮送通讯的邮船3月21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3月22日第3722号发表了这篇通讯。接着,《半周论坛报》3月25日第817号、《纽约每周论坛报》3月26日第602号和《人民报》4月16日第50号又转载了这篇通讯。《人民报》转载时,把强迫移民部分略加删节作为单独一篇文章发表,署名马克思;其余部分则刊登在“美国报刊和欧洲运动”栏目里,没有署名。——658。

- 372 柏拉图在他的对话集《理想国》中,描写了一个建立在分工基础上的共和国,他认为,应该把诗人从这个国家中驱逐出去,因为他们一点用处也没有。——662。
- 373 斯皮特尔菲尔兹是伦敦东部的一个区,居民多为贫民,其中有些是丝织工人;佩斯利是苏格兰南部的一个城市,是手工纺织亚麻布的中心。——662。
- 374 指1770年普鲁士王储亨利希访问彼得堡时提出的关于瓜分波兰的建议。两年后,根据1772年8月5日在彼得堡签订的协定,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奥地利分得了加利西亚,普鲁士分得了瓦尔米亚以及滨海区、库雅维亚和大波兰区的一部分;拉特加利亚的白俄罗斯东部的一部分划归俄国。波兰当时失去了29%的领土。——664。
- 375 马克思这篇通讯写于1853年3月18日,这是马克思在米兰起义(1853年2月6日)后第十二天,第四次在通讯中评价米兰起义和马志尼、科苏特的策略问题。在这篇通讯中,马克思还就《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一书被没收的问题,揭露普鲁士政府的诡计;并就当年2月19日签订的普奥通商条约、英国政府对待流亡者的态度等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 这篇通讯于3月18日寄出,4月3日到达纽约。《纽约每日论坛报》1853年4月4日第3733号发表了这篇通讯。——667。
- 376 马志尼的声明即马志尼1853年3月2日给一些英国报纸的信。科苏特对马志尼声明的答复即科苏特[《致梅恩·里德上尉的信》](日期不详),该信曾摘要发表在1853年3月5日《先驱》第154号,是科苏特前后两次声

- 明中的后一次声明。前次声明指科苏特 1853 年 2 月的传单《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载于 1853 年 2 月 10 日《每日新闻》(伦敦)第 2098 号、《泰晤士报》第 21348 号。——668。
- 377** 外侨管理法(Alien Bill)是英国议会 1793 年通过的一项法令。根据这项法令,政府随时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该法令有效期为一年。外侨管理法在 1802、1803、1816 和 1818 年议会都曾通过恢复实行的决定。1848 年,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宪章派 4 月 10 日游行示威,议会恢复实行外侨管理法。1853 年,当内阁提出恢复外侨管理法的提案时,英国公众对此普遍持反对态度。——671。
- 378** 圣地纠纷是希腊正教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之间一个多年的纠纷。纠纷的核心是争夺巴勒斯坦圣地:伯利恒的耶稣诞生教堂和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管辖权。这里所说的俄国、法国和土耳其政府之间关于圣地的纠纷,是 1850 年由路易·波拿巴挑起的。他为了巩固自己在东方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堡支持天主教派的要求。沙皇俄国保护当地正教教会的特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土耳其内政,达到占领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并最终占领墨西拿海峡的目的。双方的实际目的都是争夺近东霸权。摇摆不定的土耳其政府起初对法国的要求让步,但在 1853 年 5 月 4 日,当俄国特命全权公使缅施科夫到达土耳其时,土耳其政府又被迫同意特别保障正教教会的权利和特权。与此同时,苏丹在英法两国大使的支持下,拒绝了尼古拉一世关于承认他是奥斯曼帝国正教居民的保护者的要求。圣地纠纷演变成激烈的外交冲突,成为导致克里木战争的原因之一。——674。
- 379** 本文是埃卡留斯为厄·琼斯在伦敦出版的《寄语人民》撰写的一篇经济学方面的文章。其主要观点基本上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已论述的经济学观点相同。在写作过程中,马克思为埃卡留斯提供了他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所收集的资料。——677。
- 380** 厄·琼斯办的《寄语人民》在马克思的支持下,从 1851 年 5 月开始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派的合作运动展开原则性的批评。本文是琼斯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写的。这篇文章对合作问题发表了更加明确的看法。——685。
- 381** 这篇文章可能是琼斯根据马克思的倡议而写的。1851 年 9 月 24 日,帕麦

- 斯顿勋爵在梯维尔顿发表演说,反对工人为改善自己的地位而斗争,这是琼斯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文中所有事实材料都出自马克思推荐给琼斯的赛·兰格的《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一书。——695。
- 382 本文的发表受到马克思的支持。文中的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相吻合。马克思曾在1851年12月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厄·琼斯利用我的信对科苏特进行无情攻击。”——700。
- 383 示威委员会是桑·汉特为了组织一次伦敦工人的大规模示威而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目的是通过示威向科苏特表示敬意。这次示威于1851年11月3日在哥本哈根大厦前举行。科苏特曾在那里发表过演说。——702。
- 384 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魏德迈在纽约发表了一篇反对海因岑的文章,马克思决定支持魏德迈进行论战,为此去找与此有关的琼斯,琼斯在与马克思进行了详细的磋商之后,起草了这篇声明。马克思将琼斯的英文稿和德译文一起寄给魏德迈发表。根据魏德迈1853年5月24日给马克思的信来看,这篇声明曾经与魏德迈的另一篇反对海因岑的文章一起发表,但是无法查明用什么标题发表在哪家报纸上。本文是根据燕·马克思于1852年3月4日前后翻译的德文译稿译出的。——708。
- 385 本文是克路斯利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从伦敦寄到美国的有关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拖延情况的消息为《高地哨兵》撰写的一篇文章。——711。
- 386 本文是德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书信向魏德迈通报的有关在科隆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的情况写成的。——715。
- 387 本文是魏德迈根据马克思在信中提供给他材料写成的。纽约的《总汇报》没有找到,本文是粘贴在马克思1860年为准备写《福格特先生》而做的笔记里的《总汇报》剪报上的文章片断。——718。
- 388 瓦尔特堡会议是由德国大学生联合会发起、于1817年10月18日为庆祝宗教改革300周年和1813年的莱比锡会战四周年而举行的纪念大会。这次表现民族主义情绪的纪念大会成了具有反政府情绪的大学生反对梅特涅统治和拥护德国统一的示威游行。——719。
- 389 本文是魏德迈在发现德纳并未把他所提供的有关普鲁士报刊的态度的全

部情况写进《普鲁士司法》(本卷第 715—717 页)一文之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威·沃尔弗所提供的情况,自己写的一篇评述科隆案件拖延情况的文章。——722。

- 390** 圣法院是英国中世纪时期于 1487 年开始设立的法院,它曾被查理一世用来推行不得人心的政治与宗教政策,成为压制议会和反对清教徒的象征。它施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如监禁、枷刑、鞭笞和火烙等,该法院于 1641 年被长期国会废除。——723。
- 391** 马克思 1852 年夏直接参与《人民报》编辑部的工作。琼斯的这篇文章也是在马克思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写成的。发表时没有署名。——725。
- 392** 马克思在 1852 年 7 月 20 日给阿·克路斯的信中谈到英国下院选举的情况。克路斯在 1852 年 8 月 2 日的信中向魏德迈转述了马克思的信的内容。本文基本上是根据这封信的内容写成的。——728。
- 393** 《人民报》1852 年 9 月中到 12 月中匿名发表的这组文章是在马克思组织和指导下写成的。参加写作的可能是马克思的几个熟人,其中除了埃卡留斯之外,还有威·皮佩尔、厄·琼斯、威·沃尔弗等人。——731。
- 394** 新的饵雷警察滑稽戏指 1852 年 9 月底法国警方宣称在马塞发现有人企图谋杀路易·波拿巴一事。公众认为,这是再次企图为路易·波拿巴称帝作舆论准备。——734。
- 395** 本文是德纳根据马克思 1852 年 8 月和 9 月从侨居巴黎的匈牙利新闻工作者古·泽尔菲和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那些人那里得到的各种消息而写成的,匿名发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篇文章在美国产生了强烈反响,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拥护者十分愤怒,指责文章中的消息是编造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发表了两篇致《纽约论坛报》的声明(见本卷第 552—553 页和第 581—582 页)。马克思在声明中把自己同这篇文章联系在一起并承认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以往,这篇文章曾被当作马克思的著作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765。
- 396** “集中”是波兰民主协会的领导执行机关,成立于 1836 年。波兰民主协会 1832 年在法国成立,是波兰流亡者中小贵族和资产阶级左翼代表的组织。协会的纲领规定,废除农奴制度,取消封建捐税和等级不平等,将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民主协会积极地参加了 1846 年争取波兰民族解放的克拉

- 科夫起义的准备工作。1849年夏,协会的活动在法国遭到禁止,伦敦便成了“集中”的驻地,但是协会的大部分会员仍旧留在法国。50年代民主协会内部思想混乱。1862年为了准备新的起义在波兰建立了全国中央委员会,民主协会自行解散。——766。
- 397 这篇短评是魏德迈根据马克思1852年8月10日左右写给阿·克路斯的一封信写成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克路斯1852年10月15日为魏德迈摘录了马克思的信。此外,魏德迈还参考了马克思7月30日写给克路斯的信的内容。——769。
- 398 本文是皮佩尔受马克思的委托为《人民报》写的一篇文章。皮佩尔从1852年秋起,在马克思那里做些秘书工作,马克思的影响在本文中也是显而易见的。——771。
- 399 本文是《科隆日报》刊载的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在1852年11月3日和4日科隆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马克思为施奈德第二的辩护词提过建议并提供了大量的材料。——778。
- 400 皮佩尔的这篇文章继续报道了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文章是匿名发表的,但是作者指出,《人民报》上发表的前一篇有关科隆共产党人案件的文章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可以认定,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皮佩尔。——789。
- 401 本文是魏德迈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他和克路斯的信中对科隆案件的评价写成的。这些信没有保存下来。——793。
- 402 这篇《人民报》社论是琼斯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797。
- 403 黑山战争是指1852年土耳其和黑山发生的武装冲突。黑山在名义上一直是苏丹的藩属,它力求脱离苏丹而获得完全的独立。俄国曾企图调停这次冲突,但遭到土耳其政府的拒绝。1853年初,土耳其军队在奥美尔-帕沙率领下侵入黑山境内。奥地利政府担心黑山的战事和俄国保护黑山的举动引起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地区的骚乱,便派遣莱宁根伯爵率领特派使团前往君士坦丁堡,要求土耳其军队撤离黑山并恢复冲突前的状态。奥地利军队集结在黑山边境,迫使土耳其政府让步,同意接受莱宁根提出的条件,停止军事行动。——798。

人名索引

A

- 阿巴思诺特, 约翰 (Arbuthnot, John 1667—1735) —— 苏格兰医生和作家, 讽刺作品《约翰牛传》(1712) 的作者。—— 241。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 (Aberdeen, George Hamilton Gordon, Earl of 1784—1860) —— 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50 年起为皮尔派领袖, 曾任外交大臣 (1828—1830 和 1841—1846)、殖民和陆军大臣 (1834—1835) 和联合内阁首相 (1852—1855)。—— 589—594、597、624、627、636、639、644、670、671。
- 阿尔伯 (Albert 原名亚历山大·马丁 Alexandre Martin 人称工人阿尔伯 der Arbeiter Albert 1815—1895) —— 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 年二月革命时期领导巴黎工人的武装起义, 为临时政府成员, 因参加 1848 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有期徒刑, 巴黎公社的积极战士。—— 7。
- 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 康斯坦扎 (维斯康蒂公爵夫人) (Arconati Visconti, Constanca, Marquise [Visconti, Duchesse] 1801—1870) ——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767。
- 阿尔宁, 蓓蒂娜·冯 (Arnim, Bettina von 1785—1859) —— 德国浪漫派女作家, 曾积极参加当时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 歌德的崇拜者。—— 295。
- 阿尔塞尼乌斯, 圣徒 (Arsenius, der Heilige 约 354—450) —— 罗马贵族; 基督教圣徒, 隐居埃及荒漠。—— 223。
- 阿戈斯蒂尼, 切扎雷 (Agostini, Cesare 1803—1854) —— 意大利革命家, 马志尼的信徒;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 后来脱离马志尼。—— 634、641—642。
- 阿革西拉乌斯 (Agesilaus 公元前 444—361) —— 斯巴达王 (公元前 401—

361)。——201。

阿拉戈,多米尼克·弗朗索瓦(Arago, Dominique-François 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资产阶级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改革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之一;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7。

阿莱(阿莱斯),路易·皮埃尔·孔斯坦(Allais[Alais], Louis-Pierre-Constant 约生于1821年)——法国警探。——186、191。

阿里欧斯托,洛多维科(Ariosto, Ludovico 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336、337、391。

阿利博,路易(Alibaud, Louis 1810—1836)——法国无政府主义者,1836年因行刺路易-菲利浦被送上断头台处决。——779。

阿鲁埃,弗朗索瓦·玛丽——见伏尔泰。

阿姆洛·德拉乌赛,阿伯拉罕·尼古拉(Amelot de la Houssaye, Abraham-Nicolas 1634—1706)——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威尼斯政府的历史》一书的作者。——626。

阿什利——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伯。

阿斯滕,卡尔·冯(Asten, Carl von 约生于1813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阿索尔公爵,乔治·奥古斯特斯·弗雷德里克·约翰·默里(Atholl, George Augustus Frederick John Murray, Duke of 1814—1864)——苏格兰大地主。——614—615。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Athenaeus]约200)——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201。

阿提拉(Attila 死于453年)——匈奴帝国国王(434—453)。——742。

阿维安努斯(Avianus 4世纪末)——罗马寓言作家。——416。

埃布讷,海尔曼·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Ebner, Hermann Friedrich Georg 1805—1856)——德国音乐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32年底起为《法兰克福总邮报》编辑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纸的通讯员;许多出版商的中介人;最迟从1840年起成为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546。

埃尔哈德,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Erhard, Johann Ludwig Albert 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772、791。

- 埃卡留斯,约翰·弗里德里希(埃卡留斯第二)(Eccarius, Johann Friedrich [Eccarius II])——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1年起流亡伦敦;约·格·埃卡留斯的兄弟。——571。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工人政论家;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72),总委员会总书记(1867—1871年5月),美国通讯书记(1870—1872),国际各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1872年以前支持马克思,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后成为英国工联的改良派领袖,后为工联主义运动的活动家。——571,677,731。
- 埃塞尔第一,约翰·亨利希·泰奥多尔(Esser I, Johann Heinrich Theodor)——德国律师,教权派,1848年任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中间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546,548,554,557,559,568,569,777。
- 埃希特迈尔,恩斯特·泰奥多尔(Echtermeyer, Ernst Theodor 1805—1844)——德国作家和批评家,1836年同阿·卢格共同创办《哈雷年鉴》和1840年创办《德国缪斯年鉴》。——325。
- 爱德华兹,亨利(Edwards, Henry)——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1847—1852)。——413,427,431。
- 爱丽莎第一——见采勒,爱丽莎。
- 爱丽莎第二——见赫尔明豪斯,爱丽莎。
- 艾森胡特,安东(Eisenhut, Anton 死于1525年)——德国神父;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当地农民和市民起义的领袖。——303。
- 艾森曼,约翰·哥特弗里德(Eisenmann, Johann Gottfried 1795—1867)——德国医生和政论家,1848年是《德意志人民报》编辑;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后来属于左派。——14。
- 艾希霍恩,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弗里德里希(Eichhorn, Johann Albrecht Friedrich 1779—1856)——普鲁士政治家,曾在施泰因和哈登堡内阁担任多种职务,积极参与关税同盟的建立,1840—1848年任宗教事务、教育和卫生大臣,同时为书报检查三大臣之一。——26。
- 安东,古斯塔夫(Antoine, Gustave)——19世纪50年代初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奥·布朗基的妹夫。——364。

- 安东内利, 贾科莫(Antonelli, Giacomo 1806—1876)——意大利红衣主教, 教皇庇护九世的国务卿, 1850—1870年主持教皇国一切事务。——751。
- 安内克, 卡尔·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弗里茨)(Anneke, Carl Friedrich Theodor [Fritz] 1818—1872)——普鲁士炮兵军官, 1846年因进行革命活动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 1848年是科隆工人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和书记, 《新科隆日报》编辑, 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 1848年7—12月被监禁,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为指挥员, 后为革命军炮兵总监和普法尔茨军事委员会成员;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侨居美国,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1—1865)。——309。
- 昂格勒斯, 弗朗索瓦·厄内斯特(Anglès, François-Ernest 1807—1861)——法国地主,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 秩序党的代表人物。——210。
- 昂古莱姆公爵夫人, 玛丽·泰莉莎·夏绿蒂(Angoulême, Marie-Thérèse-Charlotte, duchesse d' 1778—1851)——路易十六的女儿。——736。
- 昂利第二(洛林的), 吉兹公爵(Henri II de Lorraine, duc de Guise 1614—1664)——法国弗伦特党领导人。——238。
- 奥本海姆, 亨利希·伯恩哈德(Oppenheim, Heinrich Bernhard 1819—1880)——德国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柏林《改革报》的编辑, 1849—1861年先后侨居瑞士、法国和英国;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13, 333, 359, 379—380, 387, 397, 403, 719。
- 奥当奈尔伯爵, 马克西米利安(O'Donnell, Maximilian Graf von 1812—1895)——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的侍卫官。——640。
- 奥尔良公爵——见路易-菲利浦一世(路易-菲利浦), 奥尔良公爵。
- 奥尔良公爵夫人, 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Orléans, Hélène-Louise-Elisabeth, duchesse d' 父姓梅克伦堡-什未林 Mecklenburg-Schwerin 1814—1858)——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的长子斐迪南的遗孀, 法国王位追求者巴黎伯爵的母亲。——143, 172。
- 奥尔良王朝——法国王朝(1830—1848)。——150, 155, 157, 159—161, 170, 171, 174, 178, 197, 198, 200, 202—207, 215, 220, 224, 228, 238, 261, 265, 731, 734, 736, 759。
- 奥尔斯瓦尔德, 汉斯·阿道夫·埃尔德曼·冯(Auerswald, Hans Adolf Erdmann von 1792—1848)——普鲁士将军,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 1848年9月法兰克福起义时与费·玛·利希诺夫斯基公爵一起被人民打死；鲁·冯·奥尔斯瓦尔德的哥哥。——519。
- 奥尔斯瓦尔德，鲁道夫·冯(Auerswald, Rudolf von 1795—186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自由派贵族的代表，曾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6—9月)，普鲁士第一议院议长(1849—1850)，不管大臣(1858—1862)；汉·阿·埃·冯·奥尔斯瓦尔德的弟弟。——78。
- 奥弗—甘曼公司(Offor & Gamman)——英国的一家轮船公司。——601。
-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tus[Gaius Julius Caesar 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626。
- 奥古斯滕堡家族——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爵世家(1627—1866)。——357。
- 奥康奈尔，丹尼尔(O'Connell, Daniel 1775—1847)——爱尔兰律师和政治家，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自由派右翼领袖。——339、444。
- 奥康瑙尔，菲格斯·爱德华(O'Connor, Feargus Edward 1794—1855)——英国宪章运动的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出版者；1848年后成为宪章运动的右翼代表人物。——702。
- 奥普尔侯爵，阿尔丰斯·昂利(Hautpoul, Alphonse-Henri, marquis d'1789—1865)——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陆军部长(1849—1850)。——173、179、187—189。
- 奥斯本，托马斯，丹比伯爵，卡马森侯爵，利兹公爵(Osborne, Sir Thomas, Earl of Danby, Marquis of Carmarthen, Duke of Leeds 1631—1712)——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1674—1679和1690—1695)；1695年被议会指控犯有贪污罪。——594。
- 奥斯瓦尔德，欧根(Oßwald [Osswald], Eugen 1826—1912)——德国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为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344。
- 奥托，卡尔·武尼巴德(Otto, Karl Wunibald 1808—1862以后)——德国化学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50—1851年是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派往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特使(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5年徒

刑,1856年9月底获释。——256—257,711—712,716,723,772,789,791。

B

巴巴罗萨(红胡子)——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

巴贝夫,格拉古(Babeuf, Gracchus 原名弗朗索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 1760—1797)——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1796年是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密谋失败后被处死。——779。

巴兹,让·狄德埃(Baze, Jean-Didier 1800—1881)——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206,220。

巴尔贝斯,西吉斯蒙·奥古斯特·阿尔芒(Barbès, Sigismond Auguste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团体四季社的领导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因参加1848年五月十五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1854年遇赦;后流亡荷兰,不久即脱离政治活动。——363,750。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239。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创始人和理论家;1840年起侨居国外,曾参加德国1848—1849年革命;1849年因参与领导德累斯顿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给沙皇政府,囚禁期间向沙皇写了《忏悔书》;1861年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伦敦;1868年参加第一国际活动后,在国际内部组织秘密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妄图夺取总委员会的领导权;由于进行分裂国际的阴谋活动,1872年在海牙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第一国际。——104。

巴拉盖·狄利埃伯爵,阿希尔(Baraguay d'Hilliers, Achille, comte 1795—1878)——法国将军,1854年起为元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统率巴黎卫戍部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53—1854),1854年指挥波罗的海的法国远征军;在1859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1870年任巴黎武装力量总司令。——196,208。

巴里利,朱洋培(Barilli, Giuseppe 假名奎里科·菲洛潘蒂 Quirico Filopanti

- 1812-1894)——意大利物理学教授,共和主义者;罗马制宪议会议员;1864年为意大利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成员。——634。
- 巴罗,卡米耶·亚桑特·奥迪隆(Barrot, Camille-Hyacinthe-Odilon 1791—1873)——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1848年12月—1849年10月任内阁总理,领导各个保皇集团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1849年11月内阁辞职后脱离政治活动。——151—153、157、171—173、183、198、200、207、216、740。
- 巴罗什,皮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代表人物,波拿巴主义者;1849年为上诉法院的首席检察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前和以后曾数度入阁。——179、191、192、195—197、201。
- 巴塞爾曼,弗里德里希·丹尼尔(Bassermann, Friedrich Daniel 1811—1855)——德国书商和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巴登政府在联邦议会中的代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81。
- 巴泰勒米,艾曼纽埃尔(Barthélemy, Emmanuel 1820左右—1855)——法国工人,布朗基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是秘密革命团体的成员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363、365。
- 巴特勒,赛米尔(Butler, Samuel 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革命浪漫派的代表;《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464、607。
- 巴伊,让·西尔万(Bailly, Jean-Sylvain 1736—1793)——法国天文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自由立宪资产阶级领导者之一;任巴黎市长期间(1789—1791)曾下令向马尔斯广场上的要求建立共和国的游行示威群众开枪射击(1791),因此在1793年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133。
- 白尔尼,卡尔·路德维希(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德国政论家和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写有向德国人介绍法国革命事件的《巴黎来信》;晚年成为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拥护者。——339。
- 拜伦,乔治·戈登·诺埃尔(Byron, George Gordon Noël, Lord 1788—

- 1824)——英国诗人,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740。
- 邦迪埃拉,阿蒂利奥(Bandiera, Attilio 1810—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356。
- 邦迪埃拉,埃米利奥(Bandiera, Emilio 1819—1844)——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奥地利舰队的军官,“青年意大利”成员;因企图在卡拉布里亚发动起义而被处死(1844),前者之弟。——356。
- 鲍蒂扬尼伯爵,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Batthyány, Lajos [Louis, Ludwig] Graf von 1806—1849)——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革命政府总理(1848年3—9月);革命被镇压后遭枪杀。——663、701。
- 鲍威尔,布鲁诺(Bauer, Bruno 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宗教和历史研究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34年在柏林大学、1839年在波恩大学任非公聘神学教师,1842年春因尖锐批判圣经而被剥夺教职;1842年为《莱茵报》撰稿人;早期为黑格尔正统派的拥护者,1839年后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理论家,自我意识哲学的代表;1837—1842年初为马克思的朋友;1842年夏天起为“自由人”小组成员;1848—1849年革命后为《新普鲁士报》《十字报》的撰稿人;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写有一些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85、297、325、327、334、347、348。
- 鲍威尔公司(Powell & Co.)——英国的一家皮革公司。——601。
- 保罗斯,亨利希·埃伯哈德·哥特洛布(Paulus, 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1761—1851)——德国新教神学教授,神学上唯理论的主要代表。——369。
- 贝多,玛丽·阿尔丰斯(Bedeau, Marie-Alphonse 1804—1863)——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副议长(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国。——136、158、197。
- 贝尔,约翰(Bär [Baer], Johann)——19世纪50年代初期是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571。
- 贝尔姆巴赫,阿道夫(Bermbach, Adolph 1822—1875)——德国法学家,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马克思和案件被告人之间的联系人;后为自由主义者。——503—507、510、547、781。
- 贝尔纳(Bernard)——法国上校,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参加者的军事委员,

- 会主席；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对反拿破仑第三的共和派的审判的组织者之一。——149。
- 贝尔纳，拉尔夫(Bernal, Ralph 死于1854年)——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会议员；1830—1850年任议院委员会主席。——441。
- 贝尔纳-奥斯本，拉尔夫(Bernal Osborne, Ralph 1808—1882)——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会议员；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52—1858)。——592、740。
- 贝尔奈斯，拉撒路·斐迪南·策莱斯廷(Bernays, Lazarus Ferdinand Coelestin 人称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 Karl Ludwig Bernays 1815—1879)——德国激进派政论家，40年代初是巴黎正义者同盟盟员；1844年参加巴黎的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编辑部；1848年春成为巴黎的德意志民主协会会员；1848—1849年革命后侨居美国。——330。
- 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Becker, Hermann Heinrich“红色贝克尔”der“rote Becker” 1820—1885)——德国地方法院见习法官和政论家，科隆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8—1849)，《西德意志报》的发行人(1849年5月—1850年7月)；1850年底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5年徒刑；60年代是进步党人，后为民族自由党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2—1866)，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74)；1875年起为科隆市长。——120、256、475、505—506、536—537、539、546—547、711、716、722、772、782、783、786、787、789、791。
- 贝克拉特，海尔曼·冯(Beckerath, Hermann von 1801—187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48年8—9月任帝国政府的财政大臣；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1852)和爱尔福特议会议员(1850)；支持普鲁士的联盟政策。——115、373。
- 贝克莱，弗兰西斯·亨利·菲茨哈丁(Berkeley, Francis Henry Fitzhardinge 1794—1870)——英国政治家，自由党人，会议员。——430。
- 贝克曼(Beckmann)——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科隆日报》驻巴黎记者。——494。
- 贝朗瑞，皮埃尔·让·德(Béranger, Pierre-Jean de 1780—1857)——法国诗人，以写政治讽刺诗而著称，他在诗歌中抨击封建反动势力、教权主义和现存社会制度。——245、751。
- 贝雷斯福德，威廉(Beresford, William 1797—1883)——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

- 议会议员,曾任陆军大臣(1851年3—12月)。——412、426、434、583、584。
- 贝里耶,皮埃尔·安东(Berryer, Pierre-Antoine 1790—1868)——法国律师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正统主义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61、178、198、205、207、209、213、733。
- 贝利, J. (Bailey, J.) —— 617。
- 贝利, W. (Bailey, W.) —— 617。
- 贝利尼,文钦佐(Bellini, Vincenzo 1801—183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288。
- 贝林,弗兰西斯·桑希尔,诺思布鲁克男爵(Baring, Sir Francis Thornhill, Baron Northbrook 1796—1866)——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839—1841),海军首席大臣(1849—1852)。——624。
- 贝留,理查·孟德斯鸠(Bellew, Richard Montesquieu 1803—1880)——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47—1852)。——441。
- 贝姆,约瑟夫(Bem, Józef 1794—1850)——波兰将军,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1830—1831年起义的领导人;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是匈牙利革命军领导人;革命失败后避难土耳其,入伊斯兰教,被苏丹封为穆拉德帕沙,任土耳其军队指挥官。——71、370。
- 贝努瓦·达济伯爵,德尼(Benoist [Benoît] d'Azy, Denis, comte 1796—1880)——法国政治家、金融家和工业家;正统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副议长(1849—1851)。——200、205。
- 贝塔——见贝特齐希,亨利希。
- 贝特齐希,亨利希(Bettziech, Heinrich 笔名贝塔 Beta 1813—1876)——德国作家、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哈雷年鉴》等许多民主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报刊的撰稿人;1846年为柏林自由贸易协会创始人之一;1848年三月革命后流亡英国,1851年负责编辑周刊《您好!》;1868年返回德国;哥·约·金克尔的拥护者。——120。
- 贝谢尔,奥古斯特(Becher, August)——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09。
- 李尔只斤铁木真——见成吉思汗。
- 倍克,卡尔·伊西多尔(Beck, Karl Isidor 1817—1879)——奥地利诗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33—34。
- 倍克,威廉娜(Beck, Wilhelmine 死于1851年)——匈牙利女冒险家,曾冒充男

- 爵夫人和科苏特的政治情报员；英国警察局的密探。——122—125。
- 倍蒂娜——见阿尔宁，倍蒂娜·冯。
- 本生，克里斯蒂安·卡尔·约西亚斯男爵(Bu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Freiherr von 1791—1860)——普鲁士外交家、政治家和神学家，曾任驻梵蒂冈的代表(1824—1839)和驻伦敦公使(1842—1854)。——673。
- 比安科(比安卡)，弗兰茨·约瑟夫·冯(Bianco [Bianca], Franz Joseph von)——德国骑士、庄园主和法律顾问，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 比恩包姆，威廉(Birnbaum, Wilhelm)——科隆济贫所秘书，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510、511。
- 比斯康普，埃拉尔德(Biscampe [Biskamp], Elard)——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9年创办伦敦的德国流亡者的周报《人民报》，报纸从第2号起就在马克思直接参与下出版。——719。
- 比约，奥古斯特·阿道夫·玛丽(Billault, Auguste-Adolphe-Marie 1805—1863)——法国政治家，律师，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会议议员(1848—1849)；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大臣(1854—1858和1859—1860)。——200。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172。
-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公元前571左右—497)——古希腊数学家和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派的创始人；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数，相信灵魂转生。——379。
- 毕尔格尔斯，约翰·亨利希(Bürgers, Johann Heinrich 1820—1878)——德国政论家，《莱茵报》撰稿人(1842—1843)，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8—1849年是《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1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为民族自由党人；60年代为民族联盟盟员和杜塞尔多夫《莱茵报》的编辑。——256、475—477、536、545、711、716、722、772—774、778、786、789、791、794。
- 毕克列尔，约翰(Bückler, Johann 又名施因德汉斯，意即屠夫汉斯 Schinderhannes 1777—1803)——德国强盗，莱茵黑森匪邦的魁首，后在美因茨被处死；在德国文学中施因德汉斯作为1“侠盗”，打抱不平的斗士，穷人的保护者

的形象久享盛名。——499。

宾索, 克里斯蒂安(Bünsow, Christian 死于 1852 年)——德国基尔一家书店老板(1841—1846), 1851 年起为汉堡阿尔托纳区艾姆斯比特尔一家客店的老板。——379。

波埃利奥男爵, 卡洛(Poërio[Poerio], Carlo Baron 1803—1867)——意大利政治活动家, 自由主义者, 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议会议员(1848—1849), 那不勒斯的警务长官和教育大臣(1848); 1849 年为意大利统一大会社成员, 后被判处 24 年徒刑, 1858 年越狱而逃, 1859 年被流放到南美, 途中逃到英国; 后来成为撒丁王国参议员, 意大利王国议会副议长(1861—1867)。——715。

波兹——见狄更斯, 查理。

波尔多公爵——见尚博尔伯爵, 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 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波克罕, 西吉斯蒙德·路德维希(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6—1885)——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商人, 民主主义者, 1848 年巴登起义和 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 1851 年起在伦敦经商; 50 年代初追随伦敦小资产阶级流亡者; 1860 年起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关系。——719。

波克兰, 让·巴蒂斯特——见莫里哀。

波林尼雅克亲王, 茹尔·奥古斯特·阿尔芒·玛丽(Polignac, Jules-Auguste-Armand-Marie, prince de 1780—1847)——法国国务活动家, 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 曾任外交大臣和首相(1829—1830)。——207。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波拿巴-帕特森, 日罗姆(Bonaparte-Patterson, Jérôme 1805—1870)——日·波拿巴的儿子。——766。

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拿破仑亲王(Bonaparte, Napoléon-Joseph Charles-Paul, prince Napoléon 又名日罗姆 Jérôme 绰号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 Plon-Plon et prince rouge 1822—1891)——法国政治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 1854 年在克里木指挥一个师, 在 1859 年奥意法战争中任军长; 普法战争初期曾参加关于法意反普同盟的谈判; 日·波拿巴的儿子, 拿破仑第三的堂弟, 其兄死后(1847)改名日罗姆。——766。

波拿巴,皮埃尔·拿破仑(Bonaparte, Pierre-Napoléon 1815--1881)——法国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为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拿破仑第三的堂弟。——766。

波拿巴,日罗姆(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威斯特伐利亚国王(1807—1813),1850年起为法国元帅;拿破仑第一的弟弟。——766。

波拿巴王朝——法国皇朝(1804—1814,1815和1852—1870)。——134,228—230。

波旁王朝——法国王朝(1589—1792,1814—1815和1815—1830)。——150、159,202—206,228。

波普利科拉(普卜利科拉)(普卜利乌斯·瓦莱里乌斯·波普利科拉[普卜利科拉])(Publius Valerius Poplicola[Publicola]死于公元前503年)——据传说是罗马共和国任期一年的执政官。——132。

波特,乔治·理查森(Porter, George Richardson 1792—1852)——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696。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新闻工作者和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后为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1871年国民会议议员,反对巴黎公社。——6,131,362—364,366。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1848)——德国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副议长和法兰克福国民会议议员,为左派领袖之一;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参加者,在反革命军队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76,77,86,363。

伯格霍尔德(Böghold)——哥·约·金克尔的姐姐约·金克尔的未婚夫。——294。

伯格霍尔德,索菲娅(Bögehold, Sophie)——哥·约·金克尔的女友。——294、299,300。

伯克尔, J. A. (Boecker, J. A.)——德国科隆市议会议员;1849年5月参加在科隆举行的莱茵省区乡委员会代表大会。——546。

伯里特,伊莱休(Burritt Elihu 1810—1879)——美国语言学家,博爱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的组织者。——348。

柏拉图(Plato 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662。

博布钦,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卡尔(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1826年)——德国钟表匠帮工, 1847年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会员,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伦敦, 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 1850年4月底成为该协会司库; 1851年离开伦敦。——344。

博丹, 沙尔(Baudin, Charles 1784—1854)——法国海军上将。——738。

博马舍, 皮埃尔·奥古斯坦·卡龙·德(Beaumarchais, Pierre-Augustin Caron de 1732—1799)——法国剧作家。——494, 517, 539。

博纳尔德子爵, 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Bonald, Louis-Gabriel-Ambroise, vicomte de 1754—184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 保皇派, 复辟时期的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17。

博雅多, 马泰奥·马利亚(Boiardo [Bojardo], Matteo Maria 1441左右—1494)——意大利诗人, 《恋爱中的罗兰》一诗的作者。——335, 385, 391, 407。

跛帖木儿——见帖木儿。

不伦瑞克公爵——见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

布尔, 路德维希·亨利希·弗兰茨(Buhl, Ludwig Heinrich Franz 1814—1882)——德国作家和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博士俱乐部”和“自由人”小组成员, 《莱茵报》(1842)及其他许多报刊的撰稿人; 《爱国者》杂志的出版者。——378。

布尔沃, 爱德华·乔治, 利顿男爵(Bulwer, Edward George, Baron Lytton 1803—1873)——英国政治家和作家, 辉格党人, 1852年起为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 曾任殖民大臣(1858—1859)。——740。

布赫尔, 阿道夫·洛塔尔(Bucher, Adolph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司法推事和政论家; 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左翼;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 柏林《国民报》通讯员; 后为民族自由党人, 俾斯麦的拥护者; 50年代赞同戴·乌尔卡尔特的的外交观点。——120, 362, 366, 395。

布拉莫尔(Brammall)——英国教士。——655。

布拉瑟顿, 约瑟夫(Brotherton, Joseph 1783—1857)——英国厂主, 自由贸易派, 选举制度改革的拥护者; 议会议员。——629—630。

布莱克, 弗里德里希(Bleek, Friedrich 1793—1859)——德国新教神学家, 先后任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教授。——279。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的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251、442、463、573、592、597、630—633、656、705、708。

布兰克父子公司(Blank, G. & Sohn)——伦敦一家贸易公司。——547。

布朗德尔·德·奈尔(Blondel de Néele)——12世纪末—13世纪初的法国行吟诗人;传说他是英王狮心理查的宫廷诗人,曾把被奥国俘虏的英王解救出来。——314。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团体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139、224、363—365、733、747—749、786。

布劳巴赫(Braubach)——546。

布利丹,让(Buridan, Jean 1300左右—1358以后)——法国哲学家,唯名论者;认为意志自由特别是选择自由的问题在逻辑上是不可解决的;据说他讲了一个驴子的故事:一头驴子在两个完全相同的草堆之间,无法进行选择,结果只好饿死。“布利丹的驴子”就成了一句俗语。——218、299。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为临时政府成员;与马克思同去伦敦,在那里成为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成员;1849—1850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撰稿人;50年代中期起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60年代起是民族自由党人,普法战争期间和战后为极端沙文主义者。——333—334。

布鲁讷(Brune)——德国施潘道监狱狱卒。——315。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 Junius Brutus 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132、524。

布伦奇里,约翰·卡斯帕尔(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8—1881)——瑞士法

- 学家和政治家；对革命运动参加者实行警察迫害的策划者之一；瑞士政府于1843年设立的瑞士境内德国流亡者活动调查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于1843年公布的工作报告的起草人。——779。
- 布伦坦诺，克莱门斯(Brentano, Clemens 1778—1842)——德国抒情诗人，浪漫派的主要代表。——298。
- 布伦坦诺，洛伦茨·彼得·卡尔(Brentano, Lorenz Peter Karl 1813—1891)——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迁居美国；1878年起为美国国会议员。——105、113、131、320、323、333、336、380、382、383、404、719。
- 布罗伊公爵，阿希尔·沙尔·莱昂斯·维克多(Brogie, Achille-Charles-Léonce-Victor, duc de 1785—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阁首相(1835—1836)，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78、207。
- 布吕格曼，卡尔·亨利希(Brüggen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1830年起为德国大学生联合会领导人，1832年参加汉巴赫大典，1832—1840年被监禁；1842—1843年为《莱茵报》撰稿人，1845—1855年为《科隆日报》主编；1848—1849年革命时期持保守派立场。——335。
- 布瓦绍，让·巴蒂斯特(Boichot, Jean-Baptiste 1820—1889)——法国政治家，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之一；1854年回到巴黎，又遭警察迫害和监禁，1859年获释。——158。
- B公司(B & Co.)——547。

C

- 采勒，爱利莎(爱利莎第一)(Zeller, Elise[Elise I])——保·采勒的妹妹。——281、283—286、290。
- 采勒，保尔(Zeller, Paul)——哥·约·金克尔在波恩大学的学友。——279—285。
- 察贝尔，弗里德里希(Zabel, Friedrich 1802—1875)——德国政论家，自由主义者，柏林《国民报》编辑(1848—1875)，民族联盟的创始人之一。——378。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Charles I 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634。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les I,Charlemagne 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50、612、749。

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1162—1227)。——742。

D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James Andrew Broun-Ramsaey,Marquess and Earl of 1812—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461。

达尔林普尔,约翰(Dalrymple,Sir John 1726—1810)——苏格兰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一书的作者。——614。

达尔曼,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Dahlmann,Friedrich Christoph 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29年起为格丁根大学教授,1837年为“格丁根七贤”之一,因拒绝宣誓效忠而被赶出格丁根,1842年被聘为波恩大学教授,1848—1849年为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850年为爱尔福特议会议员,后脱离政治生涯;写有丹麦、德国、英国和法国史方面的著作。——24。

达菲,查理·加万(Duffy,Charles Gavan 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爱尔兰”领导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创建人之一,议会议员;1856年流亡澳大利亚,曾多次任国家职务。——597、651。

达盖尔,路易·雅克·芒代(Daguerre,Louis-Jacques-Mandé 1787—1851)——法国画家,摄影术的首创者之一,1839年创造了达盖尔银版照相法。——216。

达拉什,阿尔伯特(Darasz,Albert 1808—1852)——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领导成员,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委员。——131、346、350、368。

达来朗-贝里戈尔,沙尔·莫里斯·德,贝内文特亲王(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de,prince de Bénévent 1754—1838)——法国外交家,外交大臣(1797—1799、1799—1807和1814—1815),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1814—1815)的代表,驻伦敦大使(1830—1834)。——394。

达姆(Damm)——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396。

大利,彼得(Ailly, Pierre d' 1350—1420)——法国传教士,神学家,红衣主教(1410年起),康斯坦茨宗教会议的重要人物。——236。

大仲马,亚历山大(Dumas père, Alexandre 1802—1870)——法国作家。——740。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s-Jacques 1759—1794)——法国政治家和法学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右翼领袖。——99、131、132。

丹尼尔斯,阿马利亚(Daniels, Amalie 父姓弥勒 Müller 1820—1895)——罗·丹尼尔斯的妻子。——508—510、541、713、782。

丹尼尔斯,罗兰特(Daniels, Roland 1819—1855)——德国医生,1846年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领导人,1850年起为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委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第一批尝试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自然科学领域的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256、475、546、711、713、716、722、772、791。

道布尔迪,托马斯(Doubleday, Thomas 1790—1870)——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626。

德·梅斯特尔——见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Lord Stanley of Bickerstaffe, Earl of 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427、434、435、440、444、455—458、461—463、465、466、583、587、590、591、593、597、627、632、636、728。

德布勒,路德维希(Döbler, Ludwig 1801—1864)——奥地利幻术演员,表演过“渐淡和渐换他影的幻灯影”。——317。

德福塞,罗曼·约瑟夫(Desfossés, Romain-Joseph 1798—1864)——法国海军上将,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1851),1849年11月—1851年1月任海军部长。——194、195。

德弗洛特——见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

德拉罗卡——见莫罗佐·德拉罗卡,恩里科。

德朗克,恩斯特(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和作家,曾一度受“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影响;1848年初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7月是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往瑞士的特使;1852年4月底流亡英国;科隆共产党人案件时期(1852)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警察当局的丑恶行径;国际会员;70年代脱离政治活动而经商。——275、328、513、523—527、571、713。

德鲁克尔,路易(Drucker, Louis)——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年为伦敦幽默周刊《您好!》的出版者。——120。

德·梅斯特尔伯爵——见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

德穆兰,吕西·西姆普利斯·卡米尔·贝努瓦(Desmoulins, Lucie-Simplice-Camille-Benoist 1760—1794)——法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右翼雅各宾党人。——132。

德纳,查理·安德森(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美国新闻工作者,废奴主义者,40—60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美国新百科全书》编辑,1868年起为《太阳报》主编。——552、581、715、765。

德斯特尔,卡尔·路德维希·约翰(D' Ester [d' 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3—1859)——德国医生,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曾在科隆的民主运动中起领导作用,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支部成员;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普鲁士制宪议会和第二议院议员,属于左派;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重要作用并支持普法尔茨临时政府;后来流亡瑞士。——310。

邓达斯,戴维(Dundas, David 1799—1877)——英国政治家和法学家;首席检察官(1849—1852)。——441。

狄茨,奥斯瓦尔德(Dietz [Diez], Oswald 1824左右—1864)——德国建筑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后来是该集团中央委员会委员;1852年赴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361、481—483、489、491、492、494、496、502、507、510、511、537、547、555、560、566、775、776。

- 狄德罗, 德尼(Diderot, Denis 1713—1784)——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 启蒙思想家,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319、378。
- 狄更斯, 查理(Dickens, Charles 笔名波兹 Boz 1812—1870)——英国现实主义作家。——316。
- 狄摩西尼(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政治家和演说家, 雅典的反马其顿派的领袖, 奴隶主民主制的拥护者; 雅典同盟反马其顿战争失败后(公元前338)被驱逐出雅典。——334。
- 迪法尔——见卢格, 路易莎。
- 迪费公司(Du Fay & Co.)——英国曼彻斯特一家纺织公司。——599、602、603。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英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 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 托利党领袖, 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 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8), 内阁首相(1868和1874—1880)。——440、454、573—579、584—587、592、593、627、632、638、640、645—649。
- 蒂茨, 弗里德里希·威廉(Tietz,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1823年)——德国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493。
- 蒂康奈尔伯爵, 约翰·德拉瓦尔·卡彭特(Tyrconnel, John Delaval Carpenter, Earl 1790左右—1853)——英国贵族。——626。
- 都铎王朝——英国的王朝(1485—1603)。——709。
- 杜班, 安德烈·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Marie-Jean-Jacques 人称大杜班 Dupin aîné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众议院议长(1832—1839),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和立法议会议长(1849—1851);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63、186—187、191、192。
- 杜邦-德勒尔, 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家, 自由主义者, 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 1830年以前是烧炭党领导成员; 40年代是王朝反对派的代表, 接近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 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 后为国民议会议员。——7、239。
- 杜恩韦克, 胡果(Dünweg, Hugo)——德国建筑师, 哥·约·金克尔的朋友。——285。

杜朗,鲁道夫(Dulon,Rudolph 1807—1870)——德国牧师,反官方教会的“光明之友”运动的拥护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1850年为《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撰稿人,1850年3月起任主编;1853年流亡美国。——330、346、347。

杜里厄,克萨维埃(Durrieu,Xavier 1817—1868)——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后迁居西班牙。——734—739。

杜普拉,帕斯卡尔(Duprat,Pascal 1815—1885)——法国政治家和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193。

杜沙特尔伯爵,沙尔·玛丽·汤讷吉(Duchâtel,Charles-Marie-Tanneguy,comte 1803—1867)——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34—1836)和内务大臣(1839—1840和1840—1848年2月)。——206、330。

杜扎尔——见司徒卢威,阿马利亚·冯。

多布尔霍夫-迪尔男爵,安东(Doblhoff-Dier,Anton Freiherr von 1800—1872)——奥地利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任商业大臣(5月)和内政大臣(7—10月)。——66。

多德森,约翰(Dodson,Sir John 1780—1858)——英国特权法院的法官(1852—1857)。——649。

多克西(Doxey)——617。

E

恩格斯(Engels)——德国科隆的新教牧师。——300。

F

法济,让·雅克(詹姆斯)(Fazy,Jean Jacques[James]1794—1878)——瑞士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激进派,曾任日内瓦州政府首脑(1846—1853和1855—1861),瑞士银行的创办人。——323—324。

法卢伯爵,弗雷德里克·阿尔弗勒德·皮埃尔(Falloux,Frédéric-Alfred-Pierre,comte de 1811—1886)——法国政治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场的策划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第二共和国

- 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曾任教育和宗教部长(1848—1849)。——157、171、172、207、209。
- 法农(Fanon)——法国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261。
- 菲埃斯基(Fieschi)——1850年在伦敦的流亡者。——779。
- 菲尔登,约翰(Fielden, John 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654。
- 菲尔斯滕贝格男爵(Fürstenberg, Freiherr von)——普鲁土地主,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04、476、543。
- 菲克勒尔,约瑟夫(Fickler, Joseph 1808—1865)——德国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民主运动领导人;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成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以后流亡英国和美国。——116、378、380、382、394、397、398、400、403、537、719。
- 菲洛潘蒂,奎里科——见巴里利,朱泽培。
- 斐迪南一世(Ferdinand I 1793—1875)——奥地利皇帝(1835—1848)。——59、65—67、76。
- 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Ferdinando II, Ferdinand II 绰号炮弹国王 King Bomba 1810—1859)——那不勒斯国王和西西里国王(1830—1859)。——60、715、715、723、742、751。
-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302、325、330、334。
- 费尔贝恩,威廉(Fairbairn, William 1789—1874)——英国厂主,工程师和发明家。——450。
- 费伦齐(Ferenczi)——匈牙利女歌唱家。——765。
- 费奈迭,雅科布(Venedey, Jakob 1805—1871)——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30年代是巴黎流亡者同盟领导人,1848—1849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340。
- 费舍(Fisher)——546。
- 费特尔·冯·多根费尔德,安塔尔(Vetter von Doggenfeld, Antal 1803—1882)——匈牙利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流亡意大利和瑞士;1867年返回匈牙利。——765—766。

- 弗莱里格拉特,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德国诗人,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50年代脱离革命斗争,50—60年代为瑞士银行伦敦分行职员。——119、121、272、273、304、516—517、548—549、554—558、559—562、571、673。
-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Franz-Joseph I 1830—1916)——奥地利皇帝(1848—1916)。——85、640。
- 弗兰茨一世(Franz I 1768—1835)——奥地利皇帝(1804—1835),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92—1806),称弗兰茨二世。——32、35。
- 弗兰格尔伯爵,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Graf von 1784—1877)——普鲁士将军,1848年11月参加普鲁士反革命政变,驱散普鲁士国民议会;1856年起为陆军元帅;丹麦战争时期(1864)任普奥联军总司令。——79、80、332。
- 弗兰克,古斯塔夫(Frank, Gustav 死于1860年)——奥地利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初侨居伦敦。——398。
- 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1515—1547)。——158。
-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Friedrich-August II 1797—1854)——萨克森国王(1836—1854)。——98。
-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helm III 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17—19。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1840—1861)。——17—21、26、36、41、42、79、81、85、89、91、93、298、481、557、643、670、719、791—792。
- 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Friedrich I Barbarossa 1123左右—1190)——1152年起是德国国王,后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386。
-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路德维希(Friedrich Heinrich Ludwig 人称亨利希亲王 Prinz Heinrich 1726—1802)——普鲁士王储,军事活动家和外交家,七年战争(1756—1763)的参加者;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664。
- 弗龙德,维克多(Frondes, Voctor)——法国军官,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流放阿尔及利亚,后流亡比利时。——635。
- 弗略里(Fleury)——查·弗略里的妻子。——524、526。
- 弗略里,查理(Fleury, Charles 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克劳泽 Carl

- Friedrich August Krause 生于 1824 年)——德国商人,在伦敦经商,普鲁士的间谍和警探。——488—493、500、511—515、521—528、538、539、541、550、556、561、566、567、569、791。
- 弗罗斯特,约翰(Frost, John 1784—1877)——英国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38年起为宪章运动的拥护者;由于组织 1839 年威尔士的矿工起义,被判终身流放至澳洲;后来被赦免并在 1856 年回到英国。——430、466。
- 弗洛孔,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山岳党人;1851 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7。
- 弗洛特(德弗洛特),保尔·路易·弗朗索瓦·勒奈·德(Flotte [Deflotte], Paul-Louis-François-René de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巴黎 1848 年五月十五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参加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60 年参加了加里波第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78。
-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 年逃往瑞士,50—60 年代是路·波拿巴雇用的密探。——100、109。
- 福克斯,威廉·约翰逊(Fox, William Johnson 1786—1864)——英国政治家、传教士和政论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442。
- 福禄培尔,尤利乌斯(Fröbel [Froebel], Julius 1805—1893)——德国自然科学家,政论家和进步书籍出版者,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1843 年底—1844 年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德意志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1857 年回到欧洲,为奥地利政府撰写时评。——76。
- 福伦,奥古斯特·阿道夫·路德维希(Follen, August Adolf Ludwig 1794—1855)——德国诗人、政论家和政治家,曾参加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1815 年后参加反政府的学生运动;1821 年流亡瑞士。——340、347。
- 福适,莱昂(Faucher, Léon 1803—1854)——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 年 12 月—1849 年 5 月和 1851)。——179、201、206。

- 福韦尔,斐迪南·奥古斯特(Fauwell, Ferdinand August 约生于1795年)——德国政府参事和印花税总监。——476。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Juliu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113、120、378—380。
- 伏尔泰(Voltaire 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François-Marie Arouet 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379。
- 傅阿德帕沙(傅阿德-埃芬蒂),穆罕默德(Fuad Pasha [Fuad Effendi], Mehmed 约1815—1869)——土耳其国务活动家,1848年是驻多瑙河两公国的政府专员,曾任外交大臣(1852—1853)和总理大臣(1861—1866)。——674。
- 傅立叶,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22。
- 富尔德,阿希尔(Fould, Achille 1800—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849),任财政部长(1849—1851),财政大臣(1861—1867),国务大臣和皇廷事务大臣(1852—1860)。——173、194、196、209。

G

- 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Gaius Julius Caesar Germanicus [Caligula] 12—41)——罗马皇帝(37—41)。——153。
- 盖尔温努斯,格奥尔格·哥特弗里德(Gervinus, Georg Gottfried 1805—1871)——德国历史编纂学家和文学史家,自由派;1844年起为海德堡大学教授,1847—1848年10月是《德意志报》的编辑,1848年是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25。
- 盖格尔,威廉·阿尔诺德(Geiger, Wilhelm Arnold)——普鲁士警官,1848年任法院侦查员,后为科隆警察局长。——503。
- 甘米奇,罗伯特·乔治(Gammage, Robert George 1815左右—1888)——英国政论家和宪章运动活动家,职业是鞍匠和鞋匠;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

- 委员(1852—1853);《宪章运动史》一书的作者。——469。
- 哥林格尔,卡尔(Göhringer, Karl 约生于1808年)——德国巴登小酒店老板,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在伦敦开设小酒店,那里成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370、377。
- 哥若夫斯基,塔杰乌什(Gorzowski [Gorzowsky, Taddäus], Thaddäus)——波兰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流亡法国,波兰民主协会会员。——766。
- 哥特弗里德(斯特拉斯堡的)(Gottfried von Straßburg 约12世纪末—13世纪初)——德国诗人,骑士诗《特里斯坦和伊佐尔达》的作者。——285、290。
- 歌德,约翰·沃尔夫冈·冯(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137、153、280、283、287、290、292、293、300、314、378、544、746、747。
- 戈尔德海姆,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奥古斯特(Goldheim, Friedrich Theodor August 约生于1807年)——普鲁士警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478、504、511—518、520—525、530。
- 戈尔盖,阿尔图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匈牙利将军,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背叛匈牙利革命,率领所属部队向沙皇军队投降。——74、370、663。
- 戈克,阿曼德(Goegg, Armand 1820—1897)——德国海关官员、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862年返回德国;日内瓦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创建人之一;国际会员;70年代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16、323、371—374、378、380—383、392、394—399、403、718—721。
- 格贝尔特,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Gebert, August Friedrich)——德国木匠,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巴登起义和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流亡瑞士,1850年迁往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并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361、537—539。
- 格伯尔,亨利希·奥古斯特(Göbel, Heinrich August)——德国上诉法院参事,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法庭庭长。——478、521、543。
- 格拉古——见巴贝夫,弗朗索瓦·诺埃尔。
- 格拉古(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53—121)——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23—122),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

- 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弟弟。——132。
- 格拉古(提比里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162—133)——古罗马的护民官(公元前133),曾为农民利益进行争取实现土地法的斗争;盖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的哥哥。——132。
-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420、443、462、595、607、624、637、715。
- 格赖夫,弗里德里希·威廉(Greif, Friedrich Wilhelm 约生于1819年)——普鲁士警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局密探。——478、498、500、504、512—515、523—525、527、528、530、538、561、566、567、569、791。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Granier de Cassagnac, Bernard-Adolphe 1806—1880)——法国新闻工作者,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52—1870);曾为《立宪主义者报》撰稿,50年代为《国家报》主编。——239、737。
-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441。
- 格雷伯爵,查理,豪伊克子爵(Grey, Charles, Viscount Howick, Earl of 1764—1845)——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06),外交大臣(1806—1807),内阁首相(1830—1834)。——427、622。
- 格雷厄姆,詹姆斯·罗伯特·乔治(Graham, James Robert George 1792—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海军首席大臣(1830—1834和1852—1855),内务大臣(1841—1846)。——420、443、574、584、585、589、595、622、630、631、645、649。
- 格里菲思, J. (Griffiths, J.)——617。
- 格里斯曼,卡尔·爱德华(Griesmann, Carl Eduard 约生于1809年)——普鲁士政府参议,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 格林森, J. G. (Gleeson, J. G.)——617。
- 格林,托马斯(Greene, Thomas)——英国政治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1846—

1852)。——441。

格林,威廉·卡尔(Grimm,Wilhelm Karl 1786—1859)——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与其兄雅·格林以编著德国民间童话和中世纪史诗著名;雅·格林的弟弟。——339。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 Ludwig Karl 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339。

格龙尼希(Grunich)——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初流亡伦敦。——344。

格吕耶尔(Gruyères)——瑞士贵族世家。——613。

格伦维尔男爵,威廉·温德姆(Grenville,William Wyndham,Baron 1759—1834)——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791—1801),首相(1806—1807)。——622。

贡东,茹尔(Gondon,Jules)——法国新闻工作者。——628。

贡斯当·德勒贝克,昂利·本杰明·德(Constant de Rebecque,Henri-Benjamin de 1767—1830)——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民主主义流派的代表,法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观点的反对者;曾从事国家法问题的研究。——133。

古比茨,弗里德里希·威廉(Gubitz,Friedrich Wilhelm 1786—1870)——德国作家、出版商和木版雕刻家。——120。

古皮勒·德·普雷费尔讷,吉约姆·弗朗索瓦·沙尔(Goupil de Préfelne,Guillaume-François-Charles 1727—1801)——法国政治家;立宪保皇派,1789年为制宪议会议员。——468。

古泰(Gouté)——法国流亡者,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361。

H

哈贝克(Habegg)——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9世纪50年代初流亡伦敦。——344。

哈布斯堡王朝——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皇朝(1273—1806年,其间有间断)、西班牙

- 牙王朝(1516—1700)、奥地利皇朝(1804年起)和奥匈帝国皇朝(1867—1918)。——613、641。
- 哈登堡,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冯——见诺瓦利斯。
- 哈克,约翰·卡尔(Haacke, Johann Carl 约生于1820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流亡伦敦,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536。
- 哈林,哈罗·保尔(Harring, Harro Paul 1798—1870)——德国作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1828年起曾数度侨居国外。——349—358。
- 哈尼,乔治·朱利安(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派左翼领袖;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民主派兄弟协会创建人之一,《北极星报》的编辑,《民主评论》、《人民之友》、《红色共和党人》等宪章派刊物的出版者;1862—1888年曾数度住在美国;国际会员;曾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友好联系;50年代初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一度同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疏远。——730。
- 哈奇尔,约翰(Hatchell, John 1783—1870)——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爱尔兰首席检察官(1851—1852)。——441。
- 哈赛尔曼—舒尔茨公司(Hasselmann Schults & Co.)——547。
- 哈瑟,莱奥(Hasse, Leo)——哥·约·金克尔的朋友,酷爱诗文。——299。
- 哈特曼,莫里茨(Hartmann, Moritz 1821—1872)——奥地利作家,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33、34。
- 海德——见荣克,克里斯蒂娜。
- 海尔梅斯,约翰·提摩泰乌斯(Hermes, Johann Timotheus 1738—1821)——德国神学家和作家,长篇小说《索菲娅从梅梅尔到萨克森旅行记》的作者。——336—337。
- 海尔维格,格奥尔格(Herwegh, Georg 1817—1875)——德国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2年起成为马克思的朋友,《莱茵报》等多家报刊的撰稿人;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巴黎德国流亡者志愿军团组织者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后长期流亡瑞士;1869年起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25。
- 海曼,卡尔·弗里德里希(Heimann, Carl Friedrich 约生于1808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海瑙男爵,尤利乌斯·雅科布(Haynau, Julius Jacob Freiherr von 1786—

- 1853)——奥地利将军,1848年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曾任总司令(1849),率领奥地利部队去镇压匈牙利革命。——53。
-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 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49、58、141、325、328、329、499、721、764。
- 海因岑(Heinzen)——德国林务官,卡·海因岑的父亲。——339。
- 海因岑,卡尔(Heinzen,Karl 1809—1880)——德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莱比锡总汇报》记者,《莱茵报》撰稿人;1844年9月逃往布鲁塞尔,1845年春移居瑞士,1847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后来先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0年秋定居美国,后为《先驱者》报的主编(1854—1879)。——115、116、330、331、336—343、359、360、372—374、383、392、403、708、720。
- 海泽,亨利希(Heise Heinrich 1820—1860)——德国律师和新闻工作者,民主主义者和政论家,《大胡蜂》报出版者和编辑(1848—1850),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1年流亡英国。——719。
- 汉普敦,约翰(Hampden,John 1594—164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夜反对专制独裁,革命斗争的参加者,在国内战争中牺牲。——79。
- 汉特,桑顿·利(Hunt,Thornton Leigh 1810—1873)——英国新闻工作者,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40—50年代支持宪章运动中的右翼,《先驱》的创办人之一。——702。
-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路德维希(Hanse mann,David Justus Ludwig 1790—1864)——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财政大臣(1848年3—9月)。——41、45、53、78、362。
- 豪(Howe)——617。
- 豪格,恩斯特(Haug[Haugh],Ernst)——奥地利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宇宙》周刊的出版者和编辑。——114、115、346、366—368、370、371、373、398。
- 豪克,路德维希·冯(Hauk[Hauck],Ludwig von 1799—1850)——奥地利军官,民主主义者,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和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被杀害。——369、370。
- 豪普特(Haupt)——海·威·豪普特的父亲。——769。

- 豪普特, 海尔曼·威廉(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 1831 年)——德国店员, 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1849), 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流亡英国;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1850 年 10 月在汉堡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捕者之一, 在审讯期间作了叛卖性的供述, 审判前即被释放, 1852 年迁居巴西。——536、769。
- 荷马(Homerus 约公元前 8 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76、316
- 赫伯特, 约翰·哥特利布(Herbertz, Johann Gottlieb 约生于 1797 年)——德国商人,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赫伯特, 悉尼, 利男爵(Herbert, Sidney, Baron of Lea 1810—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后为皮尔分子; 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1845), 军务大臣(1845—1846 和 1852—1855)和陆军大臣(1859—1861)。——443、632。
- 赫尔德, 约翰·哥特弗里德·冯(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1744—1803)——德国历史哲学家、宗教哲学家、作家和文学评论家, 启蒙思想家; 狂飙突进运动的主要理论家和德国古典文学的开拓者。——330。
- 赫尔洛斯, 卡尔·格奥尔格·雷金纳德——见赫尔洛斯宗, 卡尔。
- 赫尔洛斯宗, 卡尔(Herloßsohn, Karl 原名卡尔·格奥尔格·雷金纳德·赫尔洛斯 Karl Georg Reginald Herloß 1804—1849)——德国自由派作家和诗人, 1830 年创办美文学杂志《彗星》。——33、34。
- 赫斯, 莫泽斯(Heß, Moses 1812—1875)——德国政论家和哲学家,《莱茵报》创办人之一和撰稿人, 1842 年 1—12 月为编辑部成员, 1842 年 12 月起为驻巴黎通讯员;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40 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1846 年起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1863 年以后为拉萨尔分子; 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和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的参加者。——324、327、329、330、529—531、536、550、551、787。
- 贺拉斯(昆图斯·贺拉斯·弗拉克)(Quintus Horatius Flaccus 公元前 65—8)——罗马诗人, 同奥古斯都关系甚密。——416。
- 黑布林·冯·兰岑瑙尔(Häbling von Lanzenauer)——德国地主,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 黑策尔, 卡尔·约瑟夫·奥古斯特(Hätzel, Karl Joseph August 生于 1815 年)——德国鞋匠; 正义者同盟盟员,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9 年 3 月

- 被捕,1850年8月柏林反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小组案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506、537、779、780、785。
- 黑德,弗兰西斯·邦德(Head, Sir Francis Bond 1793—1875)——英国殖民官、旅行家和作家。——241。
- 黑尔明豪斯(Herminghaus)——哥·约·金克尔的舅父。——288。
- 黑尔明豪斯,爱利莎(Herminghaus, Elise)——哥·约·金克尔的表妹。——288、293。
- 黑尔明豪斯,古斯塔夫(Herminghaus, Gustav)——哥·约·金克尔的表弟。——288。
- 黑尔施塔特,约翰·戴维(Herstadt, Johann David 1805—1879)——德国银行家,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546。
- 黑尔特勒,丹尼尔(Hertle, Daniel 生于1824年)——德国法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被判处死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进行活动;1850年侨居美国。——398。
-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15、16、131、136、157、280、293、324—326、328、339、349、369、388、482、618、762。
- 黑克,路德维希(Heck, Ludwig 约生于1822年)——德国裁缝,不伦瑞克工人联合会主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493。
- 黑克尔,弗里德里希·弗兰茨·卡尔(Hecker, Friedrich Franz Karl 1811—1881)——德国律师,激进的共和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德国旁观者》的撰稿人和资助者(1847—1848),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侨居美国,1861—1865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上校。——322、718。
- 亨策,尤利乌斯(Hentze Julius 1816左右—1873)——普鲁士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最迟从1851年5月起成为警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506、536—537、539、550、780。

- 亨利,约瑟夫·沃纳(Henley, Joseph Warner 1793—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商业和交通大臣(1852和1858—1859)。——446、460、461。
- 亨利三世(Henri III 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743。
- 亨利四世(Henri IV 1553—1610)——法国国王(1589—1610)。——347。
- 亨利五世——见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
- 亨利六世(Henry VI 1421—1471)——英国国王(1422—1461)。——204。
- 亨利,托马斯(Henry, Thomas 1807—1876)——英国伦敦治安法庭法官。——674、702、705。
- 亨利希七十二世(Heinrich LXXII 1797—1853)——德国一小邦幼系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的领主王公(1822—1848)。——88。
- 亨利希亲王——见弗里德里希·亨利希·路德维希。
- 红胡子——见弗里德里希一世·巴巴罗萨(红胡子)。
- 红色贝克尔——见贝克尔,海尔曼·亨利希。
- 红色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拿破仑亲王。
- 红色沃尔弗——见沃尔弗,斐迪南。
- 洪特海姆,理查·冯(Hontheim, Richard von 死于1857年)——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510、516、518、520、546—548、554、556—557、559、568、569、777。
- 华兹华斯,威廉(Wordsworth, William 1770—1850)——英国诗人。——740。
- 华德,亨利·乔治(Ward, Henry George 1797—1860)——英国殖民官员,辉格党人;曾任伊奥尼亚群岛高级专员(1849—1855),锡兰总督(1855—1860)和马德拉斯总督(1860)。——430。
- 怀特,乔治(White, George 死于1868年)——爱尔兰羊毛梳理工,宪章主义者。——450。
- 霍尔默斯,约翰·弗里德里希(Holmers, Johann Friedrich 约生于1806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霍夫,亨利希(Hoff, Heinrich)——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322。
- 霍夫曼,恩斯特·泰奥多尔·阿马多斯(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德国作家、音乐家、画家和法学家;德国晚期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一度在普鲁士政府中任职。——291。

- 霍夫曼—康培公司(Hoffmann & Campe)——德国汉堡一家出版公司。——279。
- 霍亨索伦王朝——勃兰登堡选帝侯世家(1415—1701),普鲁士王朝(1701—1918)和德意志皇朝(1871—1918)。——482。
- 霍姆斯登,丹尼尔(Holmsden, Daniel)——617。
- 霍纳,伦纳德(Horner, Leonard 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450、598—602、606、655。
- 霍斯费尔德,卡尔·亨利希(Hoßfeld, Carl Heinrich 约生于1818年)——德国莱比锡的一家印刷厂主,激进民主主义者;1849年流亡英国。——333。
- 霍文,约翰·雅科布(Hoven, Johann Jacob zur 约生于1801年)——德国公证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霍伊恩,哥特洛布·赛米尔·卡尔——见克劳伦,亨利希。

J

- 基安奈拉,卡尔(Chianella, Karl)——德国克雷菲尔德一家旅馆的招待员,警察局密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证人。——529、531、787、788。
- 基奥,威廉·尼古拉斯(Keogh, William Nicholas 1817—187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英国议会中爱尔兰议会党团的领袖之一;屡任英国的爱尔兰管理机构中高级司法职务。——593、594、597、627。
- 基堡——瑞士贵族世家(约1027—1264)。——613。
- 基什,米克洛什(Kiss, Miklós 1820—1902)——匈牙利军官,民主主义者,流亡巴黎,拉·科苏特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代理人,同波拿巴集团有过联系。——766、767。
- 基佐,弗朗索瓦·皮埃尔·吉约姆(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1812年起任巴黎大学历史系教授,七月王朝时期是立宪君主派领袖,历任内务大臣(1832—1836)、教育大臣(1836—1837)、外交大臣(1840—1848)和首相(1847—1848);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133、146、206、207、224、225、239、272、506。
- 吉布森,托马斯·米尔纳(Gibson, Thomas Milner 1806—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商业大臣(1859—1865和1865—1866)。——442、629、632。

吉兹公爵——见昂利第二(洛林的),吉兹公爵。

吉佩里希,约瑟夫(Gipperich, Joseph)——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0年起为普鲁士警探,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帮助下越狱逃跑,后流亡英国。——488—491、498—499、783。

济格尔,阿尔伯特(Sigel, Albert 1827—1884)——德国军官,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53年侨居美国,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399、404。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德国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副总司令、总司令和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长;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作为将军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6年为纽约新闻工作者;阿·济格尔的哥哥。——105、116、378、380—383、387、392、394、398、399、403、404。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东(Garnier-Pagès, Louis-Antoin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48年为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曾任财政部长(1848年3—6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员(1864—1870);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7。

加格恩男爵,亨利希·威廉·奥古斯特(Gagern, Heinrich Wilhelm August Freiherr von 1799—1880)——德国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内阁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1849年5月后为哥达党的领袖之一。——719。

加里波第,朱泽培(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4—7月是罗马共和国保卫战的主要组织者;50—60年代领导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统一的斗争;1860年领导向南意大利的革命进军;1862年为了把罗马从教皇军队和法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而组织了远征;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1848—1849、1859和1866),在普法战争中站在法兰西共和国一边,70年代声援巴黎公社,赞成在意大利建立国际的支部。——356、363。

加瓦齐,亚历山大罗(Gavazzi, Alessandro 1809—1889)——意大利教士,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宣传反对天主教教会和

- 教皇世俗权力;后成为加里波第的战友。——369。
- 伽利略,伽利莱(Galilei,Galileo 1564—1642)——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力学原理的创始人,哥白尼学说的拥护者,维护太阳中心说,为此遭到宗教法庭的审判(1633);晚年在流亡中度过。——544。
- 剑桥公爵,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查理(Cambridge,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Charles,Duke of 1819—1904)——英国将军,1854年任克里木英军师长,英军总司令(1856—1895)。——430。
- 金(洛克·金),彼得·约翰·洛克(King[Locke King],Peter John Locke 1811—188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252、430。
- 金克尔(Kinkel)——德国牧师,哥·约·金克尔的父亲。——282—283。
- 金克尔,哥特弗里德·约翰(Kinkel,Gottfried Johann 1815—1882)——德国诗人、作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50年在卡·叔尔茨帮助下越狱逃跑,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海尔曼》周报编辑(1859),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113—119、131、272、273、279—318、335、350、359、361、363、366—376、379—380、387、392—400、402、403、406、407、531、535、537、712、718、719。
- 金克尔,马利亚(Kinkel,Maria)——哥·约·金克尔的母亲。——282—283。
-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Johanna 父姓莫克尔 Mockel 1810—1858)——德国女作家,哥·约·金克尔的妻子。——115、283、295、296、298—302、308、311—314、373—375。
- 金克尔,约翰娜(Kinkel,Johanna)——哥·约·金克尔的姐姐。——283、294、295。
- 久洛伊,费伦茨,毛罗什-纳梅特和纳达什卡伯爵(Gyulay[Giulay,Giulai],Ferenc Graf von Maros-Nádámeth und Nádaska 1798—1868)——奥地利元帅,匈牙利人,镇压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曾任陆军大臣(1849—1850),1859 年意大利战争初期指挥奥地利军队,在马真塔战败。——802。

K

- 卡贝,埃蒂耶纳(Cabet,Etienne 人称卡贝老爹 Père Cabet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论家;法国工人共产主义一个流派的创始人,和平空想共产主

- 义的代表人物,《人民报》的出版者(1833—1834);流亡英国(1834—1839);《1841年人民报》的出版者(1841—1851);曾尝试在美洲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1848—1856),以实现其在1848年出版的小说《伊加利亚旅行记》一书中阐述的理论。——363。
- 卡德威尔子爵,爱德华(Cardwell, Edward, Viscount 1813—1886)——英国政治活动家,最初归属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派领袖之一,后为自由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52—1855),爱尔兰事务大臣(1859—1861),殖民大臣(1864—1866)和陆军大臣(1868—1874)。——420、441、637。
- 卡尔伯的勒韦——见勒韦,威廉。
- 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威廉(不伦瑞克和吕讷堡公爵)(Karl Friedrich August Wilhelm [Herzog von Braunschweig und Lüneburg] 1804—1873)——1830年9月初被推翻,流亡国外;曾企图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帮助下复辟;40—50年代与流亡者中的民主派保持联系;《德意志—伦敦报》所有人。——115、324、342。
- 卡尔利埃,皮埃尔·沙尔·约瑟夫(Carlier, Pierre-Charles-Joseph 1799—1858)——法国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173、187、193、217、485—487、491、783、794—795。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Eugè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任阿尔及利亚总督,第二共和国时期是陆军部长(1848年5—6月),镇压巴黎六月起义;曾任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捕。——61、136、143、148—151、158、198、211、219、265、747。
- 卡赫-格-加-加赫-波赫(卡-吉-加-吉-瓦-瓦-贝-塔)(Kah-Ge-Ga-Gah-Bowth [Kagi-ga-gi-wa-wa-be-ta] 约生于1818年)——北美印第安人奥季布瓦部落的首领(1850年左右),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参加者。——348。
- 卡利古拉——见盖尔马尼库斯(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盖尔马尼库斯)(卡利古拉)。
- 卡罗卢斯·辛切鲁斯(Carolus Sincerus)——1633年是审判伽利莱·伽利略的意大利异端裁判所裁判官。——544。
- 卡诺,拉扎尔·伊波利特(Carnot, Lazare-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治

- 家和政论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七月王朝时期为众议院议员(左派反对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教育部长(1848年2—7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的反对者;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以后成为共和党反对派领袖,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78。
- 卡佩隆,保兰(Caperon, Paulin 约生于1821年)——法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9世纪50年代初是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会员。——361。
- 卡桑尼亚克——见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贝尔纳·阿道夫。
- 卡斯蒂利亚的唐·佩德罗——见唐·佩德罗(卡斯蒂利亚的)。
- 卡提利纳(鲁齐乌斯·赛尔吉乌斯·卡提利纳)(Lucius Sergius Catilina 公元前108左右—62)——罗马政治家和统帅,贵族,反对贵族共和国密谋的策划者。——468,531。
-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 Major 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239。
- 凯利,爱德华·斯蒂林弗利特(Cayley, Edward Stillingfleet)——英国政治活动家,1853年为议会议员。——653。
- 凯撒(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 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32,322,351,399,626。
-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 Adolphe-Lambert-Jacques 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619,620。
- 坎宁,乔治(Canning, George 1770—1827)——英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官,托利党领袖,议会议员;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委员;曾任外交大臣(1807—1809和1822—1827)和首相(1827)。——245,622。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者;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302,618。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德国政治家和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34年起任科隆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和《莱茵报》撰稿人;1843年起为莱茵省议会城市等级的代表,普鲁士首相(1848年3—6月),后为第一议院议员,普鲁士驻中央政府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41,45,53,78,319—320。

康沃尔——见刘易斯,乔治·康沃尔。

考尔巴赫,威廉·冯(Kaulbach, Wilhelm von 1805—1874)——德国历史画家。——400。

科贝特,威廉(Cobbett, William 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620。

科布顿,理查德(Cobden, Richard 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主义者,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251、348、349、455、573、580、616、620、621、647、656、658、665、705、708。

科策布,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1761—1819)——德国剧作家和政论家;沙皇政府的密探。——292。

科恩海姆,麦克斯(Cohnheim, Max 约生于1820年)——德国店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8年为《新莱茵报》通讯员,1850年流亡伦敦,1851年迁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旧金山支部创建人。——344。

科尔图姆,卡尔·阿尔诺德(Kortum, Karl Arnold 1745—1824)——德国诗人和作家,以《约布斯之歌》一书而著名。——348。

科克,沙尔·保尔·德(Kock, Charles-Paul de 1794—1871)——法国作家,著有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330。

科拉切克,阿道夫(Kolatschek, Adolph 1821—1889)——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德国政治、科学、艺术和生活月刊》(1850—1851)和《时代呼声》(1858—1862)两杂志的出版者,1862年创办《信使报》。——719。

科勒特,科勒特·多布森(Collet, Collet Dobson)——英国激进派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乌尔卡尔特派机关报《自由新闻》和月报《外交评论》的编辑(1856—1877)。——674。

科苏特,拉约什(路易,路德维希)(Kossuth, Lajos [Louis, Ludwig] 1802—189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革命时期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匈牙利革命政府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336、338、363、407—409、552、581、634、640、

642、643、658、663、667、700—707、718—720、765—768。

科塔, 约翰·格奥尔格·弗赖贝格, 科滕多夫男爵 (Cotta, Johann Georg Freiberg Freiherr von Cottendorf 1796—1863)——德国书商和出版商, 1832—1863年为德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科塔书店的所有人; 曾出版奥格斯堡《总汇报》和《知识界晨报》。——303。

科特斯, 约翰·多米尼库斯 (Kothes, Johann Dominikus)——德国商人,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503—506、512、781。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 (Caussidière, Marc 1808—1861)——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组织者之一; 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巴黎警察局长(1848年2—5月), 制宪议会议员(1848); 因政府准备在布尔日对五月十五日事件的参加者进行审判, 于1848年8月逃往英国。——131。

科英——见荣克, 爱利莎。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英国国务活动家, 外交官, 辉格党人, 后为自由党人; 爱尔兰总督(1847—1852), 曾镇压爱尔兰1848年起义; 外交大臣(1853—1858、1865—1866和1868—1870)。——596、649、653。

克拉默, 卡尔·哥特洛布 (Cramer, Karl Gottlob 1758—1817)——德国作家, 写有一些冒险小说。——289。

克拉普卡, 乔治(格奥尔格) (Klapka, György [Georg] 1820—1892)——匈牙利将军,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曾指挥匈牙利的一支革命军队, 1849年6—9月是科莫恩要塞司令; 1849年流亡国外; 50年代同波拿巴集团有联系; 1866年普奥战争时指挥普鲁士政府为参加这次战争而在西里西亚组织的匈牙利军团; 曾一度任拿破仑·约·沙·保·波拿巴的秘书; 1867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408—410。

克莱门特, 克努特·荣克博恩 (Clement, Knut Jungbohn 1803—1873)——德国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基尔大学教授, 丹麦人。——351。

克莱因, 尤利乌斯·莱奥波德 (Klein, Julius Leopold 1810—1876)——德国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文学史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378。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1817—1897左右)——德国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60年代初曾参加德国工人运动。——256、711、772、791。

克兰沃思男爵,罗伯特·蒙西·罗尔夫(Cranworth, Robert Monsey Rolfe, Baron 1790—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和法学家,辉格党人;曾任大法官(1852—1858和1865—1866)。——637、644、645。

克劳狄乌斯(提比里乌斯·克劳狄乌斯·尼禄·盖尔马尼库斯)(Claudius [Tiberius Claudius Nero Germanicus] 公元前10—公元54)——罗马皇帝(41—54)。——626。

克劳福德,威廉·沙曼(Crawford, William Sharman 1781—1861)——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支持宪章派;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创建人之一。——627。

克劳伦,亨利希(Clauren, Heinrich 原名哥特洛布·赛米尔·卡尔·霍伊恩 Gottlob Samuel Carl Heun 1771—1854)——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289、297。

克劳塞维茨,卡尔·菲利浦·哥特弗里德·冯(Clauswitz, K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1780—1831)——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首次把辩证法应用于军事理论;参加普鲁士军队的改革;1812—1814年在俄军中供职;1818—1830年任普通陆军学校校长,1831年任普鲁士元帅奥·奈·冯·格奈泽瑙伯爵的参谋长。——342。

克劳泽,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见弗略里,查理。

克雷格,威廉·吉布森(Craig, William Gibson 1797—187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部部务委员(1846—1852)。——441。

克雷米约,伊萨克·阿道夫(Crémieux, Isaac-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自由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为临时政府司法部长(1848年2—5月),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7。

克雷默,约瑟夫——见舍尔瓦尔,茹利安。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 Nicolas-Joseph 1798—186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203。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哲学家,康德的追随者;1805年起为柯尼斯堡的哲学教授;自由派政论家。——369。

- 克鲁马赫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Krummacher, Friedrich Wilhelm 1796—1868)——德国传教士, 加尔文宗牧师, 伍珀河谷虔诚派的首领。——297。
- 克路斯, 阿道夫(Cluß, Adolf 1825—1905)——德国工程师,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年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书记, 1848年流亡美国; 华盛顿海军部职员; 50年代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通信, 曾为德国、英国和美国许多工人和民主派报纸撰稿, 同魏德迈一起在美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后来脱离政治活动; 19世纪末成为著名的建筑师。——711、728—729。
- 克伦威尔, 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 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 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133、219、389。
- 克罗普, 弗兰茨·彼得(Kropp, Franz Peter 约生于1800年)——德国商人,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クロス利, 弗兰西斯(弗兰克)(Crossley, Francis [Frank] 1817—1872)——英国厂主, 自由党人; 议会议员(1852—1859)。——413、427、431。
- 克罗伊斯勒(Kräusler)——普鲁士教授,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 克洛普施托克, 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 德国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物之一。——279。
- 克吕西, 克·(Krüsi, Chr.)——瑞士印刷工人。——669。
- 克纳普, 阿尔伯特(Knapp, Albert 1798—1864)——德国诗人和牧师, 虔诚主义者, 写有一些教会颂歌和圣歌。——286、309。
- 克肖, 约瑟夫·布雷瓦德(Kershaw, Joseph Brevard 1822—1894)——美国军官。——705。
- 孔米赛尔, 塞巴斯蒂安(Commissaire, Sébastien 1822—1900)——法国共和主义者,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9); 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科西嘉。——158。
-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479)——中国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117、335。
- 库尔茨韦格, 约翰奈斯——见隆格, 约翰奈斯。
- 库克, 乔治·温格罗夫(Cooke, George Wingrove 1814—1865)——英国历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自由主义者; 1857年为《泰晤士报》驻中国通讯员。——

417--418。

库兰达,伊格纳茨(Kuranda, Ignaz 1811—1884)——奥地利新闻工作者,民主派杂志《国外消息》(1841—1848)编辑。——33,34。

库辛,维克多(Cousin, Victor 1792—186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折中主义者。——133。

夸德里奥,毛里齐奥(Quadrio, Maurizio 1800—1876)——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马志尼的追随者。——634。

L

拉德茨基伯爵,约瑟夫·温采尔(Radetzky, Joseph Wenzel Graf 1766—1858)——奥地利陆军元帅,1831年起为意大利北部的奥军司令,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伦巴第一威尼斯王国的总督(1850—1856)。——59,65,66,69,640,641,664。

拉蒂耶,弗朗索瓦·埃德蒙(Rattier, François-Edmond 1822—1890)——法国共和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158。

拉多维茨,约瑟夫·玛丽·恩斯特·克里斯蒂安·威廉·冯(Radowitz, Joseph Maria Ernst Christian Wilhelm von 1797—1853)——普鲁士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匈牙利人,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右派。——114,371。

拉罗什富科公爵,弗朗索瓦,马尔西亚克亲王(La Rochefoucauld [Larochefoucauld], François, duc de, prince de Marsillac 1613—1680)——法国作家,道德论者,弗伦特党的活动家。——488。

拉罗什雅克兰侯爵,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杜韦尔日耶(La Rochejaquelein [Larochajaquelin], Henri-Auguste-Georges Du Vergier, marquis de 1805—1867)——法国政治家,贵族院议员,正统派领导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52年起为第二帝国参议员。——207。

拉马丁,阿尔丰斯(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40年代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48),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7,200,315,341,740。

拉莫里诺,杰罗拉莫(Ramorino, Gerolamo 1792—1849)——意大利将军,1834年领导由马志尼组织的流亡革命者向萨瓦的进攻;意大利1848—1849年革

- 命时期指挥皮埃蒙特军队,由于采取叛变的策略,使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353。
- 拉莫里西埃,克里斯托夫·莱昂·路易·瑞绍·德(Lamoricière, Christophe-Léon-Louis Juchault de 1806—1865)——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30—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1848年参与镇压巴黎的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任陆军部长(1848年6—12月),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驱逐出法国,1857年回到法国;1860年曾指挥罗马教皇的军队。——136、158、219。
- 拉什,J. (Rush, J.)——617。
- 拉斯卡斯伯爵,艾曼纽埃尔·奥古斯坦·迪约多内·马兰·约瑟夫(Las Cases, Emmanuel-Augustin-Dieudonné-Marin-Joseph, comte de 1766—1842)——法国军官和历史学家,拿破仑第一的秘书;1815—1816年曾陪同拿破仑第一前往圣赫勒拿岛。——223。
- 拉特,约翰·雅科布·冯(Rath, Johann Jakob von 1792—1868)——德国商人,杜伊斯堡和科隆糖厂厂主,杜伊斯堡商会会长,莱茵报社股东;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约·彼·冯·拉特的弟弟。——476。
- 拉图尔伯爵,泰奥多尔(Latour, Theodor Graf 1780—1848)——奥地利将军,专制君主制度的拥护者;1848年任陆军大臣;1848年10月被维也纳起义者杀死。——67。
- 拉托,让·皮埃尔·拉莫特(Rateau, Jean-Pierre Lamotte 1800—1887)——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52。
- 拉沃,弗兰茨(Raveaux, Franz 1810—1851)——德国烟草商,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中间派左翼;驻瑞士的帝国专员,1849年6月是帝国摄政之一;巴登临时政府成员,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09、403、406。
- 拉伊特子爵,让·厄内斯特·杜科(La Hitte, Jean-Ernest Ducos, vicomte de 1789—1878)——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1849—1851)。——178、195。
- 莱昂伯爵夫人(L.伯爵夫人)(Lehon[Gräfin L.], comtesse de)——比利时驻巴黎公使沙·艾·约·莱昂伯爵的妻子,30—50年代随丈夫住在巴黎,同奥尔

- 良王朝代表人物有联系。——238—239。
- 莱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347。
- 莱奥波德(大公)(Leopold [Grand Duke] 1790—1852)——巴登大公(1830—1852)。——98, 105, 720。
- 莱布尼茨男爵,哥特弗里德·威廉·冯(Leibniz [Leibnitz], Gottfried Wilhelm Freiherr von 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482。
- 莱顿,科斯莫斯·达米安(Leiden, Kosmos Damian 约生于1795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
- 莱宁格尔,约翰·格奥尔格(Reininger, Johann Georg 生于1818年)——德国裁缝,1843年起住在巴黎,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成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9月作为该集团的特使在美因茨被捕,1852年2月是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1853年5月获释。——493。
- 莱瓦尔德,芬妮——见施塔尔,芬妮。
- 赖德律(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Ledru [Ledru-Rollin,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改革报》编辑;第二共和国时期任临时政府内务部长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848),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49),在议会中领导山岳党;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后流亡英国,1869年回到法国。——6, 53, 114, 143, 158, 163, 166, 265, 334, 346, 347, 350, 359, 360, 362, 363, 366, 371, 387, 403, 720, 737。
- 赖夫,威廉·约瑟夫(Reiff, Wilhelm Joseph 生于1824年)——德国代理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后为工人教育协会书记,1850年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5年徒刑。——772, 789, 791。
- 赖辛巴赫伯爵,奥斯卡(Reichenbach, Oskar Graf von 生于1815年)——德国西里西亚地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1850年起侨居英国,后迁居美国。——366, 387, 393, 397, 406, 537。
- 兰茨科隆斯基伯爵(Lanckoronski, Graf)——波兰流亡者,沙皇政府的密探。——766。

兰迪克(Landick)——617。

兰格,赛米尔(Laing, Samuel 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曾任英国铁路公司高级行政职务。——696—698。

兰开斯特,约瑟夫(Lancaster, Joseph 1778—1838)——英国教育家。——76。

兰斯唐侯爵,亨利·配第-菲茨莫里斯(Lansdowne, Henry Petty-Fitzmauric, Marquess of 1780—1863)——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06—1807),枢密院院长(1830—1841和1846—1852),不管部大臣(1852—1858)。——589、632。

朗道夫,皮埃尔·弗朗索瓦(Landolphe, Pierre-François 1809—1889)——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流亡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71年回到法国。——364。

劳伯,赛米尔(Laube, Samuel 约生于1818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493。

勒夫洛,阿道夫·艾曼纽埃尔·沙尔(Le Flô [Leflô], Adolphe-Emmanuel-Charles 1804—1887)——法国将军、政治家和外交家,保皇党人;秩序党代表人物,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英国,1859年回到法国;曾任国防政府和梯也尔政府的陆军部长(1870—1871),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48—1849和1871—1879)。——154、219。

勒麦,克里斯托夫·哥特洛布·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Römer [Roemer], Christof Gottlob Heinrich Friedrich von 1794—186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1833年起为符腾堡第二议院议员,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之一,1848—1849年任符腾堡司法大臣和首相,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4。

勒韦,威廉(Löwe, Wilhelm 卡尔伯的勒韦 Löwe von Calbe 1814—1886)——德国医生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副议长,属于左派,“残阙”议会迁移到斯图加特后为议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迁居美国,在纽约主编德文报纸《新时代报》,1861年大赦后回到德国;北德意志联邦议会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67—1881);进步党人,后来成为民族自由党人。——537、719。

勒泽尔,彼得·格尔哈德(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德国工人运动

活动家；雪茄烟工人；1848—1849年为科隆工人联合会副主席，《自由、博爱、劳动》的发行人；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主席，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来成为拉萨尔派。——475、536、545、716、722、772—774、778、789、791。

雷缪扎伯爵，沙尔·弗朗索瓦·玛丽(Rémusat, Charles-François-Marie, comte de 1797—1875)——法国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作家，奥尔良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第三共和国时期任外交部长（1871—1873）。——197。

雷纳德(Renard)——科隆书法教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笔迹鉴定人。——529。

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Regnault de Saint-Jean d'Angély [St. Jean d'Angély], Auguste-Michel-Etienne, comte de 1794—1870)——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陆军部长（1851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任近卫军指挥官（1854—1869）；1855年为克里木法军后备军军长。——196。

李贝尼，亚诺什(Libényi, Janos 1831—1853)——匈牙利裁缝；曾于1853年2月18日谋刺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后被处死。——640、667。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 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语文学家和政论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5月前往英国，在那里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62年回到德国；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09—513、515—517、520、522—524、526、568、571、781、782。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59、660、662。

里德，托马斯·梅恩(Reid, Thomas Mayne 1818—1883)——英国作家；1840年只身赴美，曾在社会下层和印第安人中生活；1846年参加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1849年去欧洲参加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抵达时革命已经失败；1850年回英国后从事惊险小说的创作。——642、667。

- 里格利父子公司(Wrigley & Son)——英国利物浦一家棉纺公司。——602。
- 里士满公爵, 查理·戈登-伦诺克斯(Richmond, Charles Gordon-Lennox, Duke of 1791—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保护关税派, 议会议员。——639。
- 理查一世(狮心理查)(Richard I Lion-Hearted 1157—1199)——英国国王(1189—1199)。——314。
- 理查兹, 阿尔弗勒德·贝特(Richards, Alfred Bate 笔名一个英国人 An Englishman 1827—1876)——英国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 反对科布顿和曼彻斯特派的和平主义; 50年代曾同乌尔卡尔特派进行论战。——665。
- 利法特帕沙, 萨迪克(Rifat[Rifaat-] Pasha, Sadik 1798—1855)——土耳其国务活动家, 曾任外交大臣(1853年3—5月)。——674。
- 利物浦伯爵, 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Liverpool, Robert Banks Jenkinson, Earl of 1770—1828)——英国国务活动家, 托利党领袖之一; 屡任内阁大臣, 曾任首相(1812—1827)。——622。
-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 费利克斯·玛丽(Lichnowski[Lychnowsky], Felix Maria Fürst von 1814—1848)——普鲁士军官, 西里西亚大地主,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右派; 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奥尔斯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519。
-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Lelewel, Joachim 1786—1861)——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活动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参加者, 在法国和英国的波兰流亡者中的民主派领袖之一, 1847—1848年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副主席。——766。
-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Leßner[Lessner], Friedrich 1825—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 职业是裁缝;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0年为韦斯巴登工人教育协会会员; 1850—1851年为美因茨工人教育协会主席和同盟美因茨支部领导人; 在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中被判处3年徒刑, 1856年起侨居伦敦, 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 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7—1872), 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洛桑代表大会(1867)、布鲁塞尔代表大会(1868)、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伦敦代表会议(1871)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参加者,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 在国际中为马克思的路线积极斗争, 后为英国独立工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772、789、791。

- 林格斯,马蒂亚斯·韦尔纳(Rings, Mathias Werner)——德国细木工,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和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1850年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2年为新伦敦工人联合会的创建人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509—512、517、523、572、781、782。
- 刘易斯,乔治·康沃尔(Lewis, George Cornwall 1806—1863)——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财政部秘书长(1850—1852),1852—1855年为《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臣(1855—1858),内务大臣(1859—1861),陆军大臣(1861—1863)。——441。
- 隆格,约翰奈斯(库尔茨韦格,约翰奈斯)(Ronge, Johannes [Kurzweg, Johannes] 1813—1887)——德国教士,神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德国天主教运动的发起人之一;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1849—1861)。——114—115、330、366—369、373、394、398、537。
- 隆加德,塞巴斯蒂安(Longard, Sebastian)——德国律师,哥·约·金克尔的朋友,爱好诗文。——290。
- 卢格,阿尔诺德(Ruge, Arnold 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113—117、119、131、319、324—335、340、346—350、359—362、366—374、376、380、382、387、393—394、398、399、402、403、478、720。
- 卢格,路易莎(Ruge, Luise 父姓迪法尔 Duffar)——阿·卢格的第一个妻子。——325。
- 卢卡斯,弗雷德里克(Lucas, Frederick 1812—1855)——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597、632。
-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638。
- 卢梭,让·雅克(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750。
- 鲁埃,欧仁(Rouher, Eugène 1814—1884)——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848—1852

- 年曾断续地担任司法部长和司法大臣；第二帝国时期任商业、农业和公共工程大臣(1855—1863)、国务大臣(1863—1869)、参议院议长(1869—1870)；第二帝国崩溃后逃离法国；70年代为法国波拿巴派的领袖之一。——190、192、194、195、201。
- 鲁宾逊，弗雷德里克·约翰，葛德里奇子爵，里彭伯爵(Robinson, Frederick John, Viscount Goderich, Earl of Ripon 1782—1859)——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商业大臣(1818和1841—1843)、财政大臣(1823—1827)、首相(1827—1828)。——453。
- 鲁普斯——见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
- 鲁齐乌斯，埃格蒙特(Lucius, Egmont 1814—1884)——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787。
- 鲁萨克——见鲁什恰克(鲁萨克)，伊格纳茨。
- 鲁什恰克(鲁萨克)，伊格纳茨(Ruscsak [Ruszak], Ignac)——匈牙利裁缝，民主主义者，科苏特的战友；19世纪50年代初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匈牙利籍奥军士兵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640。
- 鲁瓦耶-科拉尔，皮埃尔·保尔(Royer-Collard, Pierre-Paul 1763—1845)——法国政治家和哲学家，巴黎大学历史和哲学教授，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133。
- 路德，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132、394、504。
- 路特希尔德(Rothschild)——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家国际银行。——20、652。
-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 Lionel Nathan, Baron 1808—1879)——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议会议员(1858—1874)。——638、652。
- 路易·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 I [Louis Philippe], duc d'Orleans 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36、137、139、142—144、149、151、157、168、171、184、206、208、209、224、227、271、324、591、646、726、736。

- 路易-菲利浦-阿尔伯,奥尔良公爵,巴黎伯爵(Louis-Philippe-Albert, duc d'Orleans, comte de Paris 1838—1894)——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浦一世之孙,法国王位追求者,称菲利浦七世;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205。
- 路易-拿破仑——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229。
- 路易十五(Louis XV 1710—1774)——法国国王(1715—1774)。——239。
- 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17。
- 路易十八(Louis XVIII 1755—1824)——法国国王(1814—1815和1815—1824)。——133。
- 伦茨堡——瑞士贵族世家。——613。
- 伦普夫,E.(Rumpf,E.)——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4年起流亡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572。
- 罗伯斯比尔,马克西米利安·弗朗索瓦·玛丽·伊西多尔·德(Robespierre, Maximilien-François-Marie-Isidore de 1758—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131、132、363、749。
- 罗德(Rhode)——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巴黎的普鲁士警探。——713。
- 罗赫纳,格奥尔格(Lochner, Georg 1824—191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细木工,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1年底流亡伦敦;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和1871—1872),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65和1871)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71。
- 罗莱特,海尔曼(Rollet, Hermann 1819—1904)——奥地利诗人和艺术科学家;1848—1853年侨居德国,《共和歌曲集》和《战歌集》编者;1853年迁居瑞士,1854年返回奥地利。——33、34。
- 罗森布卢姆,爱德华(Rosenblum, Eduard)——德国大学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344。
- 罗生克兰茨,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Rosenkranz, Johann Karl Friedrich 1805—1879)——德国作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保守党人,黑格尔主义

- 者。——324、325、327。
-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 John, Earl of 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251—254、420、427、441、460—463、465—469、574、589、594、596、622、630、636—638、644、649、651—653。
- 罗泰克,卡尔·文策斯劳斯·罗代克·冯(Rotteck, Karl Wenzeslaus Rodecker von 1775—184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4、24、321、323、324、346、372。
- 罗伊施(Reusch)——德国官员,上韦瑟尔市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780。
- 罗伊斯-施莱茨-格雷茨-罗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见亨利希七十二世。
- 罗伊特,麦克斯(Reuter, Max)——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鲁士警察。——483、536、547、550、555、566、569。
- 罗伊希林,约翰奈斯(Reuchlin, Johannes 1455—1522)——德国语文学家、作家和法学家,人文主义者。——330。
- 洛克·金——见金(洛克·金),彼得·约翰·洛克。
-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33。
- 洛克,詹姆斯(Loch, James 1780—1855)——苏格兰经济学家和律师,萨瑟兰公爵夫人的财产管理人。——611、613。
- 吕特盖特,哥特利布(Lüttgert, Gottlieb)——阿·雅科比的朋友。——557。
- 律斯勒,古斯塔夫·阿道夫(Roesler, Gustav Adolf 1818—1855)——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50年起侨居美国。——110。
- L. 伯爵夫人——见莱昂伯爵夫人。

,M

- 马蒂,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Mathy, Karl Friedrich Wilhelm 1807—1868)——德国政论家、官员和政治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巴登议会中的反对派领袖,预备议会议员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8—1849),属于中间派右翼;后为俾斯麦的追随者。——382。

- 马丁,亚历山大——见阿尔伯。
- 马尔海内克,菲利浦·康拉德(Marheineke, Philipp Konrad 1780—1846)——德国新教神学家和宗教史学家,黑格尔主义者。——280。
-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420、611、614、626。
- 马尔滕(Malten)——19世纪50年代是普鲁士派往国外的间谍。——352。
- 马尔维尔,弗朗索瓦·让·莱昂·德(Maleville, François-Jean-Léon de 1803—1879)——法国政治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内务部长(1848年12月下半月),国民议会议员(1871)。——200。
- 马洪子爵,菲利浦·亨利·斯坦霍普(Mahon, Philip Henry Stanhope, Viscount 1805—1875)——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外交副大臣(1834—1835)。——441。
-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colò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时期意大利资产阶级的思想家。——394、397。
-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II 1811—1864)——巴伐利亚国王(1848—1864)。——88。
- 马拉,让·保尔(Marat, Jean-Paul 1743—1793)——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749。
- 马拉斯特,玛丽·弗朗索瓦·帕斯卡尔·阿尔芒(Marrast, Marie-François-Pascal-Armand 1801—1852)——法国政论家和政治家,人权社的领导人,后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领袖,《国民报》主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成员和巴黎市长(1848),制宪议会议长(1848—1849)。——6、133、143、154。
- 马利·德·圣乔治,皮埃尔·托马·亚历山大·阿马布勒(Marie de Saint-Georges, Pierre-Thomas-Alexandre-Amable 人称马利 Marie 1795—1870)——法国律师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1848);曾组织国家工场,执行委员会委员,制宪议会议长(1848),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1848年7—12月)。——7。
- 马洛,克里斯托弗(Marlowe, Christopher 1564—1593)——英国诗人和剧作家。——746。
-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霍华德·哈里斯(Malmesbury, James Howard Har-

ris, Earl of 1807—188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外交大臣(1852和1858—1859),掌玺大臣(1866—1868和1874—1876)。——575、591。

马尼昂,贝尔纳·皮埃尔(Magnan, Bernard-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后为元帅,波拿巴主义者;3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里昂(1831和1849)、利尔和鲁贝(1845)的工人起义及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的镇压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为巴黎卫戍司令,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是参议员。——208、217、219、736。

马斯特尔斯, W. J. (Masters, W. J.)——伦敦一家酒店老板。——508。

马斯特曼,约翰(Masterman, John 1782左右—1862)——英国银行家和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441。

马赞尼洛(Masaniello 原名托马佐·安尼洛 Tommaso Aniello 1620—1647)——意大利渔民,1647年那不勒斯王国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的领袖。——218。

马志尼,朱泽培(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民主主义者,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1853年是米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50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干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年成立国际工人协会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己影响之下,1871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346—350、353、354、356、359—363、366、367、370、371、374、383、399、403、552、581、634、641、642、658、663、664、667—669、719、720、765—767、798、801、802。

玛丽——见施勒辛,玛丽。

玛丽·约瑟夫——见苏,欧仁。

玛丽亚-克里斯蒂娜(Maria-Christina 1806—1878)——西班牙王后(1829—1833),斐迪南七世的妻子,王国摄政女王(1833—1840)。——751。

迈尔,阿道夫(Majer, Adolph 约生于1819年)——德国助理药剂师,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0年前往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协会救济委员会委员,1850年底—1851年为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派往法国和瑞士的特使;1851年其警察局密探身分在日内瓦被揭露;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

- 一。——274—275、361、485、494、495。
- 迈尔,路德维希(Meier,Ludwig)——德国波恩大学医科学生(1848);后来是格丁根的医生和教授。——309。
- 迈尔霍弗,鲁道夫(Mayerhofer,Rudolph)——德国工厂主;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陆军部副部长。——323。
- 迈克尔·肖罗斯公司(Michael Schawcross & Co.)——546。
- 迈斯纳,阿尔弗勒德(Meißner,Alfred 1822—1885)——奥地利—波希米亚诗人,40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自由主义者。——33、34。
-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John Ramsay 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696。
- 麦克奈尔—格林豪—欧文公司(M'Nair[McNair],Greenhow & Irving)——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家公司。——602。
- 曼托伊费尔男爵,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普鲁士国务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曾参与宪法(1848年12月)的颁布和三级选举制的实行(1849);曾任内务大臣(1848年11月—1850年12月)和首相(1850—1858);1859—1860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4年入选第一议院。——79、333、669。
- 梅德斯通(Maidstone)——734。
- 梅格勒,约翰·乌尔里希——见亚伯拉罕·圣克拉拉。
- 梅克伦堡-什未林——见奥尔良公爵夫人,埃莱娜·路易莎·伊丽莎白。
- 梅兰希顿,菲力浦(Melanchton,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人道主义者;温和派的代表,马丁·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新教适合诸侯的利益。——394。
-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Ludwik 1814—1878)——波兰革命家、历史学家和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和1846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森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把他从狱中解放出来;曾领导1848年波森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50年代曾向波拿巴集团求援;1856年出版了《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一书,1863年波兰起义初期被任命为波兰国民政府首脑;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105。
- 梅森豪泽,凯撒·温采尔(Messenhauser,Caesar Wenzel 1813—1848)——奥地利军官和作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期间是国民自卫军司令和维也纳卫

- 成司令;11月16日被反革命军队杀害。——71。
- 梅斯特尔(德·梅斯特尔)伯爵,约瑟夫·玛丽(Maistre[De Maistre], Joseph-Marie, comte de 1753—1821)——法国作家,保皇党人,贵族和教权主义反动派的思想家。——17。
- 梅特涅-温内堡公爵,克莱门斯·文策斯劳斯·奈波穆克·洛塔尔(Metternich-Winneburg, Clemens Wenzeslaus Nepomuk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16、29—33、35—38、41、57、64、394。
- 梅因,爱德华(Meyen, Eduard 1812—187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人”小组成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柏林《改革报》编辑(1861—1863);后为民族自由党人。——113、327、333、378—380、387、395、397、400、403、537、719。
- 蒙克,乔治,阿尔比马尔公爵(Monk, George, Duke of Albemarle 1608—1670)——英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初为王党成员,后来是奥·克伦威尔军队将军;1660年曾积极促进英国恢复君主制。——187。
- 蒙塞尔,威廉,埃姆利男爵(Monsell, William, Baron Emly 1812—1894)——爱尔兰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曾任军械局秘书(1852—1857)。——593、595。
-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 Charles Forbes, comte de 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拿破仑第三,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198、207、234。
- 弥勒——见丹尼尔斯,阿马利亚。
- 弥勒,弗兰茨·约瑟夫·阿洛伊斯(Müller, Franz Joseph Aloys)——德国法律顾问和律师,保守党人,罗·丹尼尔斯的岳父。——509。
- 弥勒,弗里德里希·卡尔·约翰奈斯(Müller, Friedrich Carl Johannes)——355、357。
- 弥勒,克里斯蒂安(Müller, Christian)——德国海关官员。——322、368。
-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 Honoré-Gabriel-Victor Riqueti, comte de 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

- 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749。
- 密勒,约翰·马丁(Miller, Johann Martin 1750—1814)——德国诗人和作家,德国文学中感伤主义的代表。——279、295、313。
- 缅施科夫公爵,亚力山大·谢尔盖耶维奇(Менш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нязь 1787—1869)——俄国军事家和国务活动家,1836—1853年任海军大臣,1853年任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权大使,克里木战争时期(1853—1856)任陆海军总司令。——674。
- 缪格,泰奥多尔(Mügge, Theodor 1806—1861)——德国作家和政论家,青年黑格尔派。——378。
- 缪拉特亲王,拿破仑·律西安·沙尔(Murat, Napoléon-Lucien-Charles, prince 1803—1878)——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驻都灵公使(1849—185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861年为那不勒斯的王位追求者,约·缪拉特的儿子;拿破仑第三的表兄。——767。
- 敏娜——见特罗莱,敏娜。
- 明克斯,F.(Münks, F.)——19世纪50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571。
- 明克斯第二(Münks II)——19世纪50年代初是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572。
- 明希-贝林豪森男爵,弗兰茨·泰奥多尔(Münch-Bellinghausen, Franz Theodor Freiherr von 生于1787年)——普鲁士侍卫官,科隆行政区政府枢密顾问,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543。
- 摩尔根,亨利(Morgan, Henry 死于1853年)——英国制针工人。——604—606。
- 摩莱伯爵,路易·马蒂厄(Molé, Louis-Mathieu, comte 1781—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曾任首相(1836—1839),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秩序党领导人。——178、207、733。
- 莫尔,卡尔·路德维希(Moll, Carl Ludwig 约生于1809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莫尔,托马斯(More, Thomas 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613。

莫尔尼公爵,沙尔·奥古斯特·路易·约瑟夫(Morny, Charles-Auguste-Louis Joseph, duc de 1811—1865)——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2月—1852年1月),第二帝国时期是立法团议长(1854—1856和1857—1865),驻俄国大使(1856—1857);拿破仑第三的同母异父兄弟。——238、270、736—737。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 Sir William, Baronet 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592、594、595。

莫甘,弗朗索瓦(Mauguin, François 1785—1854)——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家,七月王朝时期是自由主义的王朝反对派领袖;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190、191。

莫克尔——见金克尔,约翰娜。

莫里哀(Moliere 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 Jean-Baptiste Poquelin 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420。

莫里茨,萨克森伯爵(Moritz, Graf von Sachsen 人称萨克森元帅 Marschall von Sachsen 1696—1750)——法国将军,德国人,1744年起为法国元帅,1747年为法国三军统帅;争夺奥地利王位继承权的战争(1741—1748)的参加者;写有一些军事理论著作。——326。

莫利纳里,古斯塔夫·德(Molinari, Gustave de 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361。

莫罗,让·维克多·玛丽(Moreau, Jean-Victor-Marie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各国同盟的战争。——381。

莫罗佐·德拉罗卡,恩里科(Morozzo della Rocca [Della Rocca], Enrico 1807—1897)——意大利将军,1848—1849年和1859年反奥地利战争的参加者;曾任陆军和海军大臣(1849),1859年奥意法战争期间任意大利军队总参谋长,1866年普奥战争时任意军总司令。——642。

莫帕,沙勒曼涅·埃米尔·德(Maupas, Charlemagne-Emile de 1818—1888)——法国律师,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警察局长(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第二帝国时期为警务大臣(1852—1853)。——217、498、530。

- 莫斯莱,约翰·路德维希(Mosle,Johann Ludwig 1794—1877)——德国军官和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奥尔登堡派驻联邦议会和中央政府的代表;1848年是被派往维也纳的帝国专员。——76。
- 墨尔本子爵,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拉姆(Melbourne,Frederick James Lamb, Viscount 1782—1853)——英国外交家,辉格党人。——626。
- 墨尔本子爵,威廉·拉姆(Melbourne,William Lamb,Viscount 1779—1848)——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30—1834)和首相(1834和1835—1841)。——622、624。
- 穆尔,乔治·亨利(Moore,George Henry 1811—1870)——爱尔兰政治活动家,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的领袖之一,议会议员(1847—1857和1868—1870);曾为被囚禁的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进行辩护。——597。
- 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 Ali 1769—1849)——埃及总督,曾实行多次有利于埃及大地主和实业家的改革。——611。
- 穆拉德帕沙——见贝姆,约瑟夫。

N

-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19、26、106、131—134、148、153、168、174、185—188、219、223、226—237、240、241、242、245—247、265、381、383、592、650、701、726、740、742、752。
-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Napoléon Bonaparte] 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112、131、133、141、142、147、149—154、157、158、161、163、167—174、177—180、183—196、198—203、206—213、215—223、225、227—231、233—242、256、257、259—262、264—266、269—271、462、552、620、621、630、635、645—651、665、674、705、714、723、727、731—739、741—744、749—751、758—761、764—767、797、798。
- 纳肯(Nacken)——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548、554、557、559、568、569、777。
- 奈伯爵,拿破仑·昂利·埃德加(Ney,Napoléon-Henri-Edgar,comte de 1812—188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路易·波拿巴总统的侍卫官,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72。

- 奈特,路德维希·亨利希(Nette, Ludwig Heinrich 约生于1819年)——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成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545。
-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yth, James 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599。
- 尼茨施,卡尔·伊曼努尔(Nitzsch, Karl Immanuel 1787—1868)——德国新教神学家和传教士,曾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授。——279。
- 尼古拉,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Nicolai, Christoph Friedrich 1733—1811)——德国作家、出版商和书商,“开明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在哲学中反对康德和费希特。——325、331。
- 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 1796—1855)——俄国皇帝(1825—1855)。——705、751。
- 尼禄·克劳狄乌斯·凯撒(Nero Claudius Caesar 37—68)——罗马皇帝(54—68)。——742。
- 牛津伯爵,阿尔弗勒德·哈利(Oxford, Alfred Harley, Earl of 1809—1853)——英国贵族。——626。
- 纽金特——见舍尔瓦尔,茹利安。
- 纽卡斯尔公爵,亨利·佩勒姆·法因斯·佩勒姆·克林顿(Newcastle, Henry Pelham Fiennes Pelham Clinton, Duke of 1811—1864)——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46),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1854),陆军大臣(1854—1855),殖民大臣(1859—1864)。——461。
-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Neumayer, Maximilian-George-Joseph 1789—1866)——法国将军,秩序党的拥护者,巴黎卫戍司令(1848—1850)。——188。
- 诺特荣克,彼得·约瑟夫(Nothjung, Peter Joseph 1823—1866)——德国裁缝,科隆工人联合会会员(1848)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5月埃尔伯费尔德起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特使(1850年11月—1851年5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判6年徒刑;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派驻布雷斯劳的全权代表。——475—477、482、483、565、722、772—775、789、791。
- 诺瓦利斯(Novalis 原名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冯·哈登堡 Friedrich Leopold

von Hardenberg 1772—1801)——德国作家,德国浪漫派中的反动流派的代表人物。——289、290、293、295、298、301、304、305、311。

P

帕尔默伯爵,朗德尔(Palmer, Roundell, Earl of 1812—1895)——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早期依附于托利党,继而成为皮尔分子,后来是自由党人;副首席检察官(1861—1863)、首席检察官(1863—1866)、大法官(1872—1874 和 1880—1885)。——441。

帕吉特,克拉伦斯·爱德华(Paget, Clarence Edward 1811—1895)——英国军事家和政治家,辉格党人,1852年为军械总长秘书。——441。

帕金顿,约翰·萨默塞特,汉普登男爵(Pakington, John Somerset, Baron Hampton 1799—1880)——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保守党人;曾任陆军和殖民大臣(1852),海军首席大臣(1858—1859 和 1866—1867),陆军大臣(1867—1868)。——575。

帕拉茨基,弗兰蒂舍克(Palacky, František 1798—1876)——捷克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6月为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实行旨在维护哈布斯堡专制统治的政策,奥地利斯拉夫主义思想家。——53。

帕略,玛丽·路易·皮埃尔·费利克斯(Parieu, Marie-Louis-Pierre-Felix Esquiou de 1815—1893)——法国政治活动家,第二共和国时期是教育部长(1849—1851)。——195。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陆军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241、251 461、462、573、574、587、589、591、594、613、632、664、668、670、671、699、765、767、768。

派尔,罗伯特(Peil, Robert 约生于 1819 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派克,约翰(Parker, John 1799—1881)——英国政治家,辉格党人,曾任海军部秘书长(1841 和 1849—1852)。——441。

派西沃,达德利·蒙塔古(Perceval, Dudley Montague 1801—1856)——英国法学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607。

炮弹国王——见斐迪南多二世,斐迪南二世。

佩尔采尔,莫尔(Perczel, Mór 1811—1899)——匈牙利政治家和将军,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土耳其,1851年流亡英国。——67、70、72。

佩尔西尼伯爵,让·日尔贝尔·维克多·菲阿兰(Persigny, Jean-Gilbert-Victor-Fialin, comte 1808—1872)——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4和1860—1863),驻伦敦大使(1855—1858和1859—1860)。——201、216、736。

佩罗,本杰明·皮埃尔(Perrot, Benjamin-Pierre 1791—1865)——法国将军,1848年参加镇压巴黎六月起义,1849年为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196。

皮埃尔(Pierre)——伦敦官员。——514。

皮埃特里,皮埃尔·玛丽(Piètri, Pierre-Marie 1809—1864)——法国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巴黎警察局长(1852—1858)。——498。

皮恩,托马斯(Peene, Thomas)——英国伦敦的医生。——657。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245、254、415、420、422、441、460—463、574、575、591、622、646。

皮尔,罗伯特(Peel, Robert 1822—189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外交家,皮尔分子,后为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海军副大臣(1855—1857);英国首相罗·皮尔的儿子。——652。

皮尔斯,富兰克林(Pierce, Franklin 1804—1869)——美国国务活动家,民主党人,曾任总统(1853—1857)。——651。

皮佩尔,威廉(Pieper, Wilhelm 1826左右—1899)——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流亡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1853年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1859年返回德国,1892年在汉诺威一所中学任教。——571、771、789。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 William, the Younger 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

- 1801 和 1804—1806)。——586。
- 皮亚,让·皮埃尔(Piat, Jean-Pierre 1774—1862)——法国将军,波拿巴主义者;十二月十日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184—185。
-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66, 614, 734, 745—758。
- 普尔斯基,费伦茨·冯(Pulszky [Pulsky], Ferenc von 1814—1897)——匈牙利政治家、作家和考古学家;波兰人,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50 年代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人,1867 年大赦后回到匈牙利,议会议员(1867—1876 和 1884—1897)。——721。
- 普芬德,卡尔(Pfänder, Carl 1819—1876)——德国微型画家,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1845 年起侨居伦敦,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会员;1849 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英国;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50 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4—1867 和 1870—1872);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71。
- 普拉滕,奥古斯特,普拉滕-哈勒蒙德(哈勒明德)伯爵(Platen, August, Graf von Platen Hallermund [Hallermünde] 1796—1835)——德国诗人,自由主义者。——286。
- 普隆-普隆和红色亲王——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 普鲁茨,罗伯特·爱德华(Prutz, Robert Eduard 1816—1872)——德国作家、政论家和文学史家,自由主义者;曾与青年黑格尔派有联系,莱比锡《德国博物馆》杂志的出版者(1851—1867)。——326, 328。
- 普卜利科拉——见波普利科拉。

Q

- 乔治三世(George III 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660。
- 穷汉戈蒂耶或穷汉瓦尔特(Gautier Sansavoir [Walther von Habenichts] 死于 1096 年)——法国骑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1096—1099)中法国农民支队的统帅。——389。
- 穷汉瓦尔特——见穷汉戈蒂耶。
- 琼斯,厄内斯特·查理(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英国律师、工人

- 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编辑，《奇语人民》和《人民报》出版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妥协，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暂时断交。——413、414、427—431、433、457、465、466、469、548、571、592、685、695、700、708、710、725、729、797。
- 琼斯，威廉(Jones, William 1808左右—1873)——英国钟表匠，宪章主义者，1839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430。
- 邱吉尔—西姆公司(Churchill & Sim)——英国的一家木材公司。——600。

R

-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50—1851)，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194、348。
- 日拉丹，德尔芬娜·德(Girardin, Delphine de 1804—1855)——法国女作家，埃·德·日拉丹的妻子。——239。
- 日罗，沙尔·约瑟夫·巴泰勒米(Giraud, Charles-Joseph-Barthelemy 1802—1881)——法国法学家，保皇党人，曾任教育部长(1851)。——217。
- 日罗姆——见波拿巴，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 荣克·爱利莎(Jung, Elise 父姓科英 Coing 1760—1817)——1790年起为约·亨·荣克-施梯林的第三个妻子。——295。
- 荣克，格奥尔格·哥特洛布(Jung, Georg Gottlob 1814—1886)——德国陪审员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莱茵报》创办人和发行负责人之一；1848年为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后为民族自由党人。——547。
- 荣克，克里斯蒂娜(Jung, Christine 父姓海德 Heyder 1749左右—1781)——1771年起为约·亨·荣克-施梯林的第一个妻子。——295。
- 荣克-施梯林，约翰·亨利希(Jung-Stilling, Johann Heinrich 人称施梯林 Stilling 1740—1817)——德国医生、经济学家和作家，虔诚主义者。——295。
- 荣克，泽尔玛(Jung, Selma 父姓冯·圣弗洛伦廷 von St. Florentin 1760—1790)——1783年起为约·亨·荣克-施梯林的第二个妻子。——295。
- 荣克尔曼(Junkermann)——德国克雷费尔德警察局督察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

(1852)的原告证人。——529、530。

茹安维尔亲王, 弗朗索瓦·斐迪南·菲利浦·路易·玛丽, 奥尔良公爵 (Joinville, François-Ferdinand-Philippe-Louis-Marie, duc d'Orléans, prince de 1818—1900)——法国海军上将, 40年代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1848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英国, 1861—1862年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路易·菲利浦的儿子。——206、215。

S

萨代, 莱昂哈德 (Sadée, Leonhard)——546。

萨德勒, 约翰 (Sadleir, John 1814—1856)——爱尔兰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英国议会中爱尔兰党团的领袖之一, 蒂珀雷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董事; 1853年任财政副大臣; 1856年因蒂珀雷里银行破产而自杀。——593、594、597、607、627、628。

萨尔万迪伯爵, 纳尔西斯·阿希尔 (Salvandy, Narcisse-Achille, comte de 1795—1856)——法国国务活动家和作家, 奥尔良党人, 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 (1837—1839和1845—1849)。——205。

萨菲, 奥雷廖 (Saffi, Aurelio 1819—1890)——意大利作家,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 马志尼的追随者; 意大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1年流亡英国, 1872年起领导意大利共产党。——634、668、801。

萨克森元帅——见莫里茨, 萨克森伯爵。

萨兰德鲁兹·德拉莫尔奈, 沙尔·让 (Sallandrouze de Lamornais, Charles-Jean 1808—1867)——法国工业家,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 (1848—1849);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拿破仑第三。——219。

萨默斯, 罗伯特 (Somers, Robert 1822—1891)——英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612、614。

萨默维尔, 威廉·梅雷迪思 (Somerville, William Meredyth 1802—1873)——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 (1847—1852)。——441。

萨瑟兰公爵, 乔治·格兰维尔·鲁森-高尔, 斯塔福德侯爵, 布里奇沃特公爵 (Sutherland George Granville Leveson-Gower, Marquess Stafford, Duke of Bridgewater, Duke of 1758—1833)——苏格兰大地主, 议会议员; 曾任驻巴黎大使 (1790—1792)。——612。

萨瑟兰公爵夫人, 哈丽雅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 (Sutherland,

- Harriet Elizabeth Georgina Leveson-Gower, Duchess of 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伊·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儿媳。——607、608、613—615。
- 萨瑟兰家族——苏格兰贵族大地主家族。——608、612、613。
- 萨瑟兰女伯爵,伊丽莎白·鲁森-高尔,斯塔福德侯爵夫人,公爵夫人(Sutherland, Elizabeth Leveson-Gower, Countess of, Marchioness of Stafford, Duchess of 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斯塔福德侯爵的妻子,哈·伊·乔·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婆婆。——611—614。
-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133。
- 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米格尔·德(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 1547—1616)——西班牙作家。——18、76、241、354、392。
- 桑德尔斯,汉纳(Sandles, Hannah)——617。
- 桑德利,玛丽·安(Sandry, Mary Ann 1810左右—1853)——英国女工。——657。
- 扫罗(Saul 公元前11世纪)——第一个以色列王(公元前1012左右—1004)——351。
- 瑟美列,贝尔塔兰(Szemere, Bertalan 1812—1869)——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和政论家,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曾任革命政府内务部长(1848)和首脑(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巴黎,1865年回到匈牙利。——642、663。
- 沙贝利茨,雅科布·克里斯蒂安(Schabelitz, Jacob Christian 1804—1866)——瑞士出版商和书商,巴塞尔一家书店和一家出版社的所有人。——669。
- 沙贝利茨,雅科布·鲁卡斯(Schabelitz, Jacob Lucas 1827—1899)——瑞士出版商和书商,1846年10月—1848年5月为《德意志—伦敦报》编辑,1846年起为民主派兄弟协会会员,1848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40年代末—50年代初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联系;雅·克·沙贝利茨的儿子。——669。
- 沙德韦尔(Shadwell)——19世纪50年代初是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校勘律师。——457、458。
- 沙尔腊斯,让·巴蒂斯特·阿道夫(Charras, Jean-Baptiste-Adolphe 1810—1865)——法国军事家和政治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因反对拿破仑第三的政府而被驱逐出法

国。——219。

沙米索,阿德尔贝特·冯(Chamisso,Adelbert von 1781—1838)——德国浪漫派诗人。——157、286、295、309。

沙佩尔,卡尔(Schapper,Karl 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创建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案件(1849年2月8日)的被告之一;1849年2—5月为科隆工人联合会主席;《新莱茵报》撰稿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起重新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国际总委员会委员(1865),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274、361、364、478—480、482—485、489、492—496、501、532、535、536、538、565、774、786、787。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 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85—186、197、204、226、380、524、531、740、757。

尚博尔伯爵,昂利·沙尔·斐迪南·玛丽·迪约多内·达尔图瓦,波尔多公爵(亨利五世)(Chambord,Henri-Charles-Ferdinand-Marie Dieudonne d'Artois,duc de Bordeaux,comte de, Henri V 1820—1883)——法国波旁王室长系的最后代表,查理十世之孙;1830年七月革命胜利后逃亡国外,法国王位追求者,称亨利五世。——161、184、205、209。

尚加尔涅,尼古拉·安娜·泰奥杜尔(Changarnier,Nicolas-Anne-Théo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保皇派;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曾参加镇压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六月十三日示威游行,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被逮捕并被驱逐出法国,1859年回到法国;普法战争时期在莱茵军团司令部任职,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53、152—154、157、163、168、169、186—188、191、192、194—198、201、207、210、216、218、219。

舍尔瓦尔(Cherval父姓纽金特Nugent)——茹·舍尔瓦尔的妻子。——493。

舍尔瓦尔,茹利安(Cherval,Julien 原名约瑟夫·克雷默 Joseph Crämer)——普鲁士警探和奸细,曾钻进共产主义者同盟队伍,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曾领导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一个巴黎支部,1852年2月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的被告之一;在警察局的帮助下越狱逃跑,1853—

1854年化名纽金特在瑞士进行密探活动。——485、487—503、520、521、543、545、546、550、555、556、560、566、774、776、780、783、784、791。

舍夫茨别利伯爵, 安东尼·阿什利·库伯(Sheftesbury, Anthony Ashley Cooper, Earl of 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 40年代是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贵族慈善家运动的领导人, 低教会派的拥护者; 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 帕麦斯顿的女婿。——655。

圣阿尔诺, 阿尔芒·雅克·阿希尔·勒鲁瓦·德(Saint-Arnaud, Armand-Jacques-Achille-Leroy de 1801—1854)——法国将军, 1852年起为元帅, 波拿巴主义者; 1836—1851年曾参加侵占阿尔及利亚, 曾任陆军部长和陆军大臣(1851—1854), 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策划者之一, 1854年任克里木法军总司令。——154、736。

圣贝夫, 皮埃尔·昂利(Sainte-Beuve, Pierre-Henri 1819—1855)——法国厂主和地主, 自由贸易的拥护者, 秩序党的代表人物;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210。

圣弗洛伦廷, 冯——见荣克, 泽尔玛。

圣普里子爵, 艾曼纽埃尔·路易·玛丽·德·吉尼亚尔(Saint-Priest, Emmanuel-Louis-Marie de Guignard, vicomte de 1789—1881)——法国将军和外交家, 正统派的领袖,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205。

圣让·丹热利——见雷尼奥·德·圣让·丹热利(圣让·丹热利)伯爵, 奥古斯特·米歇尔·埃蒂耶纳。

圣日耳曼兹伯爵, 爱德华·格兰维尔·埃利奥特(Saint-Germans, Edward Granville Eliot, Earl of 1798—1877)——英国政治活动家, 皮尔分子; 曾任爱尔兰总督(1841—1845)和爱尔兰首席治安官(1852—1855)。——461。

圣茹斯特, 安东·路易·莱昂·德(Saint-Just, Antoine-Louis-Léon de 1767—1794)——法国政治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132。

圣西门, 昂利(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5、22。

施彼尔林(Sperling)——490。

施蒂纳, 麦克斯(Stirner, Max 原名约翰·卡斯帕尔·施米特 Johann Caspar

- Schmidt 1806—1856)——德国哲学家和著作家,青年黑格尔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330。
- 施蒂韦,约翰·卡尔·贝尔特拉姆(Stüve, Johann Karl Bertram 1798—1872)——德国政治家,自由主义者,曾任汉诺威内务大臣(1848—1850)。——14。
- 施拉姆伯爵,让·保尔·亚当(Schramm, Jean-Paul-Adam, comte de 1789—1884)——法国将军和政治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陆军部长(1850—1851)。——188,194。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Conrad 1822—1858)——德国新闻工作者,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8年11月起为《基尔民主周报》出版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后侨居泽稷岛,《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负责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1857年侨居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95,496。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f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会议议员,属于左派,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60年代拥护俾斯麦;康·施拉姆的哥哥。——319、320、324、335、362、366、399、400、403。
- 施勒辛,玛丽(Schlössing, Maria)——哥·约·金克尔青年时代在柏林的女友。——285,289,290。
- 施伦巴赫,卡尔·阿尔诺德(Schlönbach, Carl Arnold 1807—1866)——德国演员和诗人,哥·约·金克尔的朋友。——299。
- 施米茨, Th. (Schmitz, Th.)——德国科隆市一私人文书,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证人。——510,511。
- 施米特——见弗略里,查理。
- 施米特,约翰·卡斯帕尔——见施蒂纳,麦克斯。
- 施莫尔策,卡尔·亨利希(Schmolze, Karl Heinrich 1823—1859)——德国漫画家和诗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法国和英国;在伦敦的法国流亡者中间进行活动;1853年迁居美国。——537,719。
- 施奈德第二,卡尔(Schneider II, Karl)——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8年是科隆民主协会主席和民主主义者莱

- 茵区域委员会委员,1849年2月7日《新莱茵报》案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护人;1849年2月8日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案件的被告之一;1849年为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后脱离政治活动。——497、503、509、510、513、516—518、520、521、527、530、531、546—548、554、556、557、559、561、568、569、777、778、790、791。
- 施瑞费尔,卡尔·亨利希(Schnauffer, Carl Heinrich 1823—1854)——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和英国,1851年迁居美国,加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为《巴尔的摩警钟报》的出版者和编辑(1851—1854)。——344。
- 施皮斯,克里斯蒂安·亨利希(Spieß, Christian Heinrich 1755—1799)——德国演员和作家,著有一些消遣小说。——289。
- 施塔迪昂伯爵,弗兰茨·泽拉夫(Stadion, Franz Seraph Graf 1806—185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1846年起为加里西亚总督,镇压加里西亚和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策划者之一,1848年为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48—1849)。——76。
- 施塔尔,阿道夫·威廉·泰奥多尔(Stahr, Adolf Wilhelm Theodor 1805—1876)——德国语文学家、作家和政论家,自由主义者,写有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836)和一些历史小说以及有关文学艺术史问题的学术著作;《哈雷年鉴》、《德国年鉴》和《莱茵报》的撰稿人。——313。
- 施塔尔,芬妮(Stahr, Fenny 父姓莱瓦尔德 Lewald 1811—1889)——德国女作家,曾加入“青年德意志”;在小说中主张妇女解放和犹太人享有同等权利;阿·威·泰·施塔尔的妻子。——330。
- 施特拉索尔多-格拉芬贝格(施特拉索尔多)伯爵,尤利乌斯·凯撒(Strassoldo-Graffenberg [Strassoldo], Julius Cäsar Graf 1791—1855)——奥地利将军,镇压意大利1848—1849年民族解放运动时期任奥军旅长,1853年任驻米兰奥军师长,约·拉德茨基元帅的助理。——641。
- 施泰翰,哥特利布·路德维希(Stechan, Gottlieb Ludwig 1814左右—1875)——德国细木工,1836年起侨居巴黎,成为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1840年返回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工人兄弟会领导人之一;1850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1年为《德意志工人俱乐部》编辑和发行人,同年

被捕,后越狱逃往伦敦;新伦敦工人协会领导人之一。——509、769、787。

施泰因,洛伦茨·冯(Stein, Lorenz von 1815—1890)——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330、543、544。

施泰因,尤利乌斯(Stein, Julius 1813—1889)——德国教师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是第二议院议员,属于极左派;50年代是《新奥得报》编辑,1862年起是《布雷斯劳报》编辑。——546。

施泰因根斯,卢伊特伯特·亨利希·海尔曼(Steingens, Luitbert Heinrich Hermann 约生于1817年)——德国油漆匠,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原告证人。——506、537。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黑格尔的学生;《耶稣传》(1835)和《基督教教义》(1840)的作者,他对圣经的历史性批判奠定了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基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301、325。

施特罗特曼,阿道夫·亨利希(Strodtmann, Adolph Heinrich 1829—1879)——德国作家和诗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革命运动的参加者,1850—1865年流亡国外,哥·约·金克尔传记的作者。——116、279—315、359、361、387、392。

施梯伯,威廉(Stieber, Wilhelm 1818—1882)——普鲁士警官,普鲁士政治警察局局长(1852—1860),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主要原告证人;同维尔穆特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1871)时期为军事警察局局长,在法国境内的德国情报机关的首脑。——476、478、482—507、509、516、518—523、525、530、536、540、541、543、547、550、556、557、560、561、566—569、775—777、780—784、787、791。

施梯林——见荣克-施梯林,约翰·亨利希。

施瓦尔岑堡公爵,费利克斯·路德维希·约翰·弗里德里希(Schwarzenberg, Felix Ludwig Johann Friedrich Fürst zu 1800—1852)——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1848年维也纳十月起义被镇压后任首相兼外交大臣(1848年11月—1852年)。——38。

- 施瓦策,恩斯特·冯(Schwarzer, Ernst von 1808—1860)——奥地利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自由主义者;1848年为《奥地利总汇报》的创办人和编辑;奥地利帝国国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48年7—9月)。——66。
- 施韦茨勒·冯·莱克顿(Schwezler von Lecton)——柏林一官员的遗孀。——519。
- 施因德汉斯——见毕克列尔,约翰。
- 狮心理查——见理查一世,狮心理查。
- 史密斯(Smith)——617。
- 叔尔茨,卡尔(Schurz, Carl 1829—1906)——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加入秘密组织“革命集中”;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美国共和党领袖之一,曾任美国驻西班牙公使,后为参议员和内政部长(1877—1881)。——116、297、309、314、315、359、361、387、392、393、395—397、399、406、537。
- 舒尔茨(Schultz[Schultz] 死于1852年)——柏林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476、502、508、530、541、555、560、769、788。
- 司各脱,瓦尔特(Scott, Walter 1771—1832)——英国诗人和作家,西欧文学中历史小说的开创者,苏格兰人。——740。
- 司徒卢威,阿马利亚·冯(Struve, Amalie von 父姓杜扎尔 Düsar 死于1862年)——德国小说家和回忆录作家,1848—1849年德国民主运动的参加者;古·司徒卢威的妻子。——322、323、344、371。
- 司徒卢威,古斯塔夫·冯(Struve, Gustav von 1805—1870)——德国律师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1847—1848年是《德国旁观者》的出版者;预备议会议员;1848年四月和九月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862年返回德国。——114、115、319—324、335、336、342—346、350、362、366—369、371、372、387。
- 斯宾塞,赫伯特(Spencer, Herbert 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者。——626。
- 斯蒂芬斯,约瑟夫·雷纳(Stephens, Joseph Rayner 1805—1879)——英国教士,曾参加兰开夏郡的宪章运动(1837—1839)。——655—656。

- 斯科菲尔德,威廉(Scholefield, William 1809—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派,议会议员。——651。
- 斯莱德, T. (Slade, T.)——英国农场主。——605、606。
- 斯密, 亚当(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611。
- 史密斯·(威尔逊)·德赖尔公司(Smith[Wilson]Dryer & Co.)——546。
- 斯普纳, 理查(Spooner, Richard 1783—1864)——英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议会议员。——651。
- 斯图亚特, 达德利·库茨(Stewart, Dudley Coutts 1803—1854)——英国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 议会议员; 曾与波兰保守的保皇派流亡集团有联系。——664。
- 斯图亚特, 休斯顿(Stewart, Huston 1791—1875)——英国海军上将, 辉格党人, 海军部部务委员(1850—1852); 1855年为黑海舰队副总司令。——441。
- 斯图亚特, 詹姆斯(Steuart, James 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611。
-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609—610。
- 苏, 欧仁(Sue, Eugène 原名玛丽·约瑟夫 Marie-Joseph 1804—1857)——法国作家, 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 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48—1849)。——175、740。
- 苏格拉底(Sokrates 公元前470—399)——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奴隶主贵族思想家。——322。
- 苏路克, 法斯廷(Soulouque, Faustin 1782左右—1867)——海地共和国总统(1847—1849), 1849年自立为帝, 称法斯廷一世。——239。
- 索尔特, 泰特斯(Salt, Titus 1803—1876)——英国厂主。——450—451。
- 索菲娅——见伯格霍尔德, 索菲娅。

T

-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55—120)——古罗马历史学家, 《日耳曼尼亚志》、《历史》、《编年史》的作者。——348、626。
- 泰霍夫, 古斯塔夫·阿道夫(Techow, Gustav Adolf 1813—1893)——普鲁士军

- 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柏林攻占军械库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成为在瑞士的流亡者组织“革命集中”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居澳大利亚。——116、359、387、392、393、719。
- 泰斯马尔(Thesmar)——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548、554、557、559、568、569、777。
- 汤普森,托马斯·佩罗内特(Thompson, Thomas Perronet 1783—1869)——英国政治家和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派。——442。
- 汤奇—柯里公司(Tonge, Curry & Co.)——英国利物浦一家造船公司。——601。
- 陶森瑙,卡尔(Tausenau, Karl. 1808—1873)——奥地利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左翼的代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维也纳民主协会中央委员会首脑;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侨居美国。——113、359、366、394—398、401—404。
- 特鲁拉夫,爱德华(Truelove, Edward 1809—1899)——英国出版商,欧文的信徒,宪章主义者,改革同盟和全国星期日同盟盟员;曾出版马克思的著作。——673。
- 特罗莱,敏娜(Trolé, Minna)——哥·约·金克尔青年时代在波恩的女友。——287—291。
- 特罗洛普,约翰(Trollope, John 生于1800年)——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665。
- 梯特(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 Flavius Vespasianus 39—81)——罗马皇帝(79—81)。——750。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54、161、163、167、178、198、206、207、210、213、216、218—220、230、646、733。
- 帖木儿(跛帖木儿)(Timur-i-lang[Tamerlane] 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743。
- 铁木真——见成吉思汗。
- 图克,托马斯(Tooke, Thomas 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

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452。

托克维尔,沙尔·亚历克西斯·昂利·莫里斯·克莱雷勒·德(Tocqueville, Charles-Alexis-Henri-Maurice Clérel de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正统主义者和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1851)、外交部长(1849年6—10月)。——207。

托里尼,皮埃尔·弗朗索瓦·伊丽莎白·勒利永·德(Thorigny, Pierre-François-Elisabeth Leullion de 1798—1869)——法国法学家,波拿巴主义者,1834年审理里昂四月起义者案件;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内务部长(1851)。——217。

托林顿子爵,乔治·宾(Torrington, Georges Byng, Viscount 1812—1884)——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曾任锡兰总督(1847—1850)。——430。

托马斯,萨拉(Thomas, Sarah)——617。

托马佐·安尼洛——见马赞尼洛。

屠夫汉斯——见毕克列尔,约翰。

W

瓦蒂梅尼尔,安东·弗朗索瓦·昂利·勒费夫尔·德(Vatimesnil, Antoine-François-Henri Lefebvre de 1789—1860)——法国政治家,正统主义者,曾任教育大臣和教育部长(1828—1851),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会议员(1849—1851)。——200。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莱奥(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普鲁士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是普鲁士制宪议会副议长和左翼领导人之一;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49)和北德意志联邦议会议员(1867年起);进步党的领袖。——363。

瓦伊斯,克劳德·马里乌斯(Vaisse, Claude-Marius 1799—1864)——法国政治活动家,波拿巴主义者;曾任内务部长(1851年1—4月)。——199、200。

威尔逊,乔治(Wilson, George 1808—1870)——英国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派,反谷物法同盟主席(1841—1846)。——629。

威廉-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Wilhelm Friedrich Ludwig 1797—1888)——普鲁士亲王,摄政王(1858—1861),普鲁士国王,称威廉一世(1861—1888),德国皇帝(1871—1888)。——402。

- 威廉斯,泽弗奈亚(Williams,Zephania 1794左右—1874)——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宪章主义者,1839年威尔士矿工起义的组织者之一;被判终身流放澳大利亚。——430、466。
- 威廉一世(Wilhelm I 1781—1864)——符腾堡国王(1816—1864)。——98。
- 威廉四世(William IV 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673。
-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 Wellesley,Duke of 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241、456、458。
- 威灵顿公爵,阿瑟·理查·韦尔斯利,杜罗侯爵(Wellington,Arthur Richard Wellesley,Marquis of Douro,Duke of 1807—1884)——英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托利党人;阿·韦·威灵顿公爵的儿子。——458—459。
- 威斯特华伦,斐迪南·奥托·威廉·亨宁·冯(Westphalen,Ferdinand Otto Wilhelm Henning von 1799—1876)——普鲁士国务活动家,曾任内务大臣(1850—1858);马克思夫人燕妮的异母哥哥。——120、643。
- 韦尔克,卡尔·泰奥多尔(Welcker,Karl Theodor 1790—1869)——德国法学家、政治家和自由派政论家;1848年巴登驻联邦议会全权代表,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右翼——14、24、76、321、346、352。
- 韦尔纳(Werner)——查·弗略里在伦敦的熟人。——526。
-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 Gibbon 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595。
- 韦隆,路易·德西雷(Véron,Louis-Désiré 1798—1867)——法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1848年前为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巴黎评论》和《立宪主义者报》的所有人和发行人(1844—1852)。——239。
- 韦特,阿伯拉罕(Wetter,Abraham)——德国商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51年在马克思和斐·拉萨尔之间传递信件。——547。
- 维埃伊拉(Vieyra)——法国上校,波拿巴主义者;1851年任国民自卫军参谋长;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的参加者。——167。
- 维达尔,弗朗索瓦(Vidal,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勃朗的追随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179。

- 维迪尔,茹尔(Vidil,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在伦敦的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协会领导人;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发生联系。——364。
- 维多利亚(Victoria 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434、587、592、621。
- 维尔穆特,卡尔·格奥尔格·路德维希(Wermuth,Carl Georg Ludwig 1803—1867)——德国警官,汉诺威警察局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策划者之一和原告证人;同施梯伯合编《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478、504、520、521、530、779。
- 维干德,奥托(Wigand,Otto 1795—1870)——德国出版商和书商,在莱比锡开有书店,出版一些激进派作家的著作;1848—1849年曾参加萨克森的革命运动。——331、333。
- 维莱尔伯爵,让·巴蒂斯特·赛拉芬·约瑟夫(Villèle,Jean-Baptiste-Séraphin-Joseph,comte de 1773—1854)——法国国务活动家,正统主义者,曾任首相(1822—1828)。——207。
- 维里蒂,E. A. (Verity,E. A.)——英国教士。——656。
- 维利尔斯,查理·佩勒姆(Villiers,Charles Pelham 1802—1898)——英国政治家和法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曾任军法总监(1852—1858),济贫法总督察(1859—1866)。——573、594。
- 维利森男爵,卡尔·威廉(Willisen,Karl Wilhelm Freiherr von 1790—1879)——普鲁士将军和军事理论家;1848年任王室驻波森专员;1848—1849年在奥地利军队中供职,曾参与镇压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1850年统率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军队对丹麦作战;写有军事史方面的著作。——388。
-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1847年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为志愿军团首领;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同卡·沙佩尔一起组成反对马克思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1853年侨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任将军。——113、116、118、119、274、310、361、363、364、366、371、375、387、388、390—393、397、399、400、402、403、406、478—480、482、483、485、489、492—495、501、502、531、532、535—539、556、565、719、774、786、787、791。
- 维斯,格奥尔格·爱德华(Wiß,Georg Eduard)——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新闻工

作者,青年黑格尔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1850年左右侨居美国;1863年为美国驻鹿特丹的领事;哥·约·金克尔的拥护者。——333、374、375、394、403、404。

维斯康蒂公爵夫人——见阿尔康纳蒂·维斯康蒂侯爵夫人,康斯坦扎。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军官、新闻工作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1846—1847),《威斯特伐利亚汽船》编辑;曾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1846);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新德意志报》编辑(1849—1850),共产主义者同盟法兰克福区部领导人(1849—1851);1851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272、273、708、710、718、722、728、769、793、796。

魏登巴赫(Weidenbach)——1851年是巴黎警察局警官。——497。

魏斯,约翰·哥特利布·克里斯蒂安(Weiß, Johann Gottlieb Christian 1790—1853)——德国演员和导演。——286。

温克尔布莱希,卡尔·格奥尔格(Winkelblech, Karl Georg 1810—1865)——德国经济学家,鼓吹恢复行会理论,即所谓“联邦社会主义”。——305。

温克尔曼,爱德华(Winkelmann, Eduard 1838—1896)——德国杜塞尔多夫的大学生(1848),德国历史研究者。——309。

文迪施格雷茨公爵,阿尔弗勒德·坎迪杜斯·斐迪南(Windischgrätz, Alfred Candidus Ferdinand Fürst zu 1787—1862)——奥地利陆军元帅;1848年镇压布拉格六月起义和维也纳十月起义;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57、65、68、70、76、332。

文克施特恩,奥托·冯(Wenckstern, Otto von 1819—1869)——德国新闻工作者,《波恩日报》出版者之一,50年代流亡伦敦;《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的撰稿人。——673。

沃德, J. (Ward, J.)——617。

沃尔波尔,斯宾塞·霍雷肖(Walpole, Spencer Horatio 1806—1898)——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52、1858—1859和1866—1867)。——575。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 Friedrich Wilhelm 鲁普斯 Lupus 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

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00、108、119、517、519、548、549、554—562、572、782、783。

沃尔弗,斐迪南(Wolff, Ferdinand 绰号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 1812—1895)——德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巴黎和伦敦;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后来脱离政治活动,在牛津任语文教师。——572、783。

沃尔弗拉姆·冯·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 约1170—1220)——德国诗人,骑士诗《巴齐法尔》的作者。——285。

沃姆斯利(Walmesley)——708。

乌迪诺,尼古拉·沙尔·维克多,雷焦公爵(Oudinot, Nicolas-Charles-Victor, duc de Reggio 1791—1863)——法国将军,奥尔良党人,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49年指挥军队侵犯罗马共和国;曾任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试图组织力量抵抗1851年十二月二日的政变,后离开军界。——153、167、172。

乌尔默,约翰(Ulmer, Johann)——德国裁缝,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49年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参加者,运动失败后流亡瑞士,1851年起侨居英国;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1852年为新伦敦工人协会创始人之一;1865年起为国际会员。——510、523、572、781、782。

伍德,查理(Wood, Charles 1800—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自由党人;曾任财政大臣(1846—1852)、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52—1855)、海军首席大臣(1855—1858)、印度事务大臣(1859—1866)、掌玺大臣(1870—1874)。——413、414、427、430、431、575、584—586、595、622、645、652、729。

伍兹—斯塔布斯公司(Woods & Stubbs)——英国的一家公司。——601。

X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德国店员,19世纪50年代初是在伦敦的普

- 鲁士警探,曾伪造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文件。——502、508—512、520、521、523、525、527、528、538、539、550、556、561、566—569、791。
- 西蒙,亨利希(Simon,Heinrich 1805—1860)——德国布雷斯劳市法院参事,自由主义者;40年代由于持反对派立场而受惩戒,后被革职;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后流亡瑞士。——109。
- 西蒙,路德维希(Simon,Ludwig 1810—1872)——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曾被缺席判处死刑,1866年前往巴黎,后返瑞士蒙特勒。——403。
-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394、531、656。
-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612—613、660、662。
- 席勒,弗里德里希·冯(Schiller,Friedrich von 1759—1805)——德国诗人、美学家和历史学家。——186、193、201、293、309、324、380、515、543。
- 席利,维克多(Schily,Victor 1810—1875)——德国法学家,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秘密组织“革命集中”的成员,1852年迁居法国;国际会员,曾帮助总委员会巩固在巴黎的国际组织,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的参加者。——537。
- 席梅尔普芬尼希(奥耶的),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von der Oye,Alexander 1824—1865)——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巴登的斗争以及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同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有联系;1858年迁居华盛顿,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116、359、387、392、393、397、719、775。
- 谢尔策尔,安德烈亚斯(Scherzer,Andreas 1807—1879)——德国裁缝和政论家,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是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一个巴黎支部的成员,所谓巴黎德法密谋案件(1852年2月)的被告之一;后流亡英国,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新时代》出版者和《人民报》撰稿人;1871年底由于发表诽谤总委员会的言论和进行分裂活动而被开除出国际。——489—491。
- 谢立丹,理查·布林斯利(Sheridan,Richard Brinsley 1751—1816)——英国剧

作家和政治家,辉格党激进派的代表。——740。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斐迪南(Schärttner, August Ferdinand)——德国制桶匠,1848—1849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酒店,酒店成为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聚会之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属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为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委员。——361、377、537、538。

欣克尔代,卡尔·路德维希·弗里德里希·冯(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von 1805—1856)——普鲁士政府官员,1848年起为柏林警察局长,1853年起为内务部警察司司长。——529—530。

休谟,约瑟夫(Hume, Joseph 1777—1855)——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议会议员。——430、455、463、464、467、468、679。

休斯—罗纳德公司(Hughes & Ronald)——英国利物浦一家棉纺公司。——600。

许茨,雅科布·弗里德里希(Schütz, Jakob Friedrich 1813—1877)——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为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参加者和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驻巴黎代表;后流亡瑞士、英国和美国。——333、334、537、719。

许尔曼, K. (Schürmann, K.)——德国律师,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辩护人。——548、554、557、559、568、569、777。

许勒尔,弗里德里希(Schüler, Friedrich 1791—1873)——德国政治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109。

雪莱,约翰·维利尔斯(Shelley, John Villiers 1808—1867)——英国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议会议员。——665。

Y

雅科比,阿伯拉罕(Jacobi, Abraham 1830—1919)——德国医生,波恩体操联合会创建人和会长(1850—1851),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特使,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被告之一,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但因被控“侮辱国王陛下”而继续被监禁;1853年流亡英国,后迁居美国,在美国的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后为纽约医学科学院院长(1885—1889),一些医学院的教授和院长;写有医学方面的著作。——256、557、772、791—

792。

雅科比, 约翰(Jacoby, Johann 1805—1877)——德国医生、政论家和政治家, 民主主义者; 预备议会议员, 普鲁士制宪议会左翼领导人之一(1848); 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极左派; 1862年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 《未来报》创办人(1867), 反对俾斯麦的政策; 1872年起成为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党员。——363。

亚伯拉罕·圣克拉拉(Abraham a Santa Clara 原名约翰·乌尔里希·梅格勒 Johann Ulrich Megerle 1644—1709)——奥地利天主教传教士和作家。——394、396。

亚德利(Yardley)——617。

亚历山大, 约翰(Alexander, John)——爱尔兰政治活动家, 1853年是议会议员。——607。

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公元前356—323)——古代著名的统帅, 马其顿王(公元前336—323)。——187。

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俄国皇帝(1801—1825)。——13、53、56。

亚眠的彼得——见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

亚奇斯二世(Agis II 死于公元前401年)——斯巴达王(公元前427—401); 阿革西拉乌斯之兄。——201。

杨格, 约翰, 利斯加男爵(Young, Sir John, Baron Lisgar 1807—1876)——英国政治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52—1855), 伊奥尼亚群岛首席专员(1855—1859)。——637。

尧普, 亨利希·卡尔(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德国法学家, 自由主义者, 黑森—达姆施塔特政府首脑(1848—1850), 1850年3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主席。——348。

耶拉契奇, 约西普, 布日姆伯爵(Jellačić, Josip Graf von Bužim 1801—1859)——奥地利将军, 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省总督(1848—1859), 积极参加镇压奥地利和匈牙利的1848—1849年革命。——65、67、68、70、72、73。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 II 1729—1796)——俄国女王(1762—1796)。——664。

伊茨施太因, 约翰·亚当·冯(Itzstein, Johann Adam von 1775—1855)——德国政治家, 巴登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领袖之一, 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

-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341。
- 伊曼特,彼得·米夏埃尔(Imandt, Peter Michael 1823—1897)——德国教员,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1852年3月被驱逐出境,迁居伦敦;1852年7月起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513、523—527、537、571、719。
- 伊萨伯拉二世(Isabella II 1830—1904)——西班牙女王(1833—1868)。——751。
- 伊索(Aesop[Aisopos]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136、416、738、762。
- 伊雍(Yon)——法国警官,第二共和国时期掌管立法议会警卫队(1850)。——186、191。
- 隐士彼得或亚眠的彼得(Peter l'ermite 或 Peter d'Amiens 1050左右—1115)——法国僧侣和传教士,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时(1096—1099)为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之一。——389。
- 英格诺尔,弗里德里希(Ingenohl, Friedrich 约生于1804年)——德国商人,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陪审员。——476—477。
- 英格索尔,约瑟夫(Ingersoll, Joseph 1786—1868)——美国政治活动家,国会议员;曾任驻英大使(1852—1853)。——597。
- 尤尔特,威廉(Ewart, William 1798—1869)——英国政治家,皮尔分子,自由党人,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430、441。
- 尤利乌斯,古斯塔夫(Julius, Gustav 1810—1851)——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林阅览室》的出版者(1846—1848);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与马克思结交。——121。
- 雨果,维克多·玛丽(Hugo, Victor-Marie 1802—1885)——法国作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流亡泽稷岛;1855年底被英国当局驱逐出境,1870年回到法国,1871年为国民议会议员,1876年为参议员。——172、734、736、739—745、751。
- 约尔丹,西尔韦斯特(Jordan, Sylvester 1792—1861)——德国法学家和政治家,30年代黑森选帝侯国立宪民主运动的领袖;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4。
- 约翰(Johann 1782—1859)——奥地利大公,元帅,反对拿破仑法国战争的参加

者,1809年为奥地利军队指挥官,1848年6月—1849年12月为德意志帝国摄政。——47、63、97、100、108—110。

约翰·里格利父子公司——见里格利父子公司。

约瑟夫二世(Joseph II 1741—1790)——奥地利女皇玛丽-泰莉莎的共同执政者(1765—1780),奥地利君主国执政(1780—179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80—1790)。——32、33。

约斯特,威廉(Joest, Wilhelm 约生于1813年)——德国商人和厂主。——476。

Z

扎克,卡尔·亨利希(Sack, Karl Heinrich 1789—1875)——德国新教神学家,波恩大学教授。——279。

泽肯多夫男爵,奥古斯特·亨利希·爱德华·弗里德里希(Seckendorff, August Heinrich Eduard Friedrich Freiherr von 1807—1885)——普鲁士法学家,大法官;第二议院议员,属于中间派(1849—1851);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475、478、499、511、512、516、543、544、568。

泽特,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普鲁士法官,1848年起任科隆检察官,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2)的公诉人。——475、478、494、499、512、528、541—544、548、555、557、559—561、568、569、790。

詹姆斯,乔治·佩恩·雷恩斯福德(James, George Payne Rainsford 1799—1860)——英国作家,写有历史方面的小说。——740。

詹姆斯一世(James I 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626。

詹姆斯二世(James II 1633—1701)——英国国王(1685—1688)。——634。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719。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耳契娜——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凶恶的女巫。——344。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用“阿基里斯之踵”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145、147、583。

阿里曼(安格拉·曼纽)——体现世上万恶之源的古波斯神安格拉·曼纽的希腊名字。安格拉·曼纽同体现众善之源的阿胡拉·玛兹达(希腊名字叫奥尔穆兹德)有着永世不可调和的仇恨。——339。

阿斯托尔弗——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391。

阿塔·特洛尔——海涅同名讽刺诗中的主角，是一头熊。——329。

安格拉·曼纽——见阿里曼。

安吉利卡——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和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391。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汲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762。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

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76、316。

奥夫特丁根,亨利希·冯——见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

奥吉亚斯——古希腊神话中奥吉亚斯王,有大牛圈,养牛 3000 头,30 年未打扫。后来人们用“奥吉亚斯的牛圈”来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357、542。

B

巴克科斯——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快乐之神,为狄奥尼索斯的别名。据传说,他首创用葡萄酿酒,并将种植葡萄和采集蜂蜜的方法传遍四方。祭祀巴克科斯的方式是狂欢暴饮和疯狂舞蹈。——187、435、436。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108、132、236。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236。

彼得·施莱米尔——沙米索的中篇小说《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中的主人公,他用自己的影子换来一个神奇的钱袋。——157。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后篇、《亨利五世的一生》、《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骗子手、胆小鬼和吹牛家。——380。

波顿——见尼克·波顿。

柏里亚——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国王。——287。

布拉瓦伯爵——博雅多的《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391。

布鲁土斯——莎士比亚的剧作《尤利乌斯·凯撒》中的人物。——399。

D

达摩克利斯——古希腊传说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公元前 4 世纪)的宠臣;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挂在他的头上,让他知道帝王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177。

答尔乔夫——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的人物。——420。

大卫——据圣经传说,大卫幼年时撒母耳曾为其敷油,预许他继承扫罗王位。少年时值以色列王扫罗同非利士人作战,遇勇士歌利亚,军中无人能胜他。大卫自请出战,杀死歌利亚。后大卫继扫罗为以色列王。——168。

迪斯必特——见丘必特。

多马——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以不愿相信基督复活而出名。“不信的多马”一词后来就成了审慎多疑者的代名词。——502。

E

鹅妈妈——英国儿歌集中的人物。——442。

厄里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不和女神；佩琉斯同忒提斯结婚时，因忘了请厄里斯参加婚礼，她就投下了“不和的金苹果”，从而引起了赫拉、雅典娜和阿芙罗狄蒂之间的争执，最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202。

恩克拉德(或恩泽拉德)——古希腊神话中同奥林波斯山上诸神战斗的巨人之一。——797。

F

费加罗——博马舍的三部剧：喜剧《塞维尔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礼》和话剧《有罪的母亲》中的主人公；灵活、机智、能干并且有点狡猾的人的典型。——494。

疯狂的罗兰——阿里欧斯托的同名长诗中的主人公。——385、391。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283、746。

G

该隐——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的长子。据《创世记》记载，他因忌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今用为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比喻。——618。

H

哈巴谷——圣经中的先知。——133。

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德国作家诺瓦利斯的未完成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诗人，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用于寻找“蓝色花朵”——理想的诗篇的象征。——289、290。

J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济格瓦特——约·马·密勒的小说《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中的主人公。——279、283、289、295、313、314。

加略人犹大——据圣经传说,是十二使徒之一,为了30块银币出卖了自己的老师耶稣。犹大这一名字后来就成为叛卖与变节的象征。——374。

伽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女儿,女预言家;特洛伊攻陷后被亚加米农当作奴隶带走;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亚加米农》中的人物。——750。

K

卡尔·穆尔——席勒的剧作《强盗》中的主人公。——499、795。

卡却基达·迪·亚利基利——但丁《天堂篇》“火星天”上的祖先。——672。

克拉普林斯基——海涅的诗《两个骑士》中的主人公,一个破落的贵族;克拉普林斯基这个姓是由法文字crapule(贪食、饕餮、酗酒以及懒汉、败类的意思)构成的。马克思用克拉普林斯基来暗指路易·波拿巴。——141、764。

克勒维尔——巴尔扎克的小说《贝姨》中的人物,是暴发户、贪财者和贪淫好色之徒的典型。——230。

L

拉摩——德尼·狄德罗的作品《拉摩的侄子》中的人物。——319。

理查三世——莎士比亚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204。

罗多芒特——阿里欧斯托的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主人公,他的特长是大吹大擂,胡说八道。——336、337、372、374、403。

罗累莱——德国诗人广泛引用的民间传说中的一个美丽的女神,常在莱茵河滨以其歌声引诱水手使船触礁;也是致人于死命的、冷酷无情的美人的象征。海涅在他的《罗累莱》这首诗中在艺术上最出色地体现了这个形象。——299。

M

马哈德伐——即“伟大的神”,是印度主神湿婆的别名。印度姑娘们都自己制作湿婆的形象,作为她们崇拜的偶像。——287。

马利亚——据圣经传说,是耶稣基督的母亲。——282、283。

玛丽花——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在罪犯中长大的姑娘,但保持了高贵的品德和少女的纯洁;作者给她取了一个花名,即百合花,因为百合花长在污泥中,但花瓣洁白耀眼。——527。

马太——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483。

玛土撒拉——圣经中的大主教,据说他活到 969 岁。“玛土撒拉之年”是长寿的同义语。——622、671。

靡菲斯特斐勒司——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主要人物。——280、746、747。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 9 个。——339、353。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662。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210。

N

纳尔齐斯(纳尔齐苏斯)——古希腊神话中爱恋自己的影像的美少年;转义是妄自尊大的人。——285。

奈斯托尔——古希腊神话中参加特洛伊战争的希腊英雄中最老最贤明的英雄;在文学传统中,他经常被当作饱经世故的聪明的长者的典型。莎士比亚的剧作《特洛埃勒斯与克蕾雪达》中的人物。——464。

尼克·波顿——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中的人物,织工,愚蠢的小人物的典型。——185。

挪亚——据圣经传说,是“洪水灭世”后重新繁殖的人类的始祖。——281、282。

P

帕威法耳——许多中世纪诗歌中的主人公;他是出去寻找圣杯的骑士;树立了许多功勋,帕威法耳成了圣杯的守护者。——406。

潘多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相传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类后,宙斯大怒,为惩罚人类命火神赫斐斯塔司塑造一个女子,由雅典娜给予生命和服饰,阿芙罗狄蒂赠以妩媚,海尔梅斯赋予语言能力,诸神亦均有所馈赠。宙斯为她取名潘多拉,意即“有一切赠礼的女人”,并让海尔梅斯把她送到地上。潘多拉降落人间后找到普罗米修斯之弟埃庇米修斯,普罗米修斯警告其弟切勿接受宙斯的赠礼。埃庇米修斯不听劝告,高兴地接受了这个美丽年轻的女子。潘多拉下凡时随身携带有一盒,当她走近埃庇米修斯时,突然打开盒盖,顿时里面飞出种种邪恶、灾难和祸害,迅即散布大地,她急忙关盒,却把深藏盒底的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永久留在盒里。从此,世间疾病流行,灾祸横

生,希望渺茫。“潘多拉的盒子”一词成为一切麻烦、灾难、祸害之源的同义语。——650。

潘辛涅——歌德的《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中的人物。——378。

皮蒂娅——古希腊德尔斐城阿波罗神殿的女巫。——141、672、764。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287、437。

S

撒母耳——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先知。——168。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珂德》中的人物,唐·吉珂德的侍从。——76、392。

扫罗——据圣经传说,是第一个以色列王。——236。

瑟西——古希腊神话中伊伊亚岛的女巫;她用魔法把奥德赛的同伴变成猪,而把奥德赛留在岛上近一年;瑟西这个名字后来成了诱人的美女的代名词。——223。

施莱米尔——见彼得·施莱米尔。

施梯林,亨利希——荣克·施梯林的自传体小说《亨利希·施梯林的青年时代》中的主人公。——295。

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席勒的悲剧《强盗》中的人物;丧尽天良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的暴徒。——186。

索西萨尔——保尔·德·科克的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型。——330。

斯皮格尔勃——见舒夫特勒和斯皮格尔勃。

T

唐·吉珂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8、76、241、354、392。

特平——博雅多的叙事诗《恋爱中的罗兰》中的人物。——391。

W

瓦格纳——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浮士德的门生；崇尚空论、脱离生活的烦琐学者的典型。——285。

维特——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314。

温克尔里德，阿尔诺德——据圣经传说是瑞士武士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人民英雄；相传瑞士人同奥军在森帕赫城下作战时，他舍身杀敌使瑞士人获胜，是史诗《森帕赫之歌》中的主人公。——335。

乌利斯——见奥德赛。

X

希姑葩——古希腊神话和荷马的史诗《伊里亚特》中特洛伊国王柏里亚的妻子，伟大英雄赫克脱的母亲，在怀二胎时梦见自己生下了一支火炬，引燃焚毁了整个特洛伊城。——287。

西蒂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洋女神，阿基里斯的母亲。——147。

西门——见彼得。

锡仑——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奥尼苏斯的同伴。——337。

许勒尔——歌德的悲剧《浮士德》中的人物。——280。

Y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657。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750。

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有前后两副面孔，一副向着过去，另一副朝着未来；掌管门户出入和水陆交通；后人用雅努斯这一名词比喻口是心非的人。——383。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利米——圣经中的先知。——308、367。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136、282、296、297、311、312、354、387。

以利亚——圣经中的人物。据《列王记》记载，他曾奉耶和华之命斥责以色列王崇拜异教，虐待百姓；并施行不少神迹奇事，最后升天。犹太教奉为最大的先

知。——282。

以色列——圣经中犹太人的第三代祖先，据《创世记》记载，原名雅各，因与天使角力得胜，由天使改名以色列，意为“与神角力的取胜者”。——282。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236。

约布斯——卡·阿·科尔图姆的讽刺长诗《约布斯之歌》中的主人公。——348。

约翰奈斯·瓦赫特——霍夫曼的中篇小说《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中的主人公，木匠。——291。

约翰牛——18世纪英国作家约·阿巴思诺特在1712年写的政治讽刺小说《约翰牛传》中塑造的人物——一个急躁、坦率、滑稽的绅士形象，用以影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英国人。后来此名成为英国或英国人的绰号，广为流传。——241。

约拿——圣经中的人物，亚米太的儿子。约拿为躲避耶和华，乘船逃跑，耶和华命海风大作，约拿被抛入海中，耶和华又令大鱼把他吞吃。约拿向耶和华祷告求饶，耶和华吩咐鱼把他吐到陆地上。——491。

文 献 索 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January 28—29, 1852.)。——716。
- 《各个政党和政局展望》,载于1852年11月2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5号 (Political Parties and prospect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5, 29. November 1852.)。——573, 588。
- 《国防。——财政。——贵族的死绝。——政局》,载于1853年2月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99号 (Defense. —Finances. —Decrease of the Aristocracy. — Politic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99, 23. Februar 1853)。——653。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Einleitung.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Lfg. 1—2.)。——329。
- 《揭露科隆共产党人案件》1853年巴塞尔版 (Enthüllungen über den Kommunisten-Prozeß zu Köln. Basel 1853.)。——669。
- 《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载于1852年11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2号 (Attempts to form a new opposition part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2, 25. November 1852.)。——425, 573, 588。
- [《科隆案件》],载于1852年11月2日《晨报》(伦敦)第19145号 ([The trial at Cologne.]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145, 2. November

1852.)。 — 530。
- 《科苏特、马志尼和路易·拿破仑》，载于1852年12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27号(Kossuth, Mazzini, and Louis Napolé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27, 1. Dezember 1852.)。 — 581。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约·魏德迈编，第1期(Der 18.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Hrsg. von J. Weydemeyer. New York. 1852. H. 1.)。 — 734、758—764。
- 《论犹太人问题》，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Zur Judenfrag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 Lfg. 1—2.)。 — 329。
- 《马克思文集》，海·贝克尔编，1851年科隆版第1分册(Gesammelte Aufsätze. Hrsg. von Herman Becker. H. 1. Köln 1851.)。 — 120。
- 《内阁的失败》，载于1853年1月6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59号(The Defeat of the Ministry.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59, 6. Januar 1853.)。 — 593。
- 《贫困和自由贸易。——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载于1852年11月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1号(Pauperism and free trade. —The approaching commercial crisi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01, 1. November 1852.)。 — 454。
- 《商业繁荣的政治后果》，载于1852年11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02号(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the commercial excitement.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02, 2. November 1852.)。 — 460、573、574。
- [《声明。1852年3月3日》]，载于1852年3月6日《科隆日报》第57号([Erklärung. 3. März 1852] ,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57, 6. März 1852.)。 — 495。
- 《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载于1853年1月2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77号(A superannuated Administration. —Prospects of the Coalition Ministry, &c. .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77, 28. Januar 1853.)。 — 597。
- 《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载于1852年8月2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40号(The Elections. —Tories and Whig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40, 21. August 1852.)。 — 439。

- 《选举的结果》，载于1852年9月11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8号(Result of the electio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58, 11. September 1852.)。——415。
- 《选举中的舞弊》，载于1852年9月4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52号(Corruption at elections.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52, 4. September 1852.)。——415。
-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载于1850年1—3月和5—10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1—3期和5—6期(Die Klassenkampf in Frankreich. 1848 bis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H. 1—3, Januar bis März 1850, H. 5—6, Mai bis Oktober 1850.)。——149。
-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850年9月15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1850年9月15日会议记录》([Rede in der Sitzung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15. September 1850]. In: Protokoll der Sitzung des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15. September 1850.)。——479。
- 《政局展望。——商业繁荣。——饿死人事件》，载于1853年2月2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681号(Political Prospects. —Commercial Prosperity. —Case of Starvati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681, 2 Februar 1853.)。——608。

弗·恩格斯

-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署名]：卡尔·马克思，载于1851年10月25、28日、11月6、7、12、18日和1852年2月27日、3月5、15、18、19日、4月9、17、24日、7月27日、8月9日、9月18日、10月2、23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283、3285、3293、3294、3298、3312、3395、3398、3403、3406、3407、3425、3432、3438、3517、3534、3564、3576、3594号《德国》栏(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Germany. [Gez]; Karl Marz.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1851. Nr. 3283, 25. Okt.; Nr. 3285, 28. Okt.; Nr. 3293, 6. Nov.; Nr. 3294, 7. Nov.; Nr. 3298, 12. Nov.; Nr. 3312, 28. Nov.; 1852. Nr. 3395, 27. Febr.; Nr. 3398, März; Nr. 3403, 15. März; Nr. 3406, 18. März; Nr. 3407, 19. März; Nr. 3425, 9. April; Nr. 3432, 17. April; Nr. 3438, 24. April; Nr. 3517, 27. Juli; Nr. 3534, 19.

- Aug. ; Nr. 3564, 18. Sept. ; Nr. 3576, 2. Okt. — Rubrik: Germany.)。—— 564。
-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Umriss zu einer Kritik der Nationalökonomie.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 Lfg. 1—2.)。—— 329。
-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Die Lage Englands. “Past and Present” by Thomas Carlyle. London 1843.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 Lfg. 1—2.)。—— 32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 《奥·布朗基祝酒词的德译文的〔前言〕》〔传单〕1851年伯尔尼〔可能是科隆〕版〔Vorbemerkung zum:〕Trinkspruch gesandt durch den Bürger L. A. Blanqui an die Kommission der Flüchtlinge zu London durch die Freunde der Gleichheit. Bern〔Vielm. Köln〕1851.〔Flugbl.〕。—— 786—787。
- 《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London. 1848.)。—— 475、536、543、544、564、773、775、776、785。
-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传单，1848年巴黎版〕(Forderungen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 Deutschland.〔Paris 1848. Flugbl.〕。—— 27、785。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3月》〕，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7号〔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März 1850.〕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7, 28. Juni 1851.)。—— 120、475、773、775、776、786、793。
-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6月》〕，载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Ansprache d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Juni 1850.〕In: Anklageschrift〔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Cöln 1852.〕。—— 494、786、793。
-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载于《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资料》1980年柏林版第2卷(Ansprache des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1. Dezember 1850! In: Der Bund der Kommunisten. Dokumente und Materialien. Bd. 2. Berlin, 1980.)。—— 475、773、786。

- [《科隆案件》],载于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伦敦)第26号([Public statement to Editors of the English pres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6, 30. Oktober 1852.)。——516—517。
- 《时评(三)。从5月到10月》,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5—6期(Revue. Mai bis Oktober [1850].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 London, Hamburg, New York. 1850. H. 5—6)。——168,187。
-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声明》],载于《[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Erklärung über den Austritt aus dem Londoner Arbeiterbildungsverein.] In: Anklageschrift [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Cöln 1852])。——484,496,510。

其他作者的著作^①

A

- 阿伯丁,[乔·]《1852年12月27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2月28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10号(Aberdeen, [G.]: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7.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10, 28. Dezember 1852.)。——590—592,594。
- 阿伯丁,乔·《1853年3月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3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8号(Aberdeen, G. : [Rede im House of Lords, 4. März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8, 5. März 1853.)。——670—671。
- [阿尔宁,蓓·冯·]《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1835年柏林版上、下册([Arnim, B. von]: 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 Th. 1. 2. Berlin 1835.)。——295。
- 阿姆洛·德拉乌塞,阿·尼·《威尼斯政府的历史》1676年巴黎版(Amelot de la Houssaye, A. N. : Histoire du gouvernement de Venise. Paris 1676.)。——626。
-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Athenaeus: Deipnosophistae.)。——201。

①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安东,古·《致〈祖国报〉编辑先生。1851年3月6日于巴黎》,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巴黎)第66号(Antoine, G.: AM. le redacteur du journal la Patrie. Paris, 6 mars 1851. In: La Patrie. Paris. Nr. 66, 7. März 1851.)。——364。
- [奥本海姆,亨·伯·]《在几家报纸上……》,载于1849年5月31日《卡尔斯鲁厄日报》第15号([Oppenheim, H. B.]: Der in einigen Blättern… In: Karlsruher Zeitung. Nr. 15, 31. Mai 1849.)。——333—334。

B

- 巴里利,朱·《致〈每日新闻〉编辑》,[署名:]菲勒潘蒂,载于1853年2月1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9号(Barilli, G.: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Gez:] Filepanti.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099, 11 Februar 1853.)。——634。
- 巴塞勒曼,弗·丹·[《1848年11月18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莱比锡版第5卷(Bassermann, F. D.: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18. November 1848.]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5. Leipzig 1848.)。——81。
- 巴泰勒米,艾·《致〈祖国报〉主编。1851年3月8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3月12日《祖国报》(巴黎)第71号(Barthelemy, E.: Au rédacteur en chef du journal la Patrie. Londres, 8 mars 1851. In: La Patrie. Paris. Nr. 71, 12 März 1851.)。——364, 365。
- 鲍威尔,布·《法兰克福议会的衰亡。德国制宪国民议会的历史》1849年柏林版(Bauer, B.: Der Untergang des Frankfurter Parlaments.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Berlin 1849.)。——85。
- 贝尔坦,阿·《我们……》,载于1853年3月1日《辩论日报》(巴黎)(Bertin, A.: Nous avons déploré…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aris. 1. März 1853.)。——664。
- 贝克尔,海·《在德国实行君主制还是共和制。1850年10月25日在科隆陪审法庭上所作的辩护词》1850年科隆版(Becker, H.: Monarchie oder Republik in Deutschland. Verteidigungsrede, gehalten vor dem Geschworenengericht zu Köln am 25. Oktober 1850. Köln 1850.)。——711。
- 贝克曼《据我刚才获悉……》,2月25日晚巴黎[通讯],载于1852年2月28日《科隆

- 日报》第51号(Beckmann: Wie ich so eben erfahr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25. Febr., Abends.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51, 28. Februar 1852.)。——494。
- 贝雷斯福德,威·[《给约翰·弗赖尔的信》],载于1852年7月24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65期。[标题]:《德比的贿赂》(Beresford, W.: [Brief an John Frail.]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65, 24. Juli 1852 [U. d. T.]: The bribery at Derby.)。——434。
- 波拿巴,路·拿·《答辞[答第戎市长为欢迎共和国总统先生举行的宴会上的讲话]。1851年6月1日》,载于1851年6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4号(Bonaparte, L. N.: Réponse [au discours du maire de Dijon au banquet offert par la ville à M.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le 1 juin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4, 3. Juni 1851.)。——211。
-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49年10月31日]》,载于1849年11月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5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 31 octo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5, 1. November 1849.)。——171, 174。
-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50年11月12日》,载于1850年11月1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17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 12 novembre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7, 13 November 1850.)。——188, 189, 209。
- 波拿巴,路·拿·《[法兰西]共和国总统[致立法议会]的咨文。1851年11月4日》,载于1851年11月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09号(Bonaparte, L. N.: Messag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le 4 novembre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09, 5. November 1851.)。——217。
-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侍卫官埃德加·奈中校(罗马)的信。1849年8月1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9月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50号(Bonaparte, L. N.: Lettre adressée par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lieutenant-colonel Edgar Ney, son officier d'ordonnance, à Rome. Elysée-National, le 18 aout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50, 7. September 1849.)。——

172。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给乌迪诺将军的信。1849年5月8日于国民宫》,载于1849年5月10日《人民报》(巴黎)第172号(Bonaparte, L. N. : Lettre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général Oudinot. Elysée-National, 8 mai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172, 10. Mai 1849.)。——172。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公告。召唤民众。1851年12月2日》,载于1851年12月2日和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6号和337号特别增刊(Bonaparte, L. N. : Proclama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ppel au peuple, le 2 décembre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6, 2. Dezember 1851. Suppl. extraordinaire; Nr. 337, 3. Dezember 1851.)。——219—220。

波拿巴,路·拿·《[共和国总统致法国人民。]1849年6月13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5号(Bonaparte, L. N. :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peuple français.]Paris, le 13 juin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5, 14. Juni 1849.)。——167—168。

波拿巴,路·拿·《拿破仑观念》1839年巴黎版(Bonaparte, L. N. : Des idées napoléoniennes. Paris 1839.)。——153,174,231,232—235。

波拿巴,路·拿·《[1851年11月25日在伦敦工业博览会颁奖时的讲话]》,载于1851年11月26日《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巴黎)(Bonaparte, L. N. : [Rede anlässlich der Verleihung von Preismedaillen für die Londoner Industrieausstellung, 25. November 1851.] In: 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26. November 1851.)。——218,219。

勃朗,路·《致〈泰晤士报〉编辑》,载于1851年3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0748号(Blanc, L. : 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0748, 5. März 1851.)。——363—364。

《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第一部分:《王国政府的建议、信函、备忘录、记录和其他文件》;第三部分:《辩论,根据速记记录整理》1847年柏林版(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Königliche Propositionen und Botschaften, Denkschriften, Protokolle und andere Aktenstücke. Th. 3: Verhandlungen nach den stenographischen Berichten. Berlin 1847.)。——21,362。

布拉瑟顿,约·《[1853年2月3日在曼彻斯特改革派社交聚会上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Brotherton, J. : [Rede auf der

- Social Soirée of Reformers at Manchester, 3.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4, 5. Februar 1853.)。—— 629—630。
- 布莱特, 约·[《1852年10月4日在贝尔法斯特的一次宴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2年10月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40号。[标题]:《约翰·布莱特先生在贝尔法斯特》(Bright, J. : [Rede auf einem Bankett in Belfast, 4. Okto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40, 7. Oktober 1852. [U. d. T.]: Mr. John Bright in Belfast.)。—— 463。
- 布莱特, 约·[《1853年1月7日在曼彻斯特欢迎美国部长的宴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3年1月10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21号([Tischrede beim Dinner to the American Minister at Manchester, 7. Jan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21, 10. Januar 1853.)。—— 597。
- 布莱特, 约·[《1853年2月3日在曼彻斯特改革派社交聚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Rede auf der Social Soirée of Reformers at Manchester, 3.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4, 5. Februar 1853.)。—— 630—633。
- 《布朗基公民通过平等之友寄给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祝酒词》[传单]1851年伯尔尼版[可能是科隆版](Trinkspruch gesandt durch den Bürger L.-A. Blanqui an die Kommission der Flüchtlinge zu London durch die Freunde der Gleichheit. Bern [vielm. Köln] 1851. [Flugbl.])。—— 786—787。
- 布朗基, 路·《伦敦流亡者委员会的路·奥·布朗基公民为2月24日周年纪念宴会寄来的祝酒词》, 载于1851年2月27日《祖国报》(巴黎)第58号(Blanqui, L. : Toste envoyé par le citoyen L.-A. Blanqui à la commission près les réfugiés de Londres, pour le banquet anniversaire du 24 février. In: La Patrie. Paris. Nr. 58, 27. Februar 1851.)。—— 363—365, 786—787。

D

- 达尔林普尔, 约·《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1759年修订第4版(Darlynple, J. : An essay towards a general history of feudal property in Great Britain, 4. ed. corr. and enl. London 1759.)。—— 614。
- 达菲, [查·加·]《1853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2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09号(Duffy, [C. G.]: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Februar 1853.]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09, 23. Februar

1853.)。——651。

丹东,雅·[《1792年9月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1792年9月4日《国民报,或总汇通报》(巴黎)第248号(Danton, J.: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 September 1792.] In: 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48, 4. September 1792.)。——99。

道布尔迪,托·《严格的人口规律表明同人民的食物有关》1842年伦敦版(Doubleday, T.: The true law of population shewn to be connected with the food of the people. London 1842.)。——626。

德比,爱·[《1852年3月15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3月1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64号(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5. März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64, 16. März 1852.)。——466。

德比,爱·[《1852年5月2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5月2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124号(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4. Mai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124, 25. Mai 1852.)。——440。

德比,[爱·]《1852年12月2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2月2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04号(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20.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04, 21. Dezember 1852.)。——590。

德比,[爱·]《1853年2月10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Derby, [E.]: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0.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9, 11. Februar 1853.)。——636。

《德国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卷(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Parlaments. Bd. 1. Frankfurt am Main 1848.)。——52。

德拉罗卡,[恩·]《马志尼的宣言。致〈每日新闻〉编辑》,载于1853年2月2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07号(Della Rocca, [E.]: Mazzini's proclamation. To the Editor of the Daily News.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07, 21. Februar 1853.)。——642。

[德朗克,恩·]《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载于1848年6月13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2—13号([Dronke, E.]: Die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2—13, 13 Juni 1848.)。——328。

德纳,查·《马志尼和科苏特的活动。——同路易·拿破仑的联盟。——帕麦斯顿》,载于1852年10月19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590号(Dana, C.: Movements of Mazzini and Kossuth. — League with Louis Napoleon. — Palmer-

- ston. In: New-York Daily Tribune. Nr. 3590, 19. Oktober 1852.)。—— 552、581。
- [《〈德意志快邮报〉编辑部声明》], 载于1851年6月26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40号 ([Erklärung der Redaktion der "Deutschen Schnellpost".]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40, 26. Juni 1851.)。—— 374。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3月12日在白金汉的演说》], 载于1852年3月13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62号 (Disraeli, B. : [Rede in Buckingham, 12. März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62, 13. März 1852.)。—— 575。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6月2日在白金汉的演说》], 载于1852年6月1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59期。[标题]:《前保护主义者的宣言》(Disraeli, B. : [Rede in Buckingham, 2. Juni 1852.]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59, 12. Juni 1852. [U. d. T.]: The Ex-protectionist manifesto.)。—— 440、454。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7月14日在白金汉的演说》], 载于1852年7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168号。[标题]:《白金汉郡。迪斯累里先生和他的选民》(Disraeli, B. : [Rede in Buckingham, 14. Juli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168, 15. Juli 1852. [U. d. T.]: Buckinghamshire. Mr. Disraeli and his constituents.)。—— 440、454。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7月14日在白金汉的演说》], 载于1852年7月17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64期。[标题]:《选举。—— 内阁的煽动》(Disraeli, B. : [Rede im Buckingham, 14. Juli 1852.]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64, 17. Juli 1852. [U. d. T.]: The elections. — Ministerial sedition.)。—— 440、454。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11月11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1月1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71号 (Disraeli, B.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1. Nov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71, 12. November 1852.)。—— 575。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11月2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81号 (Disraeli, B.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3. Nov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81, 24. November 1852.)。—— 574。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12月3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2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90号。[标题]:《财务报告》(Disraeli, B. : [Rede im House of

- Commons, 3.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90, 4. Dezember 1852. [U. d. T.]: The financial statement.)。——576—579, 592。
- 迪斯累里, 本·[《1852年12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2年12月1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01号(Disraeli, B.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6.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01, 17. Dezember 1852.)。——584—587。
- 迪斯累里, 本·[《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19日《泰晤士报》第21356号(Disraeli, B. ; [Rede im House Commons, 18.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6, 19. Februar 1853.)。——645—649。
- 迪斯累里, 本·[《致白金汉郡选举人。1852年3月1日》], 载于1852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052号。[标题]: 《新任财政大臣和他的选民》(Disraeli, B. ; [Address to the electors of the county of Buckingham. March 1,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052, 2. März 1852. [U. d. T.]: The new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and his constituencies.)。——575。
- 杜邦-德勒尔, 雅·沙·《内部纪事。1850年12月10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12月15日《流亡者之声》(圣阿芒)第8期(Dupont de l'Eure, J. -C. ; Chronique de l'Interieur. Londres, le 10 décembre 1850. In: La Voix du Proscrit. Saint-Amand. Nr. 8, 15. Dezember 1850.)。——239。
- 杜里厄, 克·《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十二月恐怖的始末》1852年布鲁塞尔版(Durrieu, X. ; Le coup d'état de Louis Bonaparte. Histoire de la persécution de décembre. Bruxelles 1852.)。——734—738。

F

- 《法国。它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困难》, 载于1852年3月13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46期(France. Her difficulties, social and political.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46, 13. März 1852.)。——232。
-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左派声明》], 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Erklärung der Linke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97, 98。
- 费尔巴哈, 路·《基督教的本质》1841年莱比锡版(Feuerbach, L. ; Das Wesen des

- Christenthums. Leipzig 1841.)。—— 331—332。
- 费奈迭,雅·《普鲁士和普鲁士制度》1839年曼海姆版(Venedey, J.: Preußen und Preußenthum. Mannheim 1839.)。—— 340。
- 弗莱里格拉特,斐·《致约瑟夫·魏德迈》,载于1852年《革命·不定期刊物》(纽约)第2期(Freiligrath, F.: An Joseph Weydemeyer. In: 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 New York. 1852. H. 2.)。—— 272。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代表团的答复》],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Friedrich-Wilhelm IV.]: [Antwort an eine Abordnung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8. Frankfurt am Main 1849.)。—— 93。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国王陛下的演说。1847年4月11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一部分(Friedrich-Wilhelm IV.: Thronrede Sr. Majestät des Königs am 11. April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Berlin 1847.)。—— 21。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向为了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发表的公告。1848年11月8日》,载于《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选出的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柏林版第3卷(Friedrich-Wilhelm IV.: Botschaft an die zur Vereinbarung der Verfassung berufene Versammlung [vom] 8. November 1848. In: 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Bd. 3. Berlin 1848.)。—— 79。
- 弗龙德,维·《波拿巴的大赦》,载于1853年2月10日《民族报》(布鲁塞尔)第41号(Frondes, V.: L'amnistie de Bonaparte. In: La Nation. Nr. 41, 10. Februar 1853.)。—— 635。

G

- 甘米奇,罗·乔·《体面的上流社会的民主》,载于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伦敦)第23期(Gammage, R. G.: Respectable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3, 9. Oktober 1852.)。—— 469。
- 《告德国人民书!罗伯特·勃鲁姆英勇牺牲,被卑鄙杀害了!1848年11月16日于法

- 兰克福》，载于1848年11月19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7号(An das deutsche Volk! Robert Blum ist gefallen, ein Opfer feigen Mordes! Frankfurt, 16. Novem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47, 19. November 1848. 2. Ausg.)。——77。
- 《告德国人书!1850年11月于伦敦》，载于1850年11月22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29号(An die Deutschen! London, im November 1850.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429, 22. November 1850.)。——348, 368。
- 《告德国人书!1851年3月13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3月28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534号(An die Deutschen! London, 13 März 1851.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534, 28. März 1851.)。——114—115, 367—368, 370, 371, 373—375。
- 《告法国人书》，载于1849年6月13日《和平民主日报》(巴黎)第161号上午版(Au peuple français. In: La Démocratie pacifique. Paris. Nr. 161, 13. Juni 1849. Ed. du matin.)。——163。
- 《告各国民主义者书》，载于1850年11月18日《立宪主义者报》(巴黎)(Aux démocrates de toutes les nations. In: Le Constitutionnel. Paris. 18. November 1850.)。——361。
- 《告各国人民书!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1850年7月22日于伦敦》，载于1850年8月6日《流亡者》(巴黎—伦敦)第2期(Aux peuples! Organisation de la démocratie. Londres, 22 juillet 1850. In: Proscrit. Paris, Londres. Nr. 2, 6. August 1850.)。——347。
- [戈克,阿·]《从德国的现状回顾巴登革命》，巴登制宪议会一议员著,1850年[很可能是1851年]巴黎版([Goegg, A.]: Rückblick auf die Badische Revolution unter Hinweisung auf die gegenwärtige Lage Deutschlands. Von einem Mitgliede der Badischen constituirenden Versammlung. Paris 1850 [vielm. 1851].)。——323, 380—383。
- [戈克,阿·]《伦敦德国流亡者俱乐部。——为〈快邮报〉作》，载于1851年8月15日和16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82—183号([Goegg, A.]: Der Deutsche Emigrationsclub in London. Für die “Schnellpost”.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82, 15. August 1851; Nr. 183, 16. August 1851.)。——371—373, 394, 395, 397。
- 格莱斯顿,威·尤·《就那不勒斯政府迫害国事犯一事致阿伯丁伯爵的两封信》

- 1851年伦敦版(Gladstone, W. E.: Two letters to the Earl of Aberdeen on the state prosecutions of the Neapolitan government. London 1851.)。——715。
- 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阿·《关于1851年十二月事变的完整的可靠的记述》1851年巴黎版(Granier de Cassagnac, A.: Récit complet et authentique des événements de décembre 1851. Paris 1851.)。——737。
- 格雷厄姆,[詹·]《在卡莱尔的竞选演说》,载于1853年1月5日《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第435号(Graham, [J.]: [Wahlrede in Carlisle.] In: The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Times. Nr. 435, 5. Januar 1853.)。——622。
- 格雷厄姆,詹·[《1852年11月25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83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5. Nov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83, 26. November 1852.)。——574。
- 格雷厄姆,詹·[《1852年12月1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2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99号(Graham, J.: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4.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99, 15. Dezember 1852.)。——584。
- 贡东,茹·《如此复选……》,载于1853年1月25日《天主教全国联盟报》(巴黎)第24号(Gondon, J.: Les réélections auxquelles... In: L'Univers. Union Catholique. Paris. Nr. 24, 25. Januar 1853.)。——628。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12月8日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angenommen vom zweiten Kongreß. 8. Dezember 1847.] In: 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 1. Berlin 1853.)。——785,793。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约1848年11月底至12月初》],载于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etwa Ende November/Anfang Dezember 1848.] In: Wermuth/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 1. Berlin 1853.)。——785。
-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50年12月1日》],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Statuten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1. Dezember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1, 22. Juni 1851.)。——475,785、

786、796。

- 《[关于解散匈牙利议会和任命克罗地亚的耶拉契奇总督为匈牙利民事和军事最高长官的]圣谕。1848年10月3日》，载于1848年10月5日《维也纳日报》第275号(Königliches Rescript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ungarischen Reichstages und die Ernennung des Banus Jellačić von Kroatien zum Zivil- und Militärgouverneur in Ungarn vom]3. October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275, 5. Oktober 1848.)。——67。
- 《关于意大利事件的决议。1849年5月8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5月1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30号(Résolution relative aux affaires d'Italie. Paris, le 8 mai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30, 10. Mai 1849.)。——163。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截至1852年9月5日为止的八个月》，载于1852年10月9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76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eight months ended September 5, 1852.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76, 9. Oktober 1852.)。——452。
- 《关于贸易和航运的报告。1851年和1852年》，载于1853年2月19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95期(Accounts relating to trade and navigation. For the years 1851 and 1852.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95, 19. Februar 1853.)。——658。
- 《国家学词典。各阶级适用的国家科学大百科全书》，卡·冯·罗泰克和卡·韦尔克编，1845—1848年阿尔托纳修订新版第1—12卷(Das Staats-Lexikon. Encyklopaedie der sämtlichen Staatswissenschaften für alle Stände. In Verbindung mit...hrsg. von Carl von Rotteck und Carl Welcker. Neue verb. u. verm. Aufl. Bd. 1—12. Altona. 1845—1848.)——321、346。

H

- 哈林,哈·《关于工人联合会的产生及其陷入共产主义投机事业的历史片断》1852年伦敦版(Harring, H.: Historisches Fragment über die Entstehung der Arbeiter-Vereine und ihren Verfall in Communistische Speculationen. London 1852.)。——351—358。
- 海因岑,卡·《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Teutsche Revolution. Gesammelte Flugschriften. Bern 1847.)。——330、340、341。
- 海因岑,卡·《德国革命党的纲领。作为草案和建议以供讨论。1850年2月……于伦敦》，载于1850年3月16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64号(Heinzen, K.: Pro-

- gramm der deutschen Revolutionspartei. Als Entwurf und Vorschlag der Diskussion preisgegeben. London ... Februar 1850. In: Westdeutsche Zeitung. Köln. Nr. 64, 16. März 1850.)。—— 342。
- 海因岑,卡·《对德国自由派的一个警告。5. 要求》,载于《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 Eine Mahnung an die teutschen Liberalen. 5. Aufforderung. In: Teutsche Revolution. Gesammelte Flugschriften. Bern 1847.)。—— 341。
- 海因岑,卡·《逮捕令。1. 我的保证》,载于《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 Ein Steckbrief. 1. Mein Versprechen. In: Teutsche Revolution. Gesammelte Flugschriften. Bern 1847.)。—— 340。
- [海因岑,卡·]《根据第一个消息……》,4月12日莱茵[通讯],载于1848年4月15日《曼海姆晚报》第105号([Heinzen, K.]: Auf die erste Nachricht... [Korrespondenz;] vom Rhein, 12. April. In: Mannheimer Abendzeitung. Nr. 105, 15. April 1848)。—— 341。
- 海因岑,卡·《法国“和德国的兄弟同盟”》[1848年]莱茵费尔登版(Heinzen, K. : Frankreichs “Brüderlicher Bund mit Deutschland”. Rheinfelden [1848].)。—— 341。
- 海因岑,卡·《革命的教训》,载于1849年11月9日和1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1、242号(Heinzen, K. : Lehren der Revolution.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Nr. 241, 9. November 1849; Nr. 242, 16. November 1849.)。—— 338、342、343。
- 海因岑,卡·《共产主义的》,载于《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 Kommunistisches. In: Teutsche Revolution. Gesammelte Flugschriften. Bern 1847.)。—— 330。
- 海因岑,卡·《回顾巴登—普法尔茨革命》,载于1849年12月28日、1850年1月4日和11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47、248和249号附刊(Heinzen, K. : Einige Blicke auf die badisch-pfälzische Revolution.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eil. Nr. 247, 28. Dezember 1849; Nr. 248, 4. Januar 1850; Nr. 249, 11. Januar 1850.)。—— 336、337。
- 海因岑,卡·《克拉科夫。一个德国人献给瑞士人的话。III. 瑞士》,载于《德国革命。传单汇编》1847年伯尔尼版(Heinzen, K. : Krakau. Den Schweizern gewidmet von einem Teutschen. III. Die Schweiz. In: Teutsche Revolution.

Gesammelte Flugschriften. Bern 1847.)。—— 340。

海因岑,卡·《谋杀》,载于1849年1月26日《进化》(卑尔)第4期(Heinzen, K. : Der Mord. In: Die Evolution. Biel. Nr. 4, 26. Januar 1849.)。—— 336。

海因岑,卡·《普鲁士的官僚制度》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Heinzen, K. : Die preußische Bürokratie. Darmstadt 1845.)。—— 339—340。

海因岑,卡·[《声明》],载于1847年10月21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84号(Heinzen, K. : [Erklärung.]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84, 21. Oktober 1847.)。—— 338。

海因岑,卡·《我的声明》,载于1848年4月17日《曼海姆晚报》第107号(Heinzen K. : Meine Erklärung. In: Mannheimer Abendzeitung. Nr. 107, 17. April 1848.)。—— 341。

海因岑,卡·《向我的同胞呼吁》,载于1848年3月21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23号(Heinzen, K. : Aufruf an meine Landsleute.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23, 21. März 1848.)。—— 337。

[海因岑,卡·]《支持德国革命的目标》,载于1851年7月16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56号([Heinzen, K.]: Unterstützung der teutschen Revolutionsbestrebungen.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56, 16. Juli 1851.)。—— 116。

汉泽曼,大·《1847年6月8日在第一届联合省议会的演说》,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3部分(Hanse mann, D. : [Rede im Ersten Vereinigten Landtag, 8. Juni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3. Berlin 1847.)。—— 362。

[赫斯,莫·]《德国人民的红色问答书》[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Heß, M.]: Rother Katechismus für das deutsche Volk. [Frankfurt am Main 1850.])。—— 529—531、536、551、552。

赫斯,莫·《评格拉齐安诺博士文集.巴黎二载.阿·卢格的文稿和回忆录》,载于1847年8月8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第63号(Heß, M. : Dottore Graziano's Werke. 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von A. Ruge. In: 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Nr. 63, 8. August 1847.)。—— 324、327、329。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 G. W. F. :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oder Naturrecht und Staatswissenschaft im Grundrisse. Hrsg. von Eduard

Gans. Berlin 1833.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 8]). — 15, 136, 157, 618, 762.

黑格尔, 乔·威·弗·《精神现象学》1841年柏林第2版(Hegel, G. W. F. :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rsg. von Johann Schulze. 2. unveränd. Aufl. Berlin 1841.). — 293, 328, 349.

黑格尔, 乔·威·弗·《历史哲学讲演录》1837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9卷)(Hegel, 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Hrsg. von Eduard Gans. Berlin 1837.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 9.]). — 131.

黑格尔, 乔·威·弗·《美学讲演录》1835—1838年柏林版第1—3卷(《黑格尔全集》第10卷)(Hegel, G. W. F. : Vorlesungen über die Aesthetik. Hrsg. von H. G. Hotho. Bd. 1—3. Berlin 1835—1838. [Werke. Vollst. Ausg. durch einen Verein von Freunden des Verewigten...Bd. 10.]). — 325.

黑格尔, 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1830年海德堡第3版(Hegel, G. W. F. : Encyc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3. Ausg. Heidelberg 1830.). — 324.

《黑书》(Schwarzes Buch)——见维尔穆特, [卡·格·路·和威·]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

亨利, 约·沃·[《1852年9月28日在班伯里的一次宴会上的演说》], 载于1852年10月6日《卫报》(伦敦)第357号(Henley, J. W. : [Rede auf einẽm Bankett in Banbury, 28. September 1852.]In: The Guardian. London. Nr. 357, 6. Oktober 1852. [U. d. T.]: A solitary champiton...). — 460—461.

霍纳, 伦·[《截止185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报告》], 载于《工厂视察员给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截至1852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奉女王之命呈送议会两院》1852年伦敦版。引自1853年1月8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89期, [标题]:《1852年的商业》(Horner, L. : [Report for the half-year ending October 31st, 1852.]In: Reports of the inspectors of factories to Her Majesty's 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Home Department, for the half year ending 31 October 1852.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2. Nach: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89, 8. Januar 1853. [U. d. T.]: Business in 1852.). — 598—602, 606.

J

- 吉布森,托·米·《[1853年2月3日在曼彻斯特改革派社交聚会上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4号(Gibson, Th. M.: [Rede auf der Social Soirée of Reformers at Manchester, 3. Februar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4, 5. Februar 1853.)。——629、632。
- 金克尔,哥·《给南部中央联合会的回答。1851年8月20日》,载于1851年9月13日《纽约州报》第37号(Kinkel, G.: Antwort an den Centralverein des Südens. 20. Augsut 1851.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37, 13. September 1851.)。——393。
- 金克尔,哥·《[给圣路易斯市公民的信。1851年2月21日]》,载于1851年2月25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507号。[标题]:《哥特弗里德·金克尔的信条》(Kinkel, G.: [Brief an die Bürger von St. Louis, 21. Februar 1851.]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507, 25. Februar 1851. [U. d. T.]; Ein Glaubensbekenntnis von Gottfried Kinkel.)。——118、375。
- 金克尔,哥·《手工业,救救自己吧!或德国手工业者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应当要求什么和做什么?》1848年波恩版(Kinkel, G.: Handwerk, errette Dich! oder Was soll der deutsche Handwerker fordern und thun, um seine Stände zu bessern? Bonn 1848.)。——304—308。
- 金克尔,哥·《我的遗嘱》,载于阿·施特罗特曼《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1851年汉堡版第2卷(Kinkel, G.: Mein Vermächtniß. In: A. Strodtmann: Gottfried Kinkel. Wahrheit ohne Dichtung. Bd. 2. Hemburg 1851.)。——311。
- 金克尔,哥·《宣讲基督的精彩譬喻和形象教海的布道词。附几篇节庆布道词》1842年科隆版(Kinkel, G.: Predigten über ausgewählte Gleichnisse und Bild—reden Christi, nebst Anhang einiger Festpredigten. Köln 1842.)。——297。
- 金克尔,哥·《1849年8月4日在拉施塔特普鲁士军事法庭上的辩护词》,载于1850年4月5日和6日《晚邮报》(柏林)第78、79号(Kinkel, G.: Vertheidigungsrede ... vor dem preußischen Kriegsgericht zu Rastatt am 4. August 1849. In: Abend-Post. Berlin. Nr. 78, 5. April 1850; Nr. 79, 6. April 1850.)。——311—312。

- 金克尔,哥·[《1850年5月2日在科隆陪审法庭上的辩护词》],载于1850年5月3日《西德意志报》(科隆)第105号(Kinkel, G.: [Verteidigungsrede vor dem Geschworenengericht zu Köln, 2. Mai 1850.] In: Westdeutsche Zeitung. Köln. Nr. 105, 3. Mai 1850.)。——314。
- 金克尔,哥·[《1851年3月13日在维也纳革命周年纪念日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1年3月25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531号。[标题]:《金克尔的演说》(Kinkel, G.: [Rede auf dem Bankett anlässlich des Jahrestages der Wiener Revolution, 13. März 1851.]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531, 25. März 1851. [U. d. T.]: Eine Rede Kinkel's.)。——366—367。
- 金克尔,约·[《一封信的摘录》],载于1851年5月13日《科隆日报》第114号。[标题]:《金克尔》(Kinkel, J.: [Auszug aus einem Brief.]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114, 13. Mai 1851. [U. d. T.]: Kinkel) 。——115、373。
- 《金克尔的讲演》, [署名]: 一个工人, 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第1期(Kinkels Vorlesungen. [Gez]: Ein Arbeiter. In: Der Kosmo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317。
- 《[禁止罗马天主教举行巡列仪式的]公告。1852年6月15日》, 载于1852年6月16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143号(A proclamation [against Roman catholic processions]. June 15,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143, 16. Juni 1852.)。——434。

K

- 凯利, [爱·]《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25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091号(Cayley, [E.]: [Red im House of Commons, 24. Februar 1853.]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091, 25. Februar 1853.)。——653。
- 凯特勒, 阿·《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 或论社会物理学》1835年巴黎版第1—2卷(Guetelet, A.: Sur l'homm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ses facultés, ou Essai de Physique sociale. T. 1—2, Paris 1835.)。——619、620。
- 科布顿, [理·]《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6号(Cobden,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8.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6, 19. Februar 1853.)。——647。
- 科布顿, 理·《1793年和1853年。三封信》1853年伦敦版(Cobden, R.: 1793 and

1853. In three letters. London 1853.)。—— 620、621、665。
- 《[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起诉书》1852年科隆版(Anklageschrift [zum Kölner Kommunistenprozeß]. Cöln 1852.)。—— 484、493、496、510、784--785、793。
- 科苏特,拉·〔《1851年10月24日在南安普敦的演说》〕,载于1851年10月25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92号。〔标题〕:《科苏特在南安普敦的演说》(Kossuth, L. : [Rede in Southampton, 24. Oktober 1851.]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92, 25. Oktober 1852. [U. d. T.]; Kossuth's speech at Southampton.)。—— 701—702。
- 科苏特,拉·〔《1851年10月25日在温切斯特的演说》〕,载于1851年10月26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93号。〔标题〕:《科苏特.南安普敦市长家的早餐》(Kossuth, L. : [Rede in Winchester, 25. Oktober 1851.]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93, 26. Oktober 1851. [U. d. T.]; Kossuth. Dejeuner at the Mayor of Southampton's.)。—— 702。
- 科苏特,拉·〔《1851年10月28日在南安普敦市议会一次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1年10月2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95号。〔标题〕:《南安普敦欢迎科苏特的宴会》(Kossuth, L. : [Rede auf einem Bankett des Stadtrats von Southampton, 28. Oktober 1851.]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95, 29. Oktober 1851. [U. d. T.]; Banquet to Kossuth in Southampton.)。—— 701—702。
- 科苏特,拉·〔《1851年10月30日在伦敦的演说》〕,载于1851年10月3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97号。〔标题〕:《科苏特.西蒂区的欢迎会》(Kossuth, L. : [Rede in London, 30. Oktober 1851.]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97, 31. Oktober 1851. [U. d. T.]; Kossuth. Reception in the City.)。—— 702。
- 科苏特,拉·〔《1851年11月3日在伦敦哥本哈根大厦的演说》〕,载于1851年11月4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00号。〔标题〕:《科苏特.工人阶级的示威》(Kossuth, L. : [Rede in Copenhagen House in London, 3. November 1851.]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700, 4. November 1851. [U. d. T.]; Kossuth. The working class demonstration.)。—— 702。
- 科苏特,拉·〔《1851年11月10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说》〕,载于1851年11月11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07号。〔标题〕:《科苏特在曼彻斯特.自由贸易派大厅的大集会》(Kossuth, L. : [Rede in Manchester, 10. November 1851.]In: The Dai-

- ly News. London. Nr. 1707, 11. November 1851. [U. d. T.]; Kossuth at Manchester. Great meeting at the Free-Trade Hall.)。——706。
- 科苏特,拉·[《1851年11月12日在曼彻斯特的演说》],载于1851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08号。[标题]:《亨利议员先生家的早餐》(Kossuth, L. : [Rede in Manchester, 12. November 185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708, 13. November 1851. [U. d. T.]; The breakfast at Mr. Henry's M. P.)。——703—704。
- 科苏特,拉·[《1851年11月12日在伯明翰的演说》],载于1851年11月1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708号。[标题]:《科苏特在伯明翰》(Kossuth, L. : [Rede in Birmingham, 12. November 1851.]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708, 13. November 1851. [U. d. T.]; Kossuth at Birmingham.)。——700—701。
- 科苏特,[拉·]《以匈牙利民族的名义致驻扎在意大利的士兵》,载于1853年2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8号(Kossuth, [L.]: In the name of the Hungarian nation—To the soldiers quartered in Italy.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098, 10. Februar 1853.)。——634。
- 科苏特,[拉·]《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载于1851年11月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1699号(Kossuth, [L.]: Address...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1699, 3. November 1851.)。——701。
- 科苏特,拉·[《致梅恩·里德上尉的信》],载于1853年3月4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17号(Kossuth, L. : [Brief an Captain Mayne Reid.]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17, 4. März 1853.)。——667。
- 克莱门特,克·荣·《石勒苏益格公国南朱特族和朱特语同德语和弗里西亚语的实际关系。对反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残稿第六册所作的历史的、民族学的阐述》1849年汉堡版(Clement, K. J. : Das wahre Verhältnis der süder jütschen Nationalität und Sprache zur deutschen und frisischen im Herzogthum Schleswig. Eine historische und ethnographische Beleuchtung des 6ten Heftes der antischleswig-holsteinischen Fragmente. Hamburg 1849.)。——351。
- 克兰沃思,[罗·]《1853年2月14日在上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15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2号(Cranworth, [R.]: [Rede im House of Lords, 14. Febr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2, 15. Februar

1853.)。—— 644—645。

库克, 乔·温·《政党史。从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辉格党和托利党的成立起到改革法案的通过》1836—1837年伦敦版第1—3卷(Cooke, G. W. : *The history of party; from the rise of the Whig and Tory factions, in the reign of Charles II. , to the passing of the Reform Bill. Vol. 1—3. London 1836—1837.*)。—— 418。

L

拉马丁, 阿·《东方游记。1832—1833年》1841年巴黎版第1—2卷(Lamartine, A. : *Voyage en Orient, 1832—1833. T. 1. 2. Paris 1841.*)。—— 740。

拉斯卡斯, [艾·奥·]《圣赫勒拿岛回忆录。拿破仑十八月言行目录》1840年巴黎版第1—5卷(Las Cases, [E. A.]: *Mémorial de Sainte-Hélène, ou Journal Où se trouve consigné jour par jour, ce qu'a dit et fait Napoléon durant dix-huit mois. T. 1—5 Paris 1840.*)。—— 223。

兰格, 赛·《国家的贫困, 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Laing, S. : *National distress;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London 1844.*)。—— 696—698。

赖德律-罗兰, [亚·奥·]《1849年6月11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6月12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63号(Ledru-Rollin, [A.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1. Juni 1849.]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63, 12. Juni 1849.*)。—— 163。

赖辛巴赫, 奥·[冯·]《致德国公债的发行人和委员会》, 载于1852年11月20日《纽约州报》第47号(Reichenbach, O. [von]: *An die Garanten und Committees der deutschen Anleihe. In: New-Yorker Staats-Zeitung. Nr. 47, 20. November 1852.*)。—— 537。

李嘉图, 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Ricardo, D. :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3. ed. London 1821.*)。—— 659、660。

里德, 梅·《致〈先驱〉编辑》, 载于1853年2月19日《先驱》(伦敦)第152号(Reid, M. : *To the Editor of "The Leader".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152, 19. Februar 1853.*)。—— 642。

理查兹, 阿·贝·《新闻界的辩护》, 载于1853年2月24日《晨报》(伦敦)第19243号(Richards, A. B. : *Vindication of the Presse. In: The Morning Advertiser,*

- London. Nr. 19243, 24. Februar 1853.)。—— 665—666。
- 《立法议会会议记录》1850年巴黎版第8卷(Compte rendu de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égislative. T. 8. Paris 1850.)。—— 235。
- 卢格,阿·《卢格文集》(十卷集)1846—1848年曼海姆版(Ruge, A. ;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10. Mannheim 1846—1848.)。—— 327, 334。
- 卢格,阿·《巴黎二载。文稿和回忆录》1846年莱比锡版上、下册(Ruge, A. ; Zwei Jahre in Paris. Studien und Erinnerungen. Th. 1. 2. Leipzig 1846.)。—— 327, 331, 348, 359, 362。
- 卢格,阿·《当代的宗教》1849年莱比锡版(Ruge, A. ; Die Religion unsrer Zeit. Leipzig 1849.)。—— 334。
- 卢格,阿·《党中有派。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6月30日于布赖顿》,载于1851年7月15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55号(Ruge, A. ; Die Parteien in der Partei. An Karl Heinzen. Brighton, 30. Juni 1851.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55, 15. Juli 1851.)。—— 116。
- 卢格,阿·《〈德法年鉴〉计划》,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Ruge, A. ; Pla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 In: 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 Paris. 1844. Lfg. 1—2.)。—— 329。
- 卢格,阿·《德国激进改良派的选举宣言》,载于1848年4月16日《改革报》(莱比锡—柏林)第16号(Ruge, A. ; Wahl-Manifest der radicalen Reformpartei für Deutschland. In: Die Reform. Leipzig, Berlin. Nr. 16, 16. April 1848.)。—— 331。
- [卢格,阿·]《德国民主党。一、党的创建和成员;二、革命与各党派和全国的状况》,载于1850年12月21日和28日《先驱》(伦敦)第39—40号([Ruge, A.]: The German democratic party. 1. The origin and elements of the party. 2. The revolution and the present condition of parties and of the nation.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39, 21. Dezember 1850; Nr. 40, 28. Dezember 1850.)。—— 334。
- [卢格,阿·]《法兰克福制宪国民议会激进民主派的论证性宣言》,载于1848年6月7日《改革报》(莱比锡—柏林)第66号([Ruge, A.]; Motivirtes Manifest der radical-demokratischen Partei in der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In: Die Reform. Leipzig, Berlin. Nr. 66, 7. Juni 1848.)。—— 332。

- 卢格,阿·《告德国人民书!》,载于《9月7日以来的普鲁士革命和11月10日以来的反革命。日记》1849年莱比锡版(Ruge, A.: An das deutsche Volk! In: Die Preußische Revolution seit dem siebenten September und die Contrerevolution seit dem zehnten November. Tagebuch. Leipzig 1849.)。——332。
- 卢格,阿·《公开信。致我的选民,布雷斯劳市的法兰克福议会选举人。1848年10月16日于柏林》,载于《9月7日以来的普鲁士革命和11月10日以来的反革命。日记》1849年莱比锡版(Ruge, A.: Offener Brief. An meine Wähler, die Frankfurter Wahlmänner der Stadt Breslau. Berlin, den 16. Oktober 1848. In: Die Preußische Revolution seit dem siebenten September und die Contrerevolution seit dem zehnten November. Tagebuch. Leipzig 1849.)。——332。
- 卢格,阿·《赖德律-罗兰论六月大搏斗》(《流亡者之声》第2卷第4期)——为《快邮报》作》,载于1851年6月28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42号(Ruge, A.: Ledru-Rollin über die Junischlacht. (Voix du Proscrit. Vol. 2. No. 4.) Für die "Schnellpost" bearbeitet.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42, 28. Juni 1851.)。——360。
- 卢[格],阿·《水晶宫工业博览会……》,1月13日伦敦[通讯],载于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74号(Ruge, A.: Der Glaspallast der Industrie-Ausstellung ...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13. Jan.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474, 17. Januar 1851.)。——478。
- 卢格,阿·《维护人道主义的公开信》,载于1846年《模仿者》(莱比锡)第3卷(Ruge, A.: Offene Briefe zur Vertheidigung des Humanismus. In: Die Epigonen. Leipzig. Bd. 3. 1846.)。——330。
- 卢格,阿·《我们的哲学和我们的革命。给芬尼·莱瓦尔德的一封信》,载于1851年5月27日—6月9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14—125号(Ruge, A.: Unsere Philosophie und unsere Revolution. Ein Brief an Fanny Lewald.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1851. Nr. 114—125, 27. Mai—9. Juni.)。——330、334。
- [卢格,阿·]《我嗅到……》,1851年1月30日巴黎[通讯],载于1851年2月19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31号([Ruge, A.]: Ich wittere Leichenduft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30. Januar 1851.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31, 19. Februar 1851.)。——360。

- 卢格,阿·《小说家。以主人公日记中数十个教训组成的故事》1839年莱比锡版(Ruge, A.: Der Novellist. Eine Geschichte in acht Dutzend Denkkzetteln aus dem Tagebuche des Helden. Leipzig 1839.)。——325。
- 卢格,阿·《英国的好客》,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Ruge, A.: Die Englische Gastfreundschaft. In: Der Kosmo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114, 371。
- 卢格,阿·《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5月1日于布赖顿》,载于1851年5月17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06号(Ruge, A.: An Karl Heinzen. Brighton, 1. Mai 1851.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06, 17. Mai 1851.)。——115, 360, 366, 372, 373。
- 卢格,阿·《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6月6日于布赖顿》,载于1851年6月24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38号(Ruge, A.: An Karl Heinzen. Brighton, 6. Juni 1851.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38, 24. Juni 1851.)。——115。
- 卢格,阿·《致卡尔·海因岑。1851年6月20日于布赖顿》,载于1851年7月7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48号(Ruge, A.: An Karl Heinzen. Brighton, 20. Juni 1851.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48, 7. Juli 1851.)。——372。
- 卢格,阿·《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主席。1850年8月15日于布赖顿》,载于1850年8月28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356号(Ruge, A.: An den Präsidenten des Friedenscongresses zu Frankfurt am Main. Brighton, 15. August 1850.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356, 28. August 1850.)。——349。
- 卢格,阿·《在德国建立民主政体或者人民国家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自由国家》1849年莱比锡第2版(Ruge, A.: Die 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oder der Volksstaat und der social-demokratische Freistaat. 2. Aufl. Leipzig 1849.)。——333。
- 卢[格],阿·《昨天……》,11月18日伦敦[通讯],载于1850年11月22日《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第429号(R[uge], A.: Gestern schrieb mir…[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18. Nov.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429, 22. November 1850.)。——360—361。
- 卢格,阿·《3月13日在伦敦“共济会酒家”的演说》,载于1851年4月26日《不来梅

- 每日纪事报》第557号(Ruge, A. : Rede, gesprochen am 13. März in Freemasons Tavern zu London. In: Bremer Tages-Chronik. Nr. 557, 26. April 1851.)。——366。
- 卢格,阿·《9月7日以来的普鲁士革命和11月10日以来的反革命。日记》1849年莱比锡版(Ruge, A. : Die Preußische Revolution seit dem siebenten September und die Contrerevolution seit dem zehnten November. Tagebuch. Leipzig 1849.)。——332。
- 卢格,阿·和泰·埃希特迈尔《新教和浪漫主义。理解时代及其矛盾。宣言》,载于《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1839年第245—251、256—271、301—310期和1840年第53—54、63—64期(Ruge, A. / T. Echtermeyer, Der Protestantismus und die Romantik. Zur Verständigung über die Zeit und ihre Gegensätze. Ein Manifest. In: 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 1839. Nr. 245—251, 256—271, 301—310; 1840. Nr. 53—54, 63—64.)。——325。
- 卢格,阿·和卡·亨·霍斯费尔德《[致莱比锡公民的呼吁书]1849年5月5日于莱比锡》,载于1849年5月8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92号特别附刊(Ruge, A. / C. H. Hoßfeld; [Aufruf an die Leipziger Bürger.]Leipzig, am 5. Mai 1849.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292, 8. Mai 1849. Außerordentl. Beil.)。——333。
- 路德,马·《世界图景》,载于《席间演说或谈话。附录》(Luther, M. : Der Welt-Bild. In: Tischreden oder Colloquia. Anhang.)。——504。
-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8月1日—9月10日的报告》,[署名]:卡尔·马克思、亨·鲍威尔、卡·普芬德、弗·恩格斯,载于1850年9月27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87号(Rechnungsablage des socialdemokratischen Flüchtlings-Committee's in London, vom 1. August bis 10. September. [Gez]: Carl Marx, H. Bauer, C. Pfänder, Fr. Engels.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Nr. 287, 27. September 1850.)。——484。
- 罗素,约·《乌得勒支和约以来欧洲事务札记》1824—1829年伦敦版第1—2卷(Russel, J. : Memoirs of the affairs of Europe from the Peace of Utrecht. vol. 1. 2. London. 1824—1829.)。——596。
- 罗素,约·《[1852年9月24日在珀斯的一次宴会上的演说]》,载于1852年9月27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31号。[标题]:《在珀斯为潘缪尔勋爵举行的宴会》

- (Russell, J. : [Rede auf einem Bankett in Perth, 24. September 1852.]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31, 27. September 1852. [U. d. T.]: Public dinner to Lord Panmure at Perth.).——462, 463, 465—467。
- 罗素, 约·[《1853年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49号(Russell, J.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0. Februar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49, 11. Februar 1853.).——636—638。
- 罗素, 约·[《1853年2月18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1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56号(Russell, J.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8. Februar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56, 19. Februar 1853.).——649。
- 罗素, 约·[《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25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091号(Russell, J.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Februar 1853.]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091, 25. Februar 1853.).——651—652。
- 罗泰克, 卡·[冯·]《各阶级适用的世界通史。自古代至1831年》(节写本)1832—1833年斯图加特版第1—4卷(Rotteck, C. v[on]: Allgemeine Weltgeschichte für alle Stände, von den frühesten Zeiten bis zum Jahre 1831 mit Zugrundelegung seines größeren Werkes. Bd. 1—4. Stuttgart 1832—1833.).——321, 272。
- 洛克, 詹·《关于斯塔福德和塞洛普省斯塔福德侯爵夫人领地和萨瑟兰领地的改良情况的报告》1820年伦敦版。引自让·沙·莱·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Loch, J. : An account of the improvements on the estates of the Marquess of Stafford in the counties of Stafford and Salop, and of the estate of Sutherland. With remarks. London 1820. Nach: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 Etudes sur l'économie politique. T. 1. Bruxelles 1837.).——611, 613。

M

- [马尔萨斯, 托·罗·]《人口原理。附葛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著作家的研究评论》1798年伦敦版([Malthus, T. R.]: 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as it affects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society, with remarks on the speculations of Mr. Godwin, M. Condorcet, and other writers. London

1798.)。—— 626。
- 马志尼,朱·奥·萨菲·毛·夸德里奥和切·阿戈斯蒂尼《意大利全国委员会》,载于1853年2月10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098号(Mazzini, J. /A. Saffi/M. Quadrio/C. Agostini: Italian National Committee.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098, 10. Februar 1853.)。—— 634。
- 梅因,爱·《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1851年8月30日于伦敦》[石印通告]。(Meyen, E.; Die deutsche Emigration in London. London, den 30. August 1851. [Lithogr. Zirkular.])。—— 327, 379。
- 《美国千百万妇女给自己英国姐妹们的充满热情和基督教情感的信》。引自1853年1月15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90期。[标题]:《答斯塔福德宫》(The affectionate and Christian address of many thousands of the wome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ir sister the women of English. Nach: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90, 15. Januar 1853. [U. d. T.]; The reply to Stafford House.)。—— 608。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1849年法兰克福版第1、8、9卷;莱比锡版[第2—7卷](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1. 8. 9. Frankfurt am Main, [Bd. 2—7] Leipzig 1848 bis 1849.)。—— 76, 81, 87, 88, 90, 91, 93—95, 97, 100, 109。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4. Frankfurt am Main 1849.)。—— 87, 88, 90, 91, 93—95, 97。
- 蒙塔朗贝尔,沙·[《1850年5月22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立法议会会议记录》1850年巴黎版第8卷(Montalembert, C.;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2. Mai 1850.] In: Compte rendu de séances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législative. T. 8. Paris 1850.)。—— 234。
- 弥勒,弗·约·阿·《声明。1852年10月24日》,载于1852年10月25日《科隆日报》第273号(Müller, F. J. A.; Erklärung. 24. October 1852.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73, 25. Oktober 1852.)。—— 509。
- 弥勒,弗·卡·约·《弗里德里希大帝逝世以来的普鲁士政策》1832年阿尔滕堡版(Müller, F. K. J.; Die Politik Preußens seit Friedrich des Großen Tode. Al-

tenburg 1832.)。—— 355。

莫尔,托·《乌托邦》(Morus, T. : Utopia.)。—— 613。

莫利纳里,古·德·《伦敦的红色流亡者……》,载于1850年11月25日《祖国报》(巴黎)第527号(Molinari, G. de: Les émigrés rouges de Londres…In: La Patrie. Paris. Nr. 527, 25. November 1850.)。—— 361。

P

帕麦斯顿,亨·约·坦·《1853年3月1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3月2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65号(Palmerston, H. J. T. :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 März 1853.]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65, 2. März 1853.)。—— 664、670。

《陪审法庭对海尔曼·贝克尔博士及其同志们的审判。被控图谋叛国》,载于1852年10月5日—11月13日《科隆日报》第253—292号(Assisen-Procudur gegen D. Herm. Becker und Genossen. Anklage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n Complottes. In: Kölnische Zeitung. 1852. Nr. 253—292, 5. Oktober—13. November.)。—— 475、478—480、482—489、491—497、499—518、520—525、528—531、535—537、541—544、550、555—557、560、561、567、775—777、790、791、794。

皮尔,[罗·]《1853年2月24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25日《先驱晨报》(伦敦)第22091号(Peel,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4. Februar 1853.] In: The Morning Herald. London. Nr. 22091, 25. Februar 1853.)。—— 652—653。

皮[佩尔],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载于1852年10月30日《人民报》(伦敦)第26期([Peiper], W. : The trial of the Communists at Cologne.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6, 30. Oktober 1852.)。—— 790。

[皮佩尔,威·]《科隆共产党人案件。判决》,载于1852年11月27日《人民报》(伦敦)第30期([Peiper, W.]: The trial of the Communists at Cologne. The Verdict.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30, 27. November 1852.)。—— 777。

《平等者的纲领。纪念欧洲革命三周年》,载于1851年6月7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8期(Programm der Gleichen. Am 3ten Jahrestage der Europäischen Revolution. In: Republik der Arbeiter. New York. Nr. 8, 7. Juni

1851.)。——363。

《[平等者宴会委员会的声明。]1851年3月1日于伦敦》，载于1851年3月7日《祖国报》(巴黎)第66号([Déclaration de la commission du Banquet des Egaux.] Londres, le 1 mars 1851. In: La Patrie. Paris. Nr. 66, 7. März 1851.)。——364。

蒲鲁东,皮·约·《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1852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 La révolution sociale démontrée par le coup d'état du 2 décembre. Paris 1852.)。——734, 745—757。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Proudhon, P. J. : 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Ou recherches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ement. Premier mémoire, Paris 1841.)。——614。

蒲鲁东,皮·约·《致公民赖德律-洛兰、沙尔·德勒克吕兹、马丁·贝尔纳及其党羽和〈流亡者〉的编辑们。1850年7月20日》，载于1850年7月《1850年人民报》(巴黎)第2期(Proudhon, P. J. : Aux citoyens Ledru-Rollin, Charles Delescluze, Martin Bernard, et consorts, Redacteurs du Proscrit, a Londres. 20 juillet 1850. In: Le Peuple de 1850. Paris. Nr. 2, Juli 1850.)。——166。

Q

[琼斯,厄·]《科苏特和匈牙利》，载于1851年11月1日和8日《寄语人民》(伦敦)第27, 28期([Jones, E.]: Kossuth and Hungary.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27, 1. November 1851; Nr. 28, 8. November 1851.)。——700—701。

琼斯,厄·《托利党的优势》，载于1852年8月14日《人民报》(伦敦)第15期(Jones, E. : The reign of the Torie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5, 14. August 1852.)。——433。

琼斯,厄·《新的伪装》，载于1853年1月1日《人民报》(伦敦)第35期(Jones, E. : The new mixture.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35, 1. Januar 1853.)。——592。

琼斯,厄·《虚伪的种族》，载于1852年10月9日《人民报》(伦敦)第23期(Jones, E. : The race of shams.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3, 9. Oktober 1852.)。——457, 469。

琼斯,厄·《虚伪的政策。——罗素在珀斯》，载于1852年10月2日《人民报》(伦敦)

第22期(Jones, E. : The policy of shams—Russell in Perth.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22, 2. Oktober 1852.)。——465—466。

琼斯,厄·《致合作原则的拥护者和合作社社员的公开信》,载于1851年5月10日《寄语人民》(伦敦)第2期(Jones, E. : A letter to the advocates of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and to the members of cooperative societies. In: Notes to the People. London. Nr. 2, 10. Mai 1851.)。——685。

琼斯,厄·[《1852年7月6日在哈利法克斯选举大会上的演说》],载于1852年7月24日《人民报》(伦敦)第12期。[标题]:《哈利法克斯的选举》(Jones, E. : [Rede auf einer Wahlversammlung in Halifax, 6. Juli 1852.]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2, 24. Juli 1852. [U. d. T.]: The Halifax election.)。——414, 427—431。

R

荣克-施梯林,约·亨《自传》1777—1817年柏林—海德堡版第1—6册(Jung-Stilling, J. H. : Lebensbeschreibung. Th. 1—6. Berlin, Heidelberg 1777—1817.)。——295。

S

萨菲,奥·《致〈意大利与人民〉报编辑》,载于1853年3月9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21号(Saffi, A. : To the Editor of "Italia e Popolo".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21, 9. März 1853.)。——668。

萨默斯,罗·《苏格兰高地的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Somers, R. : Letters from Highlands; or, the famine of 1847. London, Edinburgh, Glasgow 1848.)。——612, 614。

瑟美列,[贝·]巴·《科苏特盗用匈牙利的名义》,[给《纪事晨报》编辑的信。1853年2月14日],载于1853年2月21日《纪事晨报》(伦敦)第26883号(Szemere, [B.]B. : Usurpation in the name of Hungary by Kossuth. [Brief an den Editor of the Morning Chronicle, 14. Febr. 1853.] In: The Morning Chronicle. London. Nr. 26883, 21. Februar 1853.)。——642。

瑟美列,贝·巴·《拉约什·鲍蒂扬尼伯爵、阿尔图尔·戈尔盖、拉约什·科苏特。匈牙利解放战争中的活动家的政治概述》1853年汉堡版(Szemere, B. B. : Graf Ludwig Batthyány, Arthur Görgei, Ludwig Kossuth. Politische Charakter-

- skizzen aus dem Ungarischen Freiheitskriege. Hamburg 1853.)。—— 663。
- 《山岳党致法国人民的宣言》。[1849年]6月12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6月13日《人民报》(巴黎)第206号(Déclaration de la Montagne au peuple français. Paris, 12 juin [1849]. In: Le Peuple. Paris. Nr. 206, 13. Juni 1849.)。—— 163, 164。
- 《声明》,载于1852年10月10日《科隆日报》第258号(Erklärung.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258, 10. Oktober 1852.)。—— 548。
- 施拉姆,鲁·《民主派在钦定第二议院采取的立场》1849年柏林版(Schramm, R. : Der Standpunkt der Demokratie in und zur octroyirten zweiten Kammer. Berlin 1849.)。—— 320。
- 施拉姆,鲁·和古·[冯·]司徒卢威《致德国民主派的通告信草案,草稿。致领袖们的附函》[1850年伦敦版](Schramm, R. /G. [von] Struve; Entwurf eines Rundschreibens an deutsche Demokraten, als Manuscript gedruckt. Begleitschreiben an die Führer. [London 1850.]。—— 319, 320, 335。
- 施蒂纳,麦·《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莱比锡版(Stirner, M. : 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 Leipzig 1845.)。—— 330。
- 施泰因,洛·冯·《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842年莱比锡版(Stein, L. von; Der Socialismus und Communismus des heutigen Frankreichs. Leipzig 1842.)。—— 330, 543。
- 施特劳斯,大·《耶稣传》(Strauß, D. : Das Leben Jesus, Kritisch bearbeitet.)。—— 301。
- 施特罗特曼,阿·《哥特弗里德·金克尔。毫无虚构的真实情况。传略》1850—1851年汉堡版第1—2卷(Strodtmann, A. ; Gottfried Kinkel. Wahrheit ohne Dichtung. Biographisches Skizzenbuch. Bd. 1. 2. Hamburg 1850—1851.)。—— 279—303, 308, 311—313, 315。
- 司徒卢威,阿·[冯·]《巴登争取自由斗争回忆录》1850年汉堡版(Struve, A. [von]; Erinnerungen aus den badischen Freiheitskämpfen. Hamburg 1850.)。—— 322。
- 司徒卢威,古·[冯·]《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1849年伯尔尼版(Struve, G. [von]; 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 321—323。
- 司徒卢威,古·[冯·]《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1848年比尔斯费尔登版(Struve, G. [von]; 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Birsfelden 1848.)。——

322。

司徒卢威,古·[冯·]《告别信……1849年10月7日于勒阿弗尔》,载于1849年10月26日《德意志—伦敦报》第238号附刊(Struve, G. [von]: Abschiedsbrief… Le Havre, 7. October 1849. In: 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eil. Nr. 238, 26. Oktober 1849.)。——324。

司徒卢威,古·[冯·]《关于根据德意志联邦法依法解决德意志各邦之间争执的第一个尝试》1830年不来梅版(Struve, G. [von]: Erster Versuch auf dem Felde des deutschen Bundesrechts, betreffend die verfassungsmäßige Erledigung der Streitigkeiten zwischen deutschen Bundesgliedern. Bremen 1830.)。——321。

司徒卢威,古·[冯·]《国家学原理》1847—1848年曼海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1—4卷(Struve, G. [von]: Grundzüge der Staatswissenschaft. Bd. 1—4. Mannheim, Frankfurt a. M. 1847—1848.)。——321, 344。

司徒卢威,古·[冯·]《新时代。人民历元年[旧时代1850年3月21日至1851年3月20日]》1849年黑里绍版(Struve, G. [von]: Die neue Zeit. Ein Volks—kalender auf das Jahr 1. [Vom 21. März 1851 bis 20. März 1852 der alten Zeit.] Herisau 1849.)。——324。

斯宾塞,赫·《人口论》,载于1852年4月《威斯敏斯特评论》(伦敦)(Spencer, H.: The theory of population. In: The Westminster Review. London. April 1852.)。——626。

斯蒂芬斯,[约·雷·]《1853年2月18日在克兰普顿的演说》:引自1853年2月23日《晨报》(伦敦)第19242号。[标题]:《十小时工作日宣传工作的进展。克兰普顿群众大会》(Stephens, [J. R.]: [Rede im Crampton, 18. Februar 1853.] Nach: The Morning Advertiser. London. Nr. 19242, 23. Februar 1853. [U. d. T.]: Progress of the Ten Hours agitation Public meeting at Crampton.)。——655—656。

斯科菲尔德,[威·]《1853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3年2月2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09号(Scholefield, [W.]: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Februar 1853.] In: The Daily Naws. London. Nr. 2109, 23. Februar 1853.)。——651。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又译《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Smith, A.: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

tions. In 2 Vols. London 1776).——611。

斯普纳, [理·] [《1853年2月22日在下院的演说》], 载于1853年2月23日《每日新闻》(伦敦)第2109号 (Spooner, [R.]: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22. Februar 1853.] In: The Daily News. London. Nr. 2109, 23. Februar 1853.).——651。

斯图亚特, 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 (Steuart, J.: 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ecomy; being an essay on the science of domestic policy in free nations. In 3 Vols. Vol. 1 Dublin 1770.).——611。

T

塔西佗《编年史》(Tacitus, P. C.: Annales.).——626。

陶森瑙, 卡·《伦敦德国鼓动者协会》, 载于1851年8月16日《先驱》(伦敦)第73号 (Tausenau, K.: The German Agitation Union of London. In: The Leader. London. Nr. 73, 16. August 1851.).——398。

陶森瑙, 卡·[《致费城宰登施蒂克尔公民的公开信。1851年11月14日》]。引自[爱·维斯]《伦敦鼓动者协会[I.]》, 载于1851年12月4日《德国通讯员》(巴尔的摩) (Tausenau, K.: [Schreiben an den Bürger G. Seidensticker in Philadelphia, 14. November 1851.] Nach: [E. Wiß]; Der Agitationsverein in London. [I.] In: 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 Baltimore. 4. Dezember 1851.).——350, 402—403。

梯也尔, 路·阿·[《1850年5月24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50年5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45号 (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24. Mai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45, 25. Mai 1850.).——230。

梯也尔, 路·阿·[《1851年1月17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51年1月18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8号 (Thiers, L. A.: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7. Januar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8, 18. Januar 1851.).——161, 167。

[《通缉卡尔·海因岑的命令》], 载于1844年11月17日《科隆日报》第322号附刊 ([Steckbrief gegen Karl Heinzen.] In: Kölnische Zeitung. Nr. 322, 17. November 1844. Beil.).——340。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793—1837年》1838年伦敦版第1—2卷(Tooke, Th. :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preceded by a brief sketch of the state of the corn trade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 Vol. 1. 2. London 1838.)。——45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8年和1839年》1840年伦敦版(Tooke, Th. :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in 1838 and 1839. London 1840.)。——45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39—1847年》1848年伦敦版(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839 to 1847 inclusive. London 1848.)。——452。

W

《王国政府致王国驻临时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的通告。1849年4月28日》,载于1849年4月30日《普鲁士国家通报》(柏林)第117号(Schreiben der Königlichen Regierung an den Königlichen Bevollmächtigten bei der provisorischen Centralgewalt. vom 28. April 1849. In: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 Berlin. Nr. 117, 30. April 1849.)。——95。

维迪尔,茹·《编辑先生……[就布朗基的祝酒词发表的声明]》,载于1851年3月10日《祖国报》(巴黎)第69号(Vidil, J. : Monsieur le rédacteur…[Erklärung anlässlich des Blanqui-Toastes.] In: La Patrie. Paris. Nr. 69, 10. März 1851.)。——364。

维尔穆特,[卡·格·路·和威·]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卷(Wermuth, [C. G. L.]/[W.] Stieber; 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Th. 1. Berlin 1853.)。——784、785、793。

维利森,威·冯·《关于1831年俄波之战中运用的大规模战争的理论》1840年柏林版上、下册(Willisen, W. von: Theorie des großen Krieges, angewendet auf den russisch-polnischen Feldzug von 1831. Th. 1. 2. Berlin 1840.)。——388。

《维利希的信》,载于1851年5月17日《宇宙》(伦敦)第1期(Willich's Brief. In: Der Kosmos. London. Nr. 1, 17. Mai 1851.)。——370。

维里蒂, E. A. [《在伯恩利的演说》]。引自1853年2月19日《人民报》(伦敦)第42期。[标题]:《伯恩利十小时工作日大会》(Verity, E. A. : [Rede in Burnley.]

- Nach: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42, 19. Februar 1853. [U. d. T.]: The Ten Hours Great meeting at Burnley.)。——656。
- [维斯,爱·]《德国国民公债和它的反对者》,载于1851年11月20日《德国通讯员》(巴尔的摩)Wiß, E.: Die deutsche Nationalanleihe und ihre Gegner. In: 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 Baltimore. 20. November 1851.)。——394, 403。
- [维斯,爱·]《伦敦鼓动者协会。[I.]II.》,载于1851年12月4日和5日《德国通讯员》(巴尔的摩)([Wiß, E.]: Der Agitationsverein in London. [I.]II. In: 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 Baltimore. 4. Dezember 1851; 5. Dezember 1851.)。——403, 404。
- 维斯,爱·《声明》,载于1851年8月25日《德意志快邮报》(纽约)第190号(Wiß, E.: Erklärung. In: Deutsche Schnellpost. New York. Nr. 190, 25. August 1851.)。——374—375。
- 《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选出的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8年柏林版第3卷(Stenographische Berichte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Bd. 3. Berlin 1848.)。——79。
- 《我们的印度帝国:贸易和资源》,载于1852年10月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75期(Our Indian Empire: Its trade and resources.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75, 2. Oktober 1852.)。——451—452。
- 沃尔弗,威·[《1849年5月26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演说》],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Wolff, W.: [Rede in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26. Ma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100, 108。
- 伍德,查·[《1852年7月6日在哈利法克斯的竞选演说》],载于1852年7月24日《人民报》(伦敦)第12期(Wood, C.: [Wahlrede in Halifax, 6. Juli 1852.] In: The People's Paper. London. Nr. 12, 24. Juli 1852.)。——427。
- 伍德,查·[《1852年12月10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52年12月11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296号(Wood, C.: [Rede im House of Commons, 10. Dezember 1852.]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296, 11. Dezember 1852.)。——584。

伍德,查·《1853年1月3日在哈利法克斯的演说》,载于1853年1月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1316号(Wood, C.: [Rede in Halifax, 3. Januar 1853.] In: The Times. London. Nr. 21316, 4. Januar 1853.)。——622。

X

西塞罗《反对鲁齐乌斯·卡提利纳的演说》(Cicero, M. T.: *Ortiones in Lucium Catilinam.*)。——531。

西塞罗《论神之本性》(Cicero, M. T.: *De natura deorum.*)。——656。

西塞罗《论预言和论命运》(Cicero, M. T.: *De divinatione et de fato.*)。——394。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Etudes sur l' économie politique.* T. 1. 2. T. 1. Bruxelles 1837.)。——612—613。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2卷(Sismondi, J. Ch. L. Simonde de: *Nouveaux principes d' économie politique, ou De la richess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opulation.* 2. ed. T. 2. Paris 1827.)。第1版1819年在巴黎出版。——660。

《西西里岛的政治骚动》,载于1853年3月18日《晨邮报》(伦敦)第24723号(Political Excitement in Sicily. In: *The Morning Post.* London. Nr. 24723, 18. März 1853.)。——668。

《宪章派公会[1851年3月31日星期一及以后几日在伦敦召开]通过的鼓动纲领》,载于1851年4月12日《人民之友》(伦敦)第18期(Programme of agitation adopted by the Chartist Convention, held in London, Monday, March 31, and succeeding days, 1851. In: *The Friend of the People.* London. Nr. 18, 12. April 1851.)。——688。

谢尔策尔,安·《致威廉·魏特林。1852年3月17日》,载于1852年5月22日《工人共和国报》(纽约)第21期(Scherzer, A.: *An Wilhelm Weitling, 17. März 1852.* In: *Republik der Arbeiter.* New York. Nr. 21, 22. Mai 1852.)。——489—491。

《新内阁的代表性。老贝雷斯福德》,载于1852年3月13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46期(Constituencies of the new ministry. Major Beresford.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46, 13. März 1852.)。——412, 426, 583。

休谟, 约·[《给〈赫尔报〉编辑部的信。1852年9月15日》], 载于1852年9月24日《赫尔报》第3050号(Hume, J. : [Brief an die Redaktion des "Hull Advertiser", 15. September 1852.] In: The Hull Advertiser. Nr. 3050, 24. September 1852.)。——455、463、467。

Y

《移民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 载于1853年2月12日《经济学家》(伦敦)第494期(Effects of emigration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e Economist. London. Nr. 494, 12. Februar 1853.)。——659。

雨果, 维·《小拿破仑》1852年伦敦版(Hugo, V. : Napoléon le petit. Londres 1852.)。——734、740—745。

雨果, 维·[《1849年10月19日在国民议会的演说》], 载于1849年10月20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93号(Hugo, V. : [Rede in der Assemblée nationale, 19. Oktober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93, 20. Oktober 1849.)。——172。

Z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于科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隆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1850年12月1日]》, 载于1851年6月22日《德累斯顿新闻通报》第171号(Die Central-Behörde an den Bund. Köln, den 1. Dezember 1850. [Ansprache der Kölner Zentralbehörde des Bundes der Kommunisten vom 1. Dezember 1850.] In: 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 Nr. 171, 22. Juni 1851.)——475、773、775、776、786。

法律、法令、条例

A

《奥地利帝国宪法草案。[1848年4月25日]》, 载于1848年4月25日《维也纳日报》第115号(Verfassungs-Urkunde des Oesterreichischen Kaiserstaates [vom 25. April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115, 25. April 1848.)。——65。

《奥地利帝国宪法。[1849年3月4日]》，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57号（Reichs-Verfassung für das Kaiserthum Oesterreich. [Vom 4. März 1849.] In: Wiener Zeitung. Nr. 57, 8. März 1849.）。——85、87、89。

D

《德意志帝国宪法。1849年3月28日》，载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德意志帝国立法议会的辩论》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4卷（Verfassung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m 28. März 1849. In: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verfassunggebenden Reichs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4. Frankfurt am Main 1849.）。——87、88、90、91、93—98。

《德意志联邦条例或原则协定。1815年6月8日于维也纳》1818年埃朗根版（Bundes-Akte oder Grund-Vertrag des teutschen Bundes. Wien, den 8. Juni 1815. Erlangen 1818.）。——13。

《帝国国民议会议员选举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Reichsgesetz über die Wahlen der Abgeordneten zum Volkshause. Frankfurt am Main 1849.）。——90。

F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坚持帝国宪法的决议。1849年4月11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8卷（[Beschuß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an der Reichsverfassung festzuhalten. vom 11. April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8. Frankfurt am Main 1849.）。——93。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任命德国临时摄政政府的决议。1849年6月6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会议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Beschuß der 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 über die Einsetzung der provisorischen Regentschaft von Deutschland vom 6. Juni 1849.]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109。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848年11月4日于巴黎》，载于1848年11月7日《总汇通报》

(巴黎)第312号(Constitution de la Republique Française. Paris, le 4 novembre 1848.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12, 7. November 1848.)。——144—149、163。

G

- 《[关于保留1850年度酒税的法令]。1849年12月20日于巴黎》，载于1849年12月21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55号([Loi relative au maintien de l'impôt sur les boissons pour l'année 1850.]Paris, le 20 décembre 1849.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55, 21. Dezember 1849.)。——174。
- 《关于报纸保证金和定期及不定期刊物印花税的法令。1850年7月16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7月2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205号(Loi sur le cautionnement des journaux et le timbre des écrits périodiques et non périodiques. Paris, le 16 juillet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205, 24. Juli 1850.)。——180。
- 《关于成立普鲁士王国等级委员会的决定。1842年6月21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20号(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eines Ausschusses der Stände des Königreichs Preußen. Vom 21. Juni 1842.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2. Nr. 20.)。——19。
- 《关于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1848年12月21日]》，载于《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及其施行法规》1849年莱比锡版(Gesetz, betreffend 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Vom 21. Dezember 1848.] In: 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mit dem dazu gehörigen Einführungs-Gesetze. Leipzig 1849.)。——90。
- 《关于法官的渎职和强制性调任他职或退休的法律。1851年5月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年柏林版第13号(Gesetz, betreffend die Diens-übertretungen der Richter und die unfreiwillige Versetzung derselben auf eine andere Stelle oder in den Ruhestand. Vom 7. Mai 185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 Nr. 13.)。——256、257、476。
- 《关于废除隶属关系及减轻农民财产负担的法律。[1848年9月9日]》，载于1848年9月10日《维也纳日报》第246号(Gesetz über die Aufhebung des Un-

- terthänigkeitsbandes und die Entlastung des bäuerlichen Besitzes [vom 9. September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246, 10. September 1848.)。——38, 39。
- 《关于国家财政和建设税收新机构等等的法令。1810年10月2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0年柏林版第2号(Edikt über die Finanzen des Staates und die neuen Einrichtungen wegen der Abgaben usw. Vom 27sten Oktober 181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0. Nr. 2.)。——19。
- 《关于建立人民国防军的法律。1849年6月16日》，载于《法兰克福德国制宪国民议会辩论速记记录》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第9卷(Gesetz vom 16. Juni 1849 über die Bildung der Volkswehr. In: Stenographischer Bericht über die Verhandlungen der deutschen constituirend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 Frankfurt am Main. Bd. 9. Frankfurt am Main 1849.)。——109。
- 《关于将来处理全部国债事务的规定。1820年1月1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0年柏林版第2号(Verordnung wegen der künftigen Behandlung des gesamten Staatsschulden-Wesens. Vom 17ten Januar 1820.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0. Nr. 2.)。——18, 19。
- 《关于将要建立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规定。1815年5月22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5年柏林版第9号(Verordnung über die zu bildende Repräsentation des Volks. Vom 22sten Mai 1815.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5. Nr. 9.)。——19。
- 《关于解散第二议院和近期召开第一议院会议的决定。1849年4月27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9年柏林版第13号(Verordnung, betreffend die Auflösung der zweiten und die Vertagung der ersten Kammer. Vom 27. April 1849.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9. Nr. 13.)。——85, 95。
- 〔《关于解散克雷姆西尔帝国议会和颁布宪法的决定》〕，载于1849年3月8日《维也纳日报》第57号〔Verordnung über die Auflösung des Reichstages in Kremsier und die Verkündung der Verfassung.〕In: Wiener Zeitung. Nr. 57, 8. März 1849.)。——83, 85。
- 《关于解散为了商定宪法而选出的议会的决定。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

- 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5号(Verordnung, betreffend die Auflösung der zur Vereinbarung der Verfassung berufenen Versammlung. Vom 5. Dezember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55.)。——79。
- 《关于进一步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国和威尔士的济贫法的法令。[1834年]》(An act for the amendment and better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poor in England and Wales [1834].)。——447。
- [《关于秘密投票选举的法令。1851年12月4日》],载于1851年12月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9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 au scrutin secret, le 4 décembre 1851.]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9, 5. Dezember 1851.)。——225。
- 《关于减少报纸税及修改报纸税与广告税法的法令》,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36年伦敦版(An act to reduce the duties on newspapers and to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duties on newspapers and advertisements.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36.)。——673。
- 《关于调整某些关税的法令。[1846年]》(An act to alter certain duties of customs [1846].)。——416,418,424,438,440,454,461,573,654—655,728。
- 《关于限制童工和女工在工厂的工作时间的法令[1847年]》(An act to limit the hours of labour of young persons and females in factories [1847].)。——430,654,655。
- 《关于修改工厂工作日法的法令》,载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1850年伦敦版(An Act to amend the acts relating to labour in factories. In: The Statut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London. 1850.)。——654,655。
- 《关于修改进口谷物法的法令。[1846年]》(An act to amend the laws relating to the importation of corn [1846].)。——416,418,424,438,440,454,461,573,654—655,728。
- 《关于修改1849年3月15日选举法的法令。1850年5月31日》,载于1850年6月3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54号(Loi qui modifie la loi électorale du 15 mars 1849. Paris, le 31 mai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54, 3. Juni 1850.)。——179—181,260,732,750。

- [《关于选举法的法令。1851年12月2日》],载于1851年12月4日《总汇通报》(巴黎)第338号([Décret sur la loi électorale, le 2 décembre 1851.]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338, 4. Dezember 1851.)。——225。
- [《关于1848年4月25日宪法草案中的选举暂行条例》],载于1848年5月11日《维也纳日报》第131号特别附刊([Provisorische Wahlordnung zur Verfassungs-Urkunde vom 25. April 1848.]In: Wiener Zeitung. Nr. 131, 11. Mai 1848. Besondere Beil.)。——65。
- 《关于召开联合省议会的诏书。1848年2月8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一部分(Patent wegen Einberuf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 Vom 8. Februar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Berlin 1847.)。——21。
- 《关于组成联合省议会的决定。1847年2月3日》,载于《柏林第一届联合省议会。1847年》1847年柏林版第一部分(Verordnung über die Bildung des Vereinigten Landtages. Vom 3. Februar 1847. In: Der Erste Vereinigte Landtag in Berlin 1847. Th. 1. Berlin 1847.)。——21。
- 《关于组织新内阁和任命陆军中将勃兰登堡伯爵为新内阁首脑的诏书。1848年11月8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1号(Allerhöchster Erlaß vom 8. November 1848, betreffend die Bildung eines neuen Staatsministeriums und die Ernennung des Generalleutenants Grafen v. Brandenburg zum Präsidenten desselben.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ss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51.)。——79。
- 《国民议会议事规程草案》,载于1849年6月25日《总汇通报》(巴黎)第176号(Projet de réglemant de l'Assemblée nationale.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176, 25. Juni 1849.)。——163、166、167。

J

- 《教育法。1850年1月19日、2月26日和3月15日于巴黎》,载于1850年3月27日《总汇通报》(巴黎)第86号(Loi sur l'enseignement. Paris, les 19 janvier, 26 février et 15 mars 1850. In: Le Moniteur universel. Paris. Nr. 86, 27. März 1850.)。——174。

N

- 《拿破仑法典》,官方出版的原件单行本,1808年巴黎版(Code Napoléon. Ed.

orig. et sùle officielle. Paris 1808)。——229、257。

P

- 《普鲁士国家宪法草案。1848年12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55号（Verfassungs-Urkunde für den preußischen Staat. Vom 5. Dezember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55.）。——81。
- 《普鲁士国家刑法典。1851年4月14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51年柏林版第10号（Strafgesetzbuch für die Preußischen Staaten [vom] 14. April 1851.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51. Nr. 10.）。——542、557、561—562、569、784。
- 〔《普鲁士国民议会关于拒绝纳税的决议。1848年11月15日》〕，载于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科隆）第145号特别附刊（〔Beschluß der preußischen Nationalversammlung zur Steuerverweigerung vom 15. November 1848.〕 In: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Köln. Nr. 145, 17. November 1848. Außerordentliche Beil.）。——79。
- 《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0—1851年柏林版（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10—1851.）。——18、19、42、79、81、85、95、256。

S

- 《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1823年6月5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Allgemeines Gesetz wegen Anordnung der Provinzial-stände. Vom 5ten Juni 1823.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en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23. Nr. 13.）。——17。

W

- 《王室内阁法令及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工作条例。1842年8月19日》，载于1842年10月29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部务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3年卷第13期（Allerhöchste Kabinets-Ordre, mit der Geschäfts-Ordnung für die Versammlung der vereinigten ständischen Ausschüsse sämtlicher Provinzen, vom 19. August 1842. In: Ministerial-Blatt für die gesammte in-

nere Verwaltung in den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Hrsg. im Bureau des Ministeriums des Innern. Jg. 3. Berlin. Nr. 13, 29. Oktober 1842.)。—— 19、20。

《为了商定普鲁士国家宪法而选出的议会的选举法。1848年4月8日》，载于《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8年柏林版第12号(Wahlgesetz für die zur Vereinbarung der Preußischen Staatsverfassung zu berufende Versammlung. Vom 8. April 1848. In: Gesetz-Sammlung für die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Staaten. Berlin. 1848. Nr. 12.)。—— 42。

X

[《新闻出版暂行条例。1848年3月31日》]，载于1848年4月1日《维也纳日报》第92号([Provisorische Vorschrift über die Presse vom 31. März 1848.] In: Wiener Zeitung. Nr. 92, 1. April 1848.)。—— 64。

《刑法典》(Code penal.)。—— 477、481、554、778。

《1830年8月14日宪章》(La Charte constitutionnelle du 14 aout 1830.)。—— 144、146。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B

《北安普敦先驱报》

—1852年12月18日第6号：《死于贫穷》(Death from destitution, cons-grave.)。—— 604—605。

《比利时独立报》

—1850年11月19日第323号：(Notre correspondance…)。—— 361—362。

C

《晨报》

—1852年10月12日第19127号：(Apparently the Poor-law authorities…)。—— 449。

- 1852年12月17日第19184号:(The debate has…)。——587。
 —1853年1月6日第19201号:(The re-elections…)。——592,594。
 —1853年1月10日第19204号:《商业和航运报告,转引自〈地球报〉》(Trade and navigation returns. [From the Glob])。——598。
 —1853年1月26日第19218号:(What has often been said…)。——617。
 —1853年1月26日第19218号:(The Times tells us…)。——623。
 —1853年2月5日第19227号:(There is not a single reform…)。——627。
 —1853年2月14日第19234号:《米兰起义》(The insurrection at Milan.)。——641。
 —1853年2月15日第19235号:《米兰起义》(The insurrection in Milan.)。——801。
 —1853年2月16日第19236号:(The telegraph will already…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Monday evening.)。——641。

《晨邮报》

- 1852年10月4日第24582号:(Of the session…)。——462。
 —1852年10月7日第24584号:(A morning contemporary…)。——462。
 —1852年12月17日第24654号:(After a lengthened…)。——587。
 —1853年3月2日第24709号:(A certain contemporary…)。——663。
 —1853年3月18日第24723号:(Important from Torkey.)。——668。

D

《德意志快邮报》

- 1851年4月11日第75号:(Wir lassen diesen Artikel… [Redaktionelle Fußnote zur Korrespondenz aus:] London, 28. März [1851].)。——372。
 —1851年8月16日第183号:(Bei dieser Gelegenheit… [Redaktionelle Fußnote zu: Amand Goegg: Der teutsche Emigrationsclub in London.])。——374。
 —1851年8月22日第188号:(Obschon diese Berichte… [Redaktionelle Fußnote zu: Der teutsche Emigrationsclub in London.])。——403。

《地球和旅行家》

- 1852年9月28日第16917号:(We yesterday attempted…)。——463。

F

《法兰克福邮报》

--1853年2月15日第39号:(Ich sende Ihnen...[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13. Februar.)。——643。

G

《改革报》

--1849年11月26日第266号:(Depuis deux jours...)。——342。

J

《纪事晨报》

--1852年9月28日第26758号:(During the vacation...)。——460。

--1852年12月17日第26827号:(Late in the debate...)。——587。

--1853年1月21日第26857号:(To the government and its supporters...)。——607。

《经济学家》

--1851年1月11日第385期:(We have remained...[Korrespondenz aus:] Paris, Jan. 7, 1851.)。——194—195。

--1851年1月18日第386期:(The contest between...[Korrespondenz aus:] Paris, Jan. 16, 1851.)。——197。

--1851年1月25日第387期:(The debates, which were begun...[Korrespondenz aus:] Paris, Jan. 23, 1851.)。——197—198。

--1851年2月1日第388期:《法国。——总统的胜利》(France. — The triumph of the president.)。——209。

--1851年2月8日第389期:《贫困率》(The Poor Rates.)。——448、681。

--1851年2月15日第390期:《1850年贸易和航运报告》(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returns for 1850.)。——448、681—682。

--1851年3月1日第392期:(We had two political demonstrations...[Korrespondenz aus:] Paris, Feb. 27, 1851.)。——205。

--1851年4月5日第397期:(It had been announced...[Korrespondenz aus:] Paris, April 3, 1851.)。——200—201。

--1851年4月19日第399期:(The ministerial combination...[Korrespondenz aus:] Paris, April 17, 1851.)。——200—201。

--1851年5月3日第401期:(Anxiety is every day...[Korrespondenz aus:] Paris,

- May 1, 1851.)。—— 201。
- 1851年5月10日第402期: (The anniversary of the proclamation...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May 8, 1851.)。—— 201。
- 1851年5月31日第405期: (Anxiety is increasing ...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May 29, 1851.)。—— 207。
- 1851年6月7日第406号: (The difficulties which bar the way...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June 5, 1851.)。—— 211。
- 1851年7月12日第411期: (The great question of revision...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July 10, 1851.)。—— 207。
- 1851年11月22日第430期: (Th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Nov. 20, 1851.)。—— 217。
- 1851年11月29日第431期: 《法国。——政治纠纷》(France. — The political dissensions.)。—— 209—210、212—213、219。
- 1851年12月27日第435期: 《路易-拿破仑的政策》(Louis Napoléon's policy.)。—— 213。
- 1852年1月10日第437期: 《年度贸易。过去的一年》(The spirit of the annual trade circulars. The year that is past.)。—— 214—215。
- 1852年3月20日第447期: 《内阁的政策》(Ministerial policy.)。—— 466。
- 1852年7月10日第463期: 《选举中的舞弊》(Corrupt practices at elections.)。—— 432、433。
- 1852年7月10日第463期: 《选举》(The elections.)。—— 441、442。
- 1852年7月17日第464期: 《选举特色》(Elections specialities.)。—— 412、426、583。
- 1852年7月17日第464期: 《政府对选举的影响》(Government influence at this elections.)。—— 434。
- 1852年7月24日第465期: 《选举结果》(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s.)。—— 441、442、444。
- 1852年7月24日第465期: 《议会代表什么》(What the parliament represent.)。—— 434。
- 1852年8月7日第467期: 《新议会的代价》(The cost of a new parliament.)。—— 433—434、435。
- 1852年9月25日第474期: 《黄金生产》(The production of gold.)。—— 452。

- 1852年9月25日第474期：《棉纺织业》(Cotton manufactures.)。——450—451。
- 1852年10月2日第475期：《约翰·罗素勋爵与民主》(Lord John Russell and the democracy.)。——455—456。
- 1852年10月2日第475期：《亨利先生和贫困》(Mr. Henley and pauperism.)。——446、447。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休斯先生和罗纳德先生的年报。1853年1月1日于利物浦》(From Messrs Hughes and Ronald's Circular. Liverpool. Jan. 1, 1853.)。——600。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迪费公司的年报。1853年1月1日于曼彻斯特》(From Messrs Du Fray and Co.'s Circular. Manchester, Jan. 1, 1853.)。——599—600、602、603。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收入。——货币不足》(The revenue. — Deficiency bills.)。——597、598。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Business in 1852.)。——598—602、606。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收入。论大不列颠1852年1月5日和1853年1月5日的年季净产值及其递增和递减情况》(The revenue. An abstract of the net produce of the revenue of Great Britain in the years and quarters ended 5th, Jan., 1852, and 5th of Jan., 1853, showing the increase or decrease thereof.)。——597、598。
- 1853年1月8日第489期：《银行的贴现率》(The bank rate of interest.)。——603、604。
- 1853年1月15日第490期：(The reply to Stafford House.)。——608。
- 1853年1月22日第491期：《旺季》(The season.)。——623。
- 1853年1月22日第491期：《新内阁和议会改革》(The new ministry and parliamentary reform.)。——622。
- 1853年1月22日第491期：《英格兰银行和贴现率》(The Bank of England and the rate of discount.)。——623—624。
- 1853年2月5日第493期：《移民和人口密度》(Emigration and population.)。——625。
- 1853年2月5日第493期：《银行报告》(The bank returns.)。——625。
- 1853年2月12日第494期：《移民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Effects of Emigration o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659、662。

K

《科隆日报》

- 1852年2月28日第51号：(Wie ich so eben erfahr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25. Febr., Abends.)。——274。
- 1853年2月17日第48号：(Die gestern Abends... [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15. Febr.)。——643。
- 1853年2月21日第52号：(Die Wiener Zeitungen... [Korrespondenz aus:] Wien, 18. Febr.)。——640。

L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 1852年10月10日第516号：《休谟先生的“靠不住的结合”》(Mr. Hume's "rope of sand".)。——455。

M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 1853年1月5日第436号：(The "Tablet" and...)。——597。
- 1853年1月5日第436号：(The ministerial election.)。——592—593。

《每日新闻》

- 1851年11月13日第1708号：《亨利议员先生家的早餐》(The breakfast at Mr. Henry's. M. P.)。——703。
- 1852年9月24日第1979号：(Lord John Russell, when pronouncing...)。——458。
- 1852年10月7日第1990号：(Rumours are current...)。——461。
- 1852年10月9日第1992号：(Two of our contemporaries...)。——461, 462。
- 1852年10月12日第1994号：(Recruits are at...)。——461。
- 1852年12月17日第2051号：《内阁的失败》(Defeat of the ministry.)。——587。
- 1853年1月4日第2066号：(The unopposed re-election.)。——592—593。
- 1853年1月13日第2074号：(Through the two circumstances...)。——596。
- 1853年1月13日第2074号：(Resolved-That in the opinion of the meeting...)。——597。

- 1853年1月27日第2086号：(We can understand conscientious men…)。——622—623。
- 1853年2月1日第2090号：(It is stated that the government…)。——625。
- 1853年2月10日第2098号：《米兰起义》(Insurrection at Milan (By electric telegraph)。)。——634。
- 1853年2月11日第2099号：(In the course… [Korrespondenz aus:] Paris, Wednesday evening。)。——634。
- 1853年2月12日第2100号：《米兰起义》(The insurrection at Milan。)。——634。
- 1853年2月23日第2109号：(The evidence already taken…)。——653。
- 1853年2月24日第2110号：(The debate on Mr. Spooners nation…)。——651。

N

《纽约刑法报》

- 1852年4月10日第4号：(Die heutige “Preußische Zeitung”…)。——722。

R

《人民报》

- 1852年9月25日第21期：《选举新闻》(Elections news。)。——456、457。
- 1852年10月9日第23期：《德比勋爵与人民》(Lord Derby and the people。)。——458。
- 1852年10月23日第25期：(Mr. Cornich. — Mr. Cherval…)。——546—547。
- 1853年1月1日第35号：《在富裕中的九天饥饿》(A nine days' starvation in the midst of wealth。)。——604、605。
- 1853年2月5日第40号：《反对实物工资制的运动》(Anti-truck movement。)。——654。
- 1853年2月19日第42号：(Depopulation of the west of Ireland。)。——658。

《人民之声报》

- 1849年11月29日第60号：(M. Heinzen ne demande…)。——342。

T

《太阳报》

- 1853年1月7日第18813号：《贴现率的提高》(Increase of discount。)。——603。

《泰晤士报》

- 1815年7月27日第9584号：(To the Editor of the Times. [Gez]: Probus.)。——673。
- 1852年9月22日第21227号：《棉纺织业》(Cotton manufactures.)。——450—451。
- 1852年10月12日第21244号：(The trial of the members…[Korrespondenz aus:] Berlin, Oct. 9.)。——548。
- 1852年12月17日第21301号：(After a very protracted…)。——587。
- 1852年12月17日第21301号：《德比选举审查委员会》(The Derby elections committee.)。——583。
- 1853年1月4日第21316号：(The symptoms announcing…)。——589、597、599。
- 1853年1月21日第21331号：《金融市场和商业情报》(Moneymarket and city intelligence.)。——607。
- 1853年1月24日第21333号：(As a new Reform Bill…)。——622。
- 1853年1月25日第21334号：(Amateur Hanging.)。——616、617。
- 1853年2月4日第21343号：(The ultra-conservative government…)。——627、632。
- 1853年2月5日第21344号：《曼彻斯特改革派的社会聚会》(Social Soirée of Reformers at Manchester.)。——629—633。
- 1853年2月11日第21349号：(The government measures…)。——639。
- 1853年2月12日第21350号：(A paragraph has been going…)。——644。
- 1853年2月12日第21350号：(The Basle Gazette quotes…)。——800。
- 1853年2月12日第21350号：(We read in the Parlamento…)。——800。
- 1853年2月14日第21351号：《米兰起义》(The insurrection at Milan.)。——799。
- 1853年2月15日第21352号：(Till within the last…)。——644、645。
- 1853年2月28日第21363号：(It is said…)。——671。
- 1853年3月5日第21368号：(The question which was put…)。——671、672。

W

《维也纳日报》

- 1853年2月10日第35号：(Von den Wegen Hochverrätherischer Anschläge

…)。——640。

—1853年2月11日第36号：(In telegraphischen Wegen…)。——641。

X

《先驱》

—1853年2月5日第150号：(Peculiarly dull in novelties…)。——625。

《先驱晨报》

—1852年10月7日第21971号：(We were right…)。——460、466。

—1852年12月17日第22031号：(Faction has triumphed…)。——587。

—1853年1月4日第22046号：(Our great novelist…)。——593。

—1853年1月21日第22061号：(The Carlow election…)。——607。

Y

《议会报》

—1853年2月15日第39号：(Lombardo-Veneto.)。——641。

《宇宙》

—1851年5月17日第1期：(Doctor Gottfried Kinkel's Vortraege…)。——370。

Z

《自由人报》

—1852年12月18日：《我们的特约通讯员星期五早晨4时发自伦敦的报道》
(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London. Friday morning. 4. a. m.)。——
593。

《总汇报》

—1844年3月10日第70号：(Die ersten Proben der Deutsch-französischen
Jahrbücher…[Korrespondenz aus:] Paris, 5. März 1844.)。——329。

—1851年9月30日第173号附刊：(Heute wurde hier…[Korrespondenz aus:]
Köln, 26. September.)。——122。

《祖国报》

—1851年3月12日第71号：(Nous nous sommes demandé.)。——364—365。

文学著作

A

- 阿巴思诺特,约·《约翰牛传》。——241。
阿里欧斯托,洛·《疯狂的罗兰》。——336、337、391。
阿维安努斯《披着狮子皮的驴》。——376、416。
巴特勒,赛《休迪布拉斯》。——607。
巴尔扎克《贝姨》。——239。
贝朗瑞,皮·让·德·《米尔米东人,或阿基里斯的葬礼》。——245。
博马舍,皮·奥·卡·德·《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494、517、539。
博雅多,马·马·《恋爱中的罗兰》。——335、385、391、407。
布伦坦诺,克·《小公鸡、小母鸡和小鸡蛋》。——298。

D

- 但丁《神曲·天堂篇》。——672。
但丁《神曲·地狱篇》。——672。
狄德罗,德·《拉摩的侄子》。——319、378。
狄更斯《哥特弗里德·金克尔一生的三个画面》。——316。

F

- 弗莱里格拉特《新的政治诗和社会诗》。——304。
伏尔泰《浪子》。——379。

G

- 歌德《哀歌》。——290、292。
歌德《浮士德》。——137、280、283、544、746、747。
歌德《魔王》。——153。
歌德《评〈拉摩的侄子〉对话中提及的人物和主题》。——378。
歌德《亲和力》。——300。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314。
歌德《神和妓女》。——287。
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281。

歌德 《温和的讽刺诗》。——290。

格林兄弟 《端饭的桌子,吐金的驴子和袋子里的小棍子》。——339。

H

哈林,哈· 《大人物之声.论德国统一》。——351。

哈林,哈· 《各族人民》。——351。

哈林,哈· 《人民》。——353、356。

哈林,哈· 《君主政体,或扫罗王的历史》。——351。

哈林,哈· 《血滴.德国诗》。——351。

哈林,哈· 《斯堪的纳维亚》。——356。

哈林,哈· 《苏醒了法国》。——356。

哈林,哈· 《王朝》。——355。

哈林,哈· 《一个人的话.献给拉梅耐的崇拜者》。——353。

海尔梅斯,约·提· 《索菲娅从梅梅尔到萨克森旅行记》。——336—337。

海涅 《阿塔·特洛尔.一个仲夏夜之梦》。——329。

海涅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49、721。

海涅 《浪漫主义学派》。——325。

海涅 《两个骑士》。——141、764。

海涅 《罗曼采罗》。——764。

海涅 《梦幻》。——499。

海涅 《巡逻来到巴黎》。——58。

海因岑,卡· 《奈贝尔博士,或博学和生平》。——339。

荷马 《奥德赛》。——76、316。

贺拉斯 《诗论》。——416。

霍夫曼 《约翰奈斯·瓦赫特师傅》。——291。

J

金克尔,哥· 《罗马的觉醒》。——292。

金克尔,哥· 《诗集》。——303。

金克尔,哥· 《萤火虫的历史》。——313。

K

科策布,奥·冯· 《恨世和懊悔》。——292。

科尔图姆,卡·阿·《约布斯之歌》。——348。

科克,保·德·《拜月者》。——330。

克洛普施托克,弗·哥·《救世主》。——279。

L

《老鼠与青蛙之战》。——386。

罗素,约·《唐·卡洛斯》。——596。

卢克莱修《物性论》。——638。

M

马洛,克·《浮士德博士的悲剧故事》。——746。

密勒,约·马·《济格瓦特,修道院的历史》。——279、295、313。

N

诺瓦利斯《亨利希·冯·奥夫特丁根》。——289、290、293、295、298、301、304、311。

P

普鲁茨,罗·爱·《萨克森的莫里茨》。——326。

S

塞万提斯《唐·吉珂德》。——18、76、241、354、392。

沙米索,阿·冯·《邦库尔宫》。——295。

沙米索,阿·冯·《彼得·施莱米尔奇遇记》。——157。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204。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226、757。

莎士比亚《皆大欢喜》。——197。

莎士比亚《尤利乌斯·凯撒》。——524。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85—186。

X

席勒《保证》。——201、324、380。

- 席勒 《大钟歌》。——309。
席勒 《欢乐颂》。——193。
席勒 《华伦斯坦三部曲。皮柯洛米尼父子》。——515。
席勒 《天之骄子》。——543。
席勒 《阴谋与爱情》。——293。

Y

- 《一千零一夜》。——488。
伊索 《牧童和狼》。——738。
伊索 《说大话的人》。——136、762。
圣经——713。
《旧约》
摩西一经(创世纪)。——434。
摩西二经(出埃及记)。——134。
撒母耳记上。——168。
以西结书。——236。
约拿书。——491。
约书亚记。——164。
哈巴谷书。——133。
《旧约外传》
所罗门智训。——53。
《新约》
马太福音。——134、175、377、761。
约翰启示录。——174。

报 刊 索 引

A

- 《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Oesterreichisch-Kaiserliche Wiener Zeitung)——奥地利政府的官方报纸,1780—1931年在维也纳出版,曾数度易名,如《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等;1814年1月1日起正式作为日报出版。——38、39、64—65、67、83、640、641。
- 《奥地利通讯》(Oesterreichische Correspondenz)——奥地利政府的半官方报纸,1850—1863年用这个名称在维也纳出版。——670。
- 《奥格斯堡报》(Augsburger Zeitung)——见《总汇报》。

B

- 《巴塞尔日报》(Basler Zeitung)——瑞士的一家报纸,1831—1839年在巴塞尔出版,1839年起成为巴塞尔保守派政府的机关报。——800。
- 《巴尔的摩警钟报》(Baltimore Wecker)——美国的一家德文日报,美国社会主义体操联合会机关报,1851年由卡·亨·施瑞费尔创办,1867年停刊。——386、403。
- 《巴尔的摩通讯员》(Baltimore Correspondent)——见《德国通讯员》。
- 《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伴侣,或思想和感情之友报》(Der Gesellschafter oder Blätter für Geist und Herz)——德国的一家文学报纸,由弗·威·古比茨创办,1817—1848年在柏林出版。——120。
- 《北安普顿先驱报。北安普顿郡、贝德福德郡、白金汉郡、沃里克郡、莱斯特郡、亨廷登郡、牛津郡、剑桥郡、拉特兰郡、赫特福德郡和林肯郡汇闻》(The Northampton Herald; General Advertiser for the Counties of Northampton,

- Bedford, Buckingham, Warwick, Leicester, Huntingdon, Oxford, Cambridge, Rutland, Hertford and Lincoln)。——604、605。
-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简称《笨拙》,1841年在伦敦创刊,主编是威·梅·萨克雷。——674。
- 《比利时独立报》(L'Indépendance Belg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31年在布鲁塞尔创刊,最初名称为《独立报》(L'Indépendant),1843年6月27日改用现名出版;19世纪中叶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机关报。——361—362。
-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 《波恩日报》(Bonn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5月7日创刊,1848年8月6日起由哥·金克尔任编辑,1849年1月起改名为《新波恩日报》(Neue Bonner Zeitung),同年2月5日起由卡·叔尔茨,5月20日至7月由约·金克尔任编辑。——304。
- 《波特里斯自由报》(The Potteries' Free Presse)——在英国的一家周报,1853年2—3月在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出版,所有者为科·多·科勒特,共出四期。——674。
- 《柏林报》(Berlinische Blätter)——见《柏林月刊》。
- 《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德国启蒙派的刊物,1783年创刊,由约·埃·比斯特和弗·格迪克出版,1798年改名为《柏林报》(Berlinische Blätter),1799年又用《新柏林月刊》(Neu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的名称继续出版,出版者是弗·尼古拉;1811年停刊。——325。
- 《柏林政治周刊》(Berliner Politisches Wochenblatt)——德国的一家周报,历史法学派机关报,1831—1841年在柏林出版,代表君主派的观点,对普鲁士的政治发展有影响,曾得到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支持。——17。
-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Bremer Tages-Chronik. Organ der Demokratie. Norddeutsche Abendzeitung)——德国民主派的报纸,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的名称出版,主编是鲁·杜朗,1851年起改名,阿·卢格曾为报纸撰稿。——118、346—349、359、360、366—368、478。
- 《布雷斯拉夫日报》(Breslau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20年创刊,19世纪40年代持自由派观点,50年代持保守主义倾向。——380。

C

-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年起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335、449、516、530、587、592、594、598、617、623、627、641、655—656、663。
- 《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英国的一家日报,1772—1937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中叶是辉格党右翼的机关报。——462、587、663、668、671。

D

-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了一期双刊号,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329。
-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德国的一家周报,1847年1月—1848年4月在曼海姆、1848年7—12月在巴塞尔出版,出版者是古·司徒卢威,报纸持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1848年7—12月,弗·默尔德斯和雅·罗特魏勒也用这个名称在曼海姆出版,只是加了小标题《续刊》(Neue Folge),并重新编号。——115、321—324、345、346、362、368、371、372。
- 《德国旁观者·续刊》(Deutscher Zuschauer. Neue Folge)——见《德国旁观者》。
- 《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青年黑格尔派的刊物,1838年1月—1841年6月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由阿·卢格和泰·埃希特迈尔负责编辑,简称《哈雷年鉴》或《德国年鉴》,因在普鲁士受到禁止刊行的威胁,编辑部从哈雷迁到萨克森的德累斯顿,并更名为《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从1841年7月起由阿·卢格负责编辑,继续出版,起初为文学哲学杂志,从1839年底起逐步成为政治评论性刊物,在1838—1841年还出版《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主要刊登新书广告,1843年1月3日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325、326、328。
-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德国缪斯年鉴》(Deutscher Musenalmanach)——德国的一家文学月刊,主要刊登当时的抒情诗歌;1830—1832年由 A. 温特、1832—1838年由阿·冯·沙米索和古·施瓦布、1839年起由沙米索和弗·冯·高迪在莱比锡出版;撰稿人有: J. 冯·艾兴多夫、弗·吕凯特、尼·莱诺、阿·格律恩、斐·弗莱里格拉特、路·乌朗特等人。——286、309。
-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德国通讯员》(Der Deutsche Corresponden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由弗·赖纳于1841年在巴尔的摩创办。——386、402—404、406。
- 《德累斯顿新闻通报》(Dresdner Journal und Anzeiger)——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1904年出版,起初具有民主自由主义倾向;1848年10月1日成为行政区政府机关报。——120、475、773、775、776、785、786、793、796。
- 《德意志》(Deutschland)——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1831年12月—1832年3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出版,每周出两次,主编是哈罗·哈林。——351。
-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 Zeitung)——布鲁塞尔德国流亡者创办的报纸,1847年1月3日—1848年2月27日由阿·冯·伯恩施太德主编和出版,起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倾向,后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威·沃尔弗从1847年2月底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7年9月起成为报纸的经常撰稿人,并实际领导编辑部的工作。——324、338。
- 《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43—1851年在纽约出版;报纸曾几度易名,1848年初卡·海因岑接管编辑部以前以《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为名出版,1851年1月28日—4月23日又加了副标题《关于新旧故乡的状况和利益的报纸》;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15—117、330、337、341、359、360、371—375、386、392、394—397、403、406。
- 《德意志—伦敦报。政治、文学和艺术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 Blätter für Politik, Literatur und Kunst)——伦敦德国流亡者创办的周报,1845年4月—1851年2月报纸在失去王位的不伦瑞克公爵卡尔的资助下出版;1849年

- 起由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班贝尔格尔负责编辑；1849—1850年报纸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和古·司徒卢威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文章，同时也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115、324、336、337、342、343、371、484。
- 《德意志总汇报》(Allgemeine Deutsche Zeitung)——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386。
-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英国的一家晚报，1803年起在伦敦每日出版；1866年以前是辉格党的机关报，以后是保守党的机关报。——463。
- 《独立报》(L'Indépendant)——见《比利时独立报》。
- 《度申老头》(Le Père Duchesen)——法国的一家周报，1790—1794年在巴黎出版；主编是雅各宾派左翼领袖雅·勒·阿贝尔。——749。

F

-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德国的一家日报，1665年左右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创刊，1684—1903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823—1903年每日出版文学附刊《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19世纪40年代报纸具有温和和自由派的倾向；1842—1843年曾多次转载马克思发表在《莱茵报》的文章。——520。
- 《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见《法兰克福总邮报》。
- 《法兰克福总邮报》(Frankfurter Oberpostam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1817—1866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临时中央政府——帝国摄政和帝国内阁——的机关报，50年代是联邦议会的机关报；1852年起用《法兰克福邮报》(Frankfurter Postzeitung)的名称出版，1829—1847年编辑是卡·彼·贝尔利，1848—1849年为G. 马尔滕。——519、643。
- 《法兰克福通讯员》(Fränkischer Correspondent)——见《德国通讯员》。
- 《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Publiciste de Republique Française)——见《人民之友》。
-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 《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 Politique, industrie, sciences, arts et littérature)——法

国的一家杂志,傅立叶派的刊物《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结合的农工法郎吉的报纸》(Le Phalanstere, 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ere, associee en travaux et en menage)的续刊;1836年—1840年9月用现在这个名称出版,每月出两次,1843年7月以前每周出三次;7月以后又先后改名为《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La Phalange. Revue de la science sociale)和《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e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ere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1851年停刊;主编是维·孔西德朗。——163,164。

《法伦斯泰尔.关于建立劳动和家庭生活相合的农工法朗吉的报纸》(Le Phalanstere, journal pour la fondation d'une phalange agricole et manufacturiere, associee en travaux et en menage)——见《法朗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G

《高地哨兵》(Der Hochwächter)——德国流亡者的一家周报,1850年9月27日—1859年前后由弗·哈骚雷克在美国辛辛那提出版。——711。

《改革报》(La Réform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6月—1850年1月在巴黎出版,主编是赖德律-罗兰;1847年10月—1848年1月曾刊登恩格斯的许多文章。——163,164,332,342。

《改革报》(Die Reform)——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6月由阿·卢格和亨·伯·奥本海姆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版,副标题是《政治日报》,1848年中至50年代初在柏林出版,副标题改为《民主派机关报》;主编是爱·梅因。——331—333,380。

《戈尔韦信使和康诺特周报》(The Galway Mercury and Connaught Weekly Advertiser)——爱尔兰的一家周报,马克思曾根据1853年2月19日《人民报》引用了原先在该报发表的《爱尔兰西部人口减少》一文。——660。

《革命》(Die Revolution)——见《进化.政治周报》。

《革命》(Die Revolution)——约·魏德迈在纽约出版的德文周报,1852年1月6日和13日出版两期后,由于物质上的困难不得不停刊,1852年5月和6月,魏德迈在阿·克路斯的资助下又作为月刊出版了两期《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272,273,734,758—764。

- 《革命报》(La Revolution)——见《民主社会革命报》。
- 《革命。不定期刊物》(Die Revolution. Eine Zeitschrift in zwanglosen Heften)——见《革命》。
- 《工人共和国报》(Republik der Arbeiter)——1850—1855年由威·魏特林在纽约出版的一家德文报纸,最初是月刊,后改为周报;其宗旨是宣扬宗派主义的平均共产主义观点。——363、489—491。
- 《共和国政府报。德意志共和国!繁荣昌盛、人人自由!》(Republikanisches Regierungs-Blatt. Deutsche Republik! Wohlstand, Bildung, Freiheit für Alle)——德国的一家报纸,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机关报;1848年9月21—24日巴登革命时期由古·司徒卢威和卡·布林德在勒拉赫出版。——322。
- 《关于欧洲形势、德国公众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 für europäische Zustände, öffentliches und sociales Leben Deutschlands)——见《德意志快邮报》。
- 《观察家》(The Examin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08—1881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445、516、559。
-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4月1日—1915年在柏林出版;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后为民族自由党的机关报;1866年以后支持俾斯麦的政策,1870—1871年曾号召兼并法国领土,主张武力镇压巴黎公社。——131、519、520。
- 《国民报》(Le National)——法国的一家日报,1830年由路·阿·梯也尔、弗·奥·玛·米涅和阿·卡尔在巴黎创刊;1834—1848年用《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的名称出版;40年代是温和的共和党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聚集在报纸周围的有阿·马拉斯特、路·安·加尔涅-帕热斯和路·安·卡芬雅克等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51年停刊。——142、143、150、151、180。
- 《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见《总汇通报》。
-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法国的一家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代表两个保皇派,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的观点,支持他们的合并。——205、365。
- 《国民议会通报》(Le Message de l'Assemblée)——法国反波拿巴派的日报,1851年2月16日—12月2日在巴黎出版。——216。

H

- 《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哈雷年鉴附刊》(Intelligenzblatt zu den Hallischen Jahrbüchern)——见《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
- 《和平民主日报。维护政府和人民利益的报纸》(La Democratie pacifique. Journal des interets des gouvernements et des peuples)——见《法郎吉。社会科学评论。政治、工业、科学、艺术和文学》。
- 《赫尔报》(The Hull 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报纸,1799—1867年在赫尔出版。——357、455、463、467。
- 《湖滨小报》(Seebblätter)——德国的一家报纸,30年代中至1849年在康斯坦茨出版;1836—1848年4月主编是约·菲克勒尔;先是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机关报,后为民主派的机关报。——382。
- 《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见《泰晤士报》。

J

- 《基督徒全国联盟报》(L'Univers. Union Catholique)——法国教权派的报纸,1833年在巴黎创刊;19世纪50年代支持波拿巴派。——629。
- 《基督徒的娱乐。基督教读者手册》(Christoterpe. Ein Taschenbuch für christliche Leser)——德国虔诚主义的文学杂志,1833—1853年由阿·克纳普在蒂宾根和海德堡出版。——286、309。
- 《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120、367、445、460 462、540、587、607、642。
-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刊物;1851年6月—1852年4月在伦敦出版;主编是厄·琼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支持这个杂志,参加它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并在周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260、693、700。
- 《家常话。周刊》(Household Words. A Weekly Journal)——英国的一家文学周报,1850—1859年由查·狄更斯在伦敦出版。——316。
- 《建筑师》(The Builder)——英国的一家建筑学问题周刊,1842年起在伦敦出

版。——674。

《进化.政治周报》(Die Evolution. Ein politisches Wochenblatt)——革命民主派的周报,侨居瑞士的德国流亡者的机关报,1848年12月29日—1849年3月9日在比尔出版,共出了11期;主编是约·菲·贝克尔;报纸在1848年12月1日曾用《革命》(Die Revolution)的名称试行出版;报纸奉行革命民主主义方针。——336。

《警钟报》(Wecker)——见《巴尔的摩警钟报》。

《经济学家.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和一般新闻》(The Economist. Weekly commercial Times, bankers' Gazette, and railway Monitor: a political, literary, and general 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43年在伦敦创刊,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报纸。——194—195、197、198、200、201、205、207、209—215、217、219、232、412、426、432—435、440—442、444、446—448、450—452、455—456、466、583、597—604、606、608、622—624、625、681—682、659、662。

K

《卡尔斯鲁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巴登政府的官方报纸;1757年在卡尔斯鲁厄创刊;1849年5月15日—6月2日巴登革命时期为“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1849年7月3—24日为巴登“临时政府的机关报”;编辑是卡·布林德、亨·伯·奥本海姆和保·勒米施。——334、336、380。

《科隆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世纪创刊,1802—1945年用这个名称出版;19世纪40年代初代表温和自由派的观点,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反对派持批判态度,维护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科隆教会争论中代表天主教会的利益;《莱茵报》被查封后,报纸成为莱茵地区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机关报;1831年起报纸出版者是杜蒙,1842年报纸的政治编辑是海尔梅斯。——115、116、274、335、373、374、475、478—480、482—489、491—497、499—518、520—531、535—537、540—544、548、555—557、560、561、567、640、643、723、775—777、790、791、794。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快邮周报》(Wochenblatt der Schnellpost)——见《纽约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

L

-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见《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
-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德国的一家日报,青年黑格尔派的喉舌;1842年1月1日—1843年3月31日在莱茵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下在科隆出版;创办人是伯·腊韦,编辑是伯·腊韦和阿·鲁滕堡,发行负责人是路·舒尔茨和格·荣克;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报纸撰稿,同年10月马克思成为报纸编辑;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报纸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反对派报纸之一;1843年4月1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19。
- 《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2年创刊,1843—1918年用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455。
- 《劳埃德氏新闻周刊》(Lloyd's Weekly Newspaper)——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 《劳埃德氏周刊》(Lloyd's Paper)——见《劳埃德氏伦敦新闻周刊》。
- 《联盟报》(L'Univers)——见《基督教全国联盟报》。
- 《立宪主义者报。政治和文学汇刊》(Le Constitutionnel. Journal politique, littéraire, universel)——法国资产阶级的报纸,1815—1870年用不同名称在巴黎出版,40年代是奥尔良派温和的一翼的机关报,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代表以梯也尔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361。
- 《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Le Proscrit. Journal de la republique universelle)——在巴黎和伦敦用法文出版的一家月刊,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850年7—8月共出两期;参加编辑部的有赖德律-洛兰、朱·马志尼、豪格、埃·阿拉戈、达拉什、德勒克吕兹和沃尔策耳;1850年10月底至1851年9月改为周刊《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在法国的圣阿芒出版。——239、346。
- 《流亡者之声》(La Voix du Proscrit)——见《流亡者。世界共和国杂志》。
- 《柳叶刀。不列颠和国外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学、生理学、化学、药理学和公共卫生杂志》(The Lancet. Journal of British and Foreign Medicine, Surgery, Obstetrics, Physiology, Chemistry, Pharmacology and Public Health)——英国的一家医学周报,1823年在伦敦创刊。——449。

《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英国第一家画报,1842年创刊,每周出一次;曾用其他文字出版。——316、379。

《论坛报》(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M

《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The Manchester Examiner and Times)——英国自由派的报纸,1848—1894年在曼彻斯特出版,50年代每周出两次,支持自由贸易派。——592、597、622。

《曼彻斯特时报》(The Manchester Times)——见《曼彻斯特观察家时报》。

《曼海姆晚报》(Manheimer Abendzeitung)——德国的一家报纸,由卡·格律恩创办,1842—1849年在曼海姆出版,每日出一次;在卡·格律恩和卡·路·贝尔奈斯领导下代表民主主义观点;1842—1843年发表过多篇《莱茵报》上的文章以及马克思对这些文章的积极肯定的态度;在反对查封《莱茵报》问题上曾引起强烈反响,曾就《莱茵报》编辑部和马克思在该报的作用作过报道。——341、378。

《每日纪事报》(Tages-Chronik)——见《不来梅每日纪事报,民主派机关报,北德意志晚报》。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英国自由党的报纸,曼彻斯特学派的机关报,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846年1月21日由W. K. 黑尔斯在伦敦创刊,1909年起同时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出版,1930年停刊。第一任编辑为查·狄更斯,继任的编辑有约·福斯特、哈·马蒂诺(1852—1866)、H. J. 林肯、总编辑约·鲁滨逊(1868—1901)、编辑阿·加德纳(1902—1919),最后一任编辑为J. 斯·霍奇森。60年代末起亨·拉布谢尔是报纸的三个所有者之一,1901年起为某公司所有,数月后归乔·卡德伯里独有。报纸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1862年美国内战爆发,它是英国报纸中唯一支持北方的报纸。70—8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252、253、445、458、461、462、548、549、587、592、596、622—623、625、634、639、642、651、653、663、668、700—706。

《每周快讯》(Weekly Dispatch)——英国的一家星期日报,1801—1928年在伦敦出版,代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259。

《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Belletristisches Journal und 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鲁·勒克索夫在纽约创办的德文周报,从1852年3月20日开始出版到1911年12月29日停刊止曾几易其名,1853年

- 3月18日—1854年3月10日用这个名称出版,以后又先后以不同的名称出版,如《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和《刑法报》(Criminal-Zeitung)等等。——722、729。
- 《民主报。〈波罗的海守卫者〉的续刊》(Demokratische Zeitung. Neue Folge des Wächters an der Ostsee)——德国的一家日报,是1848年在斯德丁创办的《波罗的海守卫者》(Wächter an der Ostsee)的续刊,在柏林出版,1850年1月改名为《晚邮报。民主派报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同年3月取消了副标题),由爱·梅因、尤·孚赫和约·普林斯-斯密斯编辑出版,支持自由贸易派的观点,有时具有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倾向,1850年7月因同年6月颁布的普鲁士新闻出版法而停刊。——311、312、380。
- 《民主社会革命报》(La Revolution democratique et sociale)——法国的一家日报,小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48年11月7日—1849年6月13日在巴黎出版,主编是沙·德勒克吕兹。——737。
- 《民族报。民主社会党机关报》(La Nation. Organe quotidien démocrate)——比利时的一家日报,1848—1856年在布鲁塞尔出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635。
- 《模仿者》(Die Epigonen)——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杂志,1846—1848年由奥·维干德在莱比锡出版。——330。
- 《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德国缪斯年鉴》。

N

- 《您好!》(How do you do?)——德国的一家幽默周报,1796年创刊,1851年起由路·德鲁克尔用德文在伦敦出版,编辑是亨·贝特齐希。——120。
- 《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New-Yorker Deutsche Zeitung, Herausgegeben von Freunden des Fortschritts)——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日报,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1年9月2日—12月4日由卡·海因岑在纽约出版;报纸同时还出版周刊《纽约德文周报》(Wochenblatt der New-Yorker Deutschen Zeitung)。——386、392、403、406。
- 《纽约德文周报》(Wochenblatt der New-Yorker Deutschen Zeitung)——见《纽约德文报。进步之友出版》。

- 《纽约快邮报》(New-Yorker 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 《纽约论坛报》(New-York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斯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 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 Semi-Weekly Tribune)。——7、63、411、415、425、439、454、460、552、564、573、581、667。
- 《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 Weekly Tribune)——见《纽约每日论坛报》。
- 《纽约民主主义者报》(New-Yorker Demokra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1845—1876年在纽约出版;曾数度易名,1846—1856年的名称为《纽约州民主主义者周报》(Wöchentlicher New-Yorker Staats-Demokrat);1848年起由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编辑出版。——708。
- 《纽约先驱报》(The New-York Herald)——美国的一家日报,共和党的机关报,1835年创刊,创办人和发行人是詹·戈·贝奈特,编辑是谢·舍维奇(1866年起),1841—1924年用这个名称在纽约出版。——726。
- 《纽约刑法报》(New-Yorker 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 《纽约州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在美国的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1834年创刊,最初为周报,1844年起改为日报,代表德国流亡者中的自由派的观点,1849—1850年支持伦敦德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从50年代中期起支持美国民主党的政策。——117、372、374、386、393。
- 《纽约州民主主义者周报》(Wöchentlicher New-Yorker Staats-Demokrat)——见《纽约民主主义者报》。
- 《农业报》(Gazeta Agricole)——法国的一家月刊,1842年起在巴黎出版。——727。

P

- 《旁观者》(Spectator)——英国自由派的周报,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445、

516。

《普鲁士报》(Preußische 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普尔和多塞特郡先驱周报》(Poole and Dorsetshire Weekly Herald)——英国的一家地方报纸。——434。

《普鲁士国家报》(Preußische Staats-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国家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r Staats-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1819年1月2日—1843年6月30日在柏林出版,1843年7月1日—1848年4月30日用《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的名称出版,1848年5月1日—1850年12月31日改名为《普鲁士国家通报》(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51年1月—1871年5月改名为《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871年5月4日起成为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官方报纸,并更名为《德意志帝国通报和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Deutscher Reichs-Anzeiger und 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1917年停刊。——95。

《普鲁士石印通讯》(Preußische 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普鲁士外交部的半官方报纸,在柏林出版;编辑是沙伊德勒(19世纪50年代)。——113、119、120、395、723。

《普鲁士王国国家通报》(Königlich Preußischer Staats-Anzeiger)——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普鲁士总汇报》(Allgemeine Preußische Zeitung)——见《普鲁士国家总汇报》。

R

《人民报,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报纸》(Le Peuple, Journal de la république démocratique et sociale)。——153、154、163、164、166、172、342。

《人民报。维护公正政治和普遍权利》(The People's Paper, the champion of political justice and universal right)——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2年5月由厄·琼斯在伦敦创刊;1852年10月—1856年1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为报纸撰稿,并对报纸的编辑工作给以帮助;周报除刊登马克思和恩格斯专门为之撰写的文章外,还转载他们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发表的文章;在这个时期,报纸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后来琼斯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日益接近,致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停止撰稿并同琼斯的关系一度破

裂;1856年6月报纸转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427—431、433、456—458、465、466、469、516、546—548、592、604、605、654、656、771。

《人民之友》(The Friend of the People)——英国的一家周报,宪章派左翼的机关报;1850年12月7日—1851年7月26日在伦敦出版,主编是乔·哈尼。——688。

《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法国的一家报纸,1789年9月12日由让·保·马拉在巴黎创办,并由他任主编出版至1793年7月初;1793年7月16日起由雅·卢任主编,并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政论家》(Publiciste de la Republique française)。——749。

S

《赛马新闻》(Racing Times)——英国的一家体育周报,1851年在伦敦创刊。——674。

《石印通讯》(Lithographische Correspondenz)——见《普鲁士石印通讯》。

《十字报》(Kreuz-Zeitung)——见《新普鲁士报》。

T

《太阳报》(The Sun)——英国的一家报纸,1798—1876年在伦敦出版,持有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倾向。——603。

《泰晤士报》(The 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沃尔特第二,约·沃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撒·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戴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倾向;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256、259、363—364、434、437、440、445、450—451、463、465、466、540、548、549、562、574—579、583—587、589—592、594、599、607、608、616、617、622、627—633、636—639、644—649、667、670—

673、734、799、800。

《通报》(Le Moniteur)——见《总汇通报》。

W

《晚邮报。民主派报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见《民主报。〈波罗的海守卫者〉的续刊》。

《维也纳日报》(Wiener Zeitung)——见《奥地利帝国维也纳日报》。

《卫报》(The Guardian)——英国的一家周报，英国国教会的机关报；1846年在伦敦创刊。——460、461。

《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英国自由派的一家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学杂志，1824—1887年为季刊，1887—1914年改为月刊；创办人是耶·边沁和约·包令，后由詹·斯·穆勒和约·斯·穆勒编辑出版。——626。

《威斯特伐利亚报》(Westphalia Gazette)——见《西德意志报》。

X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849年5月25日—1850年7月21日由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编辑是亨·毕尔格尔斯；报纸采取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报纸是在《新莱茵报》停刊后开始出版的，企图以《新莱茵报》的继承者自居，并声明，对《新莱茵报》的订户今后将改送《西德意志报》。——342、711—712、716、722、772。

《西美周刊》(Westamerikanische Blätter)——383。

《戏剧节目。精神、情感和舆论杂谈》(Didaskalia. Blätter für Geist, Gemüth und Publizität)——见《法兰克福报》。

《先驱》(The Leader)——英国的一家周报，1850年3月—1860年6月由桑·汉特在伦敦出版。——334、398、516、625、642、649。

《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英国保守党的日报，1780—1869年在伦敦出版。——460、466、587、593、607、621、639、651—653。

《宪法报。人民宪法生活和教育问题日报》(Die Constitution. Tagsblatt für constitutionelles Volksleben und Belehrung)——奥地利民主派的报纸，1848年3—10月在维也纳出版，编辑是莱·海弗纳。——369。

《小报》(The Tablet)——英国天主教的周报，1840年在伦敦创刊。——597。

- 《小金虫。文人雅士的杂志》(Der Maikäfer. Eine Zeitschrift für Nicht-Philister)——德国的一家油印文学周报,1840年由哥·金克尔和约·莫克尔在波恩创刊出版,1848—1849年革命爆发前停刊。——298。
- 《新波恩日报》(Neue Bonner Zeitung)——见《波恩日报》。
- 《新柏林月刊》(Neue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见《柏林月刊》。
- 《新德意志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Deut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年7月1日—1849年4月1日在达姆施塔特、4月1日以后—1850年12月14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编辑是奥·吕宁(1849年10月1日以前)、格·君特和约·魏德迈(10月1日以后);报纸持左派民主主义立场,1848—1849年在魏德迈的影响下接近《新莱茵报》,1849—1850年支持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互助会;后因其编辑被驱逐出境而被迫停刊。——273。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74、78、79、100、108、328、519、521、711、772、780、783、791。
- 《新莱茵报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s-Revue)——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149、168。
-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普鲁士容克和宫廷奸党的喉舌;1846年6月在柏林创刊;创办人是恩·路·格尔拉赫和汉·胡·克莱斯特·雷佐夫,编辑是海·瓦盖纳(1848—1854);报纸的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所以又有《十字报》(Kreuz-Zeitung)之称;1939年停刊。——120、333、380、519、548、643、722。
- 《新闻报》(La Presse)——法国的一家日报,1836年在巴黎创刊,七月王朝时期

具有反政府的性质；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是反波拿巴派的报纸；1836—1857年主编是埃·日拉丹。——180。

《刑法报》(Criminal-Zeitung)——见《美文学杂志和纽约刑法报》。

Y

《雅典娜神殿。文学、科学和艺术杂志》(The Athenaeum.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fine Arts)——英国的一家文艺评论周刊，1828—1921年在伦敦出版。——674。

《雅努斯。德文杂志》(Janus. Deutsche Zeitschrift)——在美国出版的一家德文周报，1851年1月—1852年12月由卡·海因岑主持的编辑部在纽约出版；在美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383。

《1834年国民报》(Le National de 1834)——见《国民报》。

《1850年人民报》(Le Peuple de 1850)——见《人民报，民主社会共和国的报纸》。

《议会报》(Il Parlamento)——意大利温和自由派的报纸，1853年起在都灵出版。——641、800。

《意大利与人民》(Italia e Popolo)——668。

《印度之友》(The Friend of India)——孟加拉的一家英文报纸，1818年在塞兰布尔创刊；19世纪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451。

《宇宙。伦敦出版的德文报纸》(Der Kosmos. Deutsche Zeitung aus London)——在英国出版的一家德文月刊，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机关报；1851年5月由恩·豪格在伦敦出版；撰稿人有：哥·金克尔、阿·卢格、约·隆格、亨·伯·奥本海姆和卡·陶森瑙。——114、118、317、370—372、375。

Z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年在巴黎创刊，1814年起用这个名称出版；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1849年革命时期支持反革命；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为温和的奥尔良反对派的机关报；70—80年代报纸具有保守主义倾向。——142、218、219、365、664。

《州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州报》。

《自由人报和商业日报》(The Freeman's Journal and Daily commercial Adver-

- tiser)——爱尔兰的一家日报,1763—1924年在都柏林出版,19世纪40—50年代支持取消英爱合并的要求,维护爱尔兰租佃者的权利。——593、597。
-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德国的一家日报,1798年由约·弗·科塔创办,由科塔出版社先后在蒂宾根、乌尔姆和斯图加特出版,1810—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基本上持保守派的观点,但温和自由派的观点也常见于报端;特别是三月革命以前,报纸是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主要喉舌;50—60年代支持在奥地利霸权下统一德国的计划。——122、329、366—367、370。
-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法国的一家日报,1789—1901年在巴黎出版,1811年1月1日起用这个名称出版,最初用《国民报,或总汇通报》(Gazette nationale, ou Le Moniteur universel)的名称出版;1799—1814、1816—1868年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48年2月26日起加副标题《法兰西共和国官方报纸》;巴黎被围困期间,报纸在巴黎和图尔两地同时出版,后在波尔多出版,是甘必大领导的国防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机关报。——99、144—149、153、163、167—168、171—174、180、184、188、189、195、196、199、209、211、217、219、220、225、230、635、664、735。
- 《祖国报。商业、农业、工业、文学、科学和艺术报》(La Patrie. Journal du commerce, de l'agriculture, de l'industrie, de la littérature,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法国的一家日报,1841年在巴黎创刊;1850年报纸支持秩序党的保皇派选举联盟;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后成为波拿巴派的机关报。——194、361、363—365。